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体例说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34卷(包括总目录卷1卷),收入自80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10000余件,文献上限为1917年初,下限至90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本卷选编的苏联历史档案文献分为 5 个专题。

“苏联与芬兰的战争”专题：本卷收录的有关苏芬战争的档案文献，主要是从外交的角度反映了战争的起因和结果，其中包括 1939 年 3 月至 1940 年 3 月苏联与芬兰之间进行外交接触和外交谈判的往来函电、谈话记录和会议记录，以及苏联在战争期间开展外交活动的情况，最后收录了苏联军方对于战争的总结，从中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对保证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方针，以及实现这种外交方针的具体策略。

“苏南冲突的起源及其公开化”专题：本卷收录的 50 多份俄国近年来解密的档案文献（包括个别南斯拉夫档案），主要是在此期间苏南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之间的声明、照会、往来电函和会谈记录。从事件的发展过程看，这些文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应该还有大量的档案文献，或者尚未公布，或者编者没有收集到。

“联共（布）中央 2~3 月全会与布哈林问题”专题：本卷收录的文件包括全会召开前夕布哈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和给中央全会全体成员的声明，安德列耶夫、莫洛托夫、奥新斯基等人的发言，全会关于叶若夫报告的决议，斯大林就布哈林问题所作的报告等。

“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专题和“关于中央各机关的‘荣誉法庭’”专题：反映的是从 1946 年年底开始的“树立苏维埃爱国

主义精神”、反对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者进行“再教育”的大规模运动中的一个突出事件——所谓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收录的文件包括苏联卫生部以党组织的名义要求把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送上荣誉法庭的呼吁书，卫生部荣誉法庭第一次开庭速记记录，公诉人在荣誉法庭上的发言摘录，卫生部荣誉法庭判决书，联共（布）中央就此案件所发的内部信件等。这些文件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特点和文化领域的气氛、制造这一案件的目的以及这一案件的影响，同时也记录了战后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

沈志华

2000年11月

目 录

本卷前言 22-1

苏联与芬兰的战争

(1939年3月至1940年3月)

专题说明 22-1

No05699 李维诺夫与伊里耶-科斯基宁关于苏租借岛屿
的谈话记录(1939年3月5日) 22-3

No05700 李维诺夫与伊里耶-科斯基宁关于租借岛屿的
谈话记录(1939年3月8日) 22-4

No05701 斯坦因与埃里科关于苏芬关系的谈话记录
(1939年3月11日) 22-6

No05702 斯坦因与坦涅尔关于交换苏芬领上的谈话记录
(1939年3月13日) 22-10

No05703 斯坦因与埃里科关于苏芬交换领上的谈话记录
(1939年3月17日) 22-13

No05704 斯坦因与埃里科关于苏芬交换领土的谈话记录
(1939年3月24日) 22-16

No05705 莫洛托夫与伊里耶-科斯基宁关于苏芬双边
关系的谈话记录(1939年10月5日) 22-19

No05706 苏联政府关于租赁岛屿问题给芬兰政府的备忘录
(1939年10月14日) 22-21

№05707	芬兰政府关于领土交换问题给苏联政府的备忘录 (1939年10月22日)	22-23
№05708	苏联政府关于领土交换问题给芬兰政府的备忘录 (1939年10月23日)	22-26
№05709	芬兰政府关于领土交换问题给苏联政府的备忘录 (1939年10月31日)	22-28
№05710	芬兰政府关于拒绝提供军事基地致苏联政府 的声明(1939年11月9日)	22-32
№05711	莫洛托夫关于军事基地问题给巴锡基维和 坦涅尔的信(1939年11月9日)	22-33
№05712	巴锡基维和坦涅尔关于军事基地问题给 莫洛托夫的信(1939年11月10日)	22-34
№05713	巴锡基维和坦涅尔回国前给莫洛托夫的感谢信 (1939年11月13日)	22-36
№05714	莫洛托夫关于召回苏联代表给伊里耶-科斯基宁 的照会(1939年11月29日)	22-37
№05715	波将金关于召回苏联代表与芬兰公使谈话的日记 (节录)(1939年11月29日)	22-38
№05716	莫洛托夫关于芬兰局势与德国大使舒伦堡的谈话 记录(1939年11月30日)	22-39
№05717	莫洛托夫关于苏芬关系与瑞典公使文特的谈话 记录(1939年12月4日)	22-41
№05718	莫洛托夫关于苏芬关系与瑞典公使阿萨里逊的 谈话记录(1940年2月20日)	22-44
№05719	莫洛托夫关于苏芬冲突与阿萨里逊的谈话记录 (1940年3月4日)	22-46
№05720	莫洛托夫关于苏芬冲突与阿萨里逊的谈话记录 (1940年3月5日)	22-47
№05721	苏联政府关于苏芬谈判的备忘录 (1940年3月5日)	22-49

No05722	莫洛托夫关于苏芬和谈与阿萨里逊的谈话记录 (1940年3月7日)	22-50
No05723	莫洛托夫与芬兰代表团关于缔结和约问题的 会谈记录(1940年3月8日)	22-52
No05724	莫洛托夫与芬兰代表团关于缔结和约问题的 会谈记录(1940年3月10日)	22-56
No05725	莫洛托夫与芬兰代表团关于缔结和约问题的 会谈记录(1940年3月11日)	22-61
No05726	莫洛托夫与芬兰代表团关于缔结和约问题的 会谈记录(1940年3月12日)	22-64
No05727	莫洛托夫与芬兰代表团关于缔结和约 问题的会谈记录(1940年3月12日)	22-67
No05728	莫洛托夫关于苏芬条约与舒伦堡的谈话记录 (1940年3月26日)	22-70
No01658	伏罗希洛夫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关于苏芬 战争的总结报告(1940年3月28日)	22-72

苏南冲突的起源及其公开化

(1944年4月至1948年7月)

专题说明	22-100	
No07817	莫洛托夫与吉拉斯关于南斯拉夫形势和政策的 谈话记录(1944年4月24日)	22-102
No07818	斯大林与赫布朗关于南斯拉夫军队和外交问题的 会谈记录(1945年1月9日)	22-112
No07819	莫洛托夫与舒巴希奇关于南斯拉夫外交问题的 谈话记录(1945年4月6日)	22-130

- No07828 萨德奇科夫与保加利亚公使托多罗夫关于成立南斯拉夫联邦的谈话记录
(1945年10月23日) 22-136
- No07829 萨德奇科夫与南人民农民党领袖关于选举失败原因的谈话记录(1945年11月12日) 22-138
- No07830 萨德奇科夫关于南斯拉夫新宪法草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1945年12月17日) 22-140
- No07831 萨德奇科夫关于南斯拉夫政治局势给莫洛托夫的信(1945年12月18日) 22-146
- No02518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的苏方记录
(1946年5月27日) 22-152
- No02519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的南方记录
(1946年5月27日) 22-160
- No03608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的南方记录
(1946年6月9日) 22-162
- No07833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菲京关于南人民阵线内反对派活动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6年6月30日) 22-171
- No07820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反对派活动等问题的谈话(摘录)(1947年4月2日) 22-173
- No07821 拉夫连季耶夫与卡德尔关于参加马歇尔计划问题的电话记录(1947年7月4日) 22-177
- No07822 拉夫连季耶夫与卡德尔关于南斯拉夫干部政策问题的谈话记录(1947年7月6-7日) 22-178
- No07823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阿-南争论问题的谈话记录(1947年8月14-15日) 22-181
- No07825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整理的关于南斯拉夫现状的备忘录(摘录)(1947年9月) 22-184

- No078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同东欧各国签订互助
条约问题给外交部的指示
（1947年10月14日） 22 - 191
- No07481**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会议后
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
（1948年1月28日） 22 - 192
- No07484** 莫洛托夫与卡德尔关于铁托访苏和贷款问题的
谈话记录（1948年2月13日） 22 - 196
- No07488**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苏南经济关系问题的
谈话记录（摘录）（1948年3月10日） 22 - 198
- No01621** 莫洛托夫就苏南关系一些问题致铁托电
（1948年3月13日） 22 - 201
- No07489**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南斯拉夫意识
形态问题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8年3月18日） 22 - 203
- No01622** 铁托就苏南关系一些问题给莫洛托夫的信
（1948年3月18日） 22 - 217
- No01623** 莫洛托夫关于撤回苏联专家致铁托或卡德尔的
电报（1948年3月18日） 22 - 220
- No01624** 铁托关于苏联撤回专家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8年3月20日） 22 - 222
- No07490** 莫洛托夫关于召回苏联专家与波波维奇的谈话
记录（1948年3月24日） 22 - 225
- No03444** 波波维奇关于会见莫洛托夫致铁托电
（1948年3月24日） 22 - 227
- No03445** 波波维奇关于会见莫洛托夫给铁托的报告
（1948年3月25日） 22 - 228
- No01625** 斯大林、莫洛托夫关于苏南关系诸问题致
铁托的信（1948年3月27日） 22 - 232

- №01626** 铁托、卡德尔关于答复对南共的指责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 (1948年4月13日) 22 - 239
- №01627** 南共中央关于中央全会决定给联共(布)中央的通报 (1948年4月13日) 22 - 255
- №01628** 日丹诺夫关于转交匈共信件致铁托的信 (1948年4月14日) 22 - 257
- №01629** 南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公开苏南分歧致日丹诺夫的信 (1948年4月16日) 22 - 258
- №03446** 波波维奇关于会见莫洛托夫致铁托电 (1948年4月19日) 22 - 260
- №03447** 莫洛托夫关于会见波波维奇给拉夫连季耶夫的通报 (摘录) (1948年4月19日) 22 - 263
- №07491** 拉夫连季耶夫与贝勃勒关于苏南关系恶化问题的谈话记录 (摘录) (1948年4月21日) 22 - 264
- №01630** 莫洛托夫致拉夫连季耶夫转贝勃勒的电报 (摘录) (1948年4月23日) 22 - 268
- №03448** 西米奇关于与拉夫连季耶夫会谈的纪要 (摘录) (1948年4月23日) 22 - 269
- №07492** 拉夫连季耶夫与别洛夫斯基关于保南联盟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8年4月27日) 22 - 271
- №01631** 联共(布)中央关于南共问题致南共中央的信 (1948年5月4日) 22 - 272
- №01632** 铁托、卡德尔关于处理分歧问题的意见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 (1948年5月17日) 22 - 296
- №01633** 苏斯洛夫关于召开情报局会议致铁托的信 (1948年5月18日) 22 - 298
- №01634** 铁托关于南共不出席情报局会议致苏斯洛夫的信 (1948年5月20日) 22 - 299

- No01635** 苏联关于对意和约给南斯拉夫的照会
(1948年5月20日) 22-300
- No01636** 联共(布)中央关于驳斥南共答复致南共
中央的信(1948年5月22日) 22-302
- No07493** 莫舍托夫递交联共(布)中央信件时与铁托和
卡德尔的谈话记录
(不早于1948年5月22日) 22-306
- No01637** 南斯拉夫关于对意和约给苏联的照会(摘录)
(1948年5月28日) 22-312
- No01638** 莫洛托夫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给铁托或
卡德尔的电报(摘录)(1948年6月9日) ... 22-314
- No01639** 南共中央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致联共
(布)中央的声明(1948年6月17日) 22-315
- No01640** 联共(布)中央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致
南共中央的信(1948年6月19日) 22-316
- No03053** 情报局关于邀请南共出席情报局会议的信函
(1948年6月19日) 22-318
- No03054** 南共中央关于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的声明
(1948年6月20日) 22-319
- No03055**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摘录)
(1948年6月28日) 22-322
- No03056** 南共中央关于情报局决议的声明(摘录)
(1948年6月29日) 22-330
- No01641** 南共中央关于召开南共五大致联共(布)
中央的信(1948年7月1日) 22-338
- No07494** 基尔萨诺夫与费依奇关于从苏联召回所有南斯
拉夫公民的谈话记录
(1948年7月6日) 22-339

联共（布）中央2~3月全会与布哈林问题
(1937年2月)

专题说明	22 - 341
No05748 布哈林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7年2月20日)	22 - 342
No0574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录 (1937年2月22日)	22 - 421
No05752 联共（布）中央全会2月25日午前会议的 会议记录(1937年2月25日)	22 - 422
No03451 联共（布）中央全会2月25日晚间会议的 会议记录(1937年2月25日)	22 - 462
No03453 联共（布）中央全会2月26日午前会议的 会议记录(1937年2月26日)	22 - 494
No11615 联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叶若夫报告的决议 (1937年2月27日)	22 - 526
No03452 联共（布）中央全会2月27日晚间会议的 会议记录(1937年2月27日)	22 - 528

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
(1947年5~7月)

专题说明	22 - 531
No06450 苏联卫生部党组织给新兴尔诺夫的呼字书 (不晚于1947年5月7日)	22 - 533
No06451 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第一次开庭速记记录 (1947年6月5日)	22 - 537

- No06452** 公诉人库普里亚诺夫在荣誉法庭上的发言摘录
(1947年6月6日) 22-547
- No06453** 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判决书
(1947年6月7日) 22-555
- No06449** 联共(布)中央致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的非公开信
(1947年7月16日) 22-559

关于中央各机关的“荣誉法庭”

(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

- 专题说明** 22-565
- No0448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各部和中央
各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的决议
(1947年3月28日) 22-567
- No044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联共(布)中央
机关荣誉法庭的决议
(1947年9月23日) 22-570
- No04489**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联共(布)中央
机关中选举荣誉法庭的决定
(1947年9月26日) 22-571
- No04490** 联共(布)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在联共(布)
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选举荣誉法庭的大会上的报告
(1947年9月29日) 22-572
- No04491** 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关于
成立荣誉法庭的决议
(不早于1947年9月29日) 22-590
- No044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苏联部长
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荣誉法庭的决议
(1948年4月5日) 22-592

【专题说明】

苏联与芬兰的战争

(1939年3月至1940年3月)

芬兰地处北欧，在19世纪以前曾是瑞典王国的一个组成部分。1809年瑞典在与俄国的战争中败北后，芬兰成为俄罗斯的一个大公国。1917年12月，芬兰脱离俄国而独立。1933年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崛起后，苏联对本国的安全忧心忡忡。为了扩大和加强苏联的安全缓冲带，1938年4月，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李维诺夫向芬兰政府提出了缔结互助条约的要求，被芬兰拒绝。随后，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斯坦因利用在芬兰度假的机会，多次与芬兰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进行秘密交涉，但还是没有结果。次年3月，苏联政府正式向芬兰提出，要芬兰政府向苏联租让某些沿海岛屿，以保证列宁格勒的安全，再次被芬兰政府否决。此后，苏芬双方继续进行激烈的外交讨价还价，最后还是没有达到苏联所希望的结果。1939年11月29日，苏联宣布苏芬关系破裂，次日苏军进入芬兰境内，战争爆发。由于芬兰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苏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才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战争伊始，苏联便扶植了以芬兰共产党人库西宁为首的芬兰人民政府，而拒绝与原政府打交道。随着战事越来越有利于苏联的发展，在瑞典驻苏联外交官的斡旋下，苏芬双方重新开始外交谈判。在苏联的军事威胁和压力下，芬兰终于完全接受了苏联

提出的更为苛刻的条件。直到1940年3月12日战斗停止，战争共持续了三个多月，史称“百日战争”。

在过去苏联和中国史学中，对于苏芬战争的研究较多地注意了战争的过程本身以及战争的结局，而对于引起战争的外交争端，围绕战争和由于战争结果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则缺乏深入的考察，其原因之一是没有公布这方面的档案文献。这里收录的俄国档案文献，主要是关于1939年3月至1940年3月苏联与芬兰之间进行外交接触和外交谈判的往来函电，谈话记录和会议记录，以及苏联在战争期间开展外交活动的情况。最后收录了苏联军方对于战争的总结。这些档案文献从苏芬关系这个侧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对国际局势的整体考虑，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方针，以及实现这种外交方针的具体策略。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胡昊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胡昊、方琼、乌传霖等)

No05699

李维诺夫与伊里耶－科斯基宁关于 苏租借岛屿的谈话记录

(1939年3月5日)

今天，我召见了（伊里耶－科斯基宁）^①，互致问候之后，我向他声明如下：

我们与芬兰的关系面临着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关系和阿兰群岛。为了满意地解决这些问题，希望形成必要的信任和友好气氛。我们认为，芬兰政府接受我们的建议就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在芬兰湾有几个小岛，它们对芬兰政府没有多大意义，而且也没有得到利用，如戈格兰、拉瓦萨雷、谢斯卡里和秋捷尔萨里。我们想租借这些岛屿30年。我们绝对不想在这些岛屿设防，只是想利用它们作为观察点，监视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通往列宁格勒的海上通道。如果芬兰政府同意的话，这无疑会对昨天开始的经济谈判产生有益的影响。为了不使代表团在这里滞留太久，希望尽快得到芬兰政府的答复。

科斯基宁回答说，他当然会把我们的建议转告自己的政府，他只限于指出，戈格兰不是一个小岛，那里有数千居民，有海滨浴场，该岛还是旅游观光点。

李维诺夫^②

① 伊里耶－科斯基宁，时任芬兰驻苏联公使。

② 李维诺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1876～1951），原名瓦拉赫·马克斯。1930～1939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41～1943年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兼驻美国大使。

№05700

李维诺夫与伊里耶—科斯基宁关于
租借岛屿的谈话记录

(1939 年 3 月 8 日)

伊里耶—科斯基宁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向我宣读了他收到的答复，其内容大致如下：

芬兰政府认为不可能审议租借这些岛屿 30 年的提议，这些岛屿是芬兰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以和平条约为根据并得到苏联承认的。按照苏联的要求，这些岛屿已经中立化，迄今没有任何防御设施。必须承认，甚至谈论这个内容都是与芬兰政府奉行的中立政策不相容的。芬兰政府请求无论如何不要张扬向我们提出的这个建议，因为一旦公布出去，就会使芬兰的社会舆论感到强烈不安。芬兰政府还请求不要把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混为一谈。当米高扬同志^①声明同意贸易代表团去的时候，他没有提及任何政治问题，也没有对谈判提出这样的条件。至于阿兰群岛，公使已经在与我们的谈判中声明，芬兰政府承担保卫这些群岛的义务，这样的保证对我们应该是足够了。公使个人认为，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那么将以书面形式发表宣言，也可以用交换照会的形式。

我对公使说，我的政府将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它没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答复。我们十分清楚，所提到的群岛是属于芬兰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向芬兰政府提出要求了。正因为芬兰对群岛拥有主权，应

^① 米高扬，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1895—1978），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该支配它们，所以，转让或出租，一点也不违背自己的中立政策，尤其我已经声明，我们绝对不想在这些岛屿设防。我们的看法是，这些岛屿对芬兰没有价值，把它们租出去，得到某些补偿，对芬兰是有利的。不能把经济问题完全与政治问题分开，因为它们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接受我们做出的这项提议，将在很大程度上全面改善苏联与芬兰的关系。芬兰贸易代表团也提出了我们不感兴趣的建议，然而，考虑到芬兰的利益，我们准备最大限度地迎合芬兰的提议。然而，我们也有权利期待芬兰对我们在另一个领域提出的建议给予积极的关注。所以，我希望，今天对我通报的答复不是芬兰政府的最后答复，它准备重新审核自己对我们提议的态度。我个人觉得，甚至可以把谈判转到交换领土方面。比如，对芬兰而言，把我们沿着卡累利阿^①边界相应部分让给它，要比荒芜的岛屿更使它感兴趣。芬兰总是对森林有兴趣，而这在卡累利阿非常丰富。至于阿兰群岛，由于贸易谈判正在继续，我认为解决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更紧迫一些。所以我建议，请芬兰政府再次讨论我阐述的问题。

科斯基宁对芬兰政府是否能够改变决定表示怀疑，但是答应转达我的谈话，过几天通报新的答复。

我向科斯基宁保证，我们没有透露我们谈判提到的任何打算。

李维诺夫

① 苏联西北部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的简称，首府彼得罗扎沃茨克。卡累利阿9-12世纪属基辅罗斯，15世纪并入俄罗斯，后部分领土（卡累利阿地峡和拉多加湖北岸）被瑞典占领。1721年北方战争结束后归还俄国。

No05701

斯坦因与埃里科关于苏芬 关系的谈话记录

(1939年3月11日)

礼节性问候之后，我转向了双方感兴趣的话题。我对埃里科^①说，我曾在度假时来过赫尔辛基，并为有可能再次来到芬兰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里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回忆。离开芬兰后，我仍然继续关注着苏联与芬兰关系的问题。就在前天，我与芬兰贸易代表团一起在米高扬同志那里吃饭，有可能与他，以及与李维诺夫同志就现阶段的苏芬关系进行交谈。李维诺夫同志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与伊里耶-科斯基宁谈话中涉及到阿兰群岛的内容。我的印象是，目前芬兰与苏联的关系正在真正地改善。必须考虑到这个因素。芬兰所希望的贸易条约，大约可以达到250万~300万芬兰马克这个数目。部长应该明白，芬兰代表团的愿望并不特别使苏联感兴趣，但是苏联政府准备满足这些要求，条件是将为相互信任和良好意志创造相应的气氛。正是应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理解我们提出的把群岛转交给我们的建议。另一方面，在我们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我指的是阿兰群岛问题。我们考虑到，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会把这些岛屿自愿地或被追地转交给德国，所以，武装这些岛屿会损害我们的利益。希望能有证据来证明，芬兰政府的良好意愿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就产生了三个取决于芬兰

^① 埃里科，时任芬兰外交部长。

政府的问题，可以证明它确实力争把苏芬关系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

埃里科回答如下：苏联关于转交群岛的建议完全出乎芬兰政府的意料。他提请我注意，根据芬兰宪法，政府无权向议会提出哪怕是割让最小一块芬兰领土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对通过伊里耶-科斯基宁转达的第一次建议，芬兰政府被迫给予了坚决肯定的答复。同样，通过伊里耶-科斯基宁转达的第二次建议，在内阁进行了讨论，最后也被否定了。芬兰政府是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的。他不明白，怎么会把岛屿问题与贸易条约问题联系在一起。在芬兰也有一些人士反对与苏联签订贸易条约，因为据他们说，苏联总是把贸易与政治联系起来。最后，部长还不明白前两个问题与阿兰群岛问题有什么联系。这些群岛永远不会落到德国手里。芬兰与瑞典签订了共同保卫这个群岛的协定，以防德国试图占领它。这个条约是防止对苏联造成威胁的最好保证。

我开始就所有问题逐个地答复埃里科。首先，我请他注意，他提到的三个问题（转交岛屿、贸易条约、阿兰群岛）之间在形式上当然没有严格的联系。然而却存在着潜在的联系，因为不能把经济与政治分开，分开是荒谬的。它们之间有联系是事实，这个事实是不能否定的。

部长所援引的芬兰宪法只是禁止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单纯的割让，但是绝对没有禁止平等地交换领土或者以相应的形式长期租赁。我深信，只要愿意，是可以找出不与宪法抵触的形式的。刚才提到的岛屿，对芬兰没有任何意义，其实芬兰可以用它们交换沿着卡累利阿边界的领土，而且这些领土上有丰富的优质木材。部长应该知道，正是从这些地区，芬兰每年运进了大量木材，然后再把它出口到国外，赚取利润。至于贸易条约，我再重复一次，这个贸易条约有多大的规模，取决于芬兰政府。如果芬兰代表团表现出良好

的意愿，不仅可以讨论满足芬兰代表团要求的问题，而且也可以讨论其他一系列体现芬兰利益的方案。最后，关于阿兰群岛问题，我仅想指出，芬兰政府目前的承诺无疑是空洞的。因为在议会这种体制下，不知道明天会出现什么样的政府。这就是我们希望就群岛问题表现出良好意愿的原因，正如部长所理解的，群岛对我们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们基本上位于通往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的水路上。况且，关于阿兰群岛问题目前我不打算细谈，只是在与现实有联系时才提到了这个问题。

埃里科再次声明，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是微妙和困难的。然而，与第一次不同，他已经不说讨论这个问题不可能了。相反，他对我的到来表示很满意，因为这有可能使他与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无疑，问题是很复杂的，必须对它进行全面研究。特别是他还没有与军方讲过。现在，与我谈话以后，他认为可以与军方讲了，后天就这样做。随后部长认为，在达成原则性协议的情况下，必须就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做出说明。他特别担心，类似的协定会引起国外对芬兰政府的攻击，指责它违背了自己的中立立场。他想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对此补充说，德国可能对芬兰政府提出同样的要求。我表示异议，因为这里谈的是交换领土或者是某种交易，比如说租赁，不能认为是违背中立。除了交换双方外，这与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关系。不应该由于这种特殊情况而为第三方国家形成最惠国的特权。

埃里科继续说，他提请我注意，为了能达成协议，必须事先做大量工作。这不取决于一个人，必须与许多人协商，而根据芬兰的节奏，这还需要时间。如果能够达成原则性协议，就必须对国家的社会舆论有所准备，就得考虑到，这个问题上不谨慎就会把一切搞糟。政府有许多敌人，他们会在这个问题上制造巨大的丑闻。

我注意到埃里科希望极其保密的愿望。我以开玩笑的口吻说，

我是在与外交部长交谈，而不是与《赫尔辛基萨诺马特报》的主编谈话。知道我们这次谈话的人屈指可数。无疑是可以保密的。因此，我认为，芬兰政府应该采取措施，防止将谈判内容透露出去。埃里科对此表示同意，并强调说，对谈判保守秘密，这对双方都有利。

回到与军方磋商的问题上，埃里科指出，显然，军方会做出否定的结论。我对此指出，类似的结论没有合理的逻辑：如果军方反对转交岛屿，那么这将意味着，岛屿对芬兰有军事意义。然而芬兰政府断言，这些岛屿没有设防。或者是芬兰政府提供了不正确的信息，或者是这个信息是正确的，所以岛屿没有军事意义，这就是说，军方不会反对出让它们，二者必择其一。埃里科对这些论据没有作答。

我重新简短地重复了我的有利于进行交易的论据。埃里科再次对我的到来表示满意，问我在这里呆多久。我回答以后，他说，现在去与军方谈话，以后我们再见面，继续这个话题。随后，他向我保证，他本人力争进一步发展苏联与芬兰的关系。我们约好14日见面。

D. 斯坦因^①

^① 斯坦因，时任苏联驻意大利全权代表。

№05702

斯坦因与坦涅尔关于交换苏芬 领土的谈话记录

(1939年3月13日)

坦涅尔^①在财政部接见了。由于他的会客室人多，未能进行长时间谈话，我建议与他共进晚餐。坦涅尔高兴地表示同意当晚会面。

与他就捷克事件^②和整个国际局势等内容谈了一会儿后，我就把话题转到了我们感兴趣的问题上。坦涅尔当然熟悉情况，因为他参与了小范围内阁成员对我们建议的两次讨论。他向我证实，整个政府还不知道我们的建议，只有5名内阁成员（卡扬德尔、埃里科、坦涅尔、纽卡年和哈努拉）作为三个联合政党的代表知道此事。坦涅尔重新证实了芬兰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建议的原因，并且与埃里科的话完全一样。

为了有利于使其接受我们的建议，我极为详细地向坦涅尔阐述了我的论据。这些论据主要归结为：（1）交换领土或长期租赁完全是芬兰政府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破坏它的中立；（2）类似的交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成为先例，成为任何第三方提出类似要求的借口；（3）我们建议用沿卡累利阿边界的领土作补偿，这个交易对芬兰政府特别有利，因为芬兰得到的地方不是荒芜的群岛，而

① 坦涅尔（1881—1966），曾任芬兰社会民主党主席。1926—1927年任芬兰总理。1939—1940年任财政部长。

② 指1939年3月德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是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地方；(4) 一旦出现了群岛移民问题（几百家），为此目的，我们愿意给予财政援助；(5) 进行所建议的交易，现政府就可以向右派政党证明，通过和平睦邻政策，从苏联得到了真正的帮助，这是大喊大叫反苏政策的芬兰右派政府永远得不到的；(6) 接受我们的建议，有助于在芬兰政府中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这无论对解决阿兰群岛问题，还是对顺利完成贸易谈判都是必要的；(7) 如果芬兰政府接受我们的建议，它就不仅能够指望芬兰贸易代表团提出的向芬兰出口的要求得到满足，而且可以指望满足其他对芬兰有利的贸易计划。

坦涅尔非常注意地听了我的话。他说，如果仅从商业方面讨论我们的建议，他会毫不动摇地接受它，因为这对他们是有利的。然而，问题在于，芬兰政府不仅应该从商业方面，而且要从政治方面对待这个问题。芬兰内部的政治环境就是如此，指望它接受这个建议是不可能的。芬兰政府也不能指望芬兰全国的社会舆论赞同与芬兰领土有关的某种交易。

随后，坦涅尔向我证明，他们认为把芬兰湾的群岛作为观察点对我们没有意义。至于到了战争时期，反正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我们也会占领它们。坦涅尔说，芬兰政府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回答说，所谈的不是战争时期，而是和平时期，正是在和平时期，这些岛屿位于直接通往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的通道上，我们对它们有兴趣。

坦涅尔告诉我，我阐述的论据有许多有意义的细节，这是最近芬兰政府讨论这个问题时没有考虑到的。坦涅尔说，我们必须重新讨论它。他顺便问我，是否可以具体地谈谈什么样的领土补偿。我回答说，我们迄今还没有把这个问题具体化，我们期待着芬兰政府的原则性答复。如果这个答复是肯定的，那么芬兰政府应该向我们提出关于领土补偿的建议。我们准备在任何时候讨论这个建议。谈

话结束时，坦涅尔开始说明，贸易条约问题为什么不应该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按照他的话说，在芬兰贸易代表团决定去莫斯科时，没有提出任何政治问题。所以，这就是李维诺夫同志通过伊里耶-科斯基宁所提出的建议为什么对芬兰政府是完全意外的原因。

Б. 斯坦因

№05703

斯坦因与埃里科关于苏芬交换 领土的谈话记录

(1939年3月17日)

正如约定的那样，埃里科召见我，向我宣读了芬兰政府将要寄往莫斯科的答复。在宣读这个答复之前，埃里科长时间非常激动地谈到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他对我说，这件事对芬兰的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右派对德国的好感大大降低。有意思的是，就连《阿扬苏塔》报也表示不赞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占领表明，德国的侵略与希特勒早先宣称的口耳曼民族的统一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对埃里科指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教训应该对一系列小国产生作用。现在应该十分清楚，用中立宣言拒侵略者于国门之外的企图是不会取得任何成功的。挽救的惟一出路是集体安全，把力量联合起来，为侵略者设置障碍。埃里科没有反对我的这个看法。

随后，他对我宣读了芬兰政府答复的最后一段。这段话说道：“芬兰政府关于群岛问题给予否定的答复并不意味着，芬兰政府不准备就苏联政府提出的安全问题进行谈判”。

听完这一段，我回答说，埃里科自然不会期待我就此表示什么态度。因为答复是给苏联政府的。我感谢他在科斯基宁发出这个答复之前对我宣读的好意。我问埃里科，他对谈判的提议有什么具体想法和内容，埃里科避免直接回答，他说，他已经把苏联的建议转交给国防委员会进行研究并做出结论。他（埃里科）亲自向曼纳林

元帅^①做了汇报，众所周知，曼纳林是国防委员会主席。等国防委员会做出自己的结论后，埃里科再与我具体谈。我说，我不完全理解把苏联的建议转交给国防委员会的意思，因为根据埃里科的话，芬兰政府已经否决了这个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国防委员会还要作什么结论。埃里科对此回答说，不仅把苏联的建议，而且把整个与芬兰湾有关的问题都转交给了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应该就这个内容说出自己的看法。他（埃里科）现在已经没有可以补充的了。他认为，在我们的谈判中，已经向前进展了，要知道芬兰人的心态和办事缓慢，埃里科说，应该理解一周来这一进展的意义。这是芬兰政府，特别是他（埃里科）具有良好意愿的证明。芬兰政府同意谈判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很重大的意义。

在谈到芬兰的建议中目前还没有具体内容后，埃里科回到了苏联的建议，说在苏联的建议中，涉及到交换领土的部分也没有具体内容。埃里科说，你们只是大致提出了用沿卡累利阿边界的领土作为补偿，但是没有任何明确的内容。而且许多人问我，可以谈到什么样的领土补偿。我回答埃里科说，我们确实没有具体说出什么样的领土补偿，而是期待着芬兰政府的原则答复。一旦芬兰政府对建议做出肯定的答复，我们准备立即具体地讨论它。我对所说的作了如下补充：埃里科关于领土补偿的具体问题本身使我认为，芬兰政府对我们的提议的否定答复不是最终结果，埃里科对此回答说：“我们看看再说”。

告辞时，我对埃里科说，当时正是芬兰政府通过科斯基宁请求对这些谈判保守秘密，但它却通报给了瑞典政府。我提请埃里科注意这一情况，警告他防止对谈判内容可能的和不怀好意的透露。埃

^① 曼纳林，卡尔·古斯塔夫（1867—1951），苏芬战争时期的芬兰军队总司令。1944年曾出任芬兰总统。

里科回答说，他自己曾经提议，不要向瑞典政府通报，瑞典政府可能是通过当时的外交部长霍尔斯特知道这件事的。按照埃里科的话，今年1月或去年12月就讨论过关于群岛问题，通过在此间讨论过这个问题的人士，瑞典人知道了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几天前瑞典临时代办问我，要我简短地向他作通报，同时，他保证一定对这件事保守秘密。埃里科再次向我证实，不要透露谈判的内容对双方都有利。我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打算，也不会有这样的打算。

我与埃里科约定在下周初，即3月20日或21日见面，但无论如何要等国防委员会做出自己的结论之后。

斯坦因

№05704

斯坦因与埃里科关于苏芬交换 领土的谈话记录

(1939年3月24日)

埃里科一开始先对昨天晚上没能接见我表示歉意。昨天和今天政府都举行会议，他只有今天才能与我交谈。他刚刚得到从莫斯科来的电报，说米高扬同志召见了贸易代表团团长，向他说明，只要政治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就不能签订条约。由于代表团团长不仅没有被授权就此问题发表谈话，而且他也不了解这个问题，当然，谈话就没有任何结果。在这种条件下，代表团决定离开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半人昨天已经离开，剩下的今天离开。埃里科认为谈判已经破裂，代表团不再回莫斯科了。芬兰政府不能给一事无成的代表团支付费用。如果谈判恢复，那么这次苏联代表团应该到赫尔辛基来。他对代表团回国所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他不知道，应该对社会舆论做出什么样的解释。

我说，召回不召回自己的代表团，这是芬兰政府的事情。至于埃里科应该做出的解释，我建议解释这次离开是因为谈判中出现了正常的困难，不要提及任何政治因素。任何提及政治因素的举动必然会引起问题，埃里科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埃里科试图使我相信，如果谈到政治因素，全国都会支持他，但是他的口气越来越小，还是转到了主要问题。

芬兰政府决定对芬兰未来的立场向我们做出书面保证。按照芬兰政府的意见，这种保证正是要形成我们提出建议时所要求的那种

安全感。埃里科说，这个保证照会将包含芬兰政府所承担的两个义务：（1）保卫芬兰的领土，反对任何侵略；（2）不缔结任何破坏芬兰中立的协定。

听完这些话，我对埃里科说，在没有得到我国政府对类似照会的态度以前，我应该指出，这个建议完全不符合埃里科最初的答复。那个答复说，“芬兰政府准备就苏联政府提出的安全问题进行谈判”。而埃里科现在提出的建议，与我们关于群岛的建议没有任何关系。我非常详细并几次向埃里科解释了我们建议的含义。芬兰政府否定了建议，但是同意讨论这个建议提出的问题。在与科斯基宁的谈话中，他转达了埃里科的答复，李维诺夫同志说，苏联政府准备听取芬兰的反建议。然而，埃里科现在提出的这个建议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是与我们的建议相对应的。埃里科或者应该提出自己的反建议，或者承认他的话与谈判毫不相干。我不得不坚持，必须彻底澄清这个问题。

埃里科沉默了很久，然后非常含糊地嘟囔说，他说不出更多的东西。我继续坚持，并且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将不得不向苏联政府通报，应该由苏联政府对此做出全部结论。当时，埃里科说，他想与我“私下”交谈。他想向我说明，他很理解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做了自己该做的一切。我回答说，这些话不能说服我，他应该证明自己具有真正良好的意愿。于是埃里科说，他与许多负责人就“按苏联建议的精神”提出反建议的问题进行了商量。我继续坚持要具体说明，埃里科犹豫了一会儿说，反建议包含向我们转交拉瓦萨雷和谢斯卡里两个小岛。至于苏尔萨里岛和秋捷尔萨里岛，埃里科说，根本就不能谈。

埃里科对说过的话又补充说，对这些领土的补偿应该是这样，以便芬兰政府既在本国社会舆论面前，也在外部世界面前捍卫这种交易。埃里科说，交换应该保证对芬兰有利。我问他，他能否对补

偿提出某个建议，埃里科对此做了否定的回答，同时他问我，我们有没有建议，我对此也做了否定的回答。我对他说，他应该考虑一下领土补偿，向我们做出我们准备讨论的相应建议。

说到群岛，埃里科顺便说，当时根据我们的要求，这些岛屿已经非军事化了。但是如果我们同意，可以在这些岛屿设防。我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但芬兰人无疑在这方面有某些计划。

回到照会问题上，埃里科请我27日星期一与他一起审议他为此起草的草案。然后，埃里科对我说，刚才给莫斯科发了电报，安排代表团团长不要回来。

我邀请埃里科28日与我共进午餐，我们那时再详细谈。埃里科接受了我的邀请。

斯坦因

№05705

莫洛托夫与伊里耶—科斯基宁关于 苏芬双边关系的谈话记录

(1939年10月5日)

莫洛托夫同志向公使声明，苏联政府认为就苏联与芬兰关系的目前问题交换看法是适宜的。在最近的谈话中，公使表达了芬兰改善与苏联关系的愿望。苏联对此持肯定态度。苏联代表与芬兰政府代表的会晤可以讨论与改善两国关系有关的具体问题。

公使指出，在自己的谈话中，他仅提及芬兰与苏联的商务关系。他打算10月7日就此问题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交谈。

人民委员提醒公使，芬兰不仅有与苏联改善经济关系，而且有过改善政治关系的讲话。公使说，这些讲话符合他的政府的立场。

苏联与爱沙尼亚签订了互助条约，正在与拉脱维亚签订互助条约，正在与立陶宛讨论相同的问题^①。希望与芬兰政府就既对苏联、也对芬兰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交换看法。苏联政府乐于在莫斯科看到芬兰的外交部长或者另一位芬兰全权代表。

公使问，要谈什么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谈改善苏联与芬兰关系的问题。苏联政府认为，应该与芬兰讨论的问题是非常紧迫的。考虑到欧洲正在进行大战，还希望讨论局势问题并做出必要的结论。

^① 1939年9月28日，苏联与爱沙尼亚签订了互助条约，10月5日和10月10日分别与拉脱维亚、立陶宛签订了互助条约。

公使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将推迟对外贸人民委员的拜会。

人民委员指出，这是公使的事情，他在此指出，应该加强对苏联与芬兰关系的调整，扩大芬兰与苏联的经济关系。

莫洛托夫同志问公使对苏联政府建议的看法。

公使说，我们希望置身于战争之外。

莫洛托夫同志说，我们的立场也是如此。

人民委员问，我们何时，可以与何人进行会晤。

公使回答说，他立即把这次谈话的内容报告自己的政府。

谈话结束时，莫洛托夫同志希望他能在不晚于今天晚上或明天早晨得到公使的答复。

№05706

苏联政府关于租赁岛屿问题给 芬兰政府的备忘录

(1939年10月14日)

在与芬兰政府的谈判中，苏联主要关心的问题有以下两点：
(1) 保证列宁格勒市的安全；(2) 确信芬兰在继续坚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为此，必须使苏联在芬兰湾海岸以及苏联有义务保卫其独立的爱沙尼亚海岸，不易受到外部敌人的攻击。

这一切的必要条件是：第一、从两岸用炮火覆盖进入芬兰湾的可能性，使敌人的舰艇和其他船只不能进入芬兰湾水域；第二、不让敌人从西面和西北面接近位于列宁格勒要冲的芬兰湾群岛的可能性；第三、把目前卡累利阿地峡^①的边界后移，因为那里与列宁格勒的距离是32公里，这就是说，列宁格勒的北部和西北部处于远程大炮的射程之内。

特别要提出“雷巴奇”和“斯列德尼”半岛问题，那里的边界是荒谬的和人为的，应该根据所附的地图进行修改。

按照上述意见，必须经过相互协议，依据对双方有利的原则解决如下问题：

1. 把汉科（冈格）港及该港东部和南部半径为5~6海里，西部和北部半径3海里的周围地区租给苏联30年，以建立海军基地，

^① 芬兰湾和拉多加湖之间一条狭长地带，原属俄国，17世纪被瑞典占领，1721年北方战争结束后划归俄国。根据1918年苏维埃俄国与芬兰签订的协定，该地峡大部分地区归属芬兰。

装备海岸火炮防御系统，使其能够与波罗的海港口芬兰湾另一岸上的大炮一起，用炮火阻截进入芬兰湾的船只。为了保卫海军基地，允许苏联在汉科港地区部署一个步兵团、两个高射炮营、两个航空团、一个坦克营，总兵力不超过5000人。

2. 苏联海军舰队有权在拉普维科港（拉普西亚）抛锚停泊。

3. 把戈格兰（苏尔萨里）、谢斯卡里、拉瓦萨雷、秋捷尔萨里（大的和小的）、别尔科以及从里波尔镇到科伊维斯托市南端，正好是“雷巴奇”和“斯列德尼”半岛西部的卡累利阿地峡部分转交给苏联，以换取相应的苏联领土，总共为2761平方公里，附上地图。

4. 为了补偿根据第3条让给苏联的领土，把列博尔和波罗索泽罗地区的苏联领土转交给芬兰共和国，总面积为5529平方公里，附上地图。

5. 充实苏联与芬兰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①，包括相互承担义务，不加入直接或间接与缔约国任何一方敌对的集团或国家结成联盟。

6. 解除双方在卡累利阿地峡苏联与芬兰边界设防地区的武装，让普通边界警卫队保卫边界。

7. 不反对用芬兰本国的力量武装阿兰群岛，但其他国家，包括瑞典，与武装阿兰群岛没有任何关系。

^① 1932年1月21日，苏联与芬兰签订了互不侵犯与和平解决冲突条约。

No05707

芬兰政府关于领土交换问题给 苏联政府的备忘录

(1939年10月22日)

芬兰政府详细地研究了苏联政府旨在促进芬兰与苏联之间发展相互关系的提议，芬兰政府得出如下结论：

芬兰理解苏联保证列宁格勒安全的愿望。芬兰希望正如它以前不止一次地强调的那样，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和睦邻关系。为了这两个目的，芬兰方面准备讨论所采取措施，以满足苏联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认为，这样做不能置之不理芬兰对国防的关注和要求，以及保证芬兰的完全中立。芬兰方面的这个政策有助于更好地加强北欧地区的和平。芬兰人的这个政策对于它的邻邦苏联也是最有利的。

芬兰政府深信，只要相互有良好的意愿，可以不破坏芬兰的安全和中立就达到上述目的，根据苏联政府转交给芬兰政府的备忘录中说的那样，这也是苏联政策的出发点。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芬兰政府准备采取下述措施，并有理由推测，这些措施会得到芬兰议会的批准：

1. 芬兰政府准备缔结把芬兰湾如下岛屿转交以换取苏联领土的协议：谢斯卡里、佩尼萨里、拉瓦萨雷、秋捷尔萨里（大的和小的）。此外，芬兰注意到两国的利益，准备讨论苏尔萨里问题。

2. 考虑到列宁格勒市接近芬兰边界，为了加强这个城市的安全，芬兰政府不反对根据上述意见重新审核卡累利阿地峡对苏联不

方便地段的边界，以换取苏联的领土。建议从哈巴拉镇东南的赖业奥基一直到芬兰湾划一条线，把科洛马亚基留在芬兰方面。这样一来，就去除了库奥卡尔的湾地。同时，芬兰政府不能讨论把这个地方的边界向西移动如苏联建议提出的10公里那样远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对芬兰本国的阵地和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所提及的地区是人口密集区和古代芬兰的领土，转交它们就意味着取消数千名芬兰公民的居住地区，并把他们移居到另一个地方。

3. 至于汉科港及其周围地区和拉波西亚湾，芬兰政府不得不坚持芬兰的不可侵犯。正如芬兰人和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无条件中立排除了把军事基地转让给外国当局的可能性。从芬兰的观点看，经常而长期地在芬兰领土上部署另一个国家的军队是不能接受的。不能排除利用他们来侵略芬兰的可能性。这样的安排会经常引起争论和不能容许的摩擦，无助于达到上述调整所追求的加强两国相互关系的目的。

4. 苏联声明准备充实芬兰与苏联现存的互不侵犯条约，包括相互承担不加入直接或间接与另一缔约方敌对的集团或国家结成联盟的条款。芬兰政府的看法仍然是，上述条约的第3条禁止加入明显敌对的形式上或实质上与上述条约抵触的某种条约、协议或公约，其中就包括相互友好关系的国家可以公正地彼此要求，不损害它们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和它们的无条件中立。但是，既然苏联政府希望这样，芬兰政府准备再次加以确认，在任何时候它都真诚地履行自己的这个义务。为了证明自己的良好愿望，芬兰政府还同意，对于上述互不侵犯条约中提到的如果缔约的一方成为第三国侵略的目标时，缔约双方有义务保持中立的第2条第1款，可以修订和确认，缔约双方有义务放弃对实施这种侵略的国家的任何支持。在此不应当把中立的普遍原则相容的立场，例如商品继续正常流转和商品过境，看做是支持。

5. 芬兰政府满意地确认，苏联政府不反对用芬兰本国的力量武装阿兰群岛。所以，芬兰政府声明，它打算利用自己的力量完成对这些岛屿的设防，同时，注意到 1921 年生效的条约^①所产生的义务，使防务达到保证其中立所要求的规模。

^① 这里指的是“十四国武装干涉”结束时苏芬签订的和约。1920年6月12日条约谈判在尤里耶夫（塔尔图）举行，10月14日签约。该条约于1921年1月1日生效。

№05708

苏联政府关于领土交换问题 给芬兰政府的备忘录 (1939年10月23日)

根据10月23日芬兰政府的备忘录，苏联政府有幸声明，按照苏联10月14日备忘录中阐述的观点，后者提出了苏联考虑到国家安全，其中包括住有350万居民的列宁格勒的安全，所提出的最起码的要求。这些条件是作为最低要求提出来的，苏联放弃了与芬兰缔结互助条约的建议，以使芬兰政府保持绝对的中立，正如放弃了使阿兰群岛非武装化或苏联参与武装它们的提议一样，苏联改变了自己的这些提议，同意芬兰用本国力量武装阿兰群岛。苏联政府做出了这些根本性的让步，因为它希望芬兰能持友好立场，并可能同意苏联在10月14日备忘录中所阐述的最低要求。

10月23日，苏联代表（莫洛托夫、斯大林）与芬兰代表（坦涅尔、巴锡基维^①）之间所交换的看法，保证了双方的相互谅解，同时也暴露了他们之间的分歧。考虑到交换看法的结果和为迎合芬兰政府的愿望，苏联政府声明：

1. 苏联政府不能放弃自己关于苏联在汉科建立海军基地的提议，认为自己的这个提议是为了保证列宁格勒安全的绝对必要的条件，在此苏联政府对10月14日备忘录做出修改，为了保卫海军基地，可以保持不超过4000人的陆军部队，限定这些部队驻扎汉科

^① 巴锡基维（1870～1956），1918年和1944～1946年任芬兰总理。1946年以后任总统。

的时间为欧洲英法德战争结束之前。

2. 苏联政府认为不能同意 10 月 23 日芬兰政府备忘录中所说的在卡累利阿地峡提供 10 俄里芬兰领土来换取苏联领土的建议，因为它认为，这个范围完全不足以保证从芬兰湾东端通向列宁格勒要冲的最起码的安全。然而，为了迎合芬兰，苏联政府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对自己最初的建议做一些修改，根据附上的地图，减少用以交换苏联领土的卡累利阿的领土面积，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关于别尔科岛的最初建议仍然有效。

3. 10 月 14 日苏联政府备忘录中阐述的其他提议，苏联政府认为必须继续有效。

4. 苏联政府接受芬兰政府关于修改互不侵犯条约第 2 条第 1 款的提议。

No 05709

芬兰政府关于领土交换问题 给苏联政府的备忘录

(1939年10月31日)^①

为了调整芬兰与苏联的政治关系，芬兰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全权代表进行了谈判，并在谈判期间看到双方政府的观点之间有相当大的分歧。两国政府的分歧在芬兰政府10月23日备忘录和苏联政府10月14日和23日的备忘录中得到了阐述。

芬兰政府希望找到解决已经公开的问题的办法，重新审议了苏联政府提出的愿望，对早先以芬兰政府名义所作的声明给以补充，作为自己的看法，并有幸通报如下：

一、鉴于提到了把汉科港及其周围地区租给苏联，把拉波西亚湾作为苏联海军舰队的停泊点，芬兰政府认为有必要保留自己早先所持的观点。芬兰政府坚持芬兰不可侵犯和中立的立场。它不能同意，在芬兰的领土上以某种形式部署另一国家的卫戍部队和建立海军基地。这既与芬兰的主权和它的国际地位不相容，也与芬兰所承担的无条件中立义务不相容。苏联政府在其最近的提议中也承认，它赞同芬兰保持无条件中立的原则。

二、芬兰政府准备签订关于让出芬兰湾以下群岛的协议，正如芬兰政府10月23日备忘录中所通报的那样，这包括谢斯卡里、佩尼萨里、拉瓦萨雷和秋捷尔萨里，连同这些岛屿的领海，以补偿苏

^① 该备忘录于1939年11月3日递交苏联政府。

联的领土。此外，芬兰政府准备就在苏尔萨里岛确立秩序问题进行谈判，以对苏联的既保证列宁格勒市的安全，也保证芬兰安全所声明的观点给予关注。芬兰政府因此也注意到了尤里耶夫和约^①第13和14条的定义。

三、在苏联10月23日的备忘录中，对苏联10月14日备忘录中建议的卡累利阿边界线作了不大的修改。芬兰政府希望表达自己对苏联旨在加强列宁格勒市安全保证的理解，同意芬兰人民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达成相互协议。但是它不能同意苏联备忘录中提出并附在地图上的边界线。这个新边界离芬兰最大的出口海港和东部芬兰的所有中心城市太近。除上述不方便之处外，这在实质上还意味着忽视了芬兰的安全观念。这同时还意味着放弃了所要求的调整，其目的应该是关注有关双方的安全观念的原则。芬兰政府在此声明，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合理的讨论之后，它可以同意在芬兰湾内端的北岸做出比以前所提方案更大的领土让步，以换取苏联所同意的领土补偿。根据所附的地图，与此相符的新边界线是瓦梅里奥基河口—瓦梅里奥基河—林图拉奥基河—考科亚尔维一线，这就是现在提出的边界（第70号界碑）。

四、苏联政府声明它面临的特别问题是，希望对它所认为的佩琴加的“雷巴奇”半岛上荒谬而人为制造的边界做出修改。这就意味着把属于芬兰的“雷巴奇”半岛的西部让给苏联。这个问题从苏联的防御观念来看是没有根据的，并且也没有指出要求芬兰做出这种领土让步的任何客观形势，或者也没有使芬兰政府相信有做出这样的领土调整的必要性。然而，为了表明自己的良好意愿，芬兰政府准备在得到领土补偿的情况下，把“雷巴奇”半岛的西部到南部的普曼基湾让给苏联。因此，有理由重新审议尤里耶夫和约的第

^① 即1920年苏芬和约。

6~8条。这些条款包含的内容或者在实际中已不能运用，或者现在已经不符合时代的实际要求了。

五、苏联政府在自己的第一个备忘录中已经声明，它打算作为补偿让出的领土，根据转交给芬兰政府的地图，把列博尔和波罗索洋罗地区让给芬兰共和国。在讨论领土让步时，芬兰政府应该注意到以下观点，它是符合公正要求的调整所必需的：

1. 正如苏联政府本身在其声明中确认的那样，芬兰政府拟定让给苏联政府的领土，比苏联方面提出让给芬兰的领土具有不同的价值。芬兰无论在陆地，还是在群岛上都失去了领土，而且芬兰还失去了重要的领海。正如苏联本身声明的那样，由于战略原因，这些领土对苏联具有首要意义。尽管进行了领土交换，芬兰得到的领土既没有相应的战略价值，也没有经济价值。所以在确定领土补偿的面积时，应该注意到这些情况。

2. 调整时要注意，应该用足够的时间去编制清单，估价由于交换领土时给芬兰政府和芬兰公民造成的损失。在那些芬兰打算让给苏联的领土上，有属于国家的不动产、铁路和其他道路、军营、学校等，也有属于私人的其他不动产，这些也与领土一起转让。属于政府并与领土一起转让的不动产在确定让出领土时只计算其价值，但是私人的不动产则应该完全由苏联按其价值给以补偿。由此得到的钱，芬兰政府应该交给相应的个人。为了实际解决最近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应该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并给它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完成这项任务。

六、苏联政府在其10月23日的备忘录中通报说，它赞同芬兰政府提出的扩充与苏联政府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在此附上议定书草案。

七、苏联政府提议双方沿着芬兰-苏联边界的卡累利阿地峡的设防区解除武装，把这个地区留给普通边界警备队守卫。芬兰政府

在自己边界所采取的措施绝对是出于对国防和安全的考虑，因此芬兰不能放弃这些措施。芬兰政府确定的无条件中立政策也要求它关心保证本国边界的安全。芬兰所采取的设防措施就是这样提出的。在正常时期，芬兰政府在边界区域作为武装力量的只有边防卫队。

八、芬兰政府确认，苏联不反对芬兰用自己的力量武装阿兰群岛，芬兰政府力求保证阿兰群岛的中立。

芬兰政府详细地讨论了自己的上述提议。芬兰政府对苏联某些愿望的否定立场不是由于芬兰政府不愿意以谅解的态度对待苏联政府加强列宁格勒市安全的愿望。芬兰政府正是考虑到这些，才在实际可能的范围内，接受了苏联政府的建议。

芬兰政府以本国全体人民的名义表明，愿意对苏联重要的安全概念做出肯定的理解，还表明，它自己力求以满意的方式调整政治关系，只要芬兰的独立、安全和中立允许，它就准备采取这样的步骤。为了改善睦邻关系和巩固和平，芬兰政府同意做出有利于苏联的让步，但是，对芬兰人民来说，这是很沉重的代价，因为这涉及到古代芬兰人就定居的地方，在几个世纪中这里就是芬兰的国家领土。

最后，芬兰政府有幸通报，这个协议的实现，按芬兰基本法规定，将取决于芬兰人民代表的赞同。

No05710

芬兰政府关于拒绝提供军事基地 致苏联政府的声明

(1939年11月9日)

在最近的会议上，苏联方面提议说，如果芬兰政府认为不能把汉科港提供给苏联作为军事基地，那么也可以把汉科周围的岛屿赫尔曼斯、库埃和海斯特布瑟以及拉波西业海湾作为停泊地。

我们把这个建议通报了我国政府，我们现在得到了答复。我国政府认为，由于与不能提供汉科作为军事基地同样的原因，对于所提到的岛屿，芬兰也不能在自己的领土和边界范围内向其他国家提供军事基地。在以前的会议上，我们不止一次地阐述了这些原因。有鉴于此，芬兰政府认为不可能同意这个提议。

No05711

莫洛托夫关于军事基地问题 给巴锡基维和坦涅尔的信

(1939年11月9日)

看了你们今天(11月9日)转交给我的芬兰政府的书面声明后,我确认,这个声明对苏联政府11月3日提议所作的阐述是不正确的。

实际上,苏联政府今年11月3日的提议如下:

1. 考虑到芬兰政府声明它不能同意别国的卫戍部队或海军舰队部署在“芬兰领土上”,苏联政府提议把汉科港地区适当的地段卖给苏联。这种决定就会消除这些土地是芬兰领土的反对意见,因为卖给苏联之后,它就成了苏联的领土。

2. 随后苏联政府声明,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汉科周围的土地不能出卖或交换,那么它建议芬兰政府或者出卖,或者交换赫尔曼斯、库埃、海斯特布瑟、罗格谢尔、弗厄谢尔、埃肯以及其他靠近上述岛屿的岛,正如芬兰政府所同意做的那样,把芬兰湾的某些岛屿和卡累利阿地峡的领土割让给苏联。

鉴于以上所述,我认为巴锡基维和坦涅尔先生在今年11月9日备忘录中阐述的“芬兰不能在自己领土和自己的边界内给其他国家提供军事基地”的反对意见是空洞的,歪曲了苏联政府的立场。

显然,如果汉科或汉科以东的岛屿卖给苏联,或换取苏联相应的领土,那么,它们就既不在芬兰的境内,也不在芬兰的边界上。

鉴于以上所述,我把你们11月9日的备忘录退回。

莫洛托夫

№05712

巴锡基维和坦涅尔关于军事基地 问题给莫洛托夫的信

(1939年11月10日)

昨天晚上，我们有幸收到您关于我们之间谈判问题的信，以及您随同该信退回的我们在昨天会议上转交给您的备忘录。

因此我们有幸通报如下：

11月3日（确切地说是4日）会议后，我们对我国政府通报说，苏联政府仍然希望在汉科半岛的领土上得到军事基地，芬兰政府可以做出选择，或者以租赁的方式，或者以出卖或交换的形式转让这些领土。此外，我们还通报说，苏联有选择地在这些预先方案中建议，把汉科周围的岛屿赫尔曼斯、库埃和海斯特布瑟以及拉波西亚海湾作为停泊地让出。苏联政府把这些条件向芬兰政府作了十分准确的阐述。

11月8日，我们得到对这些通报的答复，芬兰政府认为没有可能同意以某种方式把汉科港的领土或芬兰海岸的其他地方出让作为军事基地。根据上述指示，我们起草了我国的上述简短声明。

11月3日（4日）会议上苏联方面提出的三个岛屿——赫尔曼斯、库埃和海斯特布瑟，正如在地图上看到的，被芬兰的领土和领海所包围。这样，他们就是位于芬兰边界内的，如果不把它让给其他国家的话。关于其他岛屿——您昨天信中列举的罗格谢尔、弗厄谢尔、埃肯等岛屿，大大扩展了问题所涉及的领土——这些在11月3日（4日）的会议上都没有提到。

在芬兰政府 1939 年 10 月 31 日的答复中，简短地阐述了原因，因为注意到芬兰的国际地位，它的绝对中立政策，以及它置身于一切大国集团之外，即置身于它们间的战争和冲突之外等情况，芬兰不能同意把汉科或毗邻芬兰大陆的其他岛屿让给某个外国作为军事基地。

芬兰政府真诚地愿意加强对苏联的关系，它声明准备做出最大让步，以满足苏联的愿望。然而，它不能走得太远，否则就放弃了本国的切身利益，把芬兰湾的人口让给其他国家作为军事基地就是如此。

最后，我们代表芬兰政府表达真诚的愿望，根据芬兰方面向苏联提议的让步，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芬兰与苏联之间能够达成协议。

Ю. К. 巴锡基维

В. 坦涅尔

№05713

巴锡基维和坦涅尔回国前
给莫洛托夫的感谢信

(1939年11月13日)

主席先生：

鉴于在我们与您和斯大林先生进行的谈判中没有找到苏联与芬兰所拟订的协议的基础，我们认为今天晚上返回赫尔辛基是适宜的。

向您通报我们上述的情况，并对你们给予我们的一切殷勤接待表示真挚的感谢，我们希望，不久进行的谈判会产生令双方满意的成果。

主席先生，谨致谢意。

Ю. К. 巴锡基维

B. 坦涅尔

№05714

**莫洛托夫关于召回苏联代表
给伊里耶—科斯基宁的照会**

(1939年11月29日)

公使先生！

正如您从官方报道知道的那样，芬兰军队对苏联军队的进攻正在继续，不仅在卡累利阿地峡是这样，在苏联与芬兰边界的其他地段也是如此。

苏联政府不能再容忍这种情况。

由于既成局势，芬兰政府要为此承担全部责任，苏联政府不能再与芬兰保持正常关系，不得不从芬兰召回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代表。

公使先生，顺致敬意！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莫洛托夫

1939年11月29日

№05715

波将金^① 关于召回苏联代表与芬兰公使 谈话的日记（节录）

（1939年11月29日）

我把莫洛托夫关于从芬兰召回政治和经济代表的照会交给了公使。读完照会，公使问“这是关系破裂吗？”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公使对我声明，约今天早晨4点，他收到了芬兰政府的照会，通知同意苏联政府关于从边界线撤走芬兰军队的建议。我问，为什么公使没有向我们转交这份照会，伊里耶-科斯基宁解释说，与照会同时，他从赫尔辛基得到指示，等待另外的指示，今天应该以密码电报形式给他发来。

在谈话中，我的秘书处通知我，芬兰使团的参赞索兰科请公使立即与他进行电话交谈，伊里耶-科斯基宁走到电话机旁，与参赞谈了几句话，向我通报说，所说的密码电报已经从赫尔辛基到达，他指示立即解密译出。

公使问我，我们是否指望今天从他那这里得到芬兰政府的复照？我回答说，我认为，递交给公使的莫洛托夫的照会结束了苏联政府与芬兰现政府之间的一切问题。

伊里耶-科斯基宁问，给他离开苏联的准备时间有多长？我回答说，对此，他应该从本国政府得到指示。我们方面已经向我国驻赫尔辛基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发出了指示，立即从那里动身。

^① 波将金，弗拉基米尔·彼得洛维奇（1874～1946），1937-1940年任苏联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

№05716

莫洛托夫关于芬兰局势与 德国大使舒伦堡的谈话记录

(1939年11月30日)

舒伦堡通报，今天柏林给他打来电话说，世界报刊充满关于苏芬边界事件的各种传言，说苏联军队似乎已经越过了边界，苏联飞机正轰炸芬兰。大使请求向他通报苏联政府所采取的措施。

莫洛托夫回答说，我们已经不能与芬兰现政府达成一致，并且预见到，我们不会有任何结果。这样，芬兰政府就违背了自己所做出的承诺。芬兰政府总想欺骗我们。不排除在芬兰建立另一个政府——对苏联也对德国友好的政府——的可能性。这个政府将不是苏维埃式的，而是民主共和国类型的。谁也不会在那里建立苏维埃，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与这个政府达成协议，保证列宁格勒的安全。美国政府试图干预这件事，提出了自己的斡旋计划。但是我曾经说过，我们与现政府不会有任何结果。

如果将建立我上面所说的政府，那么，苏联政府会对此表示欢迎。苏联政府准备认真地讨论把苏联的卡累利阿部分领土转交给芬兰。

至于限制芬兰内外政策的自主性，那么苏联政府没有这样的打算。苏联政府努力用一切手段保证列宁格勒的安全。情况通报结束时，莫洛托夫声明说，列宁格勒的安全保证问题没有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苏联政府对此表示遗憾。舒伦堡问，苏联军队有没有越过边界。莫洛托夫回答说，是的，越过了。舒伦堡对空军是否参与表示

关注。

莫洛托夫作了肯定的答复。

莫洛托夫补充说，如果瑞典和挪威硬要过问，反对苏联，当然，它们会自食其果。莫洛托夫说，我们觉得，我们对芬兰采取的措施使瑞典和挪威对英国的好感已经冷却，这将对苏联和德国有利。

№05717

莫洛托夫关于苏芬关系与 瑞典公使文特的谈话记录

(1939年12月4日)

公使在他的秘书陪同下来见我，他说，根据本国政府的委托，他以芬兰的名义作如下通报。

公使声明如下：一直为和平解决芬兰与苏联之间冲突的愿望所鼓舞，以及为了提出新的积极建议使苏联和芬兰达成协议，芬兰政府愿意向苏联提出，后者是否准备就上述目的着手进行谈判。

公使向莫洛托夫递交了私人照会，其中包含着 he 刚才所作的声明。

接受了照会以后，莫洛托夫同志对公使说，后者应该知道，苏联政府不承认在赫尔辛基的所谓芬兰政府。现在它已经消失了。苏联与这个“政府”断绝了外交关系，召回了它派驻到那里的公使。

苏联政府只承认以库西宁^①为首的民主芬兰政府。

公使也应该知道，苏联已经与这个政府签订了条约。苏联不认为自己与芬兰处在战争状态。它不覬覦芬兰的领土。苏联政府已经与芬兰政府达成了关于把大片领土交给芬兰以交换它让给苏联的领土的协定。苏联政府有义务向芬兰支付4.2亿马克，以补偿芬兰让

^① 库西宁，奥托·维里格里莫维奇（1881—1946），1904年起为芬兰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1911—1917年任芬兰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193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52—1953年和1957年后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给苏联的半岛和岛屿，以及在卡累利阿地峡出让的芬兰领土上的铁路设施。

莫洛托夫说，我们认为，这决定了我们对那些自命为芬兰政府其实不能代表芬兰政府的那些人士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再讨论公使声明中所涉及的问题。

至于苏联与瑞典的关系，莫洛托夫继续说，我们与芬兰的关系一点也不会触及这种关系。

文特说，对自己的声明他没有任何补充，他将立即向瑞典政府转达莫洛托夫的答复。

然后，公使提及了保护芬兰在苏联利益的委托资格问题，他从芬兰政府那里得到了这种委托资格，并把有关照会递交了洛佐夫斯基^①。他是否应该等待答复或者是莫洛托夫现在就可以给他答复。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立即就可以给予答复。苏联政府承认芬兰人民政府。在这种条件下，瑞典公使如果以所谓的芬兰政府名义说话，怎么能代表芬兰呢？如果瑞典公使以苏联承认的芬兰人民政府名义做出声明，那么，瑞典使团可以代表芬兰。在这种情况下，公使给洛佐夫斯基的照会中提出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文特声明说，他将把莫洛托夫对他说的话转达给自己的政府。

然后公使说，他从本国政府得到了关于芬兰使团离开苏联情况的各种报道，他问，芬兰使团离开苏联怎样可以迅速地办好手续。他有情报说，苏联使团人员已经乘德国的轮船离开了芬兰，今天就抵达塔林。

莫洛托夫回答公使说，只要苏联政府得到苏联驻赫尔辛基使团人员平安地抵达塔林的消息，它不会为芬兰使团离开苏联设置任何

^① 洛佐夫斯基，原名所罗门·阿布拉莫维奇·德里佐（1878—1952），1939—1946年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障碍。

公使说，他将把莫洛托夫的答复转达给自己的政府和芬兰驻斯德哥尔摩公使。

谈话结束时，莫洛托夫指出，他向芬兰驻斯德哥尔摩公使转达答复的问题与苏联无关。这是瑞典的事情。

No05718

莫洛托夫关于苏芬关系与瑞典公使 阿萨里逊的谈话记录

(1940年2月20日)

公使与使团的参赞埃列尔一起来见莫洛托夫，向他递交了任命他的国书和召回本国前任公使文特的国书。

然后公使指出，英国和法国有意把战争扩展到北方国家的领土上去，他声明，瑞典将站在中立立场。同时，瑞典政府承认，芬兰应该做出保证苏联边界安全所必需的让步，他认为芬兰政府可能已经认识到了做出让步的必要性。要找到恢复芬兰与苏联谈判的基础。

莫洛托夫对阿萨里逊回答说，欢迎瑞典政府不顾英国和法国的压力，采取了中立的决定，但是他认为瑞典人加入反对红军的军事行动是不正常的。苏联与瑞典之间没有任何有争议的问题，没有使它们产生分歧的问题，参加战争就更不正常了。他清楚，公使知悉柯伦泰同志^①与汉森^②和京特^③谈话以及11月11日莫洛托夫同志与文特谈话的内容，莫洛托夫同志做了如下声明。

芬兰政府对苏联采取了极为敌对的立场。在英法集团的压力下，当时它不接受和平的、没有触及芬兰独立的协议，因为芬兰显

① 柯伦泰，亚历山大·米哈依洛夫娜（1872～1952），1930～1945年任苏联驻瑞典公使。

② 汉森，1932～1946年任瑞典首相。

③ 身份不详。

然指望曼纳林防线^①的“坚不可摧”。然而，对苏联军队来说，这个防线是糟糕的。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芬兰人应该认识到这种估计是错误的，继续拖延军事行动是不理智的。

现在苏联政府查实，芬兰是作为其他大国准备进攻苏联的基地而在流血，因此仅仅满足苏联政府军事行动初期的最低要求是不够的。

苏联与芬兰的人民政府有条约，其基础是相互信任和友好。至于涉及到芬兰人民政府之外的基础，问题就应该是其他提法了。现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后，苏联就不能限于卡累利阿地峡部分了。现在谈的应该是整个卡累利阿地峡，包括维堡和与拉多加湖北部衔接的领土。在苏联的建议中，当时提出的汉科基地问题仍然有效。此外，苏联准备通过自己与芬兰和爱沙尼亚签订协定的方式，重新审视保证芬兰湾安全的问题。考虑到瑞典与波特尼切湾和阿兰群岛（特别是阿兰北部岛屿）有关，苏联政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给予瑞典帮助，并与瑞典协商它能够接受的条件。

红军占领的靠近拉多加湖的北部地区可以用来换取苏联需要的芬兰其他领土。苏联政府不反对把佩萨莫交给芬兰。如果事情不拖延以及局势不因芬兰政府轻率地拖延战争而复杂化，就可以这样提出问题。无论芬兰如何指望外部的援助，苏联也不会停止这样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苏联都要保卫列宁格勒的安全，而不考虑某个大国对此有何反应，也不关心任何其他国家对此是否喜欢。

阿萨里逊问，可否把苏联的提议转达给赫尔辛基，莫洛托夫回答说，瑞典目前完全不清楚，芬兰政府是否同意把苏联的提议作为协议的基础，在此之前，他只把这些情况通报给瑞典政府，并不认为把这些情况转达给芬兰政府是合适的。

^① 芬兰 1927—1939 年在卡累利阿地峡沿苏芬边境修建的防御工事，正面宽 135 公里，纵深 95 公里。

№05719

莫洛托夫关于苏芬冲突与 阿萨里逊的谈话记录

(1940年3月4日)

公使声明，苏联取得了军事胜利，而瑞典则取得了外交胜利：除维堡和索尔塔瓦拉问题外，芬兰人做出了全面让步。

莫洛托夫指出，这不是胜利。在维堡、维堡湾和索尔塔瓦拉问题上，苏联方面没有做出任何让步。

根据从柯伦泰那里得到的情报，瑞典政府请求不要放弃试探，莫洛托夫说：“出于对瑞典政府爱好和平政策的尊重，我还可以等几天，以便瑞典政府能够斡旋到最后。”之后，如果再拖延，那么苏联政府提出的条件将会更加苛刻。如果芬兰人固执己见，那么苏联无论如何不得不放弃现在的方针，最终与库西宁的人民政府达成协议。

阿萨里逊说，他的政府希望苏联与芬兰的冲突迅速结束，因为它不希望把瑞典变成大战的基地，也不想损害与苏联的良好关系。他，阿萨里逊，将立即电告斯德哥尔摩，说苏联坚持把维堡和索尔塔瓦拉作为保卫列宁格勒的必要城市。但是他不怀疑，芬兰人在这个问题上将会制造困难。阿萨里逊补充说，瑞典政府有情报说，芬兰已经向英国和法国请求援助，后者答应帮助它。英国政府已经请求瑞典允许它经过瑞典的领土运输，但是被瑞典拒绝了。

莫洛托夫指出，英国和法国未必会在这个问题上冒险使用武力，因为这对它们太危险了。

No05720

莫洛托夫关于苏芬冲突与 阿萨里逊的谈话记录

(1940年3月5日)

公使与使团的参赞埃列尔一起来见我，声明如下：

芬兰政府本身也希望结束军事行动，恢复和平，为此目的，认为可以考虑把苏联政府的提议作为谈判的出发点，并在原则上接受它。提议的范围和个别不清楚的细节需要澄清和确认。这些问题可以在谈判期间进行调整。芬兰政府期望苏联政府通报何时何地开始谈判。同时芬兰政府建议，继续谈判期间，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缔结停战协定。

听完公使的话，接受了他包括其声明内容的备忘录，莫洛托夫指出，他不清楚芬兰政府是否接受苏联的所有提议，包括维堡、维堡湾和索尔塔瓦拉的提议。

阿萨里逊回答说，苏联的所有建议都被无条件地接受了。为了节约，在用电报转达时，没有全部列出这些提议。瑞典政府和公使本人保证，芬兰人完全接受苏联的提议。随后他声明，他得到的电报通报说，瑞典政府建议在明天莫斯科时间上午11点结束军事行动。瑞典政府相信，如果苏联政府接收这个提议，芬兰方面也将这样做。

莫洛托夫对公使回答说，他可以预先声明如下：(1) 应该明确地确定，芬兰人接受什么样的建议；(2) 对军方和苏联政府是否接受在维持原状基础上缔结和约而不把维堡、维堡湾和索尔塔瓦拉从

芬兰军队手中解放出来表示怀疑。

莫洛托夫说，他将把公使的通报向苏联政府报告，并由政府讨论这个问题后给他答复。莫洛托夫补充说，在瑞典政府和瑞典公使本人的斡旋下，芬兰政府迈出了第一步，他对此表示欢迎。

会见开始于22时35分，持续了45分钟。

№05721

苏联政府关于苏芬谈判的备忘录^①

(1940年3月5日)

根据瑞典政府的通报，鉴于芬兰政府接受了苏联政府的所有提议，包括把整个卡累利阿地峡、维堡市、维堡湾、从索尔塔瓦拉市起的拉多加湖北岸以及提议的汉科半岛和与它毗邻的岛屿无补偿地转让给苏联，苏联政府同意开始与芬兰谈判，缔结和约，停止军事行动。苏联政府提议把莫斯科市作为谈判地点，芬兰政府代表团应该抵达那里。

^① 该备忘录于3月6日凌晨2点15分由莫洛托夫递交给阿萨里诺。

No 05722

莫洛托夫关于苏芬和谈与 阿萨里逊的谈话记录

(1940年3月7日)

公使与使团的参赞埃列尔一起来见我，声明如下：

3月7日下午，芬兰代表团将乘苏联飞机从斯德哥尔摩抵达莫斯科，讨论苏联政府与芬兰恢复和平的必要细节。

正如公使昨天声明的那样，芬兰人原则上接受了苏联的所有要求。

莫洛托夫同志问阿萨里逊代表团的人员组成。

公使回答说，代表团由5人组成，但是他不清楚代表团的具体成员。知道的只是像公使刚才所说的，代表团的成员还有“其他一些人”。

随后公使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如下声明。

瑞典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同意从莫斯科时间今天11时即芬兰代表团动身后停战。瑞典政府认为需要使谈判在停止军事行动造成的气氛中，即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瑞典政府不能不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迫切愿望，并希望这一要求得到满足，这个要求不仅是出于有助于达成协议的愿望，而且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当然，这个愿望不会削弱苏联政府的立场。

公使向莫洛托夫递交了含有其政府声明的普通照会。

接受照会以后，莫洛托夫同志对公使回答说，如果芬兰人接受了苏联建议的话，很容易达成协议。但也不排除由于出现某种分歧

而恢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协议一旦签订，军事行动就停止。

公使说，他负责向斯德哥尔摩发电报说，今天停战是不可能了，但是3月8日早晨11时是否可以实现。公使请求同意他的政府的要求。他说，红军强行突破曼纳林防线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当时，无论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没有办法攻克西部战线的防线，苏联达到了它为保证列宁格勒安全所必要的目的。苏联同意停战是宽宏大量之举，这将向全世界证明，苏联不是侵略国家。瑞典做出了一切努力，不使自己卷入战争，以促进在欧洲这个地区恢复和平。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现在确定明天或后天停止军事行动为时太早，而且不可能。

莫洛托夫指出了瑞典政府和阿萨里逊本人为促进和平而活动的积极意义，表达了他本人对公使和他代表的政府的感谢。

公使回答说，感谢莫洛托夫同志，他焦急地等待着苏联政府对瑞典建议的答复。

告别时，公使问，谁将在莫斯科迎接芬兰人。

莫洛托夫回答说，芬兰人作为外国代表团，将受到礼宾司长的迎接。

公使问，怎样与芬兰人进行通讯联系，或许可以通过瑞典使团。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这是芬兰人的事情——他们怎么联系，随他们的便。苏联方面将给他们提供技术上的帮助。

莫洛托夫问，芬兰人是否将在报刊上发表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报道。

公使回答说，根据他的推测，报刊上将不作报道。

会见从3月6日24时持续到3月7日0时30分。

№05723

莫洛托夫与芬兰代表团关于缔结 和约问题的会谈记录

(1940年3月8日)

会议一开始，柳蒂^①用俄文宣读了芬兰政府的如下宣言：

“谈判开始前，请让我以我方的名义说几句话。

我们聚会于此，是为了缔结和平，结束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的芬兰与苏联的冲突。苏联方面起草了包括和约最重要的基础和条件在内的提案。芬兰政府认为可以考虑把苏联的提案作为谈判的出发点，并原则上赞同这个提案。我们力争真诚地达成和平，使两国之间建立持久而相互信任和友好关系，在实现这种关系的前提下，对双方互惠互利的活跃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关系将得到发展和繁荣。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我们认为，从对两国都有利的目标这一观点来看，上述条件和基础对我们是非常苛刻的。历史总是最赞赏那些国务活动家，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和有利地位，富有远见和有节制地促进迅速地医治可能带来的创伤，建立有利于人民的持久而为大家所承认的公正的基础。相反，依靠暴力缔造的和平经常成为持续的不稳定、慌乱和不幸的借口。

自然，苏联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该担心来自芬兰的进攻。但是我们明白，苏联作为大国，积极地参与世界政治，由于自己的这种地位和本身的安全，认为有必要关注和实现某些战略性要求。我方

① 柳蒂 (1889~1956)，1939~1940年任芬兰总理，1940~1944年任总统。

也非常明白，作为大国的苏联一直是我们的邻国，芬兰与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是我们所有人孜孜以求的目标。这在政治上对芬兰是必要的，如果达到这个目标，经济上也将得到好处。但是我们认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邻国——为了使它满意，这个邻国正在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存在，也符合苏联的利益，并给它带来好处。但是，正如我刚才说过的，苏联方面对芬兰提出的建议在我们看来太苛刻了，会在芬兰人民心中留下深深的创伤，而且对芬兰的经济生活也将造成不良影响。因为我们不能明白，我们在一切方面都采取了必要的行动，以满足苏联的战略要求，同时我们希望并期待友善和公正地注意我方所提出的观点，在友善与和谐的气氛中努力找出公正地满足苏联的战略要求的解决方法，同时又有助于达成芬兰国家和人民从切身利益来看也感到满意的结果，为芬兰与苏联之间建立牢固而良好的关系创造前提，而不是在芬兰人民心中留下深深的苦楚”。

莫洛托夫对芬兰政府的声明答复如下。苏联不想开始军事行动，在芬兰与苏联几乎两个月的谈判期间，希望芬兰政府友好地接受我们保证苏联特别是列宁格勒安全的建议。但是没有任何结果。过错不在我们。苏联政府把这些看作是芬兰政府方面与苏联敌对的表现。军事行动开始后，我们确信，芬兰对苏联处于敌对状态，而且很严重。现在确实查明，芬兰把自己的领土作为第三方帝国主义国家进攻苏联的基地。正是这些使问题更加尖锐，现在已经流了血，但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认为，苏联目前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现在不仅面临着保证列宁格勒安全的问题，而且还面临着保证摩尔曼斯克和摩尔曼斯克铁路安全的问题。因此苏联政府希望，或者接受全部要求，或者达不成任何协议。这些希望归结如下：

1. 芬兰政府向苏联让出整个卡累利阿地峡，包括维堡市和维堡湾；

2. 整个拉多加湖沿岸，包括索尔塔瓦拉市；

3. 将汉科半岛以及与其毗邻的岛屿由苏联长期租赁，在那里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防止芬兰湾遭遇任何不测事件和不幸事件，我们认为，这对芬兰也有利；

4. 把库奥拉亚维地区离摩尔曼斯克铁路的边界后移 130~150 公里；

5. 把斯列德尼和雷巴奇半岛全部移交给苏联。佩萨莫地区和海湾作为苏联以前移交给芬兰的领土，苏联可以把它留给芬兰。

如果芬兰政府接受这些提议，那么苏联政府同意签订协议，中止军事行动，因为芬兰政府任何口头的声明都是不值得信任的。

莫洛托夫声明，我们知道，芬兰也曾经有过侵占列宁格勒的计划，但是我们对这些计划嗤之以鼻，认为这件事是轻率的。然而，我们不能不考虑到这些计划。

莫洛托夫声明，芬兰政府是否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建议，我们希望有准确而明确的答复。

巴锡基维认为，芬兰政府似乎是敌视苏联的看法是一种误解。巴锡基维声明，芬兰不想战争。随后他说，现政府一成立就通过瑞典提出和平谈判的建议，如果苏联同意在 12 月初进行谈判，那么当时就可以缔结和平条约了。巴锡基维继续说，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证实，其他大国没有参与芬兰与苏联的冲突。当然，芬兰得到了物资援助，但是所有物资是我们从美国和其他国家购买的。我非常想让莫洛托夫相信，芬兰不需要列宁格勒，莫洛托夫的这个声明显然是误解。芬兰政府理解列宁格勒安全的必要性，准备迎合苏联的提议，但是芬兰政府请求不要太触动芬兰的经济和其他利益。至于苏联政府的提议，那么芬兰代表团想看到这些提议的详细情况。莫洛托夫在地图上把苏联的提议指给了代表团。

出示地图后，柳蒂发言。

发言结束时，柳蒂问，苏联政府还有没有其他提议。

莫洛托夫指出 1920 年条约关于佩萨莫地区（那里没有军事基地）的条件是，苏联的货物有权过境到达挪威，同样根据 1920 年条约，货物有权过境到瑞典，并在库亚拉方向修建坎达拉克沙—克米亚尔维的铁路。

柳蒂问，他们可否把地图带走，以研究苏联政府的提议。

莫洛托夫回答说，可以把地图带走。

柳蒂再次坚持说，苏联的提议似乎太苛刻了。

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给了他答复。他们的答复是根据莫洛托夫在柳蒂宣读宣言后所作声明的精神做出的。

会议将于 3 月 10 日之前结束。

№05724

莫洛托夫与芬兰代表团关于缔结 和约问题的会谈记录

(1940年3月10日)

柳蒂：请允许宣读我们通过瑞典政府得到的提议与现在提出的提议之间分歧的实质内容。

巴锡基维（宣读分歧的实质内容）。

莫洛托夫同志：我将对你们的声明给予答复。

柳蒂：（对宣读的内容进行补充）。我们早就指出，芬兰总是真诚地希望确立和平，而不卷入现在欧洲正发生的冲突。芬兰想尽快结束战争，因为不能保证，欧洲现在的冲突不会把芬兰卷入现在事件的旋涡中。所以，芬兰人甚至准备今天就根据我们通过瑞典政府得到的提议缔结和平条约。我们有可能确认，莫洛托夫通报了自己的要求，但是由于以前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我们没有得到现在提出要求的内容。我们准备把早先提到的汉科半岛地区租赁出去。在卡累利阿方面，芬兰人准备现在就让出所指定地区。斯大林本人以前通报说，军方要求的界线比谈判时提出的界线更靠南。关于维堡市，我们应该说，这个城市对苏联没有战略意义。对芬兰来说，这个城市有巨大的文化、历史和经济意义。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在维堡附近有一条运河，如果这个城市掌握在其他国家手里，那就非常不方便。这个城市是与它毗邻的地区的出口基地。我听到各种议论，说红军把维堡作为某种自尊心的象征加以占领，我认为，红军完全不需要这种自尊心，因为它已经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和实力

(千方百计地赞美红军和指挥部的行动)。因为维堡没有任何战略意义，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城市留给我们。

从上述转达给我们的以前的声明中，我们没有得到关于转让维堡湾的情况。我们只是从莫洛托夫那里得知了这个提议。关于拉多加湖北岸和索尔塔瓦拉市，我们准备让出这些地区，但是我们希望在这里确定另外的边界，使边界沿分水岭划定。除上述前提条件外，我们现在准备赞同所有的提议。我们把你们指出的所有要求都报告了芬兰政府。

莫洛托夫同志（指着地图上的红线）说，这条红线意味着什么？

巴锡基维说，这条线代表着他们对彼得线的理解。

莫洛托夫同志：没有这个角。我现在没有符合当时情况的表明彼得线的原图。

巴锡基维：我方有这个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我们就划了这条线。^①

莫洛托夫：但是你们看，还是有区别的。可能在彼得当政时期作过某种修改，也可能你们有与我们不同的资料？

现在我对你们宣读的声明给予答复，首先我想说，这个声明不符合实际。我逐点分析你们的声明。第一，当你们分析汉科问题时，你们依据的是1939年秋与斯大林的谈话。但是我们提醒你们，我们提出了新要求，因为开始了战争，已经出现了流血。我们确信芬兰对苏联持敌对政策。我不止一次地给阿萨里逊先生和柯伦泰女

^① “这个协定”指的是1721年8月30日俄国与瑞典为结束北方战争在芬兰的尼什塔特城缔结的和约，史称“尼什塔特和约”。和约第四条规定将部分卡累利阿地峡（包括维堡市在内）划归俄国。于是在卡累利阿地峡出现了一条从芬兰湾到拉多加湖的划线，因为该和约是彼得大帝签署的，因俄国俗称这条线为彼得线。

士寄去关于我们提议的通报，这些提议与我们秋天谈判时的要求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现在，我们对汉科提出了把整个汉科半岛和与它毗邻的岛屿租赁给我们的要求，在南部和东部5海里，西部和北部3海里范围内建立一个区域。这个要求符合与芬兰人民政府签订的条约的条款。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条约。你们没有任何根据提秋天的谈判和当时提出的要求。因为我们现在完全不能提秋天的谈判。当我们提到岛屿时，我们只是重复与芬兰人民政府签订的条约的条款。

你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也不符合事实。根据你们的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彼得线只是在划归给我们的领土的北部地区。我们在自己的提议中指出，应该把维堡和维堡湾、整个卡累利阿地峡、拉多加湖北岸和索尔塔瓦拉市交给我们。我们说新边界应该近似于彼得线，对此我们也预先通知过你们。

现在谈库奥拉亚维地区。你们所做的声明不符合我们声明中阐述的事实。我本人参加了所有的谈判，并亲自与柯伦泰女士和阿萨里逊先生联系过。因为我们对佩萨莫地区没有非分之想，于是我们说，作为交换，应该对边界线做某些修改。对其他地方我们也没有非分之想，但是我们坚持对库奥拉亚维的领土要求。我们这个声明所追求的目的是保证列宁格勒的安全。我们知道芬兰有炸毁摩尔曼斯克铁路的企图，为了保证这条铁路的安全，我们认为必须把边界后移。我认为，把所有军队从所有地区撤出的声明完全不符合实际。我说过，我们将从某些地方撤出军队，其中包括从佩萨莫地区。这样，你们声明中罗列的没有一个点符合实际。如果你们不接受我们提出的要求，那么我们的谈判就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再重复一次，如果这些谈判再拖延下去，那么我不能保证，我们现在所提出的要求不会再增加。要知道，我们与人民政府签订了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我们在地图上指出的国境线仍然有效。至

于柳蒂先生声明说，芬兰或许会被卷入战争，那么我应该说，我们一点也不怕。如果您现在威胁我们，那么独立自主政策会是什么呢？

如果所提出的要求不合您的意，那么我们只能对此表示遗憾。

柳蒂：苏联的通报经过那么多人士转达给我们，结果产生了重大的误解，我们对此深表遗憾。我们没有得到任何一个书面声明。

莫洛托夫同志：我们方面也没有得到对我们的声明中不明确的地方提出的疑问。没有人问我们，该怎样理解彼得线。

柳蒂：我们不知道，您对阿萨里逊先生说过什么，但我们只是在昨天才得到了这张纸。

莫洛托夫同志：我们口头说过，边界应该近似于彼得线。

柳蒂：因为这些是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向我们提出的，结果我们没有时间对它做出修改。我们只相信外交部情报的准确性，而关于要求军队让出这块领土的消息只是口头通报的。

莫洛托夫同志：阿萨里逊先生转告我说，我们的建议将被接受。于是我就转交了书面文本。因为他们还不清楚我所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

巴锡基维：但是我们的政府并没有收到书面通报。

莫洛托夫同志：这只是你口头上这么说。当时关于佩萨莫和北方地区什么都没提，而这里把各个地点全部列出来了。

柳蒂：显然，根据这个通报，除拉多加湖北岸的领土外，你们要全部拿去了。

莫洛托夫同志：为什么您只在北部地区接受彼得线呢？

巴锡基维：运河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被划到界外了。你们为什么非要这一小块有经济价值的土地呢？你们为什么要给芬兰带来这样的创伤呢？

莫洛托夫同志：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争论，我们认为，所提

出的要求是代表团到达这里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关于佩萨莫地区，我们提出了大约与1920年条约相符合的货物过境和海军基地的问题。这还需要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希望与瑞典建立铁路联系。有关这点可以详细谈。我们也认为，这是基本条件。我们将再没有任何提议。我们将不需要我们在芬兰政府有任何代表。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列宁格勒和摩尔曼斯克铁路的安全。我们认为这些是最低的要求，尽管我们也知道，芬兰政府对我们有敌意。

巴锡基维：我们对铁路问题很关心，这条铁路是属于我们的吗？

莫洛托夫同志：是的，是的，这是你们的铁路。我们对芬兰的内外政策问题不提出任何要求。

巴锡基维：这指的是转让地峡不给任何补偿？

莫洛托夫同志：是的，没有任何补偿。

巴锡基维：那么，私人财产、个人小企业怎么办？

莫洛托夫同志：我们对私人财产也不补偿。因为战争已经开始并在继续，这给我们造成了重大牺牲，显然，我们不能提供补偿，我们早已说过这样的话。

柳蒂：由于授予我们进行谈判的条件与现在的提议有差别，我们将把新提议通报芬兰政府，我们等待着相应的授权。

谈话就此结束。

№05725

莫洛托夫与芬兰代表团关于缔结 和约问题的会谈记录

(1940年3月11日)

会谈一开始，柳蒂就再次声明，根据代表团通过瑞典政府得到的条件，芬兰代表团准备昨天就缔结条约。得到新提议后，代表团与自己的政府进行了联系，得到了继续进行谈判的新指示。关于汉科半岛地区，芬兰政府声明，它同意新提议，条件是要根据相应的条件以时价租赁汉科半岛。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想对汉科问题作点补充。因为以前不可能对某些电报的内容做出印证，那么现在芬兰代表团可以知悉23日发出的电报的内容，其中明确提到要求租赁汉科半岛。给芬兰政府发出这个电报是为了使芬兰政府在同意我们提出的建议之前了解它的内容。这个电报中说要租赁整个汉科半岛及与它毗邻的岛屿。这个通报是由柯伦泰转交的。芬兰代表团得到了这个通报。3月5日再次发出了解释我们的要求的电报。这个电报在芬兰代表团去莫斯科谈判之前就发出了。代表团现在关于汉科半岛地区的提议是新的声明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柳蒂回答说，代表团从来没有断言，莫洛托夫没有通报苏联政府的要求，但是代表团没有得到关于汉科半岛地区提议的书面解释。

莫洛托夫再次申明，芬兰代表团没有提出对所提的建议作进一步说明的要求。

关于维堡，柳蒂通报说，彼得线是从纯粹战略观念出发的，并且这种形式为芬兰提供了重大的方便之处。所以芬兰代表团将根据相应地区的经济和民族特点，做出某种妥协性的决定。柳蒂说，他在地图上指出的地区有芬兰正在使用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如果这些地区没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那么，代表团希望确定另外的边界。

莫洛托夫回答说，我们对芬兰政府提出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因为军事行动已经开始了。

柳蒂问，可否对领土作相应的交换，而对某些地段的边界进行修改。

莫洛托夫要求在地图上指出，具体希望作哪些修改。

指出希望修改的边界后，柳蒂提出了运河问题，请求在运河的通过地区提供一条走廊，以架设桥梁和各种浮桥来弥补所造成的不方便。

莫洛托夫回答说，建立这样的走廊没有什么好结果，而总是引起缔约各方的摩擦，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在代表团指出的地点建立走廊的想法只会引起国家间的摩擦和误解，为产生不愉快和争端创造条件。关于提出修改边界的问题，莫洛托夫同志答应与代表团成员进行谈判，但是他对我们是否真能做出什么修改表示怀疑，因为这些要求已经是最低限度的。

莫洛托夫同志问，还有没有对提议的其他地方做出修改的要求。

柳蒂指着地图上库奥拉亚维地区的领土说，芬兰政府现在就准备把它转让出去。

莫洛托夫同志再次指出，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目的是保证摩尔曼斯克铁路的安全。没有任何一个处在像苏联这种地位的大国，做出像苏联现在这样做的事。没有一个大国像苏联这样把其军队已经占领的领土再交还的，苏联只有一个不冻港，但它却要

把苏联军队已经占领的佩萨莫港——与摩尔曼斯克不冻港具有一些相同条件——交还给像芬兰这样的小国。

柳蒂回答说，他对苏联在佩萨莫港所做的让步给予高度评价，芬兰代表团对此表示感谢。因为芬兰的领土是如此之小，可否在其他地方得到补偿？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以前领土补偿的条件是在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局势下提出的，当军事行动开始后，已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任何处在苏联地位的国家不仅不会给予补偿，反而会要芬兰的全部领土，而且还要大笔赔款。苏联尊重小国，它只要求保证通往苏联领土上惟一不冻港的铁路的安全。

柳蒂说，在地图上指出的划归苏联的地区，对小国芬兰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可能的话，代表团请求重新审核芬兰人提出的要求，因为已经就主要条款达成了协议，是否现在就可以结束军事行动了。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只要和平条约一签订，军事行动就同时停止，个别的次要问题不能马上解决。

之后，代表团确定了起草条约的大概时间。

谈话结束时，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他对瑞典政府参与这些谈判并提出的倡议给予高度评价。

莫洛托夫同志还说，京特、瑞典驻莫斯科大使阿萨里逊和柯伦泰同志参加了谈判。莫洛托夫同志还指出，不应该对谈判时由于通过瑞典政府所出现的技术性方面的不准确问题做出另外的解释。

柳蒂回答说，他同意莫洛托夫同志的看法，他对瑞典政府在本次冲突中的参与和提出的倡议给予高度评价。

会谈就此结束。

№05726

莫洛托夫与芬兰代表团关于缔结 和约问题的会谈记录

(1940年3月12日)

会谈开始时，审议了和平条约草案。柳蒂问，可否满足芬兰代表团提出的对边界三个地方的修改。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已经审议过了，苏联政府否决了这些提议。莫洛托夫补充说，目前谈判已经拖延了，现在苏联的领导成员的看法是，我们白白地把佩萨莫还给了芬兰。相反，必须把佩萨莫地区交给苏联的情绪现在正在增长。这种情绪在军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

于是柳蒂又提出问题，这不是在确定边界线时转交领土的问题，而是在划分边界时，不要把院落、住宅和村镇分开，从而引起某些争执。

莫洛托夫回答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完全是次要问题。类似的问题在与立陶宛和德国划定边界时已经解决，这从为解决这类问题而专门成立的委员会的工作实践中就可看出。在这种情况下，把边界线移动1-2公里没有多大问题。莫洛托夫提议把所有这些次要问题交给这些委员会去解决，它们实际上已证明，委员会自己可以自由地解决上述全部次要问题，而不需要把这些问题通报政府审议。

柳蒂提请注意，由于技术困难，草案所确定的期限实际上难以履行，芬兰代表团希望做出某些修改。芬兰代表团还希望，军事行

动现在就结束，尽管和平条约还没有签订。

莫洛托夫完全否决了这个提议，认为停止军事行动与签订和平条约相互不可分割。

日丹诺夫也赞同莫洛托夫的话，说如果这样，苏联居民就会对签订这样的协定不理解，群众就会认为，政府背着人民干了某些黑暗的勾当。

柳蒂证明，立即签订这种条约是不可能的，因为批准条约需要一定的时间。

为了批准条约，需要一定时间，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只要代表团出示芬兰代表团掌握的全权资格证书，和平条约就可签订。但是无论如何不应该把签订和平条约与结束军事行动的问题分开。

巴锡基维保证说，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的条约，将在赫尔辛基得到议会的批准。

然后芬兰代表团提及了汉科半岛的管理形式和芬兰居民与派驻在这个岛上的权力机关的关系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汉科半岛是军事性质的海军基地，那里无论如何不允许出现两个政权。这种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总是会在这些地区的执政当局之间造成摩擦和不正常的关系。莫洛托夫指出，苏联政府非常欢迎芬兰政府把汉科半岛卖给苏联，并且认为这样解决问题最好。如果芬兰政府认为我们的提议不合适，那么，必须根据苏联政府的提议，就在半岛上建立基地的问题达成一致。

柳蒂提出在建立了海军基地的地区内居民的地位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半岛上的管理将是军事性质的。半岛上的居民应该就它们感兴趣的问题亲自与半岛上的权力机关进行协商。

关于对转交给苏联的财产的赔偿问题，苏联政府认为，这些赔偿应该由芬兰政府支付。

苏联政府提出的一切要求都可以用战争已经开始来解释，由于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现在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最低限度的。战争有自己权利和后果，所以，如果我们在另外的条件下——比如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签订条约的条件——进行协商，那么这些要求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现在我们遭受了损失，对此我们既不要求任何赔款，也不要求物资和领土的补偿。苏联政府要租借汉科半岛，并再次证明，这些领土是芬兰的财产。显然，任何处在我们的地位的其他大国，都不会提出像苏联政府现在所提出的建议。

柳蒂提出了芬兰军队的问题，那些被占领地区的属于芬兰居民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次要问题。

莫洛托夫再次强调，现在主要问题是签订和平条约，千方百计地加快签署和平协定。所有其他的经济和技术问题可以在以后解决，就如同解决以前由德国占领而归苏联管理的领土上的居民撤走问题一样。

所有与转交领土和撤走居民的动产和不动产有关的问题，由联合委员会解决。

对与和平条约有关问题的讨论就此结束，委员会转而审议议定书草案。

瓦尔登将军发言，按照他的要求，根据全体委员会的意见，对苏联代表团提出的议定书草案做了某些修改。

白天与芬兰代表团的会见就此结束。

No 05727

莫洛托夫与芬兰代表团关于缔结 和约问题的会谈记录

(1940年3月12日)

柳蒂对如此可恶的条约草案感到头痛，请求瓦尔登将军发言。后者对撤军期限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表示实际上不可能履行所提出的条件。芬兰代表团对不能履行条约所规定的条件的解释是交通和通讯条件非常糟糕。为了不使苏联政府认为似乎芬兰政府消极抵制履行条约的条款，芬兰代表团请求延长履行议定书相应条款的期限。

苏联代表团认为可以满足芬兰代表团的请求，延长期限。

随后，芬兰代表团提出关于战俘的条款，认为没有必要确立专门条约，军事行动结束后，就尽快交换战俘。

莫洛托夫指出，在芬兰军队中有外国人，当然，苏联政府不能对外国战俘和芬兰俘虏同样看待。也许可以就关押在芬兰监狱中的囚犯达成某种协议，具体地说，就是安蒂卡伊宁同志^①，以及库西宁的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政府认为可以达成明确的协议。苏联政府不能把外国战俘看做是一般战俘。

柳蒂回答说，他不知道安蒂卡伊宁案件，但是认为，解决莫洛托夫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障碍，这个问题将在芬兰总统和司法部长的参与下妥善解决。

^① 安蒂卡伊宁 (1898 - 1941)，芬兰共产党组织者之一。1934年因革命活动被判处终身监禁。1940年在苏联政府协助下获释并移居苏联。

随后，芬兰代表团提到了被占领地区的芬兰居民从归属苏联的领土上撤走时所产生的财产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需要相应的协定，这个协定与遣返德国公民的条约的条件相似。苏联政府对芬兰中等的工人和公民的财产不表示异议，如果芬兰代表团广义地解释这个问题的话。然而我们必须有时间熟悉所提及的问题。

然后芬兰代表团提到了汉科半岛的租赁问题，并表示芬兰人要求增加租金。苏联政府承认可以把汉科半岛的租金增加到800万芬兰马克，比双方在条约中关于这个条款所同意的数目有所增加。

因为柳蒂在谈判中保证，芬兰的政策永远是独立自主的，永远不会与苏联为敌，莫洛托夫表示，他感到非常奇怪，事实上芬兰的政策与对苏联有敌对情绪的大国的政策是一致的。此外，柳蒂本人不久前还声明，芬兰可能被卷入战争的旋涡，可能对苏联造成威胁。苏联的政策完全不追求任何侵略性目的，我们从来不愿意占领芬兰的某些领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确立列宁格勒以及通向苏联的惟一不冻港的铁路的安全。莫洛托夫说，尽管苏联政府感觉到芬兰政府对苏联的某些不友好，但是我们总认为，现在签订的条约将会加强和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目前正是为了实现我国的安全，我们现在就要求坚定地履行条约所列的条款。

然后委员会转向审议建设把瑞典和苏联连接起来的铁路问题。芬兰代表团想方设法延长完成铁路建设的期限，说在这个期限内从人力上不可能履行条约，而且也缺乏建筑材料。尽管苏联代表团提议将给以技术和物资援助，但芬兰代表团还是不同意对建设铁路问题的具体解释，并对条约这个条款的措辞做了某些修改。

芬兰代表团提出对若干次要的技术和经济问题进行审议，但是双方代表团一致同意，把这些问题留待专门委员会审议。

对和平条约和议定书草案的讨论就此结束。

经过时间不长的休会，和平条约和议定书的俄文文本被打印出来，委员会转而讨论签订被确认的和平条约、议定书和所附地图的程序问题。

双方代表团全体成员将于 1940 年 3 月 13 日签署所有文件。

№05728

莫洛托夫关于苏芬条约与 舒伦堡的谈话记录

(1940年3月26日)

舒伦堡通报说，里宾特洛甫^①委托他请求莫洛托夫对他与芬兰人进行的和平谈判做简要通报，因为就此问题有许多传言，例如，京特就声明，这些谈判的倡议是苏联提出来的。

瑞典报纸报道说，1月29日迈出了第一步，而2月23日，张伯伦^②就公开暗示说，有人向英国提出了让英国出面斡旋的要求。

里宾特洛甫希望知道，瑞典人是否施加了压力。至于芬兰人着手谈判的希望，无论是里宾特洛甫还是舒伦堡都知道。此外，里宾特洛甫感兴趣的是：是否就归还佩萨莫问题有某种保留声明，以及是否谈到在阿兰群岛设防的问题。

莫洛托夫对大使回答说，他从来没有看到和听到京特关于倡议似乎来自苏联的声明。我们谨慎地对待和平谈判的提议。实际上事情是这样的：瑞典人通过柯伦泰转达了芬兰人的要求——希望开始和平谈判，并向他们通报苏联同意缔结和约的条件。与此同时，瑞典人向他们提出了要求，只有他们做出让步，才能进行和平谈判。

芬兰人回答说，他们同意开始谈判，尽管我们没有向他们转达具体条件，芬兰人的确不知道同意什么。所以，我们另外以书面形式向芬兰人转达了我们的要求，再次得到了同意开始谈判的答复。

^① 里宾特洛甫，约阿希姆·冯（1894—1946），时任德国外交部长。

^② 张伯伦，内（1869—1940），时任英国首相。

德国也没有向我们通报芬兰人的请求（舒伦堡点头作同意状）。

莫洛托夫继续说，至于英国，曾委托我们的全权代表就此问题进行过大概的通报，因为我们认为，瑞典人也会向英国人通报。

这次谈判中没有涉及阿兰群岛问题。

至于佩萨莫地区，尽管我们也占领了它，但是为了迎合芬兰，我们把这个地区还给了它，因为根据 1920 年的和平条约，苏联把它让给了芬兰。我们没有对芬兰的内外政策提出任何条件。我们仅预先声明，在佩萨莫地区不应该建立武装基地。我们提出的任务是保证列宁格勒的安全，然后是摩尔曼斯克和摩尔曼斯克铁路的安全。为了得到这些保证，也提出了租赁汉科半岛的问题。

舒伦堡两次问莫洛托夫：提没提阿兰群岛问题？

莫洛托夫两次都回答说，没有提出阿兰群岛问题。

舒伦堡感谢莫洛托夫的通报，声明说，他就是这样看待和平谈判的进程的，但是他接受了里宾特洛甫的委托，就请莫洛托夫再次通报谈判的进程，他不得不这样做。

№01658

伏罗希洛夫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关于
苏芬战争的总结报告^①

（1940年3月28日）

对芬兰战争的教训

对芬兰的战争持续了104天半，战事极其激烈。

我应当说，无论是我——国防人民委员，总参谋部，还是列宁格勒军区首长，起初都完全没有认识到这次战争的所有特点和困难。这首先是因为军事主管部门没有组织良好的情报工作，因而不掌握必要的敌情；我们所拥有的关于芬兰、它的武器装备和设防地区的少量情报，未得到充分的研究和处理，因而未能发挥作用。

军事主管部门对于芬兰战争的准备不够认真：

一、军事行动开始时集中在卡累利阿地峡和卡累利阿的步兵、炮兵和坦克，要突破卡累利阿地峡上的筑垒防线和击溃芬兰军队显然是不够的。

^① 伏罗希洛夫，克里门特·叶夫列莫维奇（1881～1969），时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这个报告是1940年3月28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宣读的。在报告第一页上有1941年5月27日谢尔巴科夫的下列批注：“本材料是最后修订稿”，“是从列茨基同志那里得到的”。在报告第一页的背面有伏罗希洛夫的助手列茨基的手写笔迹：“本报告第一稿14页、第二稿42页、副本35页均被销毁。”转给斯大林的那份文本的左上角有斯大林的手迹：“需要补充我军的损失和芬兰军队的损失”。

二、由于对于敌人和战区情况没有足够的了解，我们以为在芬兰战场的所有地段都能使用我们的重型师和坦克部队。

三、作战是在冬季发起的，但部队却没有相应的服装，没有在严冬条件下作战的装备和装具。

四、我军步兵没有配备轻型冲锋枪和 50 毫米的迫击炮。

红军作战准备工作中，特别是对芬兰战争的准备工作中的上述缺点，以及我下面要讲到的其他一些同样严重的缺点，很快就极其严重地影响了战争的进程。

众所周知，战争是 1939 年 11 月 30 日爆发的。作战行动一开始，中央就建立了由斯大林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同志和海军人民委员库兹涅佐夫同志（后者只在解决海军问题时参加会议）组成的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是大本营会议的经常的积极参加者，虽然他并不是大本营的正式成员。

总军事委员会^① 大本营实际上领导了战争的各种事务^② 和与前线有关的一切组织工作。

11 月 30 日早晨，位于卡累利阿地峡上的我军在炮火轰击之后全线转入总攻。经过不断排除各种人工和天然的障碍物，并歼灭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后，我军于 12 月 10 日进抵芬兰军队设防地区的前沿阵地。在连续的战斗中，军队攻入敌人领土约 25~65 公里，平均每昼夜前进 3~6 公里。在这个较短的时间内，我军在卡累利阿地峡夺取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进攻基地，也就是所谓的设防地区前沿阵地，简单地说，就是攻占了一块构筑有连绵不断、高低不平的掩

① 划着重线部分的文字是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原稿所做的修改，下同。这里的原稿文字是：“大本营，确切地说，就是斯大林同志”。

② 这里的原稿文字是：“战役”。

体和带有崖壁反坦克壕沟的地段，其间有大量避弹所和其他野战工事，在广阔的正面和深远的纵深内，岩石和钢筋混凝土的鹿砦到处林立，铁丝网纵横交错，大量专门构筑的火炮和机枪掩体随处可见。在前沿阵地，所有道路和桥头都设置了缠着有刺铁丝的鹿砦。此外，芬兰人还广泛使用应用地雷、反坦克地雷和其他地雷障碍物，不仅在道路、坡道、一切可以通行的地段、湖间地峡，以及桥梁、房屋等所有建筑设施布雷，而且还在日常家庭用具上等布雷。不仅如此，芬兰人在退却时还烧毁村庄，强制迁走居民，赶走或杀死牲畜等。简单说，这样的地方就叫设防地区的前沿阵地。

就在这同一天，11月30日，部署在卡累利阿，以及在彼得罗扎沃茨克方向、乌赫京斯卡亚方向、坎达拉克沙方向和摩尔曼斯克方向上的我军也越过国境线，一面战斗一面向芬兰内地推进。彼得罗扎沃茨克方向上的军队不断发动进攻，于12月15日前进至科塔约奥基、科拉雅尔维湖、穆尔苏拉地域，在这一线遇到敌人预先构筑的防御工事和强有力的抵抗，被迫停止进攻，并转入有组织的防御。15天内，这个方向的军队一面作战一面完成了65公里的行军，平均前进速度每昼夜4.5公里。

乌赫京斯卡亚—坎达拉克沙方向的军队一面战斗一面前进，于12月18日前以右翼部队占领了科米雅尔维湖东岸地区，以中央的兵力占领了苏奥姆斯萨尔米、卡尔彼萨尔米、奴尔米雅尔维地域。敌人在这一线上也依托预先构筑的防御工事阻止住了我军的前进，迫使其在这里也停止进攻，转入防御。

在这一带我们进入芬兰腹地35~140公里不等，平均每昼夜在作战中前进2.3~8.7公里。

我军北方集群自摩尔曼斯克向佩萨莫方向行动，于12月1日经过战斗占领佩萨莫港，同时肃清了斯列德尼半岛和雷巴奇半岛上属于芬兰的一些地域。

军事行动开始阶段的特点是，全体人员情绪振奋，所有兵种都高度紧张。

这一阶段在卡累利阿地峡上的坦克兵的任务特别繁重。坦克在那里不仅是一种重要的作战手段，而且还是军队的组织要素。坦克旅和坦克营的果敢行动（往往还是过分大胆的行动），带动了步兵前进，并且常常是保证步兵胜利的先决条件。

炮兵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行动，在第一阶段并未显现出它后来在突破“曼纳林防线”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摧毁性的威力。但即使如此，炮兵这期间在卡累利阿地峡照例还是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我军的航空兵本是武装力量中最为重要的作战要素，可惜由于气象条件恶劣，在整个 12 月内未能配合地面部队积极参加作战行动。这自然不能不对我军作战的胜利产生影响。此外，由于我军航空兵被迫无所事事，敌人得以不受阻碍地大规模实施兵力和武器的战役调动，利用纵深的作战防线把它们转到必要的地域和地点上。

就在这相当短暂的战争第一阶段内，已经暴露出我军的许多弱点和敌人的长处。

芬兰人的长处

一、与捷克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不同，芬兰人不仅善于抵抗，而且为抵抗^①作了很好的准备。

二、芬兰军队组织严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能结合地形条件和任务机动灵活地行动，防御时坚定顽强，而且纪律严明。

“舒茨科尔”^②——这个用敌视和仇恨布尔什维主义俄罗斯的

① 这里原稿的文字是：“作战”。

② 1917~1944 年芬兰的军事组织。

思想调教和培育出来的总数达15万多人的白卫军组织，被网罗进了动员起来的军队，成为使芬兰军队得以巩固的相当强大的基础和凝聚剂。同时在军队内部，舒茨科尔分子还具有宪兵的职能。

三、总的说来，芬兰战术训练良好。小分队战术操练得十分仔细，单兵训练也不错^①。

四、除所有其他武器外，芬兰人还装备有：

(1) 性能良好的新式冲锋枪，弹夹可装70发子弹^②，在任何气象条件下均能无故障地射击；

(2) 带有大量炮弹的81毫米口径轻型迫击炮；

(3) 大量种类不同的障碍地雷和冲锋枪^③。

所有这类武器都被敌人有效地用来对付我军。芬兰人在战术上特别巧妙地运用障碍地雷和自制的“苏欧米”冲锋枪。配备有10挺冲锋枪的小群滑雪兵常于夜间，有时也在白天，突入我军后方，对通常部署在道路上或道路附近的我军部队实施袭击，不时给它们造成重大损失。这主要是在拉多加湖以北行动的我军。在卡累利阿地峡，这类情况几乎没有发生过。

五、芬兰人广泛使用滑雪板，在森林中又能很好地辨别方向，这使他们占据了一定的优势^④。

六、芬兰军队能比较坚毅地经受严冬条件。

七、芬兰人表现出在构筑野战防御工事和修建完整的防御地区方面颇有创造性，而且热爱劳动到不知疲倦的地步。凡是在战术上需要的地方，他们都在短时期内设置了反坦克障碍物、壕沟、鹿砦、散兵坑、避弹所和障碍地雷区，从而有力地妨碍了我军的行动

① 这里的原稿文字是：“优秀”。

② 这里的原稿文字是：“78发子弹”。

③ 这里的原稿文字是：“苏欧米”。

④ 这里的原稿文字是：“机动作战的巨大优势”。

和推进^①。

八、敌人精通伪装艺术，并在他们的一切机动作战中广泛地加以运用^②。

九、最后，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帮助下，一段时间内是在德国人的帮助下，芬兰人预先建立了针对苏联的阵地，使卡累利阿地峡成为了一个设防地区，其东面直抵拉多加湖，西面到达芬兰湾。在科伊维斯托（比约尔克）群岛建有良好的炮兵阵地，能从海上封锁维堡湾和维堡市区近郊，成为这个设防地区的延续。这一情况也使敌人占有一定的优势^③。

关于芬兰人在卡累利阿地峡构建设防地区的事，军事主管部门是知道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设防地区实际上是怎样的情况，直到我们英勇的部队将其突破并占领了维堡之后，我们才得以知晓。

不仅芬兰政府及其总指挥部把“曼纳林防线”看做是不可攻克的堡垒，英国和法国的专家们，以及芬兰人的“朋友”们也认为如此，并一再断言，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将在它面前被撞得粉碎。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不是什么其他任何原因，促使芬兰政府去年11月同我们谈判时顽固不化到几乎白痴的地步，而当时向他们提议的是和平解决保障列宁格勒安全问题的最有利的条件。

以上扼要列举的就是芬兰武装力量与红军相比较而言的优势和长处。

① 这里删除了原稿中的一句话：“芬兰军队在防御方面显示出其稳固和强大。他们熟知和擅长防御战。”

② 这里删除了原稿中的一句话：“芬兰军队表现得主动而顽强，特别是当我军未能掌握主动的时候。芬兰人首先沿卡累利阿边境的各个地段建立了根据地，后来证明，在我们的后方，他们利用这些根据地，以滑雪部队来牵制和打击我们的交通线，并破坏独立部队之间的联络。”

③ 这句话是斯大林补充的。

我在这里没有提及非常复杂困难的独特地形条件，它在极大程度上有利于敌人而增加了我军行动的困难。

芬兰人的弱点^①

一、芬兰人的后备兵员，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比我们少得多。60万人，这就是芬兰人有可能扩大军队人数的极限。

二、芬兰人的野战炮兵与我们的炮兵相比，力量薄弱，数量较少。

三、芬兰人的飞行机之少，与我们无法相比。

四、芬兰军队尽管素质不坏，但毕竟不善于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因而其主动性仅限于在卡累利阿地峡进行防御和在其他战线实施游击行动。

五、芬军指挥部尽管具有主动创新和机敏善变的特点，但仍未达到尽善尽美，因为它过高地估计了曼纳林防线的“不可攻克性”，而对我军炮兵和航空兵的力量以及红军的攻击力估计不足。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我军在卡累利阿地峡发起第一次强人的突击以后，芬军就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

同芬兰军队接触初期暴露出来的我们的缺点

一、一些年来，在我们的所有战役计划中，我们一直把芬兰看做次要方向，因而用于这个地区的兵力和武器只能实施防御作战。因此，对整个芬兰战区都缺乏足够的关注和认真的态度，而对这个战区的特点知之甚少更是不可容忍的。

^① 整个这一节都是斯大林写的。

二、修筑道路在准备任何战争时都属于应首先考虑和最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对此却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如果说在卡累利阿地峡在这方面多少还做了些什么，那末在卡累利阿则什么也没有做。

由于卡累利阿道路网不发达，我们不得不把一些大兵团部署在一条常常仓促铺设的道路上，这自然妨碍了它们展开正常的作战活动。

三、松懈不力的军事情报工作对于我们对芬兰战争的准备产生了特别不利的影晌。

在对芬兰战争开始之际，国防人民委员部，特别是总参谋部，没有掌握多少关于敌人兵力武器、军队素质及装备质量的准确情报，特别是对卡累利阿地峡设防地区的真实情况，以及芬兰人在雅尼西亚尔维湖和拉多加湖地域构筑工事的真实情况了解极少。

四、以上种种情况加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就预先决定了军事主管部门对于涉及对芬兰战争准备的所有措施将采取不够认真的态度。当时认为，同芬兰人的战争会速战速决，至少不会给我军造成很大困难。因此，我们对于在芬兰战场进行独立的战略任务准备不足。原先派出用于对芬兰作战的兵力根本不够。我认为这一失误是进行芬兰战争准备的所有措施中最大的缺点之一，它立即对我军的行动产生了不利影响。仅在10~15天以后，我军就在卡累利阿地峡撞上设防地区而不得不停下来转入防御。同样，在卡累利阿作战的车队在前进道路上也遇到了强固的、预先构筑好的防御阵地，被迫停止进攻转为防御。需要补充新的兵力，以便不给敌人在遭受重创之后得到喘息的机会，但我们手头并无这样的兵力，要从内地通过铁路把它们调来，这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于是，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不得不把相当顺利地发动的进攻停止下来，以待必需的兵力装备到达。这需要很多时间，致使敌人得以在卡累利阿的某些作战地段转入积极行动，并暂时取得了主动权。

五、与此同时，在我军战斗行动过程中，暴露出在军队组织、战斗训练、武器装备和供应上的重大缺点。

六、组织方面的缺点：

(1)我军步兵师作战时，特别是在芬兰北方，即比拉多加湖更北的地方，显得臃肿笨拙，技术装备和后勤机构负载过重，不堪携带；

(2) 很大一部分由所谓三合一基于军人扩展而成的步兵师，特别是在最初，战斗力十分薄弱；

(3) 我们开战时没有配备芬兰人大量拥有的冲锋枪。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不及敌人，而敌人迅即发现了这一点，随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我们有不错的杰格佳廖夫冲锋枪，但当时没有配备给军队，虽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警卫部队已经采用。这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失误^①；

(4) 我们在装备迫击炮，特别是50毫米迫击炮方面，也同样处于这种不利^②状态。已经装备的82毫米迫击炮在军队中发挥作用不够，而某些部队根本不使用，因为军队还没有掌握迫击炮的使用。缺乏使用迫击炮的训练有素的干部。开始进入作战军队的50毫米迫击炮最初也因缺乏经过训练的迫击炮手而未得到很好使用。只是到了前线才逐渐地克服了这些缺点^③。这样，军队直到2月份以后才能够开始运用迫击炮，而以自己的迫击炮弹回击敌人的迫击炮弹。这也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失误^④；

(5) 步兵，不仅仅是从南方一带调来的军队，也包括长期驻扎在列宁格勒军区的军队，大都不会滑雪。这种情况对于在拉多加湖以北作战的一些步兵师造成严重的影响。虽然部队在当地和作战环

① 这句话是斯大林补充的。

② 这个词是斯大林加上去的。

③ 这里的原稿文字是：“消除了迫击炮薄弱的问题”。

④ 这句话是斯大林补充的。

境中逐渐学会了滑雪，但效果不大，至少在作战上未起到重大作用。敌人在这方面优于我们，并且广泛而巧妙地发挥了这一优势；

(6) 军队装备，首先是步兵的装备不适应冬季的条件，更不用说适应去年那样的严寒条件。毡靴很少，短皮大衣、手套也不足；旧式钢盔在寒冷的天气不适宜使用，必须换成护耳皮帽。这是军事主管部门考虑不周；

(7) 军队伙食供应的组织也必须进行重大改变，因为原有的供应体制，由于军事主管部门考虑不周^①，未能规定一系列的浓缩食品。军队中不供应面包干，而是用饼干来代替。然而对于远离铁路作战和露营驻扎的军队，面包干和浓缩食品是最适用的食物。面包干和浓缩食品便于分送到军队（体积小），而且食用方便，因为它们不易冻结；

(8) 步兵的战斗训练大都水平低下。刚刚扩展到战时编制的新建师，原有的干部本来就不强，补充的又是从预备役征召来的指挥人员，致使干部骨干队伍更加薄弱；

自然，这样的指挥人员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把交付给他们的分队和部队提高到组织严密和训练有素的状态。在许多情况下，一个个团、营、连只能在战斗行动过程中逐渐增强战斗力；

(9) 许多高级首长也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不得不撤换许多高级指挥员和参谋长，因为他们对军队的领导不仅不能带来益处，而且经认定是明显有害的；

(10) 在战争期间组建的司令部，从最高级的到师级的在内，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都准备不足，不能熟练而全面地指挥交付给他们的军队，没有能力对于前线不断变化的形势迅速做出反应，而是常常落在事态的后面；

^① 这句话是斯大林补充的。

(11) 在作战行动的最初时期，军队的纪律几乎到处都很松弛。许多指挥员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不能清醒地辨明形势，而常常是不知所措，缺乏监督所属部队、建立秩序和维护严格军事纪律的能力。最糟糕的是，在团，特别是在师的后方，经常有大批战士甚至指挥员无所事事，到处游荡，而无人过问。道路上塞满了辎重，厨房附近人群拥挤，不仅有军人，也有平民，等等。

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的专门指示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就此采取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军队的秩序和纪律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是，谈到纪律松弛时，我并不能举出下属不服从上级首长或不执行战斗命令的事例，只有个别的例外。在作战部队中，总的说来军纪一直是严明的。

对所暴露缺点的纠正

一、战事要求迅速而彻底地克服在作战过程中暴露的所有缺点和不足。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极为主动地，并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各种果断措施，以求尽快彻底地清除军队中的缺点。还采取了一切措施，设法在没有道路的芬兰战场北部地区修筑几条土质军用道路；此外，从战事一开始就着手铺设铁路：一条从彼得罗扎沃茨克至苏奥雅尔维；另一条从坎达拉克沙至库奥拉雅尔维。这些措施中的一部分已取得明显效果。从沃尔霍夫斯特罗伊至洛杰伊诺耶波列再至萨尔米的军用道路，以及一系列在前线修筑的道路，改善了在这些地域行动的部队的局面。经过两个半月的修建，一条连接彼得罗扎沃茨克和原芬兰铁路线的支线已开通运行。如果战争继续进行，这条铁路可发挥巨大作用。

二、在战事过程中，我军侦察工作的不足得到了来自作战部队各司令部的情报，以及部分来自我航空兵的情报的弥补。这使总军

事委员会大本营得以辨明形势并及时对事态做出反应。

三、对于原先规定的对芬兰作战部队的数量作了重大变动。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下令调集必要数量的步兵师和其他部队，由铁路紧急运至作战前线的相应地段。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提及我们遇到的铁路运送军队方面的困难。你们知道，并未在铁路进行动员，因此军事运输是按照和平时期的列车运行时刻表进行的，这自然降低了军用列车运行和调派的速度。虽然如此，还是应当承认，铁路列车的行进是缓慢的。结果是军队和军用物资到达前线的时间往往延误；军队集中在时间上的拖延，也影响了作战行动计划的执行。

四、在组织方面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命令在北方作战的几个步兵师通过减少后方机关和精简师炮兵来实行轻装。对营的机枪连和连的机枪排进行了改组；在师内由优秀的滑雪手组成专门的滑雪营，等等。

五、芬兰人广泛使用滑雪板也迫使我们采取相应的措施。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指示国防人民委员部建立由志愿人员——志愿奔赴前线的人很多——组成的专门的滑雪营和滑雪连。志愿人员组建成了大量的此类营、连，人员总数达到7万人。这些部队领到相应的装备，配备了自动武器和半自动武器，分配给前线的各师。此外，作战部队还补充了足够数量的滑雪板。从中央派去大量训练有素的滑雪运动教练员，由他们帮助军队进行滑雪训练。

同时，看来在前线使用那些由我们的骑兵下马组成的少量轻便机动部队的做法是合理的。这些部队在战斗中以其作战英勇顽强而享有很高的声誉。此外，为了满足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人员纷纷要求把他们派往作战部队的大量申请，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命令国防人民委员部组建了两个由志愿人员组成的步兵师。这两个师很快在列宁格勒军区建成，并派往前线。

六、一经发现敌军在战斗中广泛使用轻型冲锋枪，总军事委员

会大本营，准确一些说是斯大林同志本人，当即调动起一切可能的力量，要他们恢复杰格佳廖夫冲锋枪的生产。这种冲锋枪只配有装填25发子弹的弹夹。斯大林同志要求武器装备人民委员万尼科夫同志^①和他的设计师们研制出与芬式冲锋枪相同的装70~75发子弹的弹夹。仅仅用了15天时间，我国工业部门就研制成功并掌握了冲锋枪和装70发子弹弹夹的生产，并且开始每天生产数以百计的国产冲锋枪。这些枪支迅速发给作战部队。随即斯大林同志又提出迅速提高迫击炮和迫击炮弹生产的问题。通过一系列措施，这件事也前进了一步。鉴于在作战部队中枪械和迫击炮方面暴露的缺点，斯大林同志要求把军械部中的两个处：枪械处和迫击炮处划分出来，扩展为独立的部。这两个部承担的职责就是紧急地把枪械和迫击炮提高到完全符合作战部队需要的水平。

七、在军队的装备方面，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依然是在斯大林同志的倡议和领导下，采取一系列各种紧急措施。其中主要是：

(1) 命令相应的工业部门制造足够数量的毡靴、短皮大衣、棉手套、护耳皮帽，等等；

(2) 斯大林同志对保障作战部队御寒服装问题极其关心，他委托中央委员会书记安德烈耶夫同志^②和马林科夫^③同志直接参与此事，并给予军需部部长赫鲁廖夫同志^④以切实有效的经常性的帮助。安德烈耶夫同志和马林科夫同志为军队做了大量有益的工

① 万尼科夫，鲍利斯·李沃维奇（1897~1962），苏联炮兵上将，1939~1941年任武器装备人民委员，1942~1946年任弹药人民委员。

② 安德烈耶夫，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1895~1971），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兼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③ 马林科夫，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亚诺维奇（1902~1988），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兼干部管理局局长。

④ 赫鲁廖夫，斯捷潘·瓦西里耶维奇（1892~1962），时任苏联红军总军需部部长，后任总后勤部部长兼交通人民委员。

作。在短时间内，不仅在前线的军队，还包括准备开赴前线的军队，都已获得全部精良的装备。

八、在改善军队的浓缩食品和面包干供应问题上，斯大林同志采取了紧急而且也同样果断的措施。米高扬同志接到相应的指示，于是几天之内即大规模展开了面包干和各种浓缩食品的生产。对所有这一切，斯大林同志都直接过问并不断表示关注，直到他确信要做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而对其进一步的发展不必再有任何担心为止。短期之内，给军队向前线发运去了成千上万吨面包干和浓缩食品。

由于作战部队远离铁路，但必须为前线的军队保障不间断的正常供应，就必须组织大规模的汽车运输。有6万多辆汽车在前线和铁路之间来回奔忙，以保障军队获得所有的必需品，也从铁路线向前线运送军队。应当承认，运输兵整个说来工作极度紧张，也十分有效。特别是要考虑到，司机们还要经常不断地用武器击退芬兰的破坏性伏击，给自己扫清道路。

九、考虑到前线持续严寒的天气已经开始并将延续下去，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决定给作战部队士兵每天的口粮增加15克糖、50克脂油，而且由于天气酷冷决定自1月至4月^①向全体人员发放每人每日100克伏特加酒。这样，主要食品的总热量就从每日的3717大卡增加到4449大卡。

这一措施对于保持作战部队人员的体能和精力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十、为了改善军队的组织状况和提高其战斗力，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曾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指示，目的在于使高级指挥人员和司令部都能更有效地指挥军队。这一切取得了十分积极的效果。其中绝大部分是斯大林同志亲自写的或由他口授的。

^① 这句话是斯大林补充的。

十一、由于直接深入到部队战斗行动的一切细节，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始终对前线所有事态了如指掌，在此基础上，为了改善对部队的指挥，不得不解除一大批高级指挥员的职务，而任命更加合适的人取代他们。

十二、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考虑到国际形势——莫洛托夫同志就此作了报告——的同时，为了加强我国的武装力量，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防人民委员部获准在不宣布动员的情况下，而从二个内地军区的预备役人员中征召5万名指挥人员和符合兵役年龄的士兵入伍。征召人员的总数相当庞大。此外，国防人民委员部得到指示，要求采取措施使未参加作战的所有部队在春季前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

在历数缺点时，我只讲到了步兵。我一点也没有谈到我们的炮兵、骑兵、坦克兵、工程兵、化学兵和通讯兵，我也没有谈到我们的航空兵。我这样做自然不是因为这些兵种不存在缺点。可惜并非如此，这些兵种存在着缺点，而且还不少，并且不是小缺点。我没有说到这些兵种是因为，它们的缺点与步兵相比毕竟少些，而且有质的不同，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

中央委员会知道，上述所有兵种都是由非临时性基于军人组成的。这一点就决定了许多问题。这些军队的指挥人员从总体上说，无论是资历还是专业水平都要比步兵部队的指挥人员高得多，而主要的是他们比较稳定。这些兵种是依靠从步兵选调优秀人员而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一切保障了我军炮兵和航空兵^①，以及坦克兵等各兵种能进行常规战斗，而在许多场合下从战争一开始起就开展了良好有效的行动。

我们的机械化部队在作战前线表现不坏，而在有些场合则表现

^① 这句话是斯大林补充的。

得十分卓越。

军队的政治精神状况

尽管在前线作战中暴露出军队在组织和战斗训练中存在着大量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所有部队，全体战士和指挥人员的政治和精神状况从作战行动一开始到结束都是无可指摘的，情绪高昂的。军队中的党团组织、政治机关和所有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在前线最困难的条件下，在战士和指挥人员中进行了不懈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战斗命令的贯彻执行。

在最为困难的激烈战斗中，军队中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日益高涨。祖国、我们的党和斯大林是军队奔赴战场、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粉碎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和战胜敌人的旗帜。

我的任务是介绍在战斗中表现出英勇果敢精神和真正英雄主义奇迹的一个个师、支队、小组以及个别的卓越人物。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与会的作战行动的直接领导者和参加者——铁木辛哥^①、日丹诺夫^②、梅列茨科夫^③、库利克^④、巴甫洛夫^⑤等同志可以向大

① 铁木辛哥，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1895 - 1970），时任苏联西北方面军司令，后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

② 日丹诺夫，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1896 - 1948），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兼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书记。

③ 梅列茨科夫，基里尔·阿达纳西耶维奇（1897 - 1968），时任苏联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苏芬战争期间指挥第7集团军在维堡方向作战获胜，突破曼纳林防线。战争结束后升任苏军总参谋长。

④ 库利克，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1890 - 1950），时任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兼总军械部部长。

⑤ 巴甫洛夫，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1897 - 1941），时任苏联红军装甲坦克部部长。

家报告。但是，我仍然要说，中央委员会、我国政府和斯大林同志可以为我们军队高度的政治和精神的坚定性而自豪。

战争的第二阶段

大体上于12月末至1月初结束的战争的第一阶段，具有两个主要特点：

(1) 在作战中我们研究并判明了敌人的强点和弱点；

(2) 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据此采取措施对作战部队的指挥机构进行了改组。在卡累利阿地峡组建起两个独立的集团军——第7和第13集团军——以代替原来的一个集团军，为了协调它们的行动又成立了方面军指挥部。在敌人行动积极而我军部队战斗力较弱的彼得罗扎沃茨克方向，获得大量增援的第8集团军也分成为2个集团军——第8和第15集团军。

(3) 上面已经提到，给各作战集团军派去了相应的强大的增援部队。

大约自12月末和1月初开始，在卡累利阿地峡的我军大力进行了突破“曼纳林防线”^①的准备工作。“曼纳林防线”，即芬兰军队的设防地区，越来越清楚地呈现为一个极其强固的现代化要塞，必须投入大量的兵力和物资，并且主要的是还要花费许多时间，才能将其摧毁。我军曾经几次试图突破这个由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布满壕沟、鹿砦、铁丝网和地雷，全部由炮火和机枪火力控制的地带，都未成功。通过各兵种的顽强战斗，以及不止一次的白昼和夜间攻击，得以确切地查明，只有系统地破坏钢筋混凝土结构和岩石

^① 这个词是斯大林加上去的。

泥土结构的^① 火炮和机枪工事，即摧毁工事的主体结构，从而消灭在其中防守的有生力量，才能突破这个防御地带。

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制定了这次战役的计划，并规定了实施的日期。

在突破“曼纳林防线”的计划中，炮兵和航空兵占有主要地位。决定在部队进行突破准备的同时，开始对筑垒防线前沿进行系统的、夜以继日的炮火和航空火力轰击。这种作法取得了极其良好的效果。到我军开始实施突破的大规模进攻^② 行动（2月11日）之前，许多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和岩石泥土结构的^③ 防御工事已被摧毁，而主要的是进行防御的有生力量已经从肉体上到精神上陷于崩溃。

自2月11日起，位于卡累利阿地峡的军队开始执行突破“曼纳林防线”^④ 并攻占维堡城的计划。

战事的进程众所周知。第7集团军的部队沿着通向维堡方向的铁路线，自2月11日开始向前推进。用炮兵、航空兵和坦克消灭工事内的敌人，并摧毁这些工事（有些工事则完整无损地加以占领）的同时，第7集团军的部队勇猛有力，势不可挡地突入设防地区的纵深，使其整个体系顿时遭到瓦解。友邻第13集团军的部队也承担着艰难的任务。他们同样坚忍不拔地积极行动，把大量敌人的兵力吸引到自己身上，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各兵种的部队，根据直接指挥员证实，在这一场艰苦卓绝的、不间断地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作战中，英勇奋战，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炮兵、航空兵和坦克兵表现优异。特别是我军炮兵有组织地

① 这句话是斯大林补充的。

② 这两个词是斯大林补充的。

③ 这句话是斯大林补充的。

④ 原稿这里的文字是：“防御地区”。

完成了大量任务。炮兵部队的全体人员表现出苏联炮兵官兵的全部优良素质，表现出真正的果敢和英勇。航空兵任务繁重，而且完成作战行动一大比一大更好。

在这个时期，工程兵完成了大量极为重要的工作。尽管他们在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即攻占设防地区前沿阵地期间，已经完成了最为繁重和毫无疑问也是英勇的战斗任务。他们承担的职责是：清除道路上的堆积物和通道上的地雷，排除地雷和清除桩砦等反坦克障碍物。所有这些繁重的战斗任务，我们的工程兵常常不得不在敌人的火力下进行，有时则位于自己部队的前方，也就是说，靠他们自身的火力作掩护而进行作业。此后，工程兵仍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由于卡累利阿地峡所有部队表现出真正的英勇无畏精神，一个月之后，外国专家将其与“齐格菲防线”和“马其诺防线”^①等量齐观的不可攻克的要塞——“曼纳林防线”，只剩下一片瓦砾。就在一个月之前，还被人认为，特别是被英、法的帝国主义先生们看做为是不可攻克的要塞的“曼纳林防线”，已被突破并予以摧毁^②。

结果敌人被制服，不得不在我国政府向其提出的和约上签字。

回顾已过去的作战进程时，必须公正地指出，卡累利阿地峡的步兵，尽管存在我在前面提到的所有重大缺点，总的说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的行动是令人满意的，某些师、团表现良好，有的则作战优异。

位于拉多加湖以北的我军——第15、第8和第9集团军——

① 齐格菲防线是1936~1940年修建的德国西部筑垒防御工事体系。马其诺防线是法国于1929~1934年修建的位于法德边界的长约380公里的防御工事。

② 这句话是斯大林补充的。

所实施的战役，则呈现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

在最初 10—15 天里，顺利向芬兰内地推进了 35—140 公里以后，这个方向上的我军被迫转入防御，但却未能按要求组织完善的防御。没有构成完整的战线而仅仅沿着林间道路行动的部队，确切地说是率领部队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犯了大量错误。敌人迅速发现了我方的错误，并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利用这些错误来对付我军。我方指挥员主要的也是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把整师整师的军队部署在一条道路上，而不采取相应的战斗保障措施来掩护自己的翼侧、后方和整个交通线。

指挥机关，其包括集团军一级的指挥部，几乎没有，而在某些场合则是根本没有设法建立能保证我军部队在森林中行动并充分发挥自己强大优势——炮兵，而在有些地方也包括坦克——的阵地。大本营关于在通向后方的道路上要修筑地堡并派驻守备部队的命令，并非在所有部队都得到执行。各级指挥机关这种罪恶的消极态度，使敌人得以派出小股破坏组大量开展积极行动，而这又在指挥人员和士兵中造成了对敌人作战能力过于夸大的印象，从而使我军部队缺乏信心和感到沮丧。

属于这一类的有好几个步兵师——在第 9 集团军是第 163、第 44 和第 54 师；在第 15 集团军是第 18 和第 168 师。

这种糟糕透顶、一窍不通而又畏缩怯懦的指挥机关造成的后果是，上述几个师在不同程度上面临被敌人合围的威胁。而其中两个师——第 44 和第 18 师，果然遭到敌人的合围和封锁，而由于这两个师指挥机关的胆怯和背叛行为，他们在人员和物资方面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就一系列有关作战指挥的一般性具体问题曾发布过大量的训令和命令，但上述两个集团军的作战行动缓慢无力，在个别场合甚至是十分低劣的。

自坎达拉克沙方向发起作战行动的步兵第122师和配属给它的步兵第104师的山地步兵第237团值得受到表彰。这个师经过战斗向芬兰内地推进了140公里，几乎一直进抵克米雅尔维湖。后来根据大本营的号令该师略向后撤，尽管远离其他部队而且常常面临敌人切断其交通线和袭击其后方的威胁，该师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上述企图，不让敌人有机会采用他所惯用的在道路上分割和封锁我军部队的千篇一律的战法。这个师和山地步兵第273团作战表现优异。

在佩萨莫地区及其以南一带作战的最北面的我军集群也卓越地实施了所有的战役，并在所有交战行动中不断打击敌人。由于兵力不够强大，这个集团军（第14集团军）遵照大本营的命令停止向南推进，并牢固地扼守住自己所占领的各个据点直到战争结束。

边 防 军

从战争一开始，边防军就根据大本营的命令组建成各个营，承担起对作战部队后方及交通线实施防卫的任务。但是，随着前线形势的变化，部分的营也投入了前线作战，而且边防军通常都能卓越地进行作战行动。总的来说，我边防军在这场战争中也表现为一支组织性强、纪律严明的有战斗力的部队，能在任何条件下同优秀的野战部队一起同敌人作战。

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以自己全部的水面舰艇和水上舰艇以及航空兵非常积极地参加了作战行动，并且尽可能支援陆军。此外，北方舰队还保证了在十分困难的风暴天气从海上将陆军部队和

作战物资运往佩萨莫地区。

前线的卫生勤务

我们的军事卫生部队和帮助他们卫生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卓越地进行了大量工作。伤病员中的死亡率平均为5~6%，而在世界大战期间沙俄军队和外国军队中伤员的死亡率为11%。传染病发病的情况是个别的。医生、护士和卫生员常常冒着炮火进行手术，也常常冒着炮火向伤员输血。卫生人民委员部的医院和工作人员也为战士和指挥员迅速康复付出了大量劳动。

但是，在伤病员医疗护理的组织、后送和供应等方面也发现了不少各种各样的不足之处。

民用航空和北方海运管理总局的飞行员

民航总局和北方海运总局的飞行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民航管理总局和北方海运管理总局的110架飞机，在优秀飞行员的驾驭下，不论天气如何，白天，常常也在夜间，在作战前线 and 后方之间往返飞行，完成着各种各样但同样都很重要的任务。许多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一起很好地完成了重大的战斗任务。

下面谈几点结论

一、同芬兰的战争对于我军是一场严重的考验。红军经受住了这一场考验，成为战争的胜利者。在严冬酷寒的条件下，我们军队击溃了芬兰军队，并摧毁了被称作为“曼纳林防线”的现代化的、

确实十分坚固的要塞。红军光荣地以行动证实了斯大林的话：“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破的要塞”。红军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从战争爆发时起至战争胜利结束，斯大林同志一直积极参与了对战争的领导^①。按照斯大林同志的倡议而建立的总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不仅夜以继日地具体指挥着作战的各个集团军，而且同时为保证我军的胜利和整个国家的安全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这场战争对于芬兰这样的小国来说已不能算是小战争了。不过我们在这场战争中不仅同芬兰人作战，而且还在同那些把芬兰构筑成向列宁格勒，向苏联挺进的跳板的那些人作战。一系列国家——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美国等等——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公开在物质上支持芬兰。芬兰军队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弱小。芬兰人动员了约60万人的军队，其力量又由于实施防御作战和利用自然条件而大大增加。

战争结束后西北方面军指挥部对卡累利阿地峡战争的特点曾作了如下的描述：

“……西北方面军的部队在军事史上第一次在极其短暂的时间一个月內，粉碎并摧毁了第一流的常备防御体系，这个防御体系是按最新工程技术成果修筑的，由四条基本防御地带和大量斜切阵地组成，并在整个筑垒地段布满了障碍物。这个本来就极端困难的任務，是在地形复杂、天寒地冻、大雪覆盖的空前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方面军的部队几乎和芬兰军队的所有主力部队都交过手，因为敌人利用其他战线的沉寂，把它们全都调到了卡累利阿地峡。

根据初步统计，方面军的部队共夺取和摧毁防御工事1000多个，其中280个钢筋混凝土工事；俘获各种火炮120门，击毁常备

^① 这里原稿的文字是：“实际上领导这场战争的斯大林同志”。

发射点中的侧防暗堡火炮 150 门以上，夺得坦克 19 辆，以及大量冲锋枪、步枪、弹药和各种装具。”

红军之所以能在三个月时间内摧毁坚固的设防地区和击溃芬兰军队，是因为我们党、共青团、政府机构、经济管理部门和社会团体都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切实认真地投入了战争，投入了战争的事业，毫无保留地，以真正苏维埃爱国者的热情帮助了自己的军队。

二、同芬兰的战争，也是对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一次考验。尽管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作中的缺点在战争过程中基本得到了纠正，但错误和失误毕竟过多。必须更新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以新的力量加以充实^①。

三、列宁格勒党组织做了极其大量的，可以说简直是无比巨大的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列宁格勒的工人成了离作战前线最近，又是成果最为卓著的后方。所有大小工厂、铁路的工人决心尽一切可能，甚至准备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来帮助前线的士兵，减轻他们的作战困难，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基洛夫工厂和伊若尔工厂的工人、工程师、技术员和领导完成了特别大量和极其有益的工作。

所有这一切巨大和有益的工作是由日丹诺夫同志领导的。

四、军队得到了卡累利阿和摩尔曼斯克的党、苏维埃、共青团及社会组织大量的、经常性的帮助。

五、我军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这一胜利，是因为在战争初期发现的在战争准备方面和军事主管部门工作中的缺点，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和在他的领导下，即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基本上得到克服，从而及时地削弱，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克服了这些缺点对战争进程的有害影响。芬兰军队指挥部曾经断言，芬兰人不必有外援就可

^① 整个这一节是斯大林补充的。

以坚持至少六个月。但是，战争结局表明，芬兰人在有外援的情况下最多只坚持了三个月。^①

实际的结论和建议

一、这次战争的经验又一次证实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在基于军人薄弱基础上动员扩编的军队相比，常备部队更为强大和更有战斗力。

因此，在和平时期必须保留一支拥有足够数量的常备正规部队，以便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保证和掩护战时军队的迅速动员，以及抵挡敌人的第一次攻击。

二、训练有素、熟悉业务而且深受众望的指挥人员是和平时期进行过硬的战斗训练和在未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基础和保证。因此，积聚和培养军事干部的问题现今应当变得更加迫切，特别是必须制定保障干部稳定性的措施，必须禁止在并无极端必要的情况下将领导干部从一个部队向另一个部队频繁调动。干部频繁流动是军队涣散无力的根源。

事实证明，在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领导干部长期在位任职的部队更加稳定，战斗力更强，表现更好，因为这样的领导干部了解自己的部队和人员，因而也更加熟悉自己的本职工作。

三、战争中涌现出许多（包括来自基层的）优秀指挥员、政工人员和各种军事组织人员。应当立即把所有这些工作人员记录在案，给他们创造提高专业水平的相应条件，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成长。应当持续关注对从初级指挥人员中提拔的指挥员进行补充培训和再培训，经常从各方面给以帮助。

^① 本节加着重线的部分都是斯大林补充的。

四、应当作为制度规定：各个军区，在全年的任何季节，不论天气如何，都应把部队和司令部的战斗训练主要放在野外条件下进行。同时，要给部队安排一种复杂的条件，使之接近于部队将来在作战前线可能遇到的条件。必须密切关注部队在困难的气象和地形条件下进行训练的问题。据此，国防人民委员部应当根据此种要求修改各军区部队的供应标准。

五、我们的步兵师臃肿笨拙，特别是勤务部队和后方机关更是不堪重负。应当对步兵师的后方机关进行变革，最大限度地加以缩减。

六、在今年夏天对驻扎在远东、中亚、外高加索和喀尔巴阡山一带的步兵、山地步兵及其他的师和集团军的组织编制进行一次检查，特别是武器装备和后方。检查的着眼点是这些师机动作战的快速性和战斗能力。

七、确认必须加强红军的工程兵，必须采取措施改善工程兵各种现代机械化器材的配备。

八、根据对芬兰战争的经验，总参谋部、工程兵部和迫击炮—地雷部要专门研究有关在防御中布设障碍物和使用地雷方面的所有问题，并且要把这方面的经验在发给军队的条令和守则中固定下来。

九、为了减轻战士在行军中的过多负担，必须重新考虑战士的装备，明确规定什么由战士自己携带，什么由连队的马车载运。

十、确认在和平时期即应训练军队全体人员适应军队在战时将会遇到的条件。为此规定，通常至少五天一次向战士发放面包干和浓缩食品作为每日口粮，全体人员在任何条件下均应按行军方式加以食用。

十一、责成各兵种和各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人员在两个月之内总结军队各方面战斗工作的经验，以便对我军条令和守则提出相应的

修改、订正和补充的意见。为此，应毫不迟延地着手研究所有正式的总结、报告、记录和汇报，而且还必须使用指挥员手头的全部材料，如札记、日记等。

为了进行此项工作，总参谋长应会同各兵种首长立即指定专门的工作委员会，向它们做出相应的原则指示。

此项工作在两个月之内完成。

十二、指派一个专门的政府委员会，除军人外还应吸收国内的优秀专家参加，尽快对卡累利阿地峡筑垒防线（“曼纳林防线”）进行全面研究。

国防人民委员部在一个月内向国防委员会提出在国防建设中利用芬兰经验的建议。

十三、关于我们的军事侦察工作的问题是一个单独的问题。

军事侦察机关是这样一种机构，它为总参谋部服务并为其提供关于我们邻国和可能敌人的情报，关于它们的军队、装备、计划的情报，而在战时能起到我们军队的耳目的作用。然而，我们还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这样一种军事侦察机关。

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在尽可能短时间内建立起与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相称的军事侦察机关。

中央委员会必须为此调派一批有相当专业水平的工作人员。

十四、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卫生人民委员部必须根据战争经验紧急拟定就卫生勤务采取相应措施的计划及自己的建议，提交人民委员会。

十五、在这场战争中，军队并未感到各种弹药有所不足，其他许多重要物品也不缺乏，特别是前线获得了燃料的充分供应。但是战争对这一切的消耗数量十分巨大。因此必须责成国防委员会对此进行紧急研究，以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扩大上述以及一大批其他重要国防物资的动员性储备。

十六、关于铁路运输。这一场战争再次证实一个不容争辩的真理，即铁路运输在现代战争中起着极端重大的作用。各个战役乃至整个战争的最终胜利，都取决于能以多快的速度把军队和弹药补给运往前线。铁路运输应当准备好充分地为国防服务，同时又要满足国家所有基本的和重大的需求。

因此，必须对铁路运输问题予以最密切的关注。我指的是既包括在需要的地方修筑新线，也包括铺设复线，还包括修建铁路枢纽和车站、会让线，以及机车和车厢生产，物资和燃料储备等等，即功能完善的全部配套工作。关于干部我不讲了，这是自然而然的。

必须委托人民委员会研究此事，并采取一切措施根据这次战争的经验改善我们的铁路运输。

十七、关于公路和土路建设。一般战争，特别是现代战争，要消耗大量各种各样材料和货物。战争中有成千上万辆运输汽车和数量更多的马车在公路和土路上奔忙。在这些道路上移动的还有炮兵、坦克、各种辅助车辆等等。如果在靠近前线的地带和前线道路不足，就不得不紧急地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修建。因此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全力开展公路和土路的建设。应当通过专门的法令责成集体农庄的广大农民投身道路建设，而迄今为止并未把他们吸引到这一项十分重要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事业中来。

委托人民委员会研究这一问题，并就此做出必要的决定。

同志们！对芬兰的战争既暴露了军队准备工作中的一系列重大缺点，也显示出军事主管部门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但与此同时它也证明我国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证明党、政府和斯大林同志的领导是不可超越的，而这正是我们将来不断取得胜利的保证^①。

^① 在呈送斯大林的原稿中没有最后这段话。

【专题说明】

苏南冲突的起源及其公开化

(1944年4月至1948年7月)

1948年爆发的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在刚刚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起了巨大震动。随着南斯拉夫共产党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叛徒开除出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便出现了继苏联30年代大清洗之后以清除“铁托分子”为名的第二次大清洗运动，而这次清洗已经远远超出了苏联的国界，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被撤职，被逮捕、被枪毙。苏南冲突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第一次意识形态大论战，也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社会主义同盟的第一次大分裂，其结果对以后几十年苏联、东欧乃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尽管后来苏联发生了非斯大林化运动，苏南关系也开始有所缓和，但直到1988年苏南领导人高级会晤之前，苏联官方都没有对这场冲突的起源和性质做出重新评价。对这一历史事件的重新认识，当然需要依靠历史文献，而苏南双方当时公布的声明、照会和往来信件，以及当事人回忆录中引用的文献，囿于各自的立场和条件，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这里刊登的主要是1990—1994年在俄国专业杂志和文集上发表的关于苏南冲突的俄国档案文献，为了对比和保持连贯性，也选登

了几件南斯拉夫以前公布的文献（这里除南斯拉夫自己保存的档案外，还有50年代苏联归还南斯拉夫的档案）。这50多份档案文献包括从苏南两党领导人的战时接触直至南共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期间苏南两党和两国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之间的往来电函和会谈记录，比较清楚地勾勒出一时期苏南关系的发展脉络。当然，对于全面深入地研究这段历史来说，这还是不够的。譬如，关于1944年9月和1945年4月铁托与斯大林会谈的文件，关于1948年初苏南两国以及苏南保三国领导人会谈的文件，关于冲突期间苏南双方各自内部讨论的文件等等，都还没有公布于世，或尚未收集到。不过，通过这里刊登的文献，已经可以为重新认识苏南冲突的历史真相、重新评价苏南冲突的真正原因和性质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参加翻译的
有张木生、陈新华、岳书曦、吕允连、
高增训、孙士明、方琼、沈志华等）

No 07817

莫洛托夫与吉拉斯关于南斯拉夫形势和政策的谈话记录^①

(1944年4月24日)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的日记

绝密

双方相互问候后，莫洛托夫^②说，现在南斯拉夫的形势对人民解放军来说大概是困难的。

吉拉斯^③承认形势是困难的，又说，不过形势毕竟有好转。主要是政治形势有好转。

吉拉斯接着说，铁托元帅指示他们在莫斯科会见莫洛托夫，并就盟国和苏联承认南斯拉夫解放委员会^④问题得到说明。为此会

① 1944年4月，以米洛凡·吉拉斯为首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次会谈于4月24日17时开始。

②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1890—1986），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③ 吉拉斯，米洛凡（1911—），当时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成员，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战后任南共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1953年任联邦共和国副总统、人民议会主席。1954年被撤销一切职务。

④ 1942年11月26—27日在比哈齐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宣告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并作为领导南斯拉夫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全国性政治代表机构，在1945年8月7—10日的第二次会议上，被宣布成为民主联邦南斯拉夫临时国民议会。1943年11月29—30日，在亚伊策召开的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成立并选举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作为具有人民政府职能的执行机构，直到1945年3月7日临时政府成立。

采取哪些步骤？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应当根据自己与盟国的关系解决这一问题。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还继续与在开罗的南斯拉夫政府保持关系，但是，这是纯粹形式上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正在进行与在开罗的政府^①断绝关系的有关准备工作。譬如，我们让西米奇在苏联报刊上发表他的信^②，我们与在伦敦的比查尼奇^③保持着关系，苏联报刊经常解释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关于各种问题的立场。由此可见，正在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莫洛托夫说，前不久丘吉尔曾经致函莫洛托夫，并附上了他致铁托元帅的两封信的副件。丘吉尔在信中请求支持他对南斯拉夫的立场，以便找到国王与铁托和解的途径。苏联政府答复丘吉尔说，与国王的谈判未必有益。我们认为，必须与铁托达成协议，这对盟国有益。

苏联政府在承认铁托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取决于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场，不过，不考虑这些国家的立场是不对的。大概吉拉斯和特尔季奇^④知道，英国人不止一次建议苏联政府和米哈伊洛维奇^⑤建立联系，但是，苏联政府拒绝了这一建议。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向南斯拉夫派遣了使团^⑥，援助人民解放军，诚然，在

① 指当时驻开罗的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

② 塔诺耶·西米奇是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政治人物，曾任南斯拉夫流亡政府驻莫斯科大使，1943年11月宣布与流亡政府决裂，拥护铁托。但他的声明是1944年3月才刊登在莫斯科报纸上的。战后初期，西米奇曾出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

③ 身份不详。

④ 随同吉拉斯访苏的代表团负责人之一。

⑤ 米哈伊洛维奇，德拉扎（1893～1946），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大臣、军队参谋长，1941年投靠德国占领当局，与南共领导的武装力量作战。1946年被判处死刑。

⑥ 苏联军事使团于1944年2月23日抵达南斯拉夫，与西方国家的使团不同，苏联军事使团不是派驻最高司令部，而是派驻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的。

使用空军援助方面还不够。

目前还没法说什么时间和采取什么步骤承认铁托。

吉拉斯说他完全明白莫洛托夫的答复,认为这一答复是正确的。

吉拉斯称,委员会不能与国王和解,因为和解就意味着人民解放运动受制于国王。

莫洛托夫问,国王在南斯拉夫还有没有威望。

吉拉斯回答说,国王在塞尔维亚多少还有些威望。对克罗地亚来说,国王是中央集权的象征。在塞尔维亚境外的塞尔维亚人对国王态度不好。不知道与其顿人的态度如何。总之,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认为,高喊共和国的口号还为时尚早。

莫洛托夫问,人民解放运动在塞尔维亚的根基是否牢固。

吉拉斯回答说,人民解放运动在那里的影响很大,但是从组织上巩固得不够。米哈伊洛维奇在那里的影响很小。

莫洛托夫问吉拉斯是否低估了米哈伊洛维奇在塞尔维亚的影响。

吉拉斯承认说有可能低估了,他说,奈迪奇^①的军队是由米哈伊洛维奇的军官指挥的。奈迪奇内务部的多数警官是米哈伊洛维奇的拥护者。米哈伊洛维奇有一个名单,上名单的人在把德国人赶出南斯拉夫后要杀头。这个名单上有利奥蒂奇^②等人,但是名单上没有奈迪奇。米哈伊洛维奇在宣传中自称拥戴英国人。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③有1.5万人,但是不能打仗。他们首先是士

① 奈迪奇,米兰(1878~1945),战前曾任南斯拉夫陆海军大臣、总参谋长,德国占领时期率军投降,出任塞尔维亚吉斯林政府的首脑。

② 身份不详。

③ 原意是“参加队伍的人”,最初是南斯拉夫反对土耳其奴役的民间武装人员,后为王室所利用。二战期间站在德国占领当局一边,成为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反共民团武装组织。

气低落。至于说巴维利奇的乌斯塔什分子^①，他们一直很能打仗，是“大克罗地亚”思想的狂热斗士。他们大都已被人民解放军消灭。他们起初有7万人，现在大约还剩2.5万人。

莫洛托夫问，德国人是不是正在从南斯拉夫撤军。

吉拉斯回答说，德国人从南斯拉夫撤出了两三个师，但同时又从意大利开来一个师。因此，在这方面没有很大的变化。

莫洛托夫问，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哪些地方。

吉拉斯和特尔季奇在地图上给莫洛托夫指出了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地区。

莫洛托夫问，铁托的部队有没有出海的路。

吉拉斯回答说，现在没有出海的路，不过以前有过。如果巴尔干各国有像红军那样的军队，这种出海的路早就会有有了。

莫洛托夫问，萨洛尼卡的居民属于哪个民族。

吉拉斯回答说，萨洛尼卡的居民大都是希腊人，但萨洛尼卡周围农村住的是马其顿人。

吉拉斯说，铁托运动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巩固它在塞尔维亚的阵地，因为这对争取国际承认来说意义重大。

莫洛托夫同意这一看法，他说，人民解放运动的敌人大概认为，塞尔维亚的局势将对承认一事造成困难。

吉拉斯说，铁托没有向各大国发正式照会，要求给予承认，因为他认为目前这样做不适宜。

莫洛托夫说，当然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他又问吉拉斯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运动。战前在意大利组织的以克罗地亚脱离南斯拉夫为宗旨的乌斯塔什运动成员，于1941年4月回到南斯拉夫，建立了单独的克罗地亚国家，配合德国法西斯镇压南斯拉夫人民的抵抗运动。

吉拉斯称，他们很想尽快得到承认，特别是得到苏联方面的承认。苏联在南斯拉夫的影响很大，倘若苏联给予承认，它的影响还会扩大。

莫洛托夫说，我们已经为这一步采取了准备措施。

吉拉斯称，要丘吉尔承认难，不过，他不承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也难。

莫洛托夫说，关于承认一事我们正在研究。在这一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不过，正式的行动只能在适宜的时机才能采取。不仅要考虑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形势，还要考虑我们两国以外的形势，在我们两国以外，我们的敌人和半敌人要比朋友多。因此，必须选择既对苏联最有利，也对南斯拉夫本国人民最有利的时机给予承认。至于说支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我们保证给予支援。这种援助从技术上至今组织得不力。很长时间我们不能给予大力援助，不过，现在我们战场上的形势有了改善，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援助。

目前，对德战场上的形势是盟国将更加活跃，对我们来说，在这一时期和盟国保持良好关系至关重要。

莫洛托夫说，关于意大利，我们的立场是支持那里进行联合的一切努力。联合一切力量打击希特勒是主要任务。在莫斯科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强调了苏联旨在意大利争取建立民主政府和反对法西斯残余的意向。但是，盟国现在不急于落实莫斯科会议的决定^①。前不久，意大利政府进行了改组，它将会有助于团结广大群众反对希特勒德国。意大利人民的主要意向就是要和平，要想得到和平，必须打倒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我们准备与任何人结盟，只要他准备打败德国。

^① 1943年10月19—30日，苏英美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加速打败德国及战后欧洲安排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意大利的宣言》等文件。

莫洛托夫接着说，对于铁托来说，巩固自己在塞尔维亚的地位至关重要。

吉拉斯回答说，人民解放运动领导人没有轻视自己在塞尔维亚的地位，如果不能保证在塞尔维亚的影响，那将一事无成。目前，在塞尔维亚的游击队不多。组织游击队需要武器援助。

莫洛托夫说，大概盟国给了一些援助。

吉拉斯说，这些援助不够。他们计算过，英国人给予人民解放军的武器只够装备一个营。吉拉斯指出，英国人向南斯拉夫运送武器没有任何困难，因为他们在意大利有大量武器。

吉拉斯又说，英国人对空投武器组织不力。空投的弹药没有包装，都散落了。向没有铁路的山区空投了硝化甘油炸药，而在有铁路而且需要炸药地方，英国人却不向那里空投。英国人用降落伞空投无线电台，可是降落伞打不开，无线电台都摔坏了。这是意外还是组织不力？难以说清。

吉拉斯说，如果苏联飞行员能帮助人民解放军那就好了。

莫洛托夫回答说，我们已向盟国提出在巴里^①和布林迪西^②地区为苏联飞机安排基地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有得到答复。

莫洛托夫问人民军和英国人的关系怎么样。

吉拉斯回答说，从表面看关系还好。

莫洛托夫推测说，英国人正在南斯拉夫建立自己的情报网。

吉拉斯回答：英国人在这方面将一事无成。

莫洛托夫提醒吉拉斯说，英国人能够在南斯拉夫找到他们需要的关系。他们是些狡猾的人，腐蚀了我们许多人。

例如前不久，在美国的苏联采购团的一个工作人员发表了仇视

① 意大利东部的港口城市。

② 意大利东南部的城市。

苏联的声明。我们使馆已经声明，他是个不想归队的红军逃兵。原来是有人收买了他，做了他的工作。莫洛托夫指出，他不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的。

莫洛托夫询问科尔涅耶夫将军^①在南斯拉夫表现怎么样，而且要求坦率地讲，南斯拉夫人是否对科尔涅耶夫不满意。

吉拉斯回答说，科尔涅耶夫是个聪明正直的人。南斯拉夫对他满意的。总的来说，使团的人都很好。

莫洛托夫询问戈尔什科夫^②在那里干得怎么样。

吉拉斯回答说，戈尔什科夫很好，那里对他满意的。

吉拉斯又说，现在盼着苏联军官去希腊和阿尔巴尼亚。

莫洛托夫回答说，我们正在物色我们这方面的人。

吉拉斯说，希腊问题是个非同寻常的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前不久，丘吉尔给我们发来一封语气恼怒的信，他在信中抱怨塔斯社发表了在埃及的希腊武装力量发生哗变的报道。我们答复说，塔斯社播发的是它掌握的消息。我们允诺，塔斯社将对自己的新闻报道进行更加认真的检查。丘吉尔请求我们支持他在希腊问题上的立场，但是我们回避了这个问题。

吉拉斯说，希腊的形势与南斯拉夫的形势有本质的区别。

莫洛托夫问这种区别是什么，吉拉斯回答说，英国人在希腊阻挠人民力量联合。

莫洛托夫问，铁托和希腊有没有联系。

吉拉斯回答，只有无线电联系。

莫洛托夫问，希腊有没有铁托的人。

吉拉斯回答，那里暂时没有铁托的人，不过会有的。

① H. B. 科尔涅耶夫中将是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团长。

② 戈尔什科夫也是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成员。

莫洛托夫问，全国解放委员会与保加利亚人的关系怎么样。

吉拉斯回答，保加利亚问题是个棘手的问题。吉拉斯说保加利亚人犯了错误。他说他指的是进步人士，而不是保加利亚政府。保加利亚人没有作武装斗争的准备，没有把自己的干部派到农村和山区，而是把他们留在城市，结果很大一部分干部在城市牺牲了。

莫洛托夫问，斯大林和铁托关于保加利亚问题的电报有没有通报吉拉斯和特尔季奇。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莫洛托夫说，我们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名义，对铁托关于保加利亚问题的电报作了答复，复电指出，南斯拉夫是苏联的盟友，而保加利亚是苏联敌人的朋友。关于马其顿问题，这份电报说，没有铁托，这个问题是不会解决的。

莫洛托夫接着讲道，一周前，他向保加利亚公使斯塔梅诺夫递交了照会，要求保加利亚政府停止帮助德国人，停止在保加利亚为他们提供反苏基地。

莫洛托夫同时指出，共产党人不能代保加利亚政府受过。

吉拉斯说，如果马其顿人民开展反对德国人的斗争，这样就能解决马其顿问题。马其顿人就会明白，他们应当跟谁一块儿走，是跟反对德国人的塞尔维亚民族和克罗地亚民族一块儿走，还是跟其他民族一块儿走。

莫洛托夫问两位代表有什么实际问题要提出来。

吉拉斯回答说，最为迫切的是武器问题。他答应提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所需武器的清单。

吉拉斯接着说，他们想拜见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答应征求斯大林同志的意见。

莫洛托夫问两位代表是否见过西米奇。

吉拉斯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说，西米奇有些过分浓厚的塞尔维亚情绪。另外，西米奇在与南斯拉夫军事使团谈话时，主张在南斯

拉夫建立苏维埃政权。

莫洛托夫说，他刚才讲的给铁托的那封电报指出，我们反对南斯拉夫苏维埃化。

吉拉斯说他也是这么想的，他认为南斯拉夫应当是民主共和国，但不是法国那样的共和国，而是蒙古那样的共和国。必须没收背叛了人民的那些人的工厂。

莫洛托夫说，贝奈斯^①也赞成把大型工厂移交给国家。贝奈斯表现不错。譬如，今天《真理报》转载的他的那篇文章有一定价值。

吉拉斯指出这篇文章有自由派思想。

莫洛托夫说，我们和贝奈斯签署条约时，我们没有对波兰加入条约关上大门。当时贝奈斯说，和波兰反动人士打交道会一事无成，必须砍掉这些人的脑袋。

吉拉斯讲，南斯拉夫国内建立苏维埃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建立苏维埃在目前来说是冒险。

南斯拉夫作为一个自主的国家也许得存在2-3年，甚至5年。不过应当考虑到，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无比热爱，人民愿意和苏联一起生活。

莫洛托夫问吉拉斯和特尔季奇对梅西奇有什么看法。

特尔季奇回答说，必须在战斗中观察他。他也许是个好指挥员，但是政治上不成熟。特尔季奇说，在苏联的南斯拉夫部队最好设政治委员职位，这样能加强部队的政治纪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委员都是共产党员。

莫洛托夫回答，在苏联的南斯拉夫部队的组织形式应当和人民解放军一致。

^① 爱德华·贝奈斯（1884~1948），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其时流亡国外。

会谈结束时，吉拉斯和特尔季奇请求莫洛托夫同志促成他们拜会斯大林同志。

会谈进行了 1 小时 25 分。

(波采罗布记录)

№07818

斯大林与赫布朗关于南斯拉夫军队和 外交问题的会谈记录

(1945年1月9日)

绝密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维·米·莫洛托夫、А. Ф. 基谢廖夫和B. M. 萨哈罗夫。

南斯拉夫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南斯拉夫军队最高司令部参谋长阿·约万诺维奇。

代表团成员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问候后，斯大林同志问代表团是否一路顺利，赫布朗^①用俄语回答：“非常顺利”。赫布朗口头转达了铁托元帅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问代表团带来了什么问题。

赫布朗回答，有三类问题：一、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援助问题，二、南斯拉夫的外交要求，三、南斯拉夫军队的装备和组织问题。

赫布朗在谈到需要苏联经济援助时说，首先需要粮食援助，不过，除粮食外，南斯拉夫还想从苏联得到南斯拉夫一些工厂必需的原料，军用和民用服装及靴子、卫生物资、大学和中小学用的设备、宣传物资（新闻纸、书籍、油墨，等等）。

^① 赫布朗，安德利亚（1899～1951），1919年加入南共，战后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经济委员会和计划委员会主席，兼工业部长。赫布朗是当时访问苏联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代表团团长。1946年6月被贬职，1948年因赞成苏联立场被逮捕，1951年6月在狱中自杀。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是否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得到过什么援助，赫布朗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补充说，根据租借法案从盟国得到过某些援助。斯大林同志指出，也要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获得援助；接着又问，南斯拉夫是否打算作为战争赔款从匈牙利得到什么赔偿。

赫布朗回答说，匈牙利人给南斯拉夫造成了大约 9 亿美元的严重物质损失，因此，南斯拉夫要求赔偿损失。

斯大林同志又问，南斯拉夫是否打算作为战争赔款从德国得到什么赔偿。

赫布朗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他们还打算参加对德国某些地区的占领。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正就匈牙利媾和的条件与美国人和英国人进行谈判。看来，匈牙利的战争赔款额将为 3 亿美元，即与罗马尼亚和芬兰的赔款额一样多。美国人和英国人反对大量战争赔款，因为他们认为，大量战争赔款会削弱匈牙利，匈牙利的购买力会减弱。

赫布朗说，战争赔款额太小，并说他明白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什么反对增加赔款额，因为他们害怕匈牙利太弱。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的煤炭生产如何。

赫布朗回答，过去南斯拉夫开采煤炭，但产量很低，现在的煤炭产量更低，储量减少了。南斯拉夫领导人打算从匈牙利获得煤炭，并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在谈到对南斯拉夫的全面经济援助时说，现在，在战争时期，苏联不可能给予南斯拉夫大量的经济援助；将来可能会给予援助，但是，现在战争正在进行，不可能给予大量援助。

斯大林同志接着问，南斯拉夫是否收到了粮食，赫布朗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但是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北部提供的粮食

也算在了俄罗斯提供的粮食账上。照赫布朗的说法，这不是俄罗斯的粮食。

斯大林同志解释说，部分粮食可以算是红军缴获的战利品，这完全合乎情理。斯大林同志接着补充说，南斯拉夫人对战利品问题总是有一种不正确的理解。南斯拉夫领导人，包括铁托，认为红军应当把在南斯拉夫缴获的一切留给南斯拉夫人，这是不对的。战利品属于缴获它的那支军队所有。如果军队知道缴获的东西必须送人，它就不会努力夺取战利品。军队不仅想在战斗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方面立功，而且想在夺取敌人的物资，即战利品方面立功。要求红军交出所有的战利品是不对的。

赫布朗说，把在南斯拉夫缴获的粮食运往匈牙利，这给居民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许多南斯拉夫人对此不能正确地理解。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粮食是运给红军的，与红军驻扎在哪里根本没有关系；粮食运往匈牙利是给红军的，它没有稳定的粮食供应就不能作战。军队浴血奋战，却认为他们偷了东西，这是对红军的侮辱。斯大林同志提到了吉拉斯的言论，他曾经说，苏联军官的精神和政治面貌比英国军官的精神和政治面貌差^①。斯大林同志强调指出，这是完全不正确的，这是侮辱。不能根据个别情况概括一支军队，不能因一个丑恶的人就侮辱整个红军。必须理解一个战士的心，他奋战三千公里，从斯大林格勒打到布达佩斯，战士认为自己是英雄，他干什么都行，今天活着，明天可能被打死，人们会原谅

^① 1944年秋苏联红军进入南斯拉夫并解放贝尔格莱德以后，在红军战士中发生了多起强奸、杀人、抢劫等危害南斯拉夫公民的事件。为此，1944年10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与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耶夫举行了一次会谈。会谈中，吉拉斯说：“我们的困难还在于我们的敌人利用这点攻击我们，他们把红军和英国军队加以比较，认为英国军队没有那类违法乱纪的行为。”（据吉拉斯所著《同斯大林的谈话》）科尔涅耶夫当即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认为吉拉斯把红军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相比，是对红军的侮辱。

他的一切。在长期艰苦的战争中，战士们累了，已经精疲力尽。持“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观点是不正确的。英国军官在希腊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会有个别情况给我们战士脸上抹黑，我们为此也枪毙了人。不过必须记住，他们精疲力尽了，精神已经紧张到极点；他们认为自己是英雄，什么事都允许干，什么事都可以干。斯大林同志讲了最近的一件事，有个飞行员，一个很好的飞行员，在一个地方聚众畅饮，在那里打死了一个人。他被关进监狱，应当枪毙。调查了很长时间。原来他完全喝醉了，记不得自己干了什么事。斯大林同志说他保释了这名飞行员，因为这是个很好的飞行员。现在已经将他释放，派到了前线。必须记住，战士随时都有危险，特别是飞行员，不仅在战斗中有危险，而且只要在天上随时都有危险。德国人不那么容易打，然后还要追击他们。由于精疲力尽，人们失去了平衡，不能用通常的尺度去衡量他们。

接着，斯大林同志对给予南斯拉夫物质援助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归纳，他说，会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会进行援助。

赫布朗把话题转到军事问题上，他说，在军事方面，南斯拉夫期望得到苏联的两种援助：军事装备和人员（教官和顾问），期望帮助南斯拉夫建立一支按现代化标准组织的军队。

约万诺维奇在对赫布朗的讲话作补充时强调，南斯拉夫已经有这样一支军队的骨干和基础。必须组建军队的中央领导机构，即总参谋部、集团军司令部、军司令部和和其他较大的司令部。

斯大林同志问，现在南斯拉夫军队有多少个师。

约万诺维奇回答：现有 50 个师，51.8 万人。随着南斯拉夫全境的解放，将再动员 30 万人。50 个师中有小规模游击队师，应当进行改编。这样一来，师的总数将减少到 40 个。打算将来组建 3 个集团军，另外组建 12 个军。每个集团军 5 个师，每个军 3 个师。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的一个师现在有多少门火炮，基谢廖夫将军回答说，现在一个师有72门火炮，其中包括迫击炮，南斯拉夫人想把1.25万人的师的火炮数量增加到84门。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么多大型师不现实，建如此多的师，军官不够。斯大林同志举了波兰的例子，波兰曾经动员了20个师的兵力，但是军官不够，于是不得不把师的数量压缩到10个，其中5个师现在前线，另5个师最近也将调往前线。斯大林同志说，不过，这将是些优良师。师的编制为8000~9000人。如果南斯拉夫有20个师，但是优良师，这就很好了。问题不在数量。师可以很多，但是其价值却很小。必须培养军官，这一点至关重要。即使是20个师，这已经很多了，不应热衷于数量。斯大林同志又说，中国抗战持续了8年，但是那里学习抓得不紧。建了400个师，但是又不培养军官，因此，他们的军官不行。前不久，日本人从北进犯，8个日本师打败了43个中国师。考虑到南斯拉夫缺乏军官这一实际情况，斯大林同志谈了一个想法：应当用轻型火炮装备几个游击队师，把它们留在后方。师的编制应当少于1.3万人。斯大林同志说，对南斯拉夫来说，20个师就够了，这就很好了。以后每个师可以扩编成军，1个师就成了3个师。师多了供养很困难，它们打起仗来是不会顽强的。斯大林同志提醒他们注意这件事情的困难，并说，目标必须提出来，但是现在达不到，师不过是纸上的师。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军队怎么建设：是统一指挥，还是塞尔维亚军队、克罗地亚军队和其他军队分立。

约万诺维奇回答，将统一指挥。

斯大林同志问，语言怎么办，通用哪种语言。

约万诺维奇回答，将通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只在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使用，因为这两种语言与塞

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不同。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会帮助组建司令部：我们给人，给我们的条令，但是南斯拉夫必须有自己的军官，有好的连长、营长。南斯拉夫过去有这样的军官，因为南斯拉夫当年有一支很好的军队，南斯拉夫人主要是拜过法国人为师。

约万诺维奇说，现在南斯拉夫士兵的战斗力也很强。基谢廖夫补充说这个军队毕竟还不顽强，并且举了一个实例：南斯拉夫第21师在敌人不大的压力下就溃退了，而且损失了一部分火炮。斯大林同志插话说，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德国人有，我们也有。

斯大林同志询问南斯拉夫军队将来采取什么样的编制，基谢廖夫将军回答说，军队有两种编制方案。按第一种方案，每个师都是正规的整编师，按第二种方案，一部分师为非满员师。对这类师的司令部，已经详细研究过。

斯大林同志说也可以采用旅的编制，并以红军的经验为例说明，1942年红军的编成中有100~120个旅，每个旅的编制为4500~5000人。这些旅英勇善战，后来变成了师。这样的旅非常容易指挥，当指挥员有了经验，他们也能统率正规师。也许，南斯拉夫应当有7~10个1万人编制的师，其他师改编为旅，好让年轻的军官获得管理和指挥的经验。这种旅甚至可以叫做师。以后可以再把它们变成正规的现代化师，不过现在应当让军官成长。1942年红军就是这么做的，后来这些旅扩编成了师。斯大林同志说，游击队员必须训练，他们不适用于现代化的军队。当红军在游击区会合后，就把游击队撤到了后方，一部分游击队员留在部队或者送去学习，其他的都被遣散了。在后方他们是好样的，但是进行野战不行：他们不想进行野战，也不习惯军队的纪律。

约万诺维奇说，在南斯拉夫建40个师的干部是足够的，对此斯大林同志指出：须知必须指挥他们，指挥这些师。斯大林同志在

阐述这一想法时说，德国人是很会打仗的人，他们知道，没有军官就不可能有军队，因此，他们每到一个国家，就把所有的军官抓起来押往德国。他们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法国都搜捕军官。戴高乐在与斯大林同志谈话时就抱怨法国缺乏军官。

斯大林同志的话题回到南斯拉夫今年师的编制问题上，他谈了一个想法：也许应当建 7000~8000 人的师。斯大林同志接着说，对游击队员必须严格要求，严加约束使他们适应现代化的军队。对这一点他们往往不会心甘情愿，但是，为了现代化的军队，必须训练他们。

斯大林同志问，德国人是否正在从南斯拉夫撤离，约万诺维奇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强调指出，与此同时，德国人正在一些方向上构筑工事。斯大林同志说，德国人将会争夺萨格勒布，争夺卢布尔雅那，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据点能掩护驻意大利德军集团的侧翼。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哪些地区解放了。

约万诺维奇回答：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几乎全境以及伏伊伏丁那已经解放。德国人在利卡和克罗地亚滨海地区防御得特别顽强。

斯大林同志的话题又回到南斯拉夫军队的编制问题上，他指出，先和我们的人商量一下，必须解决以下问题：编什么样的师，编多少师。用不着编大型师。日本人一个师以前是 2 万人，但是现在他们正在把一个师的兵力压缩到 1.7 万人或者更少。斯大林同志说，一个师的正规编制为 1.2 万~1.3 万人。指挥干部问题是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培养指挥员必须花数年的时间。

斯大林同志问，过去预定向南斯拉夫提供的装备，南斯拉夫已经收到了多少。

基谢廖夫将军回答说，已经收到近 10 个师的装备。

斯大林同志命令查清已经收到什么装备。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还得解决建什么样的师的问题。斯大林同志接着说，所有的问题将和布尔加宁^①同志和安东诺夫^②将军讨论。

约万诺维奇请求向南斯拉夫军队派遣教官，并说，已经规定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和义务。他们将享有相应部队副指挥员的权力，可以向上一级报告自己的意见。还规定苏联教官着南斯拉夫军装。

斯大林同志说，教官穿南斯拉夫军装的话应当懂南斯拉夫的语言，否则，穿南斯拉夫军装没有意义。波兰的经验表明，苏联军官穿了波兰军装，但不会说波兰话，化装没起到作用。这就像戴了个面具一样。教官应当只是教官、顾问。他无权取消指挥员的决定，也不能将决定强加于指挥员。斯大林同志说，我们目前可以提供教官。斯大林同志又说，南斯拉夫人的一个弱点就是靠顾问，南斯拉夫人什么时候明白顾问会离开，他就知道必须学习了。

斯大林同志谈了由于新的轻便火炮的生产我们炮兵编成的一些变化，并问，一个南斯拉夫师应当有多少门不小于72毫米口径的火炮。

基谢廖夫将军回答说，这样的火炮应当有36门。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军队是否需要缴获的装备。

约万诺维奇作了肯定的回答，并补充说，还需要弹药，斯大林同志说：“当然”。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现在没有我们的部队。

基谢廖夫将军说，初步打算建几个兵种（炮兵、坦克部队、工程部队），它们也需要装备及其他物资。还要给南斯拉夫军队建3

① 布尔加宁，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95~1975），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和副国防人民委员。

② 安东诺夫，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1896~1962），时任苏军总参谋长，大将。

个包括供应机关、指挥机关和后方机关在内的军事机构。

约万诺维奇特别强调了急需运输工具，由于缺乏运输工具，整个军事机构和后方服务机构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原有的公路和运输工具都毁坏了；国内马匹很少。

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汽车运输问题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不仅要提供一定数量的汽车，而且主要是汽车运输需要大量汽油，这个问题难得多。不过，将为较重型火炮提供一定数量的汽车。所有的轻型火炮必须靠骡马拖运。

斯大林同志问，初步打算具体建什么样的坦克部队和工程部队。

约万诺维奇回答说，初步打算建4个坦克旅、9个工程兵营和2个高炮团。此外，预计在最近3年内培训好南斯拉夫的空军人员，并从苏联得到8~10个航空师的技术装备（约1000架飞机）。

斯大林同志问，关于正在向南斯拉夫移交的2个航空师的装备，干部培训进行得怎么样。

约万诺维奇回答说，由于缺少足够数量的教练机，训练有困难。

斯大林同志问，从总的方面说怎么为军队培养军官，有没有军事学院。

约万诺维奇说，有分别培训炮兵、机枪手和通讯人员的军官学校。炮兵干部的培训情况最好。南斯拉夫没有军事学院，不过初步打算建立联合军官学校，培训初级和中级军官，办高级指挥员进修班。

斯大林同志指出，除了为单个兵种，如机枪手、坦克兵和炮兵培养军官外，还必须培养诸兵种合成部队指挥员。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须发扬南斯拉夫训练和培养军事专业人才的传统。

斯大林同志问代表团还有什么军事方面的问题。

约万诺维奇说，主要问题都谈过了，只有一个请求：为军事测绘研究所提供设备，贝尔格莱德原有的设备被德国人运走了，还有一部分给了保加利亚人。

军事问题的讨论到此结束，斯大林同志请南斯拉夫方面阐述实质性的政治问题。

赫布朗首先阐述了南斯拉夫对匈牙利的要求。他说，匈牙利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州及其首府佩奇市蕴藏的煤，对南斯拉夫的经济至关重要。该州居民基本上是匈牙利人，但是也有一定数量的斯拉夫人。该州连同佩奇的几个矿场必须并入南斯拉夫。另外，南斯拉夫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还包括，将所谓的包姚三角地，即匈牙利的首府为包亚^①市的州并入南斯拉夫。该州是历史上巴兰尼亚省的一部分，有许多斯拉夫人。

斯大林同志插话：“匈牙利人同意吗？”

赫布朗回答说，匈牙利人当然不会同意，但是，拥有这些州对南斯拉夫至关重要，也许，可以用武力占领这些州。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去占领晚了一些，又说他也不怜悯匈牙利，但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会强烈反对这样做。在解决领土问题上他们主要遵循的是民族原则。斯大林同志又说，生活在这些区的南斯拉夫人必须自己提出并入南斯拉夫的问题。必须做出决定，大声疾呼。必须为合并进行斗争。

斯大林同志接着问，南斯拉夫人是否知道德国人在伦蒂市地区每年开采 5000 吨石油的消息。

赫布朗和约万诺维奇回答说不知道，之后，斯大林同志在地图上给他们指出了这一石油产地。

赫布朗请求让南斯拉夫代表参加对匈牙利和谈问题的盟国管制

^① 原文如此，应为包姚。

委员会。

斯大林同志说，这要力争，我们方面不会反对。

接着，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就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和南斯拉夫代表参加该委员会问题交换了意见。

赫布朗又阐述了南斯拉夫对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要求。南斯拉夫人提出，将科鲁什州（现属奥地利卡林西亚省）斯洛文尼亚人居住的那一部分并入南斯拉夫。第一次大战后该州属南斯拉夫，但是那里举行全民投票后并入了奥地利。

赫布朗又说，现属意大利的伊斯特拉半岛，连同的里雅斯特港、包拉^①港和里耶卡（阜姆）港，也必须并入南斯拉夫。伊斯特拉半岛的居民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只有港口城市有一定比例的意大利人。赫布朗出示了该地区的民族分布图，上面标有南斯拉夫所要求的边界。

斯大林同志说，必须让这些州自己要求并入南斯拉夫。

赫布朗讲，去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反法西斯议会应这些州人民关于并入南斯拉夫的要求，做出了相应的合并决定。其后，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议会也批准了这些决定。

赫布朗接着说，从战争最初的日子至今，这些州就有广泛开展的南斯拉夫人游击运动。

约万诺维奇补充说，现在，南斯拉夫的两个军、一个师和几支游击队在这些州作战。这些州完全掌握在南斯拉夫人手中。

赫布朗继续说道，在的里雅斯特和里耶卡（阜姆）只有人数不多的几个自治分子团体，他们在英国人的保护下，要求给予该地区自治权。

斯大林同志询问了这些团体有多少人，当知道数量微不足道

^① 原文如此，应为普拉，亚得利亚海港口城市。

时，半开玩笑地说把他们淹死。接着，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讲了同丘吉尔的非正式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丘吉尔建议将伊斯特拉半岛划出，成为一个自治州，它能使未来的奥地利得到进入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

赫布朗把话题转到罗马尼亚问题上，阐述了南斯拉夫对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即将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地区的领土，包括蒂米什瓦尔市^①，并入南斯拉夫。赫布朗对此提出的根据是，该地区有一个县的居民全是塞尔维亚人。蒂米什瓦尔市的居民以前主要是德国人，现在也可以交给南斯拉夫。

斯大林同志问报刊上有没有出现这方面的文章，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说，必须让该地区的人民，即塞尔维亚人，自己提出并入南斯拉夫的问题。总之，这是将来和会讨论的问题。不过，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和会上，必须有众所周知的证据。

赫布朗还请求改变与罗马尼亚在雷希察市地区的边界，因为这座位于罗马尼亚领土上而离南斯拉夫边界只有20公里的城市，有几个南斯拉夫非常需要的制铁厂。如果不能将雷希察并入南斯拉夫，那么，保证南斯拉夫通过其他途径从这些工厂获得钢铁，对南斯拉夫来说非常重要。

然后，赫布朗说，他想向斯大林同志通报与保加利亚的关系。赫布朗称，事情进展非常艰难，过错在保加利亚人。保加利亚人不接受南斯拉夫关于联邦的条约草案。

斯大林同志说，他看过条约草案，这个草案不合适，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是可以加入联邦的两个国家，而这个联邦的前景是在二元制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全联合这两个国家。根据南斯拉夫现在建议的联邦条约，保加利亚人将获得与南斯拉夫各民族诸如塞尔

^① 原文如此，应为蒂米什瓦拉市。下同。

维亚人、克罗地亚人、马其顿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平等的权利，保加利亚人认为，这个条约草案有吞并他们的意图。必须向完全联合努力，这将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时代。但是必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朝这一目标走，先从联盟，从互相援助开始，然后逐步走向联合。这不是权宜的联盟，而是永久的联盟。这是自由的联盟，是自由结成联邦的两个国家的有机联盟。不能造成想吞并保加利亚人的印象。

赫布朗说，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保加利亚人希望签署友好互助条约，是力图缓解保加利亚解决马其顿问题的困难，摆脱它因站在德国一边参战陷人的那种孤立状态的困难。条约能使保加利亚人逃避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责任。从另一方面说，保加利亚可以保留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位。南斯拉夫领导人没有接受签署互助条约的建议，并于1月初通过了联邦条约的新方案，新方案的基础也不是二重原则，而是保加利亚加入联邦，享有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各个民族将享有的同等权利。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这样的话，将来的联邦能够通过内部努力正确地影响保加利亚。联邦条约在南斯拉夫将很容易获得通过。按照规定，条约应当由南斯拉夫各联邦成员诸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等的最高权力机关批准。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联邦条约的第一个方案时，认为条约应在1944年12月31日签署，1945年1月1日宣布。初步打算1月1日隆重庆祝条约签署。所有的问题，乃至细节都作了规定：找好了举行庆祝活动的礼堂，指定了乐队，等等。但是，南斯拉夫的方案没有被接受，保加利亚同志通知说，来自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同志的电报劝阻了他们，他建议签署友好互助条约。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这样做不正确，遂于1月初提出了另一个联邦条约草案。

斯大林同志再次强调，必须逐步走向联合，保加利亚人要联

盟，他们要建立两位一体的国家，这很好。最好签署 10 年或者 20 年的友好互助条约。现在应当把二元制原则作为联合的基础，按奥匈帝国模式建立两位一体的国家，但是又避免了旧奥匈帝国存在的许多弊端。

如果形势急剧转变，保加利亚人可能会倒向美国和英国，甚至倒向土耳其。必须准备基于二元制原则上的联邦制联合。

莫洛托夫同志强调，即使友好互助条约也会使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害怕，使罗马尼亚人害怕，欧洲会一片慌乱。这将是欧洲的一个大事件，大家都害怕，只有苏联一家不害怕。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对捷克斯洛伐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交换了意见。捷克人不会害怕的，因为他们支持斯拉夫人团结的原则，但是，他们害怕这是左派斯拉夫人的联合。此外，这将影响捷克斯洛伐克的内部关系，斯洛伐克人可能要求在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类似的措施。

斯大林同志问对希腊有什么要求。

赫布朗回答说，南斯拉夫打算得到希腊的马其顿和萨洛尼卡。这些要求过去没有提，以免给希腊人民解放军造成困难，因为这样做会削弱希腊人民解放军在国内的地位，给它的地位造成困难。现在，要提出这个要求了。

莫洛托夫同志说，希腊的马其顿人自己可能提出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你们和罗马尼亚、匈牙利、希腊都是敌对关系，好像你们打算和全世界打仗；造成这种局面没有好处。

斯大林同志询问对希腊共产党人的看法。赫布朗回答说，过去，在被占领时期，他们对希腊共产党人的看法很不好，不过，最近他们表现很好。

斯大林同志问赫布朗是否认为，希腊民族解放阵线退出帕潘德

里欧政府^①是正确的。

赫布朗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后，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没有征求我们意见而迈出的不正确的一步。

斯大林同志询问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赫布朗回答说，阿尔巴尼亚人是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赫布朗称，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运动中有各党派的代表，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共产党。索古国王在国内得不到支持。国内有不人的反动团体，但对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运动没有危险。

赫布朗继续讲道，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前不久访问贝尔格莱德时，签署了南阿友好互助条约，还签署了贸易条约。

斯大林同志说，既然南斯拉夫承担了条约义务，那么它就应当履行条约义务。一旦出了麻烦就不得不打仗，它能不能打英国，它有没有足够的力量，这还是个问题。对阿尔巴尼亚应当慎重。英国人只承认实力。贝尔格莱德解放了，这很好，这又创造了有利条件。英国人害怕红军向希腊开进，假如红军朝那里开进，那里的局面当然会是另外一个样，但是，在希腊没有海军就一事无成。英国人看到红军没有向希腊开进感到吃惊。他们无法理解不允许军队采取分散运动的战略。红军的战略是建立在集中运动基础之上的。

斯大林同志又询问阿尔巴尼亚军队的情况。

约万诺维奇回答，阿尔巴尼亚有三个军，由八个师组成。

斯大林同志说，不应当和英国人打仗。关于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必须等一等，斟酌一番。互助条约还没有批准，没有宣布，这很好。建议2月以前不公布条约。

斯大林同志接着问，阿尔巴尼亚现在是什么政府，是全国委员

^① 1944年4月以希腊社会民主党领袖乔治·帕潘德里欧为首组成的新一届流亡政府。

会还是临时政府。

赫布朗回答说，阿尔巴尼亚前不久成立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已经向同盟国政府提出了承认的问题。但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至今没有得到承认。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是否承认了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

赫布朗回答说还没有承认，在地拉那只有南斯拉夫的军事使团。

斯大林同志问，南斯拉夫是否承认了保加利亚政府，保加利亚政府是否承认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

赫布朗回答说，保加利亚在贝尔格莱德有部长级公使托多罗夫，而在索非亚有南斯拉夫的军事使团和贸易使团。

斯大林同志对莫洛托夫同志说，按照国际关系法，好像应当先建立外交关系，然后再签署条约和协定。接着，斯大林同志问赫布朗，南斯拉夫组建政府的事怎么样。

赫布朗回答说，舒巴希奇^①到达伦敦后收到丘吉尔的一封电报，他在电报中赞成舒巴希奇与铁托签署再经修订的协议，并表示希望尽快组建南斯拉夫政府。但是可以看出，英国人故意拖延统一政府的组建（我们给舒巴希奇的期限是12月31日前），这对南斯拉夫的形势产生了很大的负作用。

前不久，贝尔格莱德给在伦敦的舒巴希奇发了一封电报，电报指出，组建新政府的时间不能迟于1月下旬。

赫布朗称，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领导人所持的态度是：如果1月15日前不能组成统一政府，那么，就宣布南斯拉夫全国解放

^① 舒巴希奇，伊万（1892-1955），战时南斯拉夫王国流亡政府首相。1945年3月参加南斯拉夫联合政府，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不久后提出辞职，住在萨格勒布。

委员会为南斯拉夫临时政府。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不应宣布全国解放委员会为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应当得到承认，英国人和美国人大概不会承认它，苏联政府倒是可以承认，但是现在它还受波兰事务的牵制。在波兰问题上，苏联政府不顾英国和美国的态度的简单从事，承认了临时政府，丘吉尔吞下了这颗苦果，而罗斯福垂头丧气，现在还在生气。

斯大林同志建议，在2月份之前，当许多问题还没有明朗之时，暂缓宣布成立政府。^①

斯大林同志谈了他的推测：丘吉尔由于在希腊得手非常得意，正在寻找借口在南斯拉夫故伎重演。不应在这件事上给丘吉尔帮忙。当然，希腊人民解放军被打败对南斯拉夫也是坏事。希腊反对派没有足够的力量与武装进攻抗衡。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代表退出了帕潘德里欧政府，他们做得不对。他们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让丘吉尔轻易得手了。在南斯拉夫不要发生争斗，不要让丘吉尔轻易得手。不能给他借口，而丘吉尔正在寻找这样的借口。丘吉尔在希腊很多方面已被搞得焦头烂额，故伎重演不会那么容易，何况还怕我们。

接着，斯大林同志对挑起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战事是否合适表示了怀疑。他又说，首先应当力求把政府的组成明确下来。丘吉尔认为，铁托-舒巴希奇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因为不论是铁托还是舒巴希奇，都是克罗地亚人。但是英国人失算了，这一点现在看得出来。

斯大林同志说，希望南斯拉夫方面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最好征

① 经维斯岛（南斯拉夫）谈判，铁托和舒巴希奇于1944年11月1日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商定成立统一政府。1945年3月7日，铁托组建了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政府，在28名政府成员中，11人为共产党人。舒巴希奇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求我们的意见，否则，我们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斯大林同志在谈话过程中说了一句：从族系上说，阿尔巴尼亚人也是斯拉夫人。他接着说，南斯拉夫领导人要想自信，必须有实力。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如果你不能进攻，那就以守为攻，积蓄力量，然后再进攻。对待资产阶级政客必须谨慎从事。他们资产阶级政客胸怀非常狭窄，报复心很强。要控制自己的感情；如果感情用事，一定会输的。列宁当年没有想过我们在这次战争中所争取到的这种力量对比。列宁当时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将进攻我们，倘若某个很远的国家，譬如美国是中立国，那就很好了。而现在的结果是一些资产阶级反对我们，另一些资产阶级和我们站在一起。过去列宁没有想过可以与一派资产阶级结盟，和另一派资产阶级打仗。这一点我们做到了；左右我们的不是感情，而是理性、分析、权衡。

在会谈结束时，莫洛托夫同志建议分组讨论南斯拉夫代表团提出的问题，并允诺挑选权威人士参加讨论。

赫布朗在告别时转达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全体人员的请求：允许代表团在回国前会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同意。

会谈持续了3小时15分钟。

(记录：基谢廖夫少将，萨哈罗夫少校)

Nq07819

**莫洛托夫与舒巴希奇关于南斯拉夫
外交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5年4月6日)

绝密

4月6日17时，莫洛托夫同志会见了南斯拉夫外长舒巴希奇。会谈一开始舒巴希奇就讲，南斯拉夫依然处在艰难的经济形势中。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南斯拉夫全境解放之后，南斯拉夫的经济形势将会好一些，当然，还会有不少困难，但是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南斯拉夫的经济生活还没有走上正轨，不过，从种种迹象看，它正在复苏。

莫洛托夫同志问舒巴希奇，南斯拉夫联合政府是否在齐心协力地工作。

舒巴希奇回答说，南斯拉夫政府是齐心协力工作的。每个政府成员都能畅所欲言。舒巴希奇本人对政府的情况完全满意，南斯拉夫政府中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好，不过舒巴希奇说，某些老政治家，尤其是来自侨民中的老政治家，有时候还不明白，生活不会止步不前，它在发展完善。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现在，各个民族的生活中都在出现许多新的因素，必须寻找和解的基础，寻找在这种新条件下齐心协力工作的基础。

莫洛托夫同志问，苏联政府同意任命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为

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的答复，是否已经送达南斯拉夫政府。

舒巴希奇确认，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收到认可波波维奇的答复。

舒巴希奇问，苏联政府是否收到了南斯拉夫的苏南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草案，莫洛托夫回答说，南斯拉夫的条约草案已经收到，和我方的草案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南斯拉夫想的和苏联想的完全一样，因此，它们容易达成协议。

舒巴希奇问，莫洛托夫同志是否认为有必要确定条约的有效期。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最好确定一种期限，并依据苏联与英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类似条约的经验，建议将条约有效期规定为20年。

舒巴希奇问莫洛托夫同志，他认为应有几名南斯拉夫代表签署该条约，是一名还是两名。舒巴希奇接着补充说，如果认为该条约有必要由两名南斯拉夫代表签署，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概由铁托元帅和舒巴希奇签署，如果只需一人在条约上签名，那么，他主张由铁托元帅签署条约。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必须由一名还是两名南斯拉夫代表签署条约，以及具体由谁签署，这应当由南斯拉夫政府自己决定。

莫洛托夫同志问，南斯拉夫政府是否讨论过条约草案，舒巴希奇回答说，政府知道该草案。舒巴希奇通知说，南斯拉夫政府还打算与苏联开始经济谈判，也签署相应的经济条约，并且问，作为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来的贸易和供应部长彼得罗维奇可以找谁谈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建议彼得罗维奇部长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会晤。

舒巴希奇请苏方考虑到他急于赴旧金山参加会议，因此，打算4月10-11日离开莫斯科。他想让彼得罗维奇能在他离开莫斯科

前与米高扬会晤，因为舒巴希奇非常需要知道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大概的贸易额。他估计，美国人将向他提出美国和南斯拉夫间的经济联系问题，他不想犯某种无意的错误，因此，他想尽早知道南斯拉夫和苏联之间贸易的性质和总额，即使大概的情况也行。

舒巴希奇通知说，南斯拉夫的一些经济专家将赴美国，专门讨论根据租借方案向南斯拉夫供货的规模。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供货很重要，南斯拉夫已经与该组织的代表签署了相应的协定，不过，租借法案更为重要。

莫洛托夫同志说，租借法案主要是提供军用物资。

舒巴希奇说，南斯拉夫还是想通过租借法案获得工业设备。

舒巴希奇谈到南斯拉夫和美国间可能的经济联系时称，美国人对南斯拉夫的胃口非常大。

莫洛托夫同志只插了一句话：无限大。

莫洛托夫同志又问，南斯拉夫是否想向苏联政府提出赫布朗曾提过的那些经济问题，舒巴希奇回答时强调，将提出同样的问题。

舒巴希奇说，南斯拉夫政府想在勘探和开采南斯拉夫金属矿藏和油田方面使用苏联专家。舒巴希奇称，据最近的资料，南斯拉夫在萨瓦河和德拉瓦河间有非常大的石油储量。德国人在勘探石油储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他们甚至在南斯拉夫境内开始小批量开采石油。据舒巴希奇转告，南斯拉夫政府不想允许外国人勘探和开采南斯拉夫的自然资源。譬如，英国人和美国人知道南斯拉夫有石油，但远非什么都知道。过去，在这次战争前，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在普洛耶什蒂兴办石油开采工业和石油加工工业感兴趣，利用他们对政府的影响，企图阻挠南斯拉夫对石油产地的勘探和开发。1939年，当南斯拉夫政府与一家德国公司签订了在南斯拉夫开采石油和矿产的合同后，美国大使专门拜会了舒巴希奇，建议他阻止落实这项交易。由于签署这项合同的政府第二天（1939年8月25日）辞职，

舒巴希奇利用他对克罗地亚银行的权力，向摄政者保罗提出了抗议，反对与德国公司的交易，当然，他并非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愿望出发，而是从他本人的信念出发。

莫洛托夫同志问，南斯拉夫政府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发展得怎么样。

舒巴希奇回答说，他们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关系发展得很好，他本人正在尽一切努力，使这种关系将来依然很好。

舒巴希奇又说，他担心英国人和美国人可能仍对南斯拉夫政府不满，因为南斯拉夫政府没有把他莫斯科之行的目的通知他们。舒巴希奇曾预先通知英国人和美国人，说他要赴莫斯科，不过，他对莫斯科之行是这么说的：铁托元帅要去拜访斯大林元帅，舒巴希奇陪同他去。舒巴希奇在与英国和美国的代表谈话时，并没有提及将要签署苏南条约。

莫洛托夫同志说，这件事现在可以对英国人和美国人讲了，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秘密了。

舒巴希奇问，他可否与莫洛托夫同志谈一谈修改南斯拉夫边界的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可以。他同时说，他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当然可以讨论这个问题，并请舒巴希奇陈述南斯拉夫的要求。

舒巴希奇说，南斯拉夫的要求仅限于伊斯特拉半岛以及奥地利和匈牙利与南斯拉夫接壤的几个地区。关于这个问题舒巴希奇通知说，丘吉尔在和他会谈时，对南斯拉夫的领导要求非常模糊地谈了自己的意见，并建议南斯拉夫在备忘录中不要提出伊斯特拉半岛问题。据舒巴希奇讲，梵蒂冈正在大作文章，反对将伊斯特拉半岛移交给南斯拉夫，它炮制了类似建立伊斯特拉独立国家方案的各种方案，按照梵蒂冈的设想，这样的国家能在斯洛文尼亚的天主教徒中

施加影响。舒巴希奇认为，如果在这次战争中南斯拉夫部队占领伊斯特拉半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解决修改它与意大利边界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考虑到各种反对意见和争执，舒巴希奇已经给南斯拉夫的一些教授布置了任务：对南斯拉夫的领土要求做出非常严谨而且客观的论证。

莫洛托夫同志说，客观的论据难以说服所有的人。

舒巴希奇强调，南斯拉夫政府的打算是：南斯拉夫的边界应在严格遵守民族和民族学原则的条件下加以修改。

舒巴希奇允诺将附有南斯拉夫领土要求详细说明和地图的备忘录寄给莫洛托夫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问，组建南斯拉夫联合政府的问题为什么在伦敦研究了那么长时间。

舒巴希奇相当详尽地讲述了他与英国人和彼得国王谈话的经过。艾登^①，特别是丘吉尔，拖了很长时间不接见他，而且还要和国王进行谈判，仅仅这一原因就把事情拖延了。在一次会谈中，艾登甚至说了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国王不赞同铁托和舒巴希奇的协议，那么舒巴希奇就不得不辞职，舒巴希奇对此表示反对，说他将择善而从，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未必会辞职，由于国王的原因，南斯拉夫无论如何不会发生希腊或者波兰发生过的那种事情。国王千方百计地企图说服舒巴希奇辞职，并且援引了自己的特权。舒巴希奇明确地向国王声明，如果国王和人民一起走，他就和国王一起走，否则，他就离开国王。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国王希望保全自己的威信，在同一份命令中要舒巴希奇辞职，同时又委托他组建

^① 艾登，罗伯特·安东尼（1897～1977），1940～1945年出任英国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1945～1951年艾德礼工党执政时期仍留在下议院。1942年以后长期为英国保守党领袖。

新内阁。

莫洛托夫同志问，这个问题最终是否解决了。

舒巴希奇回答说，雅尔塔会谈和莫洛托夫同志的电报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不是这封电报，英国人肯定还会拖延。

舒巴希奇问，铁托元帅能否拜访现在莫斯科的丘吉尔夫人。

莫洛托夫同志反问道：为什么不能。

莫洛托夫同志又问，南斯拉夫代表团有没有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的计划，它准备向苏联政府提出什么问题，舒巴希奇回答说，他们首先打算签署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条约，然后签署经济协定，谈一谈修改南斯拉夫边界的问题，讨论某些内务和外交问题，了解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的情况。

莫洛托夫允诺让舒巴希奇阅读苏联政府掌握的有关旧金山会议的材料。

舒巴希奇请莫洛托夫同志同意专门与他会晤，以讨论条约草案，并请他确定这次会晤的日期。

莫洛托夫同志同意会晤，并说这次会晤可在4月7日举行。

会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会谈记录：拉夫里谢夫)

No07828

萨德奇科夫与保加利亚公使托多罗夫 关于成立南斯拉夫联邦的谈话记录

(1945年10月23日)

摘自苏联驻南大使萨德奇科夫的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B. 杰卡诺佐夫、A. 拉夫里舍夫，归档。

保加利亚人问我，由于舒巴希奇的辞职，盟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有无什么新情况。我简要地向他通报了苏联与美国政府之间就南斯拉夫问题的信函往来。我同时还向他报告了美国政府关于承认阿尔巴尼亚的提案。保加利亚人发表意见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将放弃阻挠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原定选举的企图。他说，无论如何，他们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无计可施：不管在这个国家还是那个国家，各民族团结一致，任何干涉他们内部事务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保加利亚人对当时（1945年1月）保加利亚未能与南斯拉夫统一深为遗憾。按照他的看法，当时的形势对此十分有利。据他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曾指示他们保加利亚人，如果他们希望与南斯拉夫统一，那就快些予以落实，但保加利亚政府却拖延了这件事，并且还提出一系列琐碎而无关紧要的问题进行讨论，结果就把时间耽误了。盟国知道了历次会谈的情况并予以反对。按照托多罗夫的看法，这就犯下了“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错误”。公使指出，

现在我们不得不长期等待解决这一问题的良好局面的出现。

托多罗夫找我商谈这一问题已经是第二次了，从他的谈话的口气判断，他似乎对此真的感到遗憾。

И. 萨德奇科夫

№07829

萨德奇科夫与南人民农民党领袖 关于选举失败原因的谈话记录

(1945年11月12日)

摘自萨德奇科夫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B.杰卡诺佐夫、A.拉夫里舍夫，归档。

约万诺维奇和日夫科维奇^①因昨天制宪会议选举结果心情沉重，且沮丧地找到了我，他们声称，获得席位的数量与他们在塞尔维亚农民中间的实际影响不相符。他们把从50名人民农民党候选人中只选了5-6人进入联邦议会的情况说成是“群众恐怖”、年轻人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及地方上的共产党人不想遵守与他们在选举中达成的精诚合作的条件。日夫科维奇抱怨贝尔格莱德没有给他机会，那怕是召开一次选举会议。伏伊伏丁那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地方委员会以各种借口取消他与选民的会见。

情绪激动、灰心丧气的约万诺维奇指出，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青年联盟”撕毁了所有号召投票赞成他的海报。当他来到自己选区皮罗特时，青年们从四面八方围住了他，并开始有节奏地高喊：“要战士，要战士”或“英雄铁托，英雄铁托”，这一喊声持续了20~30分钟。这样一来，他根本无法与自己的选民们说上几句

^① 德·约万诺维奇和日夫科维奇均为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

话。

他们对关于自己党的表决结果是这样解释的，即没有给他们在居民中开展独立工作的机会。在已经形成的局面中，他们则不知道该如何进一步行动：是继续留在人民阵线内还是转到反对派中去，留在人民阵线就会导致在人们当中影响的损失，但转到反对派则意味着要从自己党的重大政策——与依靠苏联的共产党人的合作上后退。他们本人都同意完全与共产党人打成一片，或参加到统一的工人农民党之中。这就是当前谈论的话题。但按照他们的看法，转到一党制还为时尚早——塞尔维亚农民目前对此还没有准备。在取消他们的党的过程中，部分跟他们走的农民将转向右倾并追随反动势力。因此，他们想听听我的意见，他们该如何进一步行动，同时想知道苏联希望见到一个什么样的南斯拉夫。

我回答他们说，他们提到的问题均属于南斯拉夫的内政问题，我们不能干涉这样的事务，苏联只是希望与南斯拉夫保持良好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目前还算不上好。至于涉及未来的国家制度，我曾指出，那就是你们自己在人民阵线纲领中确定的民主联邦共和国。我个人认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而为建造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厦，眼下显然需要参与人民阵线所有民主力量的合作。

约万诺维奇和日夫科维奇对此表示感谢，他们说，有了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最后，我建议他们与铁托元帅会晤，并与他坦率地谈谈所有这些问题。

临别时，约万诺维奇提醒说，他们已经落实了我在上次谈话中提出的有必要保护人民阵线统一的意见。

萨德奇科夫

№07830

萨德奇科夫关于南斯拉夫新宪法草案 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5年12月17日)

于贝尔格莱德市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B. 杰卡诺佐夫、A. 拉夫里舍夫，归档。

关于南斯拉夫新宪法草案问题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今年12月3日南斯拉夫各报发表了供全民讨论用的南斯拉夫新宪法草案，它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几方面：

南斯拉夫宣布为人民共和国，国名全称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并被认为是平等和自由结合的各民族的联邦。参加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员有6个人民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马其顿及黑山。在塞尔维亚的构成中规定有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及科索沃和梅托希亚自治州。联邦国家与各独立共和国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确定与苏联宪法差不多，但是也有本质区别，即各独立国家无权脱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铁托与卡德尔^① 在与我

^① 卡德尔·爱德华(1910~1979)，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南共中央书记，联邦副主席兼政府副总理。

的谈话中为这一区别提出论据说，在南斯拉夫没有像苏联那样存在着深刻的民族差别，因为南斯拉夫各民族同系斯拉夫人，此外，他们的人数很少，不具备作为真正独立国家存在的条件。

宪法规定了人民政权的各项原则，其中第6条指出，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并属于人民，实现这一权利的形式是各级人民委员会。所有国家政权机关都要在普遍、平等和直接选举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

国家总的经济结构的划分确立了国家三种经济关系形式——国有、集体和私人所有制经济的存在，宪法规定不准搞对外贸易垄断，而是要对它实行国家监督，同时还规定了经济发展将按照总的经济计划执行，而该计划则是依靠国有和集体经济，以及对私人经济的监督。

宪法保障私人所有制和个人的积极性，但需要保持在下列范畴内：“任何人都不得利用私人所有制的权利损害民族的联合”，“私人所有制可能会受到限制或没收，如果整体利益要求这样做的活，但只能通过合法手段，并对私有者进行合法的赔偿”。

第19条则指出，土地属于耕种土地者所有，绝不容许出现私人大土地占用者。

综上所述，效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的南斯拉夫的草案是从“人民主权”的概念出发的，但是草案的其他各条均体现出对未来阶级分化政策的基本路线，例如第19条指出，“国家特别保护和帮助中农和贫农”。第20条则规定，为了免遭经济奴役，国家帮助劳动者联合和组织起来，接着就把这种帮助的形式具体化了。第32条还宣布：“每个公民必须各尽所能地工作；谁对社会无所贡献，谁就不能从社会取得任何东西。”

我曾问卡德尔，当存在剥削阶级——企业主、商人和地主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南斯拉夫当前条件下关于社会主义的提法，即如何

认定这些人在目前发展阶段乃是社会的生产者和有益的成员，或者如何把他们从社会的平等成员中开除出去，亦即怎样使他们合法化或在今后消灭他们。

卡德尔回答说，他们在此基础上将要收拾自己资产阶级。卡德尔声称，我们现在就已经碰上了妨碍工业企业恢复的资本家的严重怠工事件，这类违抗在今后大概还会增强。因此，我们势必要走上暴力镇压他们反抗的道路，卡德尔这样说：“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是胜利就是灭亡，我们没有其他路可走”。

草案的制定者依据我国宪法确定了每个公民的权利义务，但是，按照铁托的指示，凡列入现实保证公民权的一切条款都被删掉了。

宪法草案规定，由平等的两院——联邦院和民族院构成的人民议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

在人民议会闭会期间，人民议会主席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联邦政府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最高执行和管理机关。政府由主席、副主席、各部部长、联邦计划委员会主席、联邦监察委员会主席、高等院校和科学事务委员会主席、卫生委员会主席和社会保障委员会主席等组成。草案的起草者依据我国宪法确定了人民议会主席团与联邦政府的权限和相互关系，但是在南斯拉夫的草案中，某种或多或少制约了人民议会主席团的权利而偏袒联邦政府的倾向颇为引人注目。例如在任命和罢免联邦委员会各部部长、主席、大使，以及授予荣誉称号和奖励，均得事先说明人民议会主席团是“遵照联邦政府的提议”行事的。

任命和罢免高级军事指挥员的权力归人民议会，而不是它的主席团。

铁托在与我谈话时指出，这些附加条件和修改是他提出的，其

目的在于限制里巴尔^①的野心。

在制定宪法草案的过程中，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当中似乎发生了严重的争论。

宪法的第一稿是由南斯拉夫法学家在卡德尔和莫萨·皮雅杰^②领导下制定的，用赫布朗的话说，这一最初草案几乎只是想把苏联宪法简单地译成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而已。

例如，今后的南斯拉夫打算改称为“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联盟”，就政权的本质和起源问题而言，一切政权归城市、农村等方面的劳动者所有，铁托认为这一提法并不正确，同时提出了目前相应条款的提法。就个人的意见，我支持现在通过的共和国国名。

然而，在我看来，铁托做出了一处不适宜的修改。在交报界发表前卡德尔给我的草案第二稿中，第73条写道，议会主席团在南斯拉夫遭到进攻或者在必须履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国际义务的条件下（第49条与苏联宪法如出一辙）可宣布为战争状态。在发表的草案全文中，对第二种情况就没有规定，它是依据铁托的提议去掉的，其理由是，与国际义务有关的紧急军事手段将由作为国防部长的他来实施，而战争状态则由人民议会宣布。

当卡德尔找我交换对宪法草案的意见时，我以自己个人的名义指出，最初的提法要好一些，因为它为落实苏联—南斯拉夫条约双方通过的义务规定了相同的条件。

卡德尔声称，做出这种改变并未征得他的同意，他甚至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卡德尔无法恢复在制宪会议宪法委员会讨论草案时的最初提法。

① H. 里巴尔是民主党左翼领袖，在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曾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② 皮雅杰，莫萨（1889—？），南斯拉夫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战后任南斯拉夫国民议会、联邦议会副主席。

现在进行的草案讨论形式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

对草案的背后批评大都具有敌对的性质，发表的意见严重对立，并且以其当事人的社会 and 政党属性所转移。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人民阵线持敌视态度，并且声称草案是从苏联宪法那里抄袭过来的，是莫斯科授意的结果，甚至还是驻贝尔格莱德的苏联大使馆制定的。他们认为，这个草案的通过将会把南斯拉夫变为像改称人民国家的蒙古共和国一样纯粹是苏联的附庸。

另一组批评者认为，虽然南斯拉夫草案在保证个人自由和不受侵犯方面比苏联宪法走得远，但毕竟还不是民主的，因为它没有规定组织和政党活动的自由。他们断言，苏联宪法公开承认一党制，那样一来，作为南斯拉夫的草案也就暗中看好这一体制。

第三组代表从“左”的方面批评宪法草案。他们认为，草案与一般的资产阶级宪法没有多少区别，如果通过，就不会出现从资产阶级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它没有保护劳动者的起码权利。他们甚至还指出宪法草案侵犯了一些共和国的主权，因为它不承认它们有权脱离南斯拉夫联邦。

在制宪会议宪法委员会讨论草案的过程中，参加人民阵线的所有各党代表都对新宪法的基本原则持肯定态度，同时也都从个人角度提出了一系列修改，但人民农民党领袖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的发言却属例外。他以伪善的面目反对南斯拉夫未来经济和国家制度的基础本身。实际上，他的伪善讲话带有强烈的反苏色彩，并且把它与苏联的一党制混为一谈。在他看来，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想把这种制度以及法西斯主义和中世纪的野蛮制度强加给南斯拉夫。他认为，宪法草案过多地强调保证国家的统一而损害了一些民族、政党、个人等的自由，鉴于他的讲话大大超出了对宪法草案批评的范围，并进而转为对当今南斯拉夫对内对外政策的全面批评，因此，对其中的一些内容，我将在有关国家政治形势的信函中作进一步的

详细介绍。^①

12月14日，宪法草案提交宪法委员会投票表决，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其中也包括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都投票通过了作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未来宪法基础的草案。

尔后，委员会对其作了逐条审查，无庸置疑，制定出的宪法草案最终会获得通过。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萨德奇科夫

^① 参见本卷下面的文件№07831。

№07831

**萨德奇科夫关于南斯拉夫政治局势
给莫洛托夫的信**

(1945年12月18日)

于贝尔格莱德市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B. 杰卡诺佐夫、A. 拉夫里舍夫，归档。

关于南斯拉夫制宪会议选举后的形势（情报）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制宪会议选举和共和国宣告成立巩固了南斯拉夫的国际和国内地位，充分显示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解放斗争中诞生的民主制度的威力和强大生命力。

一、南斯拉夫人在对外政策方面感觉自己更有信心了。他们正确地认为举行制宪会议选举和宣告共和国成立是在确立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把这一胜利与苏联积极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相联系。这一看法不仅存在于国家的统治集团，而且也存在于广大的民主知识分子阶层和人民当中。选举结束后，农业部长瓦索·丘布里洛维奇就马上拜会了我。他是农业党成员，而且一直持观望态度。选举后，他首先来到大使馆，其目的就像他说的那样，是为了谈一谈他对南斯拉夫外交形势的印

象。他声称，直到不久前，在南斯拉夫领土上依然存在着苏联和西方盟国外交政策路线的对立，这种冲突在国内可以强烈地感觉出来。但现在可以说，这种冲突以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胜利而告结束，而且对立的路线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匈牙利、法国和罗马尼亚等国家。

在与大使馆参赞科热夫尼科夫同志的交谈中，米洛凡·吉拉斯声称，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南斯拉夫玩弄了一场反对苏联的大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格罗尔^①和南斯拉夫其他反动分子，然而他们却遭到了沉重的外交失败，没有能阻挠制宪会议的选举、召开和宣告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吉拉斯说，英美人的这一失败是苏联毫不动摇地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坚定的外交政策的结果。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斯拉夫社会舆论对国内最新事态的总评价。

贝尔格莱德的气氛与全国各地一样，其特点是相当平静。而且还意识到，一直密布在南斯拉夫上空的阴霾有些已经移出它的边界。

从英美报界的基调及在这里的英美代表人物的所作所为判断，同盟国大概已决定容忍在南斯拉夫出现的政治变化。众所周知，对下议院提出的问题，即英国政府是否准备承认南斯拉夫，贝文^②借口官方没有得到这一问题的信息而回避做出回答。然而，英国，还有美国，与南斯拉夫官方的外交关系，在该国废除王位、宣布成

① 格罗尔，米朗（1876～1952），战时加入了南斯拉夫流亡政府，1945年3月任联合政府副总理。1945年8月提出辞职，并成为1945年秋天成立的公开反对党的领袖之一。1945年11月议会选举失败后，格罗尔放弃政治活动，从事戏剧学研究。

② 贝文，欧内斯特（1881～1951），时任英国工党政府外交大臣。

立共和国之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路透社驻外工作人员在11月30日发出的一条信息说，伦敦正式认为，虽然宪法变了，但对铁托元帅政府的承认依然有效。

据现有情报表明，在贝尔格莱德的英国代表所要达成的目标只是使立宪会议任命的新政府承担起南斯拉夫的义务。看来，与此相关的是英国人一方面对南斯拉夫国家制度的改变不急于做正式决定，而另一方面却开始了与南斯拉夫政府的经济谈判。

主要问题是英国人提出要求承认他们在特列普查矿山的租赁公司。据贸易和供应部部长彼得罗维奇声称，南斯拉夫政府不打算承认英国人对矿山的租赁权，但同意赔偿他们在特列普查投资上的损失。

很显然，英国人拖延正式承认南斯拉夫共和国的目的在于借此保护和巩固自己在南斯拉夫的经济地位。

二、人民阵线的胜利使反对派的活动陷于瘫痪。正如前摄政王曼迪奇在与我交谈时所说的那样，“反对派被轻易地消灭了”。它的全部计划都寄托于外来干涉，但这一点却没有发生。有些反对派代表就此对英国人进行了指责，并且声称后者背叛了他们。

据特别来源的情报称，格罗尔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灰心丧气的人。在一次谈话中，他认为英美与苏联之间在不久就会发生战争，而且无法避免。人们证实说，格罗尔本人就希望这场战争。因为他预料盟国会获胜，同时还希望这一胜利会使他重新上台。

今年11月底，在萨格勒布举行了前克罗地亚地区农民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共计50人。而作为会议的召集人和会务工作主持人的有舒巴希奇、舒特伊和扬奇科维奇。有关恢复舒巴希奇和舒特伊领导的克罗地亚农民党以及有关出版党报的问题是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与会者指出，党的纲领应当建立在忠诚于现政府的进步反对党的原则之上。有些与会者则声称，他们认为舒

巴希奇及其追随者没有在制宪会议上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是一个错误。按照他们的推测，这个名单会得到克罗地亚 25~30% 的选票。与会者似乎一致表示要参加下一次克罗地亚代议机关的选举。

三、早先从各种来源获得的消息说，人民农民党领袖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力图在人民阵线内部组建反对派，这一消息大概是可靠的，并且从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在 12 月 11 日宪法委员会会议的发言中得到了证实。他这种典型的耍两面手腕和伪善的讲话有以下几点内容。他首先声明，提出的宪法很好，符合人民阵线的纲领，然后他就转到大谈特谈自己的怀疑和批评意见，以及各种警告等等。同时他还声称，一些老的“历史上的政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是因为共产党人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拙劣地利用了他们。在人民阵线中，这些党仅仅是“抬水的木棍”。在提出的宪法草案中，甚至都没看到留给其他政党的位置。该草案是毫不声张地根据一党制原则制定的，在苏联坦率和公开通过的内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做起来却要躲躲闪闪。但是，德拉戈留布认定：“国家主义”的一党制不符合南斯拉夫各民族，尤其是塞尔维亚农民的心愿和传统，他坚持要避开这种制度，进而避免新的国家制度与法西斯主义和中世纪野蛮政权的雷同。这样，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就以毫不含糊的口气将我们的国家制度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迄今为止，格罗尔及其同伙还没有发表过如此公开的反苏声明。

谈及国家生活中自由与统一的关系问题，约万诺维奇也在国家主义、依靠自由——一些民族、政党及个人的自由、保证统一方面，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指责。

在对外政策方面，约万诺维奇指控共产党人奉行有利于苏联的偏向政策。他认为这将会引起西方世界对南斯拉夫的敌视。在约万诺维奇看来，共产党人奉行的对内政策是无异于使南斯拉夫苏维埃化的路线，它也会受到西方盟国的敌视。

谈及国家的经济结构，约万诺维奇表示反对经济全面国有化的倾向。他同时认为这为资本主义世界对南斯拉夫的进攻打开了一个缺口，他还主张新宪法要保证全体公民的劳动权利。

约万诺维奇证实说，宪法草案有一部分将难以在南斯拉夫民族中通过，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他们历史上形成的特点以及他们的党政传统，这些民族将会感到自己被蒙骗。因为在亚伊策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他们得到了民族自决权，包括从南斯拉夫分离出来的权利，宪法草案并没有为他们的这种权利做出规定。

谈及农民问题，约万诺维奇对目前对待农民立场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他表达的内容大致如下：农民从事的一切就是要开展独立运动，不仅是经济独立，而且还包括政治独立。他们没有被破坏统一的言词所迷惑，他们拥护与城市工人的联盟，但联盟就意味着平等。如果达不到这一点，那他们就会寻找其他方法和其他途径，以保证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特征。

卡德尔、皮雅杰以及克罗地亚共和国农民党主席、农民联盟执行委员会瓦索·丘布里洛维奇等人都对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的言论进行了批评。

约万诺维奇针对批评指出，人们没有正确理解他，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原则性分歧意见，他从总体上是拥护宪法草案的。但他同时指出，他引用的所有论据都是有效的，而且对自己的任何一个观点都不会放弃。

因此，德·约万诺维奇的发言实际上证明了人民阵线内部已经从思想上出现了新的反对派。这时，它的行动纲领实际上与格罗尔的纲领相一致，其基本路线也已确定了下来。正如在约万诺维奇的声明中看到的那样，新的反对派指望从外部得到西方盟国的支持，在内部得到富农的支持。但目前事态仅限制在反对派思想、行动纲

领的出现，但还没有形成组织。德·约万诺维奇在没有得到支持和同情后，就决定后退，并投票赞成通过宪法草案。他正在进行积极有效的工作，成立广泛的反对派集团。他正在从事两方面工作，首先是实现农民联盟和由他领导的人民农民党的合并，其次，他开始致力于建立有农民党、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及民主激进党参加的所谓“民主联盟”。

会谈的结果目前尚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激进分子似乎已拒绝参加这一联盟。

新的反对派的前景如何呢？

当然，“农民反对派”将比“格罗尔反对派”有力，但是未必能在议会和国内产生大的影响。

议会两院中只有 10 名人民农民党选出的代表，但据卡德尔说，其中共产党员代表就占了 4 名。如果约万诺维奇转到反对派方面去，那么他也许会从自己党内拉走 4~5 人，从共和党拉走了 3~4 人，以及从其他政党拉走若十人。因此，在议会中他将成为无足轻重的少数派。

共产党采取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农民联盟与人民农民党的联合，同时还在于使人民农民党发生分裂，并且将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本人开除出党。共产党人这些努力的最终结果如何还难以评估，但这方面的一些成效已经显现出来。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И. 萨德奇科夫

No02518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的苏方记录^①

(1946年5月27日)

机密

参加者

苏联方面有：维·米·莫洛托夫，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 И. 拉夫连季耶夫^②

南斯拉夫方面有：内务部部长亚·兰科维奇^③，总参谋部参谋长科·波波维奇^④，塞尔维亚部长会议主席涅什科维奇^⑤，斯洛文尼亚部长会议主席基德里奇^⑥，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弗·波波维奇

会议开始时斯大林同志问铁托，如果今后将的里雅斯特的法律

① 根据《斯大林接见人员登记册》的记载，会谈从1946年5月27日23时持续到5月28日0时30分。

② 此时，拉夫连季耶夫已接替萨德奇科夫出任大使。

③ 兰科维奇，亚历山大（1909～1983），时任南共中央执行局主管组织和干部工作的书记，南斯拉夫内务部长。

④ 波波维奇，科查（1908-？），1945-1953年任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

⑤ 涅什科维奇，布莱哥耶（1907-？），塞尔维亚共产党中央书记。

⑥ 基德里奇，鲍里斯（1919～1953），1946年6月出任南斯拉夫部长会议经济委员会和计划委员会主席。

地位确定为一个自由城市^①，那么所指的仅仅是市区呢，还是也包括了市郊地区，怎样一种法律地位好一些呢？是照梅梅尔模式，还是照但泽模式呢^②？

铁托回答说，有一些斯拉夫人居住在市郊。所说的可以只限于市区。但他希望继续坚持把的里雅斯特列入到南斯拉夫的组成之中。随后，铁托以南斯拉夫政府的名义向维·米·莫洛托夫同志表达了谢意，感谢苏联代表团在巴黎外长会议审议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问题时所给予的支持^③。

① 的里雅斯特是亚得里亚海沿岸城市，原属奥匈帝国，1918年为意大利占领，其绝大部分居民是意大利人，后来，邻近地区的大部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也迁居到此。1945年5月初南斯拉夫军队突破德军在意大利的防线，与西方盟国军队在索查河会师，共同占领了的里雅斯特市，但双方关系日趋紧张。5月12日和15日，杜鲁门以及英美政府接连照会南斯拉夫，要求南斯拉夫军队限期撤退。5月19日铁托代表南政府声明：“南斯拉夫有权留在自己解放的国土上”。5月22日占领军双方发生了军事冲突。当时，苏联政府对此保持缄默。6月2日英美政府再次发出照会，要求南斯拉夫撤军。6月9日南斯拉夫被迫与英美达成撤军协议，但未放弃对的里雅斯特的主权要求。此后，苏联在国际会议上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建议的里雅斯特市在南斯拉夫联邦国家的范围内作为一个独立的联邦存在，而将的里雅斯特港口确定为自由港。西方大国反对将的里雅斯特及其附属地区划入南斯拉夫，提出将的里雅斯特及周围地区作为“自由的城市”。稍后，在1946年6月底，这样的建议由法国提出来了。

② 梅梅尔为波罗的海港口城市，1525年归属普鲁士公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凡尔赛和约规定，暂由国际联盟共管。后根据国联1923年决定归属立陶宛。有关公约规定，梅梅尔在实施内部管理方面享有立法等广泛的自主权，但不能超出立陶宛的宪法范围。1940年立陶宛加入苏联后改名为克莱佩达。但泽原称格但斯克，1793年起被普鲁士占领，改名但泽。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根据凡尔赛和约，但泽成为由国际联盟托管的拥有自己的立法和权力机构的非军事自由城市，但波兰享有其对外联系和经过其领土上的铁路和水路交通线的监控权。

③ 在1946年4月25日至5月16日的巴黎外长会议上，的里雅斯特及周围地区的归属问题是审议对意大利的和约时讨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积极地支持了南斯拉夫的领土要求。但在7月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莫洛托夫在没有满足南斯拉夫提出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单方面同意了法国提出的自由区方案，引起南斯拉夫强烈不满。

莫洛托夫同志询问了梅梅尔和但泽在法律地位上的区别，他指出，梅梅尔模式的法律地位比较好。

斯大林同志问铁托，南斯拉夫工农业的情况怎样。

铁托回答说，所有的土地都种上了，可以指望有一个中等的收成，并说，工业方面搞得是好的。

随后，斯大林同志建议铁托谈一下南斯拉夫代表团今晚想讨论的问题的范围。

铁托提出了以下一些问题：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经济合作，军事合作，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关于经济合作问题，铁托说，南斯拉夫不愿意向美国借债。如果美国同意提供借款，那么就会同时要求南斯拉夫在政治上做出让步。要进一步发展工业，南斯拉夫没有钱。南斯拉夫很希望从苏联方面得到援助，特别是通过建立苏南合营公司。南斯拉夫有各种丰富的矿藏，但它无法组织生产，因为没有所需的各种机器。其中，南斯拉夫也有石油，但是没有钻探机。

斯大林同志说道：“我们来帮助”。

对斯大林同志关于南斯拉夫是否出产铝、铜和铅的问题，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南斯拉夫有很多铝土矿和各种矿石，可供生产这些金属。

斯大林同志说，外贸部曾多次向南斯拉夫人提出，他们准备就组织合营公司问题进行谈判，但没有从南斯拉夫人方面得到肯定的回答。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南斯拉夫不愿意成立这些公司^①。

^① 1945年春，南斯拉夫提出采取租让形式请苏联参与开发南斯拉夫的自然资源。苏联方面同意参与开发，但要求采取合营公司的方式。不久，南斯拉夫表示同意。1946年4月新任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到贝尔格莱德后，苏南双方开始谈判，但在谈到第一个合营公司——航空公司时，就出现了分歧。南斯拉夫的代表拒绝接受苏联的草案。铁托表示，这个问题将推迟到在莫斯科进行讨论。

铁托表示异议，他说，与此相反，他曾不止一次地向萨德奇科夫大使谈到，南斯拉夫政府希望建立苏南合营公司。

斯大林说，在建立苏南合营公司之后，是否有必要准许其他大国也加入南斯拉夫的经济。对此，铁托回答说，南斯拉夫政府不打算让其他大国的资本进入自己的经济。

随后，作为简明的归纳，斯大林同志说道，就这样吧，就在建立合营公司的基础上来考虑苏南经济合作的问题吧。

铁托对此表示确认，说道，他打算在明天就这一问题，以书面的形式提出自己的建议^①。

关于军事合作问题，铁托说道，南斯拉夫政府希望为南斯拉夫军事需要而得到的苏联的供应，不是采取相互贸易的结算方式，而是以贷款的方式进行。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不大，它能够生产一些迫击炮、地雷。在很多地方干部是有的，但是没有相应的设备，因为这些设备都被德国人运走了。南斯拉夫政府希望作为赔款，从德国得到一些机器，以便恢复一些军工厂。但南斯拉夫本身毕竟无法满足军工的需求，因此，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政府寄希望于苏联的援助。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理应有一些军工厂，例如有一些飞机厂，因为南斯拉夫人在拥有丰富的铝土矿的条件下，是有能力生产铝的。同时，也需要有一些生产炮兵武器的工厂。

铁托说，要是能够在苏联铸造炮筒，而在南斯拉夫进行加工，那就好了。

^① 第二天，南斯拉夫代表团提交了以苏联对外贸易部的协定草案为基础的修改草案。6月6日苏南签署了经济合作协定。协定规定将在南斯拉夫建立八个合营股份公司，但成立公司还需要单独签订具体的协定。后来由于苏南谈判中的分歧，到1947年2月只签订了建立两个合营公司——航空公司和多瑙河航运公司的协定。

在涉及到领海疆界问题时，斯大林同志说，要保卫领海疆界，就需要有一支优良的海军。要有鱼雷艇、护卫舰和装甲舰。尽管苏联在这方面也还薄弱，但是，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的：“我们给以帮助^①。”

关于阿尔巴尼亚问题，斯大林同志指出，阿尔巴尼亚内部的政治局势现在还不明朗，有消息说，那里在共产党政治局和恩维尔·霍查之间出了一些什么问题。传来的消息说，科奇·佐泽希望在党代表大会之前来莫斯科，以便观察、分析、研究某些问题。恩维尔·霍查也表示希望与佐泽一道来莫斯科^②。

斯大林同志问铁托，他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情况是否知道些什么。

铁托在这些问题上显得好像消息不很灵通，他回答说，霍查打算在近期内到贝尔格莱德。因此，铁托认为，应该这样答复阿尔巴尼亚人：关于佐泽和霍查前往莫斯科的问题，待霍查去贝尔格莱德之后再加以研究。

莫洛托夫同志说，我们曾经多次制止阿尔巴尼亚人前来莫斯科的意向，但阿尔巴尼亚人始终坚持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指出，阿尔巴尼亚人前来莫斯科，在英美方面可能引起不良的反应，而且这将加剧阿尔巴尼亚外交局势的复杂化。

接着，斯大林同志问铁托，恩维尔·霍查是否同意阿尔巴尼亚

① 苏联报纸对访问结果是这样报道的：“苏联政府同意在长期贷款的条件下供给南斯拉夫军队武器、弹药等等，以及协助恢复南斯拉夫的军事工业”。但实际上签署具体协定还要进行专门的谈判。

② 霍查，恩维尔（1908～1985），阿共中央第一书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佐泽，科奇（？～1949），阿共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书记，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当时，霍查与佐泽之间矛盾很深。阿共中央原定1946年5月25日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一直没有召开。1948年11月阿共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佐泽作为铁托分子被清除出党，并于1949年被判处死刑。

作为联邦成员加入南斯拉夫。

铁托作了肯定的回答^①。

斯大林同志说，目前要同时解决这样两个问题，即阿尔巴尼亚加入南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和的里雅斯特的的问题，对南斯拉夫来说将是困难的。

铁托对这一意见表示同意。

因此，斯大林同志进一步说，最好首先讨论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友好互助问题。

铁托说，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应该对保卫阿尔巴尼亚的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预先做出规定。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为这一条约找到一种形式，以便使阿尔巴尼亚更接近南斯拉夫^②。

斯大林同志提到了保加利亚加入联邦的问题。

铁托说，搞联邦是不会有有什么结果的。

斯大林同志随即甩出一句反驳的话：“这件事应该做”。

铁托声称：搞联邦之所以不会有结果，因为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除此之外，在保加利亚，其他一些政党的势力是很大的，可是在南斯拉夫，尽管存在着其他一些政党，但全部政权

① 早在战时，南共便对阿共有着重要影响。战后，两国领导人均有结成联邦的想法。1946年3-4月双方商定霍查将访南，并签订南阿友好条约，其中包括经济合作协定和简化边界制度的协定，同时还签署一个秘密军事协定。4月22日铁托将这一情况通报给苏联大使，并透露了南阿结成联邦的意向。苏联方面研究后认为，阿加入南联邦的事情应推迟，简化边界制度的协定和秘密军事协定也不宜签订。5月7日拉夫连季耶夫通知铁托，苏联希望他提前访苏，并在莫斯科专门讨论南阿条约的问题。

② 莫斯科会谈的结果体现了苏联的意图，阿尔巴尼亚与南斯拉夫联合的问题被暂时推迟了。与此同时，苏联准许南阿签署友好互助条约和经济合作协定，赞成阿尔巴尼亚更接近南斯拉夫的方针。1946年6月底霍查访问莫斯科，7月初南阿签署了有关文件。

实际上都在共产党的掌握之中。

斯大林同志说，对这个问题不必担心。起初可以局限在友好和互助条约的问题上，而实质上应该做得更多一些。

铁托对此表示同意。

莫洛托夫同志说，目前可能会发生一些困难，因为同保加利亚还没有缔结和约。保加利亚可以被视为前敌对国^①。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不应该有什么实质性意义。大家知道，苏联已经与波兰订立了友好条约，但当时波兰还没有被其他国家所承认^②。

随后，斯大林同志对会谈是这样归纳的，他说，南斯拉夫政府在经济问题和军事问题方面所考虑的那些事情，都是可以办成的，现在有必要成立一个委员会，以便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

铁托向斯大林同志通报了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的关系问题，并通报了拉科西^③贝尔格莱德之行的情况。铁托说，南斯拉夫政府决定不在外长会议上提出南斯拉夫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问题（对班斯克三角地区的要求）^④。铁托对南斯拉夫与匈牙利签订了关于赔款

① 自1944年底以来，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共产党领导人就开始进行了有关两国结成联邦的谈判。这些谈判是根据斯大林的倡议或经斯大林批准而进行的，当时斯大林表示必须加快成立联邦。但是，西方盟国对此坚决反对。1946年初，保加利亚重新提出关于成立联邦的问题，对此，苏联和南斯拉夫都强调应在缔结对保和约以后进行。铁托访苏期间，苏、南、保三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确定南保之间将真正实现最密切的合作，但友好条约应在对保和平条约之后签署。

② 苏联军队1944年7月进入波兰后，扶持波兰工人党等抵抗组织建立了临时政府。在1945年4月苏联与该政府签署友好条约时，西方各国支持的是波兰在国外的流亡政府。

③ 拉科西，马加斯（1892-1971），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匈牙利政府副总理。

④ 战争后期，南斯拉夫曾向苏联提出南斯拉夫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问题。1946年4月底拉科西访问贝尔格莱德，并与铁托讨论了这一问题。铁托表示，如果给予在匈牙利的少数民族以民族权利，并保证在边界地区南斯拉夫的经济利益，他们不准备在外长会议和巴黎和会上提出对匈牙利的领土要求。拉科西对此表示同意。

支付问题的协议表示满意。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匈牙利希望与南斯拉夫保持和平关系，那么，南斯拉夫应该支持这种愿望，因为他注意到，对南斯拉夫来说，所存在的基本困难是在与希腊和意大利的关系问题上。

(拉夫连季耶夫记录)

No 02519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的南方记录

(1946年5月27日)

于克里姆林宫

参加者：

斯大林、莫洛托夫、拉夫连季耶夫

铁托、马尔科^①、科查^②、弗拉多^③、基德里奇、涅什维奇。

斯大林：“都是漂亮的人，强壮的人”。“坚强的人民”。

莫洛托夫点头表示同意。

斯大林：他问，我们一路上怎样。

铁托（说），很好……

斯大林（微笑着，讥讽地说）：“我的‘朋友’舒巴希奇怎样啊？”

铁托（也同样微笑、讥讽地）[说道]：他呆在萨格勒布。还有格罗尔。

斯大林（以同样的表情）：“那么我的‘朋友’格罗尔的情况怎样呢？”铁托（以同样的表情）：“他在贝尔格莱德……”

铁托：要随时制服他们，我们是有办法的。那些政党只是形式

① 马尔科是兰科维奇的化名。

② 即科查·波波维奇。

③ 即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

上存在，而事实上并不存在。事实上存在的只有共产党。斯大林对这一说法愉快地笑了。

斯大林：“收成怎么样？”

铁托：“会非常好。地种得很好。在那些缺粮地区也不错。不需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帮助。水果会有很多的。”

斯大林：“你们全都种上了吗？”

铁托：“全都种上了。”

斯大林：“你们的计划怎样呢？你们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来讨论呢〕？”

铁托说有经〔济〕和军事问题。

斯大林在整个过程中都说：“我们给予帮助！”

斯大林：“卡德尔和吉拉斯的情况怎么样？”

铁〔托〕：“很好。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来，即使这样，已经半个政府在这里了”。

斯〔大林〕：“英国人和美国人是不愿意把的里雅斯特让给你们的！”（微笑着说）

铁〔托〕：他对支持表示了感谢。〔说道〕，人民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致敬，〔他谈到〕〔苏联的支持〕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莫洛托夫：“但是的里雅斯特你们还没有……”

铁〔托〕：尽管如此，〔苏联的支持〕仍然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铁托……的过程中。

1946年5月27日23时

№03608

斯大林与铁托会谈的南方记录

(1946年6月9日)

续(8~9日夜晚, 1~3时之间记录)^①

一、斯〔大林〕：“我们方面曾经向你们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提出过一个建议，但既然你们不同意成立合营公司，既然你们不愿意，对此我们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比〔如〕，波兰人也不愿意，是因为美国方面没有提出成立合营公司的问题”。

铁〔托〕：“不，这既不是我的意见，也不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相反，我们认为〕，这是应该的”。

二、斯〔大林〕：“……我同意建立这些公司，正如你们……”。
(真〔洛托夫〕：“就在那些对你们和我们都最有利的部门……”)

斯〔大林〕想知道，我们这里石油、铝矾土的产地在什么地方。“你们有优质的铝矾土。”铁托解释说，产地很多，如博尔、特列普奇、拉沙，并说，我们有很好的煤，但不是供高炉用的焦炭。

三、莫〔洛托夫说〕，为了得到拉沙，意大利有一个经济上的理由，即如果没有拉沙，意大利只能满足自己需求的20%。

四、军队。

^① 这里是指6月8日至9日夜间。铁托是在6月10日结束访问的，据当时的报道，斯大林6月8日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全体成员。根据习惯，斯大林会在当天夜晚举行小范围的宴会。显然，这个记录是在宴会后追记的。不过，据参加会谈的科查·波波维奇回忆，这次谈话是在5月27日夜间进行的。

斯〔大林〕：“这是对的，如果发生战争，由于供应困难，在国内的军事工业应尽可能多一点。最好是发展航空工业，并重视铝矾土的产地，而对于炮兵部队来说，要在国内加工锻件”。

斯〔大林〕：“为了保卫沿岸一带，必须建立快速、轻便和灵活机动的艇队，因为意大利有相当强大的海军（大概有两个分舰队）”。

铁〔托〕：“……在科托尔湾^①，可以部署 30000 吨的战舰。”

斯〔大林〕：“现在都在生产 60000 吨的战舰了。可是，我们目前在建设舰队方面困难很大，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帮助你们。

我同意，我们帮助你们，为弹药工厂和轻射击武器工厂提供设备。同时，我们要派干部帮助你们，他们将帮助建立军官进修学校，这种学校过一两〔年〕可以成为学院（就像伏龙芝军事〔学院〕的级别）。

对南〔斯拉夫〕军〔队〕的供应，将在贸易条约之外，也就是说，以直接提供贷款的方式给予。

希望你们有一支海军，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将帮助你们建设造船厂和基地，以及培训相应的海〔军〕干部。

我们将帮助开采石油。

与弹药工厂的同时，重建军火库很重要，在这方面我们同样给予帮助。应该研究一下建设飞机发动机工厂的可能性。”

五、阿尔巴尼亚。

铁〔托〕（谈到海军问题）：“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与阿尔巴尼亚及沿岸一带地方是否存在边界问题”。

斯〔大林〕：“您的具体建议是什么呢？”

铁〔托〕：“应该缔结一个较好的协定，以此来帮助阿尔巴尼亚

^① 南斯拉夫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海湾。

人维护独立，这在有来自海军方面威胁的具〔体〕情况下，是会有帮助的”。

斯〔大林〕：“这是一个新的形式，不过需要考虑一下，并对此进行仔细的研究。你们与捷克签订了一个很好的协议，而且找到了一种很好的表达方式，即不仅反对战时的德国及其盟国，同时也反对其未来的盟国。^①因此需要再考虑一下，以便找到一个相应的表达方式。

对于联邦问题，现在不是时候（即使是与保加利亚）。现在主要的是关于的里雅斯特的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应该首先解决。但是，既然你们希望现在就签订协议，那么可以两件事情（的里雅斯特和阿尔巴尼亚）同时办”。（这时他微笑了）^②

铁〔托〕：“我们已经三次推迟了恩维尔·霍查的贝〔尔格莱德〕之行，因为我们考虑到同您的这次会见。总的来说，我们打算与阿尔巴尼亚缔结一项保障‘主权’的协议”。

斯〔大林〕：“您是否了解恩维尔？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是共产党员吗？他们内部是否也有一些问题，你们得到了什么情报？”

铁〔托〕：“我没有见过恩维尔·霍查，他是个年轻人，但在战争中已经开始出名了……

我们要签订一个协议，并为进一步完全的接近创造条件”。

斯〔大林〕：我同意。

铁〔托〕：“……总的说来，领导层中都是一些年轻人。据我们

① 1946年5月9日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友好互助合作条约，但没有提及德国战时的同盟者。条约中写的是：缔约国的双方，“如果其中一方由于德国试图恢复自己的侵略政策而处于与其余的敌对状态，或者与其他在侵略活动中与德国相勾结的国家处于敌对状态，那么，另一方将尽全力给予军事的和其他的援助”。

② 档案原件在这里有一个问号。

所知道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斯〔大林〕：“他们曾极力设法要到这里来，但不愿意让恩维尔一个人来，还有科奇·佐泽想跟他一道来，像是监督人员一样。对此你们知道些什么情况吗？”

铁〔托〕：“〔无论是这个问题〕，还是存在什么分歧的问题，我们的消息都不灵通”。

斯〔大林〕：“我们一再推迟他们来访的事。你们是怎么看的呢，是否有必要由我们来接待他们？我们觉得，没有必要”。

铁〔托〕：“是啊，我们是能够同他们一起解决各种事情的”。

斯〔大林〕：“现在，无论是对他们，还是对我们，都是不方便的。我们最好是通过你们来帮助他们”。

斯〔大林〕：随后他表示怀疑说，在阿〔尔巴尼亚〕政治局里好像有一些不正常。

马尔科：“政治局里有一些同志认为恩〔维尔〕·霍查不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党员，因为他经常坚持，要科奇·佐泽作为政治局里最老的一名党员，跟他一道外出。在4月全会上，他们讨论了路线问题，特别是南斯拉夫和苏联关系方面的问题，并查明了一些明显的错误，作为这些错误的代表者，谢伊富尔拉·马列绍瓦^①被开除出了政治局。从此，领导人之间就比较紧密了”。

铁〔托〕：“这个问题我们是能够和他们一起解决的”。

斯〔大林〕：“好”。

六、保加利亚。

斯〔大林〕：“现在你们是否值得同保加利亚搞联邦？”

铁〔托〕：“不，现在不是时候。因为有不少事情，他们做得还不是很彻底。比如，军队，一些资〔产阶级的〕政党，君主政体，

^① 马列绍瓦，谢伊富尔拉（1900—？），阿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领导经济工作、

还有签订和约之前的保加利亚的一些情况”。

斯〔大林〕：“对，不过应该帮助他们”。

七、匈牙利。

铁〔托〕：“我们没有任何领〔土〕的要求。自从那里内〔部〕的政〔治〕形势改善之后，我们放弃了领〔土〕的要求，这也是遵照了您的建议。”

斯〔大林〕：“对呀。如果你们与北〔方〕邻居关系良好，那么，即使希腊也会对你们另眼相看……可是，希腊在与南斯拉夫关系方面是否提出了什么要求吗？”

铁〔托〕：“在与我们的关系方面，曾经发生过多次挑衅行为，但近来没有”。

斯〔大林〕：“英〔国人〕在那里保持着军队，目的在于巩固反动势力，是啊，可能，还有其他目的”。

铁〔托〕：（笑了起来）：“在对他们的关系方面，我们有一些要求，即爱琴马〔其顿〕和萨洛尼卡^①”。

莫〔洛托夫〕：“对，萨洛尼卡，一个古老的斯拉夫城市。应该出现在爱琴海。”

斯〔大林〕：“真见鬼。有好多同志都到保〔加利亚〕去了，可是在那里应该进行的没有进行，应该发展的没有发展。共〔产党员〕是有影响的，但是在国〔家〕机关中，他们没有相应的地位。

由此，我们应该向他们指出，希望他们把斯塔伊诺夫^②撤了。现在，我们在那里的外交部只有一位秘〔书〕”。

① 马其顿地区位于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南临爱琴海。1913年巴尔干战争后分属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希腊三国，分别称瓦尔达尔马其顿、皮林马其顿和爱琴马其顿。萨洛尼卡，即塞萨洛尼基，希腊爱琴马其顿境内的爱琴海港口城市。

② 斯塔伊诺夫（1890-1972），1944-1946年任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外交部长。

铁〔托〕：“以后我将向拉科西说明一下，由于战略的原因，我们需要佩奇^①，同时要帮助匈〔牙利〕的共产党人，因为反动势力正在开始抬头”。

斯〔大林〕：“难道他们会相信你们吗？……”斯〔大林〕：“那么，今天晚上你们还有什么进一步的计划吗？”

铁〔托〕：“我们没有〔计划〕了”。

斯〔大林〕（笑）：“一个没有国家计划的政府！”（笑）

弗拉多：“同您会面，我们就听从您的安排了”。

斯〔大林〕：“那么我们可以吃点东西了”。

莫〔洛托夫〕：“既然您邀请我们，那太高兴啦。”

在别墅里

斯〔大林〕：关于陶利亚蒂^②，〔他〕是个理论家，新闻记者，会写一手好文章，是个好同志，但是要把人们团结起来，并为他们“指明方向”，这却不行，那里的条件很困难。

多列士和杜克洛都是好同志^③。

何塞（迪亚斯）^④是个好人，是个聪明人。

帕西奥纳丽娅^⑤就不是这样，她不能团结和指挥别人，在当

① 指匈牙利南部临近南斯拉夫的佩奇市。

② 陶利亚蒂，帕尔米罗（1893～1964），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

③ 多列士、莫里斯（1900～1964），法国共产党总书记。杜克洛，雅克（1896～1975），法共中央书记，是当时领导层中的第二号人物。根据参加会谈的科查·波波维奇回忆，斯大林谈到这里时还说：“多列士有一个很大的缺点：甚至一条不咬人的狗，在想吓唬人的时候也会露出牙齿，而多列士连这一点都不会。”

④ 迪亚斯，何塞（1895～1942），1932年起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后在苏联去世。

⑤ 即多洛雷斯·伊巴露丽（1895～1990），在何塞·迪亚斯去世后成为西班牙共产党的总书记。

前困难的情况下，她也没有领导能力。

罗马尼亚有一些很好的年轻的同志。

在联邦德国，皮克^①是一位好领导，是一位“老大爷”，他把人们团结起来，解决各种问题。……没有命令，德国人就不算什么了。

共产国际——没什么好说的^②。

全民投票——“也不值得一提^③”。

战斗的各族人民，应该把希腊人吸引过来。^④

“你们是否希望再来一次战争，再次落到你们的身上，叫斯拉夫人再丧失千百万人呢？如果你们不希望的话，那么，斯拉夫人就应该同苏联结成统一战线。”

意大利有复仇的想法。

贝奈斯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当你向他显示出力量的时候，他是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他自我觉得是个强者时，他便是个理想主义者（这是对铁托〔意见〕的回答：贝奈斯是英国的奴仆，但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费林格^⑤是会跟共产党人走的”。

捷克-波兰关系：捷申问题作为选举前的一种策略，已经证

① 皮克，威廉（1876~1960），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46年4月，苏联占领区的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德国统一社会党，他是德国统一社会党两位主席之一。

② 斯大林曾对保加利亚人说过：“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恢复旧形式的共产国际”。在后来同铁托的谈话中，斯大林提出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

③ 1946年9月1日希腊将举行是否实行君主立宪制问题的全民公决。

④ 当时希腊国内政治斗争非常尖锐，1946年下半年，在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支持和援助下，希腊共产党组织了反对希腊政府的武装起义。

⑤ 费林格，兹德尼古（1891~1976），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在共产党的支持下出任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副总理、总理。

明，在此之后他们并未采取任何外〔交〕的措施^①。

南〔斯拉夫〕的民主是一种特殊形式（非苏联形式），这一形式有别于其他所有的形式。

“我们是塞尔维亚人，我和莫洛托夫……我们是两个塞尔维亚人……”

“出卖灵魂的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

桉树^②。

“但愿铁托多加保重，希望他不会有什么二长两短，……因为我将不久于世了……生理的规律……，可是你将为欧洲活下去^③……”

丘吉尔向他讲述了有关铁托的情况……说他“是一个好人”。斯〔大林〕说：“我对他不了解，但既然您说了，那就是说，他应该是一个好人。我尽力去了解他吧^④”。

让德口多来吧，希望他来休息，他有……“我会医好他的头痛

① 1946年4月24日，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向各大国提交声明，正式提出了对波兰边界地区，即捷中的西里西亚的领土要求。由于捷中所引起的捷波争端到1946年4~5月，即捷克斯洛伐克战后第一次选举的前夕，已经达到了顶峰。选举是在5月26日，即斯大林会见铁托的前一天进行的。在苏南会谈中，捷中问题显然是南斯拉夫客人提出的，因为在铁托赴苏前，波兰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曾请求他劝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放弃它所提出的领土要求。

② 斯大林劝告南斯拉夫人种植桉树，因为这是造船的最好材料，斯大林还答应送给南斯拉夫一些桉树苗。

③ 根据参加会谈的科舍·波波维奇回忆，在午夜会餐时，斯大林站起来走到唱机前，开始一张盘接一张盘往里放，都是俄罗斯民歌。听到其中的一首歌，斯大林开始边舞边唱起来。莫洛托夫等人都用喊声迎合，并说斯大林身体的强壮。斯大林回答说，这是生理发展的规律，他将不久于人世。斯大林又补充说，铁托应该爱惜自己，他将为欧洲而活下去。

④ 这是斯大林在回忆1944年10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访问莫斯科时的谈话内容。1944年8月丘吉尔曾与铁托见过面。实际上，斯大林在与丘吉尔谈话之前已经与铁托认识了，铁托曾于9月底秘密访问过莫斯科。

病的”。^①

“贝文是英国的诺斯克^②”。

弗拉多询问马尔科的情况，随后马尔科又询问弗拉多的情况。

……

“贝利亚和马尔科——谁将招募谁呀^③？”

① 德日多是吉拉斯的化名。斯大林从铁托那里知道吉拉斯有头痛病。

② 贝文，欧内斯特（1881-1951），英国工党和工会领袖之一，1945~1951年任外交大臣。古斯塔夫·诺斯克（1868~1946），德国右翼社会党领袖，1919年1月率军镇压基尔水兵起义和革命运动，并秘密杀害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后任政府国防部长。

③ 贝利亚，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1899~1953），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斯大林在孔策沃的餐桌上享贝利亚和兰科维奇开玩笑，因为他们俩人在国内都是主管安全机构的。苏联方面出席午夜宴会的，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外，还有日丹诺夫、贝利亚、布尔加宁。

No07833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菲京关于南人民阵线 内反对派活动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6年6月30日)

分送：安·维辛斯基

绝密

致苏斯洛夫同志^①

现将我们得到的关于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内反对派分子活动问题的材料报告如下。

今年4~5月份，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内反对派分子的活动进一步活跃。根据现有的材料，领导这一活动的是人民农民党领袖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他企图在人民阵线内建立一个由不满铁托政府政治路线的所有分子组成的集团。最近，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把除了本党右翼以外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农民党和农业党的某些活动家拉到自己这一边。

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及其追随者认为，利用议会作为其派别活动的合法舞台是他们活动的任务之一。作为在这方面的活动之一，约万诺维奇在今年5月同克罗地亚共和国农民党和农业党中有敌对情绪的代表达成了关于在议会成立一个名叫“农民党代表俱乐部”的集团的协议。1946年5月23日，举行了该集团纲领的签字

^① 苏斯洛夫，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1892~1981），时任苏共中央书记。

仪式。纲领的内容如下：

“一、我们建立农民党代表俱乐部是为了在整个联邦和每一个单独的共和国中保持和发展人民斗争的成果，保护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制定出建立在社会公正、自由和人道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农民意识形态。

二、参加我们俱乐部的只能是接受这一纲领的代表。

三、我们打算尽一切努力建立一个有统一领导的南斯拉夫统一农民党”。

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及其支持者代表人民农民党，图纳·巴比奇代表克罗地亚共和国农民党，斯帕索斯·德米特罗维奇代表农业党，以代表小组的名义在纲领上签了字。

П. 菲京

1946年6月31日^①

^① 档案文献原文如此，根据文献排列位置，疑为30日之笔误。

№07820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反对派活动 等问题的谈话（摘录）

（1947年4月2日）

摘自 A. И. 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费·古谢夫、A. 拉夫里舍夫，归档。

一、我提及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波波维奇、菲拉科维奇和托多罗维奇在3月29日南斯拉夫人民议会会议上的发言，指出反对派是在公开地使乡村与城市相对立。铁托说，他确信，这个发言恰恰满足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要求。据他新掌握的情报，约万诺维奇本来并没有打算发言，只是到了3月29日，即发言的当天，才决定发言的。

按照铁托的话说，容许约万诺维奇集团进行活动，在当前可能会招致科舒季奇、舒巴希奇等集团更加积极起来活动。此外，铁托推测，美国人和英国人将努力促使各反动集团积极活动起来。因此，铁托打算逮捕德拉戈留布·约万诺维奇及其亲近的同谋者，因为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把他们关起来。人民支持逮捕约万诺维奇并把他交法庭审判。通过国内现有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两个农民政党（统一农民党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农民党）将可影响农村，把握住应有的方向。

今年由于粮食征购，富农的抗拒行为大为增加。有意思的是曾经发生了一些富农为抗议粮食征购而自杀的事件。本来还需要征购15万吨，不过这里包括有一定的储备。全国食用将需要7~8万吨。据铁托断言，国家能够勉强度日。他再次强调说，塞尔维亚政府去年夏天和秋天曾试图证明按原定计划完成收购任务是不可能的，从而犯了严重的错误。而现在，在经过严肃的批评之后，塞尔维亚的领导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开始从那些已经无力再上缴粮食的人那里征购粮食，从而又发生了严重的过火行为。铁托已经指示要更加谨慎地执行粮食征购政策和必须确实是向没有完成缴售任务的富农户征购谷物。铁托已下令把富农们没有完成的缴售任务视为必须从今年的收成中清偿的欠缴税款。

铁托强调说，现在对春播秋种十分重视。各地都成立了不仅负责监督新有耕地全部犁过一遍，而且要确保其深耕细作和精心播种。他不排除富农们有可能进行怠工和故意不好好播种。燕麦和马铃薯的种籽供应将遇到困难。马铃薯已经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购，预计近日内应当运抵南斯拉夫。玉米种籽足够播种所需。

二、铁托告知我说，美国人提出要把监督勘定意大利—南斯拉夫临时边界四方委员会的工作也扩展到临时勘定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疆界。按照同意大利签署的和平条约第5条，是有正式理由可以拒绝这一建议的。我问铁托，南斯拉夫政府对美国的上述建议意见如何。

铁托回答说，按照他的初步意见，把四方委员会的工作扩展到勘定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临时疆界是不适宜的，因为现在尚不存在一个该区域的政府。他想先弄清楚需要移交的伊斯特拉西北部的情况，然后再给予确切的答复。

说到这里，铁托指出，南斯拉夫当局已着手拆卸沉没的意大利船只《列克斯》号。南斯拉夫可以拆下该船全部有价值的设备，但

却未必能对船体本身有所作为，因为它深深地埋在淤泥之中。……

四、在谈到斯大林同志对拉津的信的答复^①时我提到了哈莫维奇在驻萨拉热窝第6集团军的一次图上作战演习期间所发表的意见。我指出，哈莫维奇把苏联军事条令说成是公式化的，并强调说，在采用红军的条令时倘若不加以正确的指导，将会全军覆没。哈莫维奇宣称，南斯拉夫军队应当研究其他外国军队的作战艺术，但他却只字不提研究苏联军队经验的必要性。对苏联军事条令的批评引起一些南斯拉夫军官对苏联军事学说的批评。例如，在1月份举行的一次军队会议上就已经提出，南斯拉夫应当有自己的军事条令，应当创立自己的军事学说。

铁托回答说，有人告诉他说，我们的军事顾问们对哈莫维奇的讲话很关心。他本人没有同哈莫维奇交谈过，但打算跟他谈谈。铁托认为哈莫维奇批评的不是苏军的条令，而是批评公式化地运用条令规定而不考虑山地作战环境特点的那些人。铁托评价哈莫维奇是一位谦虚的将军和热爱苏军的人。

铁托接着说，南斯拉夫军队只能向苏军学习。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自己的军事学说，德国人倒是有过，但是南斯拉夫人不能借鉴这一学说。南斯拉夫军队研究过并且将继续研究苏军的经验。不言而喻，南斯拉夫人同样也应当研究自己山地作战的经验。说要创立南斯拉夫军事学说的那位军人自己也未必懂得这个词的意义和内容。铁托认为，从内部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南斯拉夫军队有某些特点。军队中有政治委员，因为军官们没有受到过做政治工作的培训。党组织在维护军纪和掌握作战艺术的工作中起着

^① 指1946年2月25日斯大林对拉津上校和教授1946年1月30日来信的答复。拉津在信中提出了列宁的现实主义原理的问题，并建议用提纲的形式表达自己对战争和战争艺术的思想。

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当时就对哈莫维奇讲话的看法问题同铁托进行争论是不适宜的（显然，铁托是根据总参谋长波波维奇向他提供的报告做出自己的评价的）。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夫人已经给自己做出了相应的结论。虽然如此，但我还是指出，党的组织在苏联军队中过去起过，现在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为我们红军的历史所证明。我们现在没有设政治委员，但是没有政治副职，这是符合一长制原则的。

铁托抱怨说南斯拉夫总参谋部想尽办法也未能从苏联得到《军事思想》杂志。铁托曾两次重提此事并要求能给他本人寄一份这种杂志来。他特别希望一读的就是这份探讨军事战略方面极其重要的问题的杂志。我答应把他的要求报告莫斯科。

五、我问铁托，据他看，已开始播音的南斯拉夫秘密广播电台位于何处。他回答说，最大的可能是在意大利，也可能在英国。按照铁托的说法，南斯拉夫的居民并不收听该台的广播……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 拉夫连季耶夫

№ 07821

拉夫连季耶夫与卡德尔关于参加 马歇尔计划问题的电话记录

(1947年7月4日)

摘自 A. И. 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A. 拉夫里舍夫，归档。

卡德尔给我打来电话说，鉴于各方向的新闻记者和外交官纷纷询问南斯拉夫在详细拟定美国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措施方面今后的立场，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发表一项声明。在此项声明中南斯拉夫政府打算指出：南斯拉夫不能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参加拟定这样的计划，因为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建议是试图建立一种允许某些大国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并使小国的经济依附于这些大国，进而使小国丧失民族独立。卡德尔请求把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政府准备发表的上述声明的意见告知他。卡德尔同时指出，最好能在今天晚上就得到答复，因为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在明天发表这一声明。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 拉夫连季耶夫

№07822

拉夫连季耶夫与卡德尔关于南斯拉夫 干部政策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7年7月6-7日)

摘自 A. И. 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A. 拉夫里舍夫，归档。

我在前往会见铁托的途中同卡德尔进行了交谈。

在谈及各人民共和国议会目前的人员组成情况时我向卡德尔，在议会中有多少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代表。卡德尔回答说，这样的代表数量不多。他认为，按选举法编制的议会组成人员很少，这是一个错误。在通过各共和国选举法的时候，他（卡德尔）当时不在南斯拉夫国内，因而没能以某种方式就这个问题及时同铁托商讨并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当时开始实际草拟本屆人民议会代表候选人名单的时候，就发现留给一线工人的代表名额太少了，因为当时需要把必要数量的席位提供给政府成员、党的领导人员、军队的代表以及其他党派。卡德尔认为，在下一一次选举中此情况将得到纠正。

卡德尔认为今年秋季或者冬季将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将选出一个党纲党章起草委员会。卡德尔说，当前共有党员40万人左右。现在主要是通过接纳工人入党来壮大党的队伍。从前的情况曾经是：在拥有1500~2000名基本工人的工厂里党支

部只有 20~30 人。现在情况正在改善。

据卡德尔称，正在认真采取措施以大力加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和各地方党委员会机关。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成人员没有增添。但是在审议重要问题时可以邀请将来有可能被吸收进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参加。茹约维奇只是中央委员，但不是政治局委员；乔拉科维奇不是中央委员；米雷·马林科是中央委员；巴卡里奇不是中央委员；涅什科维奇不是中央委员；莫萨·皮雅杰是中央委员。

卡德尔负责对外政策问题，同时也主管国家机关的建设问题；兰科维奇主管党的干部和党的机关的组织工作问题；吉拉斯负责宣传鼓动以及文化、教育问题。在基德里奇被任命为经济委员会主席之前，卡德尔曾用很多精力处理经济问题。现在负责此项工作的主要是基德里奇。

卡德尔预计，今年秋天将对政府各部进行某些改组。例如，矿产工业部将分为燃料工业部和冶金工业部。巴涅·安德烈耶夫将留任燃料部部长，而基德里奇有可能在继续担任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情况下同时又被任命为冶金工业部部长。将组建电气化部。彼得罗维奇将被任命为该部部长，他在从莫斯科返回后将被免去对外贸易部部长职务。据卡德尔说，彼得罗维奇没能确保对外贸易的必要开展，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仅完成了外贸计划的 40%。该部的部长助理斯尔曾蒂奇也将被撤换。塞尔维亚监察委员会现任主席米伦杰·波波维奇将被任命为对外贸易部长。

卡德尔接着说，外交部仍然是一个工作很不得力的部门。西米奇无力对该部实施必要的领导。他是一名忠诚可靠的外交官，但是他缺乏治国方面的领导经验。现任克罗地亚总理巴卡里奇本来是这一职务的合适人选，但是他的健康状况使他难以胜任此职。其他具备条件的现成人选眼下还没有。我指出，我头脑里形成的印象是西

米奇工作干了很多，而且尽心竭力，忠于职守。卡德尔同意我的看法并补充说，实际上由于尚无合适的人选，近期内也未必会实施这样的撤换。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拉夫连季耶夫

№07823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阿—南争论 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7年8月14~15日)

摘自 A. M. 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A. 拉夫里舍夫，归档。

、在我同铁托在布尔多进行的交谈中，铁托对我说，在阿尔巴尼亚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之后，某些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对南斯拉夫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并且错误地评价南斯拉夫对阿奉行的友好政策。某些人在说，南斯拉夫企图以低廉的代价染指阿尔巴尼亚，说南斯拉夫许诺的非常多，但是实际上却任何东西都不给。其实南斯拉夫之所以对阿尔巴尼亚表现出关注之情，也是从阿尔巴尼亚人民本身的利益出发，力求维护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南斯拉夫视阿尔巴尼亚为地理上和军事战略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地方。曾经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其中有货物，也有粮食，尽管南斯拉夫的反动势力积极利用这些措施来反对南斯拉夫政府。

铁托对纳科·斯皮鲁的立场表示特别不满，他认为此人在奉行使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政策。去年，纳科·斯皮鲁在南斯拉夫逗留期间曾经诋毁过恩维尔·霍查。可是现在他却又同恩维尔·霍查紧紧地搞在一起。在去年，铁托曾对阿尔巴尼亚人说，恩维尔·霍查作为党的总书记，应当有与之相应的地位，也就是说，铁托曾

帮助加强他的地位。铁托并不认为恩维尔·霍查是个耍两面手腕的人，但是据他的印象，霍查很容易受他人的各种影响。铁托认为最坚定的和始终如一的领导人是佐泽。据铁托掌握的情报，在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之间，工作中缺乏必要的步调一致。

铁托认为不可以让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国之间产生不和。因此他认为非正式地邀请恩维尔·霍查和佐泽来南斯拉夫并同他们就此事进行交谈是适宜的。依照铁托的意见，应当向恩维尔·霍查和佐泽指出，不能把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看成是苏联希望阿尔巴尼亚疏远南斯拉夫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应当将其视为是对两个邻国之间亲密关系的促进。在这次会晤期间，铁托打算向阿尔巴尼亚人建议解除斯皮鲁的职务。毫无疑问，由于一些领导人对南斯拉夫采取的不友善政策，对南斯拉夫的不满情绪也将在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某些阶层中表现出来。关于这一点，铁托那里有一份由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代表提供的书面报告。

铁托请求告知他，苏联政府对拟议中的他同恩维尔·霍查和佐泽的非正式会晤一事的意见。

我答应将这一请求转告莫斯科。

二、我问铁托，粮食收购工作进展如何。铁托回答说，粮食收购计划虽然现在即将完成，但是富农阶级已经开始表现出政治性的抗拒。在伏伊伏丁那日前不得不采取行政措施——逮捕某些富农分子并处以罚金。

交谈时在座的斯洛文尼亚总理马林科说，在斯洛文尼亚，富农分子的抗拒表现为富农们不是一次缴清规定缴售的粮食，而是竭力拖延，尽管在数量上他们的缴售额并不很大。为了显示自己的抗议，某些富农故意少缴售二三公斤，甚至是一公斤。

二、据铁托告称：在克罗地亚，有四名天主教神父因为参加恐怖组织而被判罪。其中有两人被枪决。

四、10月2日将召开南斯拉夫民族阵线代表大会。铁托正在准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他打算申明：考虑到南斯拉夫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民族阵线之外不能存在其他政治性党派。

在民族阵线代表大会之后，在冬季，将召开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大会。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 拉夫连季耶夫

№07825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整理的
关于南斯拉夫现状的备忘录（摘录）^①**

（1947年9月）

……南斯拉夫共产党组织上的建立，是在1919年4月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前社会—民主组织联合代表大会上。到1920年底，共产党已经拥有约8万名党员，并且拥有联合了近20万人的、在其影响下的革命工会组织。在1920年的立宪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得到了59个议员席位。

同年12月政府颁布命令取缔共产党和革命工会。自那时起至1941年，共产党一直处于地下状态，其成员均被罚以20年的苦役。由于党的领导层内渗入了工人阶级的敌人，在很长的时间里党内不断发生派别斗争。

1937年底，以铁托同志为首的一批新人走上了党的领导岗位，从而使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工作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党的新领导人成功地消除了派别斗争，在民族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路线，防止了党的崩溃。进行了清党，清党后到1938年底党员总共只剩下3500人。在随后的数年中，党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大大加强了。

^① 该报告是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为日丹诺夫在九国共产党波兰会议发言而准备的备忘录的一部分，标题为：《南斯拉夫经济与政治现状》。类似的关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材料还有一些。在这些材料中，对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是日丹诺夫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没有出现对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批评。

到民族解放战争前夕，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已经更加巩固壮大，在自己的队伍中已经有近 1.2 万党员。尽管人数不多，但共产党却是直至国家被德国人占领之前，一直在组织上保持为统一整体的唯一政党。

共产党同占领者和本国叛徒进行的英勇、忘我的斗争，它的反映劳动者利益的正确路线，确保了它在民族阵线中的绝对领导和在南斯拉夫人民广大阶层中的无可争议的威望。共产党乃是南斯拉夫人民公认的领导者。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家中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它在对待参加民族阵线的各党态度方面采取了独特的策略方针。它努力使民族阵线成为这样一种组织形式，使党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影响来掌握居民的广大阶层。所有关于管理国家的原则性指示均按民族阵线的组织系统下达执行。在整个战争时期以及在战争结束之后，在领导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方面，没有发布任何一项共产党的决定。

在南斯拉夫未公布过有关南斯拉夫人民议会和南斯拉夫政府中党员所占比例的材料。根据非正式的材料，在南斯拉夫议会中议员席位的 70% 以上是属于共产党员的。各共和国议会的绝大多数席位也同样为共产党员所占据。

南斯拉夫共产党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把全国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以及南斯拉夫军队中的所有重要岗位均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南斯拉夫政府中，共产党人领导着以下各部：总理兼国防部长——共产党总书记铁托；第一副总理兼监察委员会主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爱德华·卡德尔；内务部长——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书记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工业部长兼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鲍里斯·基德里奇；财政部长——中

央委员会委员斯雷滕·茹约维奇^①；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部也是由共产党人出任部长的。非共产党人部长通常都配有一位共产党人作第一副部长，此人为自己所在部的活动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负全责。

在所有共和国（没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除外）共产党的第一书记都是该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在州、区、乡镇各级政权机关和民族阵线委员会中的领导岗位也均为共产党人所占据。统一的南斯拉夫工会组织、南斯拉夫人民青年和南斯拉夫妇女反法西斯联盟等组织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

这样，南斯拉夫共产党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党员实现对国家的全部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领导。南斯拉夫政府的政策也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

目前共产党总共拥有约30万党员。这种党员数量较少的情况，其原因是由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接纳新党员入党非常谨慎，严格执行个别挑选的原因。考虑到在共产党的社会成分方面目前是农民和知识分子占据多数，故现在特别注重吸收工人入党。

在战争年代，共产党遭受了巨大损失。在同占领者及其帮凶的战斗中牺牲了2名政治局委员，5名中央委员和近2.5万名共产党员。

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建设的，党的组织遍及整个国土。党在组织上是按以下序列构建的：在村镇、机关和企业有基层组织。然后是市、区、州或省级组织。

除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设有省委员会之外，在每一个共和

^① 茹约维奇，斯雷滕（1899—1976），1922年加入南共，战后任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南斯拉夫财政部长。1948年因赞成苏联立场被逮捕入狱。1950年1月，茹约维奇表示悔改后被释放，并任南斯拉夫经济研究所所长、《战斗报》新闻出版社经理。

国均有共和国一级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有的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和波斯尼亚省委员会均隶属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最高机构是党的代表大会。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共产党的活动同政府的活动交织在一起，故在党的组织中缺乏旨在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加强共产党自身的、充满生机的党的工作。

组成人员数量极其有限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目前只有不超过 13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举行定期的会议，也不做出书面的决议。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情况也是如此。领导国家方面的所有重大原则问题均在很窄的圈子内决定（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吉拉斯）。

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组成党的领导机构已经十分必要，但是南斯拉夫同志自战争结束后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仍然未能采取这一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加强党的重要措施。

共产党拥有人量在所有人民共和国出版发行的报纸和杂志。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战斗报》在贝尔格莱德出版，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和最普及的一家报纸。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全都出版自己的报纸。此外，各共和国民族阵线委员会也都有自己的报纸。所有出版发行的报纸以及南斯拉夫所有的定期刊物，统统处于共产党的监督之下。

考虑到党员的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在战争年代入党的，因而没有受到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正在进行大量的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在国内开设有中央党校，目前在学人员有 120 人，基本上都是州、区级党委会的领导工作人员。学习期限为一年。在下一个学年学习期限将改为两年。

每一个共和国的党中央委员会都下设一个党校，其学习期限为六个月。这些学校还设有函授部，它们均有大量的学员。

在各地中心和大城市还开办有学习期限为三个月的党的夜校。在这些夜校里学习的是来自各地区组织的党员骨干分子。其他所有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员均参加了各种小组和学习班的学习，同时也通过自学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

但是直到目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工作中的主要困难依然是共产党人的理论修养不够。某些政权机关和经济机关所犯错误中，大部分首先是由于负责领导工作的党员政治修养不足。在国家的政治发展与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当中的思想工作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脱节现象。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应加强在南斯拉夫人民，首先是在知识分子中间的思想工作。

* * *

在谈到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巩固国家民主制度方面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不能不指出，共产党领导人的某些过高评价自己成就的倾向和把南斯拉夫共产党摆在巴尔干地区某种“领导”党地位的意向。

在解决涉及对外政策执行方面的一些问题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某些领导人有时不顾及其他国家和兄弟党的利益，表现出民族的狭隘性。

为了证明这些结论，可以指出如下一些事实：

例如，南斯拉夫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采取错误的立场，而无视民主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同英美两国进行斗争的共同利益。在这方面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南斯拉夫报刊上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活动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同志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尖刻批评。

1946年11月保加利亚宪法草案公布之后，南斯拉夫报纸（有理由认为这是按照共产党的指示进行的）对保加利亚的宪法草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德尔的助手、共产党人格尔什科维奇在1946年11月14日《战斗报》上指责保

加利亚政府侵害了马其顿民族的民族权利，他写道：

“很明显，这样一种安排……与真正以民主方式解决民族问题、与任何民族都享有的自决权和民族统一的权利毫无共同之处”。

南斯拉夫报刊的这一批评被保加利亚社会舆论看做是企图干涉保加利亚的内政。

去年12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谈期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卡德尔同志和兰科维奇同志曾对保加利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契尔文科夫说，他们不相信保加利亚工人党（共）并且认为该党在马其顿问题上的方针是错误的。他们（南斯拉夫领导人）把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中央委员会的这种行为看做是追求在巴尔干地区发挥领导作用。

南斯拉夫政府尽管已经同阿尔巴尼亚签署了友好互助条约，但是在整整一年的过程中一直没有履行该条约的条款，没有向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提供经济援助。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对阿尔巴尼亚渴求同苏联建立直接联系十分妒忌，他们认为，阿尔巴尼亚只能通过南斯拉夫政府同苏联保持联系。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对待苏联的不友善态度的实例是：南斯拉夫政府拒绝在1946年12月接待苏联军队歌舞团——尽管派歌舞团去南斯拉夫当初是应他们邀请的。

上述这些以及其他一些事实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某些领导人存在着不健康的倾向。

* * *

南斯拉夫共产党在苏联的多方面援助下，克服了内外困难，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国家的事业中取得巨大的成就。

在评价南斯拉夫共产党所走过的道路和该党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时，共产党政治局委员、计划委员会主席赫布朗同志说：

“我应该说，我们的成就并不仅仅是我们党的功劳。我们所取得这些成就也要归功于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直接帮助把我们党提高到了它现在所处的水平，赢得了它现在所处的地位。他直接帮助我们粉碎了我们党内的帮派，帮助我们达到了党的队伍的团结统一。他帮助我们从党内清除了孟什维克分子了。他帮助了我们，我们为党实现了布尔什维克化而感谢他。”

南斯拉夫共产党依靠苏联的强有力支持，正在勇敢地、满怀信心地领导自己的人民沿着使国家进一步民主化、维护自己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独立和加强其防御能力的道路向前迈进。

No078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同东欧各国
签订互助条约问题给外交部的指示**

（1947年10月14日）

秘密

批准关于同东欧各国签订互助条约问题给外交部的如下指示：

一、首先应确保在东欧小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之间签订互助条约，在此之后再签订苏联与上述国家中那些尚未与苏联签订此类条约的国家之间的互助条约。

二、支持这样的建议，即拟议中的东欧小国之间的互助条约出发点应当是互相支援，以反对来自任何国家的侵略的义务，而不仅仅是反对来自德国及与之共同推行侵略政策的国家的侵略。

三、如果在上述国家中的这些或者那些国家之间不能就签订符合第二项内容的互助条约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则应另行研究签订互相支援条约的问题，该条约旨在反对德国及其他直接或间接以任何别的形式与之共同推行侵略政策的国家的侵略。

№07481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情报局 会议后南斯拉夫反应的调查报告

（1948年1月28日）

1948年1月28日19时30分收到

秘密

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决议对南斯拉夫 加强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

莫斯科

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文件在中央的各刊物，首先在共产党机关报《战斗报》发表（1947年10月5日）了，从10月6日到11日又发表在所有南斯拉夫的刊物上。

这个时期所有南斯拉夫的刊物都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之下，广泛阐述国外刊物对协商会议决议的反应。

1947年10月8日《战斗报》报刊登了米罗凡·吉拉斯题为《关于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情报协商会议》的社论。在这篇文章中，吉拉斯阐述了在日丹诺夫的报告^①中所涉及到的所有重要问题，

^① 日丹诺夫，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1896—194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在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上日丹诺夫代表联共（布）做主题报告。

以及协商会议文件中所反映的问题。吉拉斯在文章的结尾指出：“南斯拉夫人民可以引以自豪的是，他们的首都将成为各国共产党进行反对新的战争挑唆者和他们走卒斗争的协商和决议的地方”。这篇文章曾在南斯拉夫大多数报纸上转载。

1947年10月22日《战斗报》报发表了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随后南斯拉夫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日丹诺夫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决议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热烈欢迎。所有的南斯拉夫报纸和杂志，以及南斯拉夫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家们，都发表文章和演说，高度评价决议是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重要文献。

比如，在今年1月9-10日召开的南斯拉夫统一工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中写到：“南斯拉夫统一工会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欢迎成立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和情报局，它的决议表明全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向联合的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这是对帝国主义新战争挑唆者的重大打击”。

1947年10月11日，属于人民阵线的农业联盟党召开的全体会议通过宣言，表示欢迎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并完全赞同它的决议。宣言中写到：“我们的人民站在以苏联为首的所有热爱自由的民族一边，与世界进步力量一起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挑唆者的斗争”。

所有加入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政治团体和社会组织都表示完全赞同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决议。现在这些决议是南斯拉夫主要的外交政策。

1947年11月底召开的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它完全符合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决议。决议中强调，南斯拉夫人民一致支持在联合国会议中加强苏联代表团的力量，加强

南斯拉夫和其他代表团，维护和平事业和大、小国家的民族主权，反对战争挑衅的活动。

通过宣传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决议，促进了南斯拉夫人民的统一，加强了南斯拉夫人民在人民阵线和共产党周围的团结。现在南斯拉夫人民已将全部精神和物质力量，投入到完成南斯拉夫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之中。对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总结表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南斯拉夫工业五年计划第一年的计划完成了106%。

进一步巩固和增强了南斯拉夫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南斯拉夫人民一致欢迎和赞同苏联代表在国际会议上的工作。南斯拉夫报刊广泛评述了苏联实行的财政改革和废除票证供应的办法，强调苏联人民所取得的重大经济成就。

在南斯拉夫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30周年纪念活动。在评述莫洛托夫去年11月6日庆祝大会上的报告时，《政治报》写道：“莫洛托夫的朴实而具有极大说服力的报告表明了十月革命巨人的历史意义，……描述了苏联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的重要因素，指出了以列宁和斯大林所在国家为领导地位的当今国际形势的各主要方面”。

南斯拉夫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完全符合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宣言的原则。为补充以前签订的协议，南斯拉夫政府最近又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签订了友好相互条约。由于签署这些协议，南斯拉夫现在已与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所有新民主国家正式确定了人民之间紧密的友好关系。

南斯拉夫这些民主的对外政策引起美国和英国方面的极端仇视。他们采取一切措施对南斯拉夫的政治和经济施加影响。在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和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以后，英美在对南关系政策上非常无礼和敌视。

政治上没有可能影响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英美分子便极力给南斯拉夫造成经济上的损害。为此，美国政府至今未取消对存放在美国的价值 5600 万美元南斯拉夫黄金的管制。

英美统治集团向地中海派出了海军陆战队和战舰，企图恐吓南斯拉夫政府。

为了不让南斯拉夫承认马科斯将军的政府^①，英美政府愚蠢地警告南斯拉夫，说“承认马科斯政府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英美分子力图进一步控制的里雅斯特，保存自己在那里的驻军，以便以此影响南斯拉夫政府。

为此他们拖延委派的里雅斯特的省长，因为委派了省长就意味着的里雅斯特作为自由区政府委员会的成立，英美部队就将从与南斯拉夫接壤的的里雅斯特地区撤出。

对于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干预他国对外政策的企图，南斯拉夫政府做出了勇敢而自信的反应。

运用九国共产党代表协商会议资料，南斯拉夫政府坚决地揭露了“马歇尔计划”的卑鄙企图，集中力量带领南斯拉夫人民完成五年计划，尽可能地增强国防力量和国家的独立自主。

B. 列萨科夫

^① 1946年初，希腊共产党决定组织新的武装斗争。1947年12月希腊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军宣布正式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民主军总司令马科新任总理兼军事部长。

No 07484

莫洛托夫与卡德尔关于铁托访苏和 贷款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8年2月13日)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日记

绝密

发送：约·斯大林、拉·贝利亚、安·日丹诺夫、格·马林科夫、阿·米高扬、尼·沃兹涅先斯基、安·维辛斯基、瓦·佐林。

今天我叫来卡德尔同志，通知他对一些问题的答复，这些问题是他2月11日与我谈话时提出来的。

一、关于铁托的莫斯科之行。

我告诉他，斯大林同志和其他同志都很高兴与铁托同志会面，时间按卡德尔讲的在3月或4月。

我们讲好，来访的具体时间以后再定。

二、关于南斯拉夫申请军需品供应和南斯拉夫军事工业的供应品。

我告诉他，苏联政府将在近期讨论这个问题，并给南斯拉夫政府相应的回答。

三、给南斯拉夫贷款6000万美元的问题。

我告诉他，苏联政府研究了南斯拉夫的请求，一致认为不可能满足这个要求。同时我也告诉卡德尔，1948年是我们财政困难的一年，由于财政改革，仅降低国家价格一项，国家预算收入一年就

减少了 570 亿卢布，还有一些其他的收入也减少了。我还说，今年我们限制了投资额，并采取硬性措施限制国家支出。我补充说，半年前我们还可能向南斯拉夫提供美元贷款，但今年由于国家预算紧张，已经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卡德尔同志对我的说明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好像能理解苏联财政的情况，对这个说明的反映很平静。

维·莫洛托夫

№07488

拉夫连季耶夫与铁托关于苏南经济 关系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

（1948年3月10日）

摘自 A. M. 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秘密

我拜访了铁托。卡德尔在铁托办公室，整个谈话他都在场。

一、我对铁托说，明天要飞往莫斯科，因为已有两年没有回苏联了。计划在苏联不多呆，暂时把工作托付给阿尔米亚尼诺夫同志^①。……

布·铁托显然有些激动，问我不知道不知道克鲁季科夫^② 在外贸部对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说，苏联今年不可能与南斯拉夫签订贸易协议的事，这样做有什么理由。

我回答，正式的消息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然后铁托表示，南斯拉夫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苏联拒绝和南斯拉夫签订贸易协议，而同时正在和其他国家签订这样的协议。铁托接着说，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在战争时期是苏联的忠实盟友，并且南斯拉夫的民主制度比其他东欧国家更巩固。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没有贸易协议，这个问题不能像在外贸部里的声明那样向南斯拉夫人民解释，而这一点又不能向人民隐瞒。此外，停止南苏贸易会严

^① 即苏联驻南大使馆代办 A. M. 阿尔米亚尼诺夫。

^② A. B. 克鲁季科夫，时任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

重地影响南斯拉夫五年计划的完成，尽管南斯拉夫无论如何也要努力完成五年计划。南斯拉夫政府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决定是在南斯拉夫代表团到达苏联两个月之后才通知它的。南斯拉夫在此期间一直期望会签订这个协议。不然，南斯拉夫可以在此期间采取相应的步骤，扩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

铁托此时表示，没有贸易业务，无疑将加重南斯拉夫非贸易支出的困难。南斯拉夫将没有能力支付正在苏联学习的学生的膳宿费用，因为国家没有这部分外汇。南斯拉夫不得不减少自己在苏联的学生。这个关于不签协议的决定还牵涉到军事供给，因为根据贸易协议，应向军队提供装甲车和原油。

铁托重复了几次说，莫斯科的这个决定让人不能理解。接着他表示，这个决定与两国的友好关系是不相容的，“可以这样说，这样对待南斯拉夫，我们感到委屈。”铁托说，也许，苏联对南斯拉夫有些不满意，但即使在一个家庭中也有兄弟间的不和。“如果问及此事”，铁托请求把这一切转达给苏联政府。当我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只是问起”时，铁托改正说，那么，他是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并且是在自己的第一副主席在场的情况下，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

我回答，我将把铁托关于此事的声明通报给我的政府。

后来，铁托提出卢布和第纳尔的换算问题。按他的意见，现行的汇率实在对南斯拉夫太不利了，虽然南斯拉夫政府不止一次地提出这个问题。我问，是谁，什么时候在莫斯科提出过这个问题。铁托回答，波波维奇大使不止一次地讲过此事。卡德尔补充说，在去年参加外长会议例会期间，他本人与米高扬同志谈过这事。铁托接着说，南斯拉夫政府的这个请求，苏联没有给予满足。相反，按不久前收到通知，对用于外交需要的卢布和第纳尔又制定了新的比价：现在莫斯科要求6个第纳尔兑换1卢布，取代了过去确定的

4.2 第纳尔兑换1卢布的比价。^①

铁托表示，组建海军舰队的问题，也没有做出正确的决定。苏联军事代表对南斯拉夫的代表们说，组建海军舰队的计划实在太庞大。建议缩减这个计划，而着重于建设海防舰队。当南斯拉夫代表询问，如果缩减计划，南斯拉夫可以指望苏联方面的哪些帮助时，苏联军事代表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铁托接着说明，关于缩减组建海军舰队计划的问题，南斯拉夫政府还没有研究。政府可以缩减计划，但希望知道，如果这样做，他们可否指望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铁托还指出，苏联代表没有给予任何回答，甚至对南斯拉夫要求提供相应图纸的询问也不作回答。

卡德尔声称，这个计划里的内容，在莫斯科都已说过，而关于组建军事工业中这个计划过于庞大的问题，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给予帮助的任何具体答复。

我回答，我在莫斯科将通报这些问题。

^① 战后，南斯拉夫人民银行接受了苏联国家银行所建议的卢布与第纳尔的比价，这个根据双方各自的外汇牌价确定的比价表面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由于南斯拉夫只能根据自己实际的外汇购买能力确定第纳尔对美元的比价，而苏联可以随意提高卢布对美元的比价，从而也就提高了卢布对第纳尔的比价。1945年8月28日，南斯拉夫要求进行谈判，重新审议所规定的比价。10月份又重复了这个要求。1945年12月4日，苏方回绝了南斯拉夫的建议。此后，南斯拉夫提出了几种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具体结算方式。

№01621

莫洛托夫就苏南关系一些问题致铁托电

(1948年3月13日)

拉夫连季耶夫前来通报了一些情况^①。

一、关于加加里诺夫在阿尔巴尼亚举杯祝酒一事已按照我的指示进行了调查。业已查明，卡德尔所获得的消息是不正确的，因为加加里诺夫没有说过任何侮辱性的话。显然，我们或者被误会了，或者受到了诽谤^②。

二、关于苏联代表克鲁季科夫拒绝与南斯拉夫签订1948年贸易协定的报道不符合事实。众所周知，现在有一个苏南1947~1948年贸易协定。这个协定到今年5月31日期满。显然，在此之前肯定要签订1948~1949年的新协定。看来，在这方面我们也被误会了，或者受到了诽谤^③。

① 拉夫连季耶夫大使于1948年3月11日离开贝尔格莱德回到了莫斯科。

② 1948年2月22~23日在地拉那庆祝苏联建军节的招待会上，苏联驻阿尔巴尼亚代办加加里诺夫在回答南斯拉夫公使约瑟夫·杰尔贾为斯大林和铁托祝酒的建议时说：“如果铁托赞成民主联盟的团结，我就为他干杯。”杰尔贾当即进行了驳斥，并将此事报告本国政府。1948年2月28日，卡德尔向拉夫连季耶夫提出了这个问题。

③ 1947年7月5日苏联和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个为期两年的换货和支付协定，同时还签订了截止到1948年5月31日的换货议定书（不是贸易协定）。1947年12月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希望扩大与苏联的贸易。1948年1月30日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会见南斯拉夫代表时说，苏联政府同意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于2月10日左右来莫斯科，进行谈判签订新的换货议定书。但2月22日苏联外贸部表示无意进行签订新的议定书的谈判。2月26日克鲁季科夫以苏联政府名义正式宣布了这一意见，并要求南贸易代表团不要来莫斯科了。其理由是，南斯拉夫向苏联供货的速度很慢，前一个议定书规定的供货要拖延到1948年5月31日以后才能完成，因此，要做的只是到1948年底再开始谈判签订1949年的议定书。

三、众所周知，卢布对第纳尔的汇率问题如同对所有其他外国货币的汇率问题一样，已经在卢布与美元比价的基础上得到解决。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没有来自外国的任何异议。持异议的只有南斯拉夫。如果我们现在把第纳尔作为例外，我们就将动摇卢布汇率，对此，我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

四、就南斯拉夫建设海军和军火工业的问题，有必要再安排几次南斯拉夫代表同苏联代表的会晤。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给南斯拉夫以力所能及的援助。主要在于南斯拉夫要有一个考虑到我们和你们近期能力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否则，做出的计划可能是纸上谈兵，从实际建设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价值^①。

^① 1948年1月初，南军事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与苏联军方领导人谈判提供军用物资和苏联帮助南实现建立海军的计划的问题。开始时，斯大林表示可以完全满足南斯拉夫的请求，但是到1月底2月初，苏联却开始怀疑实现南斯拉夫提出的计划的可能性。苏联代表认为南斯拉夫的要求超出了实际需求和苏联的供应能力。3月9日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布尔加宁和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建议南斯拉夫代表重新提出一个更现实和更适度的计划。随后谈判终止，铁托在3月11日会见拉夫连季耶夫时表示，南斯拉夫认为，苏联方面已决定延缓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

No07489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南斯拉夫 意识形态问题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8年3月18日）

绝密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内对外政策上 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莫斯科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南斯拉夫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犯了极大的政治错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观察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和研究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物的言论，可以得到这一结论的根据。主要的错误如下。

一、在制定国家实际的工作任务和确定今后的发展前景上，南斯拉夫领导人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用其来指导自己的实践。他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原理，而“实践家企图抛弃理论就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是对事业的最大危害”（斯大林语）。

二、南斯拉夫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以及联共（布）这个久经考验的和全世界所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力量都承认的领导力量，采取了不友好和不正确的态度。

三、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陶醉于巩固人民民主国家和创造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先决条件等方面的成绩，过高地评价自己的功劳，在估计自己今后的前途和实行的对外政策中，妄想作为巴尔干地区和多瑙河流域国家的领导力量，已成为冒险主义的人物。对于一些兄弟党表现出不能容许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四、南斯拉夫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困难估计不足。忽视富农作为阶级产生的可能性及其作用，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上采取了机会主义的态度。

五、在确定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中实行有害的、实质上是取消主义的政策，把党与民族阵线混为一体。

一、忽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共产党在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中，在联合自己周围所有进步力量的事业中所取得的一切成绩，首先说明他们的所有实践活动是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指导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十分重视研究理论问题。他们把理论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将革命理论变为工人运动的巨大力量。在俄罗斯工人运动初期，列宁在自己的经典著作《怎么办？》中指出，只存在着两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没有中间的思想体系。列宁写道，“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①。

按列宁指示的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不重视理论问题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实践是有缺陷的和危害极大的，并且正在南斯拉夫工人运动中酝酿着危险性。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第351—352页，人民出版社，1959。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完全忽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分析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中央书记们——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的言论，就可以找到这一结论的根据。他们根本不关心在共产党员和非党的南斯拉夫人民群众中宣传马列主义。

在其他兄弟党（比如罗马尼亚）公开宣布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建成共产主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党的思想体系时，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们出于不可理解的原因，害怕向自己的人民说明：党必须遵循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思想体系。

所有南共中央书记战后的讲话都是一些没有经过充分思考的、错误的和有害的观点的大杂烩，不论在什么场合，都不能作为严肃的针对南斯拉夫现实的实践和阐述国家今后沿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理论专著。这首先说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讲话没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原理，忽视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没有把它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

比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铁托在 1945 - 1947 年所做的 53 个讲话中，仅有一处引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来证明南斯拉夫发展道路的正确性。这是三年中惟一的一次，铁托在讲话中称呼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名字，而其余的 52 次讲话，完全忽视了作为指导所有共产党行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意义和作用。

在南斯拉夫民族阵线第二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铁托描述在民族阵线中共产党发挥组织领导作用而取得成绩的原因是：“由于上述革命发展阶段的独特性质，采用了具有南斯拉夫特点的新的方法”，他一句也没有讲共产党的决定性意义，首先在于党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和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甚至在报告的结尾部分，铁托说明现代形势的基本特点时，他对伟大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的功绩只

字不提。在他所有的讲话中，没有一字提到统帅斯大林同志——我们时代的伟大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人。铁托一句也没有讲共产党的伟大先锋作用，首先是联共（布）的作用。

这些事实表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完全忽视了理论问题。铁托1945~1947年的文章和发言全部是讲建设和巩固新国家的实际任务。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好像定有规矩，从来不讲自己关于南斯拉夫发展道路的理论观点。甚至在共产党的理论喉舌——《共产党人》杂志上（该杂志偶尔出版，从1946年10月共出了3期），几乎没有专门讨论南斯拉夫发展道路的文章。在该杂志第2期发表的《新型民主制度的原则》一文中，铁托写道，各个国家达到美好公平社会制度的道路，不应该也不可能都在十月革命中被确定好的。“这些途径可以有许多共同点，但除了共同之处，每一个国家特殊的条件和内部发展情况决定了他们达到和建立一个美好社会体系所走的，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而在这种具体条件下，我们要达到的是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

这说明，铁托没有把在南斯拉夫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看成共产党的最终目的。南斯拉夫人民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明显地被他限定在“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上。这个立论贯穿在他所有的讲话和文章中。

铁托在1946年11月与南斯拉夫作家的谈话是他忽视马列主义理论意义的例子。在对作家的讲话中他一句也没有说党在培养作家事业上应起的作用，没有讲文学的党性和作家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全部讲话只限于作家的实践和组织问题。

南共中央负责宣传的书记米洛凡·吉拉斯1947年在《战斗报》发表《现时期党的任务》一文，也对党的任务和目的做了限定，他

没有讲清共产党应当为什么目的而斗争，南斯拉夫应当走什么道路，比如，吉拉斯在文章中写到：

“只有认清发展的目标和途径，全党动员起来，不惜自己的力量，不怕牺牲，国家才能走出困境”。

综上所述证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不向南斯拉夫人民宣传共产党的最终目标，不讲南斯拉夫今后的发展道路，只局限于达到和加强人民民主制度的目的。

二、忽视苏联作为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定性力量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主要的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其周围团结和联合起全世界的民主和进步力量。

每一个人都知道，是苏联及其军队通过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抵抗了法西斯的野蛮行径，挽救了人类和世界文明。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包括南斯拉夫的人民，都感谢苏联的帮助和支持，使他们获得了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初期建设自己的生活的可能。

现在英美帝国主义和其帮凶正在疯狂地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是唯一能够真正抗拒国际反动派一切阴谋诡计的现实力量。

由此得知，世界上所有真正的民主力量应该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加强苏联的权威，将其作为和平和民主的堡垒。

从这个方面看来，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联关系上不友好的事实和奇怪的立场至少应引起特别的重视。

他们在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极力低估苏联及其军队在南斯拉夫解放事业和战后建设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比如，南共中央书记米洛凡·吉拉斯 1947 年 1 月在《战斗报》上发表了《南斯拉夫的发展前景》一文，在讲述南斯拉夫人民的成就时他写到，“我们的人民取得的一切成绩，是因为成功地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所在，不但运用了红军在战争中的作用，还利用了苏联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在这篇文章中，吉拉斯还由于“我们的某些朋友”（指苏联的评论

家们)，把南斯拉夫和一些新民主制度的国家相提并论而感到委屈。他写到：

“简直不明白，有一些人自认为是学者，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却看不到在南斯拉夫国内发生的深刻的变化，在这方面把其他一些国家和南斯拉夫相提并论。

每一个聪明的南斯拉夫人都懂得的事情，……我们的许多朋友却经常搞不明白。”

南共中央书记卡德尔在华沙九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上的报告中做了如下声明：“红军在1944年协助了我们的解放，这个事实更加巩固了我们在人民中的地位。”

铁托极力过高估计南斯拉夫在民主主义阵营中的作用和角色，而忽视苏联的作用，他在1947年6月与保加利亚新闻记者谈话时声称，“保加利亚人和苏联一样，应当成为指明正确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的灯塔”。在这个谈话中铁托还说，在接近保加利亚人的关系上，“谁也没有权利在这件事上干涉我们”。

1947年8月25日铁托在和克罗地亚农民的谈话中说，“我们和英国、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对话，是相互平等的。我们声明，不允许像对待殖民地的人民那样对待我们”。

1946年12月南斯拉夫政府拒绝接待苏军歌舞团，尽管歌舞团的出访是应他们的邀请。这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不能友好地对待苏联的又一个例子。

联系青年群众的南斯拉夫少先队组织，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标志物（旗子、领巾等）与童子军相似，当苏联青年代表团的成员问，为什么南斯拉夫少先队没有采用与我们一致的形式——红旗和红领巾时，拉托·杜戈尼奇（原青年群众中央会议主席）回答说，他们认为不适宜“模仿苏联的少先队组织”。

对苏共中央关于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历史性决

议，南斯拉夫共产党机关报《战斗报》只用了几行字，做了简短和不大明白地介绍。同时报纸完全抛弃了决议的原则，只讲俄罗斯的古典音乐。就这样，《战斗报》歪曲了苏共中央决议的实质，错误地向南斯拉夫读者传达了苏共中央的这一历史决定。

之所以有必要在南斯拉夫刊物上全文刊登苏共中央这一决议，还因为这个国家受西欧形式主义音乐的影响很大。

近来，铁托在自己的公开发言中忽视苏联在团结所有进步和民主力量的事业中，在与英美反动派斗争的事业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他今年2月10日在塞尔维亚突击手代表会议的讲话中说，他不赞同联共（布）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经验，不赞同把这一运动作为新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最高形式。虽然铁托这篇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讲国际形势，但他一句也没有说苏联在反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挑衅者斗争中的作用。铁托没有参加今年2月23日贝尔格莱德苏军建立30周年纪念晚会这一事实，是颇具代表性的。

今年3月6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南斯拉夫与苏联文化合作协会第二次会议，没有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出席这个会议的开幕式。

铁托在1947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人民阵线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说到新民主制度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时，完全忽视了苏联是这个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这一事实。

三、过高地估计南斯拉夫在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成就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和总书记铁托，过高地估计自己在建设和巩固南斯拉夫人民民主国家中所取得的成就，表现出要在巴尔干地区和多瑙河流域国家担任领导角色的企图。在决定与对外政策有关的问题时，南共领导人表现出民族狭隘性和局限性，不考虑其他国家和兄弟共产党的利益，忽视其他民族人民的民族尊严。

举例来说，南斯拉夫政府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正确对待的里雅斯

特问题，在与英美政府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忽视民主力量的共同利益，使斗争复杂化。出于同样的原因，南斯拉夫共产党还在公开的刊物上，其中包括共产党机关报《战斗报》，不正确地、不能容忍地尖刻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及其领导人陶里亚蒂同志的行为。1946年11月保加利亚宪法草案公布，南斯拉夫报纸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南共中央书记卡德尔的助手共产党员戈尔什科维奇在1946年11月14日的《战斗报》上指责保加利亚政府侵犯了马其顿人民的民族权利，文章中写到：

“明显地，这样的安排……与真正民主地解决民族问题，尊重所有民族的民族自决权和民族统一，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1946年12月南共书记卡德尔和兰科维奇在贝尔格莱德对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书记契尔文科夫申明，他们不相信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中央委员会，并认为他们在马其顿问题上的路线是错误的。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中央委员会这种做法是企图得到巴尔干地区的领导权。

尽管南斯拉夫政府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友好和互助条约，但在整整一年里没有完成这个条约的条款，没有给予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以经济上的帮助。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对阿尔巴尼亚争取直接与苏联取得联系非常妒忌，按照他们的意见，阿尔巴尼亚只能通过南斯拉夫政府与苏联联系。南斯拉夫领导人控制这个国家，就像是在自己的殖民地一样。

南共中央的书记们试图向兄弟共产党的领导人建议，争取让南斯拉夫共产党充当巴尔干地区和多瑙河流域国家领导的角色。比如，卡德尔和吉拉斯曾建议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把奥地利划分成两部分。不难理解，如果奥地利的同志听从了南斯拉夫领导人这个冒险主义的建议，这个危害极大的路线会导致什么结果。

根据奥地利共产党中央书记菲连贝格的声明，南共中央委员会

的负责人相当自信地认为，南斯拉夫要比苏联更早地建成共产主义。

四、过低地估计农村的阶级斗争和富农的危险

南斯拉夫领导人醉心于自己在经济建设和巩固政治权力中取得的成就，没有重视国内阶级斗争的事实，并低估了这项斗争的意义。通常，他们只是把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和民主制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将它们用于阶级斗争。例如，铁托的讲话没有一处谈到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特别是与富农的斗争，甚至也不使用“富农”这个概念，他称富农为富裕的和殷实的农民。

铁托在自己关于五年计划和发展经济的讲话中，用很大篇幅来谈农业经济，但使用的又是“农民”这个词，而一个字也没有提南斯拉夫农村政治上的困境及富农反对人民政权的残酷斗争。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没有召集过“人民议会”的代表，让他们提高警惕性，提醒他们在国内，特别是在农村，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讲述富农在反对人民政权时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

应当指出，在南斯拉夫农村的政治形势下，这种宽容没有任何的根据。主要是农业国的南斯拉夫（农村人口将近占80%）的农业经济，现在还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

土地在南斯拉夫没有国有化，而是农民的私人所有。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土地国有化不适合南斯拉夫，打算建设在土地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农庄。应当看到，南斯拉夫有近200万占有土地不足5公顷的农户。与此同时，却有很大的富农户。因为按1946年施行的农业改革法规定，私人占有耕地的最大限额为25~35公顷。这样的做法，现在在南斯拉夫农业经济中很有可能助长富农经济，而它们在村子里是反动派的基础，对政府的一切政策都做出坚决的抵抗。

同时，工业生产及其他重要国民经济部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

南斯拉夫的农业经济却是小农生产形式，正如列宁指出的，从这个小农经济中，每日每时都在产生出大批的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分子又以一切手段，不惜代价地维持自己的生存。

列宁号召工人向富农阶级进行斗争，1918年他在《工人同志们！大家都来进行最后一次决战！》一文中写到：

“到处是贪婪残暴的富农和地主和资本家联合起来反对工人和一般贫民。到处是富农以骇人听闻的血腥手段摧残工人阶级。到处是富农和外国资本家结成联盟来反对本国工人阶级”^①。

列宁就是这样评价富农阶级的，它是工人阶级凶狠的敌人，反对它的斗争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重要任务。

众所周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1929年苏联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的问题，赋予了极大的意义。党和政府的这个措施所具有的意义及其产生的后果与1917年的十月革命是一样的。

按照列宁和斯大林所说的对富农进行斗争的意义，明显地看出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对待富农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政策。它使人联想起布哈林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众所周知，布哈林也是看不到农民分化的事实，在他那里原有的社会集团消失了，而只剩下一个被称为农村的灰色的点。铁托1946年在萨格勒布选举前所作的演说可以证明这种比照：

“我对农民讲他们是我们国家最坚固的基础，这不是为了获得他们的选票，而是因为他们确实是如此。”

可见，铁托承认人民民主国家的最坚固的基础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其先锋队——共产党，而是所有的农民，其中包括富农——这些对人民政权的一切措施已经在进行疯狂抵抗的阶级。富农的抵抗在去年粮食收购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经常阻挠粮食收购计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56。

划，蓄意销毁他们的粮食。他们渗透到人民政权的地方组织中，富农分子使用各种非法手段，企图引起劳动农民对政权机关的不满。

去年10月铁托在参战者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人民政权的地方组织在收购粮食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很多时候粮食是从贫苦的农民那里夺来的，而他们的妻子、丈夫牺牲在战争中。铁托答应，归还贫苦农民的粮食，纠正错误。但他没有分析，为什么会犯下这些错误，没有从南斯拉夫农村阶级斗争的角度去探询错误的原因。

由此可见，南斯拉夫领导人，首先是总书记铁托，对作为阶级的富农的增加和作用估计不足，这个阶级不可避免地会对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疯狂的抵抗，南斯拉夫领导人忽视列宁和斯大林所指出的，共产党应当唤醒工人阶级和被剥削的农村群众，提高他们的战斗性，动员他们做好反对城市和农村的资产阶级分子、反对阶级敌人抵抗的斗争准备。

五、对共产党在人民民主国家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采取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态度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在南斯拉夫的社会—政治发展过程中确定共产党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上，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组织原则的破坏。

在一系列党的建设和党的政治工作问题上，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没有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理论——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队伍，只有用革命的理论和社会发展的知识武装自己，才能领导南斯拉夫全体劳动群众。

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共产党宣言》一书指出，共产党应当担当起思想领袖的作用和无产阶级的组织者。工人阶级政党的存在是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政治成熟的最高阶段。

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于实践，

没有用新的科学成就来发展和丰富革命的理论。在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中，仅用纯粹的经验为指导，陷入了经验主义。

在1947年9月九国共产党协商会议之前，南斯拉夫共产党实际上是处于半合法的地位。只是在协商会议上，卡德尔和吉拉斯在报告中才声明共产党的存在，它的组成人员及关于共产党工作的一些意见。

1947年9月前，没有以党的名义发表过一篇文章和公开做过一次讲演。

过去和现在都把党混淆和溶合在“人民阵线”^①中。在新南斯拉夫成立以来的整个时期，从共产党的中央到地方基层党组织，都没有以共产党的名义发布过任何一个决定。真正地背离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组织原则——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南共中央总书记铁托担任国家所有最重要的职务，实际上是一个人领导着国家所有社会政治生活和对外政策。

这都是因为他缺乏最起码的马克思列宁理论知识，是他的领袖欲和自我欣赏、自视过高造成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机构成了国家和经济部门的某种附属品。在全国，除了波斯尼亚，部长总理们都是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的第一书记，共产党中央组织书记兰科维奇同时管理干部，又是南斯拉夫政府内务部的部长。

不召开共产党中央的全体会议，不公布党中央和政治局的决议，不吸引党员阶层参与完成党的任务。所有重要问题都由小集团来决定的（铁托、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

^① 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是全南斯拉夫的政治组织。其前身是南共在人民解放战争中成立的统一战线组织“人民解放阵线”，1945年8月改名为人民阵线。1953年，人民阵线改组为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

国家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生活的所有重要决议，都不是以党的名义，而是以“人民阵线”的名义传达到人民群众中。南斯拉夫共产党即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在1947年9月第二次“人民阵线”代表大会上，铁托声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纲领，“人民阵线”的纲领（1945年8月通过）就是共产党的纲领。同时铁托承认，“人民阵线”里也有一些资产阶级党派，并且指出，这不会削弱“人民阵线”的统一，而只会加强它。卡德尔在华沙九国协商会议的报告中再次重申了铁托的这个讲话。

这样看来，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认为加入到“人民阵线”的资产阶级党派、富农、商人和小工厂主支持它的纲领，也就是说，他们和共产党员遵循的是同一个的纲领。

铁托这个明显的错误和有害的声明，直到报纸发表吉拉斯华沙九国协商会议上的发言“为持久的和平和人民民主”时，由于报纸编辑部的一再坚持和要求才得以改正。

非常有必要召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及选举党的领导机构，而且时机也已成熟。但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知什么原因，无期限地拖延党代会的召开。忽视党的建设，背离了布尔什维克的基本组织原则，这是南斯拉夫共产党内最大的危险，会导致取消共产党，将党淹没在“人民阵线”之中。

* * *

综上所述，说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指导自己的实践和确定南斯拉夫今后的发展前途方面，他们没有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能够给予革命运动以信心，有助于对周围事件内部联系的理解，并帮助实践家们“不仅能理解现在阶级如何运动和运动的方向，还能知道不久的将来它们应该如何运动和运动方向”（斯大林语）。

南斯拉夫共产党对待苏联和兄弟党的不友好态度导致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些错误使他们在推行的国内外政策上成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在南斯拉夫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中蕴藏着极大的危险。

Л. 巴拉诺夫

В. 莫白托夫

В. 列萨科夫

No 01622

铁托就苏南关系一些问题 给莫洛托夫的信^①

(1948年3月18日)

就您3月13日的来电，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了解到一些实际情况，现答复如下：

一、有关加加里诺夫的表现，我国政府注意到您来电中所作的解释，至于向我国政府提供信息的南斯拉夫代表，我国政府认为根本不存在诽谤的问题。

二、关于贸易条约，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政府拒绝签订1948年5月至年底的贸易议定书，事实如下：

2月26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同志^②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商务代表日贝尔纳拜会了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当时他向他们通报说，苏联外贸部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观点，不能签订5月至年底的贸易议定书。他宣布，现在没有必要派遣南斯拉夫贸易代表团来莫斯科，关于（签订）1949年（贸易议定书）的谈判只能在今年底举行。茨尔诺布尔尼亚随即询问，这是克鲁季科夫的个人意见，还是他可

^① 苏联驻南大使馆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3月19日向苏联外交部报告，铁托与他会谈时告知，对莫洛托夫电报的答复“是以信件的形式并派信使送往莫斯科的，以便通过自己的使馆转交”。

^② 茨尔诺布尔尼亚，波格丹（1916~？），历任南外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共和国总统秘书长等职。

以报告本国政府的苏联政府的观点。他得到的回答是，这是苏联政府的观点，他可以将此观点报告本国政府。尔后，经克鲁季科夫的明确同意——他认为（签订）1949年（贸易议定书）的谈判只能在年底举行，茨尔诺布尔尼亚立即返回了贝尔格莱德。

根据茨尔诺布尔尼亚的这一报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自然得出结论：苏联政府不准备签订1948年5月至年底及至1949年5月的贸易议定书，虽然这一议定书是由期限为两年的南苏条约^①所规定的。然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满意地注意到您来电中所作的表示，即苏联政府愿意签订1948~1949年贸易议定书。但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提到上述信息的同时认为，因此就存在某种形式的诽谤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三、至于第纳尔与卢布的汇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从未提出过全面变动汇率的问题，因为它知道这一汇率是以卢布与美元的比价为根据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只是请求在某些部门采取一些特殊做法，因为在那些部门卢布与第纳尔的官方比价特别沉重地加重了南斯拉夫对苏联的财政义务，例如对于文职顾问、军事顾问和教官，以及在苏联学习的我国干部，等等。

四、南斯拉夫关于军火供应的建议是以过去与苏联代表举行的几次会谈为基础的，这些苏联代表并不认为南斯拉夫的计划过分。斯大林同志曾亲自赞同南斯拉夫应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苏联将援建军火工业。^②但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已注意到苏联代表的最新意见，虽然它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低估了南斯拉夫的物

^① 这里指的就是1947年7月5日苏南签订的“换货和支付协定”。

^② 指斯大林在1946年5月27日与铁托会谈时的讲话（参见本卷文件№02518和№02519）。

质能力，而且它的专家们也正在制定新的、将大大压缩的建议。十分清楚，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考虑到苏联战后恢复和建设向苏联生产部门提出的大量需求，所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此只是期待苏联在其能力范围内提供援助。以后的计划规模取决于我国自身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是相当可观的。南斯拉夫政府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一计划，原因在于它认为南斯拉夫——鉴于其地理位置和政治地位——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当然是在其能力的范围内。

由于这一切，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尽可能快地继续进行关于 1948 年贸易交换及军火供应的谈判。

1948 年 3 月 18 日

№01623

莫洛托夫关于撤回苏联专家致铁托或 卡德尔的电报

(1948年3月18日)

兹获悉，基德里奇的助手斯尔曾蒂奇^①向苏联商务代表列别杰夫声明：根据南斯拉夫政府的决定，不准向苏联机构提供经济情报。这一消息使我们感到惊讶，因为曾有一个苏联政府机构可以自由地获得这类情报的协议。^②更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南斯拉夫政府机构没有预先通知、也未解释原因而单方面地采取了这一措施。苏联政府把南斯拉夫政府的这种举动看做是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不信任行为和对苏联不友好的表现。

显然，在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如此不信任的情况下，他们认为不能保证自己不受到来自南斯拉夫机构的类似的不友好对待。

① 斯尔曾蒂奇是经济委员会副主席。

② 1948年5月9日拉夫库季耶夫致电莫斯科通报说：斯尔曾蒂奇向商务代表列别杰夫声明，南政府有一个决定，禁止国家机构和机关向任何人提供任何经济情报。因此，尽管从前有一个协议，他也不能向列别杰夫提供有关的资料。该决定还责成国家安全机构对这件事情进行监督。斯尔曾蒂奇还说，基德里奇打算亲自同列别杰夫谈这件事。有必要提醒的是，南斯拉夫政府在去年的夏天就已做出了这个决定。当时，我就同卡德尔谈过，于是他便指示基德里奇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资料。在这个协议的基础上，列别杰夫从经济委员会处得到了一些有关经济问题的情报。显然，斯尔曾蒂奇的声明反映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苏联态度的改变。关于这一通报，可参见1948年3月27日斯大林致铁托的信（本卷文件№01625）。

有鉴于此，苏联政府已指示黑色金属冶金部、有色金属冶金部、化学工业部、电力部、邮电部和卫生部，立即把他们各自的所有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撤回苏联。

№01624

铁托关于苏联撤回专家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8年3月20日)

致苏联外交部长维·米·莫洛托夫

3月18日，巴尔斯科夫将军^①向我们通报说，他收到了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元帅^②的一份电报，电报通知我们，苏联政府已决定立即撤回其全部军事顾问和教官，^③理由是他们“处于不友好行为的包围之中”，这就是说，他们在南斯拉夫没有受到友好的待遇。

苏联政府如果愿意的话，当然可以随时撤回自己的军事专家，但是我们对苏联政府为做出这一决定所提出的理由感到震惊。根据这一指责，我们调查了我国基层的领导人对于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的态度，深信撤走他们的理由是不成立的。在他们驻南斯拉夫的整个期间，对他们的态度不仅是友好的，而且确切地说，是兄弟般的和最殷勤的。在南斯拉夫，对所有的苏联人一贯都是如此。因此，苏联政府没有把做出这一决定的真实原因告诉我们，这确实使我们感到惊讶，使我们不能理解，使我们十分痛心。

其次，1948年3月19日，阿尔米亚尼诺夫代办拜会了我，并

① A. H. 巴尔斯科夫少将，时任驻南斯拉夫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

② 布尔加宁，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1895 - 1975），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武装力量部（即国防部）部长。

③ 根据铁托的请求，第一批苏联军事教官于战时，即1944年秋天被派往南斯拉夫军队。苏南之间的这种合作形式一直持续到战后。苏联的顾问和教官被派往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部和各级参谋部，以及一系列军事机关和部门工作。

通报了一份电报的内容，即苏联政府还下令从南斯拉夫撤回全部文职专家。这一决定的理由也使我们感到费解和惊讶。基德里奇的助手斯尔曾蒂奇确实曾向贵国商务代表列别杰夫说过，根据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项决定，他无权向任何人提供重要的经济情报，如果苏联人想得到这种情报的话，应当到更高级领导机关，即南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去索取。同时，斯尔曾蒂奇对列别杰夫说，他可以向基德里奇主席索取他感兴趣的情报。你们的人早已被告知，苏联政府的官方代表可以直接从我国领导人那里获得一切必需的和重要的情报。

我方做出这一决定的根据是，过去我们各部的公务人员不管需要与否，都对任何人提供情报。这就意味着他们向各种各样的人泄露国家经济机密，而这些机密可能有时确实已落到我们共同的敌人的手里。

我们从未签署过任何如来电中所说的专门协定，规定我们的人不经过政府或中央的同意，就有权向苏联经济工作人员提供与其本职工作无关的经济情报。每当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同志向我本人索取必要的情报时，我都毫无保留地予以提供，我们其他主要领导人也是这样做的。如果苏联政府不赞同我们这一从国家观点出发的立场，我们将感到非常惊讶。

同时，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拒绝所谓对苏联驻南斯拉夫专家和代表“不友好和不信任”之类的理由。迄今为止，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抱怨过这类事情，虽然他们每人都有机会向我本人诉说，而我从来没有拒绝过接见任何苏联人。我们所有主要领导人都都是这样。

由此可见，上述理由不是苏联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原因，我们希望苏联政府坦诚相告这是怎么回事，并向我们指出一切在你们看来有碍我们两国之间良好关系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事态的发展

对两国都是有害的，而迟早一切有碍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东西都必须消除。

苏联政府正从各种各样的人那里获取情报，我们认为对待这种情报应当慎重，因为这种情报不一定是客观的、准确的和出自善意提供的。

请再次接受我的敬意。

部长会议主席 约·布·铁托

1948年3月20日

№07490

莫洛托夫关于召回苏联专家与 波波维奇的谈话记录

(1948年3月24日)

摘自维·米·莫洛托夫的日记

绝密

发送：约·斯大林、拉·贝利亚、安·日丹诺夫、格·马林科夫、阿·米高扬、拉·卡冈诺维奇、尼·沃兹涅先斯基、尼·布尔加宁

相互问候以后，波波维奇说，从贝尔格莱德来的特派信使带着铁托的两封信，由他全权代表转交给莫洛托夫，铁托信的原文是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写的，但转交给他们的已经翻译成了俄文。

莫洛托夫接受了信笺，说已有通报得知特派信使带信给苏联政府。

波波维奇说，由于在专家问题上发生了这样的误会，他应当表示抱歉。

莫洛托夫声明苏联政府不得不在一些方面对南斯拉夫做出反应，鉴于在南斯拉夫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苏联方面在贝尔格莱德已发表了两个声明^①。

波波维奇请莫洛托夫取消从南斯拉夫召回军事顾问和专家的指示，波波维奇说：“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苏联专家将如何应付，

^① 指1948年3月18日和19日苏联领导人关于从南斯拉夫召回军事顾问和苏联专家的声明（参见本卷前面文件№01624）。

他们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对于肇事的南斯拉夫一方，波波维奇说，将用最严厉的方法惩处，但不应因此而损失南斯拉夫的利益。

莫洛托夫说，造成苏联专家问题上的责任完全在于南斯拉夫政府。苏联政府在贝尔格莱德的外事交涉中已经说得很明白。

莫洛托夫接着指出，他将过目今天交来的信，但苏联政府完全清楚，造成苏联专家问题上的错误，完全是在南斯拉夫政府身上。

波波维奇问，难道不能纠正现状，因为召回专家将给南斯拉夫的经济恢复带来损害。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已经通过自己在南斯拉夫的代表阐述了意见，并补充说，苏联政府根据南斯拉夫政府在上述事件的那种立场，不得不采取这种措施。

波波维奇又一次请莫洛托夫不要召回苏联专家，并声明他认为南斯拉夫对苏联的友好关系没有任何动摇。

莫洛托夫声明，苏联政府不是在嘴上而是在事实上坚持与南斯拉夫友好。苏联政府说的和做的是是一致的。

波波维奇问，能否这样理解，所有错误都在南斯拉夫一方。

莫洛托夫回答，在上述问题上是这样。

波波维奇说，南斯拉夫人和铁托很难理解这种观点。

莫洛托夫回答，苏联政府根据事实，而不是根据愿望。

谈话进行了7分钟。

附件：波波维奇交给莫洛托夫的两份文件复印件。^①

(拉夫洛夫记录)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这两份文件。

№03444

波波维奇关于会见莫洛托夫致铁托电

(1948年3月24日)

元帅^① 亲收

今日4时30分我将您的两封信^②交给了莫洛托夫本人。他们正以极大的兴趣等待着您的回信。他有些生气，话说得很少。他强调说，他们有足够的证据做出巴尔斯科夫和阿尔米亚尼诺夫通报给您的那个决定。最后，他说，在没有了解您来信的全部内容之前，他还不能说什么具体的意见，关于谈话的过程我已写了书面总结，并将派专门信使带给您。

波波维奇

① 指铁托。

② 指铁托3月18日和3月20日致莫洛托夫的两封信（参见本卷文件№01622和№01624）。这两封信是由作为专门信使的南斯拉夫外交部一位副处长瓦·斯尔曾蒂奇带到莫斯科的。他3月23日到达莫斯科并将信交给了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弗·波波维奇。

№03445

波波维奇关于会见莫洛托夫给铁托的报告

(1948年3月25日)

与莫洛托夫谈话的总结报告

在信使斯尔曾蒂奇同志到达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年3月24日，我拜会了莫洛托夫。鉴于问题的重要性，我竭力记住莫洛托夫在会谈时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基本上完全做到了。因此，转给您的是谈话的完整情况。

我：我给您带来了铁托同志的两封信，是对您电报的答复。这些信是由专门信使送到莫斯科的。

莫洛托夫：我们正在等待回信。我们从贝尔格莱德得知，你们的信使昨天已经来了，并带来了你们政府的回信。他看了一下原稿及俄文翻译稿，接着说，现在，暂时还没了解全部内容，我不能对您说出什么更具体的意见。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确信，你们的政府是主要的罪人，鉴于这一点我们被迫做出了撤回我们专家的决定。

我：难道您真的确信，元帅同志和我们的政府成员因此而成了罪人？

莫洛托夫：您可以相信您希望相信的一切，而我们苏联人只相信事实真相。

我：如果您真的执行你们的决定，那就会延误我们国家的迅速恢复和发展。我们的人民会因此而感到痛苦。我认为，无论是为了

我们的利益，还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这一点都是不可取的。难道您不认为，最好是更深入研究一下事情的全部经过，从而找出主要的罪人？我认为——同时相信您也是这样想的——我们政府到目前为止有真正的充分的证据证明，对苏联一贯真挚而忠诚的友谊是我们政策的保证和基础。

莫洛托夫：苏联赞同我们两国之间保持真诚友好关系的政策，赞同合作，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苏联对你们国家实行的就是这样的政策。

我：难道您就不能设想一下，您获得的信息是不正确的，你们的决定，或者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是可以改变的？

莫洛托夫：我再重复一次，在这个具体事件上你们的政府是有罪的，对此我们深信不移。我们感兴趣的是你们政府的答复，在没了解答复的全部内容之前，对此我还不能说什么。

我：像我们的全体同志一样，我坚信，这个问题会弄清楚的，无论什么都不能成为巩固和加强我们之间关系的障碍。

莫洛托夫：你说什么？这不取决于我们^①。

我们的谈话就此结束了。莫洛托夫很生气。他从来没有用过这种语调同我们谈话。然而，同我谈话的方式并不重要，而比较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为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应该事先通知您，或者同

① 在得到苏联撤退专家的通知后，卡德尔曾请求拉夫连季耶夫转告苏联政府，把从事工业建设项目设计和勘测工作的苏联文职专家留下，因为原定他们撤回的期限是在完成苏联对这些工程项目的任务之后。拉夫连季耶夫答应可以将卡德尔的请求转告莫斯科，但是大使馆不能中止文职专家们返回苏联。苏联领导人对卡德尔的请求没有做出反应。在3月22日前的几天里，拉夫连季耶夫收到了莫斯科的指示：“在同铁托及南斯拉夫其他的活动家会见时，有关苏联政府对南斯拉夫最近的一些举动您不要做任何解释。”3月23日，拉夫连季耶夫向苏联外交部报告说，军事顾问们已经停止了在南斯拉夫军队的工作，最后一批军官计划于3月25日动身回国，而最后一批文职专家将于3月27日动身。

我们其中的某个人谈谈，如果需要的话同您本人谈，即采用到目前为止仍是解决我们之间问题的最常用的方法——据我看来，这也是惟一正确的方法——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从与莫洛托夫的谈话中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是从他们绝对信任的某个人或某些人那里获得的情报。同时，要很快解决这个问题会有一些困难。特别是这样一个情况，我记得当您收到电报时，也就是您答复的那些电报，拉夫连季耶夫大使正在莫斯科。他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我通知外交部巴尔干司负责人基尔萨诺夫，说我很希望同拉夫连季耶夫会面。过了两三天，他问我能否在星期日，即本月21日，会见拉夫连季耶夫。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星期六晚上，巴尔干司又通知我，拉夫连季耶夫不能来了，因为他被紧急召回了贝尔格莱德。但他不是在星期日，即计划会面的那天，而是在星期一动身的。

还应该向您通报的是，现在，就连最小的事情都很难同外交部交涉。不过，这一点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在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最不重要的问题我们也要等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得到答复。而一些重要的问题，在我们的一再催促和提醒下，也还是得不到任何答复。类似的问题有：关于执行我们去年签订的购买缴获车厢的合同问题，关于我们目前正停留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车厢的问题，关于援助建设新贝尔格莱德的专家的问题，关于为巴基奇同志和泽切维奇少校治病的问题，等等。我向您通报这一点，以便使您了解，他们部里的机构，而且不仅是部里的机构，还有其他的机关，都接到了其政府关于对我国态度的决定。

如果收到您的回信后，他们还是不改变立场的话，我们就应该立即行动，继续努力，以便尽可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巩固两国的相互关系。

我想去贝尔格莱德两天，尽可能收集全部的信息和有助于这个问题解决的具体资料，我认为这样做会更好，更有益处。我建议这

一点是因为我认为，在您到达这里之前，这样做是会很有益处的，同时我也坚信这一点，一切双方感兴趣的问题都将得到正确的解决。

请接受我的深切敬意和忠诚

弗·波波维奇

1948年3月25日于莫斯科

No 01625

斯大林、莫洛托夫关于苏南关系
诸问题致铁托的信

(1948年3月27日)

致铁托同志并南斯拉夫共产党其他中央委员

你们3月18日和20日的回信均已收到。

我们认为你们的答复是不真实的,因而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

一、关于加加里诺夫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了结,因为你们否认了对他的指控,尽管我们依然认为有过对加加里诺夫的诽谤性指控。

所谓克鲁季科夫同志讲的苏联政府曾拒绝在今年举行贸易谈判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克鲁季科夫同志断然否认强加于他的那种事情。

二、关于撤回军事顾问的问题,我们的消息来源于武装力量部代表的反映和顾问们自己的报告。众所周知,我国的军事顾问是应南斯拉夫政府的迫切要求而派往南斯拉夫的,况且派往南斯拉夫的苏联军事顾问比南斯拉夫政府所要求的数量少得多,因此很明显,苏联政府无意强迫南斯拉夫接受自己的顾问。

但是,后来包括科切·波波维奇^①在内的南斯拉夫军方领导人认为,可以声明必须把苏联军事顾问的人数减少到60%。他们为此摆出了种种理由。有人认为,南斯拉夫花在苏联军事顾问身上的费用太大;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军队根本不需要苏军的经验;有人

^① 原文如此,应为科查·波波维奇。

声称，苏军的条令是刻板公式，陈规旧俗，对南斯拉夫军队没有价值；还有人毫不掩饰地暗示，苏联军事顾问白拿薪饷，因为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好处。

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一次南共中央会议上所发表的那篇侮辱苏联军队的尽人皆知的言论，说什么苏联军官在道德方面还不如英军军官。但是，众所周知，吉拉斯的这一反苏言论没有遭到南共中央其他成员的反驳。

因此，南斯拉夫军方领导人不是与苏联政府友好地进行磋商和解决关于苏联军事顾问的问题，而是污辱苏联军事顾问，败坏苏联军队的声誉。

显然，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在苏联军事顾问周围造成不友好的气氛。

如果认为苏联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同意把自己的军事顾问留在南斯拉夫，那是可笑的。

既然南斯拉夫政府对这种败坏苏军声誉的行为没有采取措施进行抵制，它就应对业已形成的局面承担责任。

三、导致我们撤回苏联文职专家的情报，主要来源于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还有专家们自己的报告。

你们的声明，即似乎斯尔曾蒂奇对商务代表列别杰夫说过，苏联专家如要索取经济情报的话，应向上级当局即南共中央和南斯拉夫政府提出要求，完全不符合事实^①。请看3月9日拉夫连季耶夫

^① 3月24日，莫洛托夫致电贝尔格莱德的拉夫连季耶夫，援引铁托3月20日信中关于对斯尔曾蒂奇向列别杰夫所作的声明的解释内容，指出：“信中是这样说的，斯尔曾蒂奇似乎说过，苏联人应该向上级机关，即南共中央和政府索取需要的情报。”对此，莫洛托夫命令苏联大使再确认一下这一说法的准确性，因为有关斯尔曾蒂奇声明的情报是3月9日拉夫连季耶夫电告莫斯科的，其中没有类似的内容。拉夫连季耶夫在回信中坚持认为自己的报告是准确的，并说明贸易副代表瓦西里耶夫也出席了斯尔曾蒂奇同列别杰夫的谈话，他可以作为证人。拉夫连季耶夫还说：“根据维辛斯基同志的指示，在与卡德尔正式协商后，列别杰夫开始得到了需要的一些情报，不过，拖延了很长时间，而且得到的也不是所有我们感兴趣的资料。”

的报告：

“基德里奇在经济委员会中的助手斯尔曾蒂奇把一项禁止国家机关向任何人提供经济情报的政府决定通知商务代表列别杰夫。所以，不论过去有过什么许诺，他也不能向列别杰夫提供所需的有关资料。国家安全机构受命监督此事。斯尔曾蒂奇还说，基德里奇想亲自与列别杰夫谈谈这个问题。”

首先，从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可以看出，斯尔曾蒂奇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从南斯拉夫中央或政府那里获得经济情报的可能性。无论如何，在苏联专家以前直接获取必要的经济情报的一些经济机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认为索取一切经济情报都必须向中央和政府交涉，那是可笑的。

其次，真实情况显然与你们在来信中所述的完全相反，从拉夫连季耶夫的报告看，苏联驻南斯拉夫的代表确实受到了南斯拉夫安全机构的控制和监视。

不妨指出，这种监视苏联代表的做法我们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才会遇到，而且那也不是在所有的资产阶级国家。

同时应当指出，南斯拉夫安全机构不仅监视苏联政府的代表，而且还监视联共（布）驻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①。

如果认为苏联政府会同意在这种条件下把自己的文职专家留在南斯拉夫，那是可笑的。

显然，对业已造成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也要由南斯拉夫政府承担。

这就是苏联政府不得不从南斯拉夫撤回其军事和文职专家的原因。

^① 尤金·帕维尔·费奥多罗维奇（1899—1968），苏联哲学家，当时还兼任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主编。

四、你们在来信中还希望向你们通报引起苏联不满和导致苏南之间关系恶化的其他事实。这种事实的确存在，虽然它们与撤回文职和军事专家没有联系，但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向你们通报这些事实。

第一，我们知道，南斯拉夫领导同志中间流传着种种反苏言论，诸如：“联共（布）正在蜕化变质”，“苏联盛行人国沙文主义”，“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是联共（布）控制其他党的工具”，等等。这些反苏言论通常是以左的词藻掩盖起来的，即“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只有南斯拉夫才真正代表着“革命的社会主义”^①。从吉拉斯、伏克曼诺维奇^②、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令人怀疑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听到这些关于苏联的言论，当然让人觉得好笑。但问题在于，这些言论在南斯拉夫的许多高级领导人中久已流传，如今还在流传，这自然正在造成一种恶化联共（布）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关系的反苏气氛。

我们当然承认，任何一个共产党，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权批评联共（布），如同联共（布）也有权批评其他任何一个共产党一样。但马克思主义要求批评应该是公开的，真诚的，而不能是背地里的，诽谤性的，从而剥夺被批评者对批评进行答辩的机会。然而，南斯拉夫活动家们的批评不是公开的和真诚的，而是背地里的和没有诚意的，同时还具有两面派性质，因为他们一面背地里以其“批评”来败坏联共（布）的声誉，一面却在公开场合伪善

① 这些言论出自拉夫连季耶夫的汇报。1948年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审查关于1948年2月10日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三国莫斯科会晤情况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工作报告。拉夫连季耶夫得到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言的情报，并向莫斯科做了汇报。

② 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时任南斯拉夫人民军政治部主任。

地颂扬它，把它说得天花乱坠。正因为如此，这种批评就变成了诽谤，变成了企图损害联共（布）声誉、丑化苏维埃制度的手段。

我们相信，如果南斯拉夫的党员群众知道这种反苏批评是异己的、怀有敌意的，他们一定会愤怒地驳斥它。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活动家们背着群众暗地里进行这些批评的原因。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当托洛茨基打算向联共（布）宣战时，他也是从指责联共（布）蜕化变质、犯有狭隘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开始的。当然，他左右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词藻掩盖了所有这一切。然而，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本人就是蜕化变质分子，而当他被揭露后，他便公开转到联共（布）和苏联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营垒中去了。

我们认为，托洛茨基的政治生涯足以发人深省。

第二，目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状况令我们感到不安。作为执政党，南斯拉夫共产党迄今尚未完全合法化，仍然处于半合法的状态，这使我们感到惊奇。党的机构的决定通常不在报刊上发表。党的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也从不公布。

在南共党内生活中看不到有充分的民主。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不是选举的，而是指派的。党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值得注意的是，党中央主管干部的书记是国家安全部长。换句话说，党的干部实际上受国家安全部长的监督。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党应该控制一个国家的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国家安全部在内，而在南斯拉夫恰恰相反，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在控制着党。这大概是南斯拉夫党员群众的独立自主性尚未达到应有程度的原因。

显然，我们不能认为这样一个共产党组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是布尔什维克组织。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看不到有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资本主义成分正在农村中迅速增长，在城市中也很活跃，而党的领导并未采

取措施加以限制。南斯拉夫共产党被资本主义成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种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搞得昏昏沉沉，而这个理论是从伯恩斯坦、福尔马^①和布哈林那里沿袭来的。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的纲领，不能混同于非党群众。在南斯拉夫则恰恰相反，人民阵线被认为是主要的实际领导力量，而且有人企图把党溶入人民阵线。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说：

“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有没有什么不同于人民阵线纲领的另外的纲领呢？没有。共产党没有另外的纲领。人民阵线的纲领就是党的纲领”。

在南斯拉夫，这个关于党组织的奇怪理论似乎被认为是一种新理论。其实这里毫无新东西。早在40年前，俄国一部分孟什维克就提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溶入非党工人群众组织，并以后者代替前者；而另一部分孟什维克则提议把马克思主义政党溶入非党工农劳动群众组织，并以后者代替前者。众所周知，列宁当时认为这些孟什维克是用心险恶的机会主义者和党的取消派。

第三，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间谍韦莱比特还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担任第一副部长。^②南斯拉夫的同志们都知道，韦莱比特是英国间谍。他们甚至还知道，苏联政府的代表也认为韦莱比特是间谍。尽管如此，韦莱比特依然是南斯拉夫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南斯拉夫政府也许正是想把韦莱比特作为英国的间谍加以利用。众所

^① 福尔马，格奥尔格（1850～1922），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主张通过议会斗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② 韦莱比特，弗拉迪米尔（1907～？），1943年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派驻开罗的军事使团团长，后任最高统帅部驻伦敦军事使团团长。回国后历任外贸部副部长、外交部副部长。

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保证博得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感而把它们的间谍作为自己的工作人，是完全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可以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控制之下。我们认为，这种政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苏联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同南斯拉夫政府的通信往来置于英国间谍的监督之下。显然，由于韦莱比特依然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领导层，苏联政府认为自己被置于困难的境地，不可能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系统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开诚布公的通信往来。

这就是引起苏联政府和联共（布）中央不满并导致苏南之间关系恶化的事实。

如上所述，这些事实与撤回军事和文职专家的问题没有联系，但它们是恶化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受联共（布）中央委托 维·莫洛托夫（签名）

约·斯大林（签名）

1948年3月27日于莫斯科^①

① 这封引起苏南全面论战的信是由莫洛托夫的助手拉夫洛夫专程送到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随后，拉夫连季耶夫在阿尔米业尼诺夫的陪同下来到了萨格勒布，将这封信交给了当时正在那里的铁托。

№01626

铁托、卡德尔关于答复对南共的指责 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

(1948年4月13日)

致约·维·斯大林、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在答复你们1948年3月27日的来信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强调指出，来信的语气和内容使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我们认为，信中之所以有这样的内容，即在某些问题上有这样的指责和态度，原因在于对我们这里的情况缺乏了解。对于你们的结论，我们只能用这样的事实来解释：这些不准确的和带有偏见的情报，苏联政府一定是从自己的机构那里得到的，而这些机构由于对情况不熟，一定是从形形色色的人——或者是某些反党分子，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不满者——那里得到这种情报的。在南共中央全会上，已经完全搞清楚并且得到证实，南共中央委员斯·茹约维奇和安·赫布朗是向苏联驻南斯拉夫代表提供不真实和诽谤性情报的罪人，这种情报既有关于所谓某些领导人言论的，也有关于我们整个党的。^① 他们想用这种不

^① 在这次会议上，茹约维奇支持苏联的立场受到一致批判，同时对茹约维奇秘密向苏联大使馆提供关于1943年3月1日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报提出指控。茹约维奇参加了那次讨论对苏关系的会议，并在会后将会议情况通报给拉夫连季耶夫。拉夫连季耶夫向莫斯科汇报后得到了莫洛托夫的指示，3月7日拉夫连季耶夫通知茹约维奇，“他转来的有关南共中央工作状况的情报已收到，我们的党中央对此感谢茹约维奇同志，并认为，他这么做无论是对苏联来说，还是对南斯拉夫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他揭露了南共中央内苏联的虚假朋友”。同时还要求茹约维奇今后继续向苏方提供情报。赫布朗因接受审查被软禁而没有出席这次中央全会，但铁托仍在会议上指控他是“使苏方对我们中央不信任的罪人”，不过，对此没有提出具体的证据。

真实的、诽谤性的情报来掩盖其反党活动，掩盖其很早就已表现出来的破坏领导人与全党之间团结的倾向和企图。此外，来自这些人的情报既不可能是客观的，也不可能是善意的和准确的，而且通常还具有特定的目的。具体到这件事来说，这种情报的目的是污蔑我们党的即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给本来就已经繁重的国家建设工作增加困难，阻止五年计划的执行，从而阻止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的实现。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苏联的代表机构至今没有设法首先向我国负责人核对这些情报，并请求南共中央或者政府提供有关问题的资料。我们认为，提供这样的情报是反党活动，也是反对国家的活动，因为这会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

无论我们每个人多么热爱社会主义的故乡苏联，但他热爱同样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自己的国家决不亚于热爱苏联，具体来说就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的千千万万最先进的人们已经为之牺牲了生命。我们深知，在苏联，人们对此也是这么理解的。

使我们感到特别惊讶的是，当卡德尔、吉拉斯和巴卡里奇作为我们党和政府的代表在莫斯科时，^①对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进行讨论。从你们的来信可以看出，早在我们的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之前，你们的政府就掌握了上述情报及类似的情报。在我们看来，与军事专家和文职专家的关系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本来在当时就可以向我们的代表团提出。

我们认为，当时有必要通过这个代表团，甚至在此之前，还可以通过更好的方式，告知我国政府，说苏联政府不满意我方人员对待苏联专家的态度，并采取某种方式消除这种状况。可事情竟弄到如此地步：苏联政府在没有任何正式通知的情况下就决定撤回其军事专家和文职专家，从而使我们面临既成事实，给我们增添了不必

^① 指参加1948年2月10日苏南保秘密会晤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访问。

要的困难。

至于撤回一些苏联军事专家的问题，我们是由于财政困难而决定把苏联专家的人数减少到必需的最小程度，除此之外，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早在1946年，联邦政府总理铁托就曾正式通知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几乎不可能付给苏联军事专家如此高的工资，请他将此情况连同我们希望苏联政府降低专家报酬条件的要求一并转告苏联政府。拉夫连季耶夫大使带来了苏联政府的答复，说报酬不能减少，要我们自便。铁托随即对拉夫连季耶夫说，既然如此，我们只好在不给我军建设带来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尽快地减少专家的人数。苏联专家的报酬比我国集团军司令员的报酬高三倍，比我国联邦政府部长的报酬高两倍。我国一名中将或上将军衔的集团军司令员那时每月工资是9000~11000第纳尔，而一位中校、上校和将军军衔的苏联军事专家，每月则拿到30000~40000第纳尔。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个联邦政府部长每月的工资是12000第纳尔。显而易见，我们感到这不仅是一种财政上的负担，而且在政治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对此很难向我国人员进行解释。可见，我们做出减少苏联军事专家人数的决定，正是出于上述原因，别无其他任何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排除我们有些人可能说过某些不合时宜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向我們提供这方面的可靠材料，毫无疑问，我们会采取措施，以便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这里同时需要提一下，也有某些苏联专家的表现并不总是象应该做的那样，这就给我们的人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因此也就违背我们愿望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议论，这种议论后来被歪曲了，而这些被歪曲了的议论又传到了苏军司令部。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不应当损害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

对信中提到的关于吉拉斯旧事的那一部分，尤其使我们感到惊讶。信中说：“根据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理解吉拉斯在一次南共

中央会议上所发表的那篇侮辱苏联军队的尽人皆知的言论，说什么苏联军官在道德方面还不如英国军官。”吉拉斯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早在1945年铁托就已对此作过书面和口头说明^①，无论斯大林还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当时都同意这一解释^②。所以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你们把曾被证明是歪曲了的而且是不准确的指责重新作为论据提出来。我们再次强调指出，无论吉拉斯还是我国领导人中的任何人，对苏联军官都没有这样的看法。只有既是苏联的敌人又是南斯拉夫的敌人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的贸易关系中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加以解决，以使这种关系能够正确发展。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否认，我方在进行贸易业务中有过失误，但我们不能相信这可以成为任何削弱我们贸易合作的充足理由。我们不能认为克鲁季科夫和我国外贸代表之间发

① 关于吉拉斯当时所说的话，事后吉拉斯曾写信向斯大林解释，他的原话是：“从外表举止看，在意大利的英国军官和在南斯拉夫的英国军官对待我们军官的态度要比这里的苏联军官好。自然，英国人有自己见不得人的打算。但是，如果苏联指挥官们不是像对待朋友和同盟者那样对待我们，敌人就会利用这一点”。吉拉斯还承认“本来不应该在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耶夫将军面前说这样的话”，但他强调“我们是作为共产党员在他面前说的”。尽管这封信没有发出，但铁托于10月29日也直接给斯大林写了大体同样内容的一封信，信中指出红军一些官兵的不体面行为，并说“我们的军队和人民对此非常痛心，因为，我们的军队和人民非常崇拜红军，并把他们理想化了”。“我担心，各种各样的敌人会为了自己的目的，即反对苏联和我们的人民解放运动而利用这些事情”。铁托还解释说：“有关这一切我很早以前就想向您汇报了，但又放弃了，而是邀请你们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科尔涅耶夫中将来，请求他尽快采取措施，哪怕只是减少这样的现象也好，同时，我还请求他，让他亲自将这些情况向莫斯科报告。”铁托在信的最后写到：“用这件事打扰您，我感到不安，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必须把这一切向您通报并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使这些现象不再发生。”

② 1945年4月，以铁托、吉拉斯为首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会谈中南斯拉夫方面就这一问题向斯大林做了详细的解释，斯大林对此表示满意，并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生的事情只是一种误会。克鲁季科夫曾明确地对我国代表说，已在贝尔格莱德等候启程赴莫斯科的我国贸易代表团不要来了，因为苏联政府不能签署在1948年进一步交换货物的议定书，他还说，只有到1948年底才有可能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克鲁季科夫把这番话告诉了我国外贸部副部长茨尔诺布尔尼亚同志和我国驻莫斯科贸易专员。当我国贸易代表们问起，这是否就是苏联政府的态度时，克鲁季科夫作了肯定的回答。

我们认为，如果我国贸易机构方面有什么差错——我们相信在供货和整个贸易关系中可能有这种事情——那么可以找到某种方式，使我们双方达成一致，并消除一切妨碍我们两国之间正常发展贸易关系的因素。

我们认为，我们双方应当共同研究和消除一切妨碍两国之间经济合作正常发挥职能的因素。

你们在来信中断言我们的国家安全机构监视苏联专家和其他苏联人，这不符合事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所以监视苏联人是一种谎言。这是有人捏造的情报。说苏联政府的代表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尤金同志也受到了这种监视，就更离奇了。

我们不明白，有什么人需要这种诽谤，使苏联政府因此而产生误解，上当受骗。我们希望告知我们有关这一情况的具体事实。

从你们3月27日的来信中可以得出结论，我们这里正在进行反对苏联的，自然也是反对联共（布）的批评。来信说南共领导人正在进行这种批评。信中还说，这种批评是背着党员群众进行的，是不真诚的，是背地里的，是虚伪的等等。同时还列举出古拉斯、伏克曼诺维奇、基德里奇和兰科维奇等人的名字。这就是说，列举了新南斯拉夫一些最著名的、最受人爱戴的、在我党多次处境困难

时都经受过考验的领导人的名字。

我们很难理解，怎么可以提出如此严厉的指责，而不说明这些指责的来源。更令人惊奇的是，竟然把我们领导人的言论同托洛茨基从前的言论相提并论。来信中引述了所谓他们言论的一些片段，诸如：“联共（布）正在蜕化变质”，“苏联盛行大国沙文主义”，“苏联正企图从经济上支配南斯拉夫”，“共产党情报局是联共（布）控制其他党的工具”。接着说，“这些反苏言论通常是以左的词藻掩盖起来的，即‘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只有南斯拉夫才真正代表着‘革命的社会主义’。”

诸如此类的言论是在长时期内从各种可疑人物那里搜集到的，并带有偏见地被硬说成出自新南斯拉夫领导人之口，于是报告给了苏联领导人。毫无疑问，根据这些言论可以得出错误的结论，可以把它们看做是反苏言论。但我们认为，根据从身份不明的人那里获得的可疑情报做出结论，而对那些在南斯拉夫广泛宣传苏联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并在解放战争中赢得极高声誉的人们提出在来信中所列举的指责，是不公道的。难道能够相信那些在监狱中服过六年、八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苦役的人——他们坐牢的原因之一就是广泛地宣传了苏联——会像你们3月27日来信中所描绘的那样吗？不能。而新南斯拉夫当今最高领导人中的大多数正是这些人，他们曾于1941年3月27日带领群众上街反对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的反人民政权，因为该政权签署了反共产国际的协定，并企图把南斯拉夫套在法西斯轴心国的战车上^①。也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苏联

^① 1941年3月25日，在希特勒德国的压力下，南斯拉夫王国政府首相茨韦特科维奇签字同意南斯拉夫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不是“反共产国际协定”）。3月27日，在南斯拉夫许多城市开始了群众性的抗议示威活动，推翻了茨韦特科维奇政府。参加此项活动的有各种派别的反希特勒势力和爱国力量，南共也起了积极作用。

深信不疑而于1941年组织了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起义。^①还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手握钢枪行进在奋起反抗的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最前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作为惟一真诚的同盟者站在苏联一边作战，他们之所以在最黑暗的日子里相信苏联一定会胜利，正是因为过去信仰、今天仍然信仰苏维埃制度，信仰社会主义。

这样的人不可能用自己的行动来“丑化苏维埃制度”，因为这意味着背叛自己的信仰，背叛自己的过去。我们认为，评价这些人，不应当根据可疑的情报，而应当根据他们多年的革命活动。

由于这些人——如来信中所说——把联共（布）说得“天花乱坠”，就称他们是两面派，这简直令人感到可怕和受到侮辱。来信中还说：“我们相信，如果南斯拉夫的党员群众知道这种反苏批评是异己的、怀有敌意的，他们一定会愤怒地驳斥它”。是的，如果真的像来信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对此也深信不疑。“我们认为，这就是南斯拉夫活动家们背着群众暗地里进行这些批评的原因”。然而，过去对群众不可能有任何的隐瞒，原因很简单，因为对苏联或联共（布）不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批评。

这里把领导与群众对立起来是错误的。说它错误，是因为现在的南斯拉夫领导人与群众是一个整体，他们在战前一起反对反人民的政权，在伟大的解放战争期间并肩战斗，而今天在建设国家和实现社会主义方面共同努力，因此他们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不少苏联人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即南斯拉夫的广大人民群众对苏联的好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在源自沙皇俄国的某些传统的基础上产生的。事情并非如此。对苏联的热爱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① 这里指1941年7月7日开始的人民解放武装斗争，这场斗争由南共组织和领导，并于1941年夏秋期间席卷了整个南斯拉夫。南共在告人民书中强调指出，苏联进行的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争“也是我们的斗争”。

它是由现在的新南斯拉夫领导人，首先包括那些在来信中受到如此严厉指责的人，持续不断地灌输到广大党员群众和全体人民中去的。新南斯拉夫领导人正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早在战前就不惜劳苦和牺牲，坚持不懈地向人民讲述有关苏联的真实情况，在南斯拉夫人民群众中播下了热爱社会主义故乡的种子。

例如，莫洛托夫同志就说过，吉拉斯曾指示不要在党校和党员培训班学习《联共（布）党史》^①。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因为不存在这样的指示，谁也没有作过这样的指示，甚至在目前，我国所有党校和许多培训班还都在学习《联共（布）党史》。在这方面，惟一真实的是，吉拉斯多次在党的会议上讲过，基层党组织中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党员错误地理解了《联共（布）党史》中的某些问题，他们把这些问题与南斯拉夫的发展机械地加以比较。例如，关于革命的两个阶段问题，关于军事共产主义问题，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等等。如果要让这些党员准确理解某些问题，最好先学斯大林的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

在此有必要强调指出，《联共（布）党史》在战前和战争期间一共秘密印刷过四次，战后又用各种民族语言印刷了25万册。列宁和斯大林的其他著作也是如此，例如，《列宁主义问题》印刷了12.5万册。

关于你们来信中提到的南共党内生活问题，可以看出你们得到了完全错误的情报并产生了错误的印象。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你们对我们党的评价。

南共中央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不是指派的。事情是这样的：在第

^① 这里指的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莫洛托夫的话引自1948年4月6日他与南斯拉夫驻苏联人使弗·波波维奇的一次谈话，波波维奇因参加4月12～13日南共中央全会而返回贝尔格莱德后将此次谈话报告了铁托。

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这次会议于1940年12月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南斯拉夫的110名代表，根据共产国际的一项决议，这次会议拥有代表大会的一切权利），选举产生了由31名中央委员和1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南共中央委员会。其中在战争期间牺牲了10名中央委员和6名候补中央委员。在1940年选举产生的7名政治局委员中有5人现在还活着，并且还在工作。政治局邀请了在贝尔格莱德的南共中央委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在南共中央委员会里只有7名新委员是指派的，而且原来都是候补中央委员或党的最优秀的领导人。此外，战争期间南共中央委员会还开除了两名委员，所以如今还活着并工作的有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19名南共中央委员和7名指派的中央委员。因此南共中央委员会由26人组成。事情就是这样。

至于说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里需要指出，南共中央政治局筹备南共党代表大会已有一年^①。我们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应当有所准备，以使其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将是一次通过党章和党纲的代表大会。晚些时候，人民阵线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也将采纳这个纲领。

来信中根据什么断定我们党内没有民主？也许是根据拉夫连季耶夫的情报吧？他是从哪里得到这种情报的？我们认为，他作为大使无权向随便什么人打听关于我党工作的情报，这不是他的职责。这种情报联共（布）中央可以向南共中央索取。

南共主管组织工作的书记同时又是国家安全部长这一事实，丝毫不妨碍党组织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党没有被置于国家安全机构

^① 在1948年4月12-13日举行的南共中央全会上决定近期召开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1948年5月20日的南共中央全会上规定了开会的确切日期，即7月21日。

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是通过南共中央实行的，国家安全部长就是南共中央委员。此外需要补充说明，南共中央干部局局长是泽科维奇，而不是兰科维奇。

说我们党内没有批评的自由，这是不真实的。我们党内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由。在定期的党的会议和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都可自由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可见，有人臆造了这种不真实的材料并作为情报递交给联共（布）中央。

所谓南共党内不存在阶级斗争的政策和城乡资本主义成分日益增长等等，是完全不真实的。举世皆知，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像南斯拉夫那样彻底的、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那么这种情报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些事实是任何人也无法反驳的。因此，我们不理解，有些人怎么可以把伯恩斯坦、福尔马、布哈林和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我们的党相提并论。我们不能不来自卫，抵制这种错误评价和对我党的侮辱。

来信中还谈到铁托同志在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从中摘录了一小段^①，并把它与40年前孟什维克取消社会民主党的图谋相提并论。

第一，这是40年前在沙皇制度下的事情，而如今是我们在南斯拉夫掌握着政权，即南共在政府中起着领导作用。根据社会发展的进程，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组织形式，改变工作方法和领导群众的方式，以便顺利地达到既定目的。

第二，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就其本质而言，不仅相当于某些可以吸收任何人入党的共产党，而且在组织上和开展活动方面还要更

^① 关于这个问题，铁托在发言中还说：“南共在人民阵线中起着领导作用”。“成立新国家后，在建立人民政权也就是国家机构、建设国家、经济和文化生活等方面，共产党已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它是作为人民阵线的主要组成部分来完成这个作用的，因为党在人民阵线中起主导作用”。

好些。虽然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现有成员 700 万左右，但并不是无论什么人都能参加进去的。

第三，南共在人民阵线内的领导权是完全有保证的，因为南共是人民阵线的核心。可见，不存在任何如来信中所说的南共消失在人民阵线中的危险。南共通过人民阵线逐渐实现自己的纲领。人民阵线自愿接受这个纲领，认为它也是自己的纲领。这就是铁托所说的南共没有另外纲领的根据。

对我们作如此的描述，我们感到遗憾。我们也希望注意这样的事实，即在某些国家，某些共产党不仅改变了工作方式，而且还改变了党的名称，如在保加利亚和波兰就是这样，^①这不会没有得到联共（布）的同意^①。当然，在这些国家，这些党走这条道路是必要的。但在我们这里，以南共为首组成了人民阵线，南共在其内部严密地组织起来，并把人民阵线的几百万群众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这种作法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虽然也有别的党具有与其国内新的特定条件相适应的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却不曾有人责备他们消失在群众之中。

那么，为什么有人怀疑我们这里的那些不容否认和早已为大家熟知的事实呢？我们深信，我党在战时和战后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说明南共是强大的，团结一致的，它有能力领导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有能力在任何困难的形势下带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前进。

我们党并不是如来信中所说的处于半合法状态，而是完全合法的，南斯拉夫人人都知道它是领导力量。

很遗憾，问题恰恰是你们不了解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性质，因而批评我们，说我们不公布党的会议和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从联

^① 1942 年重建的波兰共产党，改名称为波兰工人党；1944 年秋保加利亚共产党开始称为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主义者）。

邦政府到其下属机构，一切有关社会和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比较重要的决定都是党的决定，或者是根据党的倡议做出的，而我们的人民就是这样理解并接受这些决定的。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强调某某决定是在党的某次会议上做出的。

我们党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今天不仅在本国而且在全世界都赢得了崇高的声望，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还要着重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它遵循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并且适应于具体条件地运用了联共（布）的经验。因此，我们不理解你们在信中的断言，说什么我们的领导人在反对联共（布）的同时，却假惺惺地“伪善地颂扬它，把它说得天花乱坠”。

我们不能相信联共（布）中央会对我们党迄今所做出的贡献和取得的成就提出质疑，因为我们记得许多苏联领导人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对此曾多次予以承认。正是这样，我们坚持认为，南斯拉夫社会变革中的许多具体方面可能有益于其他国家的革命发展，而且正在被他们采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联共（布）的作用和苏联的社会制度置于次要的地位。相反，我们正在研究苏维埃制度并把它作为榜样，问题只是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以多少有些不同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在现阶段，在我们国家现有的特殊条件下，并考虑到解放战争后形成的国际环境，我们力求采取最适宜的工作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证明我们的道路比苏联走过的道路好，我们在搞什么新花样，而是因为现实生活每天都在迫使我们这样做。

至于谈到韦莱比特和他为什么现在还在外交部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卡德尔和吉拉斯告诉莫洛托夫同志，韦莱比特的情况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具体证据，甚至今天也还没有，这件事仍在审查之中，我们不想仅凭怀疑就把一个人

撤职和毁灭。

对韦莱比特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就要求我们处理他，这不是太匆忙了吗？首先，韦莱比特 1939 年入党，而在此前，他就为党作过重大贡献。他于 1940 年接受了铁托委派的一项秘密任务，在萨格勒布用他的名义租用一幢别墅，在别墅里安置共产国际的电台，瓦尔兹作为报务员与他的妻子一起住在那里^①。同时，韦莱比特还执行信使任务。所有这些工作在敌人占领下持续了一段时间，这当然意味着他有生命危险。1942 年，韦莱比特遵照党的指示参加了游击队，表现出色。后来他接受了在国外的任务，并且完成得很好。我们现在正在审查他的全部历史。如果苏联政府掌握有关他的什么具体材料，我们要求将这些材料转给我们。但不管怎样，我们将立即解除他在外交部的职务^②。

可见，你们因此而在来信中提出的指责，实在是令人吃惊的，而且是对南共中央和我们整个政府的侮辱。你们把我们与那些旨在取宠于某些大国而对间谍持容忍态度的资产阶级国家相提并论。以下就是来信中的内容，而我们认为对待一个非常友好的和坚定同盟国的政府这种内容是不能容忍的：“南斯拉夫政府也许正是想把韦莱比特作为英国的间谍加以利用。众所周知，资产阶级政府认为，为了保证博得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感而把它们的情报作为自己的工作，是完全容许的。为此目的，甚至可以同意把自己置于这些大国的控制之下”。来信中就是这么写的。人们看了这封信，不可能

① 瓦尔兹是南共党员约瑟普·科皮尼奇的化名，曾在苏联受过训练并参加「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他在南斯拉夫萨格勒布的秘密电台工作，这个电台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进行联系，1943 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后，该电台负责联共（布）中央与许多国家共产党的联系。

② 韦莱比特被解除在南斯拉夫外交部工作的借口是他需要长期休假治疗。苏南公开决裂后，恢复了韦莱比特在外交部的职务。

不由于来信中以如此手段对待一个这样的政府而深感痛心和震惊，这个政府代表着1600万人民，他们站在苏联一边，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做出了极大牺牲，如果需要的话，他们今后还将成为斗争中最可靠的同盟者。

如果你们问我们，有没有对你们方面不满意的事情，那我们会坦诚相告，有很多我们所不满意的事情。那些事情呢？这些事情虽然不可能在这一封信中都列举出来，但我们还是要举出其中的一些。首先，我们认为，苏联情报机构在我们这个正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里招募我国公民充当其间谍是不正常的，我们只能把这理解为违背我国利益的事情。尽管我们的领导人和国家安全机构对此已提出抗议，并通知你们这是不能允许的，但仍然出现了这种事情。正在被招募的人包括我们的军官、各级领导人和一些对新南斯拉夫持否定态度的人。

我们有这样的证据，有些苏联情报机构的特务在招募我们党员时，挑拨对我们领导人的怀疑，试图破坏他们的威信，说他们不称职、不可靠。例如，斯捷潘诺夫上校早在1945年招募我们的一位在我国国家安全部密码编译处工作的好同志时，就肆无忌惮地中伤我国的所有领导人，并挑拨对他们的怀疑，还说什么“暂时让铁托元帅工作是出于需要”。这样的事情至今还在继续。这就意味着，这种招募不是为了反对某个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势必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招募正在破坏我们的内部团结，使人们失去对领导的信任，涣散人心，败坏领导人的名声，并且成为搜集假情报的来源。苏联情报机构的这种活动，对于正在向社会主义前进并且是苏联最忠实盟友的我国，不能说是忠诚的和友好的。

我们不能允许苏联情报机构在南斯拉夫建立自己的情报网。我们有对付各种外国资本主义分子和国内阶级敌人的国家安全部和自己的情报机构，如果苏联情报机构需要某种情报或需要这方面的帮

助，他们随时可以提出要求，并得到满足，我们方面至今一直在这样做。

诸如此类我们不满意的事情还有很多，但这是否能够成为恶化我们相互关系的理由呢？不能。这是一些可以消除和解释的问题。

苏联和南斯拉夫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显然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但为此需要绝对的相互信任，否则我们两国之间就不可能有稳固而持久的关系。苏联人，首先是苏联领导人，应当相信，新南斯拉夫及其现在的领导人正在坚定不移地走向社会主义。

其次，你们应当相信，在现任领导人领导下的今日的南斯拉夫是苏联最忠实的朋友和盟国，它准备在严峻考验中与苏联各族人民同甘共苦。

最后，因为新南斯拉夫直接面对着不仅危及它本身的和平发展，而且也危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甚至苏联和平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所以我们感到，新南斯拉夫尽可能强大是符合苏联的利益的。因此，虽然我们知道苏联由于重建被破坏了的国家而正经历着巨大困难，但在对苏联各族人民不造成物质损失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期待苏联对我们国家的建设和五年计划的实现给予帮助。

根据以上所述，南共中央全会不能认为你们在来信中对我党工作和领导人所作的那种评价是正确的。我们深信，这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严重误会，为了有利于我们两党为之奋斗的事业，这种误会应当尽快加以消除。

我们惟一的愿望是，对于我们南共中央对联共（布）和苏联怀有的同志式和兄弟般忠诚感情的任何怀疑和不信任应当予以消除，我们永远感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迄今指引我们并将继续指引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忠于曾经是并将继续是我们的伟大榜样的苏联，并高度珍视苏联对我国各族人民的帮助。

我们相信，只有通过我们两党中央在发生误会的地方即在我们

这里进行全面的相互交谈，这一误会才能消除。所以，我们建议联共（布）中央派出一名或几名中央委员，他（们）在我们这里将有一切机会严肃认真地弄清任何一个问题。

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建议。

此致

同志式的敬礼

受南共中央委托 铁托、卡德尔

1948年4月13日于贝尔格莱德

No01627

南共中央关于中央全会决定给 联共（布）中央的通报

（1948年4月13日）

致联共（布）中央

本月12日和13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南共中央全会，除两人外全体到会，两人中一人（巴卡里奇）因病，即因正当理由缺席，另一人（赫布朗）正在接受审讯。共有25名中央委员出席。全会详细研究了联共（布）中央3月27日的来信以及写这封信的背景，除茹约维奇外，一致得出如下结论：

一、全会对联共（布）与南共之间终于出现的种种分歧深表遗憾，因为这些分歧有可能使我们两党的共同事业受到严重损害。

二、全会确认，南共工作中存在着错误和缺点，但并不是那种据此就可以做出联共（布）中央来信中所述那些结论的错误和缺点。

三、全会确认，那些结论只有在情报不充足和不正确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而这首先是我国某些反党不良分子向苏联机构提供了虚假的、诽谤性的或带有偏见的情报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

四、全会确认，对苏联机构提供那种情报负主要责任的是南共中央委员斯雷腾·茹约维奇和安德里亚·赫布朗。这个多次因错误而受到处分的反党集团企图用诽谤来掩盖其旨在破坏领导人与党之间集中统一的反党活动，说什么我党领导人发表反苏言论，而（他们）想显示自己是苏联的保卫者，并且是反对我们领导人和我们党

的（保卫者），但我们党却以多年的工作证明自己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忠于和热爱联共（布）和苏联的。

五、全会确认，茹约维奇—赫布朗集团反党活动的目的是破坏南共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团结，挑拨和削弱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最密切合作、相互帮助和兄弟般可靠的关系，因此这表明他们既敌视南斯拉夫，也敌视苏联。

根据这一切并鉴于其过去的反党活动，全会决定把茹约维奇开除出南共中央，并对他以及赫布朗在党内进行进一步审查。

六、全会坚信，一切妨碍南共与联共（布）以及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继续发展并巩固兄弟般和同盟者关系的因素必将消除。

七、全会责成中央政治局采取一切措施，以根除党内和人民阵线内所有可能破坏南共与联共（布）之间以及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兄弟般关系的现象。

全会赞成中央政治局为消灭国内资本主义残余而提出的措施。

全会赞成中央政治局为加快筹备应于今秋举行的南共代表大会而提出的措施。

八、全会赞同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附上的信并希望和深信，南共中央与联共（布）中央代表之间将尽快进行必要的个人接触，这种接触尽可能在这里即在实际上可以核查所有事实的南斯拉夫进行，以彻底消除目前误会的一切根源。

No 01628

日丹诺夫关于转交匈共信件致铁托的信

(1948年4月14日)

绝密

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书记铁托同志

兹遵照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的要求，按情报交换途径向你们通报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今年4月8日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①。

联共（布）中央书记 安·日丹诺夫

1948年4月14日

^① 斯大林向南共中央发出3月27日的信件后，便将这封信抄送给共产党情报局其他各成员国，并且未等南共中央的复函，就要求各党根据联共（布）的材料，对苏南冲突问题表示态度。同时，各党的答复按要求应先交给苏联党，而不得直接交给南共中央。匈牙利共产党的答复是最早的。以后，苏联驻贝尔格莱德的代表还将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和保加利亚党的答复转交给南共。

No01629

南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公开苏南 分歧致日丹诺夫的信

(1948年4月16日)^①

致联共（布）中央日丹诺夫同志

4月16日，尤金同志向南共中央总书记铁托同志转交了日丹诺夫同志的信件，并附有今年4月8日匈牙利共产党中央的决议。从这些文件可以得出结论，联共（布）中央已将其3月27日致南共中央的信件转发给了其他党的领导机构。我们对联共（布）中央的这一举动感到非常惊讶，理由如下：

第一，联共（布）中央采取这样的举动，没有征得南共中央的同意，没有等待南共中央的答复，而且根本没有同南共中央一起对3月27日来信中所陈述的论据进行核实。

第二，兄弟共产党因而得到的通报是片面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南共中央的意见，所以南共中央受到如此广泛的批评，以致根本无法对这种批评的错误论据进行申辩^②。

① 档案原作未注明发信日期，此外所标为起草该信的日期。

② 4月16日接到匈牙利党的信件后，南共立即举行了政治局会议，一方面起草了这封给日丹诺夫的回信，一方面决定将南共中央对联共（布）中央3月27日信件的复函转发给共产党情报局各成员国，希望他们在做出判断之前听取双方的意见。然而，除了季米特洛夫私下对吉拉斯说“要坚持下去”外，各党都一律表示支持苏联党的意见，尽管或多或少有些勉强。当时，法共和意共对此保持沉默。

据此，南共中央政治局不能同意联共（布）中央的这种举动，认为这种举动无助于消除和澄清导致联共（布）中央与南共中央之间产生分歧的原因。

No03446

波波维奇关于会见莫洛托夫致铁托电

(1948年4月19日)

元帅亲收

在星期六的8点钟，也就是刚刚回到这里，我就通知了莫洛托夫^①。我被告知，他很忙，只能在星期一接见我。今天3点钟我同他进行了会晤。我向他转交了三封信^②。他说，等他们了解一下信的内容后，再给予他们认为应该的答复，他在此之前已经知道了我们回信的内容。我向他通报了会议的过程，中央全会的团结一致，茹约维奇、赫布朗和古斯廷契奇所从事的敌对活动，总之，我向他阐述了会议的全过程和结果。我的印象是，他基本上没有听进去我所讲的话。他连一个问题都没有向我提出。当我讲完时，他对我说，我讲的这一切与我动身回贝尔格莱德之前他交给我信时我对他说过的话不相符^③。当我问他，他指的是什么时，他回答说，准确的他也不记得了，但是，我当时对他讲的我们那里出现的一些现象，他们在信里都已经写了。于是，我建议，让我向他再重复一遍我们会谈的过程，但他根本不愿意听，并站了起来，会谈就这样结

① 星期六即1948年4月17日。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弗·波波维奇是在参加了南共中央4月12~13日全会后，从贝尔格莱德返回莫斯科的。

② 其中两封信是铁托、卡德尔4月13日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见本卷文件No01626），南共中央4月13日给联共（布）中央的通报（见本卷文件No01627），另一封信不详。

③ 指波波维奇动身回贝尔格莱德参加南共中央全会之前，莫洛托夫约见他时的谈话。谈话时，莫洛托夫将苏共3月27日给南共中央的信交给了波波维奇。此时，南共中央已经收到这封信，但在莫斯科的波波维奇还不了解该信的内容。

束了。

上次同莫洛托夫谈话的过程我已经向您作了口头汇报。但是，莫洛托夫这样认为，令我很惊讶，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逐字逐句地复述一下我在动身的前一天同他的两次谈话过程。莫洛托夫是4月6日星期三的午后4点钟接见我的。他对我说，致我们中央的信是根据联共（布）中央的决定由他和斯大林签名的。接着，他又补充说，他们已经决定让我了解信的内容，因为他们能够做到对我什么都不隐瞒，而他们认为，根据一切现象来看，我对这些事情都不清楚。

他简单地向我叙述了信的内容。同时，他还讲了一些信中没有提到的事情，比如，匈牙利人对他提到的吉拉斯的声明，即我们不需要学习联共（布）的历史，又如，以前他们指责过的我们的声明，即南斯拉夫不允许自己成为大国的筹码。他当时还问我，我们中央有几名委员，是否定期开会，等等。他说完后，又问我是否有什么要说的。我说，他所说的一切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判决，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无论是我，还是我们领导人中的什么人，从来都没有想过，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我相信，他们也未能真正理解这样的决定。但是，无论对我们来说多么困难，我坚信，我们的领导人，我们的党是会战胜一切困难的，并将惩处把事情弄到这种地步的罪人。接着莫洛托夫说，他们对我们取得的成绩感到很高兴，信中也写了这一点。还说，他们感到应该更谨慎一些，因为他们相信了吉拉斯，但又确信他在耍手腕。最后，他祝愿我们取得成绩，于是，我们就分手了。

当天夜里12点钟，莫洛托夫又邀请了我。他说，他们决定将信的文稿交给我。当时，我问他，他们是否考虑，等我们的代表团来到时，可以同他们讨论并弄清楚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只有双方直接会晤并进行相互交谈，才能正确解决我们之间的

问题，除此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对此他没有做任何答复。当我问他，根据他们的意见，在这封信之后，信中提到的那些同志是否能够继续留在中央时，他沉思了一下，然后说：“我们不相信空话，只相信行动。”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讨论下去。然后，我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封信。他没有明确回答，反而问我，我们的最后一次党代会是什么时候召开的，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是什么时候选举出来的。当我告诉他这是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结果时，他说，这已经很久了，解放已经三年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召开党代会，这是不能容忍的^①。然后，他又补充说，对于我们的领导人及其工作的这种看法，不仅他们有，其他党也有。他还谈到了匈牙利人对他说过的话，即在热列兹尼卡，人数众多的党的基层组织是怎样进行秘密集会的，他们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也是完全错误的。接着，他又说，他们清楚，我们的任何决议都不以书面形式转发给基层组织，他们认为，这也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仅此而已。如果我能够确信，对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事情能得到顺利解决，我将准备接受最严厉的判决。我是完全自觉地和凭良心请求您做出您认为需要做出的决定，如果这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请不要考虑我。以后，我会努力地、富有成效地履行我的职责，恳请您注意这一点。

波波维奇

^① 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是1940年10月召开的。1944年9月至1945年5月南斯拉夫逐步从德国占领下完全解放出来。

№03447

**莫洛托夫关于会见波波维奇给
拉夫连季耶夫的通报（摘录）**

（1948年4月19日）

4月19日我接见了波波维奇，他将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对我们信的答复，以及南共中央全会就此问题所做的决议通报一并转交给我。波波维奇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对联共（布）中央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全会，除一人外，一致同意下列结论：南斯拉夫从来没有任何人做过联共（布）中央的信中所提到的那些声明。波波维奇还说，联共（布）中央的信大概是依据了不正确的和带有偏见的情报，这些情报是从挑拨者以及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苏南友好关系的敌人那里得到的。鉴于这一点，也就是说，联共（布）中央的信不是友好的批评，而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指责，因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

我回答说，我们将让中央了解这些信件并在认为需要时说出自己的意见。我还对波波维奇说，他今天说的话与上一次谈话时他对我说过的话相互矛盾，当时他说，我们信中指出的那些情况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里是存在的。……

№07491

拉夫连季耶夫与贝勃勒关于苏南关系 恶化问题的谈话记录（摘录）

（1948年4月21日）

摘自 А. И. 拉夫连季耶夫日记

秘密

发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瓦·佐林，归档。

今天贝勃勒^①打电话给我说，他想见我，以个人的方式交换一下某些问题的意见。他表示希望来我这儿。……

二、贝勃勒声明他没有受任何人委托，来我这儿是出于个人的意愿。他希望在私下和我谈一谈一些使他特别激动的问题。他指的是苏南关系问题。他不理解，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我们两国关系的恶化。……

按贝勃勒的说法，南斯拉夫占有特别的地理位置，因此，他们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具有特殊的改革任务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南斯拉夫是苏联的一部分，那么南斯拉夫面临的这些特殊性和特别的困难就不成立了，南斯拉夫也就没有独立地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任务了。就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况——南斯拉夫须独立地克服自己内部的困难和独立解决对外政策的问题，所以要求南斯拉夫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应有必不可少的效率和那种区别于苏联的政策。可能会出现双

^① 阿勒什·贝勃勒，时任南斯拉夫副外长。

方利益不一致的问题。照贝勃勒的说法，因此，苏联方面有可能不满意南斯拉夫奉行的路线，因为没有在所有的对外政策问题上与苏联进行咨询协商。贝勃勒不止一次地重复，他不清楚导致我们两国关系现在这种状况的原因。

我回答，关于苏联和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变及他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贝勃勒应该去找自己的领导解释。但我也说明，我个人不同意贝勃勒所说。南斯拉夫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它应该有另外的和特殊的对外政策。我说，按照各自的倾向，对外政策只能有两种思想体系——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体系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的思想体系。在实行对外政策时可能出现个别的问题，需要用不同的策略处理，但所有基本的对外政策问题无疑应该出于一个坚定的目的，那就是符合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利益。所以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之间在对外事务方面存在一致的立场是很重要的。我指的不是在一些小问题上进行协商，而是指在那些重要的政策问题上要有协商和一致的立场。有些问题，看上去只是地方上的问题，但它们可能引起严重的复杂的国际事端，是很重要的问题。其中包括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的发展局势，它是与全世界的政治相联系的，任何不小心的一步都可能加深事情的复杂化，况且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想使欧洲这部分地区局势复杂化，以此在世界舆论和自己国家的舆论面前，为他们在该地区的帝国主义行径开脱。

贝勃勒承认一些事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地方性问题会给世界局势以重大影响。

贝勃勒接着说，以他的理解，看来苏联方面认为南斯拉夫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太尖锐了。在布拉格三国外交部长协商会议前，铁托元帅接见了南斯拉夫代表团，并指出他们在国际会议上提出的问题过于尖锐，所以铁托建议代表团发言再温和一些。

我回答，我不是讲这些与铁托元帅有关的事，也不是想用某种

形式和通过其他渠道说出莫斯科方面的不满。相反，我清楚，南斯拉夫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比其他东欧代表团积极，总是与苏联代表团联系。因此可以认为，铁托在贝勃勒和西米奇去布拉格前对他们所谈的意见，并不是由于苏联对南斯拉夫代表团在前次国际会议上执行的路线表现出了什么不满引起的，而是铁托本人提出的。

三、在谈话中贝勃勒通知我，由于把一些南斯拉夫军队集中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边界，并向阿尔巴尼亚派遣了南斯拉夫军事代表团，两三个星期前美国大使凯诺拜访了他。他以个人名义向贝勃勒说明：按他的推想，美国政府不会支持希腊政府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边界采取任何调整军事力量的措施。然后过了五天，凯诺重新拜访了贝勃勒向他说明，他曾以自己名义向贝勃勒说明的事，现在可以看做是美国政府的正式声明。南斯拉夫外交部将此事通报了自己在所有重要国家的大使馆。贝勃勒推想，波波维奇大使一定将此事通报了苏联外交部。

我说，关于此事一点儿也不知道。

四、关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关系，贝勃勒说，季米特洛夫从捷克斯洛伐克回来时在贝尔格莱德将停留一两天，讨论保南联盟问题。按贝勃勒的说法，科斯托夫^①向驻索非亚的南斯拉夫大使齐齐默尔说，莫斯科表示支持在近期建立这种联盟。齐齐默尔为此回到贝尔格莱德，现在南斯拉夫政府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但贝勃勒想，在研究这个联盟问题时，将有许多经济方面的困难，因为保加利亚在这方面准备甚少。所以贝勃勒不排除，开始时提出的是政治联盟问题，而后将解决的还有经济联盟问题。

^① 科斯托夫，特赖乔（1897～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战时在党内领导抵抗运动，季米特洛夫回国前任保共总书记，1946年3月起任政府副总理。1949年作为铁托分子被处决。

五、临走时，贝勃勒又回到他所关心的南苏关系现状问题。因为改善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使的工作，贝勃勒希望波波维奇能够在这方面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回答说，苏联大使馆永远采取客观的立场评价南斯拉夫的情况，不可能有其他的态度。对于贝勃勒的意见，所谓需要改善我们国家之间关系的说法，我回答说，按我个人的意见，需要纠正南斯拉夫所犯下的错误，听取莫斯科对此提出的意见。贝勃勒提出，莫斯科采用了各种情报，可能有些情报不符合真实情况。我回答贝勃勒，莫斯科只采用客观和准确的情报。

我的印象是，贝勃勒是受委托而来的，以不清楚情况为掩饰，来查明大使馆如何解释苏南关系的恶化。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 拉夫连季耶夫

№01630

莫洛托夫致拉夫连季耶夫转 贝勃勒的电报（摘录）

（1948年4月23日）

……南斯拉夫政府从它不与苏联协商即向美国人和英国人陈述其对的里雅斯特^①问题的立场时起，就违反了不久前签订的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相互协商的协定^②，因此，苏联政府认为自己不受上述协商协定的约束，不能把自己关于南斯拉夫与奥地利边界问题的观点通知南斯拉夫政府，而将就此问题在伦敦举行的四国政府代表会议上陈述自己的立场^③。

……同时还请通知南斯拉夫政府，波波维奇大使没有通知苏联政府，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几周前向南斯拉夫政府声明美国不会支持希腊政府用武力改变阿尔巴尼亚—希腊边界的措施……

① 1947年2月根据法国方案通过的对意和约确定，的里雅斯特及其周围有争议的地区作为自由区分两部分，分别由英美军队和南斯拉夫军队占领，并在联大安理会与南、意两国协商的基础上选派一名总督进行管理。由于长期协商没有结果，1948年3月20日，美英法三国发表宣言，支持意大利对自由区的主权要求。3月22日，南斯拉夫政府向美英法三国发出抗议照会，同时建议南意直接谈判解决自由区的问题。苏方的指责就是针对这一举动的。4月13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认为西方的建议不能接受。的里雅斯特问题的最终解决是1975年10月通过南意双方签约完成的。

② 指1948年2月11日莫洛托夫强迫卡德尔签订的一份备忘录，文件规定，苏联和南斯拉夫应在关系到两国的重大国际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

③ 1948年4月17日，南斯拉夫副外长阿勒什·贝勃勒向拉夫连季耶夫通报说，南斯拉夫与奥地利在卡林西亚（克恩滕）地区存在着边界划分问题，南斯拉夫方面希望得到该地区一块居住着大量斯洛文尼亚居民的土地。上述建议将提交苏、美、英、法四国副外长例行会议解决。贝勃勒表示希望在会前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03448

西米奇关于与拉夫连季耶夫会谈 的纪要（摘录）

（1948年4月23日）

.....

他拿起了记录^①。他立即提出了下列意见：您转交给我的复信文本，我将提交给我国政府，我只是想强调一点，苏联政府对于我向您阐述的业已形成的事实不负责任，我也将提请我国政府注意这一点。至于贝勃勒副部长1948年3月21日征求过苏联政府的意见，并同代办^②谈过话，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他只是将准备好的作为对西方国家答复的文本的复印件转交给了他，并谈到打算向意大利建议缔结和平条约。对贝勃勒所说的一切，代办都做了记录，最后，还给他读了一遍。记录里面并没有要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或者请求同意的内容，这只是一个信息罢了。

^① 指拉夫连季耶夫对西米奇宣读的声明的记录。为了答复4月23日早晨拉夫连季耶夫转交给贝勃勒的电报（文件№01630），当天傍晚，南斯拉夫外交部长西米奇约见了拉夫连季耶夫，并宣读了南政府的声明。声明说：“南斯拉夫政府将拟定给西方大国提出的关于审查对意和约，即意大利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归属问题的建议的答复，提前24小时通报给了苏联政府。它期待苏联政府对如此重要和迫切的问题能提出自己的意见。由于苏联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南斯拉夫政府就做出了它认为需要的相对意大利的民主力量有益的答复。南斯拉夫政府认为，这件事不能成为废除关于协商的协定的原因。”会谈时，苏联人使馆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在座。

^② 指苏联大使馆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

他从莫斯科回来时^①曾提请我注意，不要期望莫斯科对这个通报做任何答复。然而，在已经确定了新闻记者招待会，而照会也转交给了西方大国代表们的时候，他又提请我注意，如此重要的问题，应该同苏联政府商量，实质上，这是对审查和平条约的立场问题。他还要我注意，如果我们同意发表一个声明，要求作为“信息”通报的那个问题只是向苏联提出的，那么，我们还有时间进行选择。

我的意见是，这只是形式上的看法，贝勃勒的过失在于，当已经通报了问题的全部实质后，他没有向代办强调要询问苏联对这件事意见。对于我的意见，他回答说，苏联政府在没有就这个问题受到询问时，是不会说出自己的意见的，此外，关于相互协商的协定的内容要比对已经形成的意见进行一般通报要广泛得多。

在这次会谈结束时，我再次强调说，这大概只是技术上的失误，而实质问题仍然是我们在的里雅斯特问题和日益临近选举的意大利问题上的利益，最后，由于纯粹的国内政策原因，对西方大国有关审查对意和约问题上的挑拨性建议需要立即做出答复。……我们的立场丝毫也没有使的里雅斯特的的问题复杂化，并且有助于粉碎西方大国在选举前进行的挑拨行为，最后，那种认为我们破坏了关于相互协商的协定的说法，与我们的立场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① 拉夫连季耶夫3月22日回到贝尔格莱德。

№07492

拉夫连季耶夫与别洛夫斯基 关于保南联盟问题的谈话记录

(1948年4月27日)

摘自 A. И. 拉夫连季耶夫的日记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瓦·佐林，归档。

我正式回访了别洛夫斯基^①。

别洛夫斯基通知说，季米特洛夫从捷克斯洛伐克回来途中，将不准备按最初打算的那样在贝尔格莱德停留^②。没有向别洛夫斯基讲明，为什么季米特洛夫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决定。当此事通知南斯拉夫外交部时，对方对此事表示不满。

别洛夫斯基指出，在《新马其顿》报上刊登了关于保加利亚大国沙文主义的大块文章。这些文章片面和错误地阐述了一系列问题。别洛夫斯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得不向南斯拉夫人做出说明。他甚至声称，显然南斯拉夫人夸大了马其顿问题，而实际上是想把马其顿问题与保南联盟这个总体问题放到一起解决。

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 A. И. 拉夫连季耶夫

① П. 别洛夫斯基，时任保加利亚驻南斯拉夫大使。

② 1948年4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布拉格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保捷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01631

联共（布）中央关于南共问题致南共中央的信

（1948年5月4日）

机密

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你们的答复及由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签署的关于1948年4月13日南共中央全会决议的通告均已收到。

很遗憾，这两个文件，特别是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签署的文件，与南斯拉夫人的前几个文件相比不仅没有任何进步，反而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使冲突更加尖锐。

该文件使用的语气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种语气只能被认为是太傲慢。文件中看不到有弄清真相、老实承认其错误和承认必须改正这些错误的愿望。南斯拉夫同志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批评，而是采取了庸俗化的态度，即把批评看作是对南共中央威信的侮辱，是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自尊心的伤害。

南斯拉夫领导人为了摆脱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采用了一种“新”方法，即矢口否认自己的错误的方法，尽管这些错误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否认1948年3月27日联共（布）中央信中所叙述的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文件。看来，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不懂得，这种矢口否认事实和文件的幼稚的作法决不能使人信服，而只能引人发笑。

一、关于从南斯拉夫撤回苏联军事顾问的问题

联共（布）中央在其3月27日的信中陈述了撤回苏联军事顾问的理由，同时声明，联共（布）中央的情报是基于这些顾问因南斯拉夫负责官员对苏军及其驻南斯拉夫代表的不友好态度而提出的申诉。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完全否认这些申诉，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联共（布）中央为什么要相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而不相信苏联军事顾问的大量申诉呢？我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呢？苏联几乎在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的军事顾问。必须强调指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我们驻这些国家的军事顾问的任何申诉。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在这些国家没有因苏联军事顾问在那里的工作而产生任何误会。在这方面，仅仅在南斯拉夫存在这种申诉和误会。问题只能这样解释，南斯拉夫在苏联军事顾问周围制造了一种特别不友好的气氛，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列举了用于付给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顾问薪金的大量开支，强调苏联驻南斯拉夫将军们收入的第纳尔比南斯拉夫将军高出两至三倍，他们认为这种情况会引起南斯拉夫军事人员的不满。但是第一，南斯拉夫将军除了领取第纳尔以外，还享有住房、佣人、食品等等实物福利；第二，付给苏联驻南斯拉夫将军们的那份货币工资完全与他们在苏联国内得的货币工资相等。苏联政府当然不能同意降低派往南斯拉夫的苏联将军们的工资。

用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将军们的开支对南斯拉夫预算来说可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但在这种情况下，南斯拉夫政府应当及时找苏联政府商谈，并建议苏联政府承担一部分开支。毫无疑问，苏联政府会同意这样做的。然而，南斯拉夫人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他们不是和睦协商地解决这一问题，而是开始侮辱苏联军事顾问，骂他们是

寄生虫，并且败坏苏军的声誉，乃至在苏联军事顾问周围已经形成了不友好的气氛之后，南斯拉夫政府才同苏联政府进行交涉。苏联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

二、关于苏联驻南斯拉夫的文职专家问题

联共（布）中央在3月27日的信中陈述了从南斯拉夫撤回文职专家的理由。联共（布）中央这样做，依据的是苏联文职专家的申诉和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的报告。从这些申诉和报告中可以得出结论，苏联文职专家以及联共（布）驻共产党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实际上受到南斯拉夫国家全部的监视。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其来信中否认这些申诉和报告的真实性和真实性，硬说南斯拉夫国家全部没有监视驻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但是联共（布）中央有什么理由相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毫无根据的说法，而不应当相信包括尤金同志在内的苏联人的申诉呢？苏联政府在各人民民主国家都派有文职专家，但并没有从他们那里接到任何申诉，他们与这些国家的政府也没有发生任何误会。请问，为什么这些误会和冲突只发生在南斯拉夫？难道不是因为南斯拉夫政府对包括尤金同志本人在内的驻南斯拉夫的苏联人采取了一种反对他们的特别方式吗？苏联政府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不得不从南斯拉夫撤回自己的文职专家。

三、关于韦莱比特和南斯拉夫外交部中其他间谍的问题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声称，在与莫洛托夫同志会晤中，卡德尔同志和吉拉斯同志谈到对韦莱比特的怀疑时，仅仅说过“韦莱比特的情况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是不真实的。事实上，在这两位

同志与莫洛托夫同志交谈时，曾谈到过韦莱比特有充当英国间谍的嫌疑。很奇怪，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认为免去韦莱比特在外交部的任职就等于毁灭了他。为什么不毁灭韦莱比特就不能撤销他在外交部的任职呢？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关于保留韦莱比特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职位的理由的说法也很奇怪，似乎没有解除韦莱比特职务是因为他正在接受审查。正是因为韦莱比特在接受审查而解除他的上述职务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对一个完全敌视苏联的英国间谍如此宽容大度？

韦莱比特并不是外交部机构中惟一的间谍。苏联代表不止一次地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反映，南斯拉夫驻伦敦大使莱奥恩蒂奇是英国间谍^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潜伏的老牌英国间谍至今还留在南斯拉夫外交部机构中？

苏联政府获悉，除莱奥恩蒂奇外，还有另外三个名字尚待查证的南斯拉夫驻伦敦大使馆工作人员，也是为英国情报机关服务的。苏联政府这样说，是完全负责任的。

人们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从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举止看，他俨然是南斯拉夫的主人，而他的人数不断增加的“情报员”可以自由自在，逍遥法外？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刽子手奈迪奇的亲友如此轻而易举地被安置在南斯拉夫的国家 and 党的机关里，那也是令人费解的。

很清楚，既然南斯拉夫政府坚持拒绝肃清其外交部机构中的间谍分子，苏联政府就不得不终止通过南斯拉夫外交部与南斯拉夫政府进行公开的通信往来。

^① 莱奥恩蒂奇是战前南斯拉夫的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由南共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后在南斯拉夫新政府中担任过重要外交职务。日前尚未看到苏联代表于1948年5月之前“不止一次地向南斯拉夫领导人反映”他是英国间谍的材料。

四、关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和苏维埃国家的问题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其1948年4月13日的来信中写道：“我们认为，他（苏联大使）作为大使无权向随便什么人打听我们党的工作情况。这不是他的职责”。

我们认为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是反苏的。显然，他们把一个作为代表苏联共产党政府在南斯拉夫共产党政府时期驻在南斯拉夫的身负重任的共产党人的苏联大使与一个作为旨在动摇南斯拉夫国家基础的资产阶级国家普通官员的一般资产阶级大使等同起来。很难理解，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怎能如此荒唐，这些同志懂不懂得，如此看待苏联大使意味着否定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些同志懂不懂得，一个代表作为把南斯拉夫从德国人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友好大国的身负重任的共产党人的苏联大使，不但有权而且有义务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不时地就所有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交谈？当然，如果仍以与苏联友好关系为基础的话，那怎么可以对这些简单的、起码的道理产生怀疑呢？

应当奉告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与南斯拉夫的看法相反，我们不认为南斯拉夫驻莫斯科大使是普通官员，不把他比作资产阶级大使，不否认他“有权向随便什么人打听我们党的工作情况”。因为他虽然做了大使，但他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所以我们把他作为一个同志和一个共产党活动家来对待。他在苏联人中有熟人和朋友。他是否在“搜集”我们党的工作的情报呢？很可能是“搜集”的。那就让他“搜集”吧！我们用不着对同志们隐瞒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我们自己正在揭露这些缺点，目的是清除它们。

我们认为，不能把南斯拉夫同志对苏联大使的这个看法当作是偶然的。这个看法源于南斯拉夫政府的总的立场，因此南斯拉夫领

领导人往往看不到苏联对外政策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外政策之间的区别，把苏联的对外政策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对外政策等量齐观，认为南斯拉夫对苏联应当实行它对英美帝国主义大国实行的那种政策。

在这方面，铁托同志于1945年5月底在卢布尔雅那的讲话是极有代表性的。他在这篇讲话中说：“有人说战争是正义的，我们也是这么看的。但我们还要求正义地结束战争，我们要求每个人都成为自己占有物的主人，我们不想为别人付账，我们不想成为筹码，我们不想卷入某种势力范围的政治当中”。

这是针对的里雅斯特问题说的。众所周知，在苏联迫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做出有利于南斯拉夫的一系列领土让步后，英国人和美国人与法国人联合起来不接受苏联关于把的里雅斯特移交给南斯拉夫的建议，并用其在意大利的驻军占领了的里雅斯特^①。为了把的里雅斯特移交给南斯拉夫，苏联已使尽了所有其他手段，最后只剩下一个手段：因的里雅斯特而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开战并用武力占领它。南斯拉夫同志不可能不知道，在如此严酷的战争后，苏联已不能再打仗了。然而，这一情况引起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不满，这也反映在铁托同志的讲话中。铁托同志在卢布尔雅那的声明，即南斯拉夫“不想为别人付账”，“不想成为筹码”，不希望南斯拉夫“卷入某种势力范围的政治当中”，不仅是针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也是针对苏联的。^②同时，在这种情况下，铁托同志对待苏联的态度与他对待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没有任何区别，因为他不承认苏联与帝

① 事实上，西方盟军是1945年5月与南斯拉夫军队同时占领的里雅斯特的，而苏联是在6月南斯拉夫被迫撤军后才开始支持南斯拉夫对这一地区的主权要求的。

② 当时南斯拉夫坚持卢布尔雅那声明只是针对西方大国的，苏南关系公开破裂后，南斯拉夫领导人承认铁托的话也是针对苏联的。

国主义国家之间有区别。

在铁托同志这一没有遭到南共中央政治局抵制的反苏观点中，我们找到了南共领导人在为数不多的南斯拉夫党员干部中说什么苏联已经“蜕变”为企图“从经济上控制南斯拉夫”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诽谤性宣传的依据；我们还找到了南共领导人关于联共（布）企图“通过共产党情报局控制其他党”、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已不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等诽谤性宣传的依据。

当时，苏联政府不得不提醒南斯拉夫政府注意，铁托同志的这言论是不能容忍的，而由于卡德尔同志和铁托同志随后就此问题所作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萨德奇科夫同志奉苏联政府指示向南斯拉夫政府发表了如下声明，萨德奇科夫同志是1945年6月5日发表这一声明的：“我们认为铁托同志的讲话是对苏联的恶意攻击，而卡德尔同志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国的读者就是这样理解铁托同志的讲话的，而且对这个讲话不可能有别的理解。请告诉铁托同志，如果他再允许对苏联进行这样的攻击，我们将被迫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以作答复，并对他进行反驳。”

铁托同志在苏维埃国家问题上的反苏立场，必然导致南斯拉夫领导人把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与资产阶级的人使们等同起来。

看来，南斯拉夫领导人打算今后仍然坚持这种反苏立场。南斯拉夫同志应当注意，坚持这样的立场就意味着放弃与苏联的一切友好关系，背叛苏联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他们还应当考虑到，他们坚持这样的立场就意味着放弃自己要求苏联给予物质援助和任何其他援助的权利，因为苏联只向自己的朋友提供援助。

为使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明白起见，我们应当强调指出，这种针对苏联大使和苏维埃国家的反苏观点我们只在南斯拉夫才能看

到，而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我们的关系过去和现在都是友好的和完善的。

值得指出的是，现在与铁托同志完全一致的卡德尔同志，在三年前对铁托同志在卢布尔雅那的上述讲话曾经有完全不同的评价。当时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萨德奇科夫同志是这样向我们报告 1945 年 6 月 5 日他与卡德尔同志的谈话的：

“今天，6 月 5 日，我向卡德尔通报了你们提出的意见（铁托尚未回来）。通报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想了一下说，他认为我们对铁托讲话的评价是正确的。同时他也同意苏联今后不能再容忍这种言论。卡德尔说，当然，在南斯拉夫处于如此困难的时刻，公开批评铁托的言论对他们来说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将尽力避免发表类似的言论。但是，如果再出现这种言论的话，苏联将有权进行公开批评。这样的批评对他们来说将是有益的。卡德尔请求向你们转达对这一及时批评的谢意。卡德尔表示，这一批评将有助于改进他们的工作。对于 3 月份政府声明中政治错误的批评，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卡德尔相信，这次批评也将有助于改进政治领导”。

“卡德尔在试图（很谨慎地）分析错误的原因时说，当然，铁托在消除共产党内以前的派别活动和组织人民解放斗争方面都有巨大功劳，但他有时倾向于把南斯拉夫看做是一个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没有普遍联系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其次，党内已形成这样的状况，党中央并未作为组织和政治中心而存在。卡德尔说，我们偶尔开开会，做出一些并不重要的决定。实际上我们中每一个人都自行其是。工作作风不好，工作中缺乏集体主义。卡德尔接着说，我们希望苏联不要把我们看做是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另一个国家的代表，而要看做是一个未来苏维埃共和国的代表，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看做是苏联共产党的一部分，这就是说，我们的关系应当建立的南斯拉夫将成为苏联的组成部分这一前景上。因此，他们希

望我们坦率地、公开地批评他们，向他们提出意见，以指引南斯拉夫的内政政策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我回答卡德尔说，应从实际出发，也就是从南斯拉夫是一个独立国家，南斯拉夫共产党是一个独立政党出发。我说，你们应当而且可以独立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只要你们要求我们提出建议，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拒绝。我们对南斯拉夫有明确的根据条约承担的义务，而且更多地有道义上的义务，当你们需要我们提供建议和帮助时，只要有可能，我们从来也没有拒绝过。每当我向莫斯科转告铁托元帅的请求时，我都得到立刻答复。但是，只有在你们通过决定或发表声明之前及时地通知我们，提供这种建议才是可能的和有益的”。……

我们姑且不谈卡德尔同志关于把南斯拉夫当作苏联未来组成部分、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当作联共（布）一部分的幼稚的和错误的论调。但是，我们想提请注意卡德尔同志就铁托同志在卢布尔雅那的反苏讲话和南共中央的不良习气提出的批评性意见。

五、关于吉拉斯同志关于情报机构和 贸易谈判的反苏言论问题

我们在3月27日的信中讲述了吉拉斯同志在一次南共中央会议上的反苏言论，他说苏联军官在道德方面不如英军军官。吉拉斯同志的这个言论涉及到少数驻南斯拉夫苏军军官的不道德行为。我们把吉拉斯同志的这一讲话看做是反苏言论，是因为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吉拉斯同志在谈到两三名苏联军官的过失时，没有看到解放了欧洲各族人民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军队与为了压迫而不是解放世界各族人民的资产阶级的英国军队之间的基本区别。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1948年4月13日的来信中声称：

“吉拉斯从来没有以这样的方式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又说“早在1945年铁托就曾以书面和口头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解释”，“无论斯大林同志还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当时都接受了这一解释”。我们认为应当指出，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这一说法不符合事实。

请看当时斯大林同志在其给铁托的电报中对吉拉斯同志的讲话是如何反应的：“我了解贝尔格莱德解放后你们处境的困难。然而，你们必须知道，苏联政府尽管遭受了巨大牺牲和损失，但还在尽一切可能帮助你们。可是，这样事实使我感到吃惊，即你们把驻南斯拉夫个别红军官兵的个别事件和错误普遍化并扩展到整个红军。你们不能如此侮辱正在帮助你们驱逐德国人，并在与德国侵略者作战中流血牺牲的军队。没有家丑的家庭是不存在的，这并不难理解，但如果因为有家丑而侮辱全家，那就令人奇怪了。如果红军战士得知吉拉斯同志和那些对其言论不予反驳的人认为英国军官在道德方面比苏联军官高尚，那他们就会因受到这样的委屈而大吵大闹^①”。

我们认为，吉拉斯同志的这个反苏讲话没有遭到南共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反驳，这就是南共领导人对苏军驻南斯拉夫代表进行诽谤性宣传的基础，而这种宣传就是我们撤回军事顾问的原因。

吉拉斯同志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它的结果是吉拉斯同志与南斯拉夫代表团一起来到莫斯科向斯大林同志道歉，并请求忘掉他在南共中央会议上所犯的令人遗憾的错误。

显然，事情完全不像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来信中所写的那样。吉拉斯同志的错误不是偶然的。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指责苏联人，说他们似乎在招募南斯拉

^① 如前注所述，南斯拉夫代表团向斯大林解释这件事是在1945年4月，而斯大林这封电报是1944年10月31日发往贝尔格莱德的。

大公民为其情报部门做事。他们写道：

“我们认为，苏联情报机构在我们这个正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里招募我国公民充当其间谍是不正常的，我们只能把这理解为违背我国利益的事情。尽管我们的领导人和国家安全机构对此已提出抗议，并通知你们这是不能允许的，但仍然出现了这种事情。正在被招募的人包括我们的军官，各级领导人，和一些对新南斯拉夫持否定态度的人”。

我们声明，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这个讲话充满了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恶意指责，根本不符合事实。

如果要求正在南斯拉夫工作的苏联人缄默不语，不与任何人交谈，那是非常荒谬的。苏联工作人员都是政治上成熟的人，而不是无权关心南斯拉夫正在发生的事情的雇佣工作者。他们当然要与南斯拉夫公民交谈，向他们提出问题，向他们了解情况，等等。只有不可救药的反苏分子，才会把这些交谈看作是企图为情报机构招募人，而且是招募那些对新南斯拉夫“持否定态度”的人。只有反苏分子才会认为，苏联领导人不如南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那样关心新南斯拉夫的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只在南斯拉夫出现了这些对苏联代表的无理指责。在我们看来，这种对苏联工作人员的无理指责，目的是为了证明南斯拉夫国家全部监视驻南斯拉夫的苏联工作人员是有道理的。

必须提出，来到莫斯科的南斯拉夫同志通常可以完全自由地走访苏联各城市，同我国人民接触，并且自由地同他们交谈。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对他们进行过任何限制。吉拉斯同志最近还来过一次苏联，他在莫斯科住了一阵后到列宁格勒去了几天，同那里的苏联友人进行了交谈。按照南斯拉夫的公式，有关党和政府工作的情报只能向党中央领导机关或政府领导机关索取。但是，吉拉斯同志不是

从苏联的这些机关，而是从这些机构在列宁格勒的地方机构得到的情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询问吉拉斯同志在那里做了什么，他搜集了哪些情报^①。我们的看法是，他在那里不是为英国、美国或法国的情报部门搜集情报，而是为南斯拉夫的领导机关搜集情报。既然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就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因为从这些情报中可以找到对南斯拉夫同志有益的东西。吉拉斯同志说不出他受到过什么限制。

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为什么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共产党人享受的权利就应该比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享受的权利少一些？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4月13日的来信中再次谈到苏南之间的贸易关系问题，硬说克鲁季科夫同志拒绝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继续进行贸易谈判的要求。我们已几次向南斯拉夫同志解释过，克鲁季科夫同志否认强加于他的这些话。我们同时也已说明，苏联政府从来没有提出过中止同南斯拉夫的贸易谈判和贸易业务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到此为止，不打算再讨论这个问题了。

六、关于南共中央政治局在南斯拉夫阶级斗争方面的错误政治路线问题

我们在信中写道，在南斯拉夫共产党内不存在阶级斗争政策的精神，资本主义成分正在农村和城市增长，而党的领导没有采取措施来限制资本主义成分。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矢口否认这一切，把我们这一具有原则

^① 吉拉斯在1948年1-2月访苏期间与列宁格勒有关机构的会谈都是苏联官方组织的，并且吉拉斯的活动一直有联共（布）中央机构负责人列沙科夫的陪同。

性的论断看做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种诬蔑，并且回避对实质问题进行回答。这些同志的论据只不过是所谓南斯拉夫正在进行切实的彻底的社会变革。但这种说法却是十分不充分的。这些同志否认在当今南斯拉夫条件下资本主义成分正在加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农村阶级斗争正在激化这一事实，所依据的是一种机会主义观点，即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不是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的那样变得更加尖锐，而是如布哈林之流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正在熄灭，他们鼓吹的是一种资本主义成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朽理论。

谁也不会否认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所进行的社会变革的深刻性和重要意义。但是，联共（布）从来没有因这一事实而得出结论说，在我国阶级斗争正在削弱，在我国不存在资本主义成分增长的危险。列宁曾在1920—1921年指出，“我们暂时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在俄国，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①。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后的15年间，起先是关于采取措施限制农村资本主义成分，后来是关于把富农作为最后一个资本家阶级加以消灭的问题，从未离开过我党的议事日程。在保障南斯拉夫建成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方面，低估联共（布）的这一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对共产党员来说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不能只在城市和工业中建设社会主义，也应当在农村和农业中建设社会主义。

南共领导人回避关于阶级斗争和限制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问题不是偶然的。更有甚者，在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讲话中往往闭口不谈农村中阶级分化的问题，农民被看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党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58。

也不动员起来去克服由于农村剥削成分增加而造成的困难。但是，南斯拉夫农村的政治形势没有理由让人盲目乐观和温厚宽容。在南斯拉夫，土地没有实行国有化，存在着土地私有制和买卖土地，富农手里集中了大量土地并使用雇佣劳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南共用抹杀阶级斗争和调和阶级矛盾的精神教育党，就势必会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困难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使南斯拉夫共产党陶醉于从伯恩斯坦、福尔马和布哈林那里搬来的资本主义成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理论。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某些显要领导人在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问题上背离马列主义路线也不是偶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出发点是承认工人阶级在消灭资本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方面的领导作用，而南共领导人却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只要指出铁托同志1946年11月在萨格勒布的如下讲话（见1946年11月2日《战斗报》）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们并不是为了要获得农民的选票才对他们说，农民是我们国家最牢靠的基础，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人”。

这个观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完全抵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在包括人民民主国家在内的欧洲，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农民。至于农民，或者更确切地说，农民的大多数，即贫农和中农，可以或者正在与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在这个联盟中起领导作用的依然是工人阶级。其实，铁托同志的上述观点不仅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而且还宣布全体农民——其中也包括富农——是新南斯拉夫最牢靠的基础。显然，这个观点表达了适合于小资产阶级政治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

七、关于南共中央政治局在党与人民阵线 之间关系问题上的错误政策

我们在上一封信中写道，在南斯拉夫，有人认为国家的主要领导力量不是共产党，而是人民阵线；南斯拉夫领导人削弱党的作用，实际上把党融合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中，因而也就犯了40年前俄国孟什维克犯过的那种原则性错误。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对此予以否认，说什么人民阵线的所有决定都是党的决定，而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强调，是在党的哪次会议上通过了哪些决定。南斯拉夫同志的堕落就在这里，他们害怕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地拥护党和党的决定，让人民知道党是领导力量，是党领导人民阵线，而不是人民阵线领导党。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最高组织形式，它居于所有其他组织之上，在苏联，它居于苏维埃和其他组织之上，在南斯拉夫，它居于人民阵线和其他组织之上。党居于劳动人民的所有这些组织之上，不仅仅是因为它把劳动人民中的所有优秀分子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而且还因为它有自己的特定纲领和特定政策，在此基础上领导劳动人民的所有其他组织。但是，南共中央政治局害怕公开承认这一点，害怕理直气壮地向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宣传这一点。南共中央政治局以为，如果它不着重指出这一点，那么其他政党就没有理由来发展他们的势力，开展他们的斗争。看来，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似乎以为他们用这种廉价的手腕就可以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可以愚弄各个阶级，愚弄历史。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和自欺欺人。只要存在着对抗的阶级，他们之间就会有斗争，而只要有斗争，这种斗争就会合法地或不合法地反映在各个团体和政党的活动中。

列宁说过，党是工人阶级手中最重要的武器。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使这一武器保持战斗准备状态。但是，因为南斯拉夫的同志们收起了党的旗帜，拒绝在人民面前强调党的领导作用，他们正在挫折这个武器，削弱党的作用，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如果认为敌人由于南斯拉夫同志们的廉价手腕而停止战斗，那是荒谬可笑的。就是这个党，应该保持随时准备抗击敌人的战斗状态，而不能麻痹大意，不能收起党的旗帜，不能以为如果不给敌人以借口，他们就会放弃斗争，就会停止以合法的或不合法的手段组织他们的势力。

我们认为，在南斯拉夫这样贬低共产党的作用太过分了。这里说的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与人民阵线之间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在原则上是不正确的。必须考虑到南斯拉夫人民阵线中有阶级成分极其不同的人，其中有富农、商人、小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各种政治团体，包括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在南斯拉夫，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只有人民阵线，而党及其组织都不是公开地以自己的名义出现在人民面前，这一事实不仅削弱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且使一个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党，不能通过公开的政治活动，通过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纲领来赢得人民的信任，并以自己的影响争取更加广大的劳动群众。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忘记了党是要发展的，而且只有在公开的对敌斗争中党才能发展，他们忘记了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廉价手腕和骗人伎俩不可能代替这种斗争，而这种斗争是教育党的干部的学校。顽固地不愿意承认除了人民阵线的纲领南共没有别的纲领这一说法的错误，这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多么严重地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党的观点。在这里我们看到，南斯拉夫共产党有取消主义发展的危险倾向，这对南共本身的生存是一个威胁，而最终将导致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的蜕化变质。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硬说孟什维克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融合

在非党群众组织中的错误是出现在40年以前，因此这些错误与南共中央政治局今天的错误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大错特错了。这两件事之间理论上的联系和政治上的联系是不容怀疑的，因为无论是1907年的孟什维克，还是此后过了40年的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同样都贬低马克思主义政党，同样都否定党作为高于所有其他劳动人民群众组织的最高组织形式的作用，同样都把马克思主义政党融合在非党群众组织中。这里的区别仅仅在于：孟什维克于1906~1907年犯了这些错误，但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受到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批判后没有重犯；而南共中央政治局不顾这一明显的教训，在40年之后还从棺材里拣出孟什维克同样的错误，并宣布它为党的理论。这一事实不仅不能减轻，反而加重了南斯拉夫同志的错误。

八、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令人忧虑的状况问题

我们在上一封信中写道，在南斯拉夫，尽管共产党上台执政已经三年半，但依然处于半合法的状态；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制度，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南共中央的大多数委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指派的。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矢口否认这一切。他们写道：“南共中央的大多数中央委员不是指派的”，“在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上（这次会议于1940年12月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根据共产国际的一项决议，这次会议拥有代表大会的一切权利）选举产生了由31名委员和10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南共中央委员会”，“其中在战争期间牺牲了10名中央委员和6名候补中央委员”，此外还开除了两名中央委员，“如今还活着并工作的有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的19名南共中央委员和7名被指派的中央委员”，目前“南共中央委员会

由 26 人组成”。

这个通报不完全符合事实。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可以看出，在 1940 年 10 月而不是 12 月举行的第五次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的不是 31 名中央委员和 10 候补中央委员，而是 22 名中央委员和 16 名候补中央委员。瓦尔特（即铁托）同志^①就此于 1940 年 10 月底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报告是这样说的：“致季米特洛夫同志。10 月 19 日至 23 日举行了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101 名全国各地推选出来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选举产生了由 22 名正式委员（其中包括 2 名妇女）和 16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大会一致通过。瓦尔特”

如果说经选举产生的 22 名中央委员中牺牲了 10 名，那么还有 12 名经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如果说 12 名中央委员中已开除了两名，那么还有 10 名经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说现有 26 名中央委员，因而如果从这里减去 10 名经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那么剩下的现有中央委员会里还有 16 名指派的委员。由此可见，现在的南共中央委员大多数是指派的。

不仅南共中央委员的情况是这样，地方领导人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是被指派的，而不是由下面选举出来的。

我们认为，在一个党执掌政权并可以享有充分合法地位的条件下，党的领导机构的这种构成方式只能说是半合法的，而这种组织本身也只能是宗派官僚主义的。

不召开党员会议或者是秘密召开会议，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容许的。这必然破坏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背着工人秘密地吸收党员也

^① 铁托战前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出于保密，取名为瓦尔特·弗里德里希。1935 年，铁托作为南共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时，使用的就是这个名字。此后，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包括斯大林在内，都用这个名字称呼铁托。

是不能容许的，吸收党员应当起到重大的教育作用，以便使党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建立联系。

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确实重视自己的党，那它就不会允许党内存在这种状况，它应当在掌握政权后，即三年半以前，立即要求党召开代表大会，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进行改组，并完全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开展活动。

如果党内存在这样的情况，领导机构不是选举产生的，而只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这就谈不上有党内民主，更谈不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知道，党员害怕说出自己的意见，不敢批评党内的一些做法，他们宁愿保持沉默，以免遭到报复。国家安全部长同时也是中央主管干部的书记，或者如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所说的是南共中央的组织书记，这不是偶然的。显然，党员和党的干部被置于国家安全部长的监视之下，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并且是不能容忍的。例如，茹约维奇同志只是在南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不同意南共中央政治局给联共（布）中央的回信草案，就立即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可见，南共中央政治局不是把党看做有权表示自己意见的独立的机体，而是看作其成员没有权利讨论任何问题，只能绝对执行“首长”一切命令的游击队。这在我们这里被称作是在党内推行军事的方法，这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内民主原则是完全不相容的。

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当时也曾企图在联共（布）党内推行军事的领导方法，但他失败了，受到了以列宁为首的党的批判，军事的方法被否决了，而党内民主作为党的建设的最重要原则得到确立。

我们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这种不正常状况对于党的生活和发展是最大的危险。这种党内宗派官僚主义状况消灭得越快，无论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还是对南斯拉夫人民民主共和国，就越有好处。

九、关于南共领导人的骄傲自大和他们对待自己错误的不正确态度问题

从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完全否认南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中存在任何错误，也完全否认在南斯拉夫少数党的干部中正在进行所谓苏联“蜕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之类的诽谤性宣传。他们认为，这里的问题完全是由于向联共（布）中央提供了关于南斯拉夫情况的错误情报所造成的。他们认为，联共（布）中央已经成了由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传播的诽谤性的错误情报的“牺牲品”，并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关于南斯拉夫情况的这种错误情报，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就不会存在任何分歧。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问题不在于南共中央的错误，也不在于联共（布）中央对这些错误的批评，而在于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的错误情报，以及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用这种情报“愚弄”了联共（布）中央。他们认为，如果惩处了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那么一切就都会正常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找到了替罪羊。

我们怀疑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自己是否相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如果他们仍然把它作为真实性说法抓住不放，那是由于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最容易使南共中央政治局摆脱已经陷入的那种困境。他们提出这种荒谬的而且显然是天真的说法，不仅是为了推卸恶化苏南关系的责任，把它嫁祸于苏联，而且是为了诬蔑联共（布）中央，说它急不可待地想搞到所有“带有偏见的”和“反党的”情报。

我们认为，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对待联共（布）中央及其就南斯拉夫同志所犯错误提出的批评性意见所持的这种态度，不仅是无聊的和虚伪的，而且是极端反党的。

如果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希望弄清真相，如果他们面对事实不感到难堪，他们就应当严肃认真地思考如下一些问题：

1. 为什么联共（布）中央关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事务的情报是正确的，没有引起与这些国家共产党的任何误解，而关于南斯拉夫的情报，按照南斯拉夫同志的说法，却是“带有偏见的”和“反党的”，并引起了他们的反苏攻击和对联共（布）中央的敌视态度呢？

2. 为什么苏联与别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日益发展和巩固，而苏南关系却恶化并在继续恶化呢？

3. 为什么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纷纷表示赞同联共（布）中央3月27日的信件并谴责南斯拉夫同志的错误，而坚持自己错误的南共中央政治局却处于孤立状态呢？

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为了揭露南共中央政治局的错误，根本没有必要求助于诸如茹约维奇和赫布朗等个别同志的情报。为此只要从发表在报刊上的南共领导人如铁托、吉拉斯、卡德尔等同志的正式言论中就可以得到足够的材料。

我们声明，苏联人没有从赫布朗同志那里得到过任何情报。我们声明，茹约维奇同志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的谈话，连南斯拉夫领导人错误讲话和反苏讲话内容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对这些同志的惩处不仅是违背党内民主原则的不能容忍的迫害行为，而且证明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反苏立场，因为他们认为，一个南斯拉夫共产党员与苏联大使谈话就是犯罪。

我们认为，南斯拉夫领导人企图推卸恶化苏南关系的责任，以此掩盖这些同志没有承认自己错误的愿望，以及今后继续推行对苏联不友好政策的意图。

列宁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

党是否严肃认真、是否真正履行它对自己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严肃认真的政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就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教育和训练群众^①”。

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明确指出，由于南共领导人拒绝承认和改正自己错误，他们正在极其粗暴地破坏列宁在这一指示中所提出的原则。

我们不得不同时指出，与南斯拉夫领导人不同，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老实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诚心诚意地改正了错误，从而使他们的党能够加强自己的队伍，并教育自己的干部。

我们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不愿意老实地承认其错误并诚心诚意地改正其错误的基础，是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极端狂妄自大。业已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冲昏了头脑，他们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起，什么都满不在乎。他们不仅自己骄傲起来，而且还鼓吹骄傲，他们不懂得骄傲有可能毁灭南斯拉夫领导人。

列宁说：“过去一切存在过的革命政党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不善于看到自己的力量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②”。

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明确指出，由于南共领导人从来不知道谦虚，而且现在仍然陶醉于自己并不是很大的成就，他们已经忘记了列宁的这一指示。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31卷，第39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33卷，第275页。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来信中谈到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劳和成绩，说联共（布）中央过去曾承认这些功劳和成绩，而现在却似乎对它们避而不提了。这当然是不真实的。谁也不能否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功劳和成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共产党的功劳和成绩并不比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少。然而，与唠唠叨叨、大吹特吹得令人厌烦的南斯拉夫领导人不同，这些共产党的领导人谦虚谨慎，没有大谈自己的成绩。

还应当指出，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对革命的贡献比南斯拉夫共产党不是小而是大。如果说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迄今所取得的成绩不如南斯拉夫共产党，这也不是因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有什么特殊本领，而主要是因为南斯拉夫游击队司令部被德国空降兵部队摧毁后，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苏联军队援助了南斯拉夫人民，击溃了德国占领者，解放了贝尔格莱德，从而为南斯拉夫共产党获得政权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可惜的是，苏联军队没有也不可能向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提供这种援助。如果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考虑到这一无可怀疑的事实，他们就会较少吹嘘自己的功劳和成绩，就会表现得礼貌一点，谦虚一点。

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骄傲自大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他们甚至把那种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承认是他们的功劳也归于自己。以军事科学问题为例。南斯拉夫领导人要人家相信，他们用新的理论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这个理论把战争看做是正规军、游击队和人民起义三者行动的结合。其实，这个所谓的理论是老生常谈，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来说，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尽人皆知，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国内战争的整个时期（1918～1921年）都是把正规军、游击队和人民起义三者的行动结合起来的，这

种结合的规模比在南斯拉夫大得多。但是，布尔什维克从未谈过他们由于运用这种军事行动方法而给军事科学加进了什么新东西。他们一点也不谈这种事，因为这种方法远在布尔什维克之前，在1812年俄国反抗拿破仑军队的战争中，库图佐夫元帅就成功地运用过了。然而，库图佐夫元帅也没有自称是运用这种方法的创造者，因为早在库图佐夫元帅之前，西班牙人（“义勇军”）在1808年与拿破仑军队作战时就已开始运用这种方法了。由此可见，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是军事科学中新东西的那个理论，实际上是140年前的老理论，而他们归于自己的那个功劳实际上是西班牙人的功劳。

此外，应当指出，任何领导人过去的功劳并不能排除他们后来犯有严重错误的可能性。我们不能根据过去的功劳而闭眼不看现在的错误。托洛茨基当时也曾对革命有功劳，但这绝对不是说联共（布）就可以闭眼不看他们后来所犯的不能宽恕的机会主义错误，这些错误把他推到了苏联敌人的营垒。

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来信中建议派一名联共（布）中央代表到南斯拉夫弄清苏南分歧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途径是不正确的，因为要谈论的不是核查个别事实的问题，而是原则性的分歧。

众所周知，苏南分歧问题已转达给九国共产党中央，他们有自己的情报局。不让其他共产党参与这件事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建议在即将召开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

受联共（布）中央委托 维·莫洛托夫

约·斯大林

1948年5月4日于莫斯科

No 01632

铁托、卡德尔关于处理分歧问题的意见 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

(1948年5月17日)

致约·维·斯大林同志、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我们收到了你们1948年5月4日的来信。讲述这封来信对我们产生了何等恶劣的影响，那是多余的。它已经使我们相信，我们所作的一切解释都无济于事，尽管我们的解释有许多事实作为根据，说明对我们的一切指责都是提供错误情报的结果。

我们并不回避对于原则问题提出的批评，但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感觉受到如此不平等的待遇，因而我们不能同意现在由共产党情报局来处理这件事。九个党在我们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收到了你们的第一封信，并做出了表示他们各自立场的决议^①。你们这封来信的内容已经不是个别党的内部事务，而是超出了许可的范围，其后果是目前在有些国家，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不仅我们的党，而且我们的整个国家，都在遭受侮辱，我们的国会代表团在布拉格就感到受了侮辱。

所有这一切的后果，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极其严重的。

我们想这样来处理这件事，即我们将在实践中证明对我们的指责是不公正的，这就是说，我们将百折不挠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

^① 这里说的九个党是指组成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九个成员。但实际上应是七个党。联共（布）中央1948年3月27日的信在南共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给了情报局除联共（布）和南共以外的七个党。

仍将忠于苏联，仍将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未来将会像过去一样表明，我们一定实现我们向你们做出的全部诺言。

受南共中央委托 约·布·铁托 爱·卡德尔

1948年5月17日于贝尔格莱德

No 01633

苏斯洛夫关于召开情报局会议致铁托的信

(1948年5月18日)

致铁托同志

亲爱的同志：

联共（布）中央建议6月上半月，大约6月8~10日，召开儿国共产党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以讨论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的现状问题。

关于召开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联共（布）中央建议这次会议在乌克兰南部的一个州召开，联共（布）中央认为这对大多数共产党来说是合适的。一旦得到您的同意，联共（布）中央即确定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具体地点并就此作进一步通知。

请尽可能地在最短期间将您对我们关于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议程、时间和地点建议的意见通知联共（布）中央。

此致

同志式的敬礼

联共（布）中央书记 米·苏斯洛夫

1948年5月18日

№01634

铁托关于南共不出席情报局会议
致苏斯洛夫的信

(1948年5月20日)

致联共（布）中央苏斯洛夫同志

亲爱的同志：

您的来信我于今年5月19日收到。这封信是莫舍托夫同志^①交给我的。我们对邀请南共中央派代表出席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观点，我们已在收到您来信的前两天通过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通知了联共（布）中央。

我们于5月20日在南共中央全会上讨论了您的来信。全会一致做出决定，由于致联共（布）中央的信里所指出的原因，我们不接受出席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的邀请。

此致

同志式的敬礼

受南共中央委托 铁托（签名）

^① 莫舍托夫，时任联共（布）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01635

苏联关于对意和约给南斯拉夫的照会

(1948年5月20日)

就今年4月23日外交部长西米奇先生向苏联大使拉夫连季耶夫递交的南斯拉夫政府对苏联政府声明——由于南斯拉夫政府违反了重大国际问题相互协商的协定，苏联政府认为自己已不受该协定的约束——的答复^①，苏联大使馆受苏联政府委托，谨通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南斯拉夫政府声明说，它关于打算就西方大国所提修订对意和约以使的里雅斯特并入意大利的建议向它们做出答复一事，已在24小时内通知了苏联政府，它等待苏联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而因为苏联政府没有表示自己的任何意见，所以南斯拉夫政府给了西方大国这种它认为对意大利民主力量是需要的和有益的答复。南斯拉夫政府的这一声明与事实显然是矛盾的。大使馆认为有必要提请注意这些事实。

一、今年3月21日晚，外交部副部长贝勃勒先生只是通过新闻途径将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就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修订与的里雅斯特有关的对意和约的建议照会该三国政府一事向苏联临时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作了通报。关于南斯拉夫政府打算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一项正式声明，说它准备以铁托—陶里亚蒂的著

^① 参见本卷文件№03448。

名谈判为基础解决的里雅斯特问题，^① 并与意大利政府签订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一事，贝勃勒先生也只是通过新闻途径向阿尔米亚尼诺夫作了通报。但是，贝勃勒先生没有表示愿意就上述问题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

二、3月22日，拉夫连季耶夫大使在与西米奇部长交谈中提请他注意，贝勃勒先生在3月21日向阿尔米亚尼诺夫通报时提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因此希望在就这些问题发表正式声明之前，南斯拉夫政府应当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

三、此外，根据3月23日公布的通报，南斯拉夫政府已于3月22日中午就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关于修订对意和约的建议向他们递交了照会。由此可以看出，南斯拉夫政府等待苏联政府在24小时内对此做出答复的说法同样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四、从南斯拉夫政府的照会中和外交部长西米奇先生3月22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南斯拉夫政府在没有征求苏联政府意见的情况下表示赞成修订涉及的里雅斯特问题的对意和约，但南斯拉夫政府当时是完全有可能与苏联政府就上述问题交换意见的，何况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向南斯拉夫政府发送的照会只是供参考而已。

上述事实证明，南斯拉夫政府的答复不符合事实，所以该答复不能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据此，违反相互协商协定的全部责任要由南斯拉夫政府承担。

大使馆谨借此机会向外交部表示敬意。

^① 1946年秋季，在贝尔格莱德铁托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举行了谈判。陶里亚蒂建议，双方发表声明，在的里雅斯特主权归意大利但同时享有“真正民主”地位的自治的基础上解决的里雅斯特问题。

№01636

联共（布）中央关于驳斥南共答复 致南共中央的信

（1948年5月22日）

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你们1948年5月17日和1948年5月20日由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署名的来信均已收到。联共（布）中央认为，南斯拉夫领导人通过这些信件进一步加重了联共（布）中央在其1948年5月4日致南共中央信里已指出会带来危害和极为严重后果的那些不可宽恕的原则性错误。

一、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写道，他们感觉自己“受到如此不平等的待遇，因而我们不能同意现在由共产党情报局来处理这件事”。甚至竟暗示，似乎是联共（布）中央使南斯拉夫领导人处于这种不平等地位的。

联共（布）中央认为，这些话没有一句是事实。在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中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的不平等。众所周知，在组建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时所有共产党都是从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出发的，即任何一个党都应当向情报局报告工作^①，正像任何一个党都有权批评其他党一样。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在1947年9月的会议上无一例外地听取了每个党中央

^① 在1947年9月参加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达成的协定中，关于情报局的职能只是规定：“情报局负责组织交流经验，并在必要时在互相同意的基础上协调共产党的活动”。

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九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从任何一个党都有批评其他各党的平等权利出发，对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工作进行了布尔什维克式的严厉批评。尽人皆知，意大利和法国的同志们当时不仅没有对其他党批评他们错误的权利提出异议，相反还以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对待这一批评，并从中得出了应有的结论。下面的情况也是尽人皆知的：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和人家一样，也借此机会在代表会议上批评了意大利和法国同志们的错误，而且也和人家一样，他们并不认为别的共产党因批评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就侵犯了意大利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的权利平等。

究竟为什么南斯拉夫同志们现在如此急剧地转变，要求取消情报局内业已建立的制度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南斯拉夫党及其领导人应当处于享有特权的地位，情报局的规章制度对该党不适用，他们有权批评其他党，而自己则不该受到其他党的批评。但是，这种道德标准——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叫做道德标准的话，与权利平等毫无共同之处。这不过是南斯拉夫领导人代表南共要求的那种任何一个党都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特权。我们一贯采取这样的立场：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有义务向情报局报告自己的工作，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有权利批评其他的党，而没有这个立场情报局就不可能存在和开展活动。南斯拉夫拒绝向情报局报告自己的工作，拒绝倾听来自别的共产党的批评，就意味着侵犯了各国共产党的平等权利。

二、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其5月17日的来信中重复了他们前一封信中的判断，硬说联共（布）中央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批评似乎是以错误的情报为根据的。但南斯拉夫同志举不出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说法。尽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在其来信中写道，他们“在原则问题上不回避批评”，但这一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对联共（布）中央的批评仍然没有给予答复。或许，南斯拉夫领导人实在说不出什么来为自己辩解吧？

或者是南共中央政治局内心意识到它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但由于想要对南共隐瞒这一情况并对它进行欺骗，因而编造不存在这些错误的说法，同时归罪于无辜的人，似乎是他们向联共（布）中央提供了不正确的情报；或者是南共确实认识不到由于它所犯的错误，南共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承认南共中央政治局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无知透顶。二者必居其一。

三、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一方面避而不答联共（布）中央的直截了当的问题，并因其顽固地不愿意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而使自己的错误更加严重，一方面则在口头上保证说他们将在实践中证明他们依然忠于苏联，依然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鉴于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口头上的保证。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已不止一次地向联共（布）中央许下诺言，却从来没有履行过。从他们的来信中，尤其是从最近一封来信中，我们对此更加深信不疑。南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铁托同志，应当明白，他们近来在日常活动中所奉行的反苏和反俄政策，足以破坏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对他们的信任。

四、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抱怨说他们陷入了困境，并说这一切的后果对南斯拉夫是非常严重的。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只能怪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以及与他们一起的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威信和自尊心置于南斯拉夫人民的利益之上，并且不肯为本国人民的利益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对南斯拉夫人民极为有害的错误。

五、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声称，南共中央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拒绝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共党内的现状问题。如果这是他们的最后决定，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情报局会议上说不出什么来为自己辩解，从而意味着他们默认自己是有罪的人，害怕在兄弟共产

党前露面。不但如此，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还意味着南共中央已经走上了脱离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并且准备使自己的党和人民背叛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统一阵线。既然情报局是统一阵线的党的基础，所以这种政策将导致背叛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事业，转到敌视工人阶级事业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去。

无论南共中央的代表是否出席情报局会议，联共（布）中央坚决要求在近期的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共党内的现状问题。鉴于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同志们请求将情报局会议改在6月下半月召开，联共（布）中央表示同意这一建议。

受联共（布）中央委托 维·莫洛托夫

约·斯大林

1948年5月22日于莫斯科

No 07493

莫舍托夫递交联共(布)中央信件时与 铁托和卡德尔的谈话记录

(不早于1948年5月22日)^①

绝密

1948年5月19日和21日与铁托和
卡德尔谈话的记录

今年5月19~22日在贝尔格莱德期间,我会见了铁托。我19日交给他联共(布)中央的信件^②,21日得到铁托回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在委托转交给联共(布)中央信件的时候,除了铁托,还有卡德尔在场。我认为有必要转述铁托和卡德尔当时关于一系列问题的言论。

铁托读完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做了以下声明:

这封信我们明天在南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但是我们已经否定了联共(布)中央关于召集情报局开会的建议。我们通过阿尔米亚尼诺夫同志对联共(布)中央第二封信作了内容简短的答复。我们对信中的指责感到委屈。我们不同意召集情报局开会,理由是,事实上,所有的党在讨论联共(布)中央的信时,都已经表明了对我们的态度。这还不够吗?已经不只是各国共产党知道这件

^① 档案原件表明这是给苏斯洛夫的汇报,但未具时间。这里标注的时间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

^② 指联共(布)中央1948年5月4日给南斯拉夫中央委员会的信。

事了，从对我们的态度中，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例如，捷克人竟如此无理地对待我们的国会议员代表团。尽管处于这样的地位，我们还将像过去一样，保持着对苏联的热爱，真诚地工作。

但是这封信我们明天还将再一次在南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讨论。请明天晚上来等答复。

在整个谈话中，铁托显得神经紧张，但他在外表上尽量做得很平静。

然后铁托通知，他们正在准备党的代表大会，问题将在中央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上最后决定。

卡德尔说，党的代表大会原打算在11月召开，现准备在7月。大会上将通过党的纲领和章程，我们的纲领已经老了，它是1920年通过的，有许多错误的地方。

铁托接着说，在代表大会上，我们准备请2000名代表。这将是一个群众性的代表会议。代表将在区的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我们将邀请其他党的代表。（在这里铁托补充说，如果他们来的话。）然后他例数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中央代表所参加过的其他党的代表人会。

铁托讲了很多关于工人阶级的作用和改善他们物质状况的话。卡德尔说的大都是党对富农阶级、对合作社和个人资本的政策。在他们的讲话中，可以感觉到一种小心谨慎，好像怕触及到联共（布）中央的信，虽然用隐含的形式他们都谈到了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这些谈话的实质可归纳如下：

——我们建设了许多大、小工厂，铁托说，但在满足工人需要方面却做得很不好，特别是在住房建设方面，在贝尔格莱德我们出现了真正的住房危机。

——我们，卡德尔说，几乎把所有个体企业，不论是工业还是商业，都收归国有了。（铁托补充说，旅店也国有化了，过一两年

房屋也将国有化。)个体商业几乎全部被国营和集体制代替了。我们停止了让个体商贩搞批发货物。我们在组织商业贸易时感到干部奇缺。

接着卡德尔转到了农业经济的现状问题。

——我们在农村中有危险的敌人——富农。虽然在土地改革时对富农经济进行了严重的打击，但是我们还有许多占有土地在25~35公顷的富农户，他们给我们上交40%的商品粮。我问：是自愿的吗？卡德尔说，不是。不得不施加压力。我们给5000多个，准确地说是5200个富农定了罪，遣送他们去做木材采运。今年我们还将采取坚决的措施反对富农阶级。产品供给的计划是：贫农和中农卖粮，将获得国家降低价格的工业品，富农上交粮食的一部分可获得国家价格的工业品，其余部分的粮食我们按固定价格收购。现在我们还不能够提出完全消灭作为阶级的富农问题，我们对此没有准备好。我们没有农业机械，现在谈这个问题，我们只能刺激富农。关于发展合作社——不但是销售合作社，还有生产合作社，我们准备过两年以后消灭富农，然后再更多地建立合作社，使现有的农业劳动组合有所发展。但强行建设集体农庄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将生产出拖拉机，调整好农业机械的生产，到那个时候再推进集体化的事业。我们现有的农业机器站证明是成功的，伏伊伏丁那自治州的这种情况特别有代表性。卡德尔说，如果你们到南斯拉夫的农村走一走，可以看见那里最突出的是我们的合作社。我们对合作化充满了希望。

* * *

5月21日铁托一个人接见了。他关上门窗，请我到桌旁就坐，交给我回信时说：

——这是我们答复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它是我们通过中央

全会讨论后提交的答复。中央全会重申了我们三天前对联共（布）中央第二封信的答复。

由于一系列原因，没有可能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我们的问题。我们认为，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不光比别人处于劣势，而且别人已经在极力地谴责我们，甚至不仅是谴责，而是在教训我们。我指的是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捷克。难道我们的资本主义成分比他们更多吗？难道他们的富农比我们少吗？难道我们采购的粮食，包括从富农那征购的比别人少吗？1947年波兰人仅收购4万车皮粮食，而我们是7万车皮。他们还在考虑剥夺寺院的土地时，我们已经付之实践了。但我们不能一下子把所有事情都做完。难道我们在对敌斗争中比那些国家——其中包括他们的党正在教训我们的那些国家——流得血少吗？我们不反对批评，但批评要公正要有原则性。尽管还可以举出更多应该批评我们的事实，但信中有许多事实被普遍化了，这使我们感到委屈。把我们比作托洛斯基分子；托洛斯基从来没有站在进步力量一边，尤其是站在苏维埃一边。毫无疑问，如果今后有战争，我们只会站在苏维埃一边。再说，我们能站在哪儿呢？我们的人民热爱苏维埃，他们深信社会主义的胜利，他们不惜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民是高尚的。他们经过多次斗争，不只是经历了最近这一次战争，这一点，不能不充分考虑到。仅仅出于这些考虑，也不宜把我们的分歧拿到更大的范围中去议论。我们的人民现在仅仅是猜测，在我们两国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是有纪律的。至于我们党的干部，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让他们了解了第一封信和第二封信，以及我们的答复。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把握着我们党的方向。

铁托接着说，我们相信，真理是会胜利的，一切问题都会搞清楚。我们两党之间的这些问题本来可以得到更正确的解决。我们不愿意掩盖，说我们以前、现在或将来没有错误，但为什么没能及时

向我们指出和分析这些错误。在某些问题上本来就有可能会出现争论和分歧，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下工作。我不赞同说我们的人不可能犯错误，包括我们的领导人。正是信中所列举的理论方法上的错误，它们大多是从所讲的整体问题中摘引出来的，而实际上比信中所写的还要多一些。但是我们认为，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这样的，也许可以来一两个党中央委员，当面讲清楚所有的问题，然后决定，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现在却搞成好像我们反对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和我们一样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现在可以搁置一段时间，让它缓和一下，然后再重新回来谈这些问题。

——昨天在全体会议上决定，7月21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已经给党中央全体人员指示开始准备代表大会。我们党为准备大会将会非常忙，我们打算讨论和决定好多重要问题。我本人也将很忙，事实上在这段时间我应回避许多国家事务。我将准备在代表大会上作主要的报告。近两天我们将发表召开代表大会的决定，公布议事日程。在党组织里展开对党纲和党的章程的讨论。

虽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因我们对拉夫连季耶夫的不满而抱怨，但我还是应该说，他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上是有很大责任的。也许，他是党的人，我不能同他争辩，但他不像萨德奇科夫。他把自己隔离起来，从个别人那里获取情报，这些人不知怀着什么目的，为他提供不真实的情报。对于我们的关系，我不得不说一些可能乍看起来是很小的事情。大概在去年，我们和他在斯洛文尼亚，在经过新的工地时，我对他说，我们正在这里建设非常重要的工厂，建设这个工厂的都是年轻人。我建议他绕新工地看一看。看来这位苏联大使并非没有兴趣参观新工地。但他没有去。可是过了不久，会见卡德尔时，他问在热列兹尼克区正在进行什么建设，谁在建设——是德国人还是南斯拉夫人？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侮

辱。这个工地离贝尔格莱德 10 公里，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劳力，差不多每一个到南斯拉夫参观的苏联人都去过那里。当然，去那里的还有怀着各自目的的外国人。但就是拉夫连季耶夫不仅不知道这个建设工程，甚至还提出这样侮辱性的问题。顺便说明一下，他问起的工厂，正是我邀请他参观的工厂的建设工地。他却提出了那些问题。难道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吗？当有人这样评价我们人民的时候，会很明显地在影响他们的工作。

* * *

5 月 20 日我会见了阿尔米亚尼诺夫，他通知我说，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在 5 月 8 日被捕，政治委员会结束了对他们案件的调查。在 5 月 15--16 日召开了非常秘密的会议，在会议上讨论了委员会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案件的结论。他们都被起诉有罪，罪行归结为他们背叛了祖国的利益。赫布朗好像是因为乌斯塔什分子，茹约维奇是因为与怀有敌意的过去南共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戈尔基奇关系密切。在会议上一一直强调南苏友好关系。发言者都事先做好了准备，在他们的发言里，茹约维奇和赫布朗被痛斥为人民的敌人。会议作出要求将他们提交法庭的决定。

B. 莫舍托夫

№01637

南斯拉夫关于对意和约给苏联的照会（摘录）

（1948年5月28日）

……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受本国政府委托，谨在此声明，在任何情况下，南政府都无意违反这个涉及两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相互协商的协定。我们两国代表团之间在多次国际会议中有过紧密合作，如同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所有原则立场一样，这只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遵循这一义务的证据之一。希望使自己的外交举动与苏联政府所表明观点相一致，是南斯拉夫政府所有行为的基础。

在这件事情上，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举动也许可以被人解释为它没有完全遵守相互协商协定的规定，尽管外交部的初衷并非如此。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委托，外交部对这种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南斯拉夫政府意图和愿望的举动深表遗憾。

至于说到英、法、美向有资格参与做出决定的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就的里雅斯特自由区问题修订对意和约的倡议——作为仅供有关国家参考向南斯拉夫政府发送了这一倡议，外交部愿意强调指出，南斯拉夫政府在修订对意和约问题上的立场与苏联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外交部在给西方大国的答复中为自己拟定的只是策略目标，即有助于揭露英、美精心策划的阴谋诡计，这种阴谋诡计部分地旨在消除1946年铁托—陶里亚蒂著名协定的影响。这一策略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与此同时，外交部认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否定的立场没有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但是

愿意强调指出，这一举动并没有带来任何损害，任何一方也都没有断言，在上述“倡议”方面南斯拉夫政府赞成修订和约。

其实，部长会议主席铁托元帅于外交部照会和声明之后几天就在自己的声明中斩钉截铁地强调指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同意修订和约^①。

根据上述一切可以看出，南斯拉夫政府这一策略举动的意图和效果不是不能友好地解决这一误会的。

外交部对这一举动再次表示遗憾，同时请求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它认为自己不受相互协商协定约束的决定。外交部方面则愿意强调指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心严格遵守相互合作的协定和与苏联真正的友好关系所赋予自己的义务。

^① 1948年3月26日，铁托在与出席南斯拉夫、意大利人少数民族文化节的一批意大利人士会晤时，谈到南斯拉夫不同意修改对意和约。

№01638

莫洛托夫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给 铁托或卡德尔的电报（摘录）^①

（1948年6月9日）

……联共（布）中央获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宣布赫布朗和茹约维奇为叛徒和卖国贼^②。我们对此理解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决心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联共（布）中央声明，如果南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要实施这一意图，那么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杀人犯。联共（布）中央要求在联共（布）中央代表的参加下对所谓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向联共（布）中央提供错误情报一案进行调查。

立等答复。

……

① 因拉夫连季耶夫5月15日例行回国述职，这个声明是由临时代办阿尔米亚尼诺夫向卡德尔口头宣布的。

② 当时，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的指控没有做任何公开的报道。5月6日只公布了他们被解除职务的命令。5月7日他们秘密被捕。5月12日，南共中央通过的将他们开除出党的决议，同样是按照特别秘密的程序发给各共和国党的委员会的。

№01639

南共中央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 致联共（布）中央的声明

（1948年6月17日）

致联共（布）中央

对联共（布）中央就赫布朗和茹约维奇问题的口头质问，南共中央声明如下：

一、南共中央从未准备“杀害”任何人，包括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在内。他们正在接受正规机构的调查。

二、南共中央认为联共（布）中央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是不正确的，对于把我们党的领导人说成是“刑事杀人犯”的企图愤怒地予以批驳。

三、据此，南共中央认为，联共（布）中央派代表参加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的调查一事根本不能予以考虑。

No01640

联共（布）中央关于赫布朗和茹约维奇 问题致南共中央的信

（1948年6月19日）

致联共（布）中央致南共中央委员会

作为对联共（布）中央信件的答复，南共中央在其4月13日的决定中声称，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已被开除出南共中央并接受党的调查，因为他们向苏联机构提供了关于南斯拉夫情况的虚假的和诽谤性的情报，其目的是恶化南斯拉夫与苏联之间的关系。

此后过了一段时间，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被捕，后来就被宣布为工人阶级的敌人。

联共（布）中央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南斯拉夫当局想把茹约维奇和赫布朗作为工人阶级的敌人处以死刑。于是，联共（布）中央6月9日给南共中央委员会发出一项声明，坚持要求派代表参加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向苏联机构提供了错误情报的调查。联共（布）中央同时声明，一旦拒绝联共（布）中央关于派其代表参加调查的建议和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进行迫害，联共（布）中央将认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刑事杀人犯。

为了对此做出答复，卡德尔同志与铁托同志商量后于6月10日在卢布尔雅那作了如下声明：

“我们对联共（布）中央的这种质问感到惊讶。我们请求宣布：南共中央政治局过去和现在都无意从肉体上消灭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向苏联代表提供情报的问题没有进行任何

调查。”

这是南共中央就茹约维奇同志和赫布朗同志的命运问题所作的第二次答复，这个答复与南共中央4月13日所作的答复是完全矛盾的。

今年6月17日，收到了南共中央就茹约维奇和赫布朗一案问题给联共（布）中央的又一次答复——按次序为第二次答复。答复中说赫布朗和茹约维奇正在接受国家机关的调查，并且对联共（布）中央的质问表示愤怒，不接受联共（布）中央关于派其代表参加茹约维奇和赫布朗一案调查的建议。

很清楚，不能认为这个答复是诚实的答复，倒不妨认为是回避答复。

同样很清楚，这个答复与前两次答复是完全矛盾的。

毫无疑问，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案件问题上的说法是混乱的，根据一时的政治需要在不同的时候提出不同的解释，只是不把匆忙编造出来的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案件的真实情况大白于天下。

仅此一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南共中央不接受联共（布）中央派代表参加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案件进行调查的建议。

从这一答复中还可以得出结论：既然赫布朗—茹约维奇案件已提交国家机关处理，所以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命运的全部责任如今就由南斯拉夫国家政权的总代表铁托总理承担。

№03053

情报局关于邀请南共出席情报局会议的信函

(1948年6月19日)

共产党情报局将开会讨论南共党内的情况，并邀请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参与共产党情报局的工作。

如果你们同意，共产党情报局希望你们的代表于6月21日以前到布加勒斯特^①，向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乔治乌-德治同志^②报告，以听取如何到达情报局将要开会的地方的指示。

请通过非利波夫迅速函复。

莫斯科

① 苏南冲突发生后，共产党情报局总部已迁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② 乔治乌-德治，格奥尔基（1901～1965），罗马尼亚工人党总书记。

No03054

南共中央关于拒绝出席 情报局会议的声明

(1948年6月20日)

情报局将开会“讨论南共党内的情况”，并邀请南共派代表出席会议。南共中央委员会已接到邀请，并请求将下列意见告知情报局会议：

南共中央委员会一向乐意参加情报局的工作。但是，鉴于送给我们的情报局会议的议事日程，其内容是解决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之间的分歧问题，南共中央不接受这个议程，因此不能派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我们认为解决分歧的办法，从一开始直到这次情报局会议，一直都被置于错误的基础之上。理由如下：

一、联共（布）中央给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封信，不是出于同志式的批评精神（南共中央可以用同样的语气答复这种信），至于信中的谴责，由于它的虚伪性，它有损于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因此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二、南共中央认为：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在战前、战时和战后都经受了如此巨大考验的兄弟党，只根据某个人所说的片面情报或对于这些话的断章取义的摘引，而不是根据对我们党整个活动的分析就提出谴责，这是完全错误的。

三、联共（布）中央的一些最严厉的谴责，显然是以我们党战前、战时和战后都一贯与之开展斗争的一些反党分子的情报为根据的。南共中央认为，南共党内过去存在的著名的分裂主义残余势力竟然

受到联共(布)中央的支持,这是不能容许的。

四、作为情报局成员的党的领导人,不征询我们的意见,就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联共(布)中央对我党的谴责,以书面声明指责我党,并拒绝我们在给联共(布)中央第一封信的回信中所提出的答辩。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在各该党的广大范围内,而且公开地做出了有损于我们国家的事情。

五、联共(布)中央甚至拒不接受我们对他们第一封信的回信中所提出的任何一条答辩,并且在对那封信的复信以及后来的信件中,又发表了对南共更加激烈的但毫无根据的谴责。显而易见,这种立场使我们不可能以平等的地位讨论问题。

所有这些事实就是南共中央不同意在情报局阐明这种分歧的理由,因为我们考虑到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加深而不会解决分歧。

南共中央指出,它建议联共(布)中央派代表到南斯拉夫来,以便对有争议的问题联合进行现场调查。联共(布)中央不接受这个在我们看来是惟一正确的程序,而是在接到我们的答复之前就将分歧公诸于情报局的其他成员党,也就是说,它在给我们发信的同时,就把信的原文也发给了其他党,与此同时,各该党领导人(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除外)给我们寄来书面声明,表明了他们对我党的看法。

这种行为不能体现互相谅解的精神,也不符合作为情报局的基础的自愿原则。

南共中央继续坚持其主张,即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直接接触,在南斯拉夫一起讨论有争论的问题,才是解决现有分歧的惟一正确的途径。南共中央对于联共(布)中央采取目前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意见分歧深表遗憾,并且再次呼吁联共(布)中央和情报局同意我们关于联共(布)中央和南共中央有必要进行直接接触以解决分歧的意见,认识到不经我们同意而讨论我们党内的情况是错误

的，从而将议事日程中关于讨论我党情况的一项予以撤销。

南共中央向各兄弟致意，并宣布：任何分歧都不能阻止南共忠诚于它同联共（布）中央以及其他共产党团结一致和密切合作的政策。

No03055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摘录）^①

（1948年6月28日）

一、情报局着重指出，近来南共领导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实行了一条不正确的、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在这一点上，情报局赞成联共（布）中央的行动，即主动揭发南共中央的错误政策，特别是铁托、卡德尔、吉拉斯和兰科维奇等同志的错误政策。

二、情报局宣布：南共领导正在实行一条对苏联和联共（布）不友好的政策。南斯拉夫执行了一个诽谤苏联军事专家和损害苏联名誉的下流政策。南斯拉夫为苏联文职专家制定了一种特别的规定，从而使他们受到南斯拉夫国家公安机关的监视，并经常被跟踪。联共（布）在情报局的代表尤金同志和苏联在南斯拉夫的许多官方代表，都曾受到南斯拉夫国家公安机关跟踪和监视。

所有这些事实和一些类似的事实都说明，南共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和共产党人的身份是不相称的，他们已经开始把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谈，而且用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样方法对待苏联。南共中央这种反苏立场造成的结果，就是使那些从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武库里借来的诸如联共（布）已经“变质”，苏联已经“变质”等等的诽谤性宣传广为流传。

情报局谴责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种反苏态度，认为它是与马克

^① 南共中央是通过南斯拉夫通讯社得到这个决议的。

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这种态度只是民族主义者的态度。

三、在对内政策方面，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背离工人阶级的立场，放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们否认在自己的国家里滋长着资本主义成分，从而也否认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这种否认是机会主义信条的直接产物。这种机会主义信条主张，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不是像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的那样变得更加尖锐，而是熄灭了，这恰恰是布哈林之流的机会主义分子所宣传并断言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

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农村推行一种错误政策，他们无视农村的阶级分化，并且认为个体农民都是单独的统一体，这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背道而驰的，是和列宁关于小农生产不断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著名论断背道而驰的。而且，南斯拉夫农村的政治形势并没有使人沾沾自喜、自鸣得意的理由。在南斯拉夫盛行的情况是：个体农民生产占优势，土地尚未国有化，还存在着土地私有和土地自由买卖，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富农手中，并且使用雇佣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他们会以掩盖阶级矛盾、调和阶级斗争的精神教育南共，而这样一来，必然会使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

在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问题上，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道路，走上民粹党、富农党的道路，因为他们断定农民是南斯拉夫国家“最稳定的基础”。列宁教导说，无产阶级作为“当代社会里革命到底的惟一阶级……必须是在全体人民为一个彻底的民主转变所作的斗争中和在全体劳动人民和被剥削人民对压迫者和剥削者所作的斗争中的领袖”^①。

^① 列宁这段话的出处不详。

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违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

就农民而言，即使可能其大多数（即贫农和中农）已向工人阶级结成了联盟，但工人阶级在这个联盟中起着领导作用。

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态度是漠视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论点的。

显而易见，这种态度也反映了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相适应的观点。

四、情报局认为南共领导正在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党是国家主要的指导和领导力量，它有自己的特殊的纲领，不能把自己溶解于非党群众之中。党是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和最重要的武器。

然而，在南斯拉夫，被看做国家主要领导力量的是人民阵线，而不是共产党。南斯拉夫领导人贬低共产党的作用，实际上把党溶解于由极为复杂的阶级成员（工人、从事个体农业的农民、富农、商人、小业主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所组成的非党的人民阵线之中，并把党与包括某些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政治团体混同起来。南斯拉夫领导人顽固地拒绝承认他们这样一种信条的虚伪性：即所谓南共不能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特殊纲领，南共应满足于人民阵线的纲领。

在南斯拉夫，只有人民阵线在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而党及其组织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出现在人民面前，这一事实不仅贬低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而且损害了作为一种独立政治力量的党的本身，因为党的任务是通过公开的政治活动及公开宣传自己的观点和纲领，赢得人民不断增长的信任，并影响更广泛的劳动人民群众。南共领导人正在重复俄国孟什维克分子关于将马克思主义的党溶解于非党群众组织之中的错误。所有这一切暴露出南共党内存在着取消主义的倾向。

情报局相信，南共中央的这个政策威胁着共产党本身的生存，

而且终究将导致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变质的危险。

五、情报局认为：南共领导人在党内建立的官僚统治，对南共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一场灾难。南共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尽管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有过一些空洞的保证，但南共中央的大多数委员是指定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共产党实际上处于半合法状态。党的会议或是根本不开，或是秘密召开，这个事实只能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像南共这种类型的组织，只能被称为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组织。它正在把一个生龙活虎的、作为独立活动的有机体的党引向灭亡，它正在党内培养着与托洛茨基在当时所提倡的方法类似的军事领导方法。

南共党员最根本的权利受到压制，对党内的不正确措施哪怕只作一点点批评，也要受到粗暴的制止。这一事态是完全不能令人容忍的。

情报局认为，由于南共中央委员茹约维奇和赫布朗敢于批评南共领导人的反苏态度，并要求南斯拉夫与苏联友好，南共领导人就把他们开除出党并且加以逮捕，这种行动是不光彩的。

情报局认为，这种不光彩的、纯粹土耳其式的恐怖统治，在共产党内是不能容忍的。南共本身的存在和发展的利益要求结束这种统治。

六、情报局认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南共中央委员会的错误所作的批评，给予了南共中央委员会以兄弟般的帮助，并向其领导人提供了迅速改正所犯错误的一切必要条件。

然而，野心勃勃、骄傲自满和自高自大的南共领导人，不是诚恳地接受批评，并以布尔什维克式的态度改正他们的错误，而是以挑战和敌意来对抗批评。他们走上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否认他们的一切错误的反党道路，并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一个政党如何对

待自己错误的的学说，从而加重了他们的反党错误。

由于不敢正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南共领导人走上了公然欺骗党和人民的道路，它向全党隐瞒对中央委员会错误政策的批评，向党和人民隐瞒对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同志采取残暴措施的真正理由。

近来，在联共（布）和其他兄弟党批评了南斯拉夫领导人的错误之后，他们试图新增加一些左的法令。他们匆忙颁布命令，对中型工商业实行国有化，尽管完全缺乏这样的基础。由于匆忙地增加了一种新的粮食税，而对实施办法同样未作准备，因此这只能打乱对城市人口正常的粮食供应。还有，就在最近，南斯拉夫领导人大声疾呼，宣称他们热爱并忠诚于苏联，但是，众所周知，在实践上他们却执行着对苏联不友好的政策。

事情还不止于此。近来南斯拉夫领导人一直信心十足地高声宣讲一项在南斯拉夫消除资本主义因素的政策。在4月13日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中，铁托同志和卡德尔同志写道：“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在国内消除资本主义残余的各项措施。”

按照这条路线，卡德尔同志4月25日在斯库普什蒂卡的讲话中宣称：“在我国，人剥削人的残余现象不会存在很长时间了”。

在目前南斯拉夫现有的条件下，南共领导人关于清除资本主义分子——从而清除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的主张，只能被认为是冒险的而且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只要不可避免地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农民经济在国内占优势，只要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条件还不具备，只要大多数农业工人对集体耕作方法的好处还没有信服，要想解决这项任务就是不可能的。联共（布）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农业大规模集体化的基础上，消灭最后和最大的剥削阶级——富农阶级——才是可能的，而消灭富农阶级也是农业集体化不可缺少的有

机组成部分。

为了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从而在农村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党需要在农村进行限制资本主义因素的仔细的准备工作的，加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并使社会主义工业能为集体经营的农业生产机器。在这方面仓促从事只能招来不可弥补的危害。

只有在仔细准备和不断执行这些措施的基础上，才能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因素过渡到消灭这些因素。

南斯拉夫领导人仓促地使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企图，都意味着或者这种冒险是注定要失败的，或者，这只不过是一个自吹自擂、空洞无物、蛊惑人心的宣言罢了。

情报局认为，南斯拉夫领导人正竭力用这种虚伪的和蛊惑人心的策略，表明他们不仅赞成阶级斗争，而且甚至走得更远，但考虑到现实可能性，这样的做法已超出了南共在限制资本主义因素方面所能提出的要求。

情报局认为，既然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些左的法令和宣言在目前条件下不过是在蛊惑人心，而且是行不通的，因而他们只能有损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帜。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情报局认为这样的冒险策略是一种下流的花招和不能允许的政治赌博。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些左的煽惑性措施和宣言，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拒绝承认错误并诚恳改正错误的事实。

七、考虑到南共党内的局势，并为了设法向南共领导人指出摆脱这种局势的途径，联（布）中央委员会和其他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建议，应该像在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讨论其他共产党的活动一样，以同样的、正常的伙伴关系为基础，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共党内的情况。

然而，南斯拉夫领导人却拒不接受兄弟党一再提出的关于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南共党内情况的建议。

南斯拉夫领导人企图逃避兄弟党在情报局内提出的公正批评，捏造了所谓他们的“不平等地位”的无稽之谈。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真实的。众所周知，当情报局成立时，各个共产党的工作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可争辩的原则基础之上的，即每一个党，正像它有权利批评其他党一样，有义务向情报局报告它的工作。

在九国共产党第一次会议上，南共曾充分利用了这种权利。

南斯拉夫夫人拒绝向情报局报告自己的活动并听取其他共产党的批评，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破坏各共产党之间的平等地位，而且事实上就等于南共要求在情报局里享有特权地位。

八、鉴于以上情况，情报局表示完全赞同联共（布）中央1948年3月到5月间给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中对南共党内局势的评议，对南共中央委员会所犯错误的批评和对这些错误的政治分析。

情报局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根据南共领导人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相容的反党反苏观点，根据他们的整个态度和拒绝出席情报局会议这一事实，南共领导人已将自己置于情报局所属各个共产党的对立面，走上了脱离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阵线的道路，走上了背叛工人阶级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并采取了民族主义的立场。

情报局谴责南共中央委员会的这种反党政策和态度。

情报局认为：鉴于上述情况，南共中央委员会已经将它自己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置于共产主义统一阵线之外，从而也将自己置于情报局之外了。

……

情报局认为：南共领导所犯错误的基础，在于这样一个不容置

疑的事实，即在过去五六个月的时间里，从前以伪装形式存在的民族主义因素，在南共领导中已获得了统治地位，因此，南共领导已经同南共的国际主义传统决裂而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

由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内部的民族力量及其能力，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没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没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没有苏联的支持，他们也能保持南斯拉夫的独立，并建设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新南斯拉夫可以不要这些革命力量的援助。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由于不了解国际形势，并被帝国主义的敲诈威胁所吓倒，因此，他们认为，用让步的方法可以讨好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认为，他们可以和帝国主义国家搞交易，以获得南斯拉夫的独立，并且逐渐地使南斯拉夫人民适应这些国家，也就是适应资本主义。在这方面，他们正在悄悄地从这样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论点出发——“对南斯拉夫的独立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比苏联的危险要小一些”。

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显然不了解，或者可能是假装不了解，这样一条民族主义路线只能使南斯拉夫蜕变成一个普通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丧失独立，沦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党内存在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南共国际主义传统、忠于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健康力量。

健康力量的任务是，迫使他们现在的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并且公开地、诚恳地加以纠正；迫使他们与民族主义决裂，回到国际主义上来，千方百计地巩固反对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

如果南斯拉夫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办不到这一点，这些健康力量的任务就要取而代之，形成党的国际主义的新领导。

情报局并不怀疑南共将会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03056

南共中央关于情报局决议的声明（摘录）

（1948年6月29日）

从内容来看，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的决议显然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它是以联共（布）中央发给南共中央的一些信件为基础的。在今年3月27日的第一封信中，联共（布）中央对南共中央提出了谴责，这封信同时也发给了共产党情报局的其他成员党，但却未将此事通知南共中央。另外，联共（布）中央转来了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支持联共（布）中央的看法的一封信。匈共中央的这封信也发给了其他各党。南共中央还收到了除法国和意大利之外的情报局其他成员党写来的类似的信件。南共中央指出，上述各党在未曾听到南共中央的意见，也没有听取其反驳的情况下，就接受了联共（布）中央的观点，并将其作为自己的根据。在联共（布）中央的这封信和其他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之后，以及在南共中央4月13日给联共（布）中央的回信发出之后，南共中央分别于5月4日和22日收到了联共（布）中央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或多或少地坚持了第一封信中的路线。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的决议，基本上是联共（布）中央这些信件的复制品。

在这些信件中，联共（布）中央指控南共中央，并要求它承认自己的错误，例如：第一，南共领导人对苏联口头上说的好听，而背地里却诋毁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第二，南斯拉夫领导人一直诽谤苏联军队，苏联专家受到敌视，苏联公民和尤金同志受到公安机关

特务的跟踪；第三，党的干部受国家安全部长的控制，党内没有民主和批评，而是以军事领导方法进行统治；第四，南斯拉夫政府希望通过间谍讨好帝国主义，并将自己置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之下；第五，党把自己溶解于人民阵线之中，因而不能再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它已渗透了伯恩斯坦主义、布哈林主义和福尔马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因素和平消亡而进入社会主义的理论；第六，某一帝国主义强国的大使在南斯拉夫俨然以主人自居，南斯拉夫人民的刽子手奈迪奇的亲友们轻而易举地在南斯拉夫政府和党的机关里谋得舒适的职位；第七，南斯拉夫领导人把苏联的对外政策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谈；第八，南共领导成员在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作用的问题上已经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第九，德国伞兵摧毁了南斯拉夫“游击队”司令部，结果人民解放运动发生了严重危机，此后苏军前来进行帮助，解放了南斯拉夫，为南共掌权创造了条件；第十，南共过分吹嘘自己战争时期的成就，虽然它的功劳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比起来并不突出。除上述谴责外，还有情报局决议中所提出的谴责，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南共中央政治局向情报局提交的一份声明（该声明将作为附件发出）中已经表明，只有把事情的真实情况弄清楚，只有把谎言和联共（布）中央方面或情报局其他成员国党中央委员会方面在原则问题上的真正不满区分开来，南共中央才能同意讨论联共（布）中央出于诽谤、杜撰以及对南斯拉夫情况的无知而做出的指控。

对于情报局决议的发表，南共中央声明如下：

一、决议中包含的批评是以不确切的和无根据的断言为依据的，它企图破坏南共在国内外的威望，企图在国内群众中和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引起混乱，并削弱南共党内的团结和党的领导作用。因此，南共中央在4月13日的信中建议联共（布）中央到现场核对

它的说法，但却遭到了联共（布）中央的拒绝，这是令人吃惊的。

二、决议在未举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坚持说南共领导对苏联执行了一项敌对政策。关于苏联军事专家在南斯拉夫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和苏联公民受到国家公安机关特务的监视的说法，根本不符合事实。直到他们被撤回，没有一个苏联代表曾提请南斯拉夫代表注意这件事。苏联公民，尤其是尤金同志在南斯拉夫曾受到监视的说法，完全是虚假的。这项声明，特别是与尤金同志有关的声明，不过是为了让南共及其领导在其他共产党的心目中威信扫地而已。

与此相反，正如4月13日致联共（布）中央的信中所说的，根据南共党员给自己党组织写的大量报告及我国其他公民的陈述，从解放起直到最近，苏联情报机关一直设法要吸收他们，则确有其事。南共中央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一个共产党人执政的、正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国家，是不能允许的，因为这种做法将导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公民道德败坏，并将削弱和破坏我国政府和我党的领导。南共中央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关系只能以信任和真诚为基础，并且为了坚持这个原则，南斯拉夫国家机关甚至从未梦想过要跟踪住在南斯拉夫的苏联公民，或对他们实行任何控制。

三、决议批评了南共关于处理阶级斗争的政策，特别是南共在农村的政策。关于这一点，还援引了人们熟知的列宁的论述。南共中央指出：在南共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政策中，它正是以上述的和类似的列宁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作指导的，这一点，决议的作者们——如果他们不辞劳苦的话——或许在我党已发表的文件和文章中读到过，或许了解关于这一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因此，决议中提出的指控以及联共（布）中央对我们的指控，实际上不过是徒劳罢了；客观上，它们不可避免地有助于鼓励和支持城乡反动的资本主义因素，并在居民中引起混乱，似乎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过渡时期，客观上的困难，特别是在供应方面的困难，都应归咎于南共中央及其政策。南共中央认为，作为一种方法来说，根据引白各个斗争时期的只言片语，或是根据个别的、孤立的和歪曲了的事实，来评价其活动，这是不能允许的。南共中央认为，在估价南共的政策时，像估价其他党的政策一样，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党的实践——党在使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中是取得了胜利，还是没有取得胜利，整个资本主义因素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是减弱了还是加强了。

四、南共中央不能不以极大的愤慨否认以下的断言：什么南共领导阶层正滑入富农党的道路，滑入对党的取消主义歧途；什么党内没有民主，党内滋长着军事领导的方法；什么党员最基本的权利在党内受到践踏，对党内的不正当行为的最温和的批评也会招来最剧烈的报复，等等。难道身经百战、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们能够容忍党内这种为男子汉和共产党员所不齿的事态的存在吗？断言我们党内不准批评以及类似的说法，对我们党的每一个党员都是极大的侮辱，它贬低我党昔日英勇的、光荣的业绩和我党当前为重建并发展南斯拉夫国家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南共中央强调指出，不能因为一些党组织尚未进行选举，就断言我们党内没有民主。这些都是战争时期和我党经历过的战后的急剧发展所遗留的问题。当时，在其他共产党内，而且在苏联党内，也存在这些问题。

至于我们党正消失在人民阵线之中，以及领导阶层正走上富农党的道路的说法，它在客观上对于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在联合组织（即人民阵线）中实现劳动群众的大团结起到了破坏作用，并使党脱离劳动群众。这一断言的根源，除以上所述之外，在于对南斯拉夫党和人民阵线之间的关系误解，在于对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实质以及工人阶级在该阵线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方式缺乏了解。在这个问题上，这一断言的出发点也不是事实，而是一些凭空捏造的说

法，继之以引用列宁著作中的著名论述进行论战，而对于列宁著作中的那些论述，南共负责人中谁也没有提出过争论。客观事实，以及在整个战争期间和战后不仅由共产党人而且由阵线非党人士发表的许多宣言表明：1. 共产党在阵线中是领导力量；2. 共产党并非消失在阵线之中，恰恰相反，党正在以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策的精神教育阵线的广大成员，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提高他们；3. 南斯拉夫人民阵线实际上正在为社会主义而战斗，如果各种各样的政治团体——像决议中所说有资产阶级政党、富农、商人、小业主等等——在人民阵线中起重要作用的话，或者，如果人民阵线是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联合组织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协议形式的话，那么，为社会主义而战斗必然是不可能的；4. 党并未接受人民阵线的纲领，而人民阵线的基本方向和纲领却来自共产党，由于党在人民阵线中的领导作用，事情自然是如此的。

因此，南共中央强调指出，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是使人民阵线的群众队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进一步接近，把党的政治活动与人民阵线的活动以及人民阵线的全部行动联系起来。

最后，南共中央指出，本党大多数的中央委员都不是指派的，而是选举的。联共（布）中央在计算时，并未把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单独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们计算在内。因此，联共（布）中央在它的一封信中提到的南共中央全体会议的22名委员应加上这7名政治局委员。南共中央在战争中失去了10名委员，因而主要从南共中央候补委员中指定7名填补空缺，南共中央为此而受到责备，这是很奇怪的。

南共中央否认关于南共处于非法状态的断言，认为这个断言是荒谬的和不真实的，并且认为这也是对南共在特定条件下和特定时间内的工作方式缺乏了解的证明。南共的工作方式产生于我党长期革命实践的具体条件；这些工作方式在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并且

是党取得群众信任的一重要因素。

五、南共中央否认如下的文不对题的谴责：什么土耳其式的统治方式在南共党内盛行；什么南斯拉夫领导人“向全党隐瞒对中央委员会错误政策的批评”；“向党和人民隐瞒对赫布朗和茹约维奇同志采取残暴措施的真正理由”。在联共（布）中央公布自己的信件之前，南共中央是不能公布这些信件的。然而，南共现有全部机构都知道联共（布）中央信件的内容，并且所有党员都得到了关于赫布朗与茹约维奇案件的通报。

情报局成员党的代表们，不向南共中央询问详细情况，竟然将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对此，南共中央不能不表示惊奇。南共中央很想知道为什么像茹约维奇之类的人竟受到保护，例如，根据共产国际决定，茹约维奇在1937年同高尔基奇一起被开除出南共；又如，赫布朗曾在乌斯塔什警察面前有过背叛行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欺骗了党，这些人在南共党内进行分裂活动，并干着毁灭党和破坏南斯拉夫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勾当。这难道不是对分裂活动、对叛徒、对瓦解南共的活动进行鼓励吗？因此，我中央委员会作为附件公布了有关赫布朗和茹约维奇的材料。

六、南共中央否认如下的荒谬断言：什么近来南斯拉夫领导人为了匆忙把小型工业和小商店国有化，为了蛊惑人心，采取了一些措施。事实上这些措施在联共（布）中央向南共中央提出指责的六个月之前就准备好了，这是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和发展的结果。

从卡德尔同志演讲中断章取义摘出的引语，只是在一般意义的说法，而他演讲的全文，事实上提出了党在目前阶段逐步排除资本主义因素的路线。

联系上述这些事实，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近来在情报局的刊物、苏联的报纸以及其他一些党的报纸上刊登的新闻中，一直没有关于南斯拉夫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例如进一步削弱资本主义因素

的措施，实现计划取得的成就，工人阶级和团结在人民阵线里的劳动人民在代表大会前进行的群众性竞赛，等等。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对有关上述成就的事实保持缄默的人，无法掩盖其对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南共中央经济路线的批评纯属是专横的和完全没有根据的。

七、南共中央声明，南共领导人中没有任何人认为在南斯拉夫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独立的斗争中不需要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帮助。只有那些完全脱离实际的人才会有这类的主张。因此，南共中央必须强调指出，扩大这种帮助与合作不仅依靠南共本身，而且依靠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南共中央认为，这种帮助必须与南斯拉夫的内外政策联系起来，但决不能与南共所不能接受的那种毫无根据的、不符合事实的指责联系在一起。

关于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准备向帝国主义做出让步，并在有关南斯拉夫的问题上与他们作交易的断言，完全是捏造的，是对新南斯拉夫最恶毒的诽谤。

然而，南共中央必须强调指出，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里，党和国家机关搞了一连串的无缘无故的行动，这种行动对南斯拉夫人民、对他们的国家、对国家的代表人物是一种侮辱，这种行动将削弱上述的合作，恶化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南共中央认为，它不能保证对于未来的类似行动保持缄默。

八、南共中央认为，南共中央决不会由于拒绝讨论它实际上未曾犯过的错误，就损害了共产主义阵线的团结。这个阵线的团结不是以承认捏造或虚构的错误和诽谤为基础，而是以一个党的政策实际上是否符合国际主义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不过，人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情报局已经背离了作为它自己的基础的各项原则，这些原则为每个党提供了根据自己的愿望做出决定的权利。然而，情报局不仅强迫南共领导人承认他们未曾犯过的错误，而且号

召南共党员在党内造反，破坏党的团结。南共中央永远不能同意在凭空捏造和缺乏相互信任的非同志式的态度的基础上讨论它的政策。这样的基础是一个没有原则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而且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南共中央认为，在讨论中它没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它决不能接受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讨论。再者，联系到上述种种情况，南共中央坚决拒绝关于南共已滑到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指控。从南共的全部内外政策来看，特别是从南共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以及实事求是地解决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方式来看，证明南共的实际情况与对它指控的情况恰恰相反。

上述不公正的指责，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使南斯拉夫全体人员以及他们无私的和英勇的斗争，都蒙受了历史上最大的冤屈。

南共中央清楚地知道，联共（布）中央对南共中央指责，将被敌人的宣传机关用来诽谤苏联、南斯拉夫及其他民主主义国家。但是，南共中央宣布：它对这一切现象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它不曾有过引起这些诽谤的任何行动。

南共中央号召全体党员紧密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路线和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同时号召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聚集在人民阵线之中，为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坚持不懈地进行工作。这就是用行动充分证明上述指责不公正的惟一途径和惟一方法。

№01641

南共中央关于召开南共五大 致联共（布）中央的信

（1948年7月1日）

致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定于7月21日开幕。代表大会要开若干天。请你们派贵党代表与会，并请不晚于7月15日告知我们能否期待你们的代表团出席和贵党代表是谁^①。

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48年7月1日

^① 这封信是1948年6月25日发给南共中央驻联共（布）中央的代表П. 别洛维奇的，委托他转交联共（布）中央。但是，联共（布）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没有派代表参加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因为在情报局的6月会议上，根据联共（布）的倡议，通过了一项建议：劝告所有的党同南共断绝任何关系。7月3日，别洛维奇从莫斯科致电贝尔格莱德：“今天我被召唤到中央，奥舍托夫通知我，鉴于已经出现的情况，从今天起停止我的工作。……明天我必须搬出办公室。”

№07494

基尔萨诺夫与费依奇关于从苏联召回 所有南斯拉夫公民的谈话记录

(1948年7月6日)

秘密

分送：维·莫洛托夫、安·维辛斯基、H. 古谢夫、瓦·佐林、
A. 拉夫连季耶夫（贝尔格莱德），归档。

7月6日根据费依奇^①的请求接见了她。

一、费依奇交给我一份照会，照会中大使馆通知，南斯拉夫政府决定召回所有在苏联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国。鉴于将会产生的预先计划和组织的那种局势，这些公民继续驻留在苏联是没有可能的。（照会附上）^②。

费依奇请求尽快回复此照会。

递交照会时费依奇很激动；关于照会的内容他没有再讲什么，也没有补充任何意见。

读了照会后，我说，我将按照会内容给外交部领导报告。

二、按照佐林^③同志的指示，我通知费依奇，苏联的战争残

① 费依奇，南斯拉夫驻苏联临时代办。

② 照会没有发表。照会内容是关于苏联方面对在苏联普通学校和军事学校学习的南斯拉夫大学生和在苏联工作的南斯拉夫人民民主共和国公民，“为了使他们改变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态度”施加影响的具体事实。

③ 佐林，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1902～？），1947～1955年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疾人组织不打算参加南斯拉夫人准备在今年举办的战争残疾人代表大会。

说明：5月10日波波维奇通知我，南斯拉夫人民阵线战争残疾人协会决定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残疾人代表会议。因此，就关于召开这样的代表大会是否合适及苏联是否可能派代表团参加问题，他请苏联提出意见。

谈话进行了10分钟。

萨哈罗夫同志在场。

苏联外交部巴尔干国家司代理司长 G. 基尔萨诺夫

【专题说明】

联共（布）中央 2~3月全会与布哈林问题 (1937年2月)

1937年2月23日至3月5日，举行了联共（布）中央全会。当时，大规模的镇压运动已成为国家政策，国内政治气氛空前紧张。在全会审议的6项议题中，中心议题是布哈林、李可夫案件。这次全会通过决定，将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联共（布），将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收入本专题的文件包括全会召开前夕布哈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给中央全会全体成员的声明，安德列耶夫、莫洛托夫、奥新斯基等人的发言，全会关于叶若夫报告的决议，斯大林就布哈林问题所作的报告等。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顾国兰、
黄有自、刘淑春、赵国顺翻译）

№05748

布哈林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

（1937年2月20日）

亲爱的同志们：

我给中央全会送去一份由两部分组成的近100页的“声明”，回答了各种供词中包含的大量诽谤。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写完这个材料，所以不能写得很充分，但它反击了这段浊流。

由于这一切我的神经彻底垮了。像亲人一样令我热爱的谢尔戈^①的死，使我丧失了最后的力量。诽谤把我置于这样一种境况：既不能与党内同志们一起、与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欢乐（在纪念普希金的日子），也不能向谢尔戈的遗体表示哀悼，这是不堪忍受的境况，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我再次以在我守护下去世的伊里奇的最后一息、以我对谢尔戈的热爱、以我最神圣的一切向你们发誓：所有这些恐怖活动、暗害行为、与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等等——都是对我最卑鄙的诽谤，闻所未闻的诽谤。

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我已经写了对诽谤者的答复。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我都无法前去参加全会：我的双腿不能行走，我受不了已经形成的气氛，我不能说话，又不愿意大哭一场，在自己人依据诽谤来辱骂我时，我也不想歇斯底里发作或者晕倒。我的答复应当宣读，也请你们将其散发。虽然我的心同你们大家在一

^① 即奥尔忠尼启则。

起，但在许多人看来我已经是一个叛逆者和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么是被恢复名誉，要么是退出舞台，别无他路。

在这种极不寻常的情况下，从明天开始我将完全绝食（从夜里 12 点已经开始。1937 年 2 月 21 日上午 10 点注。——布哈林），直到撤消对我的所谓背叛、暗害行为、恐怖活动的指控为止。我不会带着这样的罪名活下去。同志们，为了不造成与你们斗争的假象，关于这件事我没有对任何外人讲过；因此我不给全会写信；因此我也不采取其他办法。这次绝食是针对诽谤者们的。如果能向他们表明造谣诽谤将受到无情惩处并重新审讯他们，那就好了。因为我知道，这里（我读过关于叶若夫报告的决议草案）有做过头的地方（对我来说）。我决心斗争到底，没有什么好躲躲闪闪的，我忍受了严重污辱，我自愿不走出这间房间。别的事已无能为力了。永别了！我热切祝愿你们胜利。我为谢尔戈痛哭。别的事我已无能为力了。

我的最后一个请求：请把全会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定通知我妻子。如果我注定要走到凄惨道路的尽头，那就让我在这里静静地死去，请不要把我开到别的地方去，不要让别人来打搅我。

永别了。预祝胜利。

你们的 尼·布哈林

附 言：

我恳请让全会参加者了解我的详细答复（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以我的体力所能写出的答复）。从实际情况看，这比抗辩要好得多。对此我有无可争议的权利。请求你们，同志们，做这件事，何况我为此倾注了那么多最后的精力。

附 件

尼·布哈林同志致联共（布）中央全会
全体成员的声明

亲爱的同志们：

在你们就我的案子做出决定以前，我给你们写这封信。我再次肯定，我绝对没有犯那些指控我的罪过，这些指控纯属恶毒卑鄙的诽谤。好几个月以来，我遭受了最痛苦的精神折磨，我被宣布为托洛茨基罪行的同谋者，群众起来反对我，做出了最吓人的决议，我的名字被玷污，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卑鄙诽谤已经从政治上置我于死地，对我可以为所欲为。但我向所有人声明，在经过这一连串最可怕的骇人听闻的折磨之后，我仍在继续同破坏分子的诽谤作斗争，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迫使我放弃对这种诽谤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大量的这类诽谤性证词出笼的原因是，在托洛茨基匪帮所造成的目前总的气氛中，在确定的政治方针下，在了解了已有证词的情况下，后来的假证人认为，他们大体上也应这样来作证，于是一个假证词出笼了，而且逐渐增生，看起来有很多证词，也就是变成了许许多多证词。

蓄意诽谤苏联一系列活动家已成为托洛茨基分子的策略，这一点已得到证明，而且党的领导也已承认：第一，这一情况是我们党的领导直接对我讲的；第二，《真理报》的一篇社论也是这么说的。我还应补充的是，在法西斯德国的（《费尔德兴观察家》）和意大利的（《意大利日报》）报刊上，我亲眼看到了（1）我国许多杰出军事家的姓名；（2）我国许多优秀外交家的姓名；（3）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姓名。这些人都会被说成与托洛茨基的阴谋有牵连。另一方

面，拉狄克在其供词（1936年12月4、5、6日的记录，第16和17页）中说，（1934年秋）鲍姆曾向他拉狄克表示：“……希特勒总的来说不相信侨民，并且非常怀疑，托洛茨基先生的观点是否比那些使他在侨居中难以入眠的思想得到更多的表达。柏林不清楚托洛茨基在苏联有多大分量，也不知道这些观点是否与苏联那些集团的意见——它们在苏维埃政府的政策中未得到相应表达——相符。”拉狄克在这里首次提到了“右倾分子”，显然是把他们纳入上述“那些集团”的概念中的。

换句话说，“主子”——德国人——要求托洛茨基分子有更高的“威望”和“更广泛的基础”。对托洛茨基分子来说，装饰一下自己的“公司”是有直接的好处的，于是他们开始（或者说早就开始）编造神话，说与他们一起的还有其他人。这大概就是用我的名字、也用上面提到的苏联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名字做交易的原因吧。这是恶棍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为了在他们从事的卑鄙的大买卖中增加机会的需要。很清楚，诽谤我比较容易，因为我是右倾的首领。

无论如何都可以认为，下述情况已被证明：

1. 托洛茨基分子在其强盗般的策略手段中有一种策略，这就是诽谤诚实的苏联人；

2. 他们这样做的着眼点既是为了瓦解苏联的力量（一种特殊的暗害活动），也是为了自己的“国际”政策。

因此，萨尔基索夫同志在上次全会上的论证——认为没有任何人受到诬陷，而一切所谓的“诬陷”都是真实的——是建立在不明真相和对人（确切说是对野兽）过于轻信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些人绝对不值得信任的。

下面我将利用寄给我的材料——可惜远不是全部——来尽力指出哪些地方可以说明对我的指控具有恶毒暗害的性质——这些指控

既来自于托洛茨基分子，也来自于他们的右倾应声虫们。

第一部分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伪证人

一、总的评论以及拉狄克某些具有明显欺骗性的供词

拉狄克的供词是最狡猾奸诈、阴险毒辣、精心炮制的下流无耻的货色。就如同他在自由时得心应手地干下流勾当、很有特点地“习惯于”自己生活中伪装的一面（或那一半生活）一样，他现在以更高超的技艺扮演着另一种角色，捏造出有关我的一套又一套的说法，巧妙地利用我的只言片语，把一些零碎的事实与其居心叵测的虚构混在一起，装出真诚坦率的样子，向他的供词的读者提供出色的谎言。我敢说，这些供词有朝一日将会作为地地道道的诽谤大师炮制的经典性诽谤作品的范例而编入历史文选。

1. 关于拉狄克对我的态度，关于他在侦讯中和法庭上的行径。

为了表示“诚恳”（按照对这个名词的“日本式”理解），拉狄克在法庭上陈述时说：“我再承认一个罪过：我已承认自己的罪行并揭发了组织，但顽固地拒绝供出布哈林。我知道，布哈林同我一样处境很糟，因为我们的罪过纵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但实质上还是那么一回事。但是我和他是好朋友，而且精神上的友谊要胜过其他种种友谊。我知道，布哈林和我一样十分震惊，我相信他会老老实实向苏维埃政权招供。因此我不想让内务人民委员部把他抓去”等等（见《真理报》第29号报道）。

在这里，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拉狄克是一个热爱崇高美好事物的人，因为对于他来说精神上的友谊高于一切，因此他“顽固地拒绝供出布哈林”。

但是让我们拿侦讯时即庭审前对他的审讯记录（1936年12月27—29日审讯记录第1—2页）来看吧。这里丝毫看不出“顽固地拒绝”提供证词，也丝毫看不出与布哈林的“友谊”。恰恰相反，

拉狄克断言：“因而我决心毫不隐瞒地向侦查机关提供一切……何况包庇右倾分子对我并没有好处”（第 1 页）。“我期待会就右倾组织活动的情况对我进行专门审讯，而我早就决心向侦查人员和盘托出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第 2 页）。

当开始涉及“右倾分子”问题时，拉狄克立刻就血口喷人，编造出成吨的卑鄙龌龊的诽谤！在从侦讯到庭审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头脑灵活的拉狄克已经想出了另一种说法，因为这样说使人感到更可信，并且使人感到他拉狄克是一个向往神圣的精神友谊的内心复杂的人物。这可以说是在极度真诚的幌子掩盖下做出的极度无耻的事情。

2. 唐恩^① 事件。

拉狄克在 12 月 27~29 日对他审讯（见第 24 和第 25 页记录）结束时断言，我回国后告诉他拉狄克说，我“受右倾中心的委托”与唐恩取得了联系，“把存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存在右倾组织及其纲领等情况告诉了唐恩，并建议他要孟什维克中央指示其在苏联的最可信赖的代表与他们——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联系”。

不仅如此，拉狄克断言：“布哈林还请求唐恩在‘联盟分子’垮台的情况下通过第二国际在苏联开展一个保护他们的运动。这正是第二国际出面声援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的第一个中心的原因。”

对此我声明，我是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与作为第二国际委员会成员的唐恩会见的，代表团的其他同志都参加了这些会见，他们能

^① 唐恩（古尔维奇），费多尔·伊里奇（1871-1947），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 世纪 90 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两度被沙皇政府逮捕流放，1903 年流亡国外。1917 年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1922 年被驱逐出境。随后在柏林领导孟什维克侨民的政治活动，1941~1943 年在美国出版孟什维克侨民政治刊物《新路》。

够证明我就党委托我办的事与唐恩交涉得不错。我对拉狄克谈过与唐恩的会见，作为笑料，我讲了我们之间的一段对话，我对唐恩说，他憔悴了，消瘦了，而他回答说：“而您如此发胖，显然是因为把我的血都喝光了。”

任何一个明白事理的人都清楚，第二国际发起的运动是它通常在这类问题上采取的路线，拉狄克简直就是撒谎撒过了头。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点，这就是：拉狄克在法庭上为什么没有重复这一点？尽管这是相当重要的指控，而且具有国际性质。他为什么对此只字未提？无非是因为他非常明白：如果他在法庭上公开讲出这件事，就会闹出一个地道的世界性丑闻。这是因为唐恩及其朋友对此一清二楚——这是撒谎，他们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道义完全在他们那一边。到那时，拉狄克就会使人们不再相信他的一切诽谤、甚至一切真实的供词。因此他没有把这个最无耻下流的谎言拿出来（顺便说一句，我既没有对李可夫、也没有对托姆斯基谈过我的这次国外之行，我没有看到他们，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事实上都不可能与他们讨论什么）。拉狄克杜撰出了与唐恩有关的这件事的“细节”，这说明了这个长于挑拨离间的头号骗子的一整套卑鄙龌龊的手法。

3. 关于拉狄克以及关于与索柯里尼科夫的对质。

拉狄克在12月27~29日审讯开始时是这样转述据说是我和他之间有过的那次谈话的：“布哈林在与我谈话时指望，他可以逃避责任，因为除加米涅夫外，看来谁也没有揭发过他，但我当时不同意布哈林的看法，提醒他注意‘缺少法律依据’的说法^①并告诉

^① 检查机关发表声明后，在一次谈话中（有其他人到场）拉狄克确实谈到了“法律依据”一词，对此我提出，这或者是检察机关的专门用语，或者是某种怀疑。——布哈林注。

他，对他来讲惟一的机会是侦查机关没有查出右倾组织的普通成员，或者是这些人非常坚定，不会把他供出来”（第1和第2页）。

接着，就在那次谈话中，据说我还提到了“右倾”组织的历史经验，提到了对“野蛮”小组的代表人物留京^①采取的精明手腕，提到了斯列普科夫^②的坚强不屈，等等。

似乎我有这样的观点：除加米涅夫外谁也“没有出卖”我（我是在剖析讲谤的内在逻辑时有条件地采用这一说法的），而这一观点是据说曾在我和拉狄克之间进行过的那次谈话的逻辑依据和出发点。但拉狄克在这件事上遭到了最可耻的失败，因为他不知道，我和索柯里尼科夫对质过一次。索柯里尼科夫断言说，“右倾分子”是通过托姆斯基加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等等。我怎么能断定除了加米涅夫谁也不会说出我，并把这作为进一步推论的出发点呢？

拉狄克在这个问题上卑鄙地撒谎，难道还不清楚吗？后来一连串的推论随着其主要环节的落空而落空，难道还不清楚吗？我特别提请注意这一点的原因是：拉狄克在这个问题上公然撒谎，而且他无法脱身，因为整个“谈话”、所有所谓“我的”言论都与一个前提即“除了加米涅夫没有任何人揭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等等。在这个问题上拉狄克露了马脚，因为他不知道我和索柯里尼科

① M. II. 留京，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30年代初期，留京和 П. А. 加尔金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约有15~20人参加的秘密的反对派小组，其目标是改变党的领导的政策、更多地考虑工农的利益、实现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停止党内的迫害活动等，并认为实现这些改变的前提是撤掉斯大林的职务。1932年，留京小组被国家政治保卫局破获之后，被指控为策划反革命阴谋、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工人阶级和党的叛徒。斯大林要求枪决留京和小组其他领导人，但政治局的决定是将小组成员开除出党，并将其中多数人流放边远地区。

② A. H. 斯列普科夫，留京小组的成员，曾参加右翼反对派。

夫对质过。这就是说，拉狄克捏造了一系列谈话。以上所述已经完全彻底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事实对于理解政治骗子和强盗的所有其他谎言是极其重要的。拉狄克本人也承认，他不知道我和索柯里尼科夫对质这一事实。在这个问题上拉狄克撒不了谎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有关这次对质的内容他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

在审讯的最后（记录第25页），拉狄克联系另一个问题又编造出了另一套谎言，他说：“据我们所知，在审讯时除了加米涅夫外，没有人供认有关右倾组织存在的问题，因此布哈林认为（听听！——尼·布）侦查机关没有涉及他的其他材料。”

这时侦查员谈到了我和索柯里尼科夫的对质。于是拉狄克陷入窘境，解释不了我为什么没告诉他这件事，他说“很难解释”并提出了两个同样愚蠢的猜测：（1）我认为他对我隐瞒了自己的对质；（2）我不想使他伤心（在这种事情上这样的理由对所谓的同谋倒是很好!!）。

当拉狄克表示，我对他没有说起过有关我和索柯里尼科夫对质的事情时，侦查员同志说：“这令人难以相信。您同布哈林有着组织的联系，你们互相通报你们领导的组织与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进行斗争的情况。由于第一个联盟中心被揭露出来，你们商量对策，估计各自的处境。布哈林怎么会不告诉您，索柯里尼科夫在对质时揭发了他呢？”问题提得很对，何况索柯里尼科夫谈到了拉狄克是托洛茨基中心的成员。但由此可以很自然地得出结论：如果关于对质的事布哈林真的什么都没对拉狄克讲（而这已得到了证实），那么坏蛋拉狄克及其同谋者捏造的其他的一切都不足信，不管是布哈林和拉狄克的组织联系、互通情报，还是布哈林反对联共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等等。如果不是由于对我的成见和不公正的偏颇而丧失理智的话，这样的结论难道是难以想象的吗？

事实上我没有把对质的事告诉拉狄克，这是因为我认为，泄露

侦讯的内容及其进程并将这些情况告知一个正在受审查的人是党纪所不允许的。仅此而已。

从这个最明显的例子可以看出，拉狄克发挥出色的想象力，极尽捏造撒谎之能事，不惜编造大量的谈话和观点硬强加给他的诽谤的受害者。在这个问题上一切都是这样的清楚和明显，拉狄克的诽谤是无可置疑的无耻行径。

4. 从政治观点总的评价拉狄克针对我的行为（在他被捕以前）。

我断言，拉狄克在每次同我谈话时都毫无例外地伪装自己并蓄意欺骗我。

(1) 拉狄克竭力证明说他当时“出卖”勃柳姆金^①是把党的利益置于自己过去的同志的生命之上，即用别人的鲜血来证明自己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党性。

(2) 他总是异乎寻常地颂扬斯大林：“斯大林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十分之九的保证”。

(3) 他经常援引自己的文章，说没有对党的正确性的深刻信念，是写不出这些文章的。

(4) 他经常炫耀自己了解外交秘密，谈论上级机关的指示等等。

(5) 他经常显示出一直在为斯大林挂忧，也为国家政治保卫局机关不安，认为其成分不纯。

(6) 他说，他妻子的儿子曾提醒说要提防曼德尔施塔姆（因基洛夫案件被处决），但当时谁也不理会他。

(7) 他似乎真诚地宣称，如果他能在斯大林身边工作，那是他

^① 勃柳姆金曾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契卡工作人员，1918年7月6日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后来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在党内斗争中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的幸福。

(8) 他从不做出我们这里“一切都好”的样子，但总是善于“深思熟虑”，始终不变地支持（故意做出的样子）以党的方式解决问题。

(9) 他不断向我暗示，他可能成为我们国家机关中不可靠人物的报复对象，他还谈到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可能有波兰间谍。

(10) 他人骂索柯里尼科夫（他与后者已经有几年不讲话了），称他是无耻之徒。（他大骂索柯里尼科夫是在后者被宣布交付法庭审判之后。）

(11) 由于他妻子允许姆拉奇科夫斯基去他那里，他破口大骂（在姆拉奇科夫斯基走后）。

(12) 他向我表示希望“斯大林明察秋毫”。

(13) 我休假回来后，就在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案判决之后，拉狄克马上就出于“党性”的考虑劝我出席党的会议等。

(14) 拉狄克被捕后，他的妻子找我转达了他最后的话：“请尼古拉别相信任何诽谤：我在党面前一清二白”。而当时我根据他们夫妇的请求马上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封信（顺便说说，这一点尤其清楚地表明，如果我是拉狄克罪行的同谋，那么拉狄克就不可能说这些最后的话）。

(15) 有我在场时拉狄克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得极其革命：在波兰使馆的招待会上愤怒地攻击波兰记者，与布里特争吵，甚至在与鲍姆等人那次著名的别墅谈话（下面还要谈到）中特别尖锐地抨击希特勒。

(16) 有一次他对我说，他的两个熟人听到了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作家）的反苏谈话，他拉狄克劝他们马上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告。

(17) 他极力吹捧罗姆，说他是一个优秀党员，是我们出色的

侦察员。

(18) 他说，在《消息报》的一次党的会议上，在党内具有无可争议的声誉的谢利赫同志在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发表声明后发言支持他（据我后来所知，他说的是百分之百的谎言）。

如果我与他的秘密的反革命工作哪怕有一点牵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质时拉狄克提出一个论点，说“我们俩”（不胜感激！）有时也意识到自己是人，所以才说人话，说他和我都具有“两面性”。对此我要说：我没有任何两面性，因为我过去和现在都站在党的立场上。而拉狄克可能有这种两面性（如果这一点还不是纯粹的欺骗的话）。但不论是与勃柳姆金有关的“论据”、拉狄克通过她妻子向我转达的关于党性纯洁的最后的的话，还是由于姆拉奇科夫斯基被允许见他而破口大骂、对索柯里尼柯夫的辱骂、关于“斯大林明察秋毫”的警句、关于谢利赫在党的会议上发言的谎言以及其他许多问题，都不能用“两面性”来解释。不，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拉狄克在我这个诚实的党的工作者面前伪装起来。当雷声骤起，拉狄克想到寻求我的保护（因此才有他最后的话以及请求我给斯大林写信）。当他本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他就大肆诽谤我，指望会有“带来好处”的机会。只要意识到在一些问题上可以玩把戏，他就玩了起来。至于别人的生活、尊严等等，所有这些对于拉狄克之流又有哪怕是一点点的意义呢？这对托洛茨基分子来说在政治上具有双重效果（1. 离间苏联的活动家；2. 造成自己具有广泛基础的假象），个人也有因“真诚”而得到奖赏的机会。拉狄克就这样下了。

二、关于对外政策、关于托洛茨基失败主义者、

关于鲍姆及其同伙等等

拉狄克以无以复加的厚颜无耻杜撰出一整套似乎是我向他阐述的国际政策方面的理论：是我谈到过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已被证

实、在战争中两线作战必然失败、托洛茨基一伙的叛卖政策正确性等等。既然恶棍拉狄克引证的是我们俩之间似乎有过的一次面对面的谈话，那我也就没有可能百分之一百地证明他是在捏造。因此我在这里必须用复杂的证据来批驳拉狄克的无耻谎言，这样的谎言在他那里多得可以用口袋装。

首先我要就问题的实质谈几句。

1. 我不止一次对拉狄克讲过，实际的发展进程不仅推翻了托洛茨基关于在一国内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点，而且推翻了他关于在没有西欧无产阶级国家有组织的支持的情况下我们必定灭亡的论点。我说过，实际的发展进程告诉我们，没有我们的帮助，西欧无产阶级很难取得胜利（我曾在《消息报》上发表过一篇这样的文章，当然由于外交方面的原因提法比较委婉）。最值得指出的是拉狄克是同意我的说法的！

2. 尽管德国法西斯在全力备战，一旦战争爆发，我过去和现在都对战争的结局非常乐观。我不止一次说过，由于担心被指责为信奉（错误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我们往往不分析法西斯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军事措施，而这是必须了解的。我的乐观主义的依据是：日本必将遭到我们和千百万中国人的反对，而中国人将从我们这里得到有组织的力量。至于武装力量的技术装备和精神状态方面，我们要好得多。后方也是根本不一样的，无法相比（日本的预算相当紧张，农村的状况极其艰难，普遍的动荡不安和政治危机等等），苏联的兵员组织在普遍增长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德国的情况更加困难。即使波兰政府的立场是积极亲德的，波兰对德国来说也是一个“硬核桃”，因为工人、农民、下层乌克兰人以及所有犹太人都将站在我们一边。在这一背景下，德国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仍是在空转，虽然粮食供应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动员政策的结果。英国和法国十分恐惧，它们要首先指望自己的力量。我们的政策是

完全正确的，无论是从共产国际的路线（因为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革命的全部问题都将取决于战争的结局，因为苏联是革命无可争议的中心的中心，力量的力量），还是从国家的外交路线看都是这样。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出色的。

这就是我与拉狄克谈话的一些内容。但是怎样来证明呢？

第一，我认为对拉狄克无论如何不能信任。

第二，我可指出，我在与奥·鲍威尔^①谈话时，曾热烈地为我们在两条战线上确定无疑的胜利辩护。当时阿罗谢夫^②在场，我想他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他不是十分胆怯的话。

第三，在哥本哈根物理学家尼尔斯·伯尔的家中，我面对一批丹麦学者（我们的大使在场）坚决果断地痛斥德国，号召与其作斗争，并预言我们将取得胜利（丹麦当时弥漫着“别惹我”式的和平主义气氛）。

第四，我曾经（单独）做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院士的工作，首先是宣传我们的对外政策（谈话的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法西斯、反德的）。

第五，罗曼·罗兰可以证明，我曾与他当面讲过托洛茨基分子的危害性以及我们对外政策（其中包括与资产阶级国家妥协的政策和“人民阵线”政策）的正确性。

第六，我回国后，塔尔穆德教授——我们的物理学家、共产党员——来看我时，我对他说，应该首先为国防工作，还说我们最凶

① 鲍威尔，奥托（1882~1938），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1918~1919年间曾任奥地利共和国外交部长。

② 阿罗谢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1890~1938），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任特维尔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间为莫斯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区司令员。1926年起先后任苏联驻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全权代表。1934年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

恶的敌人就是托洛茨基分子。

当然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伪装。然而，1. 谁也没强迫我去同尼尔斯·伯尔谈我们的对外政策，他特别想谈微观物理学中的因果性及其他学术问题。2. 与巴甫洛夫和罗兰的谈话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成不了反面论据。而这两件事都是事实。有关巴甫洛夫的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我想罗兰也会随时证明我对他讲过的话。如果我对这种层次和这种才智的人说这样的话是出于其他目的，那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两人当然永远也不会转述我对他们讲过的话）。现在向德国退让就意味着武装它。我在听到托洛茨基派叛徒们的可耻路线时不能不为之愤怒。

可是有人想把我和拉狄克捏在一起！而无耻之尤拉狄克以他完全骗人的供词做到了这一点！竟然有人相信这一切！而且把拉狄克的谰言不加批驳地照登在我们的报刊上！……

现在重新回到拉狄克的供词上来，并且首先谈谈鲍姆的事。

在审讯时拉狄克把事情说成是这样的：鲍姆和一个德国人“没有预先通知”（12月27—29日记录第17页）突然来到他这里，当时我正在他家里坐着，没穿衬衫；他不想同他们谈话，因此言语很冲，我也给他帮腔，因此德国人走了，随后拉狄克向我讲述了他先前的试探行动：

他说（见1936年12月27—29日记录第17页）：“这时我与布哈林坐在我别墅的凉台上。我记得布哈林没穿衬衣。我由于没有得到中心和托洛茨基授权进行任何谈判，而且认为鲍姆也不具有足以进行这类谈判的权威，决定不同他谈判。此外，对科赫院长的顾问……我一无所知，我不想在有他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谈话。我不想公开告诉他这一点，于是尖锐评论了希特勒制度，以此作为拒绝，布哈林在这件事上帮了我的忙。”

接下来的说法是，鲍姆明白了情况后走了，拉狄克同我谈起了

与德国人打交道的情况，我赞同他的看法等等。

拉狄克在有关这些德国人的问题上故意撒了几个谎：

1. 来的德国人不是两个，而是三个（拉狄克向我介绍他们这些“真正的法西斯教授”）。

2. 鲍姆及其一伙根本不是在我之前走的，而我倒是很快就走了，德国人仍留在拉狄克那儿。

3. 拉狄克随后同我的“谈话”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但这里有一点是应该指出的：拉狄克断言，当着我的面他没有与这伙人进行任何卑鄙的谈判。这是对的。但是他对此是怎么解释的呢？只要读两页记录马上就会发现，拉狄克大兜圈子，为了寻找合理的解释而颠三倒四地胡扯：

1. 他拉狄克没有得到中心和托洛茨基的授权；

2. 他认为鲍姆不具有足够的权威；

3. 他不了解科赫院长的顾问（第17页）；

4. 但是“看来柏林委托鲍姆进行谈判”（第18页）；

5. “德国人已经把脚放到桌子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不想与他们进行谈判”（第18页）。

所有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既然对第一次“试探”有授权的话，难道对第二次“试探”拉狄克就没有足够的权威？难道不正是拉狄克自己说是柏林委托鲍姆与他拉狄克谈？等等。显然拉狄克在寻找某种解释，但没有找到，尽管搜集了一整套偶尔碰上的证据。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有我在场。如果我是拉狄克的同谋，那一切都将是理想的：双方的代表都在，而这正是拉狄克的“主子”所梦寐以求的（见上述鲍姆就希特勒和托洛茨基问题所说的话）——那就谈谈吧！然而没有这么做。原因是我与拉狄克一伙的肮脏政治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关系。拉狄克对此了如指掌，因此有我在场时

就不与鲍姆讲话，并且在侦讯时也没来得及精心编造比更加天衣无缝的谎言，而是前言不搭后语。

我对待法西斯德国恶棍的真正态度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有一次拉狄克漫不经心地说有人告诉他，在“民族饭店”里住着两个正在考察我国青年现状的希特勒的间谍。我立刻打电话给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斯卢茨基同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保卫局获得了一个积极的结果。这不可能是什么“伪装”，原因很简单：如果我是拉狄克的战友，那么我就不必在他的面前伪装，也就不必去告发法西斯盟友。我不得不说说这件事，因为在拉狄克和皮达可夫干出下流勾当后，我的所有著作（反法西斯的文章、演说和报告）都成不了论据，因为它们都受到了怀疑。

三、拉狄克关于恐怖活动等的诽谤

再也没有什么比拉狄克关于谢·米·基洛夫遇害后他和我之间有过一次谈话的伪证词更卑鄙无耻的了。如果不是由于目前总的形势，由于一切关系和事情都乱了套，我会对任何一个敢于重复拉狄克对我的诽谤的人羞辱一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早以前曾对我说过，对拉狄克要当心，他是阴谋家和恶棍，而我听了却付之一笑。现在不得不哭了……基洛夫之死无论是在政治上（因为我认为基洛夫是我党才能杰出的领袖），还是感情上（因为我与基洛夫的私人关系极好，他对我十分关怀体贴）都使我感到震惊。对质时连拉狄克这个恶棍也不得不假牙咯咯响地说，我谈起基洛夫总是“非常亲切”。他在这里还证明说，我说过要么停止恐怖活动、要么转而搞更大规模的恐怖活动。他还说，后来我对他说过，“右倾中心”（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赞同第二种意见，我也就不再动摇了。

再早些时候拉狄克说，我认为基洛夫同志是被右倾分子杀害的。所有这些都是血口喷人、恶意中伤的诽谤，他在法庭上又重复了这些诽谤。这不过是在肆意糟蹋人，利用一个悲剧事实来进行居

心叵测、丧心病狂的诽谤。我只能再说一次，我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见过面，因此事实上不可能同他们谈话和讨论任何问题。接着，拉狄克在受审时作的供词中回答了对于假想出来的“右倾中心”的内部分工问题，说我和乌格拉诺夫抓恐怖活动，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则抓破坏活动。听了这些无耻的谎言，不禁令人毛骨悚然。然而任何人也不能够证实我知道乌格拉诺夫在哪儿、他是否活着等等。从 1932 年起，我连他是生是死都一无所知，更不要说知道他的观点了。请随便哪一位来试着证明 1932 年以后我在哪里、在什么时候、通过谁与乌格拉诺夫有过无论是什么样的“联系”吧！

拉狄克在对质时说，我不赞成破坏活动，但执行了“命令”！是谁的命令呢？显然是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而我与他们没有见过面，又如何去执行呢？在哪里执行的呢？这显然是拉狄克从法西斯分子那里学会创作的那个“神话”。

拉狄克捏造了一次“升诚布公的谈话”（12 月 27~29 日审讯记录第 6 页），在这次谈话时我“证实”，“托姆斯基、李可夫、乌格拉诺夫和他（布哈林）将组织保存了下来，一些过去的工会运动活动家和国民经济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一组织，这个组织认为必须千方百计进行反对联共（布）领导人的斗争，包括使用恐怖手段”。在这里我想重复上面有关乌格拉诺夫以及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几句话。我很想知道“国民经济部门负责人”和“工会运动活动家”的名字，很想知道哪怕是一个他们活动的事实，哪怕是一个有关他们与我联系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的事实，哪怕是一个我知情的他们犯罪活动的事实。（而拉狄克在第 7 页上断言，我本人向他说的恰恰是关于他们的破坏活动！）

接着是拉狄克编造出的 1934 年夏天的“谈话”。似乎是我向拉狄克提到了蔡特林、斯列普科夫和马列茨基的名字，因为他们的

“垮台”“使布哈林非常焦急和担忧”。但是斯列普科夫和马列茨基是1932年夏天被捕的！而这一逮捕两年后还使我如此“焦急”，所以我才提到这些名字。（况且我当时确实不知道他们被捕！）好吧，可是这些人总是被逮捕了（蔡特林被释放了，但是去了乌拉尔）。组织究竟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拉狄克开始从另一方面精心编造他的谎言。前一次中央全会之后，我向拉狄克谈了关于亚戈达同志的报告和关于在科学院、包括在我们研究所抓人的事。我谈这些是因为有一个问题使我很苦恼：我对某些人是否有罪有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否应该就此事给中央写信。关于托洛茨基的分支机构、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揭露的一切我都一无所知。布瑟金和科舍列夫被捕尤其使我震惊，我才向拉狄克提到了这两个人的名字。克尔日扎诺夫斯基^①同志对布瑟金（而不是科舍列夫）被捕也感到惊讶。据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说，当时把布瑟金安排在科学院集体宿舍居住的原科学院办公厅主任、老肃反工作者沃伦斯基同志说，布瑟金的被捕显然是偶然的。我知道科舍列夫是原普梯洛夫工厂（好像是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是列宁格勒州委专门派来整顿党组织的，归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管等等。当科学院开始揪我时，我给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同志和哥尔布诺夫^②写了一封信（抄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并且在提到布瑟金和科舍列夫被捕时又在打印好的信上写上一句话：“但愿这个问题上没有发生

^① 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1872～1959），1893年参加俄国革命运动，曾与列宁一起组织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20年领导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1921～1930年间领导国家计划委员会，1930～1932年为燃料工业人民委员部动力总局局长，后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1929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为科学院副院长。

^② 哥尔布诺夫，尼古拉·彼得罗维奇（1892～1937），化学家，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任人民委员会秘书，1922～1923年任苏联人民委员办公厅主任。1935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之后任科学院常务秘书。

严重的失误”（这个事实可以核实）。可是惯于撒谎的拉狄克在知道这些名字后编造了一套说法：是我对他说的，我正在集合一些“原则坚定的干部”，而且还是会使用武器的人！可是他们究竟是谁呢？拉狄克说，据我说科舍列夫和布瑟金是右倾分子。他这是在撒谎。我从未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是沃伦斯基介绍我认识了布瑟金。而科舍列夫，如上面所说，是州委派来的。要么是我把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托洛茨基分子组织起来了？那么拉狄克所说的我找到的这些原则上坚定的青年干部又在哪里呢？他们是谁呢？

关于布哈林认识库克林、巴卡耶夫、叶夫多吉莫夫等人（第10页）的说法一文不值。我“认识”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也许认识所有曾担任过中央委员的人。可以请他们来证明一下：最近几年我见到过他们，与他们有哪怕一点点见不得人的联系或者知道他们见不得人的活动——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我过去未曾与姆拉奇科夫斯基见过面，我对他——无论他是作为一个人或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没有一点印象。而拉狄克恰恰说到了他，编造说我在他拉狄克家里同姆拉奇科夫斯基有过一次谈话，而且他引用种种说法，说得像真的一样。

关于这一点我还要说几句。有一次我在拉狄克那里偶然遇到姆拉奇科夫斯基，我不知道他就是姆拉奇科夫斯基（是拉狄克告诉我的）。我去拉狄克那里是为了读了一篇即将见报的文章。我读完后，姆拉奇科夫斯基嘟哝了几句马上就走了，而拉狄克说他就是姆拉奇科夫斯基，之后就开始为他妻子放姆拉奇科夫斯基进来而骂了起来，并吩咐今后再也不要放他进来。

事实真相就是如此，这不是臆造出来的。我在给政治局的第一封信中已谈了这件事。而且，拉狄克不了解我给政治局的信件内容，就像我不知道拉狄克的信件内容一样。如果认为我们是在一致行动，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又是可能的，那不是太愚蠢了吗？此外，

不知道信的内容这一事实是很容易证明的：只要问一下拉狄克我的信的内容就可以了，当然是如果这封信没有作为反驳他的证词给他看过（直接或间接地）的话。如果我是拉狄克的同谋并同姆拉奇科夫斯基进行了拉狄克强加于我的那次谈话，而且我本来就知道姆拉奇科夫斯基的作用，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向政治局报告在拉狄克那里遇到了姆拉奇科夫斯基这件事呢？同样：我的信中提到姆拉奇科夫斯基这个事实就是对拉狄克的诽谤的驳斥，这一点难道还难以设想吗？我们再往下看。请看看拉狄克是如何转述我与姆拉奇科夫斯基的谈话的。姆拉奇科夫斯基试图了解右倾分子恐怖小组的情况。布哈林闪烁其辞地答道：“当你担任我们这里的总指挥时，你就会知道一切的”（第14页）。拉狄克继续撒谎说，姆拉奇科夫斯基走后，布哈林说：“姆拉奇科夫斯基仍旧是个游击队员和短枪手”，接着便开始阐述恐怖主义思想（第15页）。

我专门引用这些地方是因为，在了解各种相互关系的人看来，所有这些无稽之谈都是明显的谎言。拉狄克在这里引用了“我的话”。可是：

1. 我因为不认识姆拉奇科夫斯基，所以与他谈话时不可能用“你”相称。

2. 我因为不认识姆拉奇科夫斯基，所以不可能说他“仍旧”是“游击队员和短枪手”。即使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是“游击队员”和“短枪手”。尽管拉狄克异常狡猾，但在这个问题上把他个人的关系硬加给我的做法很不高明。

在拉狄克的所有供词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足以说明他无耻诽谤的真正原因。

他在自己的供词中愿意把尼古拉耶夫扔给“右倾分子”。他组建起（据说是我说的！）与我有联系并由我领导的右倾组织。

他在法庭上说，还有许多不地道的托洛茨基分子，但是除了托

洛茨基分子外，还有力量上差不多的、受中心领导的右倾组织。总之他喜欢把这方面当重点。

我们来追忆几个事实：第一次庭审时，姆拉奇科夫斯基发誓说他要和盘托出。然而关于拉狄克他没讲过一句话。其他人关于拉狄克也只是说对他“寄予希望”。关于皮达可夫几乎没讲什么，报纸上一点也没有刊登第一次庭审时不利于他的供词。

关于我倒是讲得多得多（尽管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这是偶然的吗？我认为这绝非偶然。拉狄克继续采用那种策略。一方面他向资本主义世界说，你们看吧，你们看到我们托洛茨基分子做了多少事，只要看看工业，看看我们的破坏活动就行。但是在苏联就差得多了，因为我们的右倾同盟者干得更多。这是拉狄克的话的政治含义。

而另一个更为实际的含义则是：我还知道一些事情，以后再讲，我还有用。

对后一点只能表示高兴，因为还没有进行诽谤。而前一点则是犯罪行为，如同诽谤构成犯罪一样。

我和其他被拉狄克蒙骗的同志一样承认自己有一个过错，那就是信任了这个骗子。我亲耳听到过奥古斯特·倍倍尔是如何谈论拉狄克的，他说这是个不道德的人，连他的名字都不应提起。但是我当时以为这不过是对“左派”的仇恨。

列宁对我说过，拉狄克是阴谋家和恶棍，但是我一笑了之，以为伊里奇忘不了以前在国外时的那些“争吵”。

斯大林有一次劝告我要当心拉狄克。

可是我相信了他，珍惜他的才气，相信他能真心实意地转到党的立场上来，为他说了话。结局是众所周知的。当拉狄克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要我“减实地”证实他的诽谤时，这听起来就像他那出色的辩解：他是“由于深感羞耻”才拒不认罪的（见1936年12

月4、5、6日记录)。而当他被揭穿时，他的“羞耻”立即就烟消云散了。拉狄克的这种“羞耻心”与他的“诚实”完全相当。

皮达可夫、索柯里尼科夫和 索斯诺夫斯基^①的诽谤

托洛茨基派首领们事先就考虑好了事情一旦败露后的行事方法，这里也许还包括非常具体的细节。对此我非但不怀疑，恰恰相反，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而且几乎确实如此。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我记得，当我对拉狄克说，有传闻说皮达可夫的妻子被捕，并问他这怎么可能时，他回答说，他也有所闻，这“可能是由于她的风流韵事”……

又过了好久，编辑部有人告诉我说，皮达可夫最初解释他妻子被捕的原因是由于她的风流勾当。两个最初的“解释”如此吻合纯属偶然吗？未必。这些败类的行动方法中甚至包含消灭自己人，“出卖”已暴露的自己人，嫁祸于人（不是他们的自己人），即采用造谣中伤和在党内散播不信任的方法，“挑拨离间”，瓦解组织等等，尽可能在某些问题上进行总的协调（如关于诽谤的对象），——所有这一切我都觉得是非常可能的。

这一切或许可以解释在我与索斯诺夫斯基对质时发现的一些情况。

索斯诺夫斯基确实一再表明我与他就托洛茨基分子的方针谈过话，而且赞同这些方针，我作为他的反革命活动的盟友帮助过他等等。而且他甚至还出示了“物证”：

^① 索斯诺夫斯基，列夫·谢苗诺维奇（1886～1937），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曾在《贫农报》、《消息报》编辑部工作。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分子。

1. 他拿出了我写给他的一张便条，其中我建议他在文章中增加一段关于斯大林同志的话。

2. 他带来一张便条，我在其中对他（已是在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受审之后）写道（在由塔利同志签署的关于把索斯诺夫斯基从编辑部辞退的命令之后）：我不是上诉法院，我们也没有话题。好像还写了其他什么。

他把前一张便条说成是提供具有特殊伪装性质的帮助，把第二张便条说成是我的秘密指令，巧妙地（显然是“极其秘密地”）暗示他，我们之间应当断绝往来。

我们姑且设想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是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经验极其丰富的秘密工作者索斯诺夫斯基认为有必要珍藏这些能使他的同谋者身败名裂的便条呢？这是由于“极其秘密”的原故吗？无论如何不会是这样的。就是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捏造出来的。好在索斯诺夫斯基不知道，我事先听从了塔利同志的劝告（他说：“您没必要说话，我来同他谈谈工作。”），不想同他谈话，甚至我在写便条时，连如何措辞也同编辑部新来的秘书商量过，而且这张便条是由秘书转交给索斯诺夫斯基的。

“秘密指令”就是如此。至于有关斯大林同志的那段话，我在给索斯诺夫斯基建议时没有把他当作托洛茨基分子，而是把他当作真诚悔过了的、完全忠于苏维埃政权和党的人，当时我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认为他是这样的人。我想，对斯大林的作用避而不谈，在编辑部内外都将被认为是某种半示威式的行为，当时就是这样的实际规则和习以为常的做法，我远非破坏这种规则和做法的合适人选，相反，当同志们不止一次为我本人的文章增加相应的段落时，我都同样这样做。

但是问题的根子是，索斯诺夫斯基在从事“极其秘密的工作”时喜欢保存能使人身败名裂的文件。我认为这对于事先周密策划并

必然进行的诽谤是一种辅助性的武器。

1. 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中心的组成

大家知道，对我的攻击是从加米涅夫等人的供词开始的，他们恶意中伤，指责我与他们的中心合作。我首先想在这里用皮达可夫、索柯里尼科夫和拉狄克的供词来说明这个问题。

索柯里尼科夫在同我对质时表明，托姆斯基代表“右倾分子”参加中心，他这样做不仅出于自愿，不仅代表自己，而且还代表我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同时索柯里尼科夫还表明，他是从托姆斯基本人那里直接了解到这一情况的。

就这样，作为托洛茨基中心成员之一的索柯里尼科夫说，托姆斯基代表“右倾分子”参加了中心。这是第一种说法。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令人气愤的事实。在对质时卡冈诺维奇同志问索柯里尼科夫：“托姆斯基也许是没有经过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同意、独自一人参加你们的中心的？”对此索柯里尼科夫非常肯定地回答说，托姆斯基参加了，并且是以三个人的名义参加的，他是亲自听托姆斯基说的。

而在法庭上，索柯里尼科夫——他显然是读过了拉狄克的供词并知道了他的说法，或者通过审讯材料事先得知了这方面的情况——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但是右倾分子没有加入联盟。他们声明，他们一切都赞成，但仍想保存自己独立的组织，只愿意使自己的核心小组与联合中心保持联系”。（原来与托姆斯基谈话的已经不是他索柯里尼科夫了！）（见庭审速记记录。）就是说一个索柯里尼科夫有两套截然相反的说法。这是庭审时听到对质的检察官不能不予以驳斥的骗人的花招。

让我们来看一看拉狄克说了些什么（12月4、5、6日记录第5~7页）。记录说“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中心的有季诺

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伊·尼·斯米尔诺夫^①、姆拉奇科夫斯基、捷尔—瓦加尼扬”。对“您是否知道还有谁参加中心？”的问题，拉狄克的回答是否定的。第二种说法。皮达可夫、索柯里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②、拉狄克参加了平行中心。所以原右倾分子中没有人参加过托洛茨基派中心。最后，让我们再看一看皮达可夫关于这一问题说了什么（见12月19-20日审讯记录第14页）。关于平行中心的成员他说：“最初我们设想可以只限于实行中心成员之间单独会见的办法。例如1935年我两次见过索柯里尼科夫，两次或三次见过拉狄克，与谢列布里亚科夫也见过两三次，随后还见过托姆斯基，后者尽管形式上不是中心成员。但在实质上，问题发展到右倾分子参与了中心的形成。我知道，索柯里尼科夫与拉狄克保持着联系，还见过托姆斯基。好像拉狄克见过谢列布里亚科夫（在右倾分子中，他见过布哈林）。”

总之，按照这一说法，尽管托姆斯基形式上没有参加过中心，但“问题发展到”“右倾分子参与了”中心的“形成”。这是什么意思，难以理解。因为这里谈的是某种“形式”，而从所有的供词来看，是不存在什么形式的。其次，看来中心已经形成了，而另一方面——“问题”只是“发展到了”。该怎样理解这些胡说呢？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有了区别于第一种和第二种说法的第三种说法。

试问，如果不是案件中夹杂着某些不真实的、欺骗人的所谓事

① 斯米尔诺夫，伊万·尼基托维奇（1881~1936），189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在沙皇军队中服役。十月革命后曾在红军中工作，1919年起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八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骨干分子。

② 谢列布里亚科夫，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1888~1937），1905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共和国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1921年起在交通部门工作。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主要成员之一。

实的话，在托洛茨基中心的4个著名成员中能有3人对中心本身的人员组成这一重要的政治组织问题持不同看法吗？任何一个不抱成见的人都会说，不，这是不可能的。这里无非是人们在撒谎前没有来得及统一口径。

在人们成立了一个由4~5个人参加的、非常秘密的小组织的情况下，如果以为4个人中会有3个人完全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五个人的说法，这是十分荒唐的。而在这个问题上3个人在谈及这第五个人时各执一词：一个人说他没有参加，另一个人说他参加了，并有完全的权利，第三个人则说，他形式上没有参加，但“参与了”组成。而且其中的一个人根据不同的形势毫不汗颜地提出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客观真相十分明显：托洛茨基分子在第一次庭审时作了供词后（也许还在此之前）决定坚持恶意中伤的方针，说他们与布哈林、季可夫等人有合作，但在关于中心的具体问题上如何造谣还没有来得及商量好，也没有来得及互通信号。

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明显不一致使诽谤者暴露无遗。比如说，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如何不能用反论据来搪塞，譬如托姆斯基不能确定是“接近”还是“几乎参加”，这种客观上的不确定性（“组织上的不明确性”）表现为供词的不确定性。索柯里尼科夫非常明确地说，他参加了，甚至是以自己同事的委托者的身份说的。而拉狄克否认参加了，明确说中心成员只有4个人。皮达可夫持第三种立场。索柯里尼科夫在法庭上来了个大转弯，从而表明他绝对是在撒谎。

由此可见，不确定性是存在的，这不是客观情况不确定的结果，而是主观上对如何诽谤没有统一口径造成的结果。

我不能替托姆斯基担保，因为我不知道他近几年来做了些什么，但是他不可能借口我同意并以我的名义同托洛茨基匪帮进行谈判，我对此坚信不疑。索柯里尼科夫在对质时昧着良心撒谎。索柯

里尼科夫在法庭上彻底推翻了其对质时的谎言，另外编了一套，这是他的特点。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方面。不论是拉狄克还是皮达可夫在供词中都讲述了关于后来变为“平行中心”的“预备中心”的漫长故事。拉狄克和皮达可夫都指出，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托洛茨基“嫡系”针对季诺维也夫分子采取的预防性措施产生的结果。托洛茨基分子担心联盟中的力量对比使得季诺维也夫分子能发号施令。因此为了保证托洛茨基分子的领导权，他们在取得匪首托洛茨基本人的同意后，把（一旦垮台时的）“预备”中心的想法变为平行的托洛茨基中心。同时应该记得，根据皮达可夫的供词，托洛茨基教他即便对最亲密的同谋也不要一切都和盘托出，而皮达可夫本人则想，托洛茨基就是对他皮达可夫也没有完全讲出自己的真实目标（尽管除了与法西斯分子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结盟，鼓吹失败主义、搞背叛活动、破坏活动、白色恐怖等等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干的了）。而吸收托姆斯基或“右倾分子参加”的正是那个要对季诺维也夫分子保密并应该保证“纯粹托洛茨基主义”领导权的中心！这个谎言是彻头彻尾蓄意编造出来的，难道这还不清楚吗！^①

关于平行中心组成的这三种不同说法（在涉及右倾分子的问题上）和为了保证托洛茨基分子对骗子手们的领导权而吸收右倾分子参加的胡扯完全是在撒谎。

2. 关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与右倾分子的“联系”、“接触”和“联盟”等等

^① 如果认为索柯里尼科夫讲的是第一个中心，这也无济于事：当时索柯里尼科夫有两套方案，皮达可夫一直讲的是参加第二个中心，拉狄克则否认参加过第一个中心，也否认参加过第二个中心。索柯里尼科夫的欺骗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至今仍是别人望尘莫及的。

我首先声明：当我谈“右倾分子”时，如果指的首先是自己（我决不认为自己是右倾分子）的话，那么这个词是带引号的。

仅仅是参加或未参加共同的中心这个问题还概括不了关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与“右倾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以为上面对诽谤者供词的分析充分令人信服地表明，根本没有这种参加共同中心的事，而与此有关的托洛茨基中心成员的供词都是明显的谎言。我在这里将继续研究他们关于一般“联系”的供词。

先谈谈皮达可夫的供词。不错，皮达可夫在对质时没有拉狄克那样的热情，他讲述了从我到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开始他就与我在政治上关系密切，向我通报了托洛茨基的立场，我则向他谈了我对工业的“悲观主义的观点”等等。他是从我1928年到医院去看他并对事态表示悲观主义想法谈起的。据他说这就是联系的开始。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1928年（即差不多10年以前）我确实给住院的皮达可夫（当时加米涅夫在他那里坐着）读过我写的所谓“纲领”（主要是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提纲）。这个“纲领”什么地方也没有传过，没有以任何方式扩散过和传抄过。当中央审查关于右倾反对派的案件时，有人一再询问我当时的观点，谢尔戈同志还引用了一个“未披露姓名的”通讯员的话，说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同农民和解，一旦战争爆发，我们的新工厂就可能落到白军手中。因为这是上面提到的我的那份纲领中的说法，所以当时我只觉得血往头上涌。我知道，这个“未披露姓名的通讯员”就是皮达可夫。使我感到震惊的是：皮达可夫对我很温和，劝我不要激动，让他的小女儿送我回家，说了许多好话，可是随后却干出了这样阴险的事！这是我当时的心理状况。皮达可夫到底对纲领说了些什么，他已作了证实，况且政治局委员们也都知道此事。难道我在中断了一切关系后，刚到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就会立即对他说一通反对派的话（如他在对质时所说，是“悲观主义的”话）？难道能够认为这种所

谓的事实有哪怕一点点的可能性吗？所有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难道还不清楚吗？

另一方面，说我刚到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皮达可夫本人就马上把托洛茨基分子的计划告诉我，难道这是可能的吗？要知道，皮达可夫关于他们的组织方法（见12月19~20日记录第6页）是这样说的：“……有关托洛茨基的立场没有必要向所有的人讲，对人要经过长期审查，在完全确信不会出现任何意外之后，才向有关的托洛茨基分子介绍托洛茨基的真实观点。”

怎么能够使人相信，皮达可夫突然会在对我的态度上表现出非同寻常的不谨慎呢？这是违背他们托洛茨基分子的秘密工作准则的。而这一点从他自己的供词中更可以看出来，他在与加米涅夫的谈话中（1932年）对能否与右倾分子联手表示怀疑，因为他们同后者之间有着特别尖锐的政治分歧。由此可见，对于任何一个没有成见的人来说，皮达可夫的供词都是明显的虚构和谎言。

皮达可夫在1932年曾这样说：“加米涅夫……对我说，中心与右倾分子（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建立了联系。加米涅夫说，如果您现在同与您关系良好的布哈林保持必要的联系就好了。”（上述记录第10页）

据皮达可夫说，加米涅夫接着告诉他，他们就共同立场问题（下面还将谈及这个问题）与右倾分子“谈妥了”。对此我要指出，加米涅夫和皮达可夫在这个问题上明显是在撒谎。

事实是这样的：1928年（请记住，这是几乎10年之前的事了！！）我与加米涅夫进行了（政治上有罪的）谈话之后，加米涅夫对谈话内容作了相应的“润色”和整理，记录下来后交给托洛茨基发表。他就是这样“出卖了”（从我当时的心态来看）我对他的探望，而且做得比皮达可夫（对我的“纲领”一事）更阴险。

另一方面，在我读这一纲领时加米涅夫也在场。在这种情况下

我怎么能够马上加入联盟并与之达成协议呢？

因此，加米涅夫和皮达可夫创作的这段情节同样也极不可信，其本身就说明了恶意中伤的性质。我倒很清楚，在这个问题上皮达可夫是在继续加米涅夫早在法庭上就开始的编造，皮达可夫从报纸上很好地了解了有关内容。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皮达可夫在临死前作最后的总结性陈述时只字未提右倾分子（不能排除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良心发现），这与索柯里尼科夫、尤其是与拉狄克正好相反。

现在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件事。皮达可夫在对质时声称，他从1931年起与我有联系并对我讲过托洛茨基的观点。据加米涅夫说，皮达可夫还声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联盟在1932年与右倾分子以共同的反革命纲领为基础“达成了协议”。

但12月23日审讯皮达可夫的记录第26页谈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的首领托洛茨基的观点时是怎样说的呢？在1935年12月，托洛茨基对皮达可夫说，右倾分子承认了托洛茨基的所有观点，包括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但是“我（托洛茨基）知道，你们那里正开始就这种联合能维持多久的问题进行争论”。“一开始能接触就好——要知道我们在1926年就开始同季诺维也夫分子接触……”

我暂且不谈这些话的诽谤性质。我在这里只指出匪帮首领的这番话与皮达可夫们和索柯里尼科夫们（索柯里尼科夫们是在庭审前）说的话之间存在的明显的、极其尖锐的矛盾。快到1936年时，托洛茨基要求与右倾分子保持接触：“一开始能接触就好！”托洛茨基想得到右倾分子的支持，可是从他的话来看他还没有得到，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在这个问题上一切都混乱不堪、谎话连篇，这难道还不清楚吗？在审讯拉狄克的记录第21页（12月4、5、6日的记录）上，同一个托洛茨基说：“一旦爆发战争，右倾分子就会大批

加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队伍。”

如果这些“右倾分子”本来早就参加了联盟并且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此等等，那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供词中的所有这些矛盾表明供词极不老实，由此应该得出相应的结论。

除上面指出的地方外，皮达可夫还在供词记录第 3 页上谈到过我（在谈到 1931 年时，说托洛茨基知道，右倾分子“躲了起来”）。这是在猜测，很少具体内容。在第 14 页上皮达可夫说，“好像”1935 年拉狄克同布哈林见过面。大家都知道，1935 年我与拉狄克在同一个编辑部里工作。在第 26 页上说：托洛茨基对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例如其中还有克列斯廷斯基^①同志）“感兴趣”。在第 27 页上，托洛茨基指示“不要削弱”同我的“联系”（与要求进行接触恰恰相反！）。所有这些外加的矛盾只能进一步加剧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这些有组织的谎言和诽谤所特有的混乱。

3. 关于托洛茨基分子的诽谤性供词中的“共同纲领”问题

弄清关于存在所谓共同纲领的恶毒诽谤是特别有益的。

皮达可夫的供词——在转述加米涅夫的话时——涉及到这一问题（19~20 日的记录，第 11 页）：“……这个共同的目标就是：1. 推翻斯大林并消灭斯大林制度。2. 放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从而相应地改变经济政策。在这两点上我们与右倾分子很容易达成一致。”

皮达可夫继续说道：“对于我提出的改变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加米涅夫以他特有的自信答道：‘您知道，我们要等到掌权时才会做出具体说明。只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我们必须退却，以

^① 克列斯廷斯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83~1938），1903 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俄罗斯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19~1921 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22 年出任驻德国全权代表，1930 年起任副外交人民委员。

便缓和国内形势，调整外部局面。”

总之，加米涅夫与右倾分子达成协议后提出的东西是非常不明确的，只有上面列举的两点是明确的。

在对质时，索柯里尼科夫对共同纲领没讲什么，但是在回答卡冈诺维奇同志的问题时谈了有关向资本主义和小私有者让步等问题。

可是索柯里尼科夫在法庭上突然声称：“至于纲领性目标，那么早在1932年，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分子对纲领的看法就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个纲领以前被说成是右倾分子的纲领。这就是所谓的留京纲领。还在1932年，这个纲领就在很大程度上表述了这三个集团共同的纲领性目标。”（1月26日《真理报》，审讯速记记录。）

为什么索柯里尼科夫在同我对质时只字不提留京纲领呢？为什么当时多次追问他有关纲领的问题他都不作回答呢？（还要请问，检察长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个异常突出的矛盾呢?!）为什么加米涅夫在回答皮达可夫的问题时根本没有提到留京纲领呢？为什么皮达可夫本人不论在审讯时、对质时，还是在法庭调查时，甚至在最后陈述时都没有提过留京纲领呢？为什么只是到最后才从“第二种风格”的索柯里尼科夫嘴里冒出了这个纲领？为什么连提到过留京集团的拉狄克也是按另一条线索来编造，而只字未提作为三个集团共同纲领的留京纲领呢？从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供词来看，为什么托洛茨基也从未谈及这个如此权威、如此重要的纲领呢？

从这些疑窦丛生的问题中得出的结论就是索柯里尼科夫在这个问题上公然行骗，他最初打托姆斯基这张牌，然后弃之不用；他开始时说右倾分子加入了他们托洛茨基中心，随后又改用另一种说法（“右倾分子”是独立自主的）；先是只字不提留京分子，而后在公开开庭时又抓住留京不放。真是一个天才的诽谤者。

这首舞曲的含意后面会暴露无遗的。现在只要认定，索柯里尼科夫在这个问题上的欺骗手法是低级、拙劣而下流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出发点，来看一看加米涅夫的说法。这里提出了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建成，即愚蠢的、已经烟消云散的托洛茨基的理论。

任何一个略微认真研究过党史和反倾向斗争史的人都知道，我纵然犯过种种错误，甚至有重大罪过，但在各个时期都是这一理论的激烈反对者，早在反对托洛茨基的共同斗争时我就详尽地（包括在《论我国革命的性质》这篇相当长的文章中等等）讲清了这一理论的恶毒的反革命性质。因此，把这个“理论”作为想象出来的由右倾分子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的那些下流胚组成的联盟所达成的想象出来的协议的基础并硬加于我，是愚蠢透顶的。

我在这里不想作任何理论推理，只想指出，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有关共同纲领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充斥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卑劣诽谤和恶毒欺骗的大口袋，诽谤者们从这里捞取他们那可怜的不光彩的好处。

* * *

在这一节结束时我想就两个事实说几句话。

(1) 我同拉狄克在宪法委员会全会上的争论。拉狄克在会上非常狡猾地提出了有关每个公民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时都有权提候选人的问题（这对托洛茨基分子和所有其他反苏势力极其有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曾三次发言反对他的提议，说明不能这样做的理由，因为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会钻这个空子，提出反苏候选人，如果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候选人作一定的限制，那他们就会制造政治闹剧。试问，如果我是拉狄克的同谋，我为什么要否决他的提议呢？当时没有人逼我说。

这一切应如何解释呢？只能这样解释：我在这个问题上捍卫了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

(2) 巴黎的托洛茨基分子策划反对我的行动和对我的肉体攻击。

我在巴黎时，我们的秘密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巴黎的托洛茨基分子策划对我干坏事，并将我从下榻的旅馆搬进使馆。我自己也看到开始出现一队法国警察来保护我。甚至在很多人听我作报告时，托洛茨基分子组织了针对我的野蛮打闹，《最近新闻报》报道说在我指挥下如何在楼梯上痛打托洛茨基分子。能够设想巴黎的托洛茨基分子是为了“灭口”即为了掩饰我对他们的“真正”好感而想杀害我吗？甚至未必能够这样设想。那么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可见：托洛茨基分子把我看做是他们的死敌，正如我把他们看做是自己的死敌一样，因为他们是我为之服务的事业的敌人。

下面是第二部分（关于右倾分子伪证人）。

请把我给联共（布）中央全会“声明”的第二部分（第39～93页）打印若干份并与先前寄上的第一部分合在一起，先行分发给全体与会者。并请把整个材料的打印副本寄给我一份。

很抱歉，这份声明是手写的（而且写得不十分整洁！），这是由于时间十分仓促（由于材料收到很晚）以及我精神过于紧张的缘故。

尼·布哈林

1937年2月20日

附 言：

由于这种仓促我不得不从先前的声明（与蔡特林的供词有关的）中撕下一部分插在这里，而没有重写。

布哈林同志致联共（布）中央全会全体成员的声明

第二部分 右倾分子伪证人

关于库利科夫^①的供词

关于库利科夫，我只能根据对同他对质的回忆来写。^②

在这里重复讲述右翼反对派产生的历史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只想挑出最突出的、与对我最严厉的指控有关的几点来谈。

但我要先讲一个政治插曲，它有助于弄清后面要谈的一切。

早在我和其他人（在1930年）递交承认错误的声明之前（这是7年前！），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当时的志同道合者乌格拉诺夫^③和库利科夫递交了投降声明（科托夫和B.米哈伊洛夫是单独交的，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是一起交的）。而那时使我特别伤心的是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声明的内容。这个声明表现出对我故意的敌意。我在同库利科夫对质时提到过这一点并且至今仍这么认为。库利科夫则在对质时矢口否认。可是后来我找到一份旧《真理报》（1929年11月18日，星期一，第二版），在《乌格拉诺夫同志和库利科夫同志的声明》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今后怎么办？是与党和工人阶级保持距离并支持布哈林同志、李可夫同志和托姆斯基同志，还是与全党步调一致？我们认为要与党和工人阶级在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斗争。乌格拉诺夫、库利科夫。”

当时出现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这样的声明是我始料不及的。

① 库利科夫，M.M.（1891~1939），十七人为候补中央委员。

② 这部分的前面几节是1937年2月16日我收到俱乐部之前写的。——布哈林注

③ 乌格拉诺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1886~1940），1922年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委书记任上当选为俄共（布）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非常自然，我也就对他们产生极大的不信任，我们的关系实际上就中断了。我再重复一遍，问题不在于他们递交声明这件事本身，而在于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形式（我在这里谈的是大家都清楚的我当时的心情）。最终关系破裂了，而且种种猜疑使情况更加复杂化。“离乌格拉诺夫远些”——这是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当时的心情。后来（1930年）我们也递交了自己的声明，但我与乌格拉诺夫几乎没有再见过面。

1932年夏天发生了众所周知的动荡。我担心乌格拉诺夫由于其不坚定的毛病会重新向右摆，而他的这种毛病将归咎于我，我专门去他那里提醒他（我本人已经准备去休假）。我这里保存的1932年10月7日给政治局的声明的抄件就这个问题写道：“我因为知道乌格拉诺夫有容易波动的毛病并担心一些偶然的消极因素对他产生影响（在近两年中在非工作场所我与乌格拉诺夫只见过一两次面），所以提醒他克服这种危险，指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绝对必须齐心协力‘拉车’，竭尽全力工作等。但是我认为，应当把这看做是我最起码的义务，而不应认为我有过错。我与乌格拉诺夫说话完全是出于我的主动，而完全不是因为他想找机会跟我谈话。我反对对这件事作任何其他的解释，因为那将是恶意的编造。”

这就是这一时期实际关系的背景。应当说，我和其他人递交了声明后，我并没有经常地足够尖锐地提出消除宗派主义的一切残余的问题（这主要是对青年人来说），我担心否则就会疏远他们，而他们所有的人都会逐步转上正确的轨道的。因此，克服1928～1929年各种残留的坏影响客观上有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下子就能彻底加以消除的。

我们从这些情况来看库利科夫的供词。他讲的1932年春天（这是库利科夫说的时间，这个时间我不记得了，再往后不可能，往前推倒有可能）在大街上偶然（如他本人所说）遇见我一事，是

他对我的主要指控。

这段叙述简单说是这样的：库利科夫在街上偶然遇到我，责怪我的无所作为和软弱；我讽刺他的干部，说您的干部都到哪里去了等等，然后我告诉他“右倾中心”决定转向搞恐怖活动并转达了对卡冈诺维奇同志采取具体恐怖活动的指令。之后，用库利科夫的话来说，他情绪激昂并想亲自去执行这些指令……接着他休假去了。

这就是这段叙述的实质，正如每个人都能看出的，如果这整个案件不是一个真正的悲剧，那么这整个叙述只适合作幽默杂志的素材。

实际情况怎样呢？让我们看看整个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起点是由于库利科夫声明的性质而引起我对他的极不信任。事实上的关系破裂。街头的偶然相遇。库利科夫由于我实际上拒绝继续斗争而对我责难。接着我马上报之以进行恐怖活动的指令。而事情的结局是：渴望干一番“事业”的库利科夫在这之后休假去了。只要把事件的过程描绘出来，就会弄清楚，这里恰恰是构成指控实质的最严重的东西是编造出来的。相遇是事实，库利科夫非难我也确有其事。问题恰好在于我确实停止了斗争，留下了一些我本应果断坚决地与之一刀两断的尾巴。在这件事上我没有直接反驳库利科夫，而是试图用怀疑的态度从精神上瓦解他的纠缠。在这种情况下，在根本不信任库利科夫的条件下，我怎么可能发出这样的指令，而且还是下达给库利科夫的呢？这与库利科夫本人讲的无所作为以及偶然相遇一类的话都是极其矛盾的，因此不能信以为真（在这里我不准备再谈论关于我似乎有恐怖目标的卑鄙推测了）。应当说，就连用语都有胡编乱造的痕迹。即使在1928~1929年，我们从来没用过“中心”这样的字眼，更不要说“右倾中心”了，我们当时的右倾分子中事实上存在“三人团”时也没有用过。而当库利科夫声称，

我对他说：“现在右倾中心决定”等等，就明显可以看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由“右倾中心”决定的，而是由库利科夫或者他的朋友“决定的”，不是那时决定的，而是现在决定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我。

第二个严重的指控即关于留京纲领的指控编得也不成功。当我断言我只在中央委员会里见过留京纲领时，库利科夫瞪大了眼睛不无遗憾的看着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怎么啦，这是我们工作的基础哇！”如此等等。或许这一纲领是库利科夫工作的基础，但我与这一工作毫不相干，对此我一无所知，因此不承担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责任。

库利科夫怎么能在这个问题上指控我呢？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他最后一次见到我是在1932年春天，从此直到对质之前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而在1932年春天谁都没听说过什么留京纲领。库利科夫在对质时详细地转述了大街上谈话的内容，却只字未提这一谈话涉及的这个纲领，这并不是偶然的。那时候我们已好久没有见过面了，如果当时他知道这一纲领的话，那倒是一个新闻了。所以，当时他还不知道这个纲领。而后来他没再看见过我。他怎么能因为我没读过纲领而感到奇怪呢？他不可能有任何关于我的消息。我很快就走了。至于我不在时出现了什么新情况，库利科夫及其朋友们得到了这个纲领、他们或许读了这个纲领并对其表示赞同——所有这一切我至今都不知道，也不可能做出判断（在寄来的供词打字稿中有可资判断的材料。——布哈林）。

有关留京纲领的问题，下面我还将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个题目上。现在来看叶·蔡特林的供词，这份供词给我寄来了，因此我能比较容易地对其作相应的评论。

蔡特林的供词

在详细分析胡话连篇的叶·蔡特林的供词之前，我应就供词的

作者谈几句。蔡特林多年来（大约到 1933 年初为止）是我接近和喜欢的人。我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时，他是我的副手并且实际上是我的私人秘书。然而 1933 年 1 月全会后，他开始对我十分冷淡，原因是我在全会上没有把他同斯列普科夫分子区别开，而且在回答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插话时没有讲什么维护他的话。因此他当时就已决意离开我，但我去了纳尔奇克，问题就这样搁置下来了。当时他由于被怀疑与斯列普科夫等人有牵连而遭逮捕（好像是 1933 年 2 月），而后获释。他很快就以大量侮辱性信件和言词攻击我，他气愤的是，我虽然对他无辜被捕提出抗议（为了弄清所有情况并促使尽快释放他），但自己却未被逮捕，我没有为他辩护（恰恰不是这样!!），我没有帮助他的家庭。另一方面，他讲述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混乱，说“他们所有的人都掌握在我的手心里”，如果斯大林知道情况，他们就要倒霉，他要求我安排他就这一问题去见斯大林。而蔡特林的所有讲话和信件都明显带有病态的激动性质，简直接近不正常。他对我的爱戴变成了仇恨，尽管我努力要跟他和好，他还是怀着深深的敌意，甚至怀着报复的心态离开了与我一起进行的工作。他在乌拉尔工作并很快恢复了党籍。

他过去的经历是出色的（参加过十月武装起义、经历过国内战争、坐过德国监狱、参与创建过青年共产国际等等）。蔡特林在被捕前很久就劝我同斯列普科夫身边的人断绝一切关系，说他们很卑鄙等等。还指责我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当时我多次为他辩护（与他的看法相反），甚至在确信青年派中其他人确实走上反革命道路之后，还在为他辩护。

现在来看蔡特林的供词。在这里我想首先谈谈初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两点：（1）关于青年派小组（“学派”）的成员；（2）关于档案材料（所有的引文都依据 1936 年 12 月 22 日对蔡特林的审讯记录）。在提供关于青年派小组成员的供词时，蔡特林不知为什么漏

掉了A.斯捷茨基^①同志、K.罗森塔尔、一度与斯列普科夫是好朋友的瓦·伊·梅日劳克^②。是他忘记了？无论如何不可能。大家知道，上面提到的这几个同志早就脱离了青年派小组，在党和国家机关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受到党的领导人的极大信任并担任重要的负责职务。如果蔡特林提到他们，势必会影响他像现在这样歪曲历史。

那么这里是有确定的意图或只是偶然地避而不谈？这种避而不谈并不是偶然的。这里有确定的明显的不良意图。这种意图在于从一开始就把青年派小组说成是反革命团体，而把我说成是天生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怎样与相近的问题挂上钩的。侦查员问：“您是什么时候参加右倾组织的？”蔡特林答：“我是1926年来到莫斯科后参加右倾组织的，并与这个反革命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尼·伊·布哈林逐渐接近”（第1页）。总之：（1）在1926年就存在右倾组织；（2）这个组织是反革命组织；（3）这个组织有领导人；（4）我布哈林就是这些领导人之一。

这就是叶·蔡特林有关1926年的历史性供词。

任何一个对党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轻易地看出这些断言无知之极，有着明显的诽谤意图。1926年还根本没有任何右倾分子，1926年我还没有领导也不可能领导任何反党组织甚至反对派组织，这是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人——只要他不是最恶毒的诽谤者——都

① 斯捷茨基，A.M.（1896~1938），十五大至十七大为中央委员。

② 梅日劳克，瓦列里·伊万诺维奇（1893~1938），1907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是孟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内战期间曾在乌克兰和一些集团军以及南方战线工作，20年代先后在铁路运输部门、交通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担任领导工作，1931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后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知道的事实。1926 年我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甚至还没有建立比较密切的个人关系和其他关系，相反，比起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他们对我要更疏远些。蔡特林完全不是无知的人，他竟然敢于在这里扮演一个无知的可怜虫的角色，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接下来，似乎是“布哈林学派”早在 1925 年就“实际上开始反对联共（布）”。这是在什么地方？出于什么原因？在蔡特林那里整个历史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既然斯列普科夫等人在 30 年代形成了反革命集团，那就意味着他们在 1925 年就已“准备就绪”。这么说来，那些协助起草代表大会决议、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等等工作的人，那些被最负责的同志推举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人，他们那时都已经是反革命分子了？那么右倾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究竟在哪里呢？右倾产生的基础及引起分歧的问题等等又在哪里呢？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

意图是明显的：要“证明”我从一开始、几乎是一生下来，就是反革命分子。可怜的、血口喷人的企图。这是蔡特林的彻底堕落，精神上的堕落。

现在很清楚，为什么删去了（或者没有提到）上面列举的姓名。非常清楚，这里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

还有，关于我的档案的对话也许是更具代表性的。我不得不从审讯蔡特林的记录（第 18、19、20 页）中摘引出我认为最令人吃惊的段落。“问：您是否知道你们的组织（!!）有集中了反革命内容的文件的档案？这是些什么档案？现在藏在什么地方？答：档案中有如下文件：1928 年底起草的右倾组织纲领草案；布哈林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初稿；一个装有不同时期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哪一次？——布哈林）讨论各种问题的材料的文件夹；一些信件，其中有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及我们组织的其他积极分子的来信……这个档案现在保存在布哈林

的柜子里。”

接下来侦查员同志追问具体是哪一個柜子，他又重提上面问过的问题：“档案中究竟有些什么”（第19页）。“答：档案由几个文件夹组成，一个厚文件夹里面是共产国际纲领的第一稿（布哈林的手稿），第二稿（部分由布哈林手写，部分是打字稿，两部分合在一起），好像还有共产国际纲领的最后定稿。我不记得是手稿还是打字稿。在另一个文件夹中有给布哈林的各种信件，现在我很难想起是什么人的来信，但其中有斯列普科夫和马列茨基等人的来信。档案的其余部分是各种内容的文件：有笔记、草稿，其中包括中央四月全会的材料，都单放在一个文件夹里；1928年起草的纲领（是手稿还是打印稿我记不清了），布哈林写的，大约有17~20张四开纸。”

我确实不明白，侦查员同志（还有叶·蔡特林）怎么能进行这样的谈话。似乎在最重要的文件中有一些反革命组织的档案（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它们是：共产国际纲领草案；草案第二稿；共产国际纲领的最后定稿（这是连审问者格列博夫同志也必须执行的文件！）；政治局和中央全会的材料等等；“笔记、草稿，包括中央四月全会的材料”！这是怎么一回事呀！应受到指责的至多是1928年的“纲领”（而蔡特林恰恰不记得这个纲领是手稿还是打字稿了，就是说他忘记了——这并不奇怪！），还有（如果有的话）斯列普科夫的内容不详的来信。可是绝大多数材料都是共产国际的（纲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材料。而他们竟敢把这一切称之为反革命组织的档案！这样看问题，岂不是走得太远了！

我先不谈蔡特林居心险恶的评述，在他对派别的评述中有一定的真理，但由于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仇恨，变成了谎言和诽谤。我想先指出一些比较小的事实性错误。记录第3页说：“1929年初

……这时最终形成了由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和A.H.斯米尔诺夫（应是A.И.^①——尼·布哈林）组成的右倾组织的全苏中心……”

事实并非如此。乌格拉诺夫没有参与。而斯米尔诺夫（福马^②）根本就没有介入。他没有参加过各种会议，我记得，甚至在反对派开始活动时，他就劝我不要发言，甚至在中央全会上也不要发言。我确实不知道他那时的真正的观点（“笼统地”知道他的右倾情绪很严重；不知是马列茨基还是其他什么人早就在《真理报》上撰文批判过他右倾）。

第4页断言“我们指望起义运动”（指1929年），这是令人愤怒的诽谤。我担心过农民起义，但没有指望过这种起义。我出于这种担心才鼓吹机会主义的让步，以防止并遏制可能出现的骚动。说我注意在这方面的“选材”和“研究”，这很好理解，每个政治家都应加以注意。我最根本的担忧是怕农村不稳。我因此而做出了不正确的、政治上有害的机会主义结论，致使我与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并采取了各种反党步骤。但是，断言我和其他人指望农民起义运动（甚至是在1929年，即8年前，与党的关系最紧张的时期），这简直寡廉鲜耻、丧尽天良。不过，既然几乎能把共产国际的纲领变成反革命文件，那么这种“区区小事”也就不值一提了！！

有关与社会革命党人结盟的诽谤

从第4页结尾处开始的以后各页，蔡特林杜撰出新的整整一章谈论右倾历史上的策略，确切地说是关于鼓吹与社会革命党人结盟

① 斯米尔诺夫，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1877~1938），1896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曾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副农业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联共（布）中央书记、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十一大至十六大为中央委员。

② 斯米尔诺夫的化名。

的一章，对此我至今一无所知。据说（第4页），“由于指望……起义运动，一些右倾领导人（斯列普科夫、萨波日尼科夫、库兹明）纷纷表示，在农民骚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社会革命党人在农村中的影响必然增强，对此我们作为现实的政治家不得不加以考虑并与他们进行实际接触”。

“后来（1932~1933年），同社会革命党人的关系问题成了同他们建立组织联系的问题”（第4页）。现在我要指出，（A）说指望起义运动是诽谤（上面已提到）；（B）有关与社会革命党人结盟的说法是诽谤（其愚蠢还在于无中生有地夸大了社会革命党人的一般作用）；（C）滥点人名：不论是萨波日尼科夫（人家总是挖苦他嘲笑他），还是库兹明（他在西伯利亚的一个什么地方工作，很少来莫斯科）从来不被算作“领导人”，对此蔡特林非常清楚。

但是当我们着手分析蔡特林有关这些似乎存在的计划导致的实际结果的供词时，就很清楚关于这些“方针”的断言完全都是谎言，都是诽谤。蔡特林指出（记录第7页）：“我要说，早在1932年10月布哈林就已经通报我说，他已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谈过关于与社会革命党人建立接触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获得了认可，而且被认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之一。就在1932年10月中，根据布哈林同志的建议着手与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原中央委员们进行实际的会谈。这些会谈同时有几条线。问：哪几条线？答：斯列普科夫受布哈林的委托去弄清被流放的社会革命党人的现状，以及中央委员郭次、季莫费耶夫及玛·斯皮里多诺娃的所在地。”

我们先来看蔡特林的这部分坦白。刚开过中央全会（9月28日至10月2日），全会上谈到了在这之前被揭露出来的反革命组织（指留京分子、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等的被捕问题以及留京纲领等）。显然，就是在这时，为了弥补骨干的损失，开始寻找社会革命党人（“中央委员”），而他们几乎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没有任何

征兆表明社会革命党人的作用在增强，而且在1932年，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光是这一点就使蔡特林的所有供词变得非常不可信。但他自己想把供词变得荒谬绝伦、充分展示其诽谤性质。

事实正是这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按照蔡特林的供词，布哈林早在1932年10月就已经（注意：“已经”！）向他通报了就社会革命党人问题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协商的结果。

之后（“那是在10月份”，就是说显然已不是10月的头几天），照蔡特林的说法，我布哈林委托斯列普科夫去同社会革命党人联系。

然而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令人十分尴尬的事，因为斯列普科夫等人早就被捕了，是在中央全会之前被捕的。中央全会是9月28日~10月2日召开的！我从休假地回来已是在全会之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0月6日，这时斯列普科夫等人已经入狱。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1932年10月9日通过决定（决定已印发），鉴于斯列普科夫和留京已被逮捕，将他们开除出党。在那次全会上谈的也就是这件事。因此，我在还不了解事情原委的情况下，回来后马上向政治局递交了声明，写声明的日期是1932年10月7日。

那我又怎么能去委托早已被捕的斯列普科夫呢？这不仅是粗制滥造的诽谤，而且是拙劣的粗制滥造的诽谤，这难道还不清楚吗？这种诽谤将使每一个多少具有一点客观性的人对蔡特林的供词失去任何信任和尊重。

因此，蔡特林关于我委托斯列普科夫的说法不攻自破，从根本上动摇了它的前提，即关于同社会革命党人结盟、关于指望起义运动等等诸如此类的胡说。

但是记录还向我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其他论据。接下来，“布哈林自己打算通过与他交往甚密（！）的原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

物色合适的人选，通过他们也能同季莫费耶夫和玛·斯皮里多诺娃进行会谈”（第7页）。

第8页说：“布哈林对我说，在谢苗诺夫的帮助下，右倾组织成功地收集了所需要的有关流放到中亚和乌法地区的社会革命党成员的情报（!!），那里集中了社会革命党领导层的重要力量。

根据这些情报，通过斯列普科夫和斯米尔诺夫这条线，已经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郭茨和季莫费耶夫进行了会谈。”

我们先来分析这些奇谈怪论。第一，选择谢苗诺夫来寻找社会革命党人。这样的诽谤既无知又愚蠢。谢苗诺夫事实上向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党供出了社会革命党人的战斗小组，所有仍然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人都认为，谢苗诺夫是“布尔什维克的奸细”。在审讯社会革命党人的法庭上，他也扮演了揭露者的角色。社会革命党人恨他，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蔡特林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第二，用“中央委员郭茨、季莫费耶夫和玛·斯皮里多诺娃”的说法也很无知，因为他们分属不同的党。蔡特林未必会忘却这一点吧。

第三，只有疯了才会去找玛·斯皮里多诺娃，因为她有精神病。这一点我早就从肃反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了。

第四，（最有意思的是）斯列普科夫（已被逮捕的！）竟在被捕后很久还在继续活动。用蔡特林的话说，确实是我委托了谢苗诺夫（看来已是在10月的后半月），然后是寻找的阶段，再后是谢苗诺夫送来情报，最后是由斯列普科夫进行会谈。描述得不错吧？而斯列普科夫还不知道，蔡特林赋予了他神乎其神的、不可思议的本领！

这个关于谢苗诺夫、社会革命党人和斯列普科夫的诽谤也就这样落空了，而不管有关的人供认了什么。不能不看到，对我的指控是骇人听闻的，因为蔡特林说我给谢苗诺夫下达过进行恐怖活动的

指令。在这里蔡特林的诽谤（至少从记录看）达到了疯狂的程度。通过对有关提问的相应回答，蔡特林的诽谤逐步升级。问蔡特林：“您指的是哪个谢苗诺夫？”答：“谢苗诺夫就是那个暗杀列宁未遂、又杀害了乌里茨基和沃洛达尔茨基的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的原领导者”（第 8 页）。在第 9 页上侦查员同志提出的“问题”是：“您还知道哪些有关布哈林与社会革命党人谢苗诺夫联系性质的细节？”

对此只能感到愤怒。这里回避了一个问题，即谢苗诺夫是共产党人，是党员。杀害列宁的是卡普兰。杀害乌里茨基的是卡涅吉谢尔。是谁杀害沃洛达尔茨基，我不记得了。我为谢苗诺夫辩护，根据的是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党认为，他给了党很大的帮助，因此吸收他为自己的成员。与蔡特林说的相反，我很少见到谢苗诺夫，而且都是偶然相遇，他从未到过克里姆林宫我的办公室，而我根本没委托他办过任何事。至于恐怖活动，那我再重复一遍，我极其愤怒地否认有过任何与此有关的谈话。^①接着在第 8 页上蔡特林继续说：“谁专门与郭茨和季莫费耶夫进行会谈我不知道，我只能说，斯列普科夫（已被捕的！）和 A. И. 斯米尔诺夫通过一些由经过严格审查的人组成的中间环节与社会革命党人会谈过。问：谁是这些中间环节。答：是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些会谈是在 1932 年 10~12 月进行的”（下面接着说，会谈的目的达到了）。

这里又一次完全露出了马脚。第一，斯列普科夫甚至到 12 月还能出现（而他在 9 月份就已被关押！），而且他最终还“达到”了目的!!! 第二，蔡特林怎么能不知道中间环节呢？蔡特林是最接近我的人，是我的副手和秘书。如果有什么事，那他也该首先知道。

①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谢苗诺夫有相当长的时间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蔡特林本人也声称：“我记得我（1928 年）在布哈林那里见到过谢苗诺夫，在这之后就再没见过”（第 9 页）。如果我经常见到谢苗诺夫的话，那这是避不开蔡特林的，这一点大家都清楚。——布哈林注

但是他在这里什么也说不出，因为这不过是无稽之谈。第三，究竟是谁对人作了“严格审查”？是在押的斯列普科夫？还是别的人？还是要求谢苗诺夫搞恐怖活动并将这件事告诉蔡特林（第9页）却不把“环节”告诉他的我？我与斯米尔诺夫从来没有谈过任何有关社会革命党人的事。真是胡说八道！厚颜无耻的谎言！（还是梦呓？）

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

蔡特林说：“我知道，从1929年起，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我们组织的中心与以皮达可夫为代表的托洛茨基分子和以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及索柯里尼科夫为代表的季诺维也夫分子建立了牢固的组织上和政治上的接触……1928年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当时皮达可夫正生病）召开的会议为这种接触开了头”（第14页）。这就是我读“纲领”的那次会面，而皮达可夫已经报告过这件事，这一情况我很快也就知道了。这就是“密切接触”的开始。——谎言之二。

在下一页（第15页）上说：“就在那一年即1932年的年底，布哈林告诉我说，我们的组织正处于重大事变的前夜，由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分子已经联合起来，预料各地将积极开展斗争，而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取得政权。”马上又谈到了恐怖活动。

让我们想一想。1932年夏末，“我们的组织”（“青年派”）全都被捕了，留京分子也都被捕了，乌格拉诺夫（好像是）已被流放，而“我们的组织”却“处于重大事变的前夜”。那么这究竟是一些什么人呢？要知道撒谎也应有个限度！我在这里再重复一次：我不知道斯列普科夫分子与留京分子是否有联系（我只了解党的决定，但不是我自己知道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发生在这些人被捕之前。而蔡特林说是“在1932年的11月或12月”！（第15页上数第12行。）——明显的谎言之三。

接着，在同一页即第 15 页上说：“在 1932 年底，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同加米涅夫和索柯里尼科夫以及拉狄克和皮达可夫进行了”会谈。

我们再回想一下不容置疑的事实。1932 年 10 月 9 日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开除出党，好像还从莫斯科流放到外地。可蔡特林却毫不犹豫地说是布哈林的住所和托姆斯基的别墅里见的。他说的不是 1929 年，而是 1932 年底，我再重复一遍，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已被开除出党。拉狄克供认，他为了进行反革命活动，只是在 1934 年才与我接上头（也是谎言，只不过是另一种谎言，正是拉狄克的这个谎言否定了蔡特林的谎言，反过来也一样）。——通篇的谎言之三。

接下来，第 16 页说，还是“在 1932 年底”，在阿斯特罗夫的住所召开了恐怖分子会议，我布哈林在会上亲自发表了反对斯大林的反革命演说。

这里同样是老调重弹。到 1932 年底所有“积极分子”都已经被捕。他们怎么能出现在阿斯特罗夫的住所里呢？——谎言之四。

关于留京纲领

这里同样是一派胡言乱语。我们来逐一分析。

第一，蔡特林断言说，他本人没有读过纲领，关于纲领及其内容都是听我布哈林说的。每一个了解我们之间关系的人都会认为这是用心险恶的假话。我写的东西都要经过“叶菲姆”的手。如果我有纲领的话，那就不可能绕开叶菲姆。可是我并没有纲领。

第二，关于日期。在我去中亚休假前没有任何关于留京纲领的传闻。我休假回来是 10 月 6 日（当时叶菲姆在莫斯科）。这时斯列普科夫分子和留京分子都已被捕。我与其他人究竟是什么时候“赞同了”还没有出笼的文件呢？如果文件已经获得“赞同”，蔡特林怎么会没有看到呢？

第三，蔡特林证实说，他没有问我^①，纲领为什么以留京纲领、小组纲领的形式提出（他的供词的第17页），据说我对此回答说，这是为了保密。我不想提出关于这个答复本身是否恰当的问题，我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凡是了解我们的关系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蔡特林会对情况一无所知而跑来问我。如果我真的知道并赞同纲领，那么在有关如何提出等问题上，第一个参谋就是叶菲姆。但是这一切根本不存在。

我在这里再重复一次我以前说过的话：我只在中央委员会里看过留京纲领，是斯大林给我看的。如果我反对党，我自己会写纲领，而不必采用留京纲领。我只是在反对派运动刚开始时见过留京，后来他就离开了，消失了，从此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再见过他，也不可能给他下达任何“指示”。

关于1928年纲领

皮达可夫住院时我确实去过他那里。加米涅夫也确实在场。但说在那里举行了“会议”，这是不真实的。我确实读了纲领。事实是皮达可夫将这件事报告了中央。事实是我（在政治局讨论问题时）从一些专门的词语中知道了这一情况。“纲领”的事到此结束。

侦查员同志问蔡特林（第18页）：“这一纲领复制了多少份？是否散发了？”答：“出于保密的原因，纲领没有复制。”

我丝毫不打算掩盖1928～1929年的罪过。但是我要说，根本没有散发过的纲领事实上等于零，而这是在1928年。

再谈恐怖活动、宫廷政变及其他无稽之谈，

库兹明、萨波日尼科夫等

说我们派别的几乎所有成员都搞恐怖活动，而且是1929年春天之前就搞了（第11页），这是恶意诽谤。关于以前的一些谈话，

^① 原文如此。从下文意思看，应该是问了。

我是从（1）被捕人的供词（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里说的是B.库兹明）和（2）阿斯特罗夫关于代表会议的供词和萨波日尼科夫的供词中得知的。斯大林同志给我看过这些供词（是在1933年3月或更晚一些，是在我被政治局召见时）。库兹明很少呆在莫斯科。有人告诉过我（年份记不清了，大概是1931年前后），说库兹明在某个场合宣称，他不会帮助我了（由于我在党内的行为）。萨波日尼科夫总是处于一种独特地位，无论是谁，只要愿意，都能嘲弄他，从来就是谁都不把他当回事。对此蔡特林了如指掌。不但如此，在持反对派立场时期，蔡特林劝我离萨波日尼科夫远一点，因为他对于右翼反对派来说是“不可靠的”。而蔡特林在供词中却把库兹明和萨波日尼科夫说成是中心人物。所有这一切除了欺骗和谎言还是欺骗和谎言。特别要指出的是，根本就没有过似乎是由斯列普科夫、萨波日尼科夫和蔡特林举行的谈论恐怖活动的会议。

关于“宫廷政变”能说什么呢？而且还有两套方案？（蔡特林指的是1930年。）究竟是谁策划了这次政变？哪些人被卷了进来？蔡特林的说法全都是肥皂泡。为什么失去了“希望”？谁进行过尝试？以什么方式尝试的？蔡特林本应对此非常清楚，不是吗？他却只字未提。我没有同任何人谈过任何有关恐怖活动的话，也没有同谈论这件事的叶菲姆谈过。

蔡特林很清楚，我从来就是连一般的派性斗争都害怕，经常设法制止这种斗争的发展。在刚当反对派时，我曾有过苦恼、怨恨（那时我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过）、强烈的对立情绪和对领导的敌意——这都是真的。我轻率地采取了犯罪的步骤——这也是真的。希望右倾的主张在自己的发展中能够引导反革命势力取得胜利——所有这一切都千真万确。但是，当现在有人（蔡特林也同样）企图把我说成是恐怖主义者、起义者等等的时候，我不能不竭尽全力提出抗议；当有人想把我描绘成两面派（在最近几年）时，我不能不竭

尽全力提出抗议；当有人把我与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一帮卑鄙家伙密切联系起来时，我不能不竭尽全力提出抗议。

诽谤总会起一点作用。如果把拉狄克、蔡特林和其他诽谤者的供词随便给什么人看看，如果这些人不知道先后顺序的细节等等，他们就会大吃一惊，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把这些材料给证人、其他受侦查的人、受审讯的人看看，他们也将不可避免地走这同一条道路。所有这一切我都清楚。但是我因此更要反击这股逆流。许多人无非是恨我；我早就离开了他们，并且指责他们。因此，现在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报复了……

* * *

2月16日晚6时30分我收到20份各种供词（遗憾的是没有收到A.斯列普科夫、艾亨瓦尔德、П.马列茨基和上面提到的谢苗诺夫等人的大概很重要的供词）。显然我连对这堆材料进行粗略分析所必需的时间都没有，不能提供详尽的答复，但这不是我的过错。然而嫌疑犯或被告有权研究与他有关的所有材料，这是任何一个诉讼程序（无论是官方的国家的，还是党内的政治的）中最起码的准则。

关于大量的诽谤。右倾分子散播的大量统一了口径的诽谤是由以下情况造成的：几乎所有的诽谤者（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坐过牢或正在坐牢、或遭受过其他迫害；我早就与他们（“青年派”）断绝关系并公开宣布他们的活动是反革命活动；他们都读过报纸，看到两次审判和两次枪决；他们知道我被指控犯有最骇人听闻的罪行；对他们采取的方法是：“我们已经知道”，“某某人已经招供”，“侦讯要求彻底坦白”等等。

事情就是这样，例如，对列维娜的审讯：“侦讯人员掌握的材料说明：您知道留京纲领是经右倾中心认可而制定出来的”……审

联共（布）中央 2-3 月全会与布哈林问题

讯记录第 22 页。“我们有材料说明：这些活动（指恐怖活动。——布哈林注）您不仅知道，而且还亲自参加了。”——12 月 24~27 日对扎伊采夫的审讯记录。“侦查材料足以证明，长期以来您一直在反对联共（布）和苏维埃政权。估计人员更迭”……等等。——

关于若干历史时期，尤其是关于两面派行为。我必须对供词中的谎言再作一个总的说明。

我认为右倾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28~1930年（7~9年以前！）。这是右倾产生并与党斗争的时期。但是，这一斗争从“三人帮”方面来说，不是一场就地区等问题辩论的斗争：“三人帮”的所有文件都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全会或政治局）。中央委员和其他人的会议绝不像现在供词中所描述的那样都是非法的、秘密的会议。多数会议是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那里始终有充分的监督，而且大家都知道谁与你经常来往（我和李可夫还有肃反委员会派的警卫）。我并不想因此而把这些会议的派性说得轻描淡写，但我是在给这些右翼反对派产生时期的会议确切定性。常常有一些具有右倾倾向的青年人来我这里，我也常到他们那里去。而后就出现一个（不具有任何组织形式的）“三人帮”（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这个“三人帮”以“布哈林同志集团”（即一批政治局委员）出现。谁也没有加以掩饰。而现在侦查员们对当时的情况提出诸如谁加入了反革命组织的右倾中心一类的问题，这不是对历史的嘲弄吗？这种想法是用一个模式去套。右倾分子中有相当多的人滑向了反革命，这是事实。但这是另一回事。

“三人帮”的斗争一直进行到1930年。组织力量，右倾分子在外省活动等等。“三人帮”没有料到（绝不像某些供词中所说是商量好了的），科托夫、米哈伊洛夫、库利科夫加上乌格拉诺夫在1929年底递交了声明，后两个人措词激烈地反对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1930年，三人帮投降了。

第二个时期：从1930年到1932年（包括1932年）。这个时期是彻底克服过去的观点和错误的时期，是反党斗争逐步结束的时期，等等。在这个时期，有一些因素具有众所周知的两重性。如果

不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是从实质上看问题的话，就不难理解，内心的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缴械（投降）只能是这一过程的开始，因为缴械标志着转折，而在此之后事情才能逐步做完。例如，这一时期我曾在李可夫、托姆斯基准备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时帮助过他们，等等。从政治理论方面看，关于农业的刺激因素的问题（在苏维埃商业法颁布前）我还是不清楚。我对青年中的宗派主义假装没看见，对有关应对骨干加以管束的议论也假装没听见，我只是对这些“骨干”嘲笑了几句。我想，如果我在这方面持坚决立场，那么大家就会疏远我，这样他们必然就会相信并逐步完全接受党的立场。自从各种会议和决议开始把我称为反革命分子之后，有一次斯列普科夫拒绝承认我是这样的人，并在这个问题上挑起一场争论，在萨马拉的一所大学里获得多数人的支持。后来还为此开展了一个运动。我不认为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但我要求人们停止争论，不再进行斗争，接受对我随便怎样的称呼。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有一个个人想法：我完全不希望人们为了我、由于我而受苦。我不隐瞒，这些青年为我辩护的同时也使我对他们更有好感，而这一切妨碍了消除宗派主义的残余。苏维埃商业法对我本人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到这时我才绝对地明白了。我记得就在这时候我与斯列普科夫谈过一次话，我说党的领导人证明了他们的随机应变能力很强（是从实践的辩证法的积极意义上讲的），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了形势，在现有的前提条件下，颁布了振兴苏维埃商业的可靠原则，我们应毫无保留地与党一起拼命工作等等。而斯列普科夫也像早就执行了这一路线的罗济特一样同意了我的看法（正如他对我说的那样，我想他说的是真话）。

在已经没有任何模糊认识的情况下，我去休假了。可是当我回来的时候却发现，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及其一伙都已被捕，揭露了留京纲领等。显然“青年派”欺骗了我，他们同我分道扬镳并且

开始走自己的路了。

第三个时期，从1932年至今。过去的一些联系，甚至一些私人联系都断绝了：我从政治上公开谴责“青年派”，他们也远离了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坐牢，另一些人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工作，他们与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的联系也越来越少，1934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1935年一次也没联系过，1936年也是如此。这是一个真诚、尽力地为党工作，对党的领导的尊敬和爱戴迅速加深的时期，而不像第一个时期那样对党充满怨恨。这就是真实的情况。所有关于恐怖活动、关于与托洛茨基分子结盟以及所谓的右倾中心下达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的指令的卑鄙供词，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被吓坏了的人的最无耻的诽谤，他们在撇开我和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干了一些反革命勾当，这也许与乌格拉诺夫和别的什么人有关，而乌格拉诺夫显然是“为了有权威”才用我的名义进行活动（我已说过，我同他从1932年夏天起就没有见过面）。

在这一时期，我对党和党的领导和态度已经没有丝毫两重性。对于过去，我也不能说我真的耍过两面派手法，因为两面派手法实质上是一种掩饰更激烈的或原封不动的反党立场的伪装，而我在朝着清除模糊认识和旧立场的残余的方向发展，而且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早已不存在过去的负担的痕迹。

既然右倾反革命诽谤者的卑鄙谎言已经暴露了，现在我将尽力——时间极其仓促——回答一些主要的问题。

关于留京纲领

留京纲领问题属于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根据这一问题，根据对谁是纲领的作者的问题所作的回答等等，就能够判断一些人的政治倾向。

诽谤我的专家之一、特别乐于进行耸人听闻的“揭露”的B.阿斯特罗夫谈到纲领的作者时说（记录第19页）：“留京纲领实质

上不是留京的文件，而是右倾中心的文件……尤其是斯列普科夫说，留京纲领如同我们的决定（指所谓的‘代表会议’的决定。——布哈林注），包含着要求在反对联共（布）领导的斗争中采用一切手段，直至进行恐怖活动。（顺便说一句，在1933年给我看过的关于代表会议的材料中，没有任何类似的内容，却有阿斯特罗夫本人关于在一次晚会上说的一些醉话的供词。——布哈林注）斯列普科夫接着说，留京纲领的主要作者是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并且约定，一旦败露，就把这个纲领说成只是留京的纲领，以便不使右倾分子上层领导受到打击。”——说法之一。

现在我们来看乌格拉诺夫的说法（9月23日审讯记录第5页）：“问：所谓的留京纲领是什么时候出笼的？答：1932年夏天。问：谁是这个纲领的直接作者？答：纲领的直接作者是留京、加尔金、卡尤罗夫。”——说法之二。

蔡特林（寄自中央委员会的记录，1936年12月22日的审讯，第17页）说：“这个由留京起草的文件是经布哈林和我们组织的中心的其他成员同意后出笼的”。——说法之三。

库利科夫说：“我们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即所谓的留京纲领不仅是由右倾分子制定的——就如我们想说的那样。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极左分子根据与我们协商的结果参与了这个文件的制定”。他接着说：“这个所谓的留京纲领我没有看过”。（然后库利科夫“按照乌格拉诺夫的口气”详细叙述了纲领的内容。）——说法之四。

最后，我们来看看扎伊采夫的供词（12月24—27日记录第11页）：“我向乌格拉诺夫问起留京纲领，他证实了斯列普科夫对我说过的话：纲领出自右倾分子之手，‘我们的人’——乌格拉诺夫说——参与了纲领的制定，尤其是斯列普科夫为这件事找过他两次。”

而在此之前，他援引了斯列普科夫的话：“斯列普科夫证实了存在这一纲领，并说纲领的直接作者是留京、他斯列普科夫和马列茨基，但是‘领袖们’也知道这一纲领，特别是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读过这一纲领并表示赞同。有关纲领的内容，斯列普科夫说，内容与代表会议的结论相符合”（记录第10页）。——说法之五。^①

总之，乌格拉诺夫声称作者是留京、加尔金、卡尤罗夫。库利科夫则根据同一个乌格拉诺夫的说法，断言纲领是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极左分子和右倾分子集体创作的成果。扎伊采夫同样按照这个乌格拉诺夫的口述，说纲领的作者是“我们的人”，其中包括斯列普科夫和马列茨基。蔡特林说只是留京一个人干的，但又说纲领得到布哈林等人的赞同。B.阿斯特罗夫则根据斯列普科夫的口述，说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是主要作者。最后是T.列维娜（是和斯列普科夫很接近的人，与他同在萨马拉工作）说，不论是和“右倾中心”的关系也好，还是斯列普科夫是否属于作者之列也好，她都一概不清楚（记录第22页）。库利科夫详细地追述了纲领的内容，却声称他并没有读过纲领。蔡特林断言说，纲领得到了我的赞同，而他蔡特林却没有看到过（尽管他是我的左右手）。

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非常直率的阿斯特罗夫表现得特别卖力，宣称我和其他人是主要作者。而另一方面库利科夫也非常热心，宣称这个纲领是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极左分子、右倾分子的整个大联盟的纲领，是他们集体创作的成果。

阿法纳西耶夫（1936年12月23日审讯记录）关于留京纲领

^① 在我1937年2月19日收到的审讯雅·斯腾的记录中又有新的说法：其中把纲领的作者说成是我不认识的以罗赫金为首的红色教授学院的右倾教授们，而且他们得到了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鼓励。

是这样供认的：“1932年8月，加尔金带着这个纲领找乌格拉诺夫商量。我当时在乌格拉诺夫家里，我清楚地记得，加尔金走时将纲领藏在裤腰里。”

因此，加尔金第一次带纲领找乌格拉诺夫磋商是在8月（乌格拉诺夫也证实这一点，记录第6页）。我布哈林这时不在莫斯科。接着乌格拉诺夫说：“1932年9月托姆斯基、李可夫、B. B. 施米特^①和我乌格拉诺夫在博尔舍沃的托姆斯基家中聚会，我向在场的人通报说纲领已经制定出来，并叙述了纲领的内容。”（记录第6页。）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1）出席这次会议的没有我（当时我在亚洲）；

（2）即使召开过这次会议，会上也谈到过纲领，那么出席会议的人（乌格拉诺夫除外）中没有一个人是纲领的主要作者和次要作者。否则为什么乌格拉诺夫要通报纲领已制定出来并叙述了纲领的内容呢？！难道能向作者叙述他们本人写的文章的内容吗？难道能向纲领的作者叙述他们写的纲领的内容吗？

我是10月初回来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0月6日，休了两个月的假并且由于在山上耽搁而回来晚了）。这时在莫斯科已经逮捕了留京分子和斯列普科夫一伙人。中央全会也谈到了这一问题。我怎么能看到过这个纲领呢？在谁那里看到的？到已被捕的熟人那里去找吗？还是采取别的什么办法？

上述列举的内容十分清楚地证明：

（1）原三人帮中没有一个人能是留京一伙的纲领的直接的或者

^① 施米特，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1886~1940），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一战期间曾任彼得堡委员会书记，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劳动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曾参加右翼反对派。

间接的作者或合作者；

(2) 我从未见过这一纲领（后来斯大林同志在中央委员会里给我看过这一纲领，我只是在斯大林那里见到过这一纲领）。

由此可见，阿斯特罗夫和扎伊采夫的供词下流到了极点，他们竟想把我说成是这一纲领的主要作者之一或审订者。他们同索柯里尼科夫一伙以及拉狄克一样，竭尽撒谎之能事，虽然卑鄙之极，却要给人以襟怀坦白的印象。

叶·蔡特林的行径也同样无耻，他谈论留京纲领时引用所谓我说的话：他这个时候一直在莫斯科，只要我与这件事情多少有点关系，他都能详尽无遗地了解一切。

但是上面提到的乌格拉诺夫的供词使人们彻底失去了对他以下推论的信任：即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听到（乌格拉诺夫的叙述后!!）马上就赞同这一纲领，并且特别赞成进行恐怖活动。这真是讨论和通过纲领的最合适方法！

这样，我除了在总体上坚决否定当时存在过任何形式的右倾中心、存在过进行恐怖活动的方针以及对留京纲领持赞同态度外，而且依据具体事实和诽谤者本人的供词揭穿了他们的无耻诽谤。

我后来恰好是听蔡特林说，托姆斯基之所以关心这个纲领是由于他担心有人会挑拨离间，把这一纲领硬加给原三人帮。我在临行前去找过乌格拉诺夫（上面已说过），也提醒过他，因为我内心非常担心有人会挑拨离间。我知道有个万卡·科罗特科夫在围着他转，这个人有一次在我那里说了一些令人生疑的话，我赶走了他，但没有告发他，因为我知道他担任特殊职务：我差点忘了是我和捷尔任斯基介绍他入了党，并安排他从事特殊工作的。有传闻说他积极参与起草乌格拉诺夫—库利科夫的声明（从另一方面说，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自己的作用，以为自己能够推动反党斗争）。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向阿法纳西耶夫下达了进行针对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恐怖

活动的指令。而阿法纳西耶夫则认为，库利科夫和科托夫身边有叛徒（记录第7页）。

斯列普科夫分子的代表会议

在诽谤者的供词涉及的许多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关于1932年夏天斯列普科夫分子的代表会议问题，臭名昭著的留京纲领大约就是在那时出笼的。

扎伊采夫关于这次九月代表会议是这样供认的（1936年9月24—27日记录第9页）：“我现在完全清楚了，这次代表会议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复辟分子、恐怖分子的聚会。我要坦率地讲，我当时完全同意代表会议的这些结论。问：布哈林在这次布哈林分子的代表会议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答：斯列普科夫对我说，布哈林领导了这次会议。不过在此之前彼得罗夫斯基曾告诉我说，布哈林同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人见了面，他见到他们时感到非常高兴。问：布哈林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发言了吗？答：对此我不十分清楚。”

总之，扎伊采夫断言：（1）我当时就在代表会议附近，（2）我领导了代表会议，（3）我直接会见过会议的参加者，（4）我见到他们时感到非常高兴，（5）只是不清楚我本人是否发了言，（6）关于我的领导作用是斯列普科夫对他扎伊采夫说的，（7）关于我会见会议的参加者一事是H.彼得罗夫斯基告诉他扎伊采夫的。

我们看到，坦率的扎伊采夫说得非常明确：布哈林领导了“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复辟分子、恐怖分子的聚会”。就是说，结论是：布哈林是领导者。因此扎伊采夫仿效某些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做法，在一次审讯记录的末尾诅咒同我的见面，并要求把他扎伊采夫作为恶棍消灭掉。

但是“坦率的”“恶棍”的不幸在于，代表会议期间我不是在天山的冰川上就是在伏龙芝，无论如何不会在莫斯科。因此我既不能领导代表会议，也没有会见过与会者，更没有为他们感到高兴。

扎伊采夫卑鄙地、偷偷摸摸地、甚至明火执仗地造我的谣；我不知道他是否还造了斯列普科夫和彼得罗夫斯基的谣；或是所有的人都在造谣，——但这改变不了事实。我现在没有直接兴趣去弄清作伪证者们的内部事务，对我来说，揭破这个攻击我的最重要的供词就足够了。对照一下永远经得起绝对准确的检验的确凿事实（我10月6日左右才回来），很明显这个供词是无耻的诽谤。

在这一切之后，任何一个认真负责的人都会说，对这种人绝对不可以信赖。只要让他们供认恐怖活动，他们便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欣喜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热心来撒谎。既然他们在谈到留京的恐怖主义纲领时能这样肆无忌惮、厚颜无耻地撒谎，把这个纲领硬加于我（阿斯特罗夫）；既然他们在谈到斯列普科夫分子的代表会议时能这样撒谎，硬说我领导了会议，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在谈其他问题时、在谈恐怖活动破坏活动等等时撒谎呢？何况在这些问题上来自托洛茨基阵营的那些阅历更丰富、本事更高强的撒谎家已经造了我许多谣了。这一点所有负有对我的案件做出决断使命的人首先要记住。

关于“中心”

上面我们看到，在右翼反对派进行反党斗争时期有一个起领导作用的“三人帮”（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它在投降后（1930年）自行解散。在一段时间内还保持着个人和政治上的联系，后来这种联系也逐渐减少以至完全断绝。事实就是这样，而不是充斥于伪证人供词中的挑拨性谎言。

但我必须指出，这些供词中的无耻谎言一定会被戳穿，这将是其编造者们始料不及的。

一些供词谈到了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另一些供词又加上一个乌格拉诺夫。接着就有了以下一些说法：科泽列夫（1936年12月25日的审讯记录第2页）。“问：您知道右倾组织的全苏中

心的组成吗？答：是的，我知道。问：请说出名字。答：参加右倾组织全苏中心的有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B.施米特、乌格拉诺夫、瑟尔佐夫^①。”科托夫（1937年2月5日的记录）声称：“1930年我听乌格拉诺夫说，斯米尔诺夫参加了组织的全苏中心并且领导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右倾分子小组”（第1页）。由此可见，原来斯米尔诺夫也加入了“全苏中心”。科托夫在更早的供词（1936年12月9日）中说，“乌格拉诺夫对我说，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施米特、乌加罗夫^②和他乌格拉诺夫参加了组织的中心”（记录第3页）。乌格拉诺夫本人供认：“领导至今（黑体是我用的。——布哈林注）存在的右倾组织的是全苏中心。参加中心的有：尼·伊·布哈林、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瓦·弗·施米特和我——乌格拉诺夫”。

最后，“坦率的”扎伊采夫还有一个关于“超级中心”的有趣供词，而且还是听我说的（!!）：“由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秋天垮了台，我向布哈林打听夏天（或者秋天）的时候与季诺维也夫分子结成的联盟的命运问题。布哈林回答说，联盟仍旧存在，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他们都在流放地）已建立了联系，从1932年秋天起通过伊·尼·斯米尔诺夫与托洛茨基也缔结了联盟，依据的‘大致’是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盟的那些原则。已经存在一个统一的恐怖活动中心，它负责协调各个中心（右倾中心、季诺维也夫分子中心、托洛茨基分子和极左分子中心）的活动”（12月24~27日记录第14页）。

大家都知道，1928~1930年初的右翼反对派是由布哈林、李

^① 瑟尔佐夫，谢尔盖·伊力诺维奇（1893~1937），1913年入党，曾任顿河区委委员、奥德萨省委书记，1921年开始在党的中央机关工作，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

^② 乌加罗夫，Ф.Я.（1886~1940），十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可夫和托姆斯基所领导的，关于这一点所有的报纸都作了报道，这是事实，无可争辩。

但是伪证人就是伪证人。科泽列夫“拉进了”瑟尔佐夫。但他把瑟尔佐夫拉进来是有目的的，那就是证明联盟的存在。他也像乌格拉诺夫一样提到了瓦·施米特，尽管后者从不介入。科托夫扯上了斯米尔诺夫（亚·彼·）和乌加罗夫等人。如此众多的说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对“中心”成员的确定取决于这些说法的炮制者们对“有益目的”的看法，而他们也是以相应的方式行事的。但是由于他们互相矛盾，也就是说他们几乎全都是在撒谎（他们甚至不愿说他们可能有说错的地方、他们说的只是大致的内容等等。不，他们全都坚决而又肯定地点出了姓名，但他们是相互矛盾的）。

应当指出，他们关于“三人帮”（照他们的说法，不是三人帮，而是更广泛的组织）存在的时间是卑鄙的谎言。

乌格拉诺夫（见上面）特意强调说“中心”至今存在。

我声明，从1932年起，在将近5年的时间里，乌格拉诺夫从来没有见到过我。他怎么能断定我加入了什么中心——而且还是和他一起加入的——“直至最近”呢？这是肆无忌惮的诽谤，无耻地迎合已经提出的指控。

1937年2月19日才寄给我的审讯卡申的记录说：“1934—1936年我与托姆斯基谈过好几次话，我从中得知，托姆斯基、瑟尔佐夫和乌格拉诺夫主持领导着右倾分子的整个恐怖主义地下组织”（第4页）。这是一种全新的解释，它把一切都纳入了全然不同的另一个轨道。但这种解释与其他所有的供词相矛盾，特别是这种解释完全推翻了科托夫关于阿·伊·李可夫同志“主持”恐怖活动的说法。我多次遭人诽谤，没有根据相信卡申说的正确性和他对托姆斯基的指控，但是我确认，这个说法与科托夫提出的对李可夫的主要指控是相互矛盾的。

但是最令人愤慨的是扎伊采夫的超级中心，而且还是恐怖主义的超级中心，这一点除扎伊采夫外，任何人都没有提过。在这里诽谤者们的供词手法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对扎伊采夫的审问是1936年12月24-27日进行的。当时托洛茨基派的诽谤者们正全力以赴把原右倾分子拉过去：案件的第一个诉讼程序正是从这一诽谤开始的。这种诽谤引起了相应的需求。扎伊采夫在这种情况下竭尽全力地编造并供认了一个“恐怖主义联合中心”。

可惜这时情况又有所变化。拉狄克撒谎时变了个说法。拉狄克强调说只是有接触，说我布哈林对他说过“分进合击”等等。所有这一切也是卑鄙的谎言，因为我根本没同这条毒蛇讲过类似的话。但是这个谎言与扎伊采夫的谎言是互相矛盾的。如我上面讲的并已证明了的，索柯里尼科夫在法庭上撤回了他同我对质时的供词，并开始向拉狄克看齐。而扎伊采夫的供词则迎合了另一种情况，另一种需求，因此他的供词现在成了大家看到的、明显的、毫不掩饰的、极其恶劣的谎言。

在有关代表会议的问题上，扎伊采夫把我从数千公里之外搬到了莫斯科，撒了个大家都能识破的谎，同样，在这个问题上扎伊采夫的谎言的罪恶和无耻也有了充分的暴露。

诽谤者们在给想出来的中心成员确定分工方面也没有能统一口径：如拉狄克断言我负责恐怖活动，而李可夫负责破坏活动。科托夫则认定整个恐怖活动由李可夫集中负责（1936年11月30日审讯库利科夫的记录）。这好像是一件小事。而实际上决不是一件小事：一方面是我的“精神上的朋友”，另一方面又是乌格拉诺夫的左右手。他们关于“中心”内部的“分工”怎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说法呢？这是因为他们尽管都按照共同的口径作了关于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的血腥齷齪的诽谤，却没有能对有关“细节”统一口径。真想啐这帮没良心的坏蛋一口。

关于恐怖活动的诽谤

我不准备谈论向我提出的令人愤慨的指控这件事本身所引起的怒火和愤恨。在这里我尽量举一些矛盾的例子来揭露诽谤和欺骗是如何炮制出来的。

下面是扎伊采夫的供词（1936年12月24～27日记录第2和第3页）。扎伊采夫供认说，乌格拉诺夫讲述了他与托洛茨基分子伊·尼·斯米尔诺夫见面的情形后“告诉我们，1931年底，根据他乌格拉诺夫的报告，右倾中心还通过了关于进行恐怖活动作为反对斯大林领导集团的斗争手段的决定”。

而库利科夫关于1932年春天和我见面情况的供词是这样的（前面已根据对质情况谈到过这次会见）：“我断然向布哈林说，组织的参加者们向我、乌格拉诺夫和科托夫——即莫斯科中心的成员——施加压力，要求对联共（布）领导人采取坚决行动。我对布哈林说，你们联盟中心不考虑这样的决定，不知为什么拖延。”然后库利科夫针对我提出的有关骨干的问题向我提到了马特维耶夫、科托夫、涅夫斯基等人的姓名。作为对他的答复，我似乎下达了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的指令（见记录第2页）。库利科夫最后说：“于是布哈林亲自向我重申了此前我已通过乌格拉诺夫得知的联盟中心的指令，这就是在与联共（布）领导人的斗争中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手段，必须杀害斯大林”（同上）。在库利科夫的这一段供词中有几点可以揭穿这些供词是在无耻撒谎，纯属诽谤。

库利科夫对质时说，我向他下达了杀害拉·卡冈诺维奇同志的指令。而且他库利科夫还唠唠叨叨地说，卡冈诺维奇同志原来是个鞋匠，他特别了解卡冈诺维奇同志，右倾分子特别痛恨卡冈诺维奇同志等等。而在这里，在审讯时，E. 库利科夫则断言说我向他下达了杀害斯大林的指令。这里指的是同一次谈话，同一个指令。这怎么可能呢？也许是库利科夫“忘了”？但是，首先，这种事是忘

不了的。其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库利科夫的审讯是在 12 月 6 日，而对质是在 12 月 7 日，就是说总共不过隔了一天。那么，库利科夫在这一天之内就丧失记忆了吗？而库利科夫言之凿凿，十分自信！他甚至由于我不承认他的诽谤而火冒三丈。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两种说法都是胡编的。库利科夫在某一天编造了一个血腥的诽谤，在另一天又编造了另一个血腥的诽谤。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撒谎，就是撒谎！这简直令人发指。这也暴露了诽谤的极端可耻。应该对此加以惩罚，因为其实质是对国家的直接危险。

然而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库利科夫抱怨对他、科托夫和乌格拉诺夫施加了压力，而“全联盟中心”（这个令人发笑的名称是根据类比法杜撰出来的，而事实上即使在“三人帮”真正存在的时期，也从未在任何一次谈话中有过这样说法）却按兵不动并保持沉默。可是照乌格拉诺夫本人的说法，他就是全联盟中心的成员呀！根据扎伊采夫的供词，早在 1931 年，乌格拉诺夫本人不是就通过“全联盟中心”执行了关于恐怖活动的指令吗？乌格拉诺夫怎么能抱怨“全联盟中心不考虑情绪呢”？！这里很明显是混乱不堪的胡说八道。

我在上面关于右倾分子——诽谤者的整个部分的开头已经谈了库利科夫说的其他方面。在这里还要补充一些新的荒谬的说法。谎言终将被证明是谎言。

现在来谈谈时间的先后顺序。我们看到，扎伊采夫根据乌格拉诺夫的口述断言说，他和乌格拉诺夫在 1931 年底通过“全联盟中心”执行了关于恐怖活动的指令。库利科夫则断言说，他是在 1932 年春天从我那里证实了关于“中心”的恐怖主义立场的。雅柯夫列夫（1936 年 11 月 16 日审讯记录）说，“1932 年，我们右倾组织走上了策划并实施恐怖活动的道路……”（第 3 页）。科托夫（1936 年 12 月 19 日审讯记录第 4~5 页）供认，乌格拉诺夫收到

了“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为代表的组织的中心”关于“在1932年底”进行恐怖活动的指令；“组织中心为此做出了专门的决定”（第5页）。大概足够了。

按照乌格拉诺夫的说法，他在与И.И. 斯米尔诺夫的会商后亲自执行了指令。按照科托夫的说法，这个指令是下达给他的。按照乌格拉诺夫的说法，这是在1931年。按照科托夫的说法，这是在1932年。按照科托夫和雅柯夫列夫的说法，这是在1932年底。而库利科夫是在1932年春天就已得到了对似乎是已有决定的确认。如此等等。既然供词中矛盾百出，那就说明这些供词本身不堪一击，难道对此可以视而不见吗？我不知道谁作的决定，可能是乌格拉诺夫一伙作的决定，但是这与我绝对毫无关系，而且我觉得已经相当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对我的指控都是在撒谎。在我2月19日收到的审讯И. 马特维耶夫的记录中有这样一段叙述：“1932年秋天……乌格拉诺夫通报了关于组织状况的重要信息。他说右倾分子开始彻底崩溃，在目前情况下，反党斗争的老方法已经不适用，必须采取更积极的斗争方法……我记得库利科夫（!!）和别的什么人问过乌格拉诺夫，这是他本人的观点还是‘三人帮’（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的观点，乌格拉诺夫回答，‘该谁知道，谁就会知道’，这一字不差是乌格拉诺夫的原话。”这里最引人注意的是，库利科夫在秋天向乌格拉诺夫询问关于恐怖活动的指令和我的意见，而库利科夫则供认他在春天就知道了这些所谓的指令，包括从我这里得知的。这样，秋天在乌格拉诺夫处召开的会议揭穿了库利科夫春天的谎言。

作伪证者把我描绘成简直就是一个恐怖主义指令的发送者。按照诽谤者的说法，我到处发出这些指令，又批发又零售。叶·蔡特林把这个想法归到1930年，他声称“厄·伊·布哈林是宫廷政变思想的创始人”（寄自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记录第12页）。

扎伊采夫 1937 年 1 月 11~19 日说，彼得罗夫斯基（1929 年 10 月或 11 月）“从莫斯科回来后，把‘宫廷政变’的方针直接与李可夫的名字联系起来，称李可夫是这一方针的创始人和‘宫廷政变’的主要（拟议中的）执行人”。用蔡特林的话说，这一宫廷政变必然导致……斯列普科夫分子掌权!!! 就是这么写的：“托姆斯基将担任中央书记，中央机关中的其他领导职务由斯列普科夫和他那一派的成员担任”（记录第 13 页）!

竟然把这一套荒诞不经、矛盾百出的胡说加上从别人的谈话中拿来的各种添枝加叶的细节煞有介事地说给正经人听！开进部队，从克里姆林宫内部夺权，动员 200 名“右倾分子”冲进去——在每个诽谤者的供词中充斥着类似的胡说八道。此外，还有一些引人注意的东西，诸如库兹明在不同场合几次发出歇斯底里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嚎叫（按照阿斯特罗夫的说法，记录第 13 页，这事发生在 1931 年，在马列茨基的住所，甚至还有我在场；按照罗济特和萨波日尼科夫的说法，是 1929 年在罗济特的住所，我不在场；按照同一个阿斯特罗夫的另一说法，是 1930 年在斯列普科夫的别墅里），同时却有意强调说库兹明是最接近布哈林的人之一。卑鄙小人们需要这个诽谤性的小细节是为了使他们的谎言更具有可信性。我已经指出，不论是库兹明（他拒绝帮助我并住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还是萨波日尼科夫（他是大家嘲弄的对象，从来就没有谁把他当回事），他们与我根本就不亲近，即便在我与青年派关系最密切的时期。

萨波日尼科夫的供词谈到，他当着某个特列帕洛夫的面谈了恐怖活动问题，并在到了我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处后向我报告了此事。这些供词是凭空捏造，我没有听他说过类似的事，对此娜捷日达·米哈伊洛夫娜可以证明，萨波日尼科夫经常提到有娜捷日达在场。与萨波日尼科夫的说法相反，我至今对特列帕洛夫本人没有一点印

象，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也没有听说过他在右倾反对派中的作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萨波日尼科夫置自己原来的供词于不顾，在这里已经干脆作伪证，说我也给他下达了恐怖主义指令……

在关于恐怖活动和“宫廷政变”的诽谤中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根本就没有技术上的细节：不知道用什么方式、通过什么手段等等去行动；如果准备宫廷政变，那么还不知道哪些部队、哪些人参加，同谁联系；谁准备出面讲话；事情为什么败露了；有哪些力量；武器在哪里；谁来指挥等等。这说明了供词在文字上的诽谤性质。

按照扎伊采夫的说法，彼得罗夫斯基把宫廷政变的事归到1929年，并把政变与李可夫的名字联系起来。

而李可夫原来的秘书拉金（记录第11页）则断言说，恰恰在这时（“从1929年秋天开始”）为了积蓄力量而开始耍两面手法（第12页），我说“要习惯于这种状况”，而李可夫说“时间本身对我们有利”（第11页）。这怎么能结合起来呢？斯列普科夫小组的所有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全都成了恐怖分子。所有的人在许多年里都在从事恐怖活动。但是奇怪的是，在他们那里却找不到一支手枪，找不出任何一件武器，看不出在进行任何技术准备工作。然而一直在说，右倾中心的指令、布哈林的指令等等。

令人愤怒的、拙劣的胡说！！我现在没有时间逐一批驳每一个具体的谎言（如果我收到材料比较及时的话，我会这样做的），只能对这令人愤怒的无耻谎言表示原则的抗议：在我一生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从未给任何人下达过也不可能下达任何进行恐怖活动的指令。与之相反的一切证言都是诽谤者及其帮凶和靠山们的卑劣谎言。在“三人帮”事实上存在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从未有过任何恐怖主义方针。

即便是从瓦·斯列普科夫的供词中，也可以看出这种流言达到

了何等愚蠢的地步。例如他说（见记录第17页），某个梅德维捷夫生平第一次见到我就立即得到了我下达的针对斯大林的恐怖主义指令。

从我开始，哪怕有一个人能够安然无恙，都将令人惊奇！！这是一种幼稚的、没有经验的，但又是愚蠢的、罪恶的谎言。不，他们还不是拉狄克们，还不是撒谎大师，而充其量不过是学徒！

例如，还有另一个事实：科托夫说，1931~1932年间蔡特林痛恨斯大林，甚至他蔡特林准备“根据布哈林的直接指令（原文如此！）杀害斯大林”（1937年2月5日记录）。

在蔡特林做出如此卑鄙行径之后，我已对他不会发出任何感慨。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全都是胡诌：蔡特林成了最了解斯大林的作用的人之一。但这只是口头上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对此蔡特林本人什么也没有供认；第二，他为什么还需要与我脱钩呢（他早在第一次被捕前就一直想离开我，而第一次被捕后便闹翻走了，从此彻底与我断绝往来）？这一切都为了什么（如果他确实在从事科托夫硬加给他的活动）？难道蔡特林自愿离开这一事实本身还不说明问题吗？原右倾分子中惟一一个留在我身边、而且可能成为（如果根据对反革命中心及其工作等等的推测）联系人的，不是走了并去了乌拉尔吗？是否是为了到那里去执行我下达的（用科托夫的话说）针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的指令呢？真是十足的胡说八道！

这样的问题可以提出许多。

由于时间不够，我不能停留在关于破坏活动的卑下和可耻的诽谤上，以及拼凑起来的有关我的某些所谓事实上。无论如何，我对破坏活动的态度与任何一个中央委员的态度是一样的。

人物与年代

请看蔡特林开列的“学派”成员名单：

- A. 斯列普科夫 (1932 年被捕);
 - П. 马列茨基 (1932 年被捕);
 - 阿斯特罗夫 (1932 年被捕, 后被释放, 然后又被捕);
 - 扎伊采夫 (1932 年或 1933 年被捕);
 - 萨波日尼科夫 (1932 年或 1933 年被捕);
 - 克拉瓦利——担任负责职务;
 - 罗济特——奇尔奇克工程 (塔什干) 负责人 (现被捕);
 - 亚历山德罗夫 (1932 年或 1933 年被捕);
 - 艾亨瓦尔德 (1932 年被捕);
 - 古谢夫——担任负责职务, 早就退出;
 - 卡尔马利托夫 (1932 年被捕);
 - 戈尔登贝格——(一个建设项目的负责人) (现在被捕?);
 - 博里林——担任负责职务 (早就退出);
 - 门德尔松——担任负责职务 (早就退出);
 - 别连科和希巴诺夫 (在列宁格勒, 不详)。
- 补充:
- 斯捷茨基——担任负责职务;
- B. 梅日劳克——担任负责职务, 早就退出。
- K. 罗森塔尔——担任负责职务, 早就退出。

总之, 应该认为在 1932 年底原“学派”的绝大多数人几乎全部被捕。秋天, 我还在时, 他们在未向我作任何报告、未同我进行任何联系的情况下, 违背了斯列普科夫的诺言, 采取了反党方针——走上了反革命道路, 这里大概受到乌格拉诺夫的影响, 可能也有涅夫斯基一伙甚至留京的影响 (我是根据对供词批判分析后做出的结论)。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即使对我不信任 (甚至是绝对不信任), 也不能否认, 从 1932 年底至 1933 年初, 我身边并没有“能用的

人”，就算我坚持反党观点的话。但后面这个假设不是真的。我本人按照党性和捍卫党的路线的原则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消息报》全心全意地（而且是愉快地，尽管有许多令人扫兴的不快和圈套）工作。我尽量不与任何自己原来的志同道合者见面。我用经过考验的、出色的年轻党员良德列斯同志接替蔡特林，他从未与任何倾向有过联系，有军事工作经验并与肃反委员会有关系。我尽量不与原右倾分子接触。

关于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我已写过。从 1932 年夏天起我就没看到过乌格拉诺夫，从 1932 年春天起没见过库利科夫，如此等等。因此那些想要损害我的名誉、置我于死地的人须要制造一些能被作为我与右倾分子（而且现在看来还是恐怖分子）最近联系的所谓事实。格罗利曼、罗济特和科托夫的供词就是这样做的。

对这些令人愤怒的供词中的每一份我都将详细谈谈，因为这些供词的卑劣程度都达到了极点。格罗利曼。先来看事实。1935 年我与妻子在阿尔泰。由于她必须提交关于库兹巴斯的毕业论文（关于库兹巴斯的冶金工业，论文写好了，是这一年内完成的，作为毕业论文提交答辩通过了），所以我们决定参观工厂，因为我与科学院院士、该厂的技术厂长 И. П. 巴尔金的关系很好。西伯利亚的同志们给我们提供了一节车厢作起居用。

格罗利曼原来在斯大林斯克工作，我到过那里。他在供词中谈到乌格拉诺夫曾向他下达过所谓恐怖主义的指令（据说乌格拉诺夫是以我的名义下达的。我绝没有委托乌格拉诺夫做这件事，因为我与乌格拉诺夫从没有谈过并且也不可能谈这个话题），并声称“布哈林是乘坐单独一节车厢，带了几个随从到斯大林斯克来的。我与他在他的车厢里见了面。尽管情况不允许我们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因为车厢里有不相干的人），然而我们还是得以两个人单独地就有关右倾分子反对联共（布）的斗争问题谈了话。就是在这次谈话

时，布哈林非常明确地对我讲，在与联共（布）中央的斗争中，右倾分子必须组织单独的恐怖行动”，等等（接下来谈的当然是关于斯大林等等）。

我不知道格罗利曼在打什么蠢主意。他不是说不能进行开诚布公的谈话吗？可是却能够“两个人单独地”谈论恐怖活动。是在哪里“单独地”谈话？我们是当着大家的面站在窗边和坐在桌旁。这个谎言听起来尤其滑稽的是，所谓“不相干的人”是有的，顺便说一句，这是肃反工作人员，他们一直跟着我在阿尔泰和西伯利亚旅行，此外还有我妻子等人。格罗利曼就是当着肃反工作人员的面与我谈论进行针对斯大林的恐怖活动的。这个格罗利曼在上卑鄙的诽谤者这个新行当时过于卖力了！接下来，他当然一定要编造复辟活动了。我曾对格罗利曼说过，沙杜尔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把我介绍了给了赖伐尔，还谈到赖伐尔十分滑头。而格罗利曼在这件事上把我说成是议会制度的辩护士，而且还硬说我与赫里欧谈了话，而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人。

格罗利曼断言，1935年底戈尔登贝格见到过我，而我吓坏了。我不知道这样的事实。我看见戈尔登贝格是在见到格罗利曼的那个工厂里，但是有许多诚实的人在场，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可见，格罗利曼的谎言似乎编造得并不十分成功。我必须提请注意的是，格罗利曼过于卖力，甚至把我在第六次代表会议期间做的工作都称为反革命工作，他还谈到关于1928年的恐怖主义气息等等。尽管大家都知道，第六次代表会议期间，恰恰是我差点儿被盯我梢的波兰保安警察的奸细杀害——他本来要杀我，结果杀害了一个叫沙波什尼科夫的同志。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骂诸如艾维尔特这样的同志是反革命分子，艾维尔特现在正在巴西受苦，而以共产党报刊等为首的所有正派的报刊都在热情声援他。但这是一个特殊的题目，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由于不了解情

况，在记录中玷污了艾维尔特这样的名字。

罗济特也在发挥与格罗利曼同样的作用。我被说成一直（最近一段时期）在试图把罗济特从党的立场上引开。当时我真诚地为奇尔奇克工程的成就而高兴，为事情有了进展而高兴（提出到那里去的并不是我本人，而是塔什干的同志们；我也不是一个人去的，同行的有良德列斯，与罗济特谈话时采赫尔和法伊祖拉都在场；应罗济特的请求，而且也出于我个人的意愿，给谢尔戈和斯大林两同志写了封反映奇尔奇克需要的信，采赫尔同志也读过这封信）——总之，我不仅不想把罗济特从党的道路上引开，而且还想尽力帮助他。关于“应该把斗争继续进行到底，即便斯大林把我指责为恐怖分子也罢”（！）的说法，就是这个诽谤者硬加于我的（他把这说成是在1933年初的事），这是用心险恶的无耻谎言。我最后一次与罗济特见面是在塔什干和奇尔奇克，去帕米尔的路上。

最后，在一份供词里（好像是科托夫的供词）出现了马特维耶夫的名字，说他最近几年也接受了我的专门指令。我确实见过一次马特维耶夫。他同一个什么代表团来到《消息报》，穿一件钮扣闪闪发光的上衣，对我说，“您认不出我了吗？我现在是工程师”。我当着许多人的面同他打了个招呼，马上就因为什么事而离开了这个房间。我想只要费些劲，还是能够完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的。

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在中断很长时间之后，阿斯特罗夫（他还到我这里来过，但没碰见我）、谢苗诺夫、戈尔登贝格以及还有一个代表科托夫的人在一段非常短的时间里都往编辑部给我打电话。我回避了这些会面和谈话。我现在毫不怀疑，如果当时我不这样做的话，那么我在1936年就会多次成为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指令的发布者。有需求才有供给，用哲学语言来说，我受到最后的终极的诽谤，这个诽谤以其“现实性”和“完整性”登峰造极，使前述所有诽谤望尘莫及。

总之，要是相信最新牌号的诽谤者的话，那么格罗利曼和罗济特在1932年后仍旧是我的骨干。确实，反驳这些可怜的恶棍要耗费多么巨大的精力啊！

* * *

1933年，当斯列普科夫分子代表会议事件被揭露时，我就坚决与所有这些人划清了界线；我对他们撇开我、背着我搞的活动概不负责并且一无所知。我同大家一起最严厉地谴责所有反党集团并赞成严厉惩处我们国家的真正敌人。

结 束 语

诽谤势力总的部署是怎样的呢？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发起了破坏性攻击。他们的动机现已清楚（上面已谈过）。他们诽谤的内容是以“右倾分子”与他们的一个中心或若干中心的最紧密的联系为轴心。这些诽谤者们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他们的第一个中心被取缔后，在第一阶段出场唱反对我的“主角”的是索柯里尼科夫。索柯里尼科夫想证明什么呢？确切地说，他的诽谤的实质是什么呢？他大谈特谈“右倾分子”参加托派中心的问题。他在对质时断言：“右倾分子”加入了中心。他断言：托姆斯基本人加入了这个中心。他断言：托姆斯基是作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代表加入的。他还断言：“右倾分子”赞同托洛茨基的所有观点，组织上加入了中心，因而也就是结成了联盟。通过同索柯里尼科夫的对质，得出若干结论。

但后来拉狄克发起疯狂的诽谤性攻击，于是他便成了反对我的“主角”（皮达可夫居中）。由于没有来得及与索柯里尼科夫统一口径，拉狄克在供词中持另一种立场，他在人大扩展诽谤涉及的主题的同时，使索柯里尼科夫陷于尴尬的处境。所以索柯里尼科夫在法

庭上所持的立场与对质时的立场完全不同，他是在努力按拉狄克供词的路线使诽谤的步调一致起来（我在有关的信件和声明中一再指出了其中的矛盾和荒谬）。

但是，尽管托洛茨基分子最初的诽谤设想遭到了惨败，可他们又提出了第二个设想，其重心转到了“右倾分子”“独立的”组织上，于是一大批右倾分子在这一方面与托洛茨基诽谤者遥相呼应。

我在这封信里对托洛茨基分子和他们的右倾应声虫的所有主要的诽谤作了批判分析。我特别以蔡特林、扎伊采夫等人为例，指出从这方面看这些人的手段是何等卑鄙，证据是何等虚假，诽谤又是何等低下。无论涉及什么问题，一切都是血口喷人，都是拙劣的诽谤。

面对诽谤我只能孤军作战，因为我没有足够的材料、机构和助手。我确信，我只要有人手，并且有几个月的时间，就能揭穿一大堆荒唐的诽谤性谎言，并对所有问题给予令人满意的答复。但是我以为我呈送联共（布）中央的材料仍能驳倒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倾分子诽谤我的最基本内容。（供词近400页，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对此做出详细的分析。）

总之：1. 在“三人帮”实际存在（并不是虚构存在）的那一时期内从来没有过任何关于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等等的想法；

2. 从“三人帮”自行解散到1932年是逐步克服原来的错误的过程，有过两重性的成分（宗派主义），但我的整个活动（我想其他人也一样）是朝着与党完全融合的方向发展的；

3. 1932年夏末（当时我正在外地）发生了斯列普科夫分子举行代表会议、留京分子被逮捕等事件；斯列普科夫分子这样做显然是受乌格拉诺夫等人的影响的；我公开宣布与他们所有的人断绝关系并谴责他们的行为；从那时开始我没有任何关于原右倾分子和右倾分子的消息，我对他们的活动也不感兴趣，我关心的完全是别的问题；

4. 我不排除原来追随我的一些右倾分子还在进行斗争，他们已变成狂妄的反革命分子，并由此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5. 我更不排除乌格拉诺夫盗用了我的名字，因为从供词可以看出他不止一次这样做了，他与领导人之间早就有“老账”，他有“自己的集团”（如留京集团，他自己也承认过）等等（关于留京集团的存在我根本不知道）；

6. 我坚决否认任何有关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等结盟的指控；

7. 我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关于发动起义、进行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以及搞“宫廷政变”、与社会革命党人结盟等目标。我从没有下达过、也不可能给任何人下达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指令，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个别人或集团的有关意图。与我这个声明相矛盾的所有这些供词都是谎言和诽谤。

8. 我实际上为实现团结在党和党的领导人周围而积极地做了相当大量的工作，我与党的路线绝对没有任何分歧并衷心为党的成就和胜利而感到高兴。

我们机关的光荣不仅仅在于它追查有罪者，而且还在于它保护无辜者。如果有人遭到怀疑，而结果证明他是无辜的，这并没有什么不体面。证明并协助证明这一点和揭露并惩处真正的敌人是同样光荣的工作。

由于我国敌人的关照，我已历尽苦难，请求中央结束这种不应承受的苦难。

№0574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录

（1937年2月22日）

绝密

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下列决定分送给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鉴于布哈林同志声明说，他将完全绝食“直到撤消指责他叛变、进行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的指控”，又鉴于他拒绝参加联共（布）中央全会并答复全会的问题，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作如下声明：

（1）政治局不接受布哈林同志关于不要把他的“绝食”声明向中央全会报告的建议，并将他的声明分送给联共（布）全体中央委员，因为政治局认为它不能够、也不应该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保密；

（2）政治局认为它必须将有关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案件的所有问题，包括“绝食”问题和布哈林同志拒绝参加全会的问题提交全会审议。全会将于明天（2月23日）举行。

中央委员会书记

№05752

联共（布）中央全会
2月25日午前会议的会议记录
(1937年2月25日)

莫洛托夫（会议主持人）：我宣布全会的本次会议开始。由安德列耶夫^①同志发言。

安德列耶夫：同志们，我们听取了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长篇大论，读了布哈林同志冗长的书面解释。由此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以为，尽管有一些全面揭露李可夫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新供词，尽管进行过对质，但依我看，他们仍然持上次全会上他们曾坚持过的立场，否认他们的参与。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们向中央全会所作的全部解释。

我认为，根据这些解释所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甚至回避承认右倾分子反苏活动这个事实，回避承认这个事实，回避对右倾分子的这种反苏活动做出评价。请看一看布哈林同志给全会成员们寄来的这份文件。这里面有一点想对所有这些被揭露出来的右倾分子的活动即反苏活动的事实做出评价的意思吗？不，根本没有这种想法。尤其是布哈林没有这种想法。而向全会的全体成员提供的侦查材料又说明了什么呢？

我认为，首先，这些材料彻底揭露了右倾分子，揭露出在托洛

^① 安德列耶夫，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1895～1971），曾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党中央书记、北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工农检查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时任联共（布）中央书记。

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不存在这个区别——这一点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了。这些侦查材料十分清楚地证明，右倾分子在这几年中所走的就是托洛茨基分子所走的路。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无论是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右倾分子都完全保留了自己的骨干，拥有完整的秘密组织的体系，它以中心为领导，在各州有地方组织。在纲领问题上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也没有区别。这种区别不曾有过。无论是对待党的社会主义农业政策还是工业政策，他们的不妥协态度都是一致的。现在已经清楚，无论是在拒绝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还是在农业中解散和取消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方面，他们的复辟纲领也是如出一辙。

右倾分子的这个立场与托洛茨基的立场毫无区别，它在著名的1932年留京纲领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表现。而跟布哈林同志跟得最紧的、一条道走到底的他的学生斯列普科夫直截了当地指出，走美国式发展道路对我们更有利。我要问，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在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没有，没有任何区别。

在实施这个纲领的手段上也没有任何区别。右倾分子很早（从1929年开始）就选择了用两面派手法来欺骗党的策略。这一点现在已被施米特、乌格拉诺夫、拉金和所有其他人的供词非常清楚地揭露出来，他们所坚持的正是托洛茨基分子所坚持的那种欺骗党、耍两面派手法的策略。从这些供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不止一次向党认错的声明只是为了使自己留在党内而要的花招而已。由于在群众中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右倾分子便采取了托洛茨基分子所使用过的斗争手段——搞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

侦查材料清楚地表明，事情并非只限于恐怖主义的情绪、方针和议论，还有实际的步骤：通过侦查发现存在一系列有组织的恐怖主义战斗小组，如斯拉文斯基小组、阿法纳西耶夫小组、诺索夫小组，在萨拉托夫还有一个小组。所以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有方针和情

绪。他们还跟踪政府成员汽车的行车路线，这一点现在已经侦查证实。在搞破坏活动方面，问题也并不仅仅限于一般方针。现在已有供词证实，右倾分子在工业中也进行了破坏活动——这是雅柯夫列夫、科泽列夫、施米特供认的；而农业方面的情况，扎伊采夫谈到了，戈洛文谈到了——他谈了右倾分子在乌拉尔的活动，别洛博罗多夫^①也谈到了——他谈了在亚速海—黑海地区农业中的破坏活动。

已经查明了在对工人的供给方面搞破坏活动的事实，右倾分子在维丘加组织的“磨洋工”就是其后果。根据科托夫的供认，右倾分子在社会保险方面搞的破坏活动也得到了证实——他们不是把补贴发给那些需要的人，而是人为地保持失业，挥霍浪费基金，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这一点科托夫供认不讳。这就是说，右倾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他们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同志们，难道说问题只是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在路线和实践方面的一致吗？不，侦查材料指出了右倾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在组织上的联系即右倾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结成同盟，指出了右倾分子并不是孤立地活动，而是和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在一些环节上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直接地勾结起来，他们沆瀣一气，“结伙”活动。许多供词，尤其是别洛博罗多夫的供词，都说明了这一点。乌拉尔的戈洛文在其供词中谈到，右倾分子在搞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时与托洛茨基分子已经结成一伙。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右倾分子反党斗争的逻辑使他们走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所走的道路，右倾分子像托洛茨基分子一样，滑向了背

^① 别洛博罗多夫，亚历山大·格奥尔基耶维奇（1891~1938），1907年入党，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21年出任俄罗斯联邦副内务人民委员，1923年起为内务人民委员。

叛、变节、搞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这个烂泥坑。同志们，由此我想做出结论：应该像与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一样与右倾分子作斗争。这就是根据提交中央全会的侦查材料所做出的总的结论。

那么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中央全会现在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我认为，在上次全会以来的这个时期中已经进一步澄清了真相，积累了一些新材料，这些材料证明，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李可夫都不可能不知道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阵营所干的事，更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追随者所干的事。

首先，有这样一个问题：迄今为止存在着众所周知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供词，请问，布哈林或李可夫推翻了这些供词吗？这些供词是存在的，那么这些证明托洛茨基分子与右倾分子的联系、证明右倾分子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所干的一切以及托洛茨基分子供认存在一个右倾中心的供词是否被推翻了呢？因此，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这些供词是否被推翻了？没有。尽管进行了对质，尽管给了时间，尽管在这里发了言，但这些供词仍然没有被推翻。这些供词是重要的事实。此外，在这一期间有三个中心成员承认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这些供词。

请看一看，乌格拉诺夫供认了什么，请看一看，施米特供认了什么，他们都是右倾中心的成员。他们完全证实了皮达可夫的供词、拉狄克的供词、加米涅夫的供词。他们证实了这些供词。现在已经清楚，就连托姆斯基也证实了托洛茨基分子关于他们与右倾分子有联系的供词，他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他在国家出版社联合公司的讲话部分证实了这一点，讲话的速记记录还在，我认为，他开枪自杀就彻底证实了这些证词，否则他根本用不着开枪自杀。

三个右倾分子证实了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供词。同志们，这个事实是存在的，是任何辩解都躲不开、赖不掉的。现

在清楚了，无论是李可夫还是布哈林都知道，不仅知道，而且还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有联系。是有联系的。李可夫和布哈林到现在只剩下了他们在上次全会上使用过的一个论据：“有人诽谤”。但是，同志们，现在这个论据已经不够了，因为众所周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也经常利用这个论据。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用过这个论据，后来的情况又怎样了呢？

另一个情况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被判罪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有许多事情还没有说出来。这一点现在已经清楚，许多事情被他们带走了，现在不得不再来追查，他们有许多事情没有讲出来。但他们讲出来的东西都是真实的。托洛茨基分子招供的东西没有一点是假的。一切都被证实了（波斯特舍夫：说得对。）。他们供出的所有人都被证明是确实的。这个事实也是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李可夫都未能推翻托洛茨基分子的供词，就是说，供出的这些事情是存在的。这些供词证明布哈林和李可夫有罪。

如果这里使用“有人诽谤”作为论据的话，那么现在还有更有分量、更加大量的供词，提供这些供词的右倾分子是布哈林和李可夫最接近的人、他们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推说“有人在诽谤”，也不能推说有人在诬陷了。一个人、两个人可能诬陷，但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招供，那就不可能是诬陷。大家都招供了，你还能往哪儿逃？全都招供了。其次，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确切地说，这些人诬陷自己又有什么意义呢？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施基里亚托夫^①：当然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些人全都疯了吗？现在李可夫同志找到了一个疯子——涅斯捷罗夫。他对其他人还没有这

^① 施基里亚托夫，马特维·费多罗维奇（1883～1954），1923年起为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0年起兼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党纪处理小组书记。

样称呼。问题是，这些人到底为了什么要糟蹋自己、供出自己呢？

这是第一点，对此布哈林同志也没有做出回答，而这个问题已经向他提出了。第二点，与布哈林和李可夫最接近的人、他们的学生、数十年中一起工作的助手这样诬陷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他们诬陷你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这里只能有一个答案，即提供这些供词——它们已分发给中央委员——的人在事实面前再也无法掩盖你们在右倾组织中的作用了。（施基里亚托夫：还没有全都说出来。）他们没有全都说出来，但他们说出来的东西使我们有理由认定你们是右倾组织的领导人。（施基里亚托夫：说得对。）因此，关于李可夫、布哈林与已被揭露的右倾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的会见、所有这些最重要的谈话和联系的大量事实，无论是李可夫还是布哈林都未能推翻。没有被推翻，就意味着这些事实存在。就是说，这些会见、这种领导是存在的。

第三点，是我们在分析米高扬已经部分涉及的问题时必须注意的，这就是布哈林和李可夫本人的供词已经说明的某些东西。第一个事实。大家知道，在上一次全会上布哈林同志坚决否认1929年以后他与库利科夫见过面。在对质时以及后来在这次全会上他已经承认，1932年他与库利科夫见过面。他把这解释为记性不好。不，布哈林同志，这不是记性不好。这说明，你已经赖不掉这次见面的事实。不可能赖掉。这不能用记性不好来解释。

第二个事实。布哈林同志声明，他从1929年起就不再和党作任何斗争。而现在弄清楚了，1932年以前还有一个新的时期，那时他仍然对过渡时期有某些不同的看法。（施基里亚托夫：他说得模棱两可。）我们要问，你在1929、1930年一再声明你已经完全同反对派决裂并站到了党的立场上，这些声明又有什么价值呢？这个事实说明你作这些声明是在耍两面派手法。（有人喊道：说得对。）

有关布哈林的第三个事实。布哈林声称，他已经同青年派、同他的学生们决裂，很久没见到他们了，等等。但现在的声明又说些什么呢？他说：“我对于青年人中的派别组织视而不见，对于仍应保存骨干的议论听而不闻。我只是对这些‘骨干’嘲笑几句，因为我想如果我在这方面过于强硬，那大家就会疏远我。”问题并不在于记性不好。问题在于，在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一些问题。他是被迫的。

李可夫也是如此，面对事实他也不得不承认一些以前他不承认的问题。以前他一概否认与右倾恐怖分子和破坏分子见过面、作过政治性谈话。可是现在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曾与拉金见过面并与他作过政治性谈话。这是不是事实呢？

他不得不承认的第二件事，是他们曾聚集在一起读了留京纲领。（李可夫：我没有承认这一点。）可我们记得他曾肯定地说，他连听都没听说过，见都没见到过。（施基里亚托夫：对，他在全会上否认过。）可现在请大家看看：聚集在一起读这个纲领。我以为，现在根据已有的供词，有关这个留京纲领的神话已经消失了，这个神话破灭了。（有人喊道：还有关于野蛮集团的神话。）这个神话不存在了。留京纲领的真正作者已经查明，这就是由李可夫、托姆斯基、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施米特组成的右倾中心。留京纲领的真正作者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否则为什么要隐瞒读过、讨论过留京纲领这一事实呢？本来应该把存在这个纲领的情况报告中央。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把这个纲领叫做留京纲领，是他们的战略性计谋，这是一个现已被乌格拉诺夫和施米特的供词彻底揭露的战略性计谋。

还有，请允许我再说几句，因为这件事非常重要：众所周知，留京纲领在1932年就非常明确地制定了右倾分子的纲领性和策略性方针。纲领性方针规定，要取消集体农庄、消灭社会主义工业；

而策略性方针规定，要除掉现领导，提出了搞恐怖活动的问题。

施米特就是这样说的。由于这份供词没发给大家，还没来得及发，而它的内容又特别重要，所以我就给大家读一下：“这是在1932年，当时决定，到了对前一阶段的整个斗争进行总结，弄清并回答我们的志同道合者关心的、涉及现在和将来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了。这些答案在这个所谓的留京纲领中得到了反映。侦查员问：为什么这样称呼？答：原因很简单。在起草这个纲领时，我们组织的成员留京、加尔金等人起的作用是相对次要的，他们实际上是替身。这个纲领的实际作者是中心成员：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和我施米特”。（波斯特舍夫：可是他们没胆量说出来。）接下来，“侦查员问：是谁提出了起草这个文件的问题？施米特答：1932年初在博尔舍沃的托姆斯基别墅召开的一次中心的会议上提出了纲领和策略方针，参与做出这个决定的有布哈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托姆斯基和我施米特。会上制定了后来写进了纲领的基本原则。出于保密的考虑，授权乌格拉诺夫来办。这件事委托给了留京，要他拟出一个草稿。我再说一遍，文件的基本方针已经由中心成员在这次会议上提了出来。

1932年8月，由于纲领已写好，李可夫、乌格拉诺夫和我施米特在托姆斯基的别墅聚会。布哈林好像没在，当时他正在休假。但不管他在不在，反正在1932年初他同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中心成员一起制定了纲领内容的主要论点。此外，托姆斯基在1932年秋天说，布哈林回到莫斯科以后，他托姆斯基曾向布哈林介绍了这个纲领，布哈林赞成纲领的内容。八月会议讨论纲领文本时，我只赶上了讨论的结尾，因为我迟到了。在一些人的发言中我只记住了李可夫的发言，他认为经济部分比较弱，而关于搞恐怖活动的那部分写得不错，很正确。托姆斯基说，这可以修改，主要的东西不在经济部分，而在恐怖活动部分，这部分表达正确，不必争论了。我支

持托姆斯基的意见，于是纲领文本得到了赞同。纲领文本是乌格拉诺夫带来的，他又把它带走了。我在场的时候读了纲领的一些条文并进行了讨论。侦查员问：为什么这个纲领叫做留京纲领？答：完全出于保密的考虑。当时约定，如果事情败露就把这个纲领说成是留京—加尔金地方集团制定的。留京本人对此表示完全同意。这是为了彻底保护右倾中心成员，表明他们没有参与制订这个纲领。你们在这个纲领里会发现有些地方稍稍踹了右倾首领们几脚。”（施基里亚托夫：对，那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在1932年，这个纲领的实际作者没有暴露出来。同志们，这就是他们的整个手法和整个战略，是由右倾中心的一个成员现在彻底揭露出来的。现在已经真相大白，再也躲不过去了。

但是我还想比较一下一个并非不重要的情况、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就是右倾分子首领的行为，即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斯米尔诺夫、乌格拉诺夫、施米特以及所有其他右倾分子的行为。同志们，应该回忆一下他们在大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是党在1928—1937年间完成的——的行为。他们是怎样参与这个大转变的呢？要知道一种行为能说明许多问题。（波斯特舍夫：说明他们搞了破坏活动。）当时国内的工作搞得热火朝天，每个对党赤胆忠心的人都在工作中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当时国内正进行集体化，消灭富农阶级，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起草新宪法。可右倾分子在哪里呢？他们的政治积极性、对所有这些大事以及党所进行的整个大转变的参与反映在哪儿呢？他们的作用又表现在哪里呢？（波斯特舍夫：在搞背叛活动和破坏活动。）如果现在比较一下这个时期索柯里尼柯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的行为，我们要问：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行为与索柯里尼柯夫和谢列布里科夫的这种行为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绝对没有。（有人喊道：都是一路货。）如果比较一下，那么他

们完全是一路货。很清楚，没有理由认为有人阻碍右倾分子参加国家的这场伟大运动。根本没有这种事。党已经做了一切努力以便使这些人能够留在非常重要的岗位上，使他们能够参加这场运动。

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都去当平民百姓了，打算离开重要的政治工作去休息了，累了，等等。这全都是胡说八道！问题到底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这些人并没有切断自己的后路，也没有解除武装，他们仍然坚信自己是对的，即坚信自己的复辟纲领。正是这一点使他们与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系超过了与党的联系。他们与托洛茨基分子有共同的基础：对党和苏维埃政权领导人的仇恨。他们保留了所有的联系，所有的圈子。这就是妨碍他们同我国这场运动、同党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工作、同苏维埃政权的工作融为一体的原因。这就是妨碍他们参加这一最重要工作的原因。

现在，根据这些供词所揭露的右倾分子活动来看，产生这种政治消极情绪的背景已经非常清楚了，整个这件事的背景非常清楚了。这不是消极情绪，而是敌对情绪。（布琼尼：完全正确。）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忙着搞另外的活动，完全是另外一种活动。这就是对消极情绪的解释。（布琼尼：完全正确。）我还想分析一种情况。在我看来，很难想象，在路线问题上忠诚于——彻头彻尾的忠诚——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涅斯捷罗夫们、拉金们、蔡特林们、亚格洛姆们和其他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我们都认识——会走上托洛茨基分子的道路。如果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对他们表示反对，反对他们的这种情绪的话，那就很难想象他们会走上这条道路。有没有哪怕一个为中央所了解、说明布哈林和李可夫曾阻止过自己的人的事实呢？有没有哪怕一个为中央所知的、说明他们反对这些恐怖主义情绪、破坏情绪、反苏维埃情绪的事实呢？这样的事实一个也没有。

令人怀疑的是，所有这些现在已被抓起来、已被揭发从事破坏

活动、参与恐怖主义小组的右倾骨干会在没有自己将军指挥的情况下如此充满信心地独立行动。同志们，不管布哈林和李可夫怎么表白，怎么发誓，这一点我是不相信的。

通过比较这些基本事实、供词以及他们的行为，我坚信，布哈林和李可夫是知道托洛茨基分子的叛卖活动的。（波斯特舍夫：绝对知道。）不但知道，而且还和他们有联系。布哈林和李可夫不但知道右倾分子的活动，而且仍然非常谨慎、非常巧妙地领导着这些右倾分子，直到最近还在领导他们，与他们保持联系，鼓励他们进行反苏活动并怂恿他们犯罪，怂恿这些人犯罪。无论布哈林和李可夫如何否认，我对此坚信不疑。布哈林和李可夫声明和暗示说，人们不让他们辩解，不相信他们的誓言等等。我要问，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这些声明和暗示还有多大的价值呢？（埃赫：大家已经不相信他们了。相信他们的时间太长了。）不，不，党和中央已经给了你们足够的时间，给了你们十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来让你们放下武器、洗刷自己。

党从没向任何一个反对派分子和敌人提供过像给你们的那么长的时间。为了使你们留在党内，党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从党这方面来说，我还应该说，尤其是从斯大林同志这方面来说，为你们做出了多大的努力和忍耐啊。（有人喊道：说得对。）是的，正是斯大林同志一再要求并经常提醒大家。不管是哪个同志、不管是哪个地方组织提出右倾分子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打他们的屁股”，或把问题提到中央来，斯大林同志就警告我们不要太急躁，他总是这样提醒我们。然而你们却滥用党的这种信任。（有人喊道：厚颜无耻。）你们不是彻底解除武装、痛改前非，而是滥用党对你们的好意；你们不是帮助党揭发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布琼尼：还有揭发你们自己。），而是要两面派手法欺骗党。你们为右倾反革命分子打掩护，与这些苏维埃政权和党的敌人勾结在一起。

我要问同志们，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布哈林的所有这些誓言和眼泪——其中混杂着谎言、以绝食和寻死等等为威胁来继续同中央斗争的图谋——还有什么价值？所有这一切还有什么价值呢？很明显，问心无愧的人不必要这些手腕。（布琼尼：说得对。）你们的所作所为证明，你们已经被当场逮住了，因此不如老老实实来对中央说：“是的，我们被逮住了，我们在什么什么问题上是有罪的，审判我们吧！”这样做要比那些没完没了的花言巧语实在得多。你们竟然还敢要求党信任你们、相信你们说的话，但是党已经从托洛茨基分子的反苏活动中，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倾分子和“左”倾分子的背叛活动中吸取了足够严重的教训，不会再轻信你们的话了。我们不会再轻信你们的话了。

我的发言快完了。我以为，同志们，党中央已经掌握的材料不仅足以将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中央、开除出党，而且足以将这个案件移交侦查机关。（有些人喊道：说得对，完全正确）。

莫洛托夫：下面请卡巴科夫^①同志发言。

卡巴科夫：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中央全会事实上已经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活动做出了结论。他们都是党员，候补中央委员，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们在自己的发言中，布哈林还在他的材料中断言，他们相信政策是正确的，党中央的路线是对的，他们热爱基洛夫同志。布哈林说，他热爱谢尔戈，说他没有在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墓前一洒悲痛之泪是最大的遗憾。（有人喊道：伪君子！）他们的这些话似乎是要说明，这样的信念应能表明他们干的是布尔什维

^① 卡巴科夫，伊万·德米特里耶维奇（1891~1937），1914年入党，十月革命后曾在沃罗涅日、雅罗斯拉夫尔、图拉等地担任领导工作，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29年任乌拉尔州委第一书记，1934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

克的事业。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已经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两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全国各地已经成为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劳动群众的切身事业。应该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活动说些什么呢？可以让某个非党员在非党工人会议上报告一下李可夫和布哈林向我们所讲的那些活动。非党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会如何对待这些关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的报告呢？每个工人、每个集体农庄庄员都会说，这种人不可能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公民。（布琼尼：说得对！）他们在这10年的活动中不但从理论上否定了布尔什维主义，而且完全丧失了一切革命精神。在这10年中他们那种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反革命祸心已经暴露无遗。（布琼尼：他们都是法西斯。）他们在这里向我们讲了什么呢？讲自己的革命功勋？对他们的发言能作什么样的评价呢？这些发言开列了一张清单，交待了他们策划反革命活动的谈话、与反革命追随者会见的事实和时间。正是他们在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所下的大量反革命勾当支配了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忘却了这两个五年计划期间党倾注全力去完成的战斗任务，离开了党目前的任务，他们不是想党所想，而是站在一旁，参加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活动，为自己选择了另外一种活动——反党活动。

甚至在此时此地，当须要向党中央全会说清楚这一切发生的原因，说清楚为什么前中央委员、现在的候补中央委员、党员会陷入反革命阵营并领导反革命运动时，他们对这个问题是如何回答的呢？布哈林说：“我应该得到平反，或者退出舞台。”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作为布尔什维克，你们早已退出舞台了吗？（有些人喊道：说得对！）你们说“自己人凭着诽谤不实之词来无端漫骂”，是谁给了你们这样说的权利？你们指出了哪个与你们一起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中央委员？你们为什么、有什么权利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受不

了业已形成的气氛。”请你们说说，是谁在党内搞两面派？（卡缅斯基：说得对！说得太棒了！）为了和列宁—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作斗争，他们创造了这些方法。你们敌视党的活动起了很坏的涣散作用。

我认为，你们应该向中央说明，你们为什么选择了对党耍两面手法的道路？你们为什么要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不想说以绝食相要挟的问题。布哈林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去绝食。（布琼尼：他说他从夜里 12 点绝食到早上，就是说他绝食了整整一夜。会场上一片笑声。）绝食的人未必会在 50 分钟内喝掉 5 杯水。

就是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在他们这些政治罪犯和破坏分子被当场逮住之后，他们又说了些什么呢？胡言乱语，信口雌黄。大家看看，他们是怎样接受侦查的，连日期都对不上。他们推说是忘了，是他们的朋友们在诽谤他们。他们不断地诽谤内务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委员会。还抱怨说，他们被搞得精疲力尽，他们是无辜的。别人都错了，只有布哈林和李可夫这两个人矗立在有 17000 万人民的国家里，只有他们俩是正确的。

他们在这里说了两个小时，可他们俩谁也没有向中央说出哪怕一个他们所从事的布尔什维克活动的事实，他们没有提到一件布尔什维克的行动。好吧，就让他们不提事实，不提行动吧。那就请他们讲讲自己的布尔什维克言论吧。及时说出的话，也是行动；是大的行动。

他们知道他们的哪些活动呢？他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说出的第一个意见是布哈林纲领。他们在这里说，他们不知道托洛茨基分子的活动，和他们没有联系。但是布哈林曾与皮达可夫和加米涅夫讨论过他自己的纲领，这是他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意见。他们表达的第二个意见是他与加米涅夫的谈话。整整 10 年中，他们在自己的活动中和托洛茨基分子紧紧地铐在一起，就像戴镣铐的

犯人那样。可现在他们却出来抱怨说，要是皮达可夫没告发我就好了。（会场上一片笑声。）要是加米涅夫不出卖我们，不把自己的谈话印到托洛茨基分子的传单里去，那我们就不会被逮住了。李可夫还在这儿埋怨施米特不守纪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一切都好了。

难道中央会在这里给你们判断是非吗？你们都是一路货色，你们全都是对社会主义祖国犯下罪行的罪犯。（有些人喊道：说得对！布琼尼：他们都是法西斯！）

现在谈谈你们的事情。当集体化成为事实以后，全国各地的农民群众都投入到集体农庄的建设中来，而你们却向全世界大喊：“我们搞错了”。你们不参加工作，但干了些什么呢？你们炮制留京纲领，召集斯列普科夫的代表会议，而布哈林在这里撒谎说，他不知道这个会议。他是通过斯列普科夫来领导这个会议的。他去休假是有意的，不参加中央全会也是有意的。（波斯特舍夫：说得对。）中央全会10月4日闭幕，他是6日回来的。真是个世界级的骗子。（大家齐声赞同。笑声。）只要出现棘手问题，他就开溜，肯定要躲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去休假，或者去帕米尔。（波斯特舍夫：躲得越远越好。卡冈诺维奇：为的是不容易找到他。布琼尼：旅游去了。波斯特舍夫：他组织了会议，煽风点火后就一走了之。）这些年来他们以疯狂的速度纠集反革命势力。难道这不是背叛革命、不是他们的背叛行径吗？——除此之外还能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看清了什么？对资产阶级来说，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依靠敌对阶级的某些残余是有利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自愿地扮演了资产阶级复辟者这个历史性角色，领导了富农运动，现在你们的反革命活动在党中央全会上原形毕露。你们的朋友乌格拉诺夫、库利科夫、蔡特林、雅科温科、科托夫、罗济特等所作的供词对你们的“战绩”作了精彩的阐述。（波斯特舍夫：说得对。）

对你们所干的肮脏卑鄙的活动能说什么呢？库利科夫是这样说的：“阿法纳西耶夫来到我家并告诉我说，他和科托夫见过面，后者对他讲了与李可夫见面以及李可夫建议科托夫集中全力组织策划对斯大林的谋杀”的情况。这是 1934 年的事。科托夫告诉李可夫，说“在苏联的一些地区预计会出现饥荒”。这对你们来说是天大的喜讯啊！对此“李可夫回答说，只要现领导掌权，就会发生更可怕的事情。他还补充说，难道你们那儿就没有行事果断、能结束斯大林统治的人了吗？”看看，你们的意志和力量全都投入到什么样的事情上去了！你们干了卑鄙的反革命勾当。你们早就应该坐到被告席上去为你们的所作所为承担责任。

可是你们却到这里低声细语、哭哭啼啼。请看，昨天晚上布哈林来递交抗辩书，他就像一只快被掐死的老鼠一样吱吱尖叫。（笑声。）他的声音变了，眼神也变了，好像刚从洞里钻出来。中央委员们，看看吧，这是一个多么不幸的人哪！（波斯特舍夫：当年他们就住在山洞里。这帮修道士！）顺着他们与地方右倾分子联系的这条线索可以发现什么呢？我不清楚其他州的情况怎么样，但请看：李可夫在斯维尔德洛夫州有自己的代表——涅斯捷罗夫，布哈林有亚历山德罗夫、卡尔马利托夫，托姆斯基有科泽列夫等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伙。（莫洛托夫：他们到底把卡巴科夫包围了。）不但包围了起来，莫洛托夫同志，还教我学会了一些东西呢。（波斯特舍夫：议事日程上把这个问题专门列出来了。）

地下活动与州中心的所有成员都有关系。为了保密起见，乌拉尔的右倾分子与中心的联系有着多种形式。对地方组织的工作所作的指示涉及面很广，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托姆斯基曾下指示说，要保持同托洛茨基派领导人的密切联系，必须系统了解并正确使用土生土长的乌拉尔干部，要最大限度地利用一些乌拉尔工作人员群

体中的地方主义和老乌拉尔倾向以利于右倾组织。托姆斯基强调，尽管有人说工作已经开展，但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继续招兵买马。干什么？招兵买马。李可夫对涅斯捷罗夫说：要抓紧实施恐怖行动。要在地方上建立恐怖主义小组。于是他一到地方上就与卡尔马利托夫和亚历山德罗夫取得了联系。涅斯捷罗夫向李可夫报告说，为了实施针对斯大林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恐怖活动，成立了一个小组。他们继续堕落，开始在研究人员中招兵买马，招募了萨温和舒列鲍夫等人。

你们在这里说你们根本没有搞过任何恐怖活动，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但是在你们的领导下成立的每个恐怖主义小组都知道和感受到你们无时不在的影响，并且说他们正从事破坏活动，已做好搞恐怖活动的准备，实现李可夫、布哈林、托姆斯基的意志。

你们为什么和托洛茨基分子勾结到一起呢？你们说，制造出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在一起的神话对托洛茨基分子有好处，他们须要这样做多半是为了提高威信。是的，你们在这个阵营中有牌价，你们有某种价值。但是你们问一下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共产党吧。任何一个党都会认为你们一文不值。（哄堂大笑。）你们只在一个地方——在反革命阵营里有价值。他们为什么抓住你们不放呢？他们为什么需要你们的威信呢？只是因为，你们除了搞反革命活动什么也没干。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这些年来你们的全部活动都和托洛茨基分子紧紧勾结在一起。无论你们怎么推托，反正你们参加了托洛茨基中心。你们不但了解、而且还十分积极地参加了他们的活动。（许多人喊道：说得对！）所以，同志们，结论很明显，要把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中央、开除出党，要像审判托洛茨基分子那样对他们进行审判。（许多人喊道：说得对！卡巴科夫同志！）

……

卡冈诺维奇（会议主持人）：现在由莫洛托夫同志发言。

莫洛托夫：同志们，在最近两三个月中，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了。这是我们对那些早已背离我们党、更确切地说是早已背叛了我们党的人表现出极大耐心的证明之一。在清算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错误期间，我们始终记得他们的功劳，记得他们过去也做过一些好事；而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纠正他们的路线，纠正他们的做法，向他们提供回到共同道路上来的机会。不过，如果观察一下他们迄今为止在这里的言行、他们在这里的种种表现、他们对待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对我们全党的态度，那么对我们每一个客观地看待问题的人来说都很清楚，这是一些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有些人喊道：说得对。）这是一些继续在向党 and 党的中央委员会发动攻击的人。

当然，在他们的目前处境下，很难像留京纲领所表达的那样，出来发表和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纲领；像他们所有的学生和最亲密的支持者——这些人已经投降，他们在我们已经掌握的各种罪证面前不得不交代真相——所号召的那样，出来发表要推翻苏维埃政权的言论；到这里来宣布他们赞成推翻苏维埃政权、赞成复辟资本主义、赞成对党的领导人搞恐怖活动。没有人会让他们公开发表这些言论和维护这些东西。因此，他们知道，现在在党内不可能这样进行斗争。于是他们就采取其他的手段来进行斗争，并认为他们的斗争尚未结束。最起码，对于我们党的敌人来说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向那些反对党的人们指出：不要投降，要坚持住！（梅口劳克：说得对！有些人喊道：说得对！）尚未投降的人们，要咬牙挺住，拖延时间，推迟投降。这就是他们——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策略。他们说，尚未被揭露出来的人不要暴露自己，进行暗中破坏和反党斗争的人要继续干下去，我们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不会投降的，

我们将否认一切。这就是他们的策略。布哈林曾经写过、也在这次全会上说过：即便有千百万份供词，我也不会承认；不管你们说什么，我都将一概否认。

而李可夫虽然看到这种立场是毫无指望的，却仍然坚持这种立场，只不过有一点小小的保留。他在这里承认了一些东西，因为否认显然是愚蠢的。同时，他又让自己同布哈林保持某些细微的差别，以便不至于成为布哈林行为的翻版。然而，这两个人的行为已经不只是最近几年中一直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的行为，而且还是仍在继续进行反对我们党的斗争、企图保住自己的骨干分子、迷惑某些动摇者、影响某些人、最大限度地坚持其反对中央、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路线的人的行为，就像他们最近几年来的所作所为一样。

不过，同志们，既然我们谈论的是布哈林和李可夫，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同时，我们也明白，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李可夫，从他们目前的样子来看，他们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人物。（梅日劳克：说得对。）他们本人所能做的只能是那种躲在阴暗角落里的人偷偷摸摸干出来的事情，就如同耍两面手腕的人、如同遮住自己的脸去干坏事的人一样。（有人喊道：胆小鬼。）但是应当注意到，现在我们还有敌人。他们正在发出坚守阵地、继续斗争、决不投降、拒绝承认真相、拒绝承认罪证、要兜圈子、绕弯子的信号，这就是要让那些人继续坚持不放下武器的敌人的立场。这里不仅仅是李可夫和布哈林，还有另外一些人。这些人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现在也还存在。我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他们不仅向他们在我们党内的支持者呼吁，而且还向一些党外人士呼吁。他们正在给这些人发出信号。从布哈林和李可夫目前的政策可以看出，他们比原先的动摇和错误走得更远了，他们走得越来越远，现在还在沿着严重错误的道路走下去，继续保持着其恶劣的反党斗争的传统。

现在谈谈布哈林。布哈林对我们党来说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我们知道，他写了不少文章，作过不少报告，发表了不少演说；可是我们也知道，在党认识他的整个时期里，他时常挑起反党斗争。在战争时期，他在关于国家学说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公开反对过列宁。我记得在 1916 年秘密工作时期，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委员在彼得堡读过列宁的一封信——我不记得这封信有没有发表过。列宁在信中提醒我们说：我同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他所持的是消灭国家和否定国家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而我主张，国家作为工人阶级为了实现彻底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而进行的斗争的一种过渡形式，必须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我毫不怀疑，这封信如果没有发表，那就是被保存起来了。而列宁在 1916 年，1916 年秋季，就专门向从事秘密工作的俄国工作人员提醒过这一点。（斯大林：这封信发表了。有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是有一篇文章。除此之外，还有一封信。在 1916 年 11 月底，在彼得堡的秘密环境下，在一所秘密住宅里，我本人读过这封信，事情就是这样的。这封信是有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显然是知道这封信的。

下面再谈谈后来的一些事。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期间，布哈林是我们党的凶恶敌人，鼓吹可以放弃工人阶级专政。因此，用列宁的话说，[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而是一个小贵族，也就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想的不是党和革命的利益，而是不要脱离小资产阶级群众，不要脱离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那帮“左派”社会革命党同伙。他同这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沆瀣一气反对党，反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列宁。我们知道，这没有产生任何结果。接着是下一个阶段——1920 年和 1921 年。按照列宁的话说，那时布哈林是在往争论上“倒煤油”。（主席团中有人喊道：缓冲煤油。）在列宁谈论党内危机、党内困难局面的那个时期，他所干的

是在托洛茨基反对列宁的斗争中火上加油，他又倒上了煤油。总之，他在这时期起的是背叛作用，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

又过了几年。列宁已不在人世。我们大家都团结在斯大林同志的周围。布哈林似乎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但其实他是在拼凑自己的青年派，一帮饶舌的人。（有些人喊道：说得对。大厅里一片笑声。）他把斯列普科夫和其他一些人聚成了一伙，却说“我本人一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件事。”而在同阿斯特罗夫对质时，他又说，“我之所以在反对列宁的斗争中输了（斯大林：尽管我是对的。）——虽然实际上我是对的——是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干部，而列宁则有自己的干部。”（有人喊道：真是个好蛋。）“其实，从原则上说，真理是在我这一边。但在同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人作斗争时，我就显得太天真了。我也应当拥有自己的干部。”这便是学派的发端。

我们曾经就像是一家人，一起进行反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斗争，摧毁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是的，那时我们也经常受到他们的暗中攻击。最终的情况是，布哈林人虽在我们中间，但心怀叵测。你们是否看到，他拥有自己的青年干部，他正在组建自己的干部队伍。事情还并非如此简单。他不光考虑自己，他还想着提醒托姆斯基。于是托姆斯基就着手培养自己的骨干。他又向李可夫做出某种暗示，李可夫就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而且不仅是在自己的秘书处。大家都知道，李可夫不仅在自己的秘书处有亲信，他还企图在经济工作干部中始终都有自己的人。（有些人喊道：说得对。）他在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时候认识了很多，他也确有一定的组织经验。他挑选了一些自己的干部。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干部呢？是一些没有原则的人，在他们身上没有一点列宁主义，他们什么都不具备，他们对职位斤斤计较，总是在那里议论：任命某人是正确的，任命某人是错误的，某人受了委屈，某人得到了提拔。

正是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吃吃喝喝的晚会上，他们结成一伙（有些人喊道：说得对，说得对。），试图拼凑自己的干部队伍。在托姆斯基那里同样也是毫无原则，也是吃吃喝喝，也在拉拢自己的干部。只有布哈林一人还塞进了意识形态的东西，他把阿斯特罗夫、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蔡特林和库兹明这位相当重要的思想家召集在一起。他当时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将提出新的更为重要的思想等等。布哈林企图把所有这些毫无原则、与党决裂并在寻找自己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的破烂货网罗在一起。暂时他似乎还是在我们的圈子里，在我们共同的主要派别里，在党的共同的基本群众中。那个时期党正在进行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随后是进行反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斗争。

但是问题在于，应当为新的情绪和新的干部找到某些组织形式。于是，布哈林勾画出了党的新形式。对此阿斯特罗夫供述得比较详细，当然不只是阿斯特罗夫。布哈林说，应当存在的不是现在这个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目前条件下党应当是一个基本的组织框架，（斯大林：而不是坚如磐石的。）应当存在的不是一个坚如磐石的统一的列宁的党。他说的是工党类型的党，英国的工党。在工党中各种思潮可以自由角逐，在那里根本谈不上什么布尔什维主义。（斯大林：各党派的联邦。）对，斯大林同志说得很准确，正是在那里可以说是各党派的联邦，正是在那里社会主义者和非社会主义者才能同在一个组织中和睦相处。然而这样一个党当然是不能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的，它甚至连想都不会想到这一点，它不希望这样做。

他悄悄地灌输这种思想，用它来培植自己的青年派。这种思想认为须要存在的不是现在这种类型的坚如磐石的党，而是工党类型的党。在这样的党里，各种思潮、集团和派别可以自由竞争；在这样的党里确实能够以兼收并蓄各种思想和原则的思想家而炫耀；在

这样的党里可以把所有这些毫无原则的人——李可夫、托姆斯基——成功地纠集在一起，因为他们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在原则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内感到备受压抑。因此就开始寻求对各种思潮和党派施加影响的广泛自由，这种寻求是1924~1925年在他们的学生中展开的，他们考虑了要联合谁，为什么联合，把事业引向何方等问题。很清楚，这就是导致放弃列宁的党，放弃列宁主义，放弃布尔什维克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和放弃苏维埃政权的全部前提。（有人喊道：说得对。）导致另一种情况、另一条道路的基础就是这样的。但他当时还未下决心公开说出这一点。他对自己比较忠实的学生如斯列普科夫、阿斯特罗夫、库兹明、蔡特林等人则谈得比较多。

就这样，同志们，我们当然还算是幸运的。就在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施米特为代表的右倾分子试图公开爬上舞台时，我们已有足够的警惕，能够迅速转入反攻并粉碎他们的思想。所有这些尝试在组织上都是为了使我们党上当受骗，摧毁它，破坏它，使它变成为另一种组织并转向另一条轨道。

我现在不准备谈什么是右倾的问题。你们大家对此都十分清楚。你们知道，这是一条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反对农业集体化的路线，这是一条导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的路线，这是一条为了富农和资本主义的利益而放弃社会主义立场的路线。（有人喊道：说得对。）是一条导致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和资本主义复辟的路线。党对此作了充分的揭露。于是在1930年，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发表了承认自己错误的有关声明。可是现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承认这些错误只不过是为了掩盖其进一步的反党斗争。当然，现在也可以试图推翻某些日期或地点：比如说，我走的不是斯帕斯基大门而是特罗伊茨基大门，不是同科托夫在一起；比如说，我不可能走斯帕斯基门；比如说，我不是步行而是乘汽车去的，我不可

能谈论政治，因为步行时是无法谈论政治的。

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毫无意义的。对我们来说有的是另一层意义。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个案件进行侦查，那么我们是会很好地进行侦查的。维辛斯基同志会积极参加的，假如布哈林和李可夫争取这一点的话。现在的问题不是侦查。如何看待这样一些严重的事实，如大量的供词，其中数十份供词的提供者不仅有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做过同样事情的右倾分子结成了联盟），还有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的朋友们，他们揭露出近几年他们是同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人一起干的这一事实。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呢？布哈林试图证明，牵涉到他个人的那些事都是不真实的，他不能承认这些事，因为他没有干过。

可是，当布哈林的几十个最亲密的右倾同志自己招供说他们参加过恐怖活动时，布哈林就很难对此说什么了。现在，乌格拉诺夫管辖下的前哈莫夫尼基区委书记雅柯夫列夫详尽地供认，他是如何在斯大林格勒工厂搞破坏活动的。当他被调到车里雅宾斯克之后，他又在那里的建筑工地和生产部门搞破坏活动，往工人的用水中下毒并在工人中制造传染病。他们详细交待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通过第一次起诉把所有 16 名恐怖分子枪毙之后，发生在我们通过第二次起诉又把与这个案件有直接关系的所有破坏分子也枪毙之后，对此该如何理解呢？他们不得不交待这些事是自己干的，而且他们确实既从事过恐怖活动，又搞过破坏活动，对此又该如何理解呢？布哈林说，他不知道这些事。但可以认为，他们想祈求宽恕自己的罪过，这些人想向党缴械投降并帮助党，他们甚至还指出了那些不完全准确、不完全正确的事情。这是一些已经投降的人。

最后，我还要向你们列举另外一些供词，比如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团中的库兹明的供词。最近，他在 2 月 21 日的审讯时说，他承认，布哈林确实和他进行过这样的谈话：布哈林说他反

对苏维埃政权，反对党，并说他在莫斯科的那个时期曾多次会见过他那些最亲密的学生。库兹明还一字不差地重复了斯列普科夫和其他一些人在自己的供词中所交代的内容；重复了阿斯特罗夫、蔡特林、扎伊采夫以及布哈林的青年派中其他人所证实的东西。同时他又补充说：“我应当向你们作如下声明。我是你们的政敌，是你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现存制度的敌人。我认为，苏联是一座全俄罗斯的集中营，它被用来反对革命。也就是说，我赞成起义，反对苏维埃政权，我赞成推翻现存制度……”（一些人喊道：流氓，坏蛋！）他接着说：“我不会在你们面前放下武器，也不打算投降。”（一些人喊道：这个人是谁？）这就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库兹明。（一些人喊道：这个坏蛋！）他说：“我声明，我是共产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敌。”这就是布哈林集团中最核心的人物之一。（斯大林：是他培养的。）

这就是决不肯说他已放下武器的人。在4天前的侦讯中他还说：“我是你们的敌人。我是不会放下武器的。”斯米尔加在自己的供词中也作了同样的声明：“我是你们的敌人，我是不会放下武器的。”（有人喊道：这个坏蛋。）布哈林是不是想给他们打气鼓劲呢？（有些人喊道：正是他们。）难道他不知道，所有的人供认的是同样的东西，只不过是在枝节问题上有些出入。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一些人想起的是一件事，另一些人想起的是另一件事，但只要基本的东西大家说得都对，那么他们证实的就是同样的事情。（斯大林：这都是在承认事实的范围内的不同说法。）对，是在承认所有其他事实的范围内的。而且，在哪一次诉讼程序中所有被告的招供都会丝毫不差呢？这种情况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不过我们现在说的不是诉讼程序，而是事情的法律方面。这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对所有这一切都加以否认，说我不知道怎么会搞成这样，那么拉狄克也说过同样的话，他在最近一次讲话时声称：“在

我还没弄清楚我是最后一个之前，在我还没弄清楚有谁投降之前，在我还不清楚谁投降了、谁没有投降之前，我是不会招供的。只有在我知道我是最后一个的时候，我才供认自己的罪行。”

这就是一种策略，就是那些不想放下武器、不想被揭发、不想掉脑袋的敌人所采取的那种策略。他们不愿意承认说：“是的，我错了，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我现在放下武器。”不，这些人要顽抗到底。这些人能够用自己的策略给库兹明打气，而库兹明加入了他们的集团，他说：“我不会投降，我不会放下武器。我反对党，反对你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苏维埃政权。”（波斯特舍夫：“我是你们的敌人。”）对，“我是你们的敌人”。布哈林和李可夫在以自己的言行帮助这些人，支持他们的情绪，推动他们继续斗争。（有些人喊道：说得对。）他们的算盘就是这样。但是，同志们，应当说，不管他们怎样偷偷摸摸绕来绕去，那些明显的犯罪行为和政治色彩强烈的东西总是会露出马脚的。

我们不应当这么天真，以为布哈林这段时期以来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党言论。这是不确实的。他不只是在他那里召开的小范围会议上，不只是在这里或那里举行的种种会暗中发表过反党言论。你们看看他在 1934 年写给《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的文章吧，这是 1934 年 5 月 12 日的事，当时遭到了斯捷茨基和梅赫利斯的反驳，他们说，对布哈林发表在 1934 年 5 月 12 日《消息报》上的题为《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的文章不能闭口不谈。可能大家都读过这篇文章，我不准备再念这篇文章以及斯捷茨基和梅赫利斯的反驳，我要读的是另一个内容，即斯大林同志对于布哈林与斯捷茨基之间发生的这场争论的意见。这些意见说的是什么呢？这些意见已经分发给政治局委员们，也发给了布哈林和斯捷茨基。

下面是斯大林同志当时就发表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的《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一文提出的四点意见。他在向这些政治局

委员以及布哈林和斯捷茨基分发的这个文件中说：“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在布哈林同志与斯捷茨基同志的争论中，对的不是布哈林同志，而是斯捷茨基同志。第一点，不能像布哈林那样，把工业化归结为建立一般的基金，因为这样做会抹杀重工业基金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基金之间的差别。重工业是指导和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在我们的政策中既不起指导作用，也不起改造作用。整个问题的要害就在于这个差别。”（加马尔尼克：对，对。）

“第二点，不能做出哪怕是隐晦的暗示，说我国的重工业是通过多少吃掉或部分吃掉轻工业或农业的途径而发展起来的。不可以这样说，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诽谤，也是诋毁党的政策。确实，这种隐晦的暗示在布哈林同志的文章中无疑是存在的。”因为他不能公开讲出来，于是他便在1934年决定做出某些暗示并推行自己的那一套东西。（波斯特舍夫：对，对。）我在这里不再宣读那些补充意见，而只提出斯大林同志的结论的最后部分。在引用这部分时，为了得出一个完整的印象，我最好还是全文宣读：“因此不能不指出，前右倾分子时常企图把党的方针与右倾分子的方针之间的区别归结为：党似乎是通过正面进攻来达到目标，而右倾分子则是通过迂回的痛苦较少的途径来达到同样的目标；他们认为，如果能给右倾分子提供机会的话，他们本来是可以较少的牺牲达到目标的。无须证明，这种带引号的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实际上，右倾分子不是走向同样的目标，而是走向阶级敌人所设置的圈套。因此，假如工人们听从右倾分子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落入圈套……（一些人喊道：说得对。）我认为，正是布哈林同志显然还没有放弃的这种反革命‘理论’的残余在他的《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一文中发挥了作用。”（有些人喊道：对。）这就是斯大林同志就布哈林的文章向你们提出的第二点意见。

第三点意见：“不能把集体化政策归结为土地革命的概念，就

像布哈林所做的那样。不能够这样，因为这种‘手术’会抹杀集体化政策优于对农民实行的任何其他土地政策的主要之点。对我们党来说，整个问题的要害就在于这个区别，也就是说，就在于布哈林同志抹杀的这一点。这当然不是字面上的争论，这是关于提法的鲜明性和确切性的问题。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强大有力，就是因为他们从不忽视对鲜明性和确切性的要求。”第四点意见：“不能说经典和非经典的新经济政策。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使得问题复杂化并且会使人迷惑不解。新的提法是需要，但应该是由于有这个必要，能澄清概念，有明显的好处。如果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凭空臆造，那么这种提法就是有害的。布尔什维克不需要玩弄新提法的游戏。约·斯大林。”（有些人喊道：正确。）

你们看到，1934年的这场突然袭击，布哈林不是在他自己的学生的小集团中、不是在李可夫的住宅里、也不是在讨论留京纲领草案的时候发动的，而是在他担任主编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上发动的。这百分之百地是一场维护右倾分子观点的突然袭击，只不过是采取了隐蔽的、比较谨慎的形式罢了。谁也不会允许在我们党的任何一个机构里很公开地维护右倾分子的观点。但是须要动员一些人，给他们鼓劲加油，把他们拉回来同我们党进行斗争，为此布哈林提供了材料。（波斯特舍夫：他可真清楚他的人是在寻找什么。）这是为了他的亲信，也是为了那些对党的政策不十分清楚的人。（斯大林：相互呼应。）这是动员力量并且解释清楚：“要坚持，我们不会投降，我们要用不同于以往的另一种形式来继续捍卫我们的观点，我们要进行斗争。”这就是布哈林所说的内容。他并没有放下自己的武器。

当时我们对待这件事的态度还是宽容的。就这一问题斯捷茨基写了两封信，梅赫利斯写了一封信，斯大林同志表达了党中央政治局的共同意见并对此发表了看法，仅此而已。于是，整个事情就在

中央委员会内部结束了，以后也没有再谈起这件事。关于这一切布哈林同志是知道的。当时我们不想彻底揭露他。如果把这件事公开发表在我们的报刊上，布哈林早在1934年夏季就无法再当《消息报》的主编了。我们党内对他的任何信任也就荡然无存了。

让我们来看看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审判以前的最后一个时期吧。8月份，我们对托洛茨基分子、同法西斯盖世太保以及诸如此类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恐怖分子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政治审判，布哈林对这次审判却没有发表只言片语，你们难道不感到奇怪吗？对于像布哈林这样的作家来说，这种情况难道不奇怪吗？要知道，尽管托洛茨基分子已被揭露，布哈林却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反对他们的任何文字。他是否作过一些尝试呢？他是作过的。布哈林怎么能什么都不写而保全自己呢？他发出过一篇短文，后来又有一篇，不过都是一些根本无用的东西，不可能发表，它们彻头彻尾都是谎言。一个经验丰富的作家，他知道说什么，他当然是重复别人的话。要知道就连皮达可夫也用了诸如“头号匪徒”等等这样一些哗众取宠的字眼。可是整个基本内容、实质性的东西却使得我们无法下决心刊登。

就这样过去了6个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1月、2月；7个月时间里布哈林没有发表过一行反对托洛茨基恐怖分子的文字，因为这个时期他实际上在政治上是支持他们的。（有些人喊道：对！）我将给你们读一封给伏罗希洛夫同志的信。你们大家都已收到这封信了。我将给你们读一下布哈林对党及其领导人说了些什么。在审判结束之后，他给政治局委员、我们党的领导人之一伏罗希洛夫同志写了一封信。信是1936年8月31日写的。“请你们诚实地把问题摆出来，如果你们真的相信，那么就应当立即将我逮捕并处决，因为这样的坏蛋是不能容忍的……（有些人喊道：这说得对。）如果你们不是真的这么想而仍旧让我自由，那么

你们自己就是根本不值得尊敬的胆小鬼。”（波斯特舍夫：这些恶棍。）在审判过程中，托洛茨基分子这伙恶棍脱去了自己的伪装，他们供认：他们搞恐怖活动，他们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指出，布哈林是这些活动的参与者。我们——中央委员会——在工人阶级面前要承担起政治责任。我们想，让我们等一等，可能布哈林不是百分之百有罪的，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我们把他的签名留在《消息报》上。我们承担了巨大的道德责任，保护他，爱护他。而他在这时却说：或者是你们不相信这些供词，即认为审判是虚假的，或者你们就是不值得尊敬的胆小鬼。我们想挽救他、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来维护他在工人以及全体劳动者心目中的地位，而他却是这样报答我们的。这就是我们试图挽救他而得到的报答。由于我们过分耐心而打我们骂我们吧，不过我们还是想把问题弄清楚。

早在上一次全会上我们就已经有了足够的供词，但还是把这件事搁置起来了。我们决心要为迷路的人提供一条出路。哪怕他是有罪的，我们也要给他时间，让他承认自己的错误，抛弃错误，悔过自新，同这一切一刀两断。为此我们曾探索过各种途径。可他说的是什么呢？你们以为，布哈林没有这封信的副本，他就不会在需要的时候利用这封信吗？（贝利亚：他已经利用过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是怎么答复的？）伏罗希洛夫答复得相当好。我应当读一下伏罗希洛夫同志的答复：“致布哈林同志。9月3日。现将你的信奉还，你在信中竟敢对党的领导进行卑鄙的攻击。如果你想通过你的信来使我相信你是完全清白无辜的话，那么目前能使我相信的只有一点——今后要同你保持更大的距离，且不论对你的案件的侦查结果如何。要是你不以书面形式放弃你对党的领导所采用的那些卑鄙用语，那么我也将把你视为一个坏蛋。”（有些人喊道：对！波斯特舍夫：简单而明了。）

伏罗希洛夫同志作了恰如其分的答复，而且我们中间的任何一

个人无疑都只能把这样的信称之为卑鄙下流，除此之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说法。布哈林没有发表过一行字来反对托洛茨基恐怖分子，可是他却有一封反对中央的信；他在信中用粗野的语言大骂我们。布哈林是站在谁的一边呢？（有些人喊道：站在托洛茨基分子一边。）这就是明摆着的事实。不过，同志们，就算没有这一切，没有全部这些供词和其他材料，仅仅绝食这一件事，难道说还不够吗？（有些人喊道：对，对！）在中央全会召开之前，他写信说：我宣布完全绝食以示对诽谤者以及对由此而形成的气氛的抗议。仅仅这个事实就足够了，他自己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为。（米高扬：对！）除此之外还能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但是他总是装腔作势，他只对政治局谈这件事。我们则应当向整个全会报告这件事，宣读这方面的材料，而他只是对政治局委员讲。（波斯特舍夫：这么说他是有保留的，这个坏蛋。）是有保留的。他知道，托姆斯基的计谋失败了。大家都懂得他自杀的含义，可是谁都不怜惜托姆斯基的自杀。他看到这么做不起作用，那就换一种新方式吧。他是谦谦君子。看看他是怎样点头的，而当他忘记的时候就不点头了，他那里一切如常。但只要一想起来，就又点头了。（波斯特舍夫：真是受罪。）“可以把他带到全会上去。”你们看，他已到了什么地步了，原来说他不能来，后来又来了，一点都没有什么，发表了讲话……（有些人喊道：讲了两个小时。）他来了，讲了话，并且想怎么骂就怎么骂，自我感觉还挺好。（波斯特舍夫：他还把中央委员们称作是一群乌合之众。）

在宣布绝食之后过了两天，他就跳出来讲：我已经饿了4天了。哪怕看一下自己的信也好。布哈林真是一个丑角演员。而且是小地方来的演员。他想感动谁呢？要知道这不过是小演员的伎俩而已。这是一场绝食闹剧。难道革命者是这样绝食的吗？这就是反革命分子布哈林。（斯大林：算过没有，他绝食了几天？）据说，他第

一天饿了好长好长时间，第二天又饿了好长好长时间，就这样每天都饿好长好长时间。这就是布哈林的绝食闹剧。我们人家都吓坏了，处于绝望之中。但绝食结束了。他没有挨饿，而只不过是在演戏，他无疑是个扮演可笑角色的小演员，但具备演员的能耐。（斯大林：他为什么在夜里12点钟开始绝食呢？）我想，因为夜里是不吃东西的，医学不提倡夜里吃东西。

同志们，整个这次绝食是我们党内一件滑稽可笑的事。大家以后会说：这就是我们党内发生过的布哈林绝食的可笑事件。这就是布哈林竭力扮演的那个角色。这可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这都是为了同我们党作斗争。（有些人喊道：对。）他把一切可能调动的都调动起来了。就是那个库兹明在谈到他布哈林时说，他“既是右倾分子又是左倾分子，一身两任。”库兹明是对的，他根据个人印象对布哈林认识得很透彻。这个人确实是这样的，他反对列宁，但对马列茨基发表在百科词典上的那篇文章却只字未予反驳，那篇文章说布哈林是第一个阐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是布哈林，而不是列宁。布哈林没有只言片语来揭穿这个无原则的谎言，来揭露这种卑鄙无耻的行径，来揭露这种无原则的小人，因为他从思想上来说就不是我们的人，他是怀有异己思想的人。

如果说他过去还能扮演一个进行思想斗争的人的角色，那么他并不是站在我们的立场上，他所进行的斗争是反对我们的立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反对列宁主义、反对我们大家、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因此，他以可怜的表演结束了这场演出。他如同一只小小的青蛙，把肚皮鼓得胀胀地宣称：他既是理论家，他也是领头人，他还是领袖呢，可到头来却是一个扮演滑稽角色的演员。假如这种人还能从泥潭里爬出来的话，那就请赶快爬出来吧，放下武器，放弃这场卑鄙无耻的反党斗争。你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掩盖它的。现在，当你在全党面前已被揭露的时候，假如你仍继续搞这种无聊的拖

延，那么你将处于可笑的境地。

现在来谈谈李可夫。李可夫是个什么人，我们也非常清楚。在革命以前，我应当说——我先从个人回忆说起——我没有见到过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颇有影响的党务工作者；此人变幻不定，一会儿支持列宁，一会儿又支持托洛茨基，是一个见缝就钻的人。（斯大林：在1910年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克鲁普斯卡娅应当知道这件事——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结成了联盟，伊里奇处于孤立的地位。伊里奇只好前往伦敦，去了英国博物馆。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应当知道这件事。后来季诺维也夫去了伊里奇那里并把他所控制的报纸交给了伊里奇。）这是1910年的事，此后他在俄国。我在《真理报》工作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李可夫曾被流放到某个地方，他做过一些事情，我不记得他曾支持过我们。有一封署名为弗拉索夫（这是李可夫的笔名）的信曾刊登在孟什维克的报纸上，但是在《真理报》上没有登过李可夫的任何信件，也没有登过他关于支持党的任何声明。

革命开始了，召开了党的四月代表会议。李可夫反对列宁，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时，李可夫反对十月革命。我们解散了立宪会议，李可夫反对解散立宪会议。1920年，同托洛茨基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李可夫不断地掂量，谁是多数，谁是少数，最后才加入进去。当他看到托洛茨基失去多数时，他就抓住时机投票赞成列宁的意见。在后来的整个时期即右倾时期，他充当领袖人物，作了相当充分的表演。我们再接着谈后来的事情：他认了错，给他分配了新的工作。他在邮电人民委员部干了些什么呢？这是最乱的人民委员部之一。亚戈达说，那里的负责人和领导都搞过破坏活动。我们会检查和弄清楚这件事的。但无论如何这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制造灾难，这就是李可夫在邮电人民委员部留下来的东西。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工作进行得很好。他的工作做得糟透了。

这里谈的是具体工作。我们再来谈谈政治方面的问题。他曾经说过，他提供的供词是各种各样的。这是他的手法，把水搅浑。对于死人说什么都行——说他是敌人，是破坏分子，是领头人。这里还有什么良心和人格可言。（贝利亚：而他把活着的人称为疯子。）他把活着的人、把自己最亲密的助手涅斯捷罗夫称为疯子。涅斯捷罗夫给他当了10年的首席秘书，而且此后也一直和他在一起，这个人曾病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在生病前后所供认的内容是一样的。对这一点还要证实一下。

而现在施米特也招供了，施米特是他们最亲密的朋友，他本人了解他们所有的勾当。当他在莫斯科的时候以及后来一段时期不在莫斯科的时候，他都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从政治上支持他们。施米特所讲的一切都是针对李可夫的。然而他不打算承认自己的罪过和自己的错误。他持何种态度呢？我不打算讲事情的细节，不过只举一个例子。李可夫不喜欢写文章，涅斯捷罗夫以及那个拉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他们现在都供认出关于李可夫活动的事实。而从另一方面讲他则了解得更多。就拿留京纲领这样一个重大事例来说吧。依我看，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事例。（斯大林：这是所有托洛茨基分子的纲领。）对，这是所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也就是所有反革命分子的纲领。我将把这个纲领中最有代表性的几处地方念出来以证明斯大林同志刚才所说的话。现在我来援引所谓的留京纲领：“党内主要分水岭目前不是按‘拥护还是反对托洛茨基’……这条线来划分的……”（读）。

在纲领中联盟的中心思想百分之百地表达出来了：我们同托洛茨基的分歧是次要的事情；布哈林原先的那些主张也是次要的事情；主要的是要进行反对斯大林、反对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这些在留京纲领上签了名的先生，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托洛茨基分子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而

这些人则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留京纲领是用以下几点建议来结束的，他们提出的第一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号召……斗争。”（读。）当然，这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而作的小小的保留，而主要的是：推翻以我们党为领导的工人阶级专政。方针就是如此：同托洛茨基的分歧是次要的事情；布哈林原先的那些主张不必再重复；主要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反对工人阶级专政和联共（布）党，主要之点就是用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就是贯穿整个纲领的关键之处。接下去当然照例是：“立即行动起来！该结束张皇失措和胆小怕事的状态了……”（读）。

这就是你们看到的留京纲领。它谈的是什么呢？如果现在来听一下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讲话，又会得出什么结果呢？你们是否知道，布哈林曾证明说：“你们比较一下风格吧，这不是我的风格，就是说，这不是我写的。”结果却是相当令人尴尬的。我们就拿实际情况来说吧。6月初，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定于9月底召开中央全会的决定。是有过这样一个决定的。7月间，布哈林写了一份休假报告并于8月5日外出。留京纲领是在1932年6月写成的。在8月份之前，要议论和传阅和制定留京纲领，时间是相当充足的。不过发生了一件颇有意思的事，一个很重要的事实，这就是李可夫的行为。今天在场的同志中大多数人也都参加了在1932年9月底至10月初召开的中央全会，在那次会上读了留京纲领，谈到了这件事。全会通过了中央的决定，谴责这一纲领并要求，凡是知道存在这个纲领的人，统统都要把他们揭发出来，开除出党并交付法庭。于是就发生了颇有意思的事，同志们会回忆起来，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李可夫曾发过言。（有些人喊道：是发过言。）他公开表过态——

地枪毙发表这个文件的人。”（埃赫：他说过，他会亲自把这个人押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去的。）

这就是10月初在我们眼前发生过的事，那么宣读留京纲领的博尔舍沃会议是在什么时候举行的呢？他说，确切日期我不记得了。让我们提出两种设想吧。假定说，李可夫是先博尔舍沃会议上读过这个纲领，尔后才参加中央全会的。他在全会上发言说，他不知道这个纲领，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好像出了一个新文件，要是他知道有谁参与了这件事的话，他就会亲自把这个人抓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的。怎么会这样呢？把博尔舍沃会议说成是在那次中央全会之前举行的，这不大可信。那么这是在10月份以后举行的吗？这又不符合情况。假定说，这个文件对李可夫来说是新的，起码是在他做出要把当事人抓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的承诺之后才有的。（有人喊道：他说过，会议是在夏天开的。）一个诚实的人怎么能是这样的呢？怎么能够相信这么一个人呢，他在1932年10月当着我们的面发表了讲话，而到了现在，1937年的2月，又在撒谎，当面撒谎（喧闹声。），好像他只会撒谎。（埃赫：照俄国人的说法，这叫睁眼说瞎话。有人喊道：而且还掉眼泪呢。）两种情况下他都是个撒谎者，他已经不能自拔。

现在请想像一下布哈林的处境吧。布哈林在上一次全会上当着我们大家的面说过（速记记录中有），他没有听说过留京纲领，也不知道留京纲领的内容，只是斯大林同志拿给他看过，告诉他这就是留京纲领，他说，我很快地浏览了一下。（有人喊道：他没有读。米高扬：他不想读。）不过布哈林这个人相当（有人喊道：滑头）……那就请你们大家来鉴定一下吧，他从前是个什么人，现在又是个什么人——这很难鉴定。10月5日全会结束，10月7日布哈林就给政治局寄来一封信并署上“致共产主义的敬礼！布哈林”。信是这样开头的：“政治局。10月6日休假回来后，从李可夫的谈话

中大体上获悉了中央委员会全会秘密会议的情况，鉴于此，我认为应当作如下声明：第一，我不能不对某些同志提出抗议，他们在发言中提到了我的名字，尽管这种做法给我蒙上的阴影可能是微不足道；第二，不言而喻，我对反革命的文件以及全会上谈到的那个反革命组织的态度只能是一个（关于它们的存在我是在李可夫谈起秘密会议的情况时第一次知道的），——我同样认为，对此类令人憎恨的反革命文件所采取的简单的不报告的做法，就算主观上是由于极端轻率而造成的，客观上也是反党的滔天罪行……”

你们看，他用一封简短的信函便与这件事脱离了干系。可是李可夫向他讲述过文件，他参加了全会，本人还发了言，布哈林对这个纲领知道得一清二楚；在此之后他不止一次同李可夫会面——在1932年，1938年，他承认会过面。那么，当李可夫在博尔舍沃读过留京纲领之后，当他在中央全会上听说了纲领……之后，他怎么还不知道这个纲领呢。可是布哈林在我们面前公开说：我没有读过，没有听说过。（布哈林：关于博尔舍沃没有人说过一个字，请你们追问好了，绝对没有的事。埃赫：故事倒很新鲜，可是难以令人置信。）就拿布哈林的话来说吧，他在信中竭力坚持，说他听到过一点什么。可是后来，他又企图把他知道这个文件的情况说成是这样：他仅仅是从斯大林手中看到那个材料后才知道这个文件的，后来又在中央委员会里让他看了一下。（米高扬：斯大林给了他这个纲领，而一个中央委员却不想读，难道这不奇怪吗。可见，他以前是知道的。一个中央委员怎么会不想读这个文件呢。有人喊道：是他本人审订的。）这里找不出几个人是愿意相信布哈林的。（笑声。）

再来谈李可夫吧。我不想再多谈布哈林，布哈林的问题多多少少是清楚的。李可夫呢，他的虚伪、谎言、欺骗全会的企图是十分清楚的，就连在最近这个具体的场合下也是如此。现在的情况就是

这样。

布哈林在这个时候显得比较狡猾。1932年，尤其是1932年下半年，从一些派别企图崭露头角这一点来看，是最尖锐的半年。在这个时候，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正在谋求建立最牢固的联系，正在商定进行恐怖活动。这个时候在博尔舍沃托姆斯基家里正聚集着一伙人，他们正在讨论留京纲领。这个时候，8月或9月，斯列普科夫正在莫斯科召开青年代表会议。布哈林虽然知道这些事情，知道这个文件，却在1932年6月外出远行，到帕米尔去了。所有这些事实就是如此。

行了，同志们，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人的政治面貌和政治活动之后，对我们来说，情况就完全清楚了，这几年来，这些人不是设法靠拢党，而是在这段时间里先在表面上发表声明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布哈林：不对。）这是我们所能了解的最起码的东西。皮达可夫这个破坏分子曾对我们说：“不对”；拉狄克、科夫希茨、谢列布里亚科夫也说过：“不对”。他们都不承认，而我们就相信了他们。人们不相信这些人竟会走到这种犯罪的地步。即使到了今天，许多人还在给自己提出问题：不可能吧，难道说这些人会走到这种地步，他们可是我们党内的人，曾在我们党内担任过最重要的职务；他们熟悉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很好，他们落到这种地步是不可能的。

不过，同志们，我们知道，在这方面对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所持的看法也完全适用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有些人喊道：对。是的，是的。）他们也曾经是党的著名活动家，并且与列宁共事多年。当他们跟我们党在一起的时候，也确实深受劳动人民的尊敬。他们耍阴谋，施诡计，背离党，暗中袭击党和列宁；近几年来他们又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背后插刀子。不过人们还是实在不能相信，事情竟会走得

如此之远。

同志们，这就是说，我们正在进行一项非常重大的事业；就是说，我们的斗争是相当尖锐的；就是说，赞成共产主义还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问题，是我们时代最根本最尖锐的问题。（有些人喊道：对，对。）就是说，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这对劳动人民来说确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诚然，为我们在我国取得的成就可以不胜惊讶，可以欣喜万分。但是，同志们，不论我们苏联取得的成就有多么伟大，不论我们近期来在我国国内获得的成果多么丰硕，毕竟还是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还是有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或多或少是用自由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苏联的；他们是不希望走我们的道路的。

须知还有美国，那里目前还没有杰出的共产主义者；还有英国，还有法国，在这两个国家里新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了，不过那里还正在进行尖锐的斗争。依然没有一个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最终放弃了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在他们身上仍然充满着社会民主党的精神，暂时还依然故我，站在与我们不同的立场上。如果有些人从一次次动摇转而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转而建立自己的骨干队伍；如果他们对党的政策、对列宁主义的敌视态度由一些单独的行为转变为长期的斗争；那么这些人便是无可救药的。这些人是无可指望的。这些人不是同无产阶级在一起，而是同资产阶级在一起。他们会选择另一条道路。一些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虽说他们是相当杰出的工作者，读过马克思主义并且看到了我们拥有的全部成就，然而为什么他们不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呢？（斯大林：他们还写过不少见闻录。）这些人确实是似乎能够颇为出色地从事这项事业的，可是他们终究没有脱离资产阶级，没有脱离资本主义。他们之所以没有断绝这种关系，是因为他们不信仰共产主义，是因为他们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是因为他们同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主制或者说

同法西斯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这一点现在已十分清楚了。（梅口劳克：无疑是法西斯分子。有人喊道：对。）

不过，既然右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不是所有的，而是许多的）现在对我们说：不错，我搞过破坏活动，我们从事过恐怖活动，我们曾经往工人用水中下毒，我们曾经在车间里用瓦斯毒害过工人，（是有过这样一些事实，他们现在还在讲这些事情，）就意味着这些人已经完全同工人阶级、同我们党、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断绝了关系。就意味着他们是另一个阵营的人。如果有人要脱离这个阵营，有这个勇气，并想到他还能给工人做点什么的话，那么对此我们已经作了相当耐心的等待并采取过各种措施。不过既然你们已经开始了反党斗争并且走上了公开的反革命道路，那么我们对这样一些先生就只能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了。（有些人喊道：对。鼓掌。）

有人提议宣布休会至晚上6点（有些人喊道：对。）

№03451

联共（布）中央全会
2月25日晚间会议的会议记录
(1937年2月25日)

莫洛托夫：现在由加里宁同志发言。

加里宁：同志们，关于李可夫、布哈林搞恐怖活动的问题已经说得面面俱到，非常透彻了，因此在我看来没有理由再来讨论那些分发给中央委员的材料了。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和莫洛托夫都已作过分析，认为再就这些材料进行评述，就是重复。因此，我仅就布哈林活动的两个具体事实谈一谈。首先，谈一谈他给中央的书面声明。当你阅读这份声明时，会发现里面含糊其词的地方比比皆是，证据材料纯系伪造；不仅如此，他还常常要嘲讽别人，对每一件事他都有所保留：“我不想这么说，这件事本不该是这样。”但当时形成的气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使他处于一种特殊的境地。然而当你将声明通篇读完之后，它就会给你留下这样一种印象，这个人在向许许多多的个人和部门泼脏水，甚至把侦查工作本身、提供证据的人以及中央都涂得一团漆黑。

在这里，当人们打断布哈林的讲话，高声对他说道：你是在玩弄律师的把戏时，布哈林说道：“怎么，不可以吗？我在这里的处境要求我为自己辩护。”我认为，大概冲他喊叫的同志们也会认为，当他们指责布哈林玩弄律师把戏时，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布哈林不该为自己辩护，问题并不在这儿，而是说布哈林在为自己辩护时使用的是一个不论是非曲直都得为被辩护人开脱的律师采用的手

法，尽管他当事人的案子是完全没有希望的。（有些人喊道：说得对。）这位律师施展种种手段，使出浑身解数，对他来说，不管被辩护人无罪还是有罪都必须证明他是清白的，所以律师就要想方设法来施加影响。这里，如果布哈林能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央采取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就好了，那样他或许会这样提出问题，这里包括两方面：一方是中央，另一方是布哈林。而事实上，说老实话，这里所有中央委员的发言都很激烈，而且找不出一个不用猛烈的言辞来抨击布哈林的人，难道说每一位中央委员都不想让布哈林从这桩案件中清清白白地解脱出来吗？（有人喊道：他怎么解脱出来呢？波斯特舍夫：有点儿晚喽。）

我要说的还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全会之所以拖延了整整一个月不能结束，原因就在于此，大家原以为或许会有什么新情况。而对我们布尔什维克来说，您自己也十分明白，在苏联每出现一个新的敌人就是一个负数。难道不该这样说么？所以人们的确都真诚地希望能少一些对他们的指控，但与这一愿望相反，指控简直就如同山崩一样扑过来。布哈林的策略——无论反映在他的声明中和讲话中，还是表现在他的行动中——就是一味地抱定与中央作对的路线——“一概否认”。他还以绝食的方式来求得他的这一路线的彻底实现。结果，绝食成了笑柄，我觉得这是咎由自取。但我们还是真诚地审查一下。为什么我们如此审慎，要进行审查？为什么我们对您不信任？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多次被您愚弄，因而不想再被您愚弄了。（笑声。柯秀尔：我们当时也不想被愚弄。）你们读读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安德列耶夫同志宣读过的所有材料后就会明白，大家不知反复掂量过多少次：唉，可以解脱的，教育教育就算了，无论如何是可以教育好的。但结果却是白费力气。（柯秀尔：看来他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家伙。）

不错，看来他就是这么一个家伙。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不能再

受愚弄了。正是这种不想再次受愚弄的愿望要求我们进行细致的审查。同志们，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终究是高于一切的。如果布哈林在这里，在最近的一次全会上能采取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那么在我看来，他自己的声明（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就应该循着这样的思路去写，他应该说：“同志们，我在这些或者那些方面犯有错误。”将事实逐一摆出。“这些情况我记不清了，那些东西属于胡说八道。帮帮我吧，帮帮我布哈林吧，请告诉我，我怎样才能爬出这个肮脏的泥潭。”对于一个有过变节叛党这一严重经历，又对党采取过重大敌对行动的共产党员来说，如果他还想与党一道工作，这是他惟一的一条出路。

现在还不是谈论我们要在思想上对我们的学生负责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他们组织了恐怖活动，他们在实践上领导了这一场斗争。因此，布哈林应该在自己的发言中集中抨击这一点。然而，我们并没有听到布哈林和李可夫这样去讲。布哈林玩弄的律师把戏就表现在这个地方。现在请大家类推一下。如果布哈林在他的党内生活与个人生活处在最绝望的时刻向中央递交了这样的材料，说出这样的话，采取了类似绝食这样的政治行为，那么他在同自己学生的谈话中又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我们至少应该把他的一切策略伎俩都放大十倍。该不该如此呢？（柯秀尔：大致如此吧。）此后再说什么木人不知道学生到哪儿去了，那就太可笑了。毫不足怪，政治规律就是如此，对学生们来说别无选择。如果大家把所有这一切事情拿来与布哈林最近的行为进行一番类比，并将他的这一行为与对学生们的态度相联系，自然不会有别的什么选择。（柯秀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李可夫说，所有拥护布哈林的人与党所展开的斗争，都不会是没有缘故的，无风不起浪嘛。这话说得对。也许那里的浪比风还要大。李可夫的发言从本质上讲是承认错误的。当然，对个别会面、个别会谈，可能会说法不一，可能会被推翻。但是，当我们对两次

谈话进行评定时，哪次谈话在那一时刻发生过，我们就同哪次谈话进行类比。如果某次谈话是得到了证实的，比如与科托夫的谈话就属于这一类，而另一次谈话是未能得到证实的，如与乌格拉诺夫的谈话，其说法就该同与科托夫的那次谈话相一致。李可夫否认与托洛茨基分子有联系，否认自己搞过恐怖活动。但在我看来，对此最有说服力的反驳是别洛博罗多夫的供词，供词说别洛博罗多夫并非偶然与李可夫相遇。显然，偶然相遇的事是可能的，但问题在于给李可夫和别洛博罗夫牵线搭桥的是巴胡托夫。请想一想，同志们，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要进行这次会面，而且是约定的会面呢，为什么急于与别洛博罗多夫相见呢？

这次会面绝非一次偶然的相遇。是李可夫约定了这次会面，巴胡托夫——也是一位有名的右倾分子——参与安排了这次会面。于是，当我们得知以李可夫为代表的右倾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所说的那样，与托洛茨基中心的最高首领们有联系时，我们对这次会面就要另眼相看了。此外，托洛茨基分子不仅谈到这次会面，还谈到了从前谈到的事情。我个人认为，别洛博罗多夫在这里的供词是真实的，他不能不讲实话，他没有必要作伪证。如果我们哪怕还有一点政治头脑，那么单单是为了打招呼问候，为了无足轻重的会面，李可夫是怎么也不会想到要与别洛博罗多夫这个来自托洛茨基分子方面的（在审判前）最令人厌恶，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家伙进行这次会晤。李可夫与他见了面。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它一下子就说明了问题。它说明所有那些供认李可夫搞过恐怖活动的他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冤枉他。李可夫在这一问题上是无法逃脱的。他无处藏身。他逃脱不了干系。应当直截了当地发问，李可夫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想与别洛博罗夫会面，出于什么样的用心他要与巴胡托夫商定这次会晤，又是为什么巴胡托夫和其他陪同李可夫的人员落在后面，让李可夫走在头里，使李可夫与别洛博罗多夫俩人面对面地单独交谈？

仅根据这两点事实——布哈林在全会上的所作所为和我前面引述的那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他们是有罪的（我所说的有罪不是指像他自己所说的要在政治上对自己的学生负责，那不过是些老生常谈，尽人皆知的东西，人们都听腻烦了），而且他们的罪过就在于他们本身就是参与者。就我个人来说，是不愿意看到党的队伍里出现这样的“参与者”的。对党来说是一种耻辱。你们会理解这一点的。不过，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事实胜于雄辩。事实是无法回避的。现在，在我面前，人们提出了如何处理的问题。我认为，事实本身已经向中央委员会指明了应该怎样去处理。（施基里亚托夫：究竟怎么处理？）没有旁的选择。（施基里亚托夫：这是避而不答。自己提出问题，却又不作回答。）没有必要回答。回答这个问题的应该是维辛斯基同志。

莫洛托夫：现在由卡冈诺维奇同志发言。

卡冈诺维奇^①：同志们，尽管党中央的上次全会已经开过近两个月了，但在本次全会上布哈林和李可夫还是未能提出一星半点稍有分量的证据来为自己辩护。他们还是重复那些空口无凭的否认、言之无物的声明，说什么请相信我们，要么就是企图捕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偶而出现的形式上的矛盾，以此来为自己辩护。既然你自认为是正确的，是无罪的，那就应当到全会上来，首先摆一摆在自己有生以来的整个斗争过程中表现突出的积极活动的事实，摆一摆自己坚持正确的和有原则的政治路线的事实。这才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他们没有这样做，却老是说：“我不是我，马也不是我的。”^② 这并非偶然。

① 根据未经校对的速记记录稿发表。

② 这是俄罗斯的一句谚语，用来否认与某些人有关系，或借故推托表示与某事无关。

之所以说并非偶然，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有的只是他们消极的活动事实，这些事实已完全被他们以往的每一个同谋的供词所证实。他们的这些同谋都无一例外地证实，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从1928年即右倾反对派形成之日起到1936年，实际上是一个非法新党即反革命党的领导核心。这个党与其他反革命组织结成同盟，它有自己的纲领，并根据各个时期的不同需要将其改头换面，使之适应要求。

在我看来，纲领问题是一个基本问题。但是，在谈这个基本问题之前，也就是在谈他们如何在实践上为实现自己的这一纲领而斗争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来谈谈布哈林同志发表的两个声明，他把这两个声明作为为自己辩解的主要论据加以引证。这就是所谓的索柯里尼柯夫和库利科夫的两份供词中的矛盾问题。

布哈林同志说，索柯里尼柯夫在审讯中声称，右倾分子仅仅是保持接触，而在对质时他却又说，右倾分子后来加入了联盟，参加了联盟的中心。我询问过维辛斯基同志并看了审讯的速记记录。审讯的速记记录上写的是1932年。的确，在对质记录中有索柯里尼柯夫的声明，说在1932年曾试图建立联盟，让右倾分子加入到统一的中心中来。右倾分子当时只同意保持接触，拒绝加入到这个统一的中心中来。但到1935年时，他竟代表新的中心开始与托姆斯基进行谈判，而托姆斯基——一开始说他本人不能给予答复，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他代表李可夫和布哈林表示同意加入中心。这些在对质的记录中和索柯里尼柯夫供词的笔录中都有记载。

在法庭上须要就1935年的情况审问索柯里尼柯夫，因为索柯里尼柯夫根据托姆斯基的声明判定布哈林和李可夫参加了，当时在法庭上的正好还有与布哈林有直接联系的皮达可夫和拉狄克。显然，维辛斯基同志已经就1935年的情况询问过拉狄克，但没有询问过索柯里尼柯夫。这样说来，你们看，没有丝毫矛盾嘛。索柯里

尼柯夫在庭审前的审问记录中的供词与他在审问中的供词是一致的，与他在对质时的证词也是一致的。

再来谈谈库利科夫的矛盾。布哈林一口咬定，库利科夫在供词中说他企图对斯大林实行恐怖行为，而在对质时又说是对卡冈诺维奇搞恐怖活动。这个说法不准确。这有一份关于对质的材料。对质时库利科夫供认：“两天后我再次去找乌格拉诺夫……（读。）……在公园的旁边”。顺便说一句，这种在街上会面的习惯在关于布哈林同志的许多记录中是常常看得到的……（有些人喊道：说得对！）或者与阿斯特罗夫，或者与其他人。“我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讲述了自己的情况……（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声色俱厉地责备我拖延……责问我们有没有过硬的骨干。”后来，在对质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承认他确实询问过库利科夫关于骨干的问题……（读）“应该将他干掉”。“情况是这样吗？”他盯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问道。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对质时，如斯大林同志曾在这里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对托洛茨基分子供词的反应通常是十分激烈的，动不动就斥骂他们。而在这里，面对着库利科夫直视着他的目光，他没有否认。布哈林没有否认，而是回答说：“我要把一切都说出来”。这难道不是刚好证实了库利科夫的供词吗？（有些人喊道：正是。）

我问过库利科夫，1932年你在我那儿还表示过忏悔，这么说你当时是在耍两面派啦？库利科夫回答说：“是的，我要两面派，而且甚至也对你耍了两面派”。伏罗希洛夫当时问他，你们为什么要谋害卡冈诺维奇？库利科夫答道：“与要谋害斯大林一样，是为了使领导层失去带头人。”还有什么呢？大家都看见了，无论记录中记载的，还是对质中供出的，证实的都是同一件事。在库利科夫的供词中根本找不出布哈林说出的矛盾，即库利科夫在记录中说他企图谋害斯大林而在对质时又说他仅是要谋害卡冈诺维奇。我可以

再读几段供词，库利科夫在这里不止一次地证实他与布哈林交谈过。布哈林本人也打算承认自己同库利科夫作过几次交谈，承认自己做错了。他是这样讲的……（读。）……“我相信他刚才说的话。”（米高扬：这是布哈林说的？）是的，在对质后说的。“但是我坚决抗议”……（读。）

附带说一句，谈到“策划”及其他问题，我想提醒诸位，还是在就基洛夫同志被害一事举行第一次庭审时，加米涅夫就曾讲过同样的话。他确切的说法是这样的：“我与此案毫无牵连，既未参与策划，也未付诸行动”。而现在布哈林也是这样说：“我是无辜的，既未参与策划，也未付诸行动。”他还说：“我所能够做的只是试图说明怎么会产生这样的看法，库利科夫怎么会想出这种事情来。”

米高扬问：“你否认在亚历山德罗夫公园旁边的那次会面？”“对这件事我想这样来解释……（读。）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一方面当有人在这里质问布哈林：“对于1932年乌格拉诺夫集团表现出的一些过激情绪您是知道的，对吗？”他的回答是：“是的，我知道。但是我把这些过激情绪理解成了要开展某种运动。”“您有没有把这种过激情绪看做是要进行恐怖行动？”“没有，我没有把这看做是要搞恐怖行动。”这就是说，他一方面声明，1932年他到乌格拉诺夫那里劝说不要采取过激行为时，对过激行为的理解是开展一般运动；另一方面，当他与库利科夫对质时，他却干脆说：“我所能做的只是试图说明”，并解释道，他们分道扬镳了，他并没有发过指示，而在乌格拉诺夫集团内部可能产生过搞恐怖活动的情绪。斯大林同志插话：“干得巧妙”。的确干得巧妙。他说，我们中心没有卷进去；而当他们落网时，他们会说，我们都没错，有错的是扳道工。然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普通的扳道上的问题，他们无论如何也是那些本来要采取行动的人。

伏罗希洛夫问道：“库利科夫为什么会产生你所承认的那种情

绪呢？”布哈林避实就虚地回答道：“我说的绝对是实话，我头脑里从来不曾产生过搞恐怖活动的念头。”难道这是对问题的严肃回答吗？“1932年我确实在乌格拉诺夫居住的那条胡同里见过库利科夫……他握住我的手……（读。）确有其事……我甚至还流了泪。”（有些人喊道：为什么流泪？）为什么事，无人知道，为什么流泪，无人知道。“我摊开双手说：有什么法子？他说，没有法子，必须采取行动。库利科夫就是这么对他讲的。我把他教训了一顿，问道，你们的靠得住的人都到哪儿去了。我们从没有使用过‘恐怖行动’一词。”（有些人喊道：使用的是“杀掉”、“干掉”。）是的，是的。这就是我在教训人时讲过的靠得住的人的思想。也就是说，第一，他们1932年会过面，库利科夫要求采取行动，而他为此表示难过，流了泪。然后问靠得住的人都到哪儿去了。（洛佐夫斯基：流泪是因为没有靠得住的人。）问题不在这儿，洛佐夫斯基同志。犹杜什卡们常常也会流泪的。（有人喊道：这在谢德林那里有很妙的描述。）不知道为什么感到难过，他是否在为行动的结局感到难过，感到左右为难呢？是否在为库利科夫要求他采取行动，而他又难于做出决定而感到难过呢？因为这无论如何是很危险的。在一份记录上他承认，乌格拉诺夫集团存在着更为极端的打算。他们分道扬镳了。库利科夫要求采取行动，他问道，你们的靠得住的人都到哪儿去了。（布哈林：您搞混了。）他有意做扣儿搅混水，企图使我们搞不清。但在我们看来，事情很清楚，库利科夫要求采取行动，要求实行恐怖行动，而他是赞同的。

接着叶若夫向布哈林发问：“你认为1932年与库利科夫有可能谈过话……”（读。）布哈林回答说：“我当时还同党作过斗争呢。”我这是按照速记记录读的，此事发生在1932年。这就是说，他讲他1932年与党作过斗争。一方面这个人声明……（布哈林：您读的是一份未经订正的速记记录。在使用速记记录之前，应该先进行

校对。)我们甚至可以凭着记忆就能复述出来,因为像这样的对质是不常见的。况且,我们去听这次对质并不是为了一睹您的尊容,而是为了得到证实。您不要以为政治局委员们除了去听对质就没有旁的事情可干了。他是这样说的:“我当时还同党作过斗争。”奥尔忠尼启则问他:“这件事发生在1932年。一些事情你还能清楚地记得”……(读。)布哈林马上支支吾吾起来……(引用记录。)显然,他是在向您施加压力,可您却还是对他表示了赞同。这就是库利科夫在对质时所供认的东西,以及我所作的简要引述。

同志们,你们由此可以看出,布哈林的声明、他找出的所谓矛盾破绽,在这儿就好像是孩子们用纸牌搭成的小房子一样,一碰就散架子了。他的声明没有什么内容。结果,布哈林没有在这里、在全会上回答与1932年谈话相关的实质性问题,没有在这里、在全会上清楚而有条理地谈一谈自己1932年对乌格拉诺夫都说了些什么,交谈的内容是什么,对库利科夫说了些什么,交谈的内容是什么,1932年你同党进行了什么样的斗争,——对所有这些极其重大的问题布哈林都避而不谈,没有回答任何问题。相反,他却企图抓住一种虚构的矛盾破绽,搬到这儿来当作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一条论据,奉为至宝。

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所有证词的。实际上,布哈林和李可夫在自己的报告和讲话里并没有就1932年、1933年和随后几年间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倾向、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路线做出实质性的回答。他们只字不提他们是如何看待党的政策、如何同那些对党的这一政策和实践持有异议的人进行辩论和斗争。他们也只字不提那些企图从背后向党、向工人阶级捅刀子的乳臭未干的罪犯是如何在他们的羽翼下成长起来的。从本质上说,关于这些问题,他们什么也没有交待。他们所采取的立场只有一个,这就是恶意攻击所有证词。所有证词都被指责为不实之词。对阿斯特罗夫的供词、斯列普

科夫和艾亨瓦尔德的供词、扎伊采夫、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等人的供词，也就是说，他所有学生和整个所谓莫斯科小组的供词，布哈林都给否定了。你们会发现，这些学生没有一个还留在党的队伍内。这也不是偶然的。（米高扬：好一个老师啊。）他就是这样一个老师。（有些人喊道：有其主，必有其仆嘛。）

李可夫也否认他的整个小组的供词。我还会专门谈到李可夫小组的几名最重要的成员的，他们是斯米尔诺夫、埃斯蒙特、托尔马乔夫。李可夫否认涅斯捷罗夫的供词，称他是一个疯子；否认拉金的供词；否认阿尔乔缅科的供词，阿尔乔缅科曾是忠于他的。这一点我们都是知道的；他当然也否认施米特的供词。瞧，诸位也许会说，阿斯特罗夫、斯列普科夫以及其他青年派分子，尽管他们已不那么年轻……（有些人喊道：他们已是40岁的人啦。）就当他们还是年轻人吧，我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可是他却否认施米特和乌格拉诺夫的供词……你们怎么样，想不想在全会上把施米特和乌格拉诺夫描绘成这样的一些大坏蛋？他们甚至在被捕后和招供时还连你们带自己一块儿诽谤了呢。他们是恶棍，用不着我们来为他们辩护。这是一些坏蛋、恶棍，是一些身在中央却与中央作对、身在党内却与党作对的家伙，但我们毕竟对他们了解，他们曾经是与你们十分接近的人。这些人都是些重要人物。施米特毕竟曾经作过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人民委员；你们的中心成员乌格拉诺夫毕竟曾是你们的顶梁柱；当你们开始组织右倾反对派时，你们曾指望莫斯科的组织跟着你们走。你们当然打错了算盘。（波斯特舍夫：说得对，说得对。就像季诺维也夫指望列宁格勒人那样。）跟你们走的只是一小撮脱离了党员群众的人，而你们却还曾对他们有所指望，可是现在他们粗暴无礼地否认了一切。

乍一看上去，这些都再简单不过了，人嘛，总是要为自己辩护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要我们给予他们以人道的理解，——请你们出

于人道，体谅一下我们的处境吧，等等，等等。然而实际上，同志们，这是——我在这里正想谈一谈——这是敌人玩弄的新伎俩……（有些人喊道：说得对。）企图对所有供词进行恶意攻击，企图恶意反驳几十个人的供词。然而无论在哪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这些人进行审问，他们的供词都是相同的。当然，总的来讲，他们当中也可能会有个别模棱两可、与事实有出入的地方，但在中心采取了搞恐怖行动的立场和1932年中心领导了留京纲领的起草工作等事情上，他们的基本倾向是供认不讳。所有的人都供认，中心起初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签订了保持接触和互通情报的协议，后来，中心加入了联盟，中心教唆自己的人采取两面派手法，这是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供认不讳的。

应该说阿斯特罗夫给我们全体政治局委员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很有能力、非常理智的人，你怎么也不会像李可夫称呼涅斯捷罗夫那样，把他也说成是个疯了。这个人在我看来是诚实的，他发觉他们已经跌入万丈深渊，所以我们无论从供词中还是在质对时，都会感觉到他们对布哈林的愤懑和怨恨。教育他们的是布哈林，将他们推入这深渊之中的也是布哈林，可是布哈林本人现在却在声嘶力竭地指责他们，说“你们这是一派胡言，是在给我栽赃”，责骂他们是诽谤他人的小人。然而不是别人，恰恰是阿斯特罗夫作证说，那还是在1929年，——你们读一读证词就会看到，那人就是眼前的这个布哈林。阿斯特罗夫是这样作证的：“1929年春，斯列普科夫对我说，就在他对我讲此事的那天早上，布哈林去了他那里。接下去他又说道：你是了解布哈林的，他是一个有话就说，有什么新念头就会迫不及待地全盘托出的人。我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读。）现在我弄明白了，这种念头一直都折磨着布哈林。”

这事发生在1929年，而在1931年和1932年，布哈林就已经

在直接地向阿斯特罗夫和其他人发号施令了。他说，应当干掉斯大林，应当杀死斯大林。（布哈林：纯粹是捏造，百分之百的诽谤。）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听你说过这种话了。（布哈林：而我还要反复说，还要说。）请吧，就当在全会说，也好让全会既听听您的，也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应该对问题的实质进行分析。光是凭空反驳，您是无法使任何人感到信服的。应当以事实服人。我们就是在以事实来使人信服，而您却任何事实也拿不出来。（有人喊道：只有诽谤。）1930年，在波克罗夫-斯特列涅沃的斯列普科夫别墅举行了一次会议，布哈林参加了那次会议。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他教自己的人如何运用两面派手法，并对前景作了说明。他说：“1930年春，第三次粮食征购运动将要进行，这对斯大林的党的领导来说将是一个最严峻的春天。”他说，到目前为止，农民的粮食已经被夺走，而现在这些农民正被组织到集体农庄中去。

看到了吧，这就是利用集体农庄问题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典型的社会革命党人提法。你们尽可以捶胸顿足地矢口否认说，你们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同社会革命党人订立同盟，但在意识形态上、在纲领上你们与他们是一丘之貉。“右倾组织的任务，是团结自己的骨干，为将要到来的那一时刻作好准备……（读。）他说，另外还要打入领导岗位，这样就容易搞到情报。”对你们来说，这就意味着当你们钻进中央委员会之后，搞情报就方便了。阿斯特罗夫说，这是为了搞情报容易些，而且继续奉行这种两面派策略的正是党内那些人，更何况布哈林和李可夫在中央委员会里还能够经常参加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怎么会得知党内生活的最新情况呢？你们，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列席政治局会议，却成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情报员，成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情报员。（波斯特舍夫：成了叛徒。）阿斯特罗夫还供认，1932年在斯列普科夫被捕之后，他还曾与布哈林会过面。“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逮捕的一切

情况都告诉了布哈林……（读。）我把这看做是执行组织中心的指令。”

这样一来，你们就会看到，1929 年谈起指令，似乎还是遮遮掩掩的，而实际上已经是直截了当的了。到 1931~1932 年间，无疑已经是直截了当地下达指令了。至于以后的供词，至于 1933 年的事情，至于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斯诺夫斯基等人，就无须多说了。他们拒不承认这些供词。但我们应该从政治上来看问题。如果从政治上看问题，那会有什么不同的呢？如果你们在自己的右倾组织内部通过了采取恐怖行动的方针，搞暴动的方针，那么在实际中你们怎么不去扩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增大自己的机会呢？你们怎么会不在实际中去与他们结为同盟呢？你们怎么能不与他们携手并肩地行进呢？这里逻辑是完整的和无懈可击的。而供词也是有重要依据的。就以施米特的供词和对质来说吧，这是至关重要的。他们每个人都是很严肃的，所有的供词都是重要的。这不是一个偶然谈及某人的供词。党对任何一份供词都要进行分析，哪怕只有一份。然而，我们在这里听取的是几十个人的供词，特别是听取了施米特的供词。

施米特供认，早在 1930 年就出现了恐怖主义情绪。证实这一说法的，不仅有涅斯捷罗夫，还有拉金、阿尔乔缅科——顺便说说，正是这个该死的阿尔乔缅科，还供出了他曾与另外一些人一起组织了对政府机构的监视活动。你们可曾知道，这可不是右倾分子随便说说，从阿尔乔缅科、涅斯捷罗夫、拉金的供词来看，这可不是就恐怖话题随便说说。肯定不是的。这是有组织的活动。这不，施米特就在这儿，施米特、乌格拉诺夫和库利科夫的供词在这儿，你们如何躲得过去？你们哪有藏身之处？这些供词你们怎么能回避得了，他们盯着李可夫说：是的，正是你向我们下达了这样的指令。你们中心，即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确定了恐怖活动的

方针。因此，请大家想一想，李可夫在对质时怎么能不哑口无言呢？还是来读一读对质时的对话吧。他当时只提了一个问题：我参加过这次会议吗？施米特回答他说：是的，你参加过这次会议。另有一次，在施米特供认讨论留京纲领一事时，李可夫问道：“我参加过这次会议吗？”施米特答道：“是的，你参加过”。李可夫似乎还想狡赖，但当施米特开始陈述后，他一下子跳了起来说：“噢，我曾把这……”（斯大林：谁？）留京纲领叫做“梅德维捷夫纲领”。这也就是说，一方面李可夫提出了疑问，似乎他并没有参加过这次会议，另一方面他又承认他讨论过这个纲领，他参加这个纲领的讨论。

这些供词你们是回避不掉的。事情是你们干的，人是你们的人，你们栽培了他们，你们驯化了他们，你们教唆他们，你们在政治上怂恿他们，而现在你们却推说他们在说气话。布哈林称涅斯捷罗夫是个疯子，对施米特则更不知该怎样定性才好。你们对所有供词都矢口否认。

顺便说一件事，提起这些生了气的人，我们便不能不讲到布哈林同志写给谢尔戈同志的便条。布哈林在这里面暴露出自己卑鄙无耻的特点，他还利用谢尔戈的名声进行投机。当全党都在为谢尔戈而哭泣，当人们还在为谢尔戈举行葬礼，当全体人民都在痛苦地为他举行哀悼的时候，布哈林却发现了一条利己的道路，他迫不及待地干起了卑鄙的内奸勾当。他利用了谢尔戈——我们一位故去同志的名字。此事绝非偶然，他是想以此来表明自己与谢尔戈关系密切。我们大家都知道，也可以从数十份速记记录中看到谢尔戈的极其尖锐的批驳。昨天，我刚刚读了其中的一份——埃斯蒙特和斯米尔诺夫案件是个非常严重、非常重要的案件——搞恐怖活动的案件。请不要忘记，我们决不会饶恕你们。而现在您却要利用谢尔戈的名字进行投机。您怎么不知道为自己的厚颜无耻而感到愧疚呢！

他给谢尔戈同志的便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谢尔戈，请允许我溜掉儿夫”……（读。斯大林：此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应该是在1932年。便条上面没有署名日期。（有人喊道：比这还要晚点。）在1933年，1933年底。（布哈林：蔡特林是在1933年底被捕的。）这事发生在夏天。看到了吧，布哈林还在为蔡特林辩护。

蔡特林因为什么缘故生气呢？您在这件事上面是为蔡特林辩护的呀。（布哈林：蔡特林责怪我没有为他辩护。）您与蔡特林同伴、同吃、同睡，他是您最忠实的朋友，对您绝对忠诚的人。是什么原因使蔡特林要生气呢？在此之后，蔡特林被释放了。也就是说，蔡特林能够估计到他之所以获得自由，是因为您为他说了情，帮了忙。那么，蔡特林有什么理由还要生您的气呢？您又为什么要声称他生气了呢，难道是为了诋毁他的供词吗？（布哈林：因为我这样才能向您证明此事如同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明白。）

另外还有一个事实。这里有一批被逮捕的科学院工作人员，顺便说一下，布哈林可以在科学院工作中显示一下他真是一个在动员非党学者支持党的人。但他没有这样做。（布哈林：那巴甫洛夫呢？）巴甫洛夫？我们会弄清巴甫洛夫的事情的，现在先不说这个。是这样，在那里被逮捕的有一大批人，原来他们都是一些恶毒的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分子，这伙人原本就是被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纠合在一起的。从他们的个人角度讲，他们非常同情布哈林，喜爱布哈林，千方百计地拥戴布哈林，不遗余力地吹捧他，同时还在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组织内效力卖命。当他们这伙人尚未被抓起来时，布哈林曾经千方百计地庇护他们。而当这个学派被粉碎之后，布哈林又将他们召集到研究所，即科学院内对他们进行教育。（斯大林：甚至连马列茨基也去了。）马列茨基只是一个副手。布哈林以合法的身份培植这第2个学派。布哈林为这个学派撑腰，参加这个学派的有：谢迪赫、科舍列夫、布瑟金、瓦西里耶夫、比比科

夫、季尼扬斯基。

布哈林给科学院副院长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和戈尔布诺夫院士寄过一封信。请允许我把这封信读一下。（有些人喊道：读吧。卡冈诺维奇读信。）大家可以看到，对“胆小的”这一术语，他既从右的方面也从左的方面来使用。如果需要，将来可以从科学院请人来讲这里面的矛盾。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带有这种观点的先例：就是这个受布哈林庇护的布瑟金曾向许多同志散布说布哈林是个好人，是个杰出的同志，还是这个布瑟金又供认说布哈林曾同他进行过反苏的谈话，说布哈林知道他们有恐怖主义情绪。（布哈林：完全是尤中生有。）卡列夫是一个陷得很深的托洛茨基分子。您也是知道的，当着您的面，卡列夫曾供认说，你们曾经谈论过党的政策是错误的，把中央骂了一通，还处心积虑地破坏党的领导人的威信。当时您在哪儿？对于这些您从前学生的供词，您又作何解释呢？还有一份曾在我们的编辑部工作过的卢克尼茨基院士的供词。（布哈林：在哪个编辑部？米高扬：您知道他在哪个编辑部。）他是在《消息报》编辑部。（布哈林：他从未在《消息报》做过事，他与我同在科学院工作过。有人喊道：他本人知道自己在哪儿工作过，让他本人讲嘛。）卢克尼茨基供认：“1936年2月或4月，在莫斯科布哈林的办公室里，即普希金广场的《消息报》编辑部里，我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布哈林在这次谈话中尖刻地批评了党的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同志。”（布哈林：天哪，我的天哪。他只是带来了他自己写的一本书，再就没说什么。莫洛托夫：您以后再来说这些吧。）这是一些与您的学派没有联系，完全来自另一方面的人，他们也都证实确有此事。您自己在对质时也承认您与索斯诺夫斯基谈过话，谈到了处境困难，您受到攻击，遭受迫害。（布哈林：我没有说过遭受“迫害”，但讲过受到攻击的话。）攻击也好，迫害也好，反正是一回事。从各方面来讲，与您过从甚密的人都证实说您同一些人

抱怨过中央的政策，同另一些人谈起并直接下达过搞恐怖活动的指令，而您现在却在这里企图把事实说成是大伙儿都对您进行诽谤。难道您想让我们相信您的鬼话？

同志们，我认为李可夫和布哈林在这里左一个声明，右一个讲话，死皮赖脸地为自己证明，说什么人们都是诽谤他们，他们是清白的……（施基里亚托夫：他们才是集诽谤之大成者。）这是在玩弄一种新的策略。不要忘了，皮达可夫、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利夫希茨以及所有其他被我们审判的人，事实上都只是交待了一些已经败露了的东西。（施基里亚托夫：是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东西。）被揭露出来的是已经无法再遮掩的东西，他们把大量的不可告人的东西带入了他们那龌龊的坟墓。（有些人喊道：说得对！的确如此！）这不是偶然的，现在，我们把他们枪决了之后，才发现加米涅夫把自己搞间谍活动的秘密和他与某些大国进行谈判的秘密，以及他与间谍之间的联系，都一同带到了坟墓里。季诺维也夫也是如此。皮达可夫把许多秘密和许多人的情况都带进了坟墓。利夫希茨是个恶棍，我还将专门就他的问题作个报告。他带走了大量还没有交待的交通部门的情况，因此，在我们把他们枪毙之后，交通战线又冒出了一些损毁和破坏活动。然而他们的策略就是这样，只交待那些已经被揭露出来的东西。现在看得很清楚了，交待出来的这些东西没有挽救他们，也挽救不了他们。我们把他们都枪毙了。

现在布哈林和李可夫在采用另一种策略，一种敌视的策略：即矢口否认一切，诋毁证词，而且，正当一位英国律师，一个自由派律师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证明根据这些证词完全可以构成有罪判决的时候，正当部分资产阶级报刊，尤其是法西斯分子想方设法要说明和证明这些证词都是暗中安排好的时候，布哈林却在这里声称：“他们用鼻子嗅出来这里指供的是我，他们对相关的问题做出了相应的回答”。一大串哑谜，一大串的暗示和声明向我们表明，我们

在这儿正在与诋毁证词的一伙人打交道，然而这些证词是无法用事实加以推翻的，因为事实对他们是不利的。于是，他们便在这个问题上转而祭起了敌对的策略。

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事实是：1930年一个组织，一个恐怖组织，即索尔莫沃的斯米尔诺夫的恐怖组织，乌格拉诺夫的组织被揭露了出来。他们从此事得到的第一信号是：“放弃此事”。1932年又揭露出另外一些恐怖组织，两个恐怖组织——一个是斯列普科夫的组织，另一个是斯米尔诺夫和埃斯蒙特的组织。政治局对此问题作了讨论，这是有记录的，他们受到了警告。但这些警告并未能起到作用。埃斯蒙特—斯米尔诺夫恐怖组织是第一重要的恐怖组织。这个恐怖组织在亚速海—黑海边疆区有自己的重要小组，因此别洛博罗多夫现在供认说，他与李可夫指定索契为实行谋杀的地点，这并不是偶然的。别洛博罗多夫的计划与埃斯蒙特、托尔马乔夫、斯米尔诺夫、米罗什尼钦科等人的计划是吻合的。米罗什尼钦科当时证实说，“我们的方针，我们的顿涅茨计划就是要搞暴动。但是，由于不知道事情能否成功，我们就将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实行恐怖行动上”。

这就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无法使他们回心转意和洗手不干的事实。斯列普科夫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这是不是事实？这是事实。布哈林能推翻这个事实吗？他并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他只是说他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不过至于他是否参加了会议，也许后面将会谈到。这是事实。在托姆斯基的别墅里召开过一次会议——不管是在喝得醉醺醺的情况下召开的，还是在没有喝醉的情况下召开的，总之是开过一次会议，会上讨论了留京纲领，这是李可夫在这儿承认的事实吧？无疑，这是事实。你们怎么能躲得掉这些事实呢？

我认为，核心问题是留京纲领，它能向我们提供理解右倾分子

全部策略的关键，它能向我们提供理解统一联盟的关键。施米特供认，4月份开过一次会。他说，我们需要一个纲领。当时需要做出一个结论。参加这次四月会议的有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决定了要起草一个纲领，会上为起草纲领拟定了提纲和方针。8月份，在托姆斯基的别墅里搞了个聚会并就这个纲领进行了讨论。10月份党的中央全会讨论了留京纲领问题。可是李可夫无论是在中央全会上，还是在中央全会之后，无论是在对质中我们追问他时，还是在上次全会上，他一次也没有谈起过哪怕是读这份纲领时他也在场。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只是偶然地在对质过程中与施米特发生争吵时说出了这件事。

布哈林声称，只要能够根据文章风格等证明这份纲领是他写的，那事情也就算了结了。然而我们并不是孩子，同志们。我们认为，这个纲领在技术上究竟出自哪个人之手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我可以从其他方面，即与这一问题无关的方面举几十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道理，比如有时坐在那里执笔写作的是我们，而向我们口授的是斯大林同志。他虽然没有动手写，但他在指示我们该怎样写决议、报告书、各种各样的文件等。请原谅我举了这样的例子，作这种类比，但这也纯粹是进行形式上的类比。情况就是这样，问题在于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对起草这个纲领发了指示，拟定了提纲。（布哈林：我没有拟定任何提纲。）而纲领的出笼则是后来的事情了，它出自留京、斯列普科夫或其他什么人之手，这无关紧要。问题的症结不在技术上，而在于本质。难道留京纲领与您1930年、1931年、1932年的立场有什么本质差别吗？它与您的立场难道不一致吗？（布哈林：绝对不一致。）不，是一致的。

同志们，如果你们还没有忘记右倾分子自1928年以来所采取的立场，如果你们能仔细地读一读布哈林起草的这份右倾分子的纲领，你们就会确信留京纲领从总体上讲与右倾分子的立场是完全吻

合的。回想一下所谓农业衰退的言论吧。回想一下所谓的农民动摇吧。回想一下自由贸易的口号吧。回想一下优先支持个体经营的口号吧。回想一下取消对富农的一切限制的口号吧。回想一下取消富农的个人所得税的口号吧。（波斯特舍夫：军事封建剥削。）回想一下关于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声明吧。如果把眼前的留京纲领拿来读一读，你们就会发现，它的渊源完全是那些论点。什么农业衰退，生产下降，他就是这样描绘的。这里面甚至还说对农民的掠夺，这倒比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的说法要温和多了。显然，他们是不想因引用对农民实行军事封建剥削这句话而使布哈林露出马脚，所以才用了“掠夺”这样一个较温和的字眼。

要求优先支持个体经营，解散强制建立的集体农庄，这种话难道我们没有在你们的纲领中——你们三人的纲领中——听到过？你们在那个纲领中都讲了些什么？你们当时扭扭捏捏地说：“我们并不反对集体农庄，但应该解散不必要的国营农场，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强制实行集体化或者至少要取消一切有可能导致强制集体化的措施。”你们想一想这一切，想一想你们关于取消对富农的非常措施的要求，而当时面临的问题是——要么我们战胜富农并为工人搞到粮食，要么让富农战胜我们。你们想把自己的纲领说成是偶然事件。留京纲领就是从你们所有的要求中概括出来的东西。当然，留京纲领中也有新东西。那是你们从1932年的全部实践中归纳出来的东西。

你们，布哈林和李可夫，参与了同加米涅夫的几次谈判，你们与加米涅夫就结为联盟问题进行了谈判。稍后，于1932年，留京纲领便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必须联合一切力量，问题不在于托洛茨基与布哈林之间存在不存在分歧，而在于要同斯大林进行斗争。现在请把你们散发的那份传单拿来读一读吧。你们现在读了它就会看到，你们在同加米涅夫谈判时对党的制度、党的状况、苏维埃国家

的状况所作的评述都毫无遗漏地被留京纲领吸收了进去，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复述了一遍。在政治局讨论皮达可夫声明的会议上，不是你们说在我们的党内有监狱、有囚室吗？这难道不是写入留京纲领的那些字眼吗？

我再说一遍，如果布哈林不想避而不答的话，他是无法回避这一点的，即从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以及口号的本质上和纲领的提纲上看，留京纲领都完全出于你们自1928年起所采取的立场，所不同的只是你们根据反党斗争不断加剧的需要，作了某些调整，使其更加充实而已。为什么你们对此缄默不语？你们以为我们是些孩子吗？我们在这里聚会，难道就是要讨论谁、在哪里、在哪一条街上、通过哪个门、乘坐的什么车、与谁会面吗？我们感兴趣的是政治。你们为什么不涉及这些实质性问题呢？那是因为你们无法否认这是你们的纲领，你们制定了这个纲领，你们组织了恐怖活动，你们与加米涅夫一起向季诺维也夫建议组成了那个自1928年到1936年始终存在的联盟，它毫无疑问是一个法西斯式的联盟。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既然你们把党描绘成监狱、囚室，既然你们把国家描绘成对农民的军事封建剥削，那么由此就会得出任何相应的结论。

你们想把这个问题说成是由于天真而偶然地出现的一次失误，——“我的失误是偶然的，我与党一道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可是后来我却偶然地退却了。”然而情况并不是这样，您在这里跑不了的。这也不是偶然的。相反您与党一道同托洛茨基进行斗争的那两年倒更像是偶然的。如果撇开那两年不谈，我们会看到您还剩下什么。您与党的斗争，既有关于民族政策问题的，也有关于工会问题的，既有关于国家问题的，也有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的，然后跳过您与托洛茨基斗争的那几年，结果就是，您与托洛茨基斗争的那两年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波斯特舍夫：

况且他们还在为这个偶然事件而感到悔恨。)他们自然会感到悔恨。

他们同托洛茨基作了斗争，而且还是与党站在一起进行的，这件事是个偶然事件，也存在一些错误，提出了类似“发财吧”这样一些口号，中央对此进行过谴责，等等。他们那时摇摆过，但毕竟还是与党一起进行斗争的，在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时他们与党走到了一起。但在此之后，他们又开始推行反列宁主义的政策，同我们党的列宁斯大林委员会又展开了斗争。(有些人喊道：说得对。)为了避免人家说我空口无凭，请允许我在这里引证几个事实。同志们，要知道我们最关心的是问题。有证词，而且除了证词外还有客观事实。要知道，布哈林不能总是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应该懂得这是有客观标准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谈这些客观标准，这些客观事实。

布哈林和李可夫在发表声明之后，承认自己的错误之后，他们又是如何为党奋斗的呢？他们有什么样的行动，有哪些事实可以推翻证词呢？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这样的事实，但我们却有，我们有足以使我们证实所有证词都是真实可信的客观事实。下面我谈的就是这些事实。首先是有关组织方面的事实。1931年——我不再提1929年的事情了——他与加米涅夫进行了谈判。1931年——加米涅夫与李可夫进行了会谈：应当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讨论一下形势。关于这个问题李可夫对党一直守口如瓶，只是在过了6年之后才将这件事吐露出来，向我们吐出了骨头——瞧瞧，我是个坦率的人，我本可以不说的，但我说了。1932年，托姆斯基与季诺维也夫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极为热烈地会面。季诺维也夫在教育人民委员部自己的办公室里主持了会谈，其中谈到国内形势严峻，需要好好议一议，等等。1932年，斯列普科夫分子召开了代表会议。

在结束这一话题之前，请允许我稍稍扯得远一点。布哈林在声明中说：“我没有参加过斯列普科夫分子的代表会议，但参加了讨

论留京纲领的会议”。这是一种策略，我想用几件事证实我的说法。1928年，当共产国际讨论他涉嫌的台尔曼事件时，他溜了。布哈林没有参加。1930年，召开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对那次斗争进行总结时，布哈林没有参加。（波斯特舍夫：是的，是的。）您可能以为我们把您没有参加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事情早忘在脑后了；您是个头儿，您无疑是一个头儿，您怎么能够撇下托姆斯基，让他说几句玩笑话和俏皮话就敷衍了事？您怎么可以撇下李可夫，让他必要时甚至一声不吭，而自己却急忙躲到克里米亚去呢？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哈林一直住在克里米亚。1932年，斯列普科夫分子召开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布哈林筹备的。（布哈林：您凭什么这么讲？）凭供词。但是布哈林没有亲自到会。布哈林这次没有参加会议难道是偶然的？您随便同什么人讲都行，但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经验的，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而现在您又该对扎伊采夫的失言吹毛求疵了。主要根据。扎伊采夫说：领导我们代表会议的是布哈林，但我记不得他是否出席了那次代表会议。再说留京纲领，中央全会讨论留京纲领。布哈林当时到哪里去了呢？布哈林没有参加会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波斯特舍夫：他爬出去了。）是的，是的。

1936年，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分子受到审判。作为中央政府机关报《消息报》的主编，他这时在哪儿呢？他离开了莫斯科来到帕米尔的某个地方，这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是什叶派的真主们把他召了去不成？无论怎样，总要离莫斯科更远一点，这样就无法将他召回来，即使有意召他回来，他也可以找借口，乘飞机怕飞机失事，乘火车怕火车颠覆，总是可以找到借口的。正如你们看到的，讨论留京纲领时，他不在场。他真是个可怜的人，从帕米尔回来后就不得不通过李可夫来了解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留京纲领的情况。之后，他自己写了报告。这就是策略，同志们。这是一种

既胆怯又狡诈的策略。这是间谍采用的策略，这是一种目的在于不露痕迹的斗争策略。

1932年，在托姆斯基的别墅里举行了一次聚会，宣读了纲领。诸位来看一看，看看李可夫在这儿是怎样说的，他试图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幼稚无知的人。请看一看他是怎样描述这次聚会的：在别墅里，我喝得醉醺醺的，我被叫到了另一间屋里。而在供词中他却说走了嘴，供认说他们读的就是这个纲领。而这次他却又说，他们对我讲要宣读一份工厂的材料。真会有相信这种鬼话的怪人。他们说，有人在工厂里拾到一份传单，要读一读。十分清楚，你们在托姆斯基别墅里宣读的就是这个纲领。全会是在10月份召开的，在托姆斯基别墅的聚会是在8月份。你们在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就读过这个留京纲领，你们不仅读过，还对它进行了修改，作过指示。施米特在供词中就说过：“李可夫表示，要对太露骨的地方作修改，托姆斯基说，这可以放在以后再去润色，但是这个第二部分写得非常精彩，紧凑，有恐怖的味道。”他们需要这么一个能够将所有反党、反苏维埃国家的力量纠集起来的纲领。然而布哈林，这位主要首领之一，此时却不在场。他们说，就别让首领到场了，这个时候还是让他留在帕米尔吧，我们可以参加聚会，万一出现什么风吹草动，我们就把留京抛出去，反正他是不会出卖我们的。

1932年，埃斯蒙特、托尔马乔夫及其他人的案件。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与此案有直接关系。你们会发现，在留京和斯米尔诺夫案件之后，以及讨论留京纲领的时候，托姆斯基和布哈林都不在场。托姆斯基和施米特到纳尔奇克打猎去了，布哈林也不在。只剩下李可夫一个人——那就让李可夫来消灭痕迹，假装忿忿不平地说，这个纲领太不像话了，是个白卫军的纲领，就他一个人来为我们所有的人撒谎吧。1932年，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这两个托姆斯基家的常客常常与他会面。这一点从供词中可以看出。

1934 年，托姆斯基和季诺维也夫在托姆斯基的别墅中见了面。托姆斯基和李可夫就走还是不走这个问题出了些主意。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上次的中央全会上作过发言，并将之说成是同一组织的两个领导人的主意。肯定就是这样。你们很容易就会想象出托姆斯基在别墅里同季诺维也夫都说了些什么。李可夫竟能把在托姆斯基别墅中的聚会说成是一种全无恶意的与世俗百姓一样的会面，但他甭想蒙谁。顺便说一点，他本人在讨论埃斯蒙特—斯米尔诺夫案件时还曾讽刺过别人呢，当那些人试图将自己的谈话说成是并无恶意的市井凡人的言语时，他还讥讽地对他们说：哦，可不是嘛，如果是两个党员在一起聚会，那可就不是为了家长里短而聊闲天了，而是要谈政治了。可是现在李可夫却对我们宣称，在那里所做的就是闲聊天。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季诺维也夫和托姆斯基当时就在那里，经他们策划，你们的实际策略在留京纲领的基础上变得更加明确了。

1935 年，李可夫与托姆斯基仍保持联系，李可夫曾到过托姆斯基的公寓和别墅。1936 年，托姆斯基与李可夫多次会面，托姆斯基向李可夫讲述了他曾被召到中央去的事情，情况是如此这般，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当然，他们商量了对策，这是无疑问的。这就叫做“忠于职守”吧！

他们工作得如何呢？托姆斯基在全苏化学工业联合公司工作得如何我们是清楚的。托姆斯基在国家图书杂志出版社联合公司工作得如何？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里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李可夫在邮电人民委员部工作得如何？人们已在这里就此作过报告，而且我们还将就此进行详细的分析。布哈林工作得如何呢？布哈林自己是如何表现的呢？（有人喊道：两面派。）布哈林除了这些行为以外，他还有一系列的讲话，从他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开始，他在那里总是千方百计地要弄出点什么名堂来。在那儿挑起过论战——这里我不想详谈这个问题——辩论的是关于对改造的理解，他在谈到

对我国经济的改造时，只字不提阶级、富农、政治，而仅仅是从技术角度来说明改造——竟有这样的新技师、工程师，——他偏离政治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只从技术的角度谈问题，不想去涉及政治。

在第十七次全苏代表会议上他作了发言，他在我们的生活里找到的惟一一处不足是实验室里的工作搞得很糟。你们还记得他发表的那个耍两面派的演讲吧，美中不足的只是实验室。而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早在1932年他就在与党作斗争了，他在关于农业中的刺激因素问题上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上我们懂得什么是刺激因素，你们的一切争论难道不都是围绕着什么是刺激因素而进行的吗？要么是资本主义的刺激因素，要么是社会主义的刺激因素。你们主张的是搞自由贸易和发展富农经济的可能性的刺激因素。这就是你们反对集体化、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出发点，你们主张的是自己的刺激因素。这就是他1931年到1932年在关于刺激因素这个小问题上所持的不同意见。而在全苏代表会议上，只要看看他1932年的讲话，就会发现，他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也是耍了两面派手法的。他说：“我拥护党，我发现的惟一缺点就是实验室”。而与此同时，他却在自己策划恐怖活动的实验室里为实施谋杀党的领导人的恐怖行动而在给炸弹装药。（有些人喊道：说得对。）

最后，再来看看他的文章吧。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在这里引述过他的一篇文章，我所要说的是他发表于1935年11月7日的一篇总结性文章——《革命的一年与我们的敌人》。这篇文章中存在着许多混乱和许多错误，而且他在论述中农问题时说，中农不再是摇摆不定的力量了。这话是在我们的集体农庄得到全面发展的时候讲的。他不去谈机器制造业是我国经济的中心，黑色冶金业自身就是一切。他不去讲重工业是我国经济的基础，却说什么我们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他还有一篇论述选举的文章，我们曾在中央组织局对他

的这篇文章作过相当精心的分析。他在文章中声称，第七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是集体化就要取得胜利或者说已经取得胜利的首次代表大会。而这正是我们在第六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所得出的结论，当时我们的集体化就已经站稳了脚跟。他对我们国家的理解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混乱的。最后，以1935年11月7日的《消息报》为例。我已经说过，斯大林同志曾就这一天的报纸写过专门的批示，非常详尽地分析了报纸所载文章的缺点和大的错误。

我应该说，在这一天的报纸上发表了尼古拉·莫罗佐夫的一篇文章。从欢庆节日的角度讲，发表这样的文章真是驴唇不对马嘴，但现在看来，此文是另有所指。他在这篇题为《尼古拉·莫罗佐夫请教马克思》的文章中叙述说，马克思是赞成民意党人的活动的，其中包括恐怖主义活动。隔了两行，他又讲述了民意党人是如何准备1881年的恐怖行动的。为什么在11月7日的报纸上要登载尼古拉·莫罗佐夫的文章呢？他说，他是想用通俗的语言来介绍一下老民意党人。对不起，您错了，这是在向恐怖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发送信号。这不是偶然的。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些漫画吧。请看，这是最耐人寻味的东西了，老实说，我也只是今天才看明白了画中的意味，或许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新的角度吧。这里说的是布哈林的那篇题为《革命的一年的几点总结与我们的敌人》的文章及这样一幅插图——不知道报界的人士如何来称呼它：伟大的佛来米派画家勃列伊克格伊姆^①的一幅未完成的巨大的巴比伦塔，互不理解和互相敌视的民族，鼓动人们搞无政府主义并煽动内部仇视的神秘的暴动信号。（有人喊道：这个坏蛋。）看到了吗？这就是革命的一年的几点总结与我们的敌人。瞧，巴比伦塔画在这儿并配上这样的说明。这说明的含义是什

^① 原文如此。

么难道还不明白吗？文章本身就完全是用法西斯报纸上搞下来的东西拼凑而成的，只不过是作了某些修补而已。

总之，布哈林不知道从何时起，成了偏爱援引法西斯报纸的人了。（斯大林：进行宣传。）他援引法西斯报纸，只是略作一点批驳。顺便说说，在莫洛托夫同志今天评述过的几篇文章中，布哈林试图阐述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审判案一事，但他在这些文章中所写的依旧是那些关于法西斯分子的废话，驴唇不对马嘴，我们没法将它们发表出来。（布哈林：是你们对我讲要发表关于纽伦堡代表大会的文章的。）研究所有两部著作——我不想将所有这些人都牵扯进去：苏联科学院的《回忆列宁》，这部厚厚的文集是为纪念列宁逝世10周年而出版的。这部文集曾有一个前言。这篇前言后来没有发表，中央报刊部不准那篇前言发表，而是另写了一篇。然而，那篇前言正是由布哈林直接审订的。（布哈林：那不是我写的。）是谁写的，没能查清，但它是布哈林直接审订的，他为这部文集而感到自豪，将它分送给我们每个人，好像在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一样。

下面就是那个前言中的一段话：“在我们这个资产阶级反动时代即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神秘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列宁的学说……”对不起，能把我们的时代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时代即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和神秘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吗？目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取得胜利的时代。难道可以把我们的时代说成资产阶级反动时代即法西斯主义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吗？在一部学术著作中这么写，难道是偶然的吗？难道是偶然的失言吗？拉狄克——布哈林的那个基本论点是不是又在这里被偷偷地塞了进来？拉狄克曾在受审时就此作过发挥，说什么法西斯主义正在取得胜利。（布哈林：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这又不是我写的。您这到底是怎么了？）您为此曾像为自己

的全集一样感到骄傲。这无疑反映了布哈林和拉狄克一样，也把我们的时代理解为法西斯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其结论是，法西斯主义还占统治地位，法西斯主义还在进攻，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是法西斯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因此应当对法西斯主义俯首贴耳，应当与它和解。（布哈林：天哪，您这是怎么回事呀！随您说吧！）不对，不该说“您这是怎么回事呀”，而应当找一找自己的思想根源，即使您想用空泛的总结来反驳也好。

同志们，我以为从1928年起，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就其整个思想和所有观点来看，滑到他们目前这一步田地那是必然。事物的逻辑就是这样，历史事件的逻辑就是这样。如果你执迷不悟，如果你试图动员力量，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力量跟着你跑呢？只能是法西斯主义的力量，敌人的力量，恐怖主义的力量，而且你要为他们引路，不管你是否是这样打算的。（有人喊道：说得对。）布哈林的追随者库兹明曾对布哈林作过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评论，他在供词中声称：不错，他说，我是你们的敌人——莫洛托夫同志已经在这里引用过这句话。接着，库兹明谈到了布哈林，他说：“我对他有这样一个评语：确切地说，他自己都不知道，……（读）……应该去夺权，还是应该去狩猎。”（笑声。）库兹明所作评论的原话就是这样。虽然库兹明是他的学生，但这话还是能够说明布哈林这个人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夺取，还是应该去狩猎。然而，这个评语决不会减轻这个人所造成的危害。

他既左倾，又右倾。当瑟尔佐夫—洛米纳泽左右倾联盟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他们站到了哪一边呢？布哈林既同情左倾分子，又同情右倾分子，所反对的只是党、只是中央、只是斯大林同志。还是看一看布哈林在一次对质中是怎么说的吧。斯大林同志问布哈林：“列宁在世时，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你是主张让局势更趋紧张呢，

还是主张让局势更趋缓和？”布哈林回答道：我当时主张缓和。布哈林说，我认为遵循列宁的策略党就会毁灭，所以我当时表现得非常激烈。他当时的表现激烈到什么程度呢？你们都知道关于领导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要逮捕列宁的事吧。（布哈林：那还是从我这儿得知的呢。）这是各种文件不止一次地提及的一个事实。（布哈林：而您所说的恰恰相反。）好吧，就算是从您那儿得知的，知道你们企图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去逮捕列宁并建立一个以皮达可夫为首的新政府。（布哈林：不对，不对。）这是您自己讲的。（有人喊道：是他自己这样发言的。）他发言的速记记录和他本人的笔记终究是可以援引的。我们知道布哈林当时进行了很激烈的斗争。

同时他还是个恬不知耻的人。是个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恬不知耻的人，而且他也真做了。1927年他曾亲自对我讲过——我已记不得是因为什么由头，当时我对他谈起了波格丹诺夫，我说列宁把波格丹诺夫调离了中央——“您知道吗，您这个人太天真了。波格丹诺夫是个非常能干、很有意思、颇有才干的人，但列宁不喜欢、不能容忍有才干的人，所以把他驱逐了出去。”布哈林可以否认有这回事，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这话是他讲的。我这里所讲的是他在对待列宁态度上恬不知耻的一个典型例子，而我们则是把列宁看得很神圣。布哈林还以同样恬不知耻的态度来对待中央委员会，对待斯大林同志，甚至唆使那些恶棍去反党，准备搞暴动，搞恐怖活动，反党。

不错，所有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不错，他们都不过是些可悲的小走卒，他们投身于反革命的营垒，指挥反革命分子。好在党取得了胜利，好在党有这样的领导，好在他们在我们的面前扮演了背叛者的角色——一切都还不错。然而作为胜利者的我们，施舍宽容的时间太久了。（有人喊道：说得对，说得对！）不能总是这样。不错，可以也须要宽容，何况这样做与其说是宽容，毋宁说是一种政

治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我应该说，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无论是对待李可夫、布哈林还是对待其他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他们多次讲，我们都是一道工作过的人，甚至斯大林同志还经常对我们说，我们太热衷于追查问题了，应当试一试让这些人留在党内。

今天，在 1936 年，我们公布了这些我们想象不到的卑鄙龌龊的勾当。1936 年以前，我们没有想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竟能堕落到如此地步，尽管我们将他们屡次开除出党，也未曾想到皮达可夫、利夫希茨和其他人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想象不出他们究竟会堕落到何等地步，然而在 1936 年，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了这一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从今天起这种宽容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将这些人从我们的党内清除出去，应当对这些人继续进行侦查，因为，即使在他们的背后没有什么势力，他们自己也会成为敌人的，我们应当清除他们，以便消除这些人对我们的危害。（掌声。）

№03453

联共（布）中央全会
2月26日午前会议的会议记录
(1937年2月26日)

安德列耶夫（会议主持人）：现在开会。请奥新斯基同志发言。

一方面，当我听了米高扬同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发言之后，当卡冈诺维奇同志抢了我的最后一块面包之后，当我听完了这些发言之后，我认为，我未必能说出什么有新意的东西，而且我觉得继续讨论这一问题未必合适。但是可以说是贝利亚同志、波斯特舍夫同志等人主动把我叫上了台，既然承蒙中央委员会如此关心我，我决定发言——或许不无裨益。

说实在的，为什么有人在茹柯夫发言之后会突然想起我并提出让我发言呢？（柯秀尔：我们早就对您感兴趣了。施基里亚托夫：我们甚至还记得您，早就对您感兴趣了。）看来，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既然茹柯夫是李可夫的副手，那么一提我的姓名大概就会联想起布哈林的姓名来，因为我们当年都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首领，然后又一起在《消息报》编辑部里工作过，两个人都是科学院院士，布哈林和我目前都还是院士。（有人喊道：目前还是党员呢。）因此我就谈谈这三个方面，而且我觉得在这些方面足以明确我对问题的态度，例如对布哈林的评价，我大概还能补充一些有益的细节，因为我非常了解他，对李可夫则不然，我与李可夫从来未有过私交，——我们完全是不同类型的人，并且不可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我先谈第一个方面，那将是一些对历史的回忆，但这些回忆可能是不无益处的。

我与布哈林之所以一起成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首领，是因为早在革命前我们就有深厚的友谊。我们在同一个时期一起开始为党工作，当时一起在党内做了许多工作……（有人喊道：只是因为这个缘故吗？）一同坐过牢，顺便说一句，我们的政治立场非常接近，因为我在革命前就是现在通常说的“左倾分子”，而布哈林也是这样的人。后来发生了革命，于是在我们已中断交往相当长的时间——布哈林侨居国外，而我则奔波于俄罗斯各省，几次被流放——之后，我们又见面了，这种友谊得到了恢复，而且我最初对这种友

谊寄予厚望。我对这种友谊很感兴趣，我想它一定会带来什么结果。其实带来的只有一个结果：在最初的一年半中我们一起参加了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正如我现在可以非常明确、十分坦率地说的，不是什么好结果。（笑声。）正如当时列宁谈到我们时宽容地说的，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号幼稚病，因为民主集中制是二号幼稚病。

这是非常宽容的定语，我们由于害了这些“幼稚病”，无疑给工人阶级带来不少危害。我们的“幼稚病”使工人阶级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此外这种幼稚病给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增添了力量，为工人阶级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鼓了劲、开了路。（瓦雷斯基：列宁把你们叫做疯狂的小资产者。）是的，瓦雷斯基同志，他好像也是这样叫您的。（笑声。瓦雷斯基：我当时不是这样的人。至少我赞成布列斯特和约，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整个乌克兰都知道。）那就是说您发病还要稍晚一些，是在鼓吹民主集中制的时候。（笑声。）

1918年底或者1919年初我与布哈林在政治路线上分道扬镳了。我们分手是因为布哈林走的路应当说比我正确。我在左派共产主义者收场后又走上了民主集中派的道路，而布哈林则向党的领导、向列宁靠拢了。在靠拢过程中他也犯过大错误，常常摇摆不定；如大家所知道的，他与列宁在民族问题和工会问题等上都争论过。但我仍然应该客观地承认，我在后来的一段时期所犯的错误要多得多。如果说我们就这样分手了，绝不是出于我的政治品德，那么至少这种分歧是相当大的，而且从分歧的方式本身来看也是如此。我记得，在列宁逝世后，我退出了民主集中派，当时我拿定了主意：对我来说，这已经够了……（施基里亚托夫：真诚了一阵，够了。）我给党造成的困难够多了，尤其是我们失去了我们杰出的领袖……（有人喊道：说得对。）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因此对党的事业要有充分的责任感，于是经过极其长时间的争论，

经过极其长时间的说服后，我与当年那些民主集中派的同志断绝了关系。

我们的争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第一，关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应当说，我一直支持这一观点，甚至当我还是反对派时也是如此，而且主要正是由于这一点我才脱离了反对派。其次是关于我们这里是否有热月的问题。而第三个问题是——是否能与托洛茨基结盟。在所有这三个问题上我们断然分手了，但是分手是经过非常充分的辩论之后，是堂堂正正、郑重其事地分手的。至于布哈林离开左派共产主义者，那么正如他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所说的那样离开的：不知为什么“悄悄地溜掉了”，而我们毫无察觉——为什么离开，怎样离开的，关于这一点他没有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谈过。这就使我与布哈林的关系变得冷淡起来。（波斯特舍夫：他确实是悄悄地溜掉了，没有打一声招呼。）

现在我想指出下面一个使我们的关系越加冷淡、分歧越加严重的情况。这就是我们之间在理论问题上出现的深刻分歧。这对评价布哈林的这一方面大概将是相当有意思的一页。应该说，早在革命前我就是“左派分子”和召回派分子，但我从来不是前进派分子。从理论上讲，那时也好，左派共产主义者活动时期也好，我从来都拥护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我学了马克思的著作，并且当我读《资本论》时，对马克思的方法进行了深入思考。对我来说，唯物辩证法尤其宝贵，甚至可以说它是神圣的原则。早在革命前，当我就这一题目与布哈林谈话时，我发现布哈林并不这么看：我发现他非常尊敬波格丹诺夫。而马克思主义和波格丹诺夫是两种不能相容的东西，如天才与暴行不能在普希金身上并存一样。

革命后，1918年，当我们都还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时，有一次我与布哈林不知为什么事争论了起来。我在谈话中提到唯物辩证法。布哈林就此对我说：“那么请你告诉我，什么是辩证法？这不

过是故弄玄虚。辩证法无非是能动地提出问题，从运动发展和变化的观点看问题的方法。这就是辩证法，这里没有必要故弄玄虚。”我气坏了，回答他说：“不是这么回事，资产阶级理论提到的一般的发展公式与辩证地提出问题之间有巨大的差别。这个差别首先在于，辩证法是通过矛盾和对这些矛盾的解决来发展。”这些话布哈林一点也听不进去。我可以肯定地说，当列宁写文章指出布哈林不懂得辩证法时，列宁是百分之百地绝对正确的。我再举一个例子，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当时我就听不惯布哈林“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这样一些术语，如“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应当做出结论”……“从社会学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等等。问题是社会学是像不久前被我们顺利取缔的儿童学一样的“科学”，也就是伪科学，这种伪科学正如德国人所说的是随着一定的资产阶级理论的兴衰而兴衰的。这门儿童学本身就随着一定的纯资产阶级理论的兴衰而兴衰。总之只有从资产阶级实证论的观点看，社会学才能存在。马克思不支持这种观点，没有谈过什么社会学，而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毫无共同之处。而布哈林如常言所说的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这些术语则表明他的世界观中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占了很大的比重。（加马尔尼克：既然你已经知道这些情况，那么为什么你们之间的政治友谊还保持了这么长的时间呢？）为什么友谊保持这么长的时间？这一友谊从1917年保持到1918年底。（有人喊道：那么后来呢？）后来你们就会发现，我们不仅政治上的友谊，而且理论上的友谊都结束了，这一点我下面还要讲。于是我开始越来越清楚，我们在理论上有着非常严重的分歧。而这种分歧的外在表现是这样的。

在座的多数人大概没有注意到1924年初或者1924年底我不得不进行的一场争论。这恰恰是布哈林学派形成的时期，当时布哈林

担任《布尔什维克》杂志的主编。我当时反对均衡论，好像是我第一个起来争论的。我在争论中谈到布哈林时点的却是他的笔名。我当时与康德拉季耶夫教授争论，他研究危机问题是从均衡论这门他和布哈林都赞成的资产阶级理论出发的。我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来编成题为《世界经济与危机》的小册子。这本书中有一些方法错误（如谈因果问题），因为我当时对唯物辩证法问题还没有完全入门。（阿库洛夫：能不能切近本题来谈？）我马上就更切近本题。但是刚才谈的也与本题有关。（斯大林：这都与历史有关。）不，这不完全只与历史有关。所以，这本书中有一些错误。但是书中的观点是正确的，因此我大体上不会为它而感到羞愧。我还应补充一下：争论时本来是有所指的，却要点“笔名”，点的是另一个姓名，另一个人。这说明当时与布哈林争论不方便，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布尔什维克》杂志主编。所以我在争论中点的是另一个姓名，力求证明“均衡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现在接着讲。我现在要讲 1931—1932 年的事，也许还有 1933 年的事。有一次我在克里姆林宫的路上走，布哈林在路上遇到了我。（哄堂大笑。有人喊道：又是老调重弹！在什么门旁边？）我恰好想就这一点说一说卡冈诺维奇同志说得不完全对的问题，他说布哈林的路上相遇是策略。不，这是布哈林的习惯，一种病态。布哈林在路上遇到人就开始随心所欲地谈起来，谈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抓住遇到的人不放，说：“请送我到拐角那儿”，然后又说：“我现在把你送回去”，一边走一边谈。我想，这儿的许多人对布哈林的这种习惯都不陌生。而这一回布哈林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现在干什么呢？研究什么？”（有人喊道：当时你在哪儿工作？）我那时还没有去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或者也许去那里还不到一年，我研究哲学至少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而且直到现在我

在研究。我便对他说：“我在研究哲学”。（有人喊道：那是为了工作吗？）为了工作？如果你们提出这个问题，那我就回答说：我在《消息报》工作到布哈林去那里工作为止，或者也许已经是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局长。这些事我是按照中央的指示做的，但是坦率地说，我个人过去和现在都向往学术研究，而不是这些事。（笑声。）

于是我就说：“我现在研究哲学”。他当时给我提出下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也开始研究哲学，但是有两个问题总是弄不懂。第一，什么是矛盾？第二，什么是质？”（笑声。有人喊道：有意思。）顺便说一句，后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不仅弄不懂这两点，而且不知为什么也想象不出来，我没有实在的概念。（有人喊道：这是他说的吗？）是的。“你看，逻辑上的矛盾，这好理解，这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但是唯物辩证法断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存在于实际中，存在于生活中。那么这种客观矛盾是什么呢？还有质。至于什么是量，这我懂并且能想象得出来，这所有的人都明白都清楚，可是什么是质呢？人们说量转化为质。这一点我真想象不出来。”于是他开始在这方面发挥——这讲起来就长了——依他看，为什么存在的只有量，量又是如何存在的。顺便说一句，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实证主义对问题的提法。

我开始就这一问题向他提供一些基本的定义，努力形象地使他能想象出这些东西是如何存在的。后来我晚上回到家里后想：“既然他不明白这一点，那我写张便条，在纸上确切地解释一下。而且把这一切表述出来对我也有好处”。便条写好了，但终究没有寄出，一直放在我的桌子里，因为我想，既然他对辩证方法中的基本东西如此一窍不通，那还值得把便条寄去吗？要知道，我们的见解没有丝毫的共同点，这样做徒劳无益，尤其是我们在政治问题上没有丝毫的共同点，可是这样一来也可以这么想：他们从谈理论问题开始，然后联合起来开始政治行动。

这里顺便谈一下政治行动。这切近本题。（有人喊道：这是当前的局势。）谈起我的遭遇，如果不把我当作一个对辩证法问题感兴趣的人，而是把我当作一个对现实问题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那就应该提一下这样的事情：早在1923~1924年我就与农业经济方面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恰亚诺夫、马卡罗夫——进行了激烈的争论；1924~1925年就一般经济问题与康德拉季耶夫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大家都知道我从1927年起就努力研究苏联的汽车业发展问题。这可以说是我心爱的题目。同样很早我就醉心于农业的拖拉机化的研究。

我记得，当列宁还在世时，我在一个委员会里向他提出能否直接依靠电动机实现农业技术变革问题。我当时问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是否认为，第一阶段用内燃机来实现这一点，然后这为实现农业电气化作好准备？”早在1920年我就提出有关农业的社会改造问题，尽管这个问题提出得过早，并有些片面（播种委员会和由国家调节农业），因为我毕竟完全清楚，不改变农业的社会结构，即最终不实现集体化，当然不可能实现农业的技术变革。只有在集体农庄和机器拖拉机站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变革确实实现了。

最后，同志们，我早就对冶金工业的发展感兴趣并且始终注视着它的发展，每天都关注它的状况。我为什么老是这样讲呢？因为作为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我心爱的理想）的一个环节，我们经济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问题总是使我感兴趣，而且不仅仅感兴趣：我在这些问题上还做了一些工作。因此很清楚，我与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在这方面的立场有所不同，我与他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接触，而且没有尝试去接触，根本不存在这种接触。

我在作了多少有点空泛的议论后，现在来谈一下阿库洛夫同志认为更切近本题的话题，即在《消息报》编辑部里我们共同的工作

以及我们“共同”做了些什么事，这里的“共同”我是放在引号里的。当茹柯夫批评李可夫时，在座有人嘲笑他，说他做过李可夫的副手。（有人喊道：但我同他作过斗争，可是你呢？）我当时是编委会成员。但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请允许我作如下说明。第一，我应该告诉你们，我要坚决地强调指出，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布哈林的副手，并且从来也没有当过他的副手。如果什么时候曾有人提议我去《消息报》编辑部当布哈林的副手的话，那我会十分坚决地回绝，真的要像布哈林现在那样宣布绝食了。（波斯特舍夫：这是与布哈林的一个共同点。）当然像我们原来共同犯过的错误一样。

第二，应当说，在布哈林到来之前我就在《消息报》编委会里了。当布哈林被任命去那里时，并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而且也没有人问过我是否愿意在布哈林手下当编委会成员。要是那时有人问到我的话，那我一定会说，我并不很愿意，说得确切些，我根本不愿意。而重要的是：当布哈林被任命去《消息报》后，编辑部中的许多人并且甚至是多数人都寄以希望，因为前任主编在各方面都非常弱，报纸办得很糟，他本身的行为有失体面，使报纸也威信扫地。而这之后任命了一位著名的著作家，布哈林无疑是这样的人。此外，编辑部的全体人员都希望布哈林能通过这一任命来为自己恢复名誉，靠拢党的领导，在工作中大显身手，办好报纸，而这对编辑部全体人员是求之不得的。

然而我对这些幻想一点也不赞成。顺便说一句，我不赞成是因为我毕竟非常了解布哈林。那时我当然连想也没想到布哈林背着现在被发现的那样大的包袱，就像没有想到拉狄克会像他所干的那样十分卑鄙无耻地欺骗我们一样。当一切真相大白后，对于拉狄克我只感到非常痛苦——首先是一个出乎意料地被人愚弄的人的感觉（这是一种非常不快的感觉）；第二种感觉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竟然能如此卑鄙下流！

因此，我像所有的人一样，由于对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一无所知，对新任主编一点也不感到满意。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因为我非常了解他的性格，一方面他是个非常不坚定、意志薄弱、优柔寡断的人。而另一方面他又可能是非常固执非常严厉的人，尤其是一旦触犯了他的权威和自尊，他就会变得格外固执而严厉。因此他很难改正错误，尤其是公开给他指出的错误，而且指出这些错误的是比他地位低的人；而对于布哈林来说政治上和学术上最高的权威就是他本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

正因如此，我并没有想这件事会有好结果。现在我告诉大家，我当时是如何非常具体地表示我的想法的。召开了编委会第一次会议，而且会议是在那位好客的拉狄克的住所里举行的。这次编委会开会是为了建立联系并拟定下一步工作的总任务及远景规划。第一次会议，其实就是倒数第二次会议，因为《消息报》编辑部总共只开过两次会，在这次会上，和与会者的情绪截然相反，我作了简短的发言。我提出了在下一步中应当避免什么和强调什么的问题。会上我简要提出 6~7 点建议，其中有 4 点我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这次会议的与会者也都还记得。

第一，报纸当前最应当关心的是什么——这就是报纸应当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明确的政治面貌。会议参加者之一谢利赫——顺便说一句，他后来与我一起反对布哈林——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指的是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和什么样的政治面貌？要知道只能有一条路线和一个面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和布尔什维克的政治面貌”。我回答他说，我指的正是这一点。当时他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说。我想现在所有的人都理解了。

第二，我非常委婉地提出，现在编委会中有两个人是来自最后一个反对派的前反对派分子，他们就是布哈林和拉狄克。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允许任何原来的人，原来的反对派分子，进入编辑部；处

理报社的干部问题要十分慎重。

第三，我说了不应该做什么（顺便说一句，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不知道在和谁打交道）——这就是不应该使报纸转向，变成非党知识分子的机关报。如果有院士、作家、学者参与办报，这非常好——这是好事，但是这样的人不能太多，以免这份报纸成了非党知识分子的机关报。

第四，在报纸版面上不要过于追求华丽等等，这可能会降低报纸的原则性。

在第一次会上我说的这几点以及另外几点引起了一些人的疑惑，但我说得正中要害，因为我警告过要避免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首先，在政治路线上，报纸开始闪烁其词、离题万里。其次，在原来的人方面，索斯诺夫斯基当然在报社里登台亮相，就是那个隔500米都能让人闻出十足非苏维埃气味的、我在第一次诉讼时在《消息报》党的会议上揭露过的托洛茨基分子索斯诺夫斯基。顺便说一句，我当时没有想到拉狄克是暗藏的中心成员，但是对索斯诺夫斯基我却很有把握，他是一个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我在党的会议上就是这么说的。

这方面还包括另一件有代表性的事情：有人竟然想把加米涅夫拉进编辑部来主管文艺部。其实他没有来报社工作，只是由于他不满意工作条件，他希望在家里、在别墅里编稿件，要别人把材料往他那儿送，由于这个原因事情“吹了”。我还记得，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同布哈林接触过，但我告诉拉狄克，我坚决反对吸收加米涅夫进报社；季诺维也夫也好，加米涅夫也好，都决不能让他们进报社工作。

这以后，报纸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变成非党知识分子的机关报，当然也就变成了“带画刊的日报”——我是这样称呼它的，因此报纸的原则高度也随之降低了。其他几点我也是以类似的精神提出来

的，因为我非常清楚报纸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几点也说对了。

但是大家问我，我是如何为实现自己的建议而斗争的。从在编辑部里打“阵地战”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斗争得相当无力，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后来我们只开过一次即第二次编委会，是在第一次会议后隔了一个月召开的。在这次会上，布哈林的两个副手之间发生了争执，然后是布哈林与他实际的党内副手——谢利赫之间发生了争执。谢利赫被逐出编辑部。我处于一种完全孤立的境地，而编委会再也没有开过会。况且大家都还应该记得，对我来说《消息报》编委会的工作完全是兼职，因为我那时是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局长，这一点大家都还记得，都还知道我在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中有多少麻烦多少不快，我是如何和梅赫利斯吵架的等等。所以客观上我简直不可能每天再去《消息报》编辑部打“阵地战”。

你们也许还有权说，发表宣言还不够，还要付诸实施。但是我肯定地说，我没有充分的可能性去这样做。给报纸写文章我倒是写了，因为既然中央任命我为报纸的编委会成员就应该写文章支持报纸。当然，当谢利赫又回到编辑部去后（是被迫的），我开始写得多一些并常去编辑部与他联系。但是总而言之，我不能说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什么英雄业绩，或者像茹柯夫证明说他不断进行过斗争那样，说我也不断地进行过斗争。（笑声。茹柯夫：我有根据可以这样说，而且中央也知道。）

请允许我谈一谈下面一个问题。我与布哈林都是科学院院士。大家如果据此向我提出要求：我作为科学院院士为揭露其中的丑闻做了些什么，那么我在这里要坦言相告：我所做的比在《消息报》编辑部里做的还要少，其原因如下：第一，我成为科学院院士这件麻烦事正好发生在我担任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局长的时候。我参加了科学院的例会，但是没有参与处理科学院的组织工作问题。过了很久，当我离开中央国民经济核算局后，有人建议我参与处理科学

院的这些工作，但是我对此丝毫不感兴趣，请求让我摆脱这些工作。

总而言之，我认为，现在为了在科学院里发挥党的影响、贯彻我们共产党人所需要的东西，我认为甚至必须在中央全会的讲台上强调，我们自己首先要科学地工作。我因此过去和现在都请求给我提供科学地工作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对那里的事真正有所了解。比如，如果您想知道在物理和化学领域发生了什么，那您就必须懂得什么是高等数学，否则相对论也好，量子力学也好，您都弄不清楚，那么现代精密科学的所有最高成就都会与您擦肩而过。如果您想让我——比如说——在科学院做些实际事情，那么我就应该在学术方面切实有效地开展工作，否则将一无所获。出于个人兴趣，如果身边就是这种梦寐以求的学术工作，但却只能做些学术组织活动，这对我来说根本不可能，所以我没有去做过。

但是我能指出我与布哈林在科学院中的分歧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什么地方。同时我要再次指出，我当时根本没有认识到，在从事反革命非法活动方面，布哈林的反苏学问有多大。但我对下面的事提出了抗议，就是这一抗议使布哈林不再参加科学院党组会议。我非常讨厌那时科学院会议的气氛，会议经常安排一些过时的、烦琐的、毫无用处的报告，如介绍由一个法国助祭编纂的13或14世纪手稿的著名报告（遗憾的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现在不在，他记得这件事）。我记得，在党组会议上我非常尖锐地提出要停止这种活动，要做确实具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布哈林于是就反驳我并对我冷嘲热讽。

如果你们推到克尔日扎诺夫斯基身上去，那在这方面我无论如何不能对他作任何指责，因为他完全支持我。但是布哈林开始在这方面嘲讽我制止我。我们“大于了一仗”。不知是由于这一个原因还是由于一系列原因，布哈林对科学院的活动不再感兴趣，也不再

参加党组会议。他仍旧领导几个研究所的工作，因为他大概需要这样做。但是他的整个活动大大减弱了，我认为这决不是损失。我已经谈了很久，让我结束我的发言吧。上面就是我对要求我说明的三个方面能讲的情况。最后我想谈谈有关侦查材料以及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施基里亚托夫：对，这才是实质。）

我听了米高扬和伏罗希洛夫的发言，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听了卡冈诺维奇的发言，不得不再说一遍，老实说他抢走了我的面包，因为这些结论我本来也能作。在这一问题上能够说的一切或多或少都将是重复。参与审理这一案件的人都会注意到，布哈林和李可夫借口“不在场”（即“发案时我在别的地方”，这是典型的打官司手法）并抓住个别矛盾，从实质上推翻一些次要的东西，只要他们能推翻的话。但主要的东西他们却推翻不了，他们明显地回避最主要的指控。他们只谈证据有出入的地方，但对相吻合的方面却闭口不谈。可是相吻合的要比有出入的多，而且这些有出入的并不是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东西。

他们的整个答辩给人的印象是缺少一条贯串整个事实的总线，也没有对此做出有条理的解释。卡冈诺维奇在这次会上说得很好，我再重复一下，他们没有讲出什么明确的东西，即他们没有从实质上解释清楚他们持什么观点，以及在有关时期里他们是如何进行活动的。总之整个答辩矛盾百出，结构不严密并且毫无原则。而之所以毫无原则，不是因为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对主要指控无话可说。

总之必须指出，情况非常清楚，结论也很明白。我也像许多有这种感觉的同志一样不明白，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进行这场争论呢？也许布哈林和李可夫在最后陈述时（如果有这种陈述的话），会说些有新意的东西。那就应该马上为他们提供这种机会。但是我认为，要他们说出有新意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因此改变结论也不可

能，而我认为结论应该这样表述：如果说在8月诉讼程序之后公布的通告说“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那么现在这个说法变了，应该说“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起诉完全具有逻辑和法律依据”。

安德列耶夫（会议主持人）：现在请雅罗斯拉夫斯基^①同志发言。

雅罗斯拉夫斯基^②：同志们，但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讨论关于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背叛问题。我认为，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背叛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这一指控完全得到了证实。指控是由侦查材料证实了的，是在这个会上通过对他们自我辩解的种种尝试的分析证实了的，是由他们本人的发言证实了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十分缜密地进行了侦查，收集了揭发他们的证词。这些由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不同人提供的证词基本上完全吻合，并且提供了极为详尽的材料，使我们能够说我们不再怀疑这些人是党的叛徒。对质则更进一步证明这些指控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这次全会上我们第三次听取了有关这一案件的情况。应当坦率地说，也许对任何一个案件都没有这样慎重，都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愿望：想给被告一个开脱自己的机会，让他们哪怕是提供一个极小的证明自己无罪的证据。可是我们越来越相信，这些人在从事党内活动期间，确切地说是从事反党活动期间犯下了一连串的罪行，他们在这次全会上选择了自我表白这种最恶劣的道路，还想欺骗党。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叶梅利扬·米哈伊洛维奇（1878～1943），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十月革命后曾任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以及《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

② 速记记录的左上角有批注：“速记记录经我修改。И·雅罗斯拉夫斯基 1937年2月26日”。

大家如果看一看最近一期专门登载有关上一次诉讼程序材料的《社会主义通报》杂志，那就会确信布哈林和李可夫所奉行的完全是《社会主义通报》杂志奉行的那条诽谤路线，而《社会主义通报》杂志早就提前开始为布哈林和李可夫辩解和洗刷。难道这是偶然的吗？孟什维克和恶毒攻击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报刊都力图把这一案件说成是整个侦查都是假的，没有一项指控是对的，一切都是早就定了调子的，等等。那么布哈林在这次会上在干什么呢？他在会上说，如果读了这一大堆指控材料，就会得到一个印象，相信所有这一切。我却与他相反：我拿了布哈林的报告，读完后对自己说，为了相信布哈林有罪，未必要十分仔细地读所有这些供词，因为布哈林自己敲打自己，自己证明自己是有罪的。试图败坏苏维埃政权机关、侦查机构的名声，这也是敌人的斗争手段。

我们很清楚，编造的这类文件不仅是要给党中央委员会看，而且是打算让国外、让党的敌人都知道。尤其是绝食这种手段，这在我们党内斗争史上是闻所未闻的。宣布绝食的是一个并未遭到逮捕的人，一个有充分机会读到所有材料并加以反驳的人，一个有可能出席中央全会并面对我们党中央全会、面对我们党两次代表大会之间的最高机构为自己申辩的人！候补中央委员宣布绝食是我们党历史上从未听到过的反党、反苏维埃的斗争方法。要在我们过去的革命史中去寻找类似的情况是白费劲。我们宣布过痛苦的、殊死的绝食，我们是向我们的敌人，向沙皇政府宣布绝食的。布哈林却向自己的党宣布绝食，他不是以我们革命的光荣的过去为榜样，而是以富农为榜样。富农在苏维埃政权下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绝食，富农迫使自己的全家绝食，而把成吨的粮食藏在粮仓里，为的是说：看看吧，苏维埃政权都搞到什么地步了，人们饿得浑身浮肿，卧倒在地！布哈林以为，他也许能得到什么人的怜悯，关于他绝食的消息会广为人知，人们会议论纷纷，说党把可怜的布哈林整到什么地

步了。

同志们，我们中的许多人对布哈林相当好，我甚至要说是温情脉脉。甚至在这个会上，当他已经进行反党斗争时，人们还无数次称呼他布哈尔奇克，他知道这种情况，但是他极不光彩地滥用了同志们对他的这种友善态度、党的这种长时间的忍耐。当然这次宣布从夜里12点到次日上午10点的绝食引起的不仅是笑声，而且将激起更大的愤怒，因为一个候补中央委员居然采取这种斗争手段和辩护手段，而他还吹嘘自己在地下斗争时期是布尔什维克。

同志们，对布哈林和李可夫我只谈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李可夫与拉金的谈话。当时拉金去中央委员李可夫那儿，说服他必须进行恐怖主义斗争。中央委员李可夫不仅没有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苏维埃政权机构——国家政治保卫局，让他们逮捕这个坏蛋和恐怖主义者，他对中央委员会也一声不吭。难道这不是背叛吗？难道这不是对自己的党的彻底的、无耻的背叛吗？

1923年李可夫和所有其他人一起投票赞成捷尔任斯基的建议，这个建议要求党员如果知道存在反革命集团、知道存在反革命组织时，应当马上报告中央委员会和侦查机关。他知道这个建议并投票表示赞同，可是事情竟然发展到他本人成了阴谋家的地步，我们是否还有权在这个会上再提出推迟做出决定的问题呢？他早就背叛了党。

关于留京纲领。我不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是否利用了我们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有关留京纲领的档案材料。其中有对乌格拉诺夫、加米涅夫和斯滕的审讯。其中有非常有意思的材料。当时我就已经知道，这个留京纲领是右倾分子搞出来的。斯滕直接把这件事告诉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尽量避而不谈这件事，因为他们知道纲领出自谁的手。季诺维也夫起初说是“一个小伙子”给的。结果和李可夫说的如出一辙，他不知道，就说是一个

……（波隆斯基：工会会员！）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给的。当时中央委员会不多，可以查出来、想起来，是谁领导的哪个中央委员会。季诺维也夫说一个小伙子把纲领给了斯滕，接下来谈到谁组织了这个右倾小组。斯滕断定他对季诺维也夫谈到了斯列普科夫，他与斯列普科夫谈到过这件事，并且斯列普科夫警告斯滕说，如果斯滕把右倾分子写了纲领这件事传出去，那斯列普科夫就说斯滕与这件事有关。

因此，当时就已经知道，这一纲领是由右倾分子写的，乌格拉诺夫，斯列普科夫及其他右倾分子与制定这个纲领有关。但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布哈林与制定这个纲领也直接有关。然而应该记得那时从乌格拉诺夫口中了解的情况：布哈林在临行前对乌格拉诺夫说，在他的学生中和接近他的人中有“一种好斗的情绪”。布哈林对乌格拉诺夫谈过这种好斗情绪。但布哈林对中央委员会只字未提在右倾分子中有好斗情绪。（布哈林：我什么时候说了？）这是在 1932 年。

布哈林：我是说群众的思想动荡。但没有说右倾分子有好斗情绪。不能这样乱搅。

雅罗斯拉夫斯基：我一点也没有乱搅。布哈林 1932 年对乌格拉诺夫说右倾分子有好斗情绪，却不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这一情况。他只是对自己的同伙乌格拉诺夫谈了这一点。（斯大林：从内容上能看出来：经济部分是布哈林的提纲。）我现在就来谈这一点。乌格拉诺夫当时否定他与制定这一纲领有什么关系。乌格拉诺夫当时否定他与制定这一纲领有什么关系。乌格拉诺夫曾几次找我们，哭着闹着说：“真的不是我写的，我早就不再反党了。斯大林同志给我分配了工作，我将进行工作，永远不再反党了”。我们这一回又看到了布哈林、乌格拉诺夫的两面派表现，布哈林、乌格拉诺夫及其他右倾分子当时已经把这种两面派变成了一整套手段。

季诺维也夫来找我们哭诉，说这件事与他毫不相干。我把他叫到中央监察委员会通知他说，他被开除出党，原因是他与加米涅夫和斯滕讨论了留京纲领，而且没有把有关这一纲领的情况报告给中央委员会。这时他也哭着说：“我没有任何罪过，完全坚持党的路线，请不要把我开除出党”。请大家注意，季诺维也夫说他完全坚持党的路线时，正是他已经组织了恐怖主义小组的时候。难道现在，1937年，我们了解了所有这些坏蛋之后，难道我们在处理右倾分子的这类两面派行为时还会有一点犹豫吗！在这种情况下眼泪对我们已经产生不了任何影响。

我记得拉狄克被捕前不久，拉宾斯基同志从《消息报》来找我们，他谈到拉狄克时说，拉狄克心灰意懒，躺在家里哭。在干了他拉狄克干出的那些卑鄙勾当之后，当他已经感觉到要受到惩罚时，是会哭的。我们在这里，在这个讲台上，在上一次全会上，看到了布哈林流泪，但是现在我们了解一切之后，想起这些令人厌恶的眼泪就会感到恶心。

关于布哈林能否得出所谓的留京纲领中包含的那种结论。但是请允许我首先针对奥新斯基讲几句话。他在这里说，他不发言是因为这些问题鼓舞不了他。令人非常遗憾、非常悲哀的是，这些问题已经打不动奥新斯基的布尔什维克良心，激发不起他同这些事物斗争的愿望。应该回忆一下，正是奥新斯基1921年提出了在我国组织农民协会的建议。这个建议只得到了拉狄克一个人的赞同。当时在所有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两个人赞成在我国组织农民协会。奥新斯基应当回忆一下，他和这些人早先和后来都常常有相似的情绪，他同这一集团的许多观点在很久以后也还是吻合的。

看一看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全部活动——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开始，当时他们的所有分歧意见都已经形成——就很清楚，他们一直都在反对列宁和他的路线。我不提布哈林在战争时期认为失败主义

口号使我们失去了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的可能性；不提他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发表的完全是非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列宁把布哈林、皮达可夫、拉狄克等人的这种观点称作沙文主义的观点；我也不提布哈林在过渡时期问题上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但是如果拿布哈林在列宁去世后、在他与党中央争吵后多少恢复了一些工作的时期来说，如果拿他已经离开党很远——正如他在自己的那个纲领中所表明的那样——之后的时期来说，或者就拿他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来说，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他至今从未认真地批判过这一理论。（斯大林：有意思。）可是难道这个“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不就是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胜利的不信任吗？难道这个理论不是和托洛茨基的口号一样吗？托洛茨基说资本主义很强大，北美合众国能供给整个欧洲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份口粮，能养活并支持他们。（斯大林：过分地相信资本主义的力量。）这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既然李可夫1917年就确信社会主义的太阳无论如何不可能从东方升起，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不可能、从发展水平来看无论如何不可能在俄国开始并取得胜利，而后来他就暗中破坏苏维埃政权，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措施，反对党的路线，——既然发生过这一切，既然他们仇恨领导人，既然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既然存在斯列普科夫等人的疯狂的反党反布尔什维克的小集团，那么究竟为什么他们就不会参与制订这个留京纲领呢？这个纲领与你们在各个时期所维护的东西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把所有这些支离破碎的东西收集起来加以整理，如右倾著作家集团所做的所赞许的那样，为什么就不能搞出一个留京纲领来呢？

留京纲领说到底囊括了布哈林和李可夫纲领的各个组成部分。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托姆斯基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的工会中央委员聚集在一起读这个纲领。李可夫嘟嘟囔囔，据他说，他认为

这个纲领与施略普尼科夫纲领相仿。施略普尼科夫纲领当然可说是“很精彩”，看上去它甚至比留京纲领还要好。（洛佐夫斯基：其中没有提到恐怖活动。）而正是李可夫参加讨论了这一纲领。是的，他说他没有参加讨论，而这次讨论后过了两个月他对中央委员会说：“要是我什么时候听谁说过这一纲领，我会马上就报告的”，并且投票赞成把所有知道这一纲领而不报告者开除出党。

同志们，要是有一个普通党员参与恐怖主义议论（如同李可夫与拉金进行了恐怖主义的议论），要是这个党员暗中参加讨论反党文件，而且没有把这件事报告给自己的党组织，我们就把他开除出党并且投入监狱。我们把这种人开除出党并且将其作为反革命斗争的参加者交侦查机关处理。我们能够采用别的什么尺度来对待中央委员会成员布哈林和李可夫吗？难道这不是对党最卑鄙的背叛吗？

布哈林这时从帕米尔回来。他知道有这样一个纲领。我们了解布哈林，我们毕竟知道他对各种理论感兴趣，对所有的新文件感兴趣。有人告诉他中央全会上讨论过一个其激烈程度至今闻所未闻的反党文件；要是布哈林没有读过这个文件，要是他不知道这个文件，怎么能设想他不会提出要求：请马上把这个文件给我，我来看一下，请现在就把这个文件给我，我愿意而且应该确定我对这个文件的态度。他没有这样做。既然他事先已经非常熟悉这个文件，他为什么要再去看它呢？

同志们，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不能相信他们无罪。我们不能违背党员的良心，没有权利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们的手段的影响，他们目前正试图用这些手段来诋毁某些证词。如果仔细分析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供词，可以找到更多的矛盾，比他们这些非常老练的人在那些揭发他们的证词中所找出的矛盾要多10倍。

他们还是不要投机为好，他们以为新的诉讼对我们也不利。当然最好是没有这件事，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回避现实，不能实

行鸵鸟政策。这当然要付学费，但是必须付。危险得多的是，一连几个月有人问我们：“那么说到底布哈林和李可夫有没有罪？你们为什么不能定罪？你们为什么不能定罪？”这要危险得多。这个案件继续拖下去对我们非常有害，因为青年党员会开始怀疑我们是否有针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重要根据。而我们有着非常重要的根据，全面的完全能证明他们有罪的根据。我们必须考虑到教育这年轻的一代。

我在这里还想说，布哈林就绝食一事道了歉，他谈到了道歉并请求原谅他宽恕他。不，同志们，这种事能宽恕吗？我们不能宽恕这种事。党也不能宽恕这种事。问题当然并不在于令人好笑、令人厌恶和令人愤慨的绝食。但是决不能宽恕证据确凿的两面派行为：决不能宽恕反对党的反革命勾结，而这些反革命勾结也是证据确凿的；也决不能宽恕那种形式上向党悔过10次，暗中却拉起反党反革命组织的人。应该把这些人驱逐出党，交付审判。

安德列耶夫（会议主持人）：请在请伊克拉莫夫^①同志发言。

伊克拉莫夫：同志们，侦查材料充分证明，以布哈林和李可夫为首的右倾分子进行了反革命的恐怖主义破坏活动。根据中央政治局提供给我们的材料，侦查材料，我们大家都确信他们参与了反革命活动。当我听了他们的发言并读了布哈林的诽谤性声明后，我本人更加确信他们做的是齷齪的勾当，他们在这个会上试图否认所有这一切，又不提供能推翻这一指控的任何根据、任何文献和材料。他们的“理由”很独特。

第一个理由：当这个全会上大家迫使他们谈具体事实时，李可夫就说：“我不记得”，“我不记得”，而布哈林则说：“我的记忆模

^① 伊克拉莫夫，阿科马利（1893—1938），乌兹别克共和国党和苏维埃领导人，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糊”，可是他自己却能确定，几号发生了什么事。这种强词夺理的策略党早就领教过，早就揭露过。还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基洛夫同志就谈到了“健忘的伊万们！”（笑声。伏罗希洛夫；连爹娘也忘了的伊万们！）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论据，这是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理由：如果谁提供了揭发他们的证词，那他们就称这些人是疯子或者是对他们怀恨在心的人。而我则认为并确信，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比他们的老师和领袖诚实，而另一些人则被文献、事实和对质逼得走投无路。这就是作了坦白的两类人。我认为，右倾分子的这些领袖，布哈林也好，李可夫也好，看来都属于第二类。他们确实不想坦白交待，因此须要把他们置于那样的境地，进行那样的对质，这样他们才会坦白交待。我坚信，就是应该这样做。

第三个理由是受到了威胁。这个理由在声明中和发言中都有。首先——指控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控侦查员，说他们提出的是口径统一的问题，布哈林的声明中就是这样写的。可是请大家设想一下，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和恐怖分子来到侦查员那里时，侦查员应当问什么呢？是问：“您在布哈林那儿还是在李可夫那儿喝了茶或是打了猎？”这个侦查员难道是饶舌者吗？既然他掌握了事实，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像侦查员那样提问。但是同志们，这些侦查员工作的成果我们在这次全会上体会到了。要知道，经过侦查员的工作，这些人现在供认了许多其他问题，他们在上次全会上是不承认这些问题的，只是在本次全会上才承认了。

布哈林在上次全会上说，从1929年起，他与他的集团的人就没有任何联系。可是侦查材料上又写了什么呢？我不全部念了，只念一下1932年布哈林与库利科夫关于恐怖活动的第一次谈话。这是不是事实呢？可是在上次全会上他是否否认的。第二件事是讨论留京纲领。李可夫在上次全会上否认了吗？否认了。那么现在承认了吗？承认了。送乌加罗夫时谈了政治问题。是乘车还是步行去的，

这并不重要。与施米特会见了么？这是个恐怖分子。谈话了么？谈了。在布哈林那儿与加米涅夫和皮达可夫会见也确有其事。而最主要的是：1929—1932年他们是否常有联系？侦查材料已经证实，而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了。

这说明什么？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所有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呢？留京纲领是在1932年出现的。以斯列普科夫为首的布哈林分子的代表会议是在1932年举行的。难道这一切都不是事实吗？布哈林把这一时期称作向克服倾向转变的过渡时期。我相信布哈林说的，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但是不是向克服倾向转变——这些话让他对别的什么人讲吧。这恰好是从以前的那一套工作向恐怖活动、破坏活动和积极斗争转变的过渡时期，存在的正是这样的过渡时期，难道这不是人们的供词所表明的吗？尽管这里没有提出任何划一的问题，却查明了一系列事实，我们要表扬我们那些从事侦查工作的同志，因为他们帮助党揭露了这些伪善者，布哈林和李可夫如果在上次全会上就承认了这些事实，今天对党、对他们都要好些。

第四，我们听到了布哈林的威胁，他简直是在吓唬人。布哈林说侦查员利用了不确切的材料，侦查员追问了反革命档案。布哈林说，侦查员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叫做反革命决议。这恰恰不是侦查员说的，而是你们学派中的您的学生、您的同谋者、反革命分子们这样说的。我认为，应当弄清本质。如果从本质上分析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就会看到其中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文献是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在任何一个图书馆里都可以借到。布哈林那里怎么还保存着，这真有意思。我作为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联共（布）成员还记得布哈林提出的草案。这个草案怎么样呢？这是个非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献。布哈林推托说，这里的侦查中出现了什么错误。我认为什么错误都没有。那么实质上怎么样

呢？如果大家允许的话，我就读几段布哈林提出的草案和斯大林同志作过的修改。

布哈林在他提出的提纲草案的序言中写道：“第一个时期以1921年为最高点，而以无产阶级的一系列重大失败告终。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是这一时期的最后一环，而这一失败又是第二个时期即资本主义体系局部稳定逐步形成、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恢复时期的起点等等”。这里只字未提苏联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未提战胜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国内反革命分子的胜利。

而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建议如下：“第一个时期即资本主义体系危机加剧、无产阶级的直接革命发动的时期，以1921年为其发展的最高点，而其结束的标志一方面是苏联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共产国际的建立，另一方面是西欧无产阶级的一系列重大失败和资产阶级全面进攻的开始。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是这一时期的最后一环。这一失败又是第二个时期即资本主义体系局部稳定逐步形成、资本主义经济逐步‘恢复’、资本进攻的发展和扩大以及因受到重大失败而削弱的无产阶级大军继续进行防御战的时期的起点。”

布哈林在这一条中也没有提第二个时期和第三个时期，我不相信他只是忘了提——忘记了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斯大林同志作了下述修改：“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即第二个时期。——伊克拉莫夫注）是苏联迅速恢复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十分重大的成就以及共产党对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政治影响增长的时期。最后，第三个时期主要是资本主义经济超出战前发展水平和苏联经济几乎同时超出这一水平的时期（所谓的技术改造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在新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时期的开始）”。这样的修改未必能说是偶然的。

这就是联共（布）代表团委员会——斯大林同志所作的修改。

（有人喊道：改得好！）瞧，把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行进也“忘了”，他的草案里没有这一点。（波斯特舍夫：记忆模糊。）记忆模糊，同志们，说得对。苏联胜利的社会主义建设及其革命作用也被否定了。

在这个草案的第4条中斯大林同志提出了如下修改：“苏联作为促使各国工人阶级和殖民地劳动群众革命化、对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因素的发展——所有这些矛盾最终不能不导致矛盾的新的爆发”。这是偶然的吗？我想不是偶然的。在布哈林的草案中没有关于法西斯主义和法西斯对劳动群众压迫的问题。在第16条中斯大林同志作了这样的修改：“但同时反映出阶级矛盾普遍激化，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和方法异常尖锐，这一切越来越多地表现为资产阶级采用法西斯的压迫方法”。接着布哈林对关于党的革命作用和组织作用的问题“记忆模糊”了。

在谈到帝国主义各国对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镇压的那一条中，斯大林同志作了下面的修改：“特别针对共产党、针对惟一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日益严重的剥削的革命斗争的党”。布哈林在第21条中关于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的叛卖作用问题上“记忆模糊”。斯大林作了如下修改：“所谓的社会民主党的‘左派’领袖在改良主义的分裂运动中起了特别可耻的作用，他们口头上赞成统一，但实际上一再无条件地支持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分子的罪恶的分裂行径”。接下来斯大林同志在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叛卖行为问题上作了大量的修改，如果都要读完了恐怕要占用好多时间。请大家看看（他展示材料），有整整3页。这是偶然的吗？我认为不是偶然的。

这也是关于法西斯主义的问题，关于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以及其他非常重要的问题。有关法西斯主义问题斯大林同志作了如下修改：“在国际关系方面，法西斯主义在波兰和意大利实行暴

力政策、使之军事化和法西斯化的政策，并且越来越暴露出侵略的倾向。这等于对和平构成经常性威胁，等于用军事冒险和战争对无产阶级国家进行威胁”等等。在有关帝国主义、中国革命及其他问题上也作了这样大量的修改。

下面斯大林同志还作了很有意思的、乍看起来是所谓文字编辑上的修改。布哈林写的是：“德国转而反对苏联”。斯大林同志改为：“德国资产阶级……”。大家看，这才是阶级分析方法。接着布哈林写道：“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正转向资产阶级方面”。斯大林同志干脆删去“理论上”和“正转向”并建议改成“已经转到”。同志们，这才是对社会民主党、对法西斯主义和对资产阶级的态度。由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联共（布）代表团对所有这些问题（苏联问题、国际政策和策略问题）都作了修改。

现在清楚了，如果蔡特林谈到了档案并提到这个文献，那就是说布哈林特意保存着他写的草案，指望有一天搬出来给他所有的朋友——托洛茨基分子、社会民主党人、法西斯分子看，表明他并不想激化针对他们的问题，这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代表团搞的，“瞧，他们对你们搞了多少鬼啊”。他特意保留这一文献只能是为了这一目的，否则怎么也不好解释。因此，他保存这一文献是心怀叵测的，是为了打击我们的党。所有这一切正是反对我们的党、反对我们的国家的斗争。斯大林同志作了57处修改。布哈林的这个反党草案也就“所剩无几”了，于是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决议。这个布尔什维主义的文献是在违背布哈林的意愿的情况下由斯大林同志为首的联共（布）代表团委员会制定的。

所以我认为，对于他试图作的这一指责，我们应当这样来回答：“你又一次进行了诽谤，你最好还是老老实实在地交代一次自己的反党勾当吧。”我有意拿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这样最有权威的党

的决议来作例子。他所援引的其他东西至少不会比这更说明问题。（梅日劳克：完全一样）。

现在看第五个理由。绝食——这是一套地地道道卑劣的趁火打劫式的敲诈手法。（笑声。）我想在这里作一个类比，请大家看一看：虔诚的穆斯林守斋（斋戒）要比在这里宣布绝食的布哈林更认真一点。（笑声。）至少他们是从日出到日落不吃东西……（笑声。）而布哈林则相反，是从日落到日出不吃东西。（笑声。）他的这一威胁同志们已经引用过了。我想引用他另外的一些话。他写道：“甚至为了不造成与你们大家、与党斗争的假象，关于这件事我将不对任何外人讲”。他是在撒谎。因为这件事已经传到塔什干了。在我启程的前一天消息就传开了，当然是他们的人传的，说布哈林自杀了，布哈林宣布绝食了，随之而来的是对党对中央委员会的种种诽谤。（有人喊道：确实如此。）对这第五个“理由”本身我想我们的回答是——这不过是威胁，是对党的别有用心的敲诈。

现在来看看他是如何为自己辩护的。我们读了他的报告后都感到惊讶，他攻击托洛茨基分子不遗余力，可是对自己的人则敷衍了事，一笔带过。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两个负责同志——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采赫尔同志和乌兹别克斯坦副内务人民委员列昂诺夫告诉我说，布哈林从帕米尔到了塔什干后，在与别人交谈时非常激动，因为他了解到托洛茨基分子供出他们是他们的同谋。但是当他听说拉狄克也卷进去了时，就更加激动地说：“卡尔卢沙怎么啦？不可能的事。我用脑袋替他担保。卡尔卢沙不可能陷进去”。（斯大林：他好像常去帕米尔。）他确实常去我们那儿……（有人喊道：看他甚至喝起水来了。笑声。）

同志们，他为什么这样做？卡尔卢沙挺不住了，卡尔卢沙全说出来了，卡尔卢沙比较痛快地说了。我形成了这样一个看法：他不说不利于自己的人的话，因为大概那些人还有些事情没有交待，但

是这一切总要彻底暴露的，一定会暴露的。这是一个没查清的毛病，而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他对自己的人，对自己的同志是非常讲同志情谊的。

同志们，下面谈谈布哈林和李可夫过去的活动，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在革命前和革命后反对过列宁，所以列宁的著作对这一点谈得很充分，我们读过这些著作，知道这些著作，而且我们中的许多同志在10年间直接同他们斗争过。我认为，关于他们的这些行为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昨天在这里讲得很好，我就不想再谈了，因为我完全同意他们的看法。我想提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关于他的“学派”和对人的教育问题。由于他们采取的政治方针，这个“学派”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来呢？

第一，就是推崇反对“马克思-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寻神派分子波格丹诺夫的“有组织的经济”。这就是寻神派分子波格丹诺夫反对马克思-列宁的世界观的根本。在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时，我记得列宁在读了这本书后在页边上写道：“布哈林对辩证法一窍不通”。我想过，这个人是真的不懂还是他从来就没有站在马克思、列宁的立场上？要是一个人自己的信念并不坚定，那就会一无所获。要是内心对某个问题没有信念，那就永远不会正确地解决问题，办成事情。这是第一点。

第二，同志们，这就是培养一个学派来反对列宁。这一点昨天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谈过了，斯大林同志插了话。布哈林他教导别人说，在反对列宁的斗争中他是正确的，但他却失败了，因为他没有干部。如果用这种精神教育人们反对列宁反对党，那么会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来呢？这不仅是布哈林的学说，而且是用来团结人的口号。昨天科萨列夫同志出色地描述了团结在布哈林周围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可是，同志们，他们是不是都不可救药了呢？我对此表示怀疑，有些人也许是能改造过来的，但不是用党的

路线，而是用反党的精神对他们进行了教育。同志们，我有这样一个信念：当列宁生病时，特别是当列宁去世时，这些人兴高采烈，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能掌权了。我们有句俗话说：“所罗门一死，魔鬼喜洋洋”。于是这些魔鬼认为，现在他们就要掌权并且一定会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拉向后转，转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是党是坚强的，领导人是列宁主义的，党是斯大林同志领导的，所以他们不能得逞。正因为如此，他们从来不可能是我们的人。

第三，同敌人进行组织斗争。阿斯特罗夫供认：1927年，当我们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时，查明了托洛茨基分子与白卫分子的联系，我们进行了抵制，反对公布这条消息。这是什么行为呢？这是希望把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与此事隔开。我认为，要是他们现在有张报纸，他们也不会发表文章说，托洛茨基通过赫斯与希特勒勾结。我坚信他们是不会报道的。我们知道，党是志同道合者的联盟。他们在组织问题上和意识形态问题上有哪一点是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呢？他们有什么样的联系？有什么样的团结呢？丝毫没有。

现在如果加上布哈林、李可夫和右倾分子对集体化、对消灭富农这个阶级、对工业化的攻击，再添上“发财吧”这个口号，——瞧，这就是纲领，这就是留京纲领及他们企图组织的“民主党”的基础，这就是他们所有纲领的基础的基础。因此可以肯定，李可夫读过并审订过留京纲领，而不是他不知道并且没有参与编写这一纲领。难道这不是我们已经拿到手的这个反革命文献、诽谤书的基础的基础吗？难道不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所有其他反苏分子的纲领吗？所有这一切反对的都是我们的路线、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斗争。恐怖和破坏活动——这是为实现这些思想和这一纲领而进行的实际斗争。这几点就是正式的指控，并且已经得到了证实。

下面谈一谈宫廷政变。对我们的一个或者两个领导人——我们的领袖——搞恐怖活动，这难道不是社会革命党的思想吗？国家、

党、工人阶级、集体农庄群众对此似乎漠不关心。我们大家都知道，列宁和斯大林培育的党在同右倾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这伙败类、同“左”倾分子的斗争中团结一致，日益巩固，并且永远不会让这些入夺取政权。他们想通过恐怖手段来夺取政权，这是痴心妄想。不仅党组织、工人阶级，就连集体农庄庄员——这些昨天还食不果腹、昨天还在忍饥挨饿，而今天却丰衣足食、生活文明的农民也已经不会跟他们走了。他们只能引导富农跟他们走。他们采用了新的方法。米高扬同志在这里说得好，他说他们与托洛茨基分子一起在党内耍两面派手法，并且散布对党内同志的不信任。原来持有党组织发的证明可以随便到哪里去，而现在没有特别通行证就进不了边疆区和共和国的党组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破坏了这种信任。有时工人们问道：“这个党员可以不可以相信？”真是奇耻大辱！光凭这一点，当凭他们试图瓦解我们的党，光凭他们在党内制造这种不信任，光凭这一切就应该审判他们！只有最坏的敌人才会做出这种事来。对我们来说，最珍贵的、最宝贵的是我们的党。而右倾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一起在党内耍两面派。我们的各级党组织粗心大意，没有马上揭露他们，没有马上揭穿这些两面派。我想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在与他们的斗争中要再一次战胜这种两面派行为，更加巩固我们的党组织。

他们在我们国内还散布了些什么呢？他们与托洛茨基分子一起教我们党的敌人、富农、民族主义分子采取恐怖活动、破坏活动、间谍活动这种斗争方法。（波斯特舍夫：说得对！）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揭露出一连串民族主义组织和集团。他们的纲领是直接来自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分子的纲领抄来的：恐怖活动，首先是针对斯大林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恐怖活动。（波斯特舍夫：破坏活动。）内务人民委员部机构现在在乌兹别克斯坦抓到一个与波兰反间谍机关有勾结的特务。难道这一切不是他们在我们党内造成的吗？就凭这些

也要审判他们，消灭他们。（有些人喊道：说得对！）茹柯夫在这里说政治局包庇他们。我认为他犯了一个错误，这样说是不对的。中央委员会从来也没有包庇过这种反党思想，从来也没有包庇过反党分子。中央委员会非常耐心并且非常认真地想把他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纠正他们的错误，而他们辜负了这一切。我们党的力量、尤其是党中央委员会的力量就在于中央委员会从来不包庇这样的敌人。

现在谈谈结论。我想我们首先应当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认为，这可以看做是反党、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而对任何叛乱都应当镇压。我记得，早在 1926 年捷尔任斯基同志就对季诺维也夫说过：“您起来反对党，那我们就镇压您”。我想捷尔任斯基的这些话完全适合于这些叛徒。对于他们的结论应当只有一个：审判，把他们、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关起来，使他们永远也不能同任何人进行反苏维埃政权、反革命的议论。

安德列耶夫：同志们，有人建议停止讨论。之后还要让布哈林和李可夫发言^①，然后由叶若夫同志作总结发言。现在宣布休息 10 分钟。

^① 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发言已收入本档案选编第 8 卷“布哈林案件”专题。

№11615

联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叶若夫报告的决议

（1937年2月27日）

关于叶若夫同志报告的决议

（1）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材料，根据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布哈林同志与拉狄克、皮达可夫、索斯诺夫斯基、索柯里尼科夫的对质和李可夫同志与索柯里尼科夫的对质，以及全会对问题的充分讨论，联共（布）中央全会确认，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知道托洛茨基中心从事罪恶的恐怖活动、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他们不仅没有与之作斗争，而且向党隐瞒了这些活动，不向联共（布）中央报告，从而促进了这些活动。

（2）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材料，根据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布哈林同志与右倾分子库利科夫、阿斯特罗夫的对质和李可夫同志与科托夫、施米特、涅斯捷罗夫的对质，以及中央全会对问题的充分讨论，联共（布）中央全会确认，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至少知道他们的学生和追随者斯列普科夫、蔡特林、阿斯特罗夫、马列茨基、涅斯捷罗夫、拉金、库利科夫、科托夫、乌格拉诺夫、扎伊采夫、库兹明、萨波日尼科夫等人组织了恐怖犯罪集团，并且不仅没有与其进行斗争，还给他们撑腰打气。

（3）联共（布）中央全会确认，布哈林同志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企图推翻上面列举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恐怖分子的

供词，就报告的内容看，这是一份诽谤性的文件，它表明布哈林同志根本无力推翻托洛茨基分子和右倾恐怖分子针对他的证词。不仅如此，该报告还以反驳这些供词为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诽谤性攻击，甚至对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进行了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进行的攻击。鉴于此，布哈林的报告只能被看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根本不值得信任的文件。

根据上述情况，同时考虑到，列宁在世时，布哈林同志不论在十月革命前（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还是在十月革命后（在关于布列斯特和约、党纲、民族问题以及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上）都反对过党和列宁本人，李可夫同志也一样，不论在十月革命前，还是在十月武装起义期间（他反对十月革命）以及在十月革命后（他要求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并且离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岗位以示抗议，因此得到列宁送他的一个绰号——工贼）都反对过党和列宁本人，这无可置疑地说明，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的政治堕落不是偶然的或者突发的。鉴于所有这一切，联共（布）中央全会认为，应立即将布哈林和李可夫同志开除出党并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但是考虑到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区别是他们还没有受到过严重的党内处分（未曾被开除出党），联共（布）中央全会只做出如下决定：（1）将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联共（布）；（2）将布哈林和李可夫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

No 03452

联共（布）中央全会
2月27日晚间会议的会议记录^①
(1937年2月27日)

安德列耶夫（会议主持人）：现在开会。请斯大林同志代表第一项议程特设委员会作报告。

斯大林：同志们！中央全会的特设委员会委托我通报该委员会工作的结果。请允许我来通报。关于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处分，即至少将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联共（布），委员会没有任何意见分歧。委员会中没有一人表示反对这个建议。有意见分歧的是：是否把他们交付法庭审判；如果不交付法庭审判，那么惩处以什么为限。委员会的部分成员主张把他们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要求把他们枪决。另一部分人主张把他们交付审判，要求判处他们10年监禁。第三部分人主张交付法庭审判，但对应当做出什么样的判决不先作决定。最后，委员会的第四部分人主张把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案件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而不交付法庭审判。最后一种建议占上风。

结果是委员会一致做出决定：把布哈林和李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联共（布），并且将他们的案件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

委员会的理由。委员会在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时也像这次全会一样，对他们的反党反苏活动以及他们在这里，即在全会上的行径当然十分气愤。但是委员会认为，不能够并且也不应该听凭

^① 文稿的左上角有批注：“已阅。斯大林”。

这种愤怒的支配。

在委员会中，也像这里在中央全会上一样，有人，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在布哈林和李可夫与那些受到一定的司法程序的追究和相应惩处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区别。委员会不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认为，绝不能将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混为一谈，因为他们之间有区别，而且这种区别有利于布哈林和李可夫。

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是一回事，他们已经有一次被开除出党，后来恢复了党籍，然后再一次被开除出党；而布哈林和李可夫则是另一回事，他们没有被开除出党。不能在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与李可夫和布哈林之间划等号，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前者1927年曾举行过反苏游行，后者则没有犯过这种罪行。

委员会不能不考虑到，布哈林和李可夫过去没有犯过这种罪行，并且迄今为止还没有为提出把他们开除出党的问题提供理由和根据^①。所以委员会不得不加以考虑的是，不论是李可夫还是布哈林到目前都没有受到过严重的党内处分，如果不算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开除出政治局，以及李可夫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话^②。委员会最后通过了下述决定草案。可以宣读吗？（有些人喊道：请读吧。）

“联共（布）中央全会关于布哈林同志和李可夫同志案件的决议。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查材料、对质……（读。）……将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这个草案由委员会一致通过。

^① 接下来删去了一句话：“迄今为止没有提供理由”。

^② 接着删去了下面这段话：“至于说他们由中央委员转为候补委员，那并不是处分，而是由于他们没有被选上。为了使做出的决定公正、客观，委员会考虑到了这种区别。”

安德列耶夫：有没有人想要发言？没有。除了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建议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没有。对斯大林同志受委员会的委托提出的建议是否有修改？没有。总的说来，可以表决了吗？交付表决。我要提醒同志们，参加表决的除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根据党章的规定，还有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赞成这一建议的请举手。请放下。有人反对吗？没有。有人弃权吗？两人。这样的话，决定通过，两人——布哈林和李可夫——弃权。会议休会到明天12点。

【专题说明】

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

(1947年5~7月)

从1946年年底开始，苏联掀起了一场“树立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反对西方“腐朽”文化的影响、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者进行“再教育”的大规模运动，直接领导这一运动的是日丹诺夫。在此过程中，日丹诺夫亲自策划炮制了所谓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苏联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微生物学家克柳耶娃和莫斯科大学教授、细胞学和组织学教研室主任罗斯金多年从事肿瘤生物疗法的研究，1946年3月宣布发现了用于治疗某些痛症的物质。这一成果在医学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关注，美国大使和美国学者在征得苏联官方同意后与苏联医学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以及两位学者讨论了开展合作的问题。7月6日苏联卫生部正式通知两位学者，决定向美国学者公开研究方法的实质，接受美国大使的合作建议。8月7日，根据斯大林指示正在具体制定意识形态新方针的日丹诺夫在得到有关这些情况的报告后批示，他认为不应该让美国大使去研究所。对所谓案件的炮制就这样开了头。1947年早春，日丹诺夫亲自详细设计了整个案件的操作方案，并亲自起草了与此有关的主要材料，或对某些材料参与定稿。本专题收录的文件反映了当时苏联社会政

治生活的特点和文化领域的气氛、制造此案件的目的以及这一案件的影响，同时也记录了战后苏联知识分子的命运。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孙凌齐、李永全翻译)

No06450

苏联卫生部党组织 给斯米尔诺夫^①的呼吁书

(不晚于1947年5月7日)

苏联卫生部党组织掌握的材料证明，卫生部工作人员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作了大量有损苏联学者和公民的荣誉及尊严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勾当。

众所周知，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在15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从事抗癌疫苗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初步的、卓有成效的成果。他们研制出了“克—罗”制剂，用该制剂对某些癌症进行治疗取得的初步经验表明，这是一项能够在癌症——一种世界科学迄今为止尚未提出一项有效治疗方法的病症——的治疗方面产生一场革命的极其重大的科学发现。

大家还知道，由于原卫生部领导人（米捷列夫）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行为以及原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②的公开犯罪行为（他成了美国间谍），“克—罗”制剂连同制剂的生产工艺资料于1946年底被送给美国人，这对苏联在这项发现中的优势（优先权）是一个打击，给我们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

① 斯米尔诺夫，叶菲姆·伊万诺维奇（1904~?），上将军医，曾任军事卫生总局局长、军医总局局长，1947~1953年间任苏联卫生部长。

② 帕林，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1903~1971），生理学家，时为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学术秘书。因“克—罗”案件被诬为美国间谍，受到迫害。斯大林逝世后马上获得释放，恢复了名誉。创建了医学生物研究所，是宇宙医学生物学实验的组织者和参加者，196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有哪些不光彩的行为呢？

这些行为就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用自己的行动导致“克—罗”制剂的秘密公之于世，导致把该制剂送给美国人。

1. 还在1945年和1946年初，当“克—罗”制剂在治疗癌症病人方面获得初步疗效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没有为自己的成果保密（因为这项发现还处在萌芽阶段，尚未经过全面的临床检验），相反却为了个人的荣誉开始炫耀自己的成果并把有关发现的消息传扬到国外。因此，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试验和他们的实验室的工作引起外国情报机关、首先是美国情报机关的极大关注。

2.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追求的是个人的知名度，因此当后来美国情报机关对他们和他们的实验室发起真正进攻时，他们根本经不住考验。从1946年6月起，在短时间内先后拜访过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有：美国驻苏大使斯密特、美国科学院院士瓦克斯曼^①、美国教授梅特和累斯利。他们这些人来到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实验室，一再要求详细了解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工作的情况，并公开表示愿意提供任何范围的“帮助”。美国人这种实质上无异于收买的“帮助”的要价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同美国抗癌科学界进行“合作”，把“克—罗”制剂送给美国人，还要把制剂研制及今后任何改进的秘密告诉他们。

同美国人的这些会见和会谈的结果是，经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同意，原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他是美国间谍——在赴美之前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那里得到了要送给美国人的《癌症的生物疗

^① 瓦克斯曼，塞尔曼（1888—1973），出生于乌克兰的美国微生物学家，最早分离出许多抗菌素，1944年发现链霉素，1952年获得诺贝尔奖金。当时苏联关于“克—罗”案件的材料中说，瓦克斯曼访问苏联期间同学者会谈时始终拒绝透露链霉素的生产秘密。但是在1947年7月28日有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研人员 and 积极分子参加的党的非公开会议记录中却记下了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后来成为院士）A. H. 沙利尼科夫的一段话：“作为参加科学院会议的客人，瓦克斯曼把链霉素的全部生产工艺都告诉了我们。”

法》一书手稿、“克—罗”制剂生产工艺介绍材料和10支制剂。

党组织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这种行为是不光彩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使用苏联的经费在苏联实验室里工作，15年来一直受到苏联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他们本应该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交给苏维埃国家，而不是送给外国人。但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却把秘密从自己的苏维埃国家泄露出去。他们竟欣然让美国人参观自己的实验室。他们竟然进行有损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会谈。最后，他们竟然干出有损于苏联公民的荣誉和尊严的可耻而卑鄙的勾当——托帕林把手稿、工艺资料和制剂送给美国人，这是危害苏维埃国家和苏联科学的利益的行为，因为交出“克—罗”制剂的研制秘密就意味着苏联失去了优势。

3. 党委会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迷惑政府、欺骗政府的做法也是很光彩的。

我们知道，当政府开始调查这一案件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大概预感到他们的行为可能会被定为反国家的行为，因此在申诉材料中千方百计地向政府隐瞒事情真相，淡化送给美国人的手稿的重要性，谎称手稿中没有“克—罗”制剂生产工艺的关键部分，认为既然帕林没有把生产工艺资料送给美国人，那么转交手稿这件事似乎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党委会掌握的材料证明，手稿中包括了进行必要试验所需的全部资料，因而等于泄露了工艺秘密。所以，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特别是克柳耶娃的申辩是错误的，是想欺骗苏联政府。

还应该指出，党委会掌握的材料证明，作为向美国人泄露“克—罗”制剂的机密的酬谢，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从美国间谍累斯利那儿得到两包贿赂礼品，而且，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对这件事至今仍守口如瓶。

鉴于上述事实，苏联卫生部党委会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行为有损于苏联公民的身分，败坏了苏维埃国家和苏联科学的

荣誉和尊严，是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把同美国人的联系看得比同苏联政府的联系还重要，瞒着政府把自己的发现送到国外去，试图欺骗政府并掩饰这一不光彩事件的所有严重后果。

把发现送给美国人是假人道主义为幌子进行的，关于医学科学应该遵循人道主义原则的说法并不能证明上述行为是正确的。众所周知，美国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把自己的医学发现和制剂送给其他国家，他们根本不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原则，就连那些早已广泛使用并随便卖给其他国家的制剂也常常拒绝向俄国人出售。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不可能不知道所有这些情况，但这并未妨碍他们把自己多年研制的属于苏联人民和苏维埃国家财产的成果送给美国人。

苏联卫生部党委会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行为应受到荣誉法庭的审判。因此，党委会认为，必须把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送上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

党委会书记 马伊斯基

党委会委员 沙巴诺夫

瑟切夫

伊林娜

福京娜

马西耶维奇

涅乌波科耶娃

格列宾尼科娃^①

^① 这份以苏联卫生部党组织的名义要求把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送上荣誉法庭的呼吁书是由日丹诺夫亲自起草的，他在1947年5月7日将此呼吁书草案呈送斯大林并作了说明。

№06451

**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
第一次开庭速记记录**

(1947年6月5日)

荣誉法庭成员：

А.Н. 沙巴诺夫 (主席)

尼·亚·谢马什柯

И.П. 拉津科夫

С.А. 萨尔基索夫

М.Д. 科弗里金娜

И.Н. 马伊斯基

布占金娜

公诉人——彼·安·库普里亚诺夫教授

主席：同志们，请就座。

我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卫生部荣誉法庭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行为的案件的公开审理现在开始。

1947年5月14日，苏联卫生部部长斯米尔诺夫同志向荣誉法庭提交了苏联卫生部党委会下列内容的呼吁书（呼吁书附上）。

同一天，苏联卫生部部长斯米尔诺夫同志还交给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主席一封信：“现将苏联卫生部党委会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行为应受到荣誉法庭制裁的建议书交给您。我同意党委会所作的结论。斯米尔诺夫”。

由苏联卫生部部务委员沙巴诺夫副教授任主席，成员包括医学科学院院士谢马什柯教授、拉津科夫教授、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萨尔基索夫教授、苏联卫生部副部长科弗里金娜同志、苏联卫生部党委书记马伊斯基同志、劳动医疗保健中心联合会中央责任书记布占金娜同志的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于今年5月14~29日进行调查时研究了这份呼吁书，阅读了关于这个案件的所有材料，讯问了被告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以及下列几位证人：中央实验医学研究所所长扬克列维奇同志、医学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基马科夫教授、原苏联卫生部部长米捷列夫、梅契尼科夫研究所所长维伯尔同志、副教授米洛诺夫。

通过调查确认：

1. 克柳耶娃教授和罗斯金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抗癌疫苗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初步的、卓有成效的成果。他们研制出了“克一罗”制剂，用该制剂对某些癌症进行治疗取得的初步经验表明，这是一项极其重大的科学发现。

2. 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克柳耶娃教授和罗斯金教授确实通过原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把《癌症的生物疗法》一书手稿和“克一罗”制剂以及制剂的生产工艺资料送给了美国人。

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把手稿和“克一罗”制剂生产工艺资料送给美国人使苏联在这一重大科学发现中的优势（优先权）受到威胁，并给我们国家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失。

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手稿和“克一罗”制剂生产工艺资料是在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积极参与和完全赞同的情况下送给美国人的。罗斯金教授在今年5月15日荣誉法庭讯问时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他不同意把手稿送给美国人，他就不会拿出来。他声称：“我内心是赞成把手稿交给帕林的。”

3. 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克柳耶娃教授和罗斯金教授用自

己的行动导致治疗癌症病人的“克—罗”制剂的秘密公之于世。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没有为自己的成果保密（因为这项发现还处在萌芽阶段，尚未经过全面的临床检验），相反却为了个人的荣誉开始炫耀自己的成果并把有关发现的消息传扬到国外。

比如，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早在1945年初，罗斯金教授就把《试验性的癌症毒性疗法》一文寄往美国。1945年6月29日美国收到这篇文章并于1946年刊登在有关杂志上。此外，1946年经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同意，《星火》周刊和《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报》刊登了报道他们从事癌症生物疗法工作情况的文章。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试图说明他们炫耀自己的成果事出有因，即我们国内有人要剽窃他们发现的优先权，荣誉法庭认为这种解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早在1946年3月，克柳耶娃教授就在医学科学院主席团作报告，介绍自己在癌症治疗方面的成果，当时这些成果得到了肯定的评价。

4. 荣誉法庭根据这些材料及其他材料确认，如此炫耀癌症生物治疗方面的科学成果，势必引起外国情报机关，首先是美国情报机关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工作的强烈关注。由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追求的是个人的知名度，因此当美国情报机关对他们的实验室发起真正进攻时，他们根本经不住考验。

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从1946年6月起。在短时间内先后访问过他们实验室的有：美国驻苏大使斯密特、美国教授梅特和累斯利。调查证明，这些美国人在参观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实验室时，一再要求详细了解他们工作的情况，并公开表示愿意提供任何范围的“帮助”。

这种表示是对他们这些学者进行收买的一种尝试。

比如，罗斯金在今年5月15日的供词中说，在梅特和累斯利参观实验室时，累斯利举杯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说：“为幸福家庭

干杯！你们将成为百万富翁。”（会场出现骚动）

美国大使斯密特也提过类似的建议。罗斯金教授说：“下楼梯时，大使比同行的人慢了几步，悄悄通过翻译对我说：如果需要把什么东西寄到美国，他随时愿意效劳，并把他的私人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5. 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美国人所有这些许诺的结果是，经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同意，被美国人收买的原医学科学院院士、学术秘书帕林在美国把《癌症的生物疗法》一书手稿和“克—罗”制剂及其生产工艺资料交给了累斯利。

6. 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当政府开始调查原医学科学院院士、学术秘书帕林的犯罪行为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预感到他们的行为将会被定为反国家的行为，因此在申诉材料中千方百计地向政府隐瞒事情真相；他们极力淡化送给美国人的手稿的意义，企图证明手稿中没有“克—罗”制剂生产工艺的关键部分。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言行以及向政府所作的保证都是向政府提供假情况，目的是欺骗苏联政府。他们对政府说，《癌症的生物疗法》一书手稿中不包含能泄露“克—罗”制剂生产工艺秘密的材料，交出手稿不会给苏联医学科学的优先权造成任何损失。

罗斯金教授在今年5月15日和26日荣誉法庭庭审时供认，依据书和文章可以研制出“克—罗”制剂，但需要时间。克柳耶娃教授在今年5月27日接受讯问时企图迷惑荣誉法庭，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克—罗”制剂工艺。对荣誉法庭提出的通过帕林送给美国人什么工艺资料的问题，克柳耶娃继续采取不真诚和不老实的态度。她在荣誉法庭上说，她通过帕林送给美国人的是科学，而工艺则是技术。

根据上述材料和帕夫洛夫副教授的结论及对担任研究所所长的那几位证人扬克列维奇、基马科夫、维伯尔等人的讯问，荣誉法庭确

认，手稿中包括了“克一罗”制剂生产工艺的全部必需材料。

7. 根据对原医学科学院院士、学术秘书帕林的讯问材料，荣誉法庭确认，作为向美国人泄露“克一罗”制剂秘密的酬谢，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从累斯利那儿得到两包东西。但是，不论是在荣誉法庭上，还是在调查过程中，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都说，他们从美国方面得到的只是铅笔和钢笔（会场出现骚动）。

8. 荣誉法庭通过调查还确认，克柳耶娃教授和罗斯金教授在法庭调查期间极力狡辩，说什么将他们的发现公之于世并送给美国人不是他们的本意，是迫于原苏联卫生部部长米捷列夫和原医学科学院院士、学术秘书帕林的行政压力，在履行米捷列夫的决定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曾采取过一些阻止转交的措施。

荣誉法庭确认，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说法同事实不符。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不仅没有坚持为自己的成果保密，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必须将这些成果公之于世。

荣誉法庭确认，1946年7月初苏联卫生部会议讨论关于将“克一罗”制剂送给美国人的条件的协议草案时，全体与会者，其中包括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都同意把这项发现送给美国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反对的不是原则，而是交易条件。

9. 罗斯金教授和克柳耶娃教授看到已无法否认自己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行为，于是在调查期间竭力用“人道主义”情感来解释自己的行为。当询问罗斯金教授为什么要把手稿送到国外去时，他回答说，是遵循人道主义原则这样做的。在荣誉法庭向克柳耶娃提出书面询问时，她不正面回答向她提出的问题，却用所谓的人道主义思想含糊其辞地应付。

10. 荣誉法庭通过调查确认，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歪曲了他们向联共（布）中央、党和政府领导人反映情况的事实。

为了证明这一点，请允许我读一下安·亚·日丹诺夫今年5月

30日给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的声明：

“致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主席沙巴诺夫同志

声 明

看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因把‘克—罗’抗癌制剂的发现成果送给美国人这种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行为而被送上卫生部荣誉法庭的案件材料后，我认为有责任向荣誉法庭声明，在罗斯金和克柳耶娃教授的供词中（见1947年5月15日荣誉法庭速记记录、今年5月20日克柳耶娃教授对荣誉法庭所提问题的答复和今年5月27日荣誉法庭庭审速记记录）有很多歪曲事情真相并迷惑法庭的伪证词。

为了恢复真相，我应作如下声明：

1. 罗斯金教授在5月15日的供词中承认，斯大林同志在1947年2月17日的政府会议上曾问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送给美国人的《癌症的生物疗法》一书手稿是否将“克—罗”制剂的工艺制作秘密泄露出去，对此，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好像说过，利用手稿能够研制出制剂，但需要一年或二年的时间。

作为这次政府会议的主席，我有责任声明，罗斯金的这个供词同他们向政府讲的完全相反。克柳耶娃在政府会议上欺骗政府，十分肯定地说，手稿中没有‘克—罗’制剂工艺的关键部分。罗斯金的态度实际上也同克柳耶娃一样，只不过罗斯金被迫在会上含糊地承认，他推测美国人利用手稿可以在6—8个月中研制出‘克—罗’制剂，但这不会给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工作以及苏联的优先权造成任何损失。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特别是克柳耶娃，欺骗政府，说手稿中没有关键的工艺部分。现在他们又企图欺骗法庭，伪造自己在政府会

议上的回答。

2.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在自己的供词中说，把他们的发现成果公之于世并送给美国人并非他们的本意，完全是迫于原卫生部部长米捷列夫和帕林的行政压力。他们在履行米捷列夫和帕林的决定时坚信，米捷列夫和帕林是按照政府的指示行事的，而且他们——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最后还采取了一些阻止转交的措施。

我应该向荣誉法庭声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这些供词完全不符合事实，是捏造出来的。既然我受政府委托调查‘克一罗’制剂送给美国人这一案件的情节，我就应该在此恢复事情的真相。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并没有为自己的‘克一罗’成果保密。相反，他们认为必须将这些成果公之于世。他们不注意保密，多年来到处宣传自己的成果，从而引起了美国情报机关的注意。在政府调查向美国人赠送手稿和‘克一罗’制剂的情况时，他们仍认为送给美国人是合理和正确的。罗斯金甚至还用虚伪的‘人道主义’说法来证明这一行为的正确性。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参加了1946年7月初召开的卫生部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米捷列夫和斯密特将要签署的关于向美国人赠送‘克一罗’制剂的条件的协议草案，正如调查所确认的那样，在这次会议上，全体与会者，其中包括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都同意把这项发现送给美国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反对的不是原则，而是交易的条件。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在帕林赴美之前将‘克一罗’制剂、手稿和工艺材料交给帕林并不是奉命行事，而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这是罗斯金本人在今年5月15日自己的供词中讲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对米捷列夫不满，不是因为他同意把‘克一罗’制剂送给美国人，而只是因为米捷列夫对他们的实验室不够重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在帕林把他们多年的研究成果送给美国人之后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相反还千方百计地为帕林辩护。所以，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关于

他们同卫生部领导在把‘克—罗’制剂送给美国人的问题上有过一番斗争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米捷列夫、帕林、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从来没有向政府表示他们反对把成果送给美国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向政府隐瞒事情的真相和自己的意图。政府是在没有得到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任何协助的情况下揭示出事件的实质并对这起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案件做出适当结论的。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抱怨说，政府不关心苏联学者或把他们的成果当作同某个大国进行政治游戏的砝码，对这些卑鄙的说法无需反驳，这只能证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是不可信赖的苏联公民。

3.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歪曲了他们向联共（布）中央，特别是向我反映情况的事实。第一次，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于1946年3月向中央申述说卫生部对他们帮助不够。中央于1946年4月3日专门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通过一项书记处决议，责成卫生部采取必要措施帮助他们的实验室。第二次，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于1946年11月15日向中央反映情况，他们给我送来一份便函，抱怨米捷列夫仍对他们的工作不予重视，要求给实验室增加设备，为‘克—罗’制剂安排临床试验。政府认真研究了这封信，并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帮助他们。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说，美国大使斯密特1946年6月参观实验室后不久我就召见了他们，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1946年9月25日曾通过一个叫舒宾科夫的人送给我一份有关‘克—罗’制剂情况的便函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我没收到过这样的便函^①。

^① 为了证明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迷惑政府、欺骗法庭的指控，日丹诺夫竟然不惜撒谎、否认事实。实际情况是，舒宾科夫是国家安全部的负责工作人员，这份便函与“克—罗”案件的准备材料一起保存在日丹诺夫的个人档案中。

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

我第一次见到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是在1946年11月26日，而不是他们所说的1946年3月和6月。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从来没有通过书面和口头形式向我抱怨‘有人要把制剂送给美国人’。

只是当手稿和‘克一罗’制剂通过帕林落到美国人手里、特别是当政府得知‘克一罗’制剂被送给美国人这一事实并开始对这一不光彩事件进行调查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才被动地、在政府的要求下，面对事实不得不讲出一些实情。他们根本不想揭出全部事实。不仅如此，他们还走上了向荣誉法庭作假供的危险道路。

安·日丹诺夫

1947年5月30日”

荣誉法庭根据上述材料做出结论，苏联卫生部党委会在给卫生部部长的信中提供的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行为的事实充分证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确实犯了对苏联公民来说是不光彩的反爱国主义的错误。这一案件将由荣誉法庭依据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1947年3月28日关于荣誉法庭的第748号决定进行审理。

签名：荣誉法庭主席：沙巴诺夫

荣誉法庭成员：谢马什柯

拉津科夫

萨尔基索夫

布占金娜

马伊斯基

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于1947年5月26日做出关于指派公诉人

的决定，该决定建议指派著名医学科学家库普里亚诺夫教授作为荣誉法庭公开审理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行为的公诉人。

主席：克柳耶娃教授，荣誉法庭向您提个问题：您是否认为自己犯有从事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活动罪？

克柳耶娃：我认为，我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案件中，包括把书交给帕林这件事。但是，我不能承认自己犯有故意从事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活动罪。

№06452

公诉人库普里亚诺夫 在荣誉法庭上的发言摘录

(1947年6月6日)

……现在我们在荣誉法庭上审理的事实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还因为，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和我们的政府为在苏联卓有成效和顺利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包括医学领域的工作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斯大林同志向苏联学者提出了一项伟大的任务——赶上和超过外国学者的成就。

为什么在我们的队伍中能够出现苏联学者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反爱国主义的行为呢？

为什么这两位科学家没有全身心地接受我们苏维埃的理想呢？应该说，这里谈的不仅仅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没有充分理解苏联学者的爱国主义义务。在此应该非常明确地指出，被告这种人的意识里充满腐朽的资本主义残余。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无论沙皇俄国反动统治阶级，还是国外反动力量都在向知识分子和人民灌输有辱人格的各种反爱国主义观点和情感，灌输依赖外国人、奴颜婢膝和崇洋媚外的感情，而让居住在俄罗斯的各族人民保持这种崇洋媚外的奴隶感情对统治阶级和反动力量都是十分有利的。地主、资本家、沙皇官吏从来没有重视过俄国人民的历史利益，他们始终与俄国人民格格不入并采取敌视态度，千方百计淡化和贬低俄国人民的成就，在所有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众所周知，在18~19世纪，俄国贵族极力贬低俄罗斯文化，使其庸俗化，丧失和抛弃民族传

统，甚至到了几乎忘记自己的语言、开始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广泛使用法语的地步。后来，俄国剥削阶级反动阶层又像18世纪贵族对法国人那样对德国的东西都起劲地顶礼膜拜。沙皇俄国反动统治阶级这种卑鄙的反人民政策使我们的人民遭受了无尽的屈辱！由于对外国人卑躬屈膝，致使多少伟大的文化成就、多少重大的科学发现卖给和转让给外国或被外国人用欺诈的手段据为己有！因此，在俄国科学史上常常出现俄国科学界优秀代表的伟大发现的优先权后来落到外国学者手中的事件，就毫不奇怪了。比如，有人试图把俄国科学的奠基人罗蒙诺索夫在化学领域的伟大发现的优先权安到拉瓦锡头上；无线电通讯的发明者是伟大的俄国学者波波夫，后来有人企图篡改成是意大利人马可尼在无线电通讯发明中占有优先权。还有亚布洛奇科夫、门捷列夫等很多人的发现，都是如此。俄国科学史令人信服地证明，所有靠剥削其他民族的劳动而获利和发财的反动派都对俄国学者的发现垂涎三尺，并在沙皇俄国反动阶级的协助下试图截获、剽窃和占有伟大的俄国人民的科学和文化成果。

所有这一切说明，俄国地主和资本家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的直接目的是使俄国永远落后，使人民在精神上永远受奴役并绝对依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这是一条将俄国变为西欧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显然，俄国统治阶级的这个政策对帝国主义国家、外国帝国主义者非常有利，因为这个政策使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俄国和俄国人民的财富为自己自私的目的和利益服务，阻碍俄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发展。显然，复活崇洋媚外的感情，复活这种实质上是奴隶的意识、自惭形秽的意识和在精神上依附资本主义外国的意识，对当代帝国主义者也是有利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不明白为什么“最次的”一个苏联公民，只要他摆脱了资本的桎梏，也比任何一个套着资本主义桎梏的外国高官高出一头”。

因此，同志们，从这里可以看清楚，只要我国某些知识分子和学者的头脑中还保留着崇尚资产阶级文化、崇洋媚外、对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奴颜婢膝的奴隶精神，苏联人民就不能认为已经彻底完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对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任务和在我国实现文化革命的任务。

正因为如此，同志们，我们科学界、苏维埃国家的医学工作者以及我国所有知识分子绝不能容忍罗斯金和克柳耶娃的反爱国主义行为。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之流为替自己危害苏联科学和苏维埃国家的行为辩护，提出了独出心裁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医学科学发现是不能保密的，应该根据人道主义原则和关心所有人健康的原则尽快公之于世和向国外传播。没有比这个观点更错误和更虚伪的了！苏联学者罗斯金和克柳耶娃自愿把自己的发现送给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让这些国家利用科学成果为极其自私自利、惟利是图的目的服务，为少数金融寡头、大工业家和大商人获取暴利的目的服务，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人道主义？现在美帝国主义者正利用科学成果来建立美国人优越于所有其他民族的“理论”，即说明美国人可以像希特勒那样实现对世界的统治的理论，这还谈得上什么人道主义？现在还有人相信帝国主义国家的人道主义，相信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和走狗——他们在刺探、剽窃和用欺骗手段获取其他国家的科学发现——的人道主义，这些人是何等的头脑简单，何等的天真啊！在此请问罗斯金和克柳耶娃教授：美国学者、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向世界提供过重要的科学发现吗？美国学者给苏联科学以及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提供过自己的发明和发现吗？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人根本就没有把科学用于人道主义目的，从来没有公开过自己的科学秘密。罗斯金和克柳耶娃对此应该是清楚的。至少罗斯金和克柳耶娃应该知道，当他们实验室一位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受到感染

时，他们虽然从国外得到了治疗制剂，但却没有得到该制剂的制造工艺。美国人不仅没有向我们透露他们的秘密，而且还拒绝寄来和卖给我们现成的药品、制剂和仪器。用不着去谈论“美国的人道主义”，只要想一想黑人在美国的状况就足够了……

在此应该回忆一下伟大的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的话，他说：“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曾同奴隶占有制、贩卖奴隶、‘初夜权’、教会的宗教法庭、对图卢兹‘亚尔毕派’的普遍灭绝、对向往圣经和福音书中保留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布鲁诺、胡斯、无数不知名的‘理论家’、‘女妖’、手工业者、农民处以火刑……等等现象同床共枕。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要求永远憎恨市侩作风、工人阶级的叛徒，憎恨所有使人民受难的人，憎恨所有靠千百万人的痛苦而生活的人。”大家都记得高尔基在著名的《如果敌人不投降，那就消灭它》一文中所说的这些名言。

同志们，很难相信，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学者中还有人不知道苏联爱国主义者的真正的人道主义就是忘我地、忠实地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就是不断地增强祖国的实力和威力。苏联学者尤其清楚，只有在我们苏维埃国家中科学才能真正完全地为人民利益服务。苏联学者应该全心全意地、彻底地忠于自己的祖国，应该像苏联英雄加斯捷洛、马特洛索夫、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奥列格·科舍沃伊那样，在为苏维埃祖国建功立业中表现出忘我的和彻底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年来，苏联知识分子、苏联学者始终同我国人民一道并肩前进。这是布尔什维克党采取的英明政策和结果。

苏维埃国家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真正的大学者始终真心实意和诚实地把自己的工作同自己的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学者知道，所有进行科学创造的设备 and 条件都是人民给的。正是苏联人民以其英勇的劳动为我国科学工作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科学

也应该造福人民。

但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显然不这样理解学者的任务。罗斯金教授对苏联学者的义务的理解是独出心裁的。比如，他认为，德国学者不是为自己的主人——克虏伯家族、蒂森家族、戈林家族服务，而是为自己干。他说：“要是在德国的话，那么学者的工作成果是属于自己的。”但他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您以为在德国这是属于学者本人的吗？难道您不知道德国学者的发现是针对我们的吗？”（1947年5月26日速记记录）

罗斯金和克柳耶娃不认为瞒着苏维埃国家把属于我国人民的成果送给外国人是一种罪过，这并不奇怪。他们不理解我国伟人的生理学家和爱国主义者巴甫洛夫的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无论做什么事，我都在想，首先我要全力以赴地为我的祖国服务。”1935年8月17日巴甫洛夫在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家大会上对与会者说：“你们已经耳闻目睹了科学在我们国家占据着多么特殊的优越地位。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在我们国家里国家政权和科学的关系：我们这些科研机构的领导人感到担忧和不安的是，我们怎样才能不辜负政府为我们提供的所有这些条件。”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不妨经常想想这位爱国主义学者这些精彩的话；当他们把自己的手稿交给间谍和祖国的叛徒帕林时，更应该想想这些话。他们还应该经常想想，他们在科学上的发展、他们的整个威望、他们的全部生活都离不开苏联的高等教育，离不开苏联的科学机构，离不开自己的祖国。但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显然已经丧失了最后一点苏联学者的尊严、爱国主义的责任以及苏联人的爱国主义感情。否则的话，就无法理解如下事实：帕林从美国带回来累斯利“答谢”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两个小包，用罗斯金和克柳耶娃的话说，是并不值钱的礼品——自来水笔”。罗斯金和克柳耶娃都不明白，这个“不值钱的”礼品包含着美国人对苏联人的全部

鄙视，就像他们给黑人一串项链或希望通过交换小首饰来获得真正有价值的能够发财的东西一样。罗斯金和克柳耶娃不明白，自来水笔中的墨水玷污了苏联学者和苏联公民的尊严和荣誉。

对罗斯金下面的奇谈怪论也只能作这种评价。他认为自己决意把作品在国外、而不是在苏联发表，是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他说：“我的导师这样做，我的前辈这样做，我也这样做。”（1947年5月15日速记记录第31页）

罗斯金就是这样说的。看来，罗斯金不想明白，真正的俄国学者更愿意在家里、在祖国发表自己的作品，然后，这些作品才作为杰出的发现和世界科学成就在国外报刊上转载。众所周知，“非欧几何学”的创始人罗巴切夫斯基——高斯、黎曼、爱因斯坦的前辈——1826年2月11日是用俄语作报告讲述自己的发现的。他的《论几何学的开端》一文是用俄文在喀山省杂志上发表的，而后才用多种欧洲语言发表……

罗斯金教授应该知道，俄语是世界上最丰富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早已成为国际语言。俄语是最早摆脱地主和资本家压迫的伟大人民的语言，是为全世界指明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的语言。正如现在没有苏联的参与就不能解决国际事务一样，目前没有俄语就没有真正的文化和文明。

我们感到愤怒的是，罗斯金忘记了他是伟大的苏维埃国家的学者，整个进步人类都团结在苏维埃国家周围，而他却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的成果发表在外国的杂志上，根本不管该杂志是庸俗的还是反动的。

由此可见，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把苏联科学的利益放在次要地位，他们身上缺乏苏联民族的自豪感。然而，只有苏联人民、只有我国学者才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因为正是我们，苏联人，我们的人民在人类社会史上第一个建成了社会主义这个人类最伟大和完

善的制度，永远消灭了压迫和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

苏联人民自豪的是，在人民中推出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革命和先进科学的天才、社会主义生活的领导者和建设者、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斯大林。正是布尔什维克党及其创始人和领袖把我们的人民培养成先进的、有文化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生活的建设者。他们使每个苏联人具有社会主义革新者和建设者的伟大创造力。他们教育苏联人民不怕困难，不断前进，在建设新世界的事业中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他们教育苏联人民对胜利充满信心，对自己伟大的、崇高的、正义的事业充满信心，勇敢地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无限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和苏维埃祖国，对所有压迫和背叛行为持毫不妥协的、强烈的憎恨态度，对腐朽的仇视人类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腐败的资本主义文化持憎恨态度……

罗斯金和克柳耶娃这种反爱国主义行为在我们这里是没有滋生的土壤的，但遗憾的是，它作为野蛮的返祖现象、作为可怕的过去的残余仍然存在。少数至今大概仍没有意识到科学中的非政治倾向会导致什么结果的人应该好好想一想。他们应该明白，没有无党性的科学，我们苏维埃科学是为我们苏联人民服务的，是为真正先进的民主制度服务的。苏维埃国家的不合格的公民不可能是优秀的学者。我们，苏联学者是非常光荣的。我们要用苏联学者和公民的荣誉和尊严、用民族自豪感和苏维埃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的青年人。

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培养起来的、忠于我们伟大祖国的苏联医务工作者大家庭今后不应该允许也没有权利允许任何人用我们刚刚审理过的这类行为来败坏它的荣誉。

根据荣誉法庭掌握的所有材料，根据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供词以及在公开庭审时对这一案件的审理，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反国家、反社会和反爱国主义的错误行为是证据确凿的。

我作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得到你们选出的荣誉法庭的信任，

担任公诉人。我认为，罗斯金和克柳耶娃教授把苏联在癌症生物治疗领域的重要发现送给美国人、使苏联科学的威信受到损失并使我国祖国在解决具有重要国家意义的重大科学问题中的优先权受到威胁，从而犯下了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错误，应该对罗斯金教授和克柳耶娃教授提出公开警告。^①

^① 荣誉法庭公诉人库普里亚诺夫的发言稿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卫生部新部长斯米尔诺夫和总检察长戈尔舍宁起草，日丹诺夫参与定稿。

№06453

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判决书

(1947年6月7日)

由苏联卫生部副部长 A. H. 沙巴诺夫副教授任主席，成员包括医学科学院院士尼·亚·谢马什柯教授、И. П. 拉津科夫教授，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 С. А. 萨尔基索夫教授、苏联卫生部副部长 М. Д. 科弗里金娜同志、劳动医疗保健中心联合会中央责任书记布占金娜同志、苏联卫生部党委书记 И. Н. 马伊斯基同志的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在该法庭公审会上对指控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犯有反爱国主义、反社会和反国家的错误的案件进行了审理，现确认：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从事了大量有损于苏联学者和苏联公民的荣誉及尊严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勾当。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在 15 年多的时间里一直从事抗癌疫苗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初步的、卓有成效的成果。他们研制出了“克—罗”制剂，用该制剂对某些癌症进行治疗取得的初步经验表明，这是一项能够在癌症——一种世界科学迄今为止尚未提出一项有效治疗方法的病症——的治疗方面产生一场革命的极其重大的科学发现。

由于原卫生部领导人（米捷列夫）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行为以及原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的公开犯罪行为（他成了美国间谍），“克—罗”制剂连同制剂的生产工艺资料于 1946 年底被送给美国人，这对苏联的优势（优先权）是一个打击，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失。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不光彩的行为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用自己的行动导致“克一罗”制剂的秘密公之于世，导致该制剂落入美国人手中。

还在1945年和1946年初，当“克一罗”制剂在治疗癌症病人方面获得初步疗效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没有为自己的成果保密（因为这项发现还处在萌芽阶段，尚未经过全面的临床检验），相反却为了个人的荣誉开始炫耀自己的成果并把有关发现的消息传扬到国外。因此，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试验和他们实验室的工作引起外国情报机关，首先是美国情报机关的极大关注。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追求的是个人的知名度，因此当后来美国情报机关对他们和他们的实验室发起真正进攻时，他们根本经不住考验。从1946年6月起，在短时间内先后拜访过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有美国驻苏大使斯密特、美国科学院院士瓦克斯曼、美国教授梅特和累斯利。他们这些人来到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实验室，一再要求详细了解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工作的情况，并公开表示愿意提供任何范围的“帮助”。美国人这种实质上无异于收买的“帮助”的要价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同美国抗癌科学界进行“合作”，把“克一罗”制剂、制剂研制及今后任何改进的秘密都送给美国人。

同美国人的这些会见和会谈的结果是，经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同意，原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他是美国间谍——在赴美之前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那里得到了要送给美国人的《癌症的生物疗法》一书手稿、“克一罗”制剂生产工艺介绍材料和10支制剂。

荣誉法庭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这种行为是不光彩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使用苏联的经费在苏联实验室里工作，15年来一直受到苏联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他们本应该把自己的科研成果交给苏维埃国家，而不是送给美国人。但是，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却把秘密从自己的苏维埃国家泄露出去。他们竟

欣然让美国人参观自己的实验室。他们竟然进行有损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会谈。最后，他们竟然干出有损于苏联公民的荣誉和尊严的可耻而卑鄙的勾当——让帕林把手稿、工艺资料和制剂送给美国人，这是危害苏维埃国家和苏联科学的利益的行为，因为交出“克—罗”制剂的研制秘密就意味着苏联失去了优势。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把同美国人的联系看得比同苏联政府的联系还重要，瞒着政府把自己的发现送到国外去，试图欺骗政府并掩饰这一不光彩案件的所有严重后果。

荣誉法庭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迷惑政府、欺骗政府的做法也是很光彩的。

现已查明，当政府开始调查把手稿送给美国人一事时，克柳耶娃和罗斯金大概预感到他们的行为可能会被定为反国家的行为，因此在申诉材料中千方百计地向政府隐瞒事情真相，淡化送给美国人的手稿的意义，谎说手稿中没有“克—罗”制剂生产工艺的关键部分，认为既然帕林没有把生产工艺资料送给美国人，那么送手稿这件事就是无关紧要的。

荣誉法庭经过权威鉴定后确认，手稿中包括了进行必要试验所必需的全部资料，因而等于把工艺秘密泄露出去。所以，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声明，特别是克柳耶娃的声明是想欺骗苏联政府。

荣誉法庭还查明了一个可耻的事实，即作为向美国人泄露“克—罗”制剂的机密的酬谢，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从美国间谍累斯利那儿得到两包贿赂礼品。

把发现送给美国人是以假人道主义为幌子进行的，关于医学科学应该遵循人道主义原则的说法并不能证明这些行为是正确的。众所周知，美国人过去和现在从未把自己的医学发现和制剂送给其他国家，他们根本不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原则，就连那些早已广泛使用并随便卖给其他国家的制剂也常常拒绝向俄国人出售。克柳耶娃和

罗斯金教授不可能不知道所有这些情况，但这并未妨碍他们把自己多年研制的属于苏联人民和苏维埃国家财产的成果送给美国人。

荣誉法庭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在荣誉法庭面前没有做出苏联公民应有的表现，而且依然执迷不悟。在荣誉法庭公审会上，当证人和一些学者发言指控他们的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行为之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在作最后陈述时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诚实和诚恳态度来承认对他们的指控。

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确认，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行为是反国家和反爱国主义的，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 1947 年 3 月 28 日《关于苏联各部和中央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的第 758 号决定^① 第 11 条决定：

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提出公开警告。

荣誉法庭的判决是最后判决。

荣誉法庭的本判决书副本将放进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个人档案。

荣誉法庭主席 A. 沙巴诺夫

荣誉法庭成员 尼·谢马什柯

И. 拉津科夫

C. 萨尔基索夫

M. 科弗里金娜

布占金娜

И. 马伊斯基

1947 年 6 月 7 日于莫斯科市

^① 原文如此。

No 06449

联共（布）中央
致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的非公开信
(1947年7月16日)

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党的边疆区委委员、州委委员、
市委委员和区委委员、苏联各部部长、
中央主管部门负责人和领导人、
苏联各部及中央主管部门党组织书记、
各军区和集团军司令

最近一个时期，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揭露出一些事实，证明在苏联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外国的东西和资产阶级西方现代反动文化卑躬屈膝、有损于我国人民形象的行为。其中最典型的是联共（布）中央揭露的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反爱国主义和有损国家的不法行为的案件。今年6月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审判。

鉴于这一事件的重大政治意义，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各级党组织及各部部长和各部党组织送发这封信，阐明案件的真相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和教训。

联共（布）中央把苏联卫生部荣誉法庭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全部材料发给你们，这些材料包括：部党组织给卫生部部长的呼吁书，荣誉法庭第一次会议速记记录，公诉人在法庭上的发言和荣誉法庭的判决。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在原卫生部部长米捷列夫的纵容下，在美国间谍——原苏联医学科学院学术秘书帕林的积极帮助下，把苏联科学的重要成果——抗癌制剂送给了美国人。他们是苏联的不可信赖的公民，为了追求在国外的声誉和廉价的知名度，经不住美国情报人员的利诱，把属于苏联国家和人民的科学发现送给美国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无视国家和人民的迫切利益，忘记了自己对关心和重视他们工作的祖国的义务，使苏联科学丧失了在这项发现中的优先权（优势），给苏联的国家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失。

从这些材料中你们可以看出，为了取悦于外国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用尽了各种办法。在案件的审理中，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表现得不真诚、不体面，极力掩盖事实，公然说谎，迷惑法庭。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们试图以人道的、“纯洁的”动机来解释自己的肮脏行为。有部里 1000 多名工作人员参加的法庭审判向广大的社会舆论界揭露了这些人：他们道德政治水准低下，行为动机无聊而又卑鄙，连苏联公民起码的荣誉和义务感都没有。

联共（布）中央认为，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大概不是惟一的偶然事件，它说明我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领域的某些阶层在道德政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这些事实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早在去年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以及关于话剧院剧目的两个著名决议中，联共（布）中央就要求特别重视我国某些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的危害性。但是，在联共（布）中央发出这

些严肃警告之后，崇洋媚外现象还在蔓延，甚至涉及到像克柳耶娃这样一些应该把自己获得的知识、工作条件、社会地位归功于苏维埃国家的学者。这更加说明，如果不根除崇洋媚外这种危险的不良社会现象，它就会腐蚀我国知识分子中那些不坚定分子。

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何在？为什么我们苏维埃社会中会有人不顾民族尊严、丧失自尊心，对外国资本家最卑微的出卖灵魂的走卒卑躬屈膝呢？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把俄国人民从外国资本的经济和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苏维埃政权使我国第一次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和先进的集体化农业，实现了经济独立。我国人民完成了文化革命，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国家，打碎了资产阶级西方国家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桎梏。苏联成了世界文明和进步的堡垒。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社会主义体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苏联发挥世界历史作用的情况下，怎么还会卑躬屈膝和不相信自己人民力量的可耻现象呢？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会有崇洋媚外的情绪呢？

这种反爱国主义的情绪和行为的根源在于，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仍然是万恶的沙皇俄国的残余的俘虏。沙皇俄国统治阶级依靠外国，长期以来将俄国置于落后和被支配的状态，因此，他们给知识分子灌输的是我国人民落后的思想并使知识分子相信俄国人永远是西欧“老师”的“学生”。同时对居住在沙皇俄国的其他民族也采取这种态度，无视他们的科学和文化，沙皇俄国统治阶级脱离人民，与人民格格不入，不相信俄国人民的创造力，认为俄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落后状况。从18世纪起外国人纷纷涌进俄国，他们把自己看做是高贵种族和高级文化的代表。所以，18—19世纪俄国贵族阶层逐渐失去自己的民族特征和传统，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语言，盲目地摹仿法国的一切。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后来，俄国

贵族对法国习俗和法国文化推崇的现象又被俄国统治阶级对德国人卑躬屈膝的态度所取代。

俄国科学始终因崇洋媚外现象而受到损失。由于不相信俄国科学的实力，所以俄国科学家的科学发现得不到重视，致使俄国科学家的重大发现纷纷转给外国人或被外国人剽窃。罗蒙诺索夫在化学领域的伟大发现被说成是拉瓦锡的，伟大的俄国科学家波波夫发明的无线电通讯被意大利的马可尼剽窃，俄国科学家亚布洛奇科夫发明的电灯也被外国人据为己有，等等。

所有这些都对外国资本家有利，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把我国人民的财富用来为他们的自私的目的和利益服务。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在俄国支持和培植俄国人民文化上和精神上的低劣思想。俄国的科学和文化同沙皇俄国其他民族的科学和文化一样，始终是在同使它丧失独立性、遭到西欧文化轻视的种种尝试进行无情斗争中发展和锻炼起来的。

卑躬屈膝的第二个根源是周围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知识分子最不坚定阶层的影响。美英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不惜代价要在苏联内部建立情报和反苏宣传据点。外国情报人员为了在我国内部建立一些施加影响的阵地所作的努力是众所周知。他们知道，我国工人、农民和士兵能够坚定地捍卫苏维埃国家的利益，绝不会干出有损于我国荣誉和尊严的事情，于是他们便积极寻找不坚定和易攻破的环节，并且在沾染了卑躬屈膝和丧失自信等病征的我国某些知识分子中找到了突破口。因此十分清楚，帝国主义走狗试图千方百计地支持和助长某些人意识中极其有害的资本主义残余，以便削弱苏维埃国家，在思想政治方面瓦解最不坚定的苏联公民。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清楚地表明，正是那些沾染了对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的奴才思想的人容易成为外国情报人员的猎物。

我们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应该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中得出

什么结论呢？

1. 由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的现象已造成一定影响，党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用苏联爱国主义和忠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精神教育苏联知识分子，培养他们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性格，使他们能够抵制外国情报人员的任何狡诈的手段，能够在任何情况下不惜任何代价捍卫苏维埃国家的利益和荣誉。各级党组织应该孜孜不倦地向我国人民宣讲斯大林同志的指示，他说，即使是“最次的一个苏联公民，只要他摆脱了资本的桎梏，也比任何一个套着资本主义桎梏的外国高官高出一头”。

2. 经验证明，荣誉法庭在培养苏联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出很大作用。由于法庭在审判过程中把对一些人的具体行为的调查同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来，由于荣誉法庭具有广泛的公开性，从而使诉讼程序产生巨大的道德威力，使荣誉法庭成为我们政治教育工作的强大杠杆，这是一般抽象的政治宣传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这说明，荣誉法庭是教育我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新型的而且是非常有效的形式，必须加以鼓励和发展。

3.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还表明，在我们国家机构一些工作人员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存在放松警惕、宽容和不负责任的现象。面对资本主义敌对势力的包围，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不像是国家政治工作者，而像是一些无原则的、不问政治的、失去布尔什维克本色的、甘愿上钩的人，听了几句奉承和好听的话就为外国情报人员提供一切服务。如果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重视我们，我们就应该首先尊重自己。任务在于要使我们的人民学会保持苏联人应有的尊严。

4. 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还暴露出各部党的政治工作薄弱。这个工作不是经常地开展，往往只是在纪念日和运动时才搞一搞，而且与各部最重要的现实事件相脱节，没有把真正用布尔什维克精

神教育部里工作人员作为中心工作。各部党组织的工作应最坚决地克服这一严重缺点。

中央委员会建议党的州委委员、边疆区委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市委委员和区委委员认真阅读这封信及所附材料，还要在苏联各部、中央主管部门、高等院校、科学院和科研院所党组织中进行宣传和讨论^①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

1947年7月16日^②

①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随后责成各党组织把讨论情况和相关决议报送中央。联共（布）组织部曾于1947年8月27日、10月25日和12月26日三次研究了全国的党组织开展讨论的情况以及进行总结的问题，并责成有关部门直接监督非公开信中措施的落实以及党的会议上揭露出的问题的处理情况。

② 非公开信是由日丹诺夫亲自起草的。

【专题说明】

关于中央各机关的“荣誉法庭”

(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苏联与战时盟国的关系从合作转向对抗，以及国内出现了要求变革的倾向和思潮，苏联领导人采取了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措施。1946年，展开了清除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运动，其信号是对《星》和《列宁格勒》两家文学刊物的处理。批判运动迅速由文学发展到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方面，1947年开始波及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而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则成为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进行批判运动的标志。与此同时，作为加强对社会意识的影响的措施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新方式，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政府各部和中央机关成立荣誉法庭，以处理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反爱国主义、反国家、反社会”行为。受斯大林的委托，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苏斯洛夫、库兹涅佐夫负责有关荣誉法庭文件的起草和措施的落实。1947年4—10月，在82个政府部和中央主管机关选举成立了荣誉法庭。荣誉法庭的任期原定一年，1948年将其延长了一年，以后再无延长任期的决定，因而荣誉法庭实际存在到1949年底。本专题共收录了有关在中央机关成立荣誉法庭的6个文件。这些文件从一个方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22卷

面反映了战后初期苏联社会政治生活的特点和苏联领导层对战后新形势的认识及其思维方式。

(本专题文件由姚海编辑和校注，

刘明骞译)

№0448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
中的荣誉法庭的决议**

（1947年3月28日）

1.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案（文本附后）。
2. 两周内首先在卫生部、商业部和财政部成立荣誉法庭。

附 件

**关于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的决议**

1. 为了用苏维埃爱国主义和忠诚于苏维埃国家利益的精神教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使其深刻认识到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以便同有损于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荣誉和尊严的不良行为作斗争，决定在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成立荣誉法庭。

2. 荣誉法庭负责审查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工作人员和科学工作者的反爱国主义、反国家、反社会的行为和活动，如果这些过失行为和活动不在刑事处罚之列。

3. 荣誉法庭由5~7人组成，其成员应在各部或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工作人员和科学工作者大会上以不记名投票的方式从各部或

各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之中选举产生。各部或主管部门的党组织的代表以及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可以成为荣誉法庭的成员。

4. 在各部和各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大会上，无论是党和工会组织，还是参加会议者均有权推荐荣誉法庭成员候选人。列入荣誉法庭成员候选人名单或从这一名单中撤消的问题均以公开表决的方式确定。

获绝对多数票的候选人被认为当选。

部长和主管部门的领导人不能当选为荣誉法庭的成员。

5. 荣誉法庭的主席由法庭成员以公开表决的方式在其成员之中选出。

6. 法庭任期1年^①。

7. 负责向荣誉法庭提交案件的或者是各部部长和主管部门领导人，或者是工会组织，或者是各部以及各主管部门的党组织。

8. 荣誉法庭在审查案件之前，应由法庭成员根据庭长的委托对事实进行核查。由庭长确定，谁将作为证明人被传唤。

9. 荣誉法庭通常在公开的大会上审理案件。

荣誉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包括：审查所收集到的有关案件的材料，听取证人提供的情况，核查相关证据。

荣誉法庭在审理案件时，参加法庭大会的各部或者是各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就案件的实质进行发言。

10. 荣誉法庭的判决由法庭成员的简单多数票通过。判决书中应指明错误行为的实质和法庭确定的惩罚措施。

11. 荣誉法庭可以做出下列决定：

1) 对被告人进行公开的谴责；

^① 1948年7月7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做出决定：将荣誉法庭的任期再延长一年。

- 2) 对被告人进行公开的警告；
 - 3) 将案件移交侦查机关，然后依照刑事程序提交法院。
12. 荣誉法庭向被起诉的工作人员公开宣读法庭的判决。
荣誉法庭判决书的副本应进入工作人员的个人档案。
13. 对荣誉法庭的判决不得提出上诉。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约·斯大林
联共（布）中央书记 安·日丹诺夫

№0448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联共（布）中央机关
荣誉法庭的决议

（1947年9月23日）

1. 认为必须在联共（布）中央机关中建立荣誉法庭。
2. 确定荣誉法庭由7人组成。

№04489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关于在联共（布）中央机关中
选举荣誉法庭的决定

（1947年9月26日）

1. 决定今年9月29日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
进行荣誉法庭的选举。责成亚·亚·库兹涅佐夫^①在人会上就成立
荣誉法庭问题作报告。

2. 批准附件^②所列的参加选举荣誉法庭会议的人员名额。

① 库兹涅佐夫，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1905--1950），1925年入党，1938年起担任列宁格勒州委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41~1944年间列宁格勒防御战的组织者之一，1943年获中将军衔，1945年出任列宁格勒州委和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间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组织部成员。1950年10月因所谓“列宁格勒案件”而被逮捕并遭处决。1954年4月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为其平反。

② 所收集档案中无此附件。

№04490

**联共（布）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
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选举荣誉法庭的大会上的报告**

（1947年9月29日）

同志们，正如你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根据部长会议和党中央的决定，在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都应成立荣誉法庭。

党中央委员会确认，在我们知识分子某些阶层的意识中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有害残余，对外国的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卑躬屈膝；在此之后，提出了成立荣誉法庭的必要性问题。因此，荣誉法庭的首要任务是用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使之认识到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同有损于苏维埃工作人员的荣誉和尊严的不良行为进行斗争也是荣誉法庭的任务。

在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案件的非公开信里，以下列方式明确了荣誉法庭的意义：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分析人们的具体犯罪行为要同政治教育工作结合起来……（宣读摘录的文件）”。

荣誉法庭负责审查苏联各部和中央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工作人员和科学工作者的反爱国主义、反国家、反社会的不法行为，如果这些行为不在刑事处罚之列。

各部和各主管部门中的荣誉法庭选举结果，以及卫生部成立的荣誉法庭都证明了政府和党中央委员会决议的正确性。现在，已经

可以这么说：由于进行选举，各部和各主管部门以及各科研所的工作人员的纪律性提高了，警惕性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责任感增强了。

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信中——现在可以称之为历史性的信件——提醒人们：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教授的案件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它清楚地证明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某些阶层——特别是在文化领域工作的——政治道德状况严重低下。中央委员会非公开信中的这个论点是完全正确的。正如已被查明的那样，目前可以说，在我们的各部和各主管部门的很多领导人员中存在着大量的卑躬屈膝的情况。请允许我举几个例子。

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揭露了水文气象观测站原负责人费奥多罗夫在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的行为。只要指出下面这些情况就足够了：我们水文气象观测站的全部资料，其中包括绝密的研究资料都已经落入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手中；同时，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我们的水文气象观测站发号施令，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有关此事还有下列事实：根据远非完全的统计资料，海军武官在不同的时间光临总局接待室——88次，美国水文气象观测站的代表——55次，军事代表团工作人员贝肯斯——41次，克洛德——20次，……^①——18次等等。

事情竟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在这个部里搞了一个专门的办公室，这些侦察人员在这里发号施令和研宄机密文件，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同时，还将印有“绝密”、“供内部使用”字样的文件送到英国人和美国人手里。把信息资料、具有保密性质的信函定期寄给他们，而且还用一些理由作这种行为的借口，就像分送给党中央的各位书记一样。

根据部长会议和党中央的决定，费奥多罗夫已经被免职，剥夺

^① 此处原件文字难以辨认。

了中将军衔，近日内荣誉法庭将对其进行审判。

农业部全苏农艺学研究所负责人什雷科夫，不久以前将多年生苜蓿的样品寄给了一个在莫斯科的外国人。在给这个外国人的信中，什雷科夫还答应给他寄一年生苜蓿的种子，但他没能得逞。

交通部的教授波波夫，在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将自己的论文《正（交）焦距理论》刊登在美国的杂志上。这篇论文在设计车辆运算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篇论文里，波波夫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而这最后却变成了美国人的财富。

这样的事实在石油工业部、森林工业部、科学院，在一系列学术和科研机构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今天，在这个会议上，我将不再谈我们知识分子阶层中一些人存在的这些卑躬屈膝行为的根源，因为这一点在中央非公开信里已经全面和详细地进行了阐述。

在中央委员会的非公开信里，已经指明了肃清这些流毒的道路。首先，应该用苏维埃的爱国主义、忠诚苏维埃国家利益的精神教育知识分子，要同温厚善良和粗心大意作斗争，加强警惕性，最后，还要加强在各部、各主管部门、高校以及科学研究所的党务和政治工作。

为了实现这些任务，实现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识根本转变，在他们中间发扬苏维埃民族自豪感，发扬独立自主的精神，使他们理解先进的苏维埃文化对于腐败落后的资产阶级文化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应该开始对党本身进行改革，从党的机关开始，首先是从党的最高机关——中央委员会机关开始。

为此，要求在整个党的机关中、首先是党的中央委员会机关中作些什么呢？

首先，必须消除中央机关在实践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缺点，以使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和整个中央机关适应我们所面临的任

务。

在加强和改善党的政治工作方面，在战后恢复和继续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工作方面，我们党的机关一直起着重大的作用。

我们国家经济实力的加强，我们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环节的工作有条不紊，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务机关——它负有坚定不移地执行我们党 联共（布）的政策的责任——工作的好坏。因此，全面改善党务机关的工作是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

在改善我们机关的工作以及教育它的工作人员的事业中，要求中央机关的荣誉法庭发挥重大的作用。

我毫不怀疑，我们今天的到会者都一致赞同联共（布）中央《关于在中央委员会机关中成立荣誉法庭》的决议。（掌声）

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是健康的、富有工作能力的，它善于执行中央委员会的路线并为之而奋斗。但是，我的任务不是谈它的成绩和取得的成果，也不是谈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中好的方面。相反，我的任务是以布尔什维克的坦诚来揭示它的缺点。况且，我们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并非是一些完全正确的人，而我们的机关，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是在干部自身错误的基础上培养他们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拥有足够的事实可以证明，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些工作人员有反爱国主义、反国家、反社会的不法行为；这些行为被揭露后，在比较好的情况下，在部门党务会议的小范围内对此进行过讨论。对这些不法行为的分析没有被利用来教育整个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而这一点正是须要做的，因为在机关的某些领导人中已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观点，认为既然这个人已经在中央里工作了，那么他的职能只是监督和教训别人，而他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党务活动家已经是完善的了。这样的同志已经忘记了经常在政治上自我完善和培养我们的积极分子的必要性。应该把能

够受托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看做是一种荣幸。中央委员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应该成为我们祖国的真正爱国者，在为维护国家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中成为榜样，在道德和纪律方面成为表率，竭诚地对待自己的党务职责，也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具有高度思想水平的党的干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应成为国家公务人员的榜样，而党的中央委员会机关在整体上应成为所有其他的部和主管部门的榜样。

党始终都在关怀着自己的党务机关，党一直在为其队伍的纯洁，首先是它的机关的纯洁进行斗争。与此同时，一些在党的知识方面受教育较少的同志认为中央的工作同普通的公务一样，在中央机关上班工作被认为是履行某种义务：坐满规定的时间就一边去了。这些人忘记了他们是党的领导人员，而不是官吏；忘记了不是每一个党的积极分子都有幸能来到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对于这些同志来说，中央并不是最神圣的地方。当迈过这座大厦的门坎时，他们没有体会到一种崇高的感情。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领导干部中间还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不应被称为官吏或官僚，但是有这样一些人敷衍了事地对待自己的党务职责。而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工作不应被看做是一种公务，而应该看做是一种党员的义务。他们不是全力以赴地进行工作，对待托付给他们负责的领域里的工作漫不经心，也不研究国内发生的现象，不作有关的总结，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就是允许自己的工作出差错。应该永远记住，联共（布）中央的某个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哪怕是出现极小的疏忽和差错，都会立即给党和国家相应部门的工作带来负面的影响。为了证明这一点，请允许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吉尔^①的《与弗拉基米尔·伊里

^① 吉尔，斯捷潘·卡齐米罗维奇（1888·1966），1917～1924年间是弗·伊·列宁的司机，1930年入党。

奇·列宁在一起的六年》就是一本政治上有害的小册子，它的出版给劳动者思想教育工作带来了危害，因为这本小册子是杜撰的，它歪曲了历史事实，损害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形象。党中央委员会已确认，这件事是由于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和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在出版有关列宁的材料时没有责任心，违反了联共（布）中央1938年8月5日做出的关于禁止出版未经中央批准的描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平事迹的书籍和小册子的决议。

中央决议中关于出版吉尔的小册子一事是这样说的：

“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出版了这本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小册子，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本小册子的实际组织者是韦尔比茨基——一个文学投机商，在几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利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生平资料进行投机钻营活动，纠缠不休地向各个出版社推荐出版。”

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像吉尔的书这样的书籍能够出版，只是因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对于出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生平事迹书籍的工作没有进行应有的监督。

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出版局局长莫罗佐夫，出版局顾问季诺维也夫和宣传局局长科瓦廖夫轻率地处理出版吉尔的书一事，被一些修改过的词句所迷惑，没有弄清楚整个事情的实质，就批准了该书的出版。

在决定出版关于列宁生平事迹的书籍和小册子这样重要的事情上，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缺乏最起码的程序。签发出版关于列宁生平书籍的人不是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的领导人，而是研究院普通的工作人员……

党中央委员会惩处了在这件事情上犯有过错的工作人员。但是在今天的会上我还想提一个问题：怎样评价党中央委员会机关以及

苏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这种非党性地对待自己的义务和职责的行为呢？

毫无疑问，这些行为应该被认定为是反国家和反社会的行为。因此，那些仍然怀疑我们这里是否存在着可以送交荣誉法庭进行讨论的案件的同志可以确信：我们这里存在着大量这样的案件。

让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个例子。不久前，国家监察部查明，在北方海上航道管理局的一些领导人和学者中存在着反爱国主义和反国家的事实，一些研究北极的最重要学术著作——它们已构成国家机密——被交给了美国人。一共给了美国人 2000 份书籍、小册子和非公开论文，这些资料暴露了过去 25 年里对北极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具体结果。你们知道，美国人现在对北极是多么感兴趣。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北极的一切全都交给了美国人。我不再列举这些例子了。

如果有责任对这个机构进行监督的党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人员真正实现这种监督，如果他们感觉到对党和国家负有责任，为我们国家的命运担忧，这种担忧就会表现在工作中，那么自然就有可能及时地防止这一切的发生。但是这一点没有做到。

请允许我列举几个我们党内生活以及工作实践中的例子。

我想说，在党的发展问题上对州党委员会没有进行令人满意的及时的监督，结果导致对党员数量的追求，而给在党员中开展政治工作造成了损失。

还应该说一下，在联共（布）中央机关的一部分领导人员中存在着道德败坏和不成体统的行为，这种情况对于党员来说是不能允许的，更不要说是联共（布）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了。

举两个例子。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宣传员库拉金显然没有珍惜中央工作人员的崇高荣誉以及中央的信任，本月底，他在莫斯科的一户住宅里被民警局的工作人员发现时处于醉酒后神志不清的状态，

并被扒掉了衣服，遭到了抢劫。试问，这是什么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还有干部部的视察员斯米尔诺夫。在到明斯克出差期间，与荡妇混在一起，表现得极为不成体统，明斯克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把他送到民警局。

还可以列举一些事实，但我认为，这些就足够了。

还有一些机关工作人员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对待中央的文件，甚至将文件丢失。对外政策部的视察员什库罗夫将非常机密的文件丢在了通行处。干部部的视察员苏斯利亚耶夫从第5/8号楼到第14号楼时，将机密文件放在写字桌上，过了一个月，被联共（布）中央大楼的保安人员发现了。

还有一个例子。8月28日对机密文件的保管状况进行了检查。检查的结果发现，在罗曼诺夫同志没有锁好的办公桌里放着一个公用笔记本，上面有供给整个苏联、各地区以及各加盟共和国的工业和农业用的燃料装运地点。从这份文件中可以了解燃料生产的规模和地点、铁路的运输能力以及需要农用燃料的地区。

应该知道，有关经济活动、苏维埃活动、我们党和国家活动的状况，有关国防措施和对外政策等方面的资料都汇集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因此，联共（布）中央机关的工作，不论何种职务，按照其性质来说全都是机密的。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每一位工作人员在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业务素质的同时，应该具有高度警惕性、守口如瓶，善于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这一点应该成为每一位党的领导干部的不可缺少的品质。我们应该永远牢记：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这是我们同敌人进行斗争的锐利武器，是不可违背的苏维埃人民的生活法则。

在今天这个大会上，我想提醒我们的工作人员，所有这一切在中央的一系列非公开信中已经做了阐述：1935年1月18日“关于残暴杀害基洛夫同志事件的教训”、1936年7月29日“关于托洛

茨基-季诺维也夫反革命集团的恐怖活动”、1935年5月13日“关于签发和保管党证的混乱局面以及采取的整顿措施”、1941年7月29日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这些信件的主要思想是真正提高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斯大林同志在1937年的党中央二、三月全会上也着重指出了这一点。斯大林同志说，各个资产阶级国家，无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怎样，他们总是经常地互相派出大量的间谍分子。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派到我们国家的间谍要少一些。正相反，资产阶级国家派到我们国家的间谍要比派到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多2-3倍。

目前，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对我国采取了更加公开的反动政策。美国打算全力以赴地实现自己的计划，并公开号召采取反对苏联的新步骤。斯大林同志说：“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苏联崛起并有可能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感兴趣的，他们竭尽全力地在内外政策上给我们施加压力。在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苏联拥有的这样的社会力量，人民的党，是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的，他们是永远不会为外国服务的。”因此，在进行针对我国的破坏活动时，外国间谍机关的首要目标是我们的某些不坚定的工作人员。

在目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增强对保守国家机密的责任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在我们的中央机关里有这样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喜欢传播新闻，散布只在小范围内讨论过的问题。很遗憾，我们这里还没有杜绝家庭内部的闲话。工作人员回到家里，把我们机关里做的事讲给家里人听。把新闻讲给妻子听，而妻子又讲给邻居听，邻居再讲给自己的好朋友听，这样一来，新闻也就成了公众的财产了。这样的事曾发生在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提高价格的决定上。决定是绝密的，但是，还是通过家庭闲谈传出去了，最后莫斯科的居民都知道

了。

在这里，我不想委屈谁，也不想侮辱谁，我说的都是人们议论的。难怪我们这里有人说，要想知道新闻，请到‘莫扎伊卡’^①（大厅里活跃起来了，一片笑声）。

在我们的各部和各主管部门里就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经常是每周一次或者是每周一次定期到中央委员会来“获取一些信息”。怎么理解这“获取一些信息”呢？也就是了解一下有关国际路线方面有什么新闻，等等。然后就拨弄是非。而我们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发现这一点，无休止地闲扯。下面我就说一说这种情况。斯大林同志说得很对，有一些人不是被自己的大脑、而是被自己的舌头来支配。斯大林同志说：“如果一个人有舌头，并能善于使用和管理它，那么，这个人平凡的人；而如果一个人是被自己的舌头管理和支配的，那么这个人就是不平凡的人。”（笑声）如果一个人用自己的舌头管理和支配行动，那么他甚至不会知道什么时候、无意中泄露了什么。

在我们的中央机关里就有这样一些人，他们甚至不记得，他们曾经闲扯过什么。我再谈一谈这些人，他们经常忘记自己曾经乱说过什么。我们的一些比较喜欢闲谈的工作人员，他们想像不到，他们所说的东西往往会被外国的间谍机关利用；他们本身自然是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的，虽然他们都是对自己比较亲近的人说的。但是，不应该忘记，别人知道了秘密，尽管是比较亲近的人，也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同志们，我们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注意到，外国的间谍机关千方百计地想钻进我们党的心脏——中央机关。如果外国的间谍

^① 当时联共（布）中央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居住的地区，在莫扎伊斯克公路旁。这一路段在1957年改名为库图佐夫大街。

机关没有办法俘获我们工作人员本人，那么，它会设法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亲人和朋友来达到目的。

我举几个例子。在这些例子里要出现几个姓名。我不愿意怀疑这些同志进行间谍活动。但是，既然我要列举这些例子，那么不得不谈到这些名字，自然，他们已经被中央委员会机关开除了。

今年年初，综合技术博物馆外语培训班的女学员哈尔拉莫娃，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与外国的间谍机构有关系，在她母亲的家里，她把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托卡列夫介绍给了一名美国特务。那么，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与一名间谍之间会有什么共同语言呢？接下来就清楚了，托卡列夫与这个间谍人员一起喝酒，推心置腹地进行交谈，但是，这一点他没有对党中央的任何人讲。试问，间谍机关为什么会对他感兴趣？难道是因为他是一位漂亮的男子而与他交往？不，他们是想通过这名工作人员来获取中央的一些情报。

第二个例子。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加里宁，通过其姐姐与一位美国女公民相识，这位美国女公民是从事间谍活动的，而我们这位加里宁却与她定期会面，甚至已经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难道能够允许我们的机关工作人员这样？他被开除了。我不知道，今后在他身上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机关里有一位叫切尔文采夫的工作人员，他有一个熟人，他的这个熟人与英国使馆的一名职位很高的人——使馆的秘书——有关系，而这位秘书已经被我们查明是一名特工人员，这种熟人关系却瞒着中央。

大家看到了吧，间谍机关是如何工作的。如果不能通过我们的工作人员本身，就通过他们的熟人来获取他们需要的情报资料。

不久前，我们揭露并逮捕了国家外国文学出版社的社长，以前

曾在宣传部工作过的苏奇科夫^①，他是美国间谍机关的代理人。在审讯时苏奇科夫供认，他对苏维埃政权充满了敌意，与美国的特务机关建立了联系，被美国大使馆招募为美国进行间谍工作。正如已查明的那样，他在几年的时间里一直向美国间谍机关提供他所了解的有关出版社和党中央机关的情报。

在这里我想停一下，并向亚历山德罗夫^②同志——如果他今天也在场——和谢尔巴科夫^③同志提一个问题：苏奇科夫被推荐到机关工作，他在党务工作方面具有什么才能？为什么他突然进入党的委员会里？

请允许我简要叙述一下他的简历。苏奇科夫生于1917年，直到1941年中期以前他还在学习，没有什么生活阅历。1941年入党，在党的队伍里时间很短，没有做过党的基层工作，对党的基层工作也不了解。还能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呢？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在党的机关工作的。对不对？

（座位上有人喊：正确）。

试问，为什么亚历山德罗夫同志将他调入中央机关？是不是由于他懂得外语和外国文学，就将他调入机关，做领导工作？他是作为专家被调入机关的。专家——这也不是偶然抛出的一个单词。当我们在中央书记处批评亚历山德罗夫同志所在部门的工作很糟时，

① Б.Л. 苏奇科夫在1955~1956年获得平反并重新入党，后来担任国家文学出版社副总编。

② 亚历山德罗夫，格奥尔基·费奥多罗维奇（1908~1961），哲学家，194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40~1947年间为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③ М.И. 谢尔巴科夫，时任联共（布）中央干部部部长。1947年10月23~24日，联共（布）中央荣誉法庭审查了中央干部部部长 М.И. 谢尔巴科夫和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К.С. 库扎科夫丧失警惕、玩忽职守、推荐苏奇科夫到中央机关工作的案件。荣誉法庭决定对他们两人进行公开谴责。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决定将他们开除出党。斯大林逝世之后，他们在1955~1956被恢复党籍。

他经常使用这个词。他说：“我的部里共有25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都是专家。”

我想问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党中央机关挑选的干部，是作为专家，而不是党的活动家？

还在5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就已明确指出，光是学者的称号不能成为做领导工作的理由。在90年代，马克思在《社会民主党人》上写道：他们就会清楚，他们所拥有的学院派的知识须要经过认真的批判性的自我检验，而完全不能给予他们在党内的官级和相应的岗位。我们党内的每个人都应该从最普通的工作做起。为了在党内的负责岗位上工作，只具备文学才能和理论知识是不够的，甚至在无可争议地具备以上两方面条件时，也还要求熟悉党的斗争条件，充分掌握斗争的方法，个人的忠诚经得起考验，性格坚强，自愿参加党的工作，等等。

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早在60年前就明确的东西，今天我们的一些领导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

斯大林同志曾就挑选我们党的中央机关干部的原则给过我们指示，我们应该遵循这些原则。斯大林同志把这些原则归纳为三点。

第一，要使那些我们将要安排到党中央机关工作的工作人员懂得党组织的工作，首先应该懂得地区级的党组织的工作。

第二，应该是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

第三，应该了解我们党的政策。在我们这里，我敢说，在党的中央机关里有这样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党的政策，而是坐在那里凭空想像自己是了不起的活动家，并去教训别人。

这样，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并考虑到我们这里存在的违纪现象，或者说，根据自我批评的方法，根据党的选拔中央机关干部的原则，我们应该审视一下，我们机关里是不是也有仅仅是专

家的工作人员？我们是不是要帮助这些同志成为真正的党的工作人员？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派他们到基层工作，而有些人看来是应该转为从事专业工作的。我想，你们会赞成我这个说法的。（喊声：“正确”。）

正如现在同志们承认的那样，苏奇科夫被提拔是因为他帮助亚历山德罗夫写了报告，而且还有朋友关系。

再回到苏奇科夫的案件上。应该提出第二个问题：是否有可能揭露他，或者因为这是一个狡猾的、伪装好的敌人，因此很难揭露他。已经清楚，有足够的事实揭露他。

第一，1943年2月，中央委员会决定停止《外国文学》杂志的出版，该杂志的编辑就是苏奇科夫。停止出版这本杂志是因为，该杂志成了传播英美资产阶级文学的工具，并给苏联带来了政治危害。此外，停止出版该杂志并不是根据中央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的建议，不，这是根据已故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谢尔巴科夫^①的建议，一些同志也写了报告，正如在调查中确定的那样，他们在报告中也阐述了自己的想法。我读一下报告：“杂志主要刊登的是英美作家的一些作品，同时，选材也非常片面。那些带有对英美制度批判的材料都被从杂志上排除了。”“杂志刊登了大量外国和苏联的短篇小说、特写和论文……杂志在自己的一系列文章中，事实上对英美报刊评价英美在这场反对德国的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表示赞同。”“已经查明的事实是：编辑部在发表这些作品时犯了替英美做宣传的错误。杂志把英美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条件理想化，成为英美在我们国家进行宣传的喉舌。”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已经查明的情况。

^① 谢尔巴科夫，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1901-1945），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6年起先后担任过列宁格勒等州的州党委书记。1938~1945年间担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1941年起担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2年起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副国防人民委员，苏联新闻局局长。

请允许我援引一些苏奇科夫关于杂志这个问题的供词。他供认：“国外文学界的代表知道我崇拜外国文化并同外国人有联系，便通过我的帮助把反动的作品和文章塞进《世界文学》杂志。由于我的犯罪行为，外国作品和其他文学材料渗入了苏联杂志，这些东西使苏联知识分子迷失方向，并且造成了有关英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和政治的虚假印象。我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系列英美作家的作品，它们美化和夸大了英美在这场战争中的军事努力。这份苏联杂志开始被伪装成记者和作家的外国间谍人员广泛利用。英国记者P……约翰在《世界文学》杂志发表报道就是一个例子……（读）”。

你们怎么想，这些事实是否足以不仅将他免职，还应该开除出党——最低限度。

而在此之后，却有人向谢尔巴科夫^①同志建议，将他（苏奇科夫）安排到中央机关里工作，并说这是为了阻止他攻击中央委员会。利用谢尔巴科夫同志去世的机会，他终于挤进了中央机关。这是亚历山德罗夫、谢尔巴科夫^②、库扎科夫干的。

我们的党组织又做了些什么呢？

在苏奇科夫被解除在杂志的职务之后，1944年9月，莫斯科委员会书记索科洛夫对苏奇科夫给予了下列评价：“在担任《世界文学》杂志的编辑和外国文学部主任期间，能够胜任工作。”显然，应该质问一下索科洛夫，他依据什么与这样的鉴定往中央委员会送。而我们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读这样的鉴定时认为这是谎言，但又什么事也不做。

同谢尔巴科夫（他现在已被解除职务）类似的这些人，在对待

① 指亚·谢·谢尔巴科夫。

② 指M.H. 谢尔巴科夫。

苏奇科夫的事情上，把同志感情放在了第一位。

（施基里亚托夫：还想掩饰。）

第二个事实——苏奇科夫与外国人的公开联系：有外国记者参加的家庭聚会，主要是在宾馆里进行的互访，等等。

如果党组织哪怕是稍微注意一下苏奇科夫的日常生活，就马上会发现问题：他为什么同外国人联系。党组织不关心党员的日常生活以及他的交际范围，这是不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第三个事实——为托洛茨基分子科佩列夫^①辩护。苏奇科夫请求释放被关押的科佩列夫，他是1946年11月被逮捕的。苏奇科夫与科佩列夫一起在列宁研究院学习过，并在一起进行过反苏的谈话。苏奇科夫决定搭救自己的朋友，并给检查长阿法纳西耶夫同志写了一封信。检查长将苏奇科夫叫到面前，并对他说：“你这样做是不正确的，我将把文件寄给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同志。”

苏奇科夫希望预防事情的发展，他跑到库扎科夫那里说：“我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我是不是应该写一份说明？”库扎科夫说：“也可能会找你谈话。”果然，谢尔巴科夫把他叫去，同志式地数落了他几句，这件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后来，我曾了解过，是否有人知道这封信。结果是都不知道：对中央书记隐瞒曾经有过这样一封信。

第四个事实——关于他的反苏言论。正如后来查明的那样，很多同志都知道苏奇科夫曾发表过反苏言论，但大家都默不作声。

第五个事实——是他的过分的“求知精神”。当他还在出版社工作时，他就有任务了解所有的机关，弄清情况，以便尽快把最新情报送交美国大使馆。而正是由于我们中央机关的领导干部们过多的闲谈，使苏奇科夫得以了解很多情况并告诉了美国人。例如：他

^① 科佩列夫，列夫·季诺维也维奇（1912年生），文艺学家，作家。

从我们的领导干部那里听到了派遣一系列工作人员到国外去执行任务的情况，并且能说出具体的姓名。后来大家都很吃惊——为什么我们的人连遭不幸。因为人家早就知道，谁到哪里去。

还有，他从库扎科夫和谢尔巴科夫那里得知了我们国家正在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后，立即告诉了美国人。这里指的是有关核产品的问题。从叶戈林^①同志和弗拉迪金同志那里了解到摩尔达维亚粮食极其缺乏以及很多人死于饥饿的情况。他们正在谈论这件事的时候，苏奇科夫来了，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苏奇科夫案件以及我所列举的这些例子，都说明了我们中央机关各个部门的不良状况。由此我们应该得出相应的结论，首先是要提高警惕性。

警惕性应该是苏联人必备的品质。警惕性——如果你们愿意——应该成为我们的民族特点，体现在苏维埃俄罗斯人的性格中。而首先是我们党的工作人员应该具备这种警惕性。无论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中，在每一个实际工作步骤中，在日常生活中，警惕性都应该体现在党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行动中。警惕性应该体现在某个党的工作人员对同自己一起工作和相互交往的人的仔细考查之中。有警惕性的人经常会想：他自己的行动或者别人的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应该严格地保守国家的机密。如果谁不能保守国家的机密，那么他就可能是敌人求之不得的宝贝，成为敌人的帮凶。应该记住，外国的情报机关正竭尽全力地刺探我们国家的机密，为此目的他们经常利用我们某些工作人员的闲谈、自吹自擂以及粗心大意。

^① 叶戈林，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1896～1959），文艺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46年）。1925年入党。1944年担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文学艺术部主任。

关于中央各机关的“荣誉法庭”

同志们，事实就是这样的。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应该加强我们的机关，对我们机关的工作人员应该更加严格要求。毫无疑问，在这方面荣誉法庭将会给予中央书记处很大的帮助，你们无疑会选出最值得信赖的工作人员组成荣誉法庭。

为了使我们各部、处的党组织更积极地开展工作，应该全力发展和支持健康的批评，要使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我们机关里发扬光大。

同志们，我相信，从今天我们党中央书记处的批评中，你们会做出相应的布尔什维克的结论，并会更加努力，使中央机关的工作更加完美，就像斯大林同志要求我们的那样。（雷鸣般的掌声）。

№04491

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 关于成立荣誉法庭的决议

（不早于1947年9月29日）

在听取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亚·亚·库兹涅佐夫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在联共（布）中央机关成立荣誉法庭的决定所做的报告并进行讨论之后，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大会热烈拥护这个决议。

荣誉法庭是用苏维埃爱国主义、忠于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精神教育我们知识分子，同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卑躬屈膝行为进行斗争的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在联共（布）中央机关成立荣誉法庭的决议要求对联共（布）中央机关进行改革，使机关的全部工作适应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最近一个时期向党和全体人民提出的那些重大任务，提高联共（布）中央机关的每一名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无情地揭露和鞭撻所有纪律性不强、事务主义以及对所承担工作的非党性态度的表现。

荣誉法庭是在与反爱国主义、反国家、反社会以及贬低苏联人民尊严的行为所开展的斗争中进行政治干预的强有力手段。

会议认为，联共（布）中央机关成立荣誉法庭是必要的。对于一名共产党员来说，能在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是一种崇高的荣誉。联共（布）中央机关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应该成为具有布尔什维克党性、高度思想和组织水平的典范。我们每个人的职责是：在

关于中央各机关的“荣誉法庭”

与任何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卑躬屈膝的行为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中，成为所有机构和部门工作人员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榜样，成为坚定不移地完成党提出的用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和苏联人民民族自豪感教育知识分子这一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榜样的榜样，成为具有坚定不移的意志、善于对抗外国间谍机关任何阴险狡猾的行动、时刻准备在任何条件下不惜任何代价保卫苏维埃国家利益和荣誉的榜样。

我们荣誉法庭的任务是：捍卫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崇高称号，保持这个称号的纯洁性。荣誉法庭应该成为完善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的有力杠杆。

我们将选举优秀的、值得信任的同志担任荣誉法庭的成员。

我们要让我们的领袖和导师、亲爱的斯大林同志相信，我们将以无限忠于列宁—斯大林的党、无限忠于我们强大的苏维埃国家的精神，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对我们的知识分子和我们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布尔什维克教育的事业！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同志万岁！

英雄的布尔什维克党万岁！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繁荣富强！

№044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苏联部长会议和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荣誉法庭的决议

（1948年4月5日）

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以下决议提交联共（布）中央委员进行表决：

关于成立苏联部长会议和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荣誉法庭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①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议如下：

1. 为了加强党和国家纪律，同有损苏维埃和党的领导工作人员的尊严和荣誉的涣散现象，反国家行为进行斗争，成立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荣誉法庭。

2.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荣誉法庭负责审理联盟各部正副部长、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各委员会正副主席、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各总局正副局长、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反国家和反社会的过错行为。

3. 荣誉法庭共由5人组成——1名庭长和4名法庭成员，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任命。

① 该决议的草案由H丹诺夫和苏斯洛夫受斯大林的委托起草。1948年4月6~7日，征询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们对政治局通过的决议的意见，并将此文件作为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决议。

关于中央各机关的“荣誉法庭”

4. 关于是否将案件提交荣誉法庭进行审理的问题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

5. 荣誉法庭在审理案件之前，应该对事实进行核查，此项核查由法庭成员根据庭长委托进行。庭长决定谁应该作为证人被传唤。

应向被告出示事实核查结果，被告有权请求庭长传唤新的证人，出示文件和证明材料。

荣誉法庭为每个被审理的案件指定公开的公诉人。

6. 荣誉法庭通常是在公开的大会上审理案件。

荣誉法庭审理案件包括：审查所收集到的有关案件的全部资料，听取被告向法庭的解释和证人的证词，核查证据。

荣誉法庭审理案件时，联盟各部正副部长、苏联部长会议所属各委员会和各总局的领导人及其副手、各加盟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各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和各部部长、以及荣誉法庭邀请的有关人士可以出席，并可根据案件的实质发言。

7. 荣誉法庭的判决经法庭成员的简单多数票通过。判决书中应指明错误行为的实质和法庭所确定的惩罚措施。

8. 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荣誉法庭可以决定：

1) 对被告进行公开谴责；

2) 公开警告；

3) 提请中央监察委员会将被告开除出党或转为联共（布）预备党员；

4) 提请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于不适合担任现职者降职或免职；

5) 将案件移交侦查机关，以便按刑事程序提交法院。

9. 向受到荣誉法庭审判的工作人员公开宣读荣誉法庭的判决书。荣誉法庭判决书的副本进入被告的个人档案。

10. 对荣誉法庭做出的判决不得上诉。